

帝国主义在满洲

〔苏〕B. 阿瓦林 著

商务印书馆



K25/20

帝国主义在满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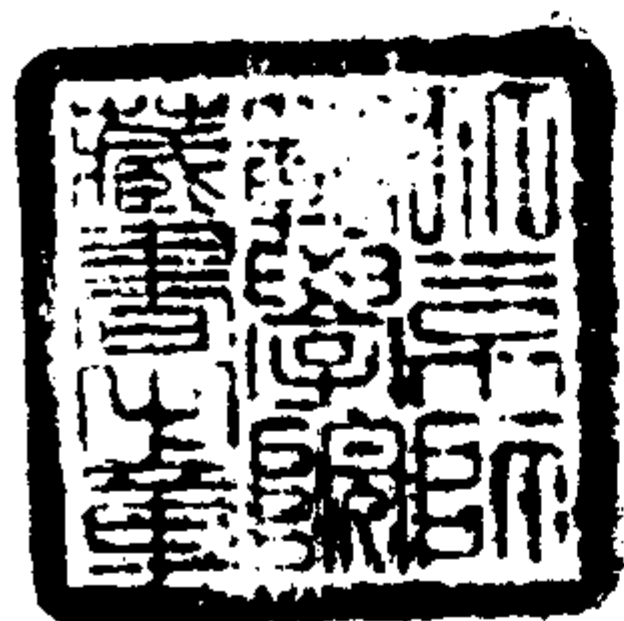
[苏] B. 阿瓦林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3874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753874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Авари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МАНЧЖУРИИ

ТОМ 1

Этапы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за Манчжурию

2-е пересмотре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здание

Ог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1934—Ленинград

帝国主义在满洲

〔苏〕В. 阿瓦林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³/₈ 印张 1 插页 366 千字

1980 年 3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64 定价: 1.45 元



阿瓦林这部著作的上卷第二版对各帝国主义者争夺满洲战略基地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叙述。本书所收集的实际数据非常丰富，并引证了大量确凿的外国史料和档案资料。作者在第二版中，把它一直叙述到目前为止。在新补充的三章中，B.阿瓦林介绍了日本的占领经过、帝国主义势力的分布情况和日本以满洲为战略基地的反苏战争准备。为了说明作者分析问题的精辟，可以特别指出，他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曾极为准确地预言了后来日本对满洲的入侵。

3.6/01

目 录

绪论

外国资本入侵前的满洲历史概况	1

帝国主义争夺满洲的各个阶段——第一时期

日本帝国的武装出动和沙皇专制政府的侵略	19
美国资本首次企图侵入满洲	39
关于满洲问题的矛盾尖锐化和列强的集团化	49
沙皇专制政府同日本的搏斗和瓜分满洲	65

第二时期

俄日帝国主义的联盟	113
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大战时期的逼攻	163

第三时期

十月革命后国际帝国主义在满洲	202
苏中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247
满洲封建军阀集团对夺取中东铁路的准备	262
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	270
夺取中东铁路是反苏战争的前奏	276
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287
满洲地方资本的发展	303
日美在满洲对立的危机阶段	319
冲突后的苏中关系	335

第四时期

日本占领满洲	343

日本的扩张和两个体系的斗争	367
在满洲的军事准备	389
军事铁路的修筑	390
土路的修筑	399
航空	402
通讯的装备和军事化	404
军阀在经济上的专政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406
军事工业基地的装备,工业的军事化	415
其它经济部门的军国主义化	423
用后备军建立军事据点	427
满洲国武装力量的组织	431
组织白匪	433
日本军队集结于满洲	436
反苏战争的思想准备工作	438
人名索引	442
地名、名词索引	451
译后记	481

绪 论

外国资本入侵前的满洲历史概况

5

关于住在现在满洲地方的古代居民及其经济结构和民族变迁等资料，主要可以从中国的历史记载以及在东亚地区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中获得。

但是不管哪种史料都很贫乏。其中年代记载经常混乱，使现代从事研究的人员搞不清楚，留下了大量的需要想象、推测的地方，对古代城郭和居民点的遗迹也很少考察研究。只是从十七世纪开始，才有了充分可靠和比较完善的资料，当时一个满洲氏族正在竭力征服和统一满洲-通古斯和蒙古部族。1636年，他们的一个类似“统一者”的首长在奉天开始称帝，同世纪四十年代，一个满洲的军事封建氏族组织利用中国将领要求帮助平息农民起义的机会入侵北京(1644年)，对农民起义实行血腥镇压之后，便逐渐占领了整个中国。

满洲人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现在满洲，在研究工作人员中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满洲人的祖先在中国史册中所记载的是肃慎氏族，他们在纪元前就定居在这里，就是后来为大家熟悉的称为挹娄的部族。当时挹娄族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文明：他们从事耕耘和牧养牛、羊、猪等家畜。农业经济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为建立强大的封建君主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粟末族的首长们在征服并统一了相互仇杀的部族之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历史上称为渤海国。这个国家从七世纪一直存在到十世纪。现在的

乌苏里边区也属于该国，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大量堡垒和城郭的残迹。渤海国的有些城市之间甚至筑有公路，到现在还能看到⁶它们的残迹。另外一些文物遗迹则证明渤海国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和生产力水平。渤海国人当时同中国和日本都曾互派过使节，并派青年去中国学习。他们甚至有过类似义务教育的制度。

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足以证明渤海国居民及其祖先属于满洲-通古斯部族。有一种意见认为，渤海国人属于朝鲜血统，而满洲人在较晚的时候才从西北来到现在的满洲。

不管怎么样，渤海国由于来自西面的游牧民族，即中国人所熟知的契丹族的人侵而灭亡。属于蒙古-通古斯部族的契丹族不仅灭亡了渤海国，他们还从布哈拉到山东征服了整个中亚。过去属于渤海国部族之一的女真族在十二世纪又顺利地推翻了这个游牧民族的统治，建立了“金国”，这个国家存在了一百多年以后，被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部族所灭亡。这些游牧民族一直烧杀到海边，使这一整个地区变成荒无人迹的地方后，遂又转向南方——中国。后来，成吉思汗的儿子在中国建立了世袭的王朝。

经过约四个世纪之久，在这块被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济生活又达到了可以统一那些离散的部族而建立一个大国的程度了。

位在东部长白山(今敦化县地区)一带的满洲-通古斯部族的酋长努尔哈赤相继征服了其周围从事农、牧、狩猎的通古斯族和一部分蒙古部族，随后又征服了位在南部地区的中国人。这个征服毗邻部族的过程发生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持续数十年之久。1637年，其邻邦朝鲜承认了满洲政权。

这时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满洲人迫切感到需要文字，而当时他们还没有。据中国史学家称，当时努尔哈赤命令采用蒙古字母作为满文，并用满文翻译了一些中文书籍等等。上述那些歌颂过清朝(大清)的中国史学家们提供了关于各个部族的生活情况及

其统一时间的资料。例如，当满洲国家在东南部已建立了巩固的中心时，中国史学家们对这个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描述时写道：

“虽然有些部族与满洲的政治机体融合在一起，但还存在着另一些独立的部族……他们过着变化无常的简单生活，在严寒边区的深山老林和河川里寻找生活资料，氏族间相互敌视，大自然的肆虐——所有这一切都必然迫使那些最弱者在某些地方去寻找为自己完全是偶然性能生存下来的可靠的依赖……于是在宁古塔开始出现从最遥远的东部地区前来的各种半开化部族，因而满洲王朝继续在其同族一代间把自己的领土更向东北扩展，把位在东面沿海一带的一些部族，即瓦尔哈(1599—1636年)、虎尔哈(1612—1644年)和窝集(1611—1639年)都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¹

与其它类似的情况相同，商业的发展对满洲-通古斯部族统一为一个整个民族起了重要的作用。把一些个别的小市场统一为一个大市场，是满洲王朝在其“同族一代间”扩大领地的基础。在生产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利用商业资本所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扩大了剥削领域，实现了某种的“民族统一”。这种统一的形成，是通过把毗邻杂居的并彼此有极其密切商业联系的各个外族并入本民族的政治机体内。当然封建制度中国的武力压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协力对外。可是这个新国家在尚未巩固的时候，邻邦中国就发生了变故，这就为“北狄”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在北面的强大封建军国主义国家迅速成长起来，而南面的明朝却接近末年。封建官僚统治机构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尤其是高利盘剥，简直是无空不入，在中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时以明朝最后一代皇帝为首的北京朝廷过着无比奢侈淫逸

1 鲁达科夫：《中国文史资料》，译自《吉林通志》，第1卷，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1903年，第7—8页。

的生活，而国内人民却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甚至有些年头，在中国中部的居民为了活命发生过人吃人的情况。¹

从广东到北京，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封建上层对此进行了血腥的军事镇压，但是农民起义仍然此伏彼起，日益壮大和发展。一个当过士兵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成功地把广大的农民武装联合起来，随着他的势力的壮大，不少下级官吏和大批军队都加入了起义队伍。农民军占领了帝都北京。

8 中国封建官僚上层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向“北狄”求援。在此以前，在满洲形成的强大军事组织已经从北面向中国逼近。当时明朝派往防御满人的军事首领和军队突然改变了作战方针。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中，根据当时文件曾这样描述过向满人求援的情况：

“吴三桂看到李自成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已无力与之抗衡，遂急切向满人求援，在此之前就已有过联系。他曾前后八次往返派使臣去晋见满洲亲王；满人的疑虑最后终于消除了，九亲王睿王率大军十四万往援吴三桂。当吴得知满洲大军已临近他的营地之后，他便亲往满军营房拜见亲王，在同其谈话时并自称为臣，他自己也按满人习俗薙发，并用白马祭天，黑牛祭地，断矢为誓。当他返回自己驻地后便命令老百姓都按满人习俗薙发，并敞开大门迎接满军到来。”²

精疲力尽的农民起义军被满洲生力军击败。一部分得以保全的本地封建主阶层渗进了大量的异国成分，而后者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都得由中国的劳动人民来奉养。

满洲人征服了中国，但自己的国家却大大荒芜了。满洲征服者把几十万本国人民甚至把一些“以鱼皮为衣”的部族（显然有些

1 约翰·罗斯：《满洲人——中国当代的统治者》，伦敦，1891年，第147页。

2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圣彼得堡，1857年，第96—97页。

氏族是属于果尔特、乌德海和鞑子族)都迁至中国。因为要在几亿人民中国的一些极其重要战略地点布置一些哪怕是不多的驻防部队,所需人员也是可观的。

最近时期(在清朝被推翻以前)在中国流行着一首歌谣,是这样描绘满洲人入侵的:

黑暗夜晚,突然袭来了无数铁骑鞑鞑。
啊!他们人数如此众多,
好象尘埃一样笼罩了整个中国。
太阳刚刚升起,我们连自己的服装也被迫改换了。
傍晚,他们就想把我们变成满人效劳的忠驯士卒。¹

的确,中国农民不仅被变成了士卒,而且被变成了真正的奴隶(甚至每个满洲士兵都分配到几个俘虏兵当奴隶),变成了既被满洲贵族、也被“自己的”统治阶级所剥削的农奴和半农奴的奴隶,即使不是用作直接的徭役,也是处在带有封建和高利贷性质的各种从属形式的奴隶地位。尽管如此,在满族统治初期,农民情况由于种种原因较之明朝末期还是有所改善,经济上也有了某些发展的可能。但是征服者自己——满洲人在中国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他们虽然具有保存自己封建-氏族组织和自己生活方式的愿望,虽然有禁止战败者迁往满洲本国的禁令(这一禁令在1878年才被彻底废除),但是满洲人的中国化却在高速发展。十九世纪末期,满洲人,甚至在他们的故乡,都开始使用中国语言²。现在满洲人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存在,只是在黑龙江省还有几个村庄,在那里的居民仍说满族话。

满洲人被同化的问题以及随同化而产生的各种情况将在另篇

1 M. 帕夫洛维奇:《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18页,《同时代人》,1911年,第11册。

2 参阅鲁达科夫的论文引文第10—11页;赫沃斯托夫:《奉天省记述》,圣彼得堡,1904年;齐托维奇:《吉林省军事概述》,圣彼得堡,1904年——人口部分。

里详细叙述¹。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仍是与满洲接壤的东西方邻国的那些最初意图和这些国家在满洲命运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后果。

当满洲国家刚建立并向南方扩展的时候，彼得大帝前期的俄国“新土地发现者”为了寻找“新的小块土地”和缴纳毛皮实物税者向满洲的北部接近。

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率领一队“志愿人员”（1643年）从雅库次克出发乘木船沿勒拿河、阿尔丹河，渡过结雅河^①顺阿穆尔河^②直达河口。诚然，远在1616—1618年前，托博尔斯克省将军就向中国“皇帝”和蒙古派过使节—丘麦涅茨、彼特林和蒙多夫。彼特林于1618年抵达北京（明朝万历皇帝时期），他在中国逗留约一个月，并带回托博尔斯克一份没有人能读懂的中国文书。这次彼特林使团没有明确的任务，因而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²

波雅尔科夫回来后，以其亲自见闻讲述了阿穆尔流域是块“新奇”和“富饶”的地域，这在“小块土地”和“缴纳毛皮实物税人”的寻找者之间引起巨大兴趣。继他之后，于1649年一位精明强干的市侩叶罗菲·哈巴罗夫带着一定的任务抵达阿穆尔。建立了阿尔巴津^③城堡后（在石勒喀河流入额尔古纳河的下游），新的“封建主”为了俄国沙皇和“为了自己的无限贪婪”向附近的部族收缴贡赋。习惯于西伯利亚的边陲冒险家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快使土著屈服于他们“火力战”的武力之下，但是使他们惊奇的是却遭到了拒绝和坚决的抵抗。土著部族已经是（或至少是附属）满洲—中国王朝的纳贡者。达斡尔人就这样回答过他们：“我们是给中国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② 即黑龙江。——译者

③ 即雅克萨。——译者

1 《帝国主义在满洲》，下卷（《帝国主义和满洲的生产力》）。

2 H. E.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一卷，1910年）认为最初的俄国使臣似乎是1567年到过北京的彼得罗夫和亚雷舍夫（第59页），但这是不正确的。对此还可参阅巴尔托里得的《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1925年，第187页。

皇帝纳贡，给你们纳什么贡呢？”

同满洲军队的几次冲突虽然都是俄国人得到胜利，但是当时沙皇的志愿前卫部队却陷入了极端困难境地，因为定居在阿穆尔以西的部族大部转向南方，向嫩江和牡丹江一带迁移。从事农业的达斡尔人、郭古里人、杜切尔人由于受到俄国冒险家——殖民者和“沙皇奴仆们”以“蒙古式”的独特侵扰结果（这种侵扰造成房屋破坏、粮仓被抢和拷打吓唬居民而血流成河）而向自己的封建主——北京皇帝求援。北京政府在同俄国人的几次武装冲突失利后，决定采取另外的斗争手段——迁移居民。

上述各部族迁移后，俄国的阿穆尔征服者被迫改为“低口粮配给制”，因为当时不仅贡物，甚至连粮食都难以弄到。此时满洲-中国军队继续在边境进行战争，并不时取得胜利。哈巴罗夫的队伍在乌苏里江口区域获得胜利后（1652年），他的继任者哥萨克军队下士斯捷潘诺夫已以莫斯科沙皇的正式代表身分到达阿穆尔河口，并沿松花江溯流而上。但在1658年，满洲-中国军队以相当数量的部队占领了阿尔巴津城堡并将其毁坏。城内居民一部分被屠杀，一部分被俘虏。1665年在俄国“流亡者”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领导下重建了这个城堡，但是时时遭到满洲军队的袭击和围困。¹

派到中国皇帝那里去的莫斯科使节巴伊科夫（1656年）和斯帕法里（1675年），在谈判其它问题的同时对中俄远东边境问题也应当达成协议，但是毫无所获。甚至不允许他们晋见皇帝。满洲人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容许异国人在自己祖国的边境设防，所以满洲人在那里不断集结极其可靠的有生力量以巩固其在中国的统治。

结果满洲人如愿以偿。1689年边境上的军事冲突以签订尼布

1 参阅《海事文集》，1861年，№ 5，《阿尔巴津及满洲人的围困》，第14—25页。

楚条约而告终。这是第一个俄中条约，也是中华帝国有史以来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11 俄国的全权代表是御前大臣戈洛文，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耶稣会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中国方面以军队数千人来加强力量，此外中国人还大肆宣扬另有三万多中国军队即将到达。根据条约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所有重大要求都作了让步。边界线规定沿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及其支流格尔必齐河，从格尔必齐河上游沿分水岭直达大洋一乌第湾。整个阿穆尔流域都归中国所有。阿尔巴津城堡应当拆毁。俄国人被驱逐出满洲后一百五十多年，俄国的远东边境一直保持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状态。¹十八世纪上半叶通过布连斯奇和恰克图条约（1727 和 1729 年）²进行了一次细节补充。根据这些条约，额尔古纳河上游边界线划定为由阿巴哈图哨所到沙宾达巴哈山隘。这实质上是俄国人再一次的让步，因为尼布楚条约已规定边界线是沿额尔古纳河至其河源为止，即至少要到扎赉诺尔湖为止。

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初，在北京已经有了俄国的传教士团，并派遣过特命全权代表，俄国代表曾数次提出关于阿穆尔的航行问题和“修改边界线”的问题，但是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³

十九世纪下半叶，正当兴盛起来的俄国商业资本、在萌芽期的工业资本推动下与农奴主结成联盟为其扩张而大力寻找新对象的时候，边界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 《俄中条约汇编》，1889 年，外交部出版，第 1—6 页。

2 《俄中条约汇编》，第 10—14，50 页。

3 1764 年，对不久前停止的贸易问题的解决是俄中两国政府十八世纪相互关系的特点。中国皇帝在自己的命令中指出：“贸易的停止使俄罗斯人感到不快，我则对所有的牲畜表示惋惜”（斯卡里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圣彼得堡，1883 年，第 140 页）。诚然，就是这“一个理由”，因为对贸易的停止，“俄罗斯”政府曾经提出过强烈的抗议，连中国商人也很不满。

四十年代末，俄国人又出现在阿穆尔流域，并开始修建城市、村庄和堡垒。1851年，靠近阿穆尔河口建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①和在河口上游建立了马林斯克；^②1854年建立了哈巴罗夫斯克^③；1856年建立了布拉戈维申斯克。^④

这次对外扩张已经不是想发横财的贪婪的“志愿者”、封建征服的得宠的代表、受到宗教迫害的旧教徒、为了逃避法律惩处和进行直接抢劫而流亡到边区来的犯罪分子等人们的半自发的行动了。这次行动的领导来自农奴主专政的中央——圣彼得堡，它沿着预先计划好的确定的路线向前发展。

俄国的商业资本正在大力发展，并开始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这就大大促进了俄国的向外扩张。1801到1860年间，俄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二倍半，国内棉花加工量增长得更大，俄国同东方的贸易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通过恰克图同中国的贸易也有了增长¹。不管尼古拉一世如何忙于练兵和近东事务，但他本人对恰克图的通商事务仍特别关注。早在1833年在皇室为资产阶级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还没有忘记询问一位制呢厂的厂主雷勃尼科夫：“你们在恰克图卖得最多的是什么？”²

① 即庙街。——译者

② 即阔吞屯。——译者

③ 即伯力。——译者

④ 即海兰泡。——译者

1 1833年出口布匹63.2万码，价值500万卢布，1841年已达到125.9万码，价值1,000万卢布。1800年进口茶叶311.1万磅，1832年——556.2万磅，1852年——920.8万磅。1831—1840年十年间，俄国对中国的年平均出口达810.8万卢布（纸币）；从中国的年平均进口——807.1万卢布。整个十九世纪，1852年为对中国出口的最高峰，达1,200万卢布。在此以后，俄中贸易就衰退下来，这是由于英国和其他列强通过“开放”港口冲进大量商品的结果。80年代的前半期，俄国从中国的进口又开始增长，1900年前达到4,600万卢布（主要是茶叶进口的增加）。本世纪中叶。在尼古拉一世时，俄国占中国贸易的第三位（《关税署统计课汇报》，《俄中贸易资料》，圣彼得堡，1909年）。

2 《俄国档案》，1891年，№ 12，《雷勃尼科夫在冬宫宴会上的叙述》，第565页。

对东方来说，俄国已成了一个“纺织品”国家。虽然阿穆尔地区本身作为一个市场作用并不甚大，但是它是通往太平洋、通往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和日本市场的必经之路。英国从中国攫取了大量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俄国占领这一地区的主要意义也就是想把它变成攫取这种财富的来源地。须知，涅维尔斯科伊最初就是把尼古拉耶夫斯克作为贸易商站来修建的，在此之后他查明了萨哈林^①不是个半岛，从阿穆尔可以驶入日本海而不必绕过萨哈林岛。

毫无疑问，彼得堡和东西伯利亚的行政首长们(穆拉维约夫)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反对英国的鸦片战争中(1839—1842年)所受到的挫败。嗣后，不断壮大起来的农民暴动，发展成为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软弱无能。1858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和黑龙江将军奕山所缔结的璦琿条约把阿穆尔以北的整个地区(实际上已为俄国占领)都划归俄国所有。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则规定由“大清国和俄国共管”¹。

- 13 中国人的软弱和退让已毫不足怪。中国的南方已被太平军所席卷，英法军舰炮轰了沿海港口。进行所谓第二次中国战争。英法资本的大炮发了言，要求广泛地参与对中国人民剥削的权利。

1860年，专门派往北京的俄国使臣伊格那提耶夫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了沿海地区。最初北京统治集团不仅不打算割让沿海地区，而且也不想批准璦琿条约。然而整个政治形势却又一次帮助了俄国“花布”帝国主义的代表：英法联军迫近大清首都。伊格那提耶夫充当了战争双方的调停者，说服优柔寡断、吓破了胆的中国

① 即库页岛。——译者

1 《俄中条约汇编》，第110—112页。

统治者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让步。为了对“调停”表示“酬谢”，清朝只能批准璦琿条约，并“割让”沿海地区，此外别无办法。俄国在贸易问题上也取得了各种优惠和让步。¹

这样，农奴主的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从三方面包围了满洲。但是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内部虚弱，以及距离新领地的遥远和隔绝，对所获得的领地迅速地加以消化是无能为力的，因而专制政权也只能暂时满足于所进行的掠夺。况且俄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浪潮近十年来已沿着它比较熟悉的道路转向更近的目标——近东和中亚。

根据穆拉维约夫和伊格那提耶夫签订条约规定的满洲北面的行政边界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现在满洲各省与苏联接壤的边界。

俄国农奴主和发展起来的俄国资本在到九十年代才对远东予以特别注意，他们在这里推行了广泛的侵略政策，对象就是满洲。

俄国资本主义，特别是俄国工业资本，远远没有成熟，也不具备侵占大片领土的足够的前提条件，却进行了突击，加速这种突击的原因之一，就是企图在满洲边境站稳脚跟的、早熟的、而且是凶猛的、赋有侵略性的日本资本主义竞争者的出现。

十六世纪下半叶，日本人曾暂时占领过与满洲毗邻的朝鲜，并妄图在中国中部沿海地区站住脚。经历着流血内战的封建日本从 14 十六世纪下半叶起产生过封建“中央集权”的倒退过程。最大的军事领袖之一丰臣秀吉打败了自己的敌人后，日本军队登上大陆，占领了朝鲜（1592 年）。丰臣秀吉的军队甚至渡过鸭绿江占领了南满，但是在同明朝军队进行几次战斗后被迫退出。后来（1598 年），日本人也退出了朝鲜，只是釜山港还被他们占领过一段时间。当时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比被日本封建主占领的朝鲜高。

1 《俄中条约汇编》，第 159—172 页。

最残酷的封建剥削有时竟使生产者丧失劳动力再生产的可能。日本统治阶层对农民-生产者的关系,充分反映在晚期的德川幕府给其藩臣们的训诫中。在这个幕府的文件中讲道:“向农民征收,要达到既不能使他们活,也不能让他们死的地步。”

高利盘剥的空前发展也加剧了经济衰退。¹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条件成为多次持续的农民暴动的起因。所有这些就不能为牢固地占领朝鲜创立条件。

早在 1867 年马克思就指出:“日本有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有颇为发达的小农经济,它提供的欧洲中世纪的情景,比我们所有历史书籍所提供的更为忠实可靠……”。²

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不彻底的上层人物的“革命”——明治维新运动(1868 年),成为日本以迅速步伐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转折点。

明治维新的“革命”不管怎样不彻底和没有完成,然而它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具有巨大的意义。七十年代的日本可怜得微不足道,“和俄国相比等于零”(列宁),但后来却赶过了俄国,沙皇-地主制度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作了些可笑的极不象样的尝试。明治“执政”的最初十年,为了把国家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政府措施。

在最初十年期间,日本新政府加紧创建了国营的工业、运输业和商业。但自 1879 年开始又把这些国营企业交给了私人经营,15 并对资本主义企业主加以保护和支持。下列数字可以说明日本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发展进程:

1 “亚洲形式下的高利贷长期存在下去,不能导致别的,只能导致经济衰退和政治腐化”(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2 篇,第 428 页,1932 年版)。

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575 页,1931 年版。

年 份	登 记 资 本 (单位: 千日元)				
	农 渔 业	商业和银行	工业(包括采掘业)	运 输 业	合 计
1869	—	25,434	—	—	25,434
1880	1,053	111,279	14,725	12,080	139,137
1895	2,542	169,254	68,259	57,945	298,000 ¹

上列数字和某些项目摘自当时的日本资料,其时尚无足够可靠的统计数字,不能认为是准确的,仅供一般参考。

由下列出进口总值可以看出日本工业发展第一阶段对外贸易额的增长情况:

年 份	千 日 元	年 份	千 日 元
1868	26,246	1887	96,700
1872	43,190	1892	162,420 ²
1877	50,770	1894	230,828 ³
1882	76,150		

1892年,出口达九千一百一十万日元,进口达七千一百三十二万日元,而日本的贸易顺差约达二千万日元。总之,在日华战争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输出超过了输入,自1882年到1895年期间,出超额共达七千二百四十二万七千日元。

大多数原来的纯封建主迅速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企业主是这一阶段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已经与商业资本有联系的部分当权的封建主广泛利用国库资金以加速其原始积累。借助于国家补贴、用一次发给年金代替封建主们领取的月俸、为封建主偿付债

1 L. 巴兰廷:《日本企业的发展和性质》,《远东评论》,1926年6月,第271页。

2 波格列别茨基:《现代日本经济概论》,哈尔滨,1927年,第271页。

3 杜莫拉尔:《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巴黎,1903年,第144页。

务、把国营企业廉价转让给他们等等方式，使封建主们获得了巨额¹⁶ 财富。仅赎回薪俸一项就发给封建主二亿一千零九十一万日元，对采地所有者支付的债务，国家就花费了五千三百万日元等等¹。已经成长起来的封建主们（这些封建主们在此以前就已被金钱和家族关系把他们同最庞大的商业-资本主义商行结合在一起了）从事着资本主义活动，他们很快就创办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大企业。这些企业不久就具有欧美式的垄断性质（这已是日中战争以后的事了）。

然而必须指出，随着商业、工业和银行资本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残余在日本农业中仍继续起着统治作用。但在工业中在颇大程度上尚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奴役性的剥削方式，因为这类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生产消费资料工业的性质，而后者的建立需要固定资本较少，况且对这类工业也比较容易和迅速掌握。

许多封建残余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并按其特性来说，最多可以和“普鲁士的道路”相比），或者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或者为适应资本主义剥削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略有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很快掌握了欧美技术并已赶上欧美资本主义的日本资本主义，在其最初时期就感到自己岛国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许多极其重要原料的缺乏，农村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残余所决定的过小的市场容量，对劳动者进行半殖民地式的过高的剥削率，本国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大量遗留下来无所事事的藩臣——武士们的失业，所有这些，在其发展的初期就引起了日本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图。这就自然地把它注意力转向毗邻的中国一些“保护不好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正处在封建-农奴

1 杜莫拉尔：《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巴黎，1903年，第81—85页。

主的桎梏下，并被典型的亚洲式高利贷所吞食。欧洲各国的炮舰当时已在中国的沿海一带游弋。

距日本很近的牛庄¹，早在 1861 年就设有大不列颠的资本主义的代表——英国领事。牛庄的对外贸易额 1887 年以前就达到了一千万海关两。

日本首先把注意力放到离它“伸手可及”的朝鲜和日本列岛南 17 面的琉球、台湾诸岛。刚刚结束了长期南北战争获得胜利的美国资本，从七十年代起就企图渗入朝鲜。日本当然更有迫不及待之感，因为朝鲜的部分陆地离日本西南海岸最近，对它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朝鲜可以成为日本向东亚地区进一步渗透的最好基地和对付大陆入侵敌人的前哨。对日本的敌人来说，朝鲜可以成为进攻日本列岛的最好阵地。占有朝鲜，可以把日本置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1876 年，日本海军在朝鲜沿海进行了示威以后就同朝鲜缔结了条约。条约的第一条强调“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享有同日本同样的主权”。这样就使朝鲜脱离中国的第一步获得成功。此外，还为日本的贸易开放了釜山、元山、仁川各港口，并允许日本人进入朝鲜首都——汉城。过去美国和欧洲各国都有过同样的意图，但是都未成功。如果不算日本在釜山的商站，过去根本就未允许过外国人进入朝鲜，回忆一下这些事实，这个条约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

缔结贸易条约前的日朝贸易数字如下(纸币日元)²：

1 1858 年中英条约中把在南满最大河流辽河口的营口误称为牛庄。真正的牛庄在离海岸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既然过去把营口叫作牛庄，我们在历史部分仍沿用旧称。

2 斯卡里科夫斯基引自《在太平洋的俄国贸易》，日本资料，第 114 页。

年 份	朝鲜输出	朝鲜输入
1873	52,382	50,664
1874	55,935	57,522
1875	59,787	68,930
1876	82,572	81,374

朝鲜政府在条约缔结后尽管对日方的贸易多方加以限制，但是后者的增长仍极显著：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贸易额(千日元)¹

1877/78 年……348 1879/80 年……2,351

1878/79 年……1,244 1880/81 年……3,827²

- 18 朝鲜自日本输入的主要是从日本港口转口的欧美商品（日本垄断对朝贸易期间，来自日本的欧美转口商品占朝鲜输入的 88%）。

尾随日本而挤进朝鲜的还有其它列强，首先是美国、俄国和英国³。为了对抗日本人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俄国在汉城展开了积极活动（对朝鲜军队的军训计划，拉扎列夫港的占领）。同时英国，主要是为了对付俄国，也示威性的占领了朝鲜湾入口处一个岛上的汉密尔顿港（1885 年）。当英国确信这种示威对俄国起到相应作用后，就很快撤离了该港。⁴

1 《朝鲜记述》，财政部出版，1900 年，第 2 集，第 245 页（日本海关报告）。

2 B.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上卷。

3 美国同朝鲜于 1882 年缔结了通商条约，英国、德国——1883 年，俄国——1884 年（莫尔斯，第 3 卷，第 9 页）。

4 参阅卷宗第 200 号给驻朝鲜第一任代办维别尔的指示函件 25/10—1895 年，第 19—20 页；给什佩叶尔代办的指示 1/9—1895 年，革命与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基金会。

在日本国内早在七十年代暴发的旧制度拥护者的武装斗争还在继续,统治阶级不得不抽出相当的力量来对付这个斗争,这就削弱了他们对外政策的精力。

八十年代日本在朝鲜展开了新的积极活动。1884年,日本人策动的反华运动,其结局却变成了反对他们自己。在这次风潮中,日本外交使者被朝鲜人逐出汉城,后来中国的驻朝官员在军队的协助下恢复了秩序。这就是当时总的形势,日本人只好暂时节制一下自己的前进运动。根据天津条约(1885年),日本和中国都同意将自己的武装力量撤出朝鲜,以后遇有必要时,必须在相互书面通知后方能将军队开进朝鲜。

日本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控制朝鲜受到阻挠,便在经济上继续征服这个国家。日朝贸易额的增长在近几年间提高一倍多,即从1886年的二百五十万八千墨西哥元¹增加到1894年的五百六十九万七千墨元²。诚然,朝鲜同其他近邻国家——中国、俄国的经济关系也同时在发展,例如朝鲜在这一时期同中国的贸易从四十五万五千墨元增加到二百二十二万六千墨元;同俄国的贸易从一万四千墨元增加到二十一万八千墨元³,但是这些国家还是远远落后于日本。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地在七十年代还是有了一定的扩大。

1874年,日本对琉球群岛提出不可分割的控制权的要求(这 19 些岛屿的统治者在数百年间一直都承认中日两国的双重主权),并占领了台湾岛的一部分。由于某些欧洲强国的压力和存在着同中

1 其中——输入二百零二万墨元。

2 其中——输入三百六十四万六千墨元。

3 《朝鲜记述》,财政部出版,第3集,1900年,第176—179页。在此期间,朝鲜从日本和中国的进口中,欧美转口商品占的比重很大。

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威胁,日本才被迫撤离台湾,但对琉球群岛的要求并未放弃。1881 年,大清国政府终于承认了日本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帝国主义争夺满洲的各个阶段

第一时期

日本帝国的武装出动和 沙皇专制政府的侵略

在资本主义全速发展的条件下，由于所谓的“明治维新”的表面性和不彻底，日本仍处在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密网束缚中。这一状况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国内市场的萎缩。军事封建分子操纵国内政治统治权，他们刚刚完成了变更某种部署后，就力图为自己找到适应时代要求的旧的和新的根据。这对处在资本主义还未进入帝国主义最后阶段时期的日本对外侵略的加强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经过短时期的间歇后，日本在九十年代又开始新的断然的行动，旨在侵占清朝统治下的部分领土。这次日本的野心不限于朝鲜。日本开始在朝鲜采取坚决行动和关于朝鲜问题（要求行政改革之后日本人策动的宫廷政变、不宣而战的军事行动、朝鲜新政府对中国的宣战、日本“援助”朝鲜、缔结日-朝同盟条约），继而由于1894—1895年战争胜利的结果，要求割让奉天省南部（几乎满洲的全部海岸线——从辽河口到鸭绿江口）、台湾、澎湖列岛、承认朝鲜独立（即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独断独行权），要求二亿两军事赔款，赔款未付清之前，日本有权占领威海卫。清政府吃了败仗之后，感到自己内部的虚弱，接受了全部条件¹。看来，日本资本

¹ 参看马关条约，马克穆拉：《论文集》，第1卷，第24页。

21 主义已在大陆站稳脚跟并有进一步扩张的广阔前景，因为满洲的沿海地区不仅是对整个满洲，而且是对整个中国，首先是对包括大清首都在内的华北扩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坚固据点。日本占领朝鲜和威海卫之后，便成了毗连海域的主人，随时能封锁俄国自沿海地区向南方的出口和阻止任何国家的舰队逼近北京地区。

正在日本资本和军事官僚机构准备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俄国¹在德法两国的积极支持下“以断然的忠告”进行干涉。其结果日本被迫放弃了满洲，也丧失了自己在朝鲜的地位。

日本天皇于 1896 年 5 月 10 日发表声明（签订马关条约后不到一个月），其中宣称：“德俄两帝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共同建议将奉天省归还中国。我们接受友好国家的这一忠告并命令本国政府通知三国²。

11 月间同中国签订了关于归还奉天省和为归还该省付给日本“补偿费”三千万库平两的协定。

战争的结果，日本仍取得了对其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殖民地——台湾，除此以外，还获得了在当时极为可观的一笔军事赔款。这些情况，跟工业的军事繁荣和随之而来的打击了较薄弱企业的暂时不景气一样，也促进了资本的加速集中、托拉斯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发展。日本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在日本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各种因素、特别渴望殖民地、特别力图军事扩张的帝国主义各种因素都在迅速发展着。日本的这些因素跟在俄国一样，它加强了“对军事力量、特别是便于对外国人掠夺的垄断”

1 “……占领辽东半岛将对中国首都造成经常性的威胁并使朝鲜的独立成为幻想，因此必将造成远东持久和平的长期障碍。”“由于这种原因……为了表示对日本政府诚挚友谊的新证明起见，俄皇陛下政府希望本政府向日皇陛下政府提出自己诚挚友谊的新证明，兹劝告放弃辽东半岛。”法国和德国政府用同样的措词提出照会。而德国公使着重使用了表示威胁的语言（参看《满洲发展的报告》，大连，1929 年，第 179—180 页）。

2 马克穆拉：《论文集》，第 1 卷。

(列宁)。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日本统治阶级继续对邻近的领土,首先对朝鲜和满洲垂涎不已。

日华战争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侵入满洲、为 22 占领满洲的尖锐化的斗争开始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战争阶段来临了。特别是帝国主义者瓜分和重新瓜分中国这个巨大的半殖民地斗争时期也来临了,而满洲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争夺满洲的主角一开始就是日本和俄国,后者直到资本主义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为止。满洲一开始就引起了美国资本的特别注意,也是它的渴望的目标。渗透到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英国资本对满洲也一直非常“有兴趣”。在为满洲而搏斗的列强共同行动中法国和德国也经常叫嚷;其中每个国家对满洲都有或大或小的打算。此外,关于满洲问题提出要求或放弃要求往往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相互游戏中的一张王牌。

沙皇政府为了把日本从满洲和朝鲜排挤走而甘冒战争危险的坚决行动是由什么东西所引起的?¹沙皇政府所代表的统治剥削阶层对遥远的地区究竟有哪些意图?

为了更明确地提出这一概念,必须回忆一下当时沙皇俄国发展情况和趋势的某些资料。

俄法缔结同盟(1892年)后,法国黄金²开始大量流入俄国,它的工业在此以前已吸收外国资本了。俄国资本主义照常发展,虽

1 参看 1895 年 3 月 30 日的《特别会议记录》,案卷第 96 号,沙俄外交部最重要部分档案。在以下的引证中只指出莫斯科革命和对外政策档案中沙皇外交部最重要部分档案案卷号数。

2 十九世纪末,俄国工业主要依靠外国资本,当地俄国人资本仅占全部工业资本的 21%,其余资本都是来自外国(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第 3 卷,第 24 页)。据法国大使馆参赞维尔斯特拉特计算,九十年代末仅在工业方面的外国投资即达七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其中 72% 为法国、比利时的投资。这些资本主要是在九十年代流入俄国的。参看瓦纳戈的论文《十九世纪末的工业》,《1905 年汇编集》,《革命运动史》,第 1 卷,第 185 页,国家出版社,1925 年。

然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束缚阻滞了这一发展，而且比当时日本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保护关税在这一发展上却起了不小的作用。

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因为“大量保存下来的、与资本主义不能并存的旧机关”，“因为资本主义和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列宁）而遭受最大的痛苦。工业资本多多少少有成效地克服了各种障碍，尽管缓慢地，但仍以颇大的速度向前进展。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俄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半（1890 年为一千三百万卢布，1900 年则为三千二百万卢布）¹，大工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一百五十至三百万人）。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和旧的地主经济的解体，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农民的分化很快地进行着。铁路网及其供应者——冶金工业²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1885 年熔出生铁三千一百万普特（1 普特=16.38 公斤——译者），1895 年熔出生铁八千七百万普特，1898 年熔出生铁一亿三千六百万普特，1900 年熔出生铁一亿七千六百万普特³。贸易有了大规模的发展⁴。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新生的俄国工业资本的高位构成，生产于十九世纪初已高度集中。俄国资本的有机构成甚至比德国的还要

1 其中棉花的消费自 1890 年的八百万普特增至 1900 年的一千六百万普特（波克罗夫斯基：《俄国文化史略论》，第 1—2 集，库尔斯克，1924 年，第 122 页）。

2 1881—1890 年期间建筑了六千九百三十八俄里新铁路，1891—1900 年建筑了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五俄里新铁路，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Φ. 梁兴科：《俄国土地革命略论》，第 1 卷，列宁格勒，1926 年，第 139 页）。H. 瓦纳戈在《十九世纪末的工业》论文中（在 1905 年汇编集的引文中）列举了更大的数字：1891—1900 年建筑了二万零七百一十三俄里的新铁路（第 187 页）。

3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文化史略论》，第 121 页。

4 十九世纪末外国商品每年进口为五亿卢布，出口每年为六亿卢布，国内贸易年贸易额达到二十亿卢布（罗日科夫：《俄国历史上的城市与乡村》，莫斯科，1920 年，第 88 页）。

高。俄国一千工人以上的大企业所占工人的百分比大于德国¹。

俄国资产阶级开始过分强调自己的经济作用，开始谈论关于自己的主人翁的权利。下哥罗德斯克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伏尔加河流域之人》，因为俄皇尼古拉于 1896 年来参观下哥罗德斯克展览会和参加工商业全国大会而在象是一篇宣言中论述商人阶层：“商人阶层因其富裕是我们时代唯一强有力的。它是全能的。”²

工商业阶级的代表甚至开始攫取政府机关官职等级的最高级别。另一方面，贵族阶层的代表日益大量地和以较明显的表现形式成为资本的尉官。此外，一部分前农奴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资本家-企业家，直接关心于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良好的机会。沙皇政府不得不非常注意地来倾听资产阶级的呼声、它的需要和要求³。沙皇政府为了地主官僚上层的利益和为了王朝的利益而保持封建残余，同时在历史必然的压力下又促进“祖国的”工商业的发展。除了酿酒业和制糖业外，在工业中冶金业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自 1884—1895 年期间，俄国政府由于“保护关税主义”，仅铁轨一项付给工厂主的费用比从外国⁴ 购买铁轨还要多一亿卢布。“我国冶金业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工业部门更快地采取了‘国营的’形式”⁵。

1 二十世纪初俄国大企业占全体工人的 24%，而德国大企业只占全体工人的 8%（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第 3 卷，1923 年，第 26 页）。

2 《伏尔加河流域之人》报纸，1896 年 7 月 6 日，第 184 号《保持文书的体裁》。

3 参看财政部参事科别科 1896 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工商业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俄工业大会文件汇编》，下诺夫哥罗德，1886 年，第 1 卷）；波兰矿业第四次大会主席讲话（《波兰王国矿业第四次大会文件汇编》，第 360 页）等等。

4 叶尔曼斯基：《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运动》，第 1 卷，第 315 页（叶尔曼斯基根据巴洛德的资料引用这个数字）。

5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第 3 卷，莫斯科，1923 年，第 179 页。例如，1899 年官家消费了六千万普特金属，比这一年生产的多了一半（参看 1901 年 4 月 10 日《工商报》刊登的文章：《关于消除困难的措施等问题》）。1901 年官家消费了六千三百万普特金属，约相当于八千万普特生铁（巴洛德：《俄国未来的经济问题》，载《政治公报汇编》，1905 年，第 44 页）。还可以举出政府特别照顾冶金业的许多事实。例如，因为建筑西伯利亚铁路预付波洛夫采娃-斯基格里茨三百万卢布，以改建纳维日京斯基工厂，并按一普特以一百五十八至一百八十戈比的高价签订了五百万普特的钢轨合同（巴洛德：上文，第 45 页）。

同时已建成的宏伟的铁路本身给了资产阶级以巨额利润，使殖民地市场接近工业中心，把新的地区引入到强化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范围内，也给未来开辟了更加灿烂的前景。特别是西伯利亚铁路（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绵延的铁道）于1891年开始建筑，给俄国商业和工业资本开辟了远大的前景。B. И. 列宁论及九十年代工业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时写道：

“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把魔掌伸向拥有亿万居民的世界的另一洲——亚洲，那里在此以前只有印度和不大一部分边缘地区同世界市场保有密切的联系。里海东岸的铁路已开始为资本‘开辟’中亚细亚‘大西伯利亚铁路’（所谓大，不仅指它的长度，而且指建筑人无限掠夺国家金钱，无限剥削筑路工人）开辟了西伯利亚”……¹

25 “西伯利亚大铁路”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俄国资本即将来到俄国以外远东广阔领土上的问题，这些领土直到现在几乎完全在俄国资本活动范围以外。首先俄国资本当然对邻近俄国边境的地区——蒙古、满洲和朝鲜——有野心。沙皇政府当时远东政策的指导者维特在自己的报告中把沙皇教训了一番：“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不达四亿六千万，而当代国际贸易额不少于五亿金卢布，远还没有把自己同欧洲的贸易关系发展到可能的限度，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正处在开始的阶段”。“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欧洲文明各民族都致力于占领东方亚细亚市场，毫不吝惜任何代价”。根据维特的说法，由于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结果，其所发生的变革必须“不仅有利于俄国这个亚洲东方和西欧产品贸易交换的中间人，而且也有利于俄国这个最接近亚洲东方各民族的大生产者和消费者”²。

1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2 Б. А. 罗曼诺夫：《俄罗斯在满洲》，列宁格勒，1928年，第58页。参看格林斯基：《俄日战争序幕》，彼得堡，1926年，第10—11页；M. H. 波克罗夫斯基：《日本的战争》《1905年汇编集》，第521—523页。

日本军事-警察帝国武装军队的出动、占领朝鲜和南满洲是企图赶过自西方快要来到的可怕的竞争者。

关于日本的出动所掩盖的动机，在彼得堡也猜透了。在讨论对日本施加影响问题的“特别会议”上，维特认为“日本所从事的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后果。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旨在反对我们¹”。

必须回忆一下，当时俄国统治阶级已确定两条俄国扩张的路线——向近东和向远东。如果把“文化任务”、“历史使命”等等语言的外壳抛开，那就应该承认，问题只不过是：俄国统治阶级把自己的侵略矛头指向何处最适宜，同竞争者争夺哪些领土最适宜，而把其中哪些领土提供给竞争者作为报答某种协助的补偿。

如果除去波斯，那么地主和商业资本为了自由输出农产品首先关心的是在近东侵占海峡。起初远东未引起他们的特别关心。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在当时曾遭到地主的强力反对，因为害怕西伯利亚谷物的竞争和廉价的“人手”外流到新的地方。一开始就关心 26 远东各方面有希望的辽阔的市场和领土的主要是工业、属法国资本的“派生”企业、银行资本以及在俄国有很大影响的法国资本本身。

德国竭尽全力，使俄国的扩张转向中东和远东、远离巴尔干和远离近东——沙皇政府侵略意图的传统目标。德国自己现在把魔掌伸到这儿了。德国资本主义因此打算把远东作为补偿而开始同俄国一起反对日本在亚洲大陆²立足的意图。法国也参加了自己盟国的活动。因为在中国占优势最早的英国对日本的胜利感到很害怕，所以俄德法的活动比较容易成功。

1 参看案卷第 96 号，1895 年 3 月 30 日《特别会议记录》。

2 德国最初对中日纠纷完全不参与，现在声明准备参加一切步骤，如果他们认为这种步骤对付东京是必需的。外交大臣于 1895 年 3 月 30 日在特别会议上这样报告（参看案卷第 96 号，1895 年 3 月 30 日《特别会议记录》）。

虽然后来当彻底弄清楚了日本的要求时，英国迁就了这些要求（诚然，因为辽东半岛的割让威胁俄国的利益和北京的独立，但是“中国政府若把首都迁到对英国影响最大范围的南京¹，就能使这一威胁完全失效”），但未采取任何重要行动来支持日本。

不能说俄国的活动标志着它当时就决心向远东扩张并放弃近东的“目标”。沙皇政府只是利用形势想在这里和那里两处都得手。但是在成功的“外交行动”之后，部分由于惯性和德国的挑拨性的催促，部分由于能扩大对巨大的中国人力的殖民主义剥削的诱人前景，沙皇政府的扩张矛头就基本上向着远东了。

沙皇政府从大陆排挤日本²之后，自己力图剥削满洲。它投入了大量资金，为一小撮有利害关系的剥削者开始创造了发横财的各种机会。

1900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写道：“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
27 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很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制度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这里倾销工业品，从中牟利。”还写道：“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列宁把掠夺者的侵占方法和“基督教徒立功”的鲜明图景加以描述之后，开始论述侵占满洲。“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它简直象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

1 金贝尔莱勋爵致哈茨非尔德的声明。《新东方》第6期，格里姆：《中国问题》，第49页。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回答沙俄外交大臣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对于任何强迫措施或敌对日本的行动拿不定主意，因为英国的“社会舆论在最近日益倾向于日本人方面”（波克罗夫斯基：《日本的战争》，《1905年》汇编集，第525页）。

2 康拉德教授认为日华战争已使日本在大陆站稳脚跟了。“1894—1895年的日华战争完成了第一阶段，它以胜利结束并使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站稳脚跟”（康拉德：《日本》，彼得堡，1923年，第160页）。但是这一观点与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列宁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狂妄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并回答：“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实行冒险政策，是因为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升官发财，建立‘功勋’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断然牺牲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暴露出自己是甘愿充当资本家大亨和贵族的奴才的昏官的政府。”¹

在需要冒险政策的“一小撮贵族”中间就有“头号贵族”尼古拉·罗曼诺夫，他认定侵占满洲和其他地区以及与此有关的“功绩”是王朝的光荣和巩固，是把资本主义、军事封建剥削和直接掠夺扩大到新的亿万异族人身。在工业资本集团中间，除了军事工业以外，首先是整个冶金业对侵占满洲有兴趣，它供给了铁轨、钢铁结构和机车等等。毫无疑问，在沙皇政府远东扩张中寻求迅速发横财的资本家大亨中间也有巴黎银行所培育的俄国金融资本 28 的代表。

同中国做生意的一小撮资本家大亨：茶叶进口商²、纺织品和

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

2 1899—1900年俄国从中国输入三千五百九十万卢布的茶叶，中国全部茶叶输出为五千三百七十万卢布；从中国输入一百一十多万卢布的丝和丝制品，中国全部丝和丝制品输出为一亿三千四百五十万卢布（费奥多罗夫：《东方商业利益的竞争》，载《政治公报汇编》，1903年，第92和103页）。

石油出口商¹对此也感兴趣。

沙皇政府此时在自己的远东政策中反映出了这几小撮剥削者的意图和利益。

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将详细地考察统治阶级各派系在沙皇政府的向远东和满洲扩张中的立场以及伴随这一扩张而来的各种具体情况。顺便应该指出，有个叫 И. 克尔音的在不很久前企图证明沙皇在远东的政策是对的。例如，И. 克尔音这样断言：当英国、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在亚洲追求剥削目的而在这里看到了富庶的市场时，“俄国只是为了欧洲地区的过剩人口在亚洲寻找地方”。这位“历史学家”又说，如果俄国和日本平分满洲并在中国其余地方划分势力范围，那末俄日之间就形成自然同盟了（异体字是克尔音标的），两国之间新的流血冲突的幻影也就永久消失（异体字是著者标的），对两个民族和世界文明都是有利的。根据克尔音的意见，那时，“我们在亚洲的历史任务就算完成了”²。

1 1898 年美国输入中国的煤油为九百三十万卢布，俄国为三百万卢布；荷兰从东印度为四百万卢布；1900 年美国输入中国的煤油为六百六十万卢布，俄国为七百万卢布，荷兰从东印度为三百五十万卢布；1901 年美国输入中国的煤油为九百四十万卢布，俄国为四百四十万卢布，荷兰从东印度为五百九十万卢布。出口商在对东方各国的煤油出口中获得的暴利不下 50%。

1899—1900 年中国输入棉织物为五千九百万卢布。其中俄国输入中国的棉织物为四百万卢布。大不列颠占第一位为三千六百六十万卢布，美国占第二位为一千七百万卢布。同时从中国输入俄国的棉织物为一百七十万卢布（费奥多罗夫：同上书，第 89—91, 105, 310 和 311 页）。

2 克尔音：《日本。文化、历史和经济概论》，国家出版局，1924 年，第 85, 87 页。在这本“著作”的许多奇谈怪论中，就有象下面那样不需要注释的莫明其妙的“词句”：“毫无疑问，日本人是亚洲最先进的民族”……“但是他们的文化是纯物质的，关于精神文化，尤其是世界性的精神文化，直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将来也未必能听得到。亚洲的一切都已经过去。它能说的都说了，它没有什么再说的了”（第 42 页）。“不用说，这种极其复杂的工业（化学工业——著者）产品的质量是不能与标准的德国生产相比的，因为这种工业在思想和经验中与高度的直觉才能有联系，而突厥—蒙古人的精神气质天生就不赋有这种才能。”（第 73 页）

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和虽然年轻、但已经历了强化积累²⁹和集中过程并以快步走向垄断阶级的日本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来自俄国方面的威胁面前迅即退却了？它为什么让自己丧失全部胜利果实的四分之三(如果不超过的话)，并深知竞争者不仅使它丧失这些果实，而且刻不容缓地想把这些果实攫为己有？我们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回答。朝鲜银行正式出版的《满洲经济史》关于日本退却的原因简单而明确地指出：“对中国的战争耗尽了财政和军用品的储存，对三大国的联合干涉加以抵抗，可能是缺乏理智的行为。”¹

日本资本不得已退却了……等待时机。而俄国在日本资产阶级的心目中，在很大程度上在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民心目中得到了一个民族敌人的声望，迟早要同这个敌人进行生死的斗争。俄日战争前的全部时期，日本都是在准备这一斗争、争取进入大陆、其中包括满洲领土的权利的情况下渡过的。日本政府有时向彼得堡建议瓜分远东地区而进行妥协，但每次都遭到沙皇政府的拒绝，它认为朝鲜、满洲和整个华北“是俄国命中注定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1896年)，日本特使山县提出瓜分朝鲜的建议最有意思，“日本准备让出朝鲜东西海岸各港口的大部分领土，自己只保留半岛的南部”。山县也建议成立反英同盟²。1898年在签订著名的关于朝鲜问题协定时，日本代表西(德二郎)又向罗申提出关于划界建议，但也未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

政治上的野心未得到满足、成立同盟的建议又遭到拒绝的日本资本无论在朝鲜，或是在南满经济上却日益强有力地稳固下来了，贸易额在不断地增长。诚然，对南满的全部贸易额是由大豆及

1 《满洲经济史》，汉城，1920年；S.米诺卜：《朝鲜银行的统治者》，第26页。

2 参看案卷第200号，《沙俄外交部关于高丽问题给尼古拉二世的节略》，1899年2月9日。

其加工品的输出所组成，但是这样的贸易就巩固了南满同日本的经济关系¹。根据英国驻牛庄领事馆的资料，日本经过拚命努力，把棉制品塞进满洲已有了“极大的成绩”，日本棉制品对满洲的进口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

根据英国领事馆的报告，牛庄同各国贸易数字如下表(单位千英镑)²：

年	英 国		香 港		日 本		俄 国 及 满 洲		美 国		欧 洲 (无 俄 国)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单 位 千 英 镑											
1895	—	—	16	55	—	159	4	—	—	—	—	—
1896	2	—	279	72	23	517	12	1	—	—	—	—
1897	3	1	184	60	41	755	7	—	—	—	—	—
1898	2	1	84	62	84	947	24	—	—	—	—	—
1899	29	—	299	88	259	1,214	38	—	140	—	11	—

(这些数字可能不完全准确而且有些偏颇,但是描述了关于一般图景的正确概念。未填数字的空格,是因为数字微不足道)。

横滨正金银行于 1900 年在牛庄开设分行³。

沙皇政府排挤日本之后，依靠法国资本立即着手在满洲确立自己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在朝鲜也进行同一方向的尝试,力图加强自己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为了彻底巩固“亲善”，彼得堡政

1 根据日本资料,1898 年经过牛庄港口对日出口达六百六十八万四千海关两,1899 年为八百零九万一千海关两,占该港口全部出口的 35%,输出口到国外的为 4%,其余全部出口都是输向中国各口岸的(《满洲经济史》,第 28,29 页)。
2 基比卢斯:《关于我国对日战争的原因》,《政治公报汇编》,1905 年 第 33 页。
3 《关于满洲发展的报告》,大连,1929 年,第 103 页。

府在初期对中国执行故意引人注目的“亲善政策”。签订马关条约后,1895年夏,北京面临立即付给日本第一批军事赔款问题,俄国政府以法俄借款四亿法郎贷给中国,其条件在当时是比较有利的(年息4%)。

1896年春,经过某些迁延和周折,俄国获得了自己对中国“亲善”的报酬。洛班诺夫—李鸿章(正确地说,维特—李鸿章)条约(5月22日)给予俄国通过北满建筑铁路的权利。这样一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段横贯中国领土。诚然,如果不答应给李鸿章(中国的俾斯麦)¹ 三百万的贿赂,租让权的获得是办不到的。秘密条约(其中包括关于未来中东铁路条款)还是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是预防亚洲大陆不受新的其他国家的侵入。这个条约如第1款所说的是直接反对日本的²。

1896年8月末,建筑中东铁路的合同签字了,从这时起俄国以“坚定的步伐”进入满洲大地。双方对于必须“报答”俄国“友谊”的信心是那样强烈,以致总理衙门(即清朝外交部)还在1895年秋天就准许俄国工程人员在满洲进行勘探³。但还在这以前,沙皇政府为了经济上侵入满洲和侵入整个中国便开始了组织上的措施。贷款给中国以后,立即以加快的速度并在法国银行家参加下成立俄华银行(又称道胜银行——译者),该行在中国金融、经济活动方面具有广泛的任务⁴。

1 后来李鸿章只领到一百万。

2 第1款规定:“无论日本对东亚俄国领土进袭,或对中国和朝鲜的领土进袭,都将被视为立即适用本条约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崇高的缔约双方必须以其当时所支配的全部陆、海军相互支援。在双方军队的供应上尽可能相互协助。”(格里姆:《条约汇编》,莫斯科,1927年,第105页)

3 工程人员斯维尼亚金和安德里安诺夫勘探队。

4 1898年夏季发行追加额的股票,俄国政府买走了全部股票,这样就成为25%以上固定资本的占有者了。1902年,俄国政府又买了二万股额,占有固定资本53%。

因为贸易额的扩大(主要是输入的增加),到俄华银行成立时,通常货币汇兑已达到可观的数额。例如,1893年一个季度从俄国汇至中国为一百五十四万英镑和十四万二千银卢布(格林斯基:《俄日战争序幕》,摘自维特档案材料,彼得堡,1916年,第216页)。

根据 1896 年条约,建筑和经营经过满洲铁路的权利名义上给了俄华银行。俄华银行理事会代表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建筑和经营以及为此目的成立特别股分公司——中东铁路公司的合同。

中东铁路公司实际上是完全虚假的机关,因为股东实质上只有一个俄国政府,而各机关的代表——官吏被任命为公司的理事。

32 俄华银行和中东铁路公司是作为装门面的幌子,用来掩盖俄国入侵满洲和这一行动的政治作用。参加俄华银行的法国资本,未参加中东铁路公司,在该公司也不起影响。

给予俄国政府铁路租借地的条件和实际情况,都未使中国政府对签订条约和合同的实际意义产生过任何怀疑。

条约第四条保留条件:铁路“不能成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皇帝最高权利的任何借口”,不过是空洞的词句,因为条约和合同的其余各款已使俄国成为北满事实上的主人。军事同盟条约规定,可以自由利用铁路来完成俄国的军事目的¹。根据建筑铁路合同使中东铁路公司获得了“管理所属土地绝对和特殊的权利”、架设电讯设施权;中东铁路公司的收入免除各种课税;中国政府对该公司的活动实际上不应进行任何监督²。准许沙皇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入北满,就意味着为将来正式吞并这一地区创造了前提。

中国在沙皇俄国面前的完全投降,充分说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叶所处的经济和政治衰败的状态。

欧洲商品侵入中国的结果,封建剥削者的欲望特别增大了。他们为满足今天尽量榨取农民的一切,完全不顾生产者能否保有劳动力再生产的可能性。

加倍盘剥的、亚洲式的高利贷在满族统治的后半期获得了广

1 参看 1896 年 5 月 22 日俄华条约条文,《阶级斗争》杂志第 1—2 期,1924 年,Б. 罗曼诺夫的文章:《李鸿章的股金》,第 101 页,或格里姆:《条约汇编》,第 105 页。

2 参看《俄华间关于铁路、邮电、海关问题协定》条文,第 9—12 页;1915 年以来《外交部公报》附录。

泛的发展，它使中国经济衰落和官吏营私舞弊达到了极点。封建官僚们认为高利贷、贿赂行为跟对农民榨取“合法”捐税同样是正常现象。边疆各省的封建暴君和中央大部分封建官僚上层都被各国所收买。其中俄国花费几十万卢布主要是用来收买边疆的将军们的。对李鸿章行贿是自然的事情。只有在俄帝国主义统治权的 33 建立威胁到要代替中国统治阶级对劳动大众剥削者地位的情况下，以及被别国收买的人员已从各该国领到有关任务的情况下，才能指望中国统治阶级会抵制俄国的侵略意图。

对落后的、大部分受各省范围限制的、亚洲式的高利贷资本来说，不在它（高利贷资本——译者）的势力范围内的某些省的沦落（意即沦为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译者），是不重要的。主要的人民大众——受压迫的农民，如果反抗封建农奴制的不能忍受的条件，那么大部分也只限于县和省的范围内，对于在遥远的满洲所发生的事情，很少关心。只有一部分商人阶层和知识分子反对俄国人侵入满洲，但他们既软弱而又无势力。

满洲本地人口极稀少（约三百万），极大部分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外来的（来自华北各省和南满）。他们不抵抗俄国人入侵，是自然的。

在侵占满洲的同时，俄帝国主义在朝鲜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朝鲜国王在其首都从日本人的势力下逃奔俄国公使馆，在这里呆了一整年（到 1897 年 2 月），并采纳了俄国的“友谊”劝告。朝鲜国王甚至请求接受他的国家作为俄国的保护国，对此尼古拉“个人”表示同意¹（部长们不知道）。俄国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到达了朝鲜；国王下令在建筑铁路时采用俄国宽轨。彼得堡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两项协定。该两项协定正式规定了俄日在朝鲜的共同统治，但是因为国王留驻在俄国公使馆以及朝鲜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的

1 R. 罗申：《波特氏外交年鉴》，伦敦—纽约，第 1 卷，第 125—126 页。

仇视态度,事实上俄国此时是占优势的一方,甚至企图从朝鲜海关赶走英国人。

这是中国实际上处于俄国的保护国地位的时期。俄国在当时对北京政府具有比英国大得多的影响,在此以前的很长时期内,英国独占地支配着中国。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结束了。

34 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1897年12月)和在强大的压力下强加于中国政府的关于租借辽东(关东)半岛南端二十五年、该半岛其他地区中立化(俄国有权否决中国向外国人提供租借地)的协定和建筑自哈尔滨至南满海岸不冻港约一千公里的铁路¹,特别激起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的积极性,并完全破坏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俄国“友谊”的威信。沙皇政府同时提出其他的强求,这些强求清楚地说明“保护者”想使“被保护者”完全受自己的支配。沙皇政府的无止境的贪婪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要求发生了冲突。对日本发现的“一块美味的肥肉”,除俄国外,其他国家的饥饿的资本也垂涎不已²。

当沙皇政府签订中东铁路干线合同时,也从事拟定今后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中国的庞大计划。德国看中了山东的胶州。急速成长的德国资本主义此时急于寻求殖民地,其中之一选中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额虽然不特别大,但已很可观(九十年代末在中国的贸易额中占第六位)。

沙皇政府作为中国的“保护者”应该提出抗议并要德国人退出胶州。中国政府向自己的“保护者”提出了请求。但是沙皇政府不能这样作,因为今后如侵占中国任何一块土地和获得新的权利时,不仅会遭到远东邻国日本的积极抗议,也会遭到西方可怕的近邻

1 《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6年)》,第331—337页。

2 “日本变为工业国家之后,克服了万里长城的障碍,发现了那样美味的一块肥肉,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甚至意大利的资本家立即咬着这块肥肉不放”(《列宁全集》,第4卷,第165页)。

德国的积极抗议。

如果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坚决抗议,德国最终很可能退出胶州,认为在当时为了胶州而使关系尖锐化是不合算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也势必暂时放弃公开的侵略政策,同法国资本一起走上缓慢的经济上征服中国的道路(至少在国际形势大变化以前),但是法国资本可能要求不使自己居于次要作用的地位。沙皇政府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如一般在其全部远东政策中一样,维特基本上无疑地力图执行俄国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及与其有关连的法国资本所希望的路线。某一部分商业资本也拥护维特的政策。

在庞大的计划下,但在中国现实利益比较少和在中国以外有充分活动范围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在现时倾向于进攻性的,但是慎重的、无危险的政策。 35

比较薄弱的、刚刚开始转为垄断阶段的俄国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因为有侵占满洲和全中国的广泛计划,力图尽可能少冒风险,在现阶段联合其他盟国的资本通过经济的侵入和利用有利的国际局势以获得新的“世袭领地”。

在沙皇政府中居领导地位的军阀和上层贵族坚持另一条路线。以王朝为首的军人和非军人贵族都力图急速奔向远东,沿着“爱国主义万岁”的路线前进,引向冒险政策。代表军事工业和军用造船业的一部分工业资本同这一条路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一伙坏人中无所损失。所得的是升官、勋章和供应杀人武器赚得的千百万利润。转移群众注意力的企图也推动他们去冒险,因为群众日益大声地对现存制度表示他们的不满。剥削者的有利害关系集团的这两条路线都直接反映在沙皇政府的远东政策中。

第一条路线在极大程度上体现在维特身上,虽然他也主张妥协,因为他与对第二条路线有利害关系的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维特支持西伯利亚铁路经过北满直线化的计划。他拟定有向不冻港修铁路的计划、在中国本部建筑铁路的计划和侵入中国中部、南部、扬子江流域——英国资本世袭领地的计划。在维特的协助下成立了俄华银行、俄朝银行、开发满洲矿产股分公司等等。

维特的胃口是极大的：“占领满洲不是俄国的最终目的，俄国应分得这个中国巨人的大部分，因为迟早它将成为欧洲外来人的猎物”¹。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向导者在这里强调，在现阶段吞并满洲应该“以自然的步骤”来完成，不要太性急。因此当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为了回报德国占领胶州而建议占领大连港时，维特表示坚决反对。

36 诚然，俄国政府仍然决心侵占不冻港来补偿自己，以代替抗议德国侵占胶州，俄国舰队在“旅行者的顺遂港口”——旅顺口²和大连湾停泊了。维特考虑到既成事实，也就在中国执行强化的进攻政策，然后对已侵占的地方加以积极的防御。

但是，甚至俄国舰队已在旅顺口停泊，中国国旗也在那里降下来了，甚至在同大清政府签订了关于租借旅顺口协定前不久，维特还在自己的圈子内进行说服：“为了能强使日本人离开威海卫，我们应当暂时放弃旅顺口和大连湾”³。

无疑，根据维特及其心腹的授意，《公民报》和《彼得堡公报》还在1898年秋天就刊登了果敢的文章，反对占领旅顺口，声称这一步骤是应该纠正的错误⁴。

直到俄日战争以前，维特在政府机关往来文件中一再抱怨占领辽东的不适时和危害性。

1 格林斯基：同上书，第338页。

2 中国的旅顺口的意义是“旅行者的顺遂港口”。

3 参看案卷第111号，1898年2月3日维特致拉姆兹多尔夫信的副本。

4 参看案卷第810号，第145页。

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内幕很少披露（甚至维特也不知道是否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同时在沙皇政府的这一行动中订立契约一方——中国政府所表现的非常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值得注意。北京政府希望俄国（为履行莫斯科俄华防御条约）出来反对德国侵占胶州（俄国代表曾保证有希望解决）而同意在自己的领土上必要时给俄国人以各种优待。俄国代办于1897年11月电告俄国外交部：“中国大臣们说，现在无条件同意把从未向其他外国人开放过的港口对我国军舰随时开放，并于必要时将中国官方军火库、仓库等等提供我方使用。”¹ 几天后，俄国外交部答复巴甫洛夫代办：“由于中国已同意，我国舰队立即在海军少将列乌诺夫指挥下开进旅顺口。必须发出指示，对舰队予以友好的欢迎”²，就这样在保护中国的幌子下完成了对辽东的侵占。

1898年2月间，俄国外交部致电巴甫洛夫代办：“俄皇陛下深信，中国皇帝政府将保证作为中国的天然保护者的俄国在黄海沿岸拥有强固据点，并着手缔结关于租用旅顺口和大连湾的书面协定”³。

德国和俄国“获得这些权利”之后，其他列强也纷纷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法国提出关于海南岛不得割让给第三国、关于铁路租借地、关于租借广州湾的要求；日本要求福建省不得割让给第三国；英国强占威海卫和扩大香港领土；美国企图在福建省沿岸建立自己的加煤站，等等，等等。俄国“保护者”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尽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公然分割中国领土，夺取它的主权，而俄国对中国不能给以任何实际的支持。

不仅如此，如我们所看到的，沙皇政府自己不满足于北满，而

1 参看案卷第113号，《旅顺口和大连湾》，1897年10月23日巴甫洛夫的电报。

2 同上，1897年11月29日外交部致巴甫洛夫的电报。

3 参看案卷第113号，1898年2月11日外交部致巴甫洛夫的电报。

走在掠夺者的前列,侵占了南满港口。因为这一步骤,沙皇政府的主要王牌——对中国的“友谊”完全丧失了,整个局势也起变化了。彼得堡政府不得不把以“友好”条约形式侵入中国的广泛计划丢开和缩小对朝鲜的胃口,以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满洲。

表示既是防御的同时也是退却的第一批措施有:对于朝鲜,签订了俄日议定书(1898年4月25日),该议定书第三款承认“日本在朝鲜工商企业的广泛发展”,同时确认俄国帝国政府将不妨碍日本和朝鲜之间商业和工业关系的发展¹;对于中国,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俄国和英国交换了关于铁路利益范围的照会(1899年4月16—28日)。俄国在自己的照会中承认扬子江流域为大不列颠势力范围,而英国则承认长城以北的领土为俄国的势力范围²。黄河流域作为未划分的范围加以保留。

1 《条约和关于远东问题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第346—348页。

2 《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第358—364页。李鸿章称俄英协定为“瓜分中国”。这是对俄华“同盟”最后的打击。在这以后关于沙皇政府和中国皇帝政府之间的任何友谊都已谈不上了。北京政府开始向前不久的敌人日本寻求援助和友谊。

俄国强求在满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占”支配地位以及对中国其他地区的野心,不仅成为对日本和英国关系中的障碍物,也成为对美国关系中的障碍物。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对俄国极端仇视的态度,在以后的 1904—1905 年战争中它们所给予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德国和法国对于把满洲变为俄国独占的势力范围暂未表示特别的不安,而其他列强——日本、英国和美国则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扩张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关于美国对待满洲的立场,必须详加说明,因为美国资本到现在特别“致力于”满洲,而它在帝国主义争夺满洲斗争中的作用与日本一样显得特出。

美国资本,跟俄国资本和日本资本一样,很早就对满洲及其邻近领土直接关心了。九十年代,“美元”感到自己必须在国外加强“文化”活动。诚然,华尔街的视线早已注视亚洲了。归根到底是:从旧金山到上海、广州、辽东比从莫斯科、伦敦或任何欧洲国家的首都要近得多¹。但是,问题当然不在这里,而在于迅速发展的北美资本主义的胃口要求新的剥削对象。它渴望殖民地的超额利润,为了寻求这种超额利润而把触角伸向东亚海岸地区。

美国资本在东亚首次表达了强有力的言词,海军上将伯里于 1853 年“发现”日本之后,在军舰的“威力”支持下劝说日本政府开放日本各港口以方便北美资本的“业务”。1858 年签订了日美通 39

1 例如,旧金山至大连为五千四百九十四公里,伦敦至大连为一万零九百六十五公里,莫斯科至大连为八千六百二十公里。

商条约。众所周知,现在美国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仍占第一位¹。

但是美国资本代表伯里的活动远不限于日本的开放。舰队司令伯里在这一时期(1853—1854年)侵占了小笠原群岛南部的一些岛屿,日本人现在这些岛屿上加紧建筑作为海军基地。伯里在琉球群岛上最好的港湾上,邻近日本海岸的那坝,升起了美国星条旗,在这里建立了美国军舰和商船的加煤站。伯里建议美国政府宣布正式占领这些岛屿并请求准许占领台湾,并解释说,这是旨在反对我们海上强大竞争者——英国所必需的措施。他写道:“必须在东方使人感到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占领这样阵地的时机已来临了,以便在东方民族中重视我国的国民权利。”

由于内部矛盾而削弱的美国资本在这一时期未能巩固舰队司令伯里所占领的阵地,但是经过“南北战争”(1860—1864年)以后重振兵力,他于1871年再次窜入东亚。这次的对象是朝鲜。

在美国政府讨论获得东亚海军基地时(美国占领夏威夷和菲律宾前三十年),朝鲜被提出作为未来基地部署地点之一²。

美国驻北京公使得到指令后采取措施,为了查明能否在朝鲜获得贸易优先权和缔结相应的条约,他竟率领舰队开进朝鲜海军要塞江华,该要塞扼守流经汉城的汉江河口。

由于朝鲜人对美国的建议持敌对态度,舰队采取了军事行动。在美国人损失极少的情况下,有四百八十一尊大炮的五座要塞被破坏,五十面军旗被夺走,朝鲜士兵战死者二百五十人,伤者甚众³。虽然经过了这次战斗,美国公使洛乌仍试图进行谈判。根据⁴⁰公使洛乌的意见,美国海军和陆战队的战役比1858年英法攻占大沽口之役要大得多,当时强迫中国政府派代表签订了条约⁴,但美

1 美国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或第二位。

2 T. 邓尼特:《罗斯福与俄日战争》,纽约,1925年,第10页。

3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3卷,1918年,第7页。

4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3卷,1918年,第7页。

国的强求没有成功。朝鲜对外国资本仍不开放。

经过几年，日本资本比美国资本更成功地使朝鲜“开放”了。美国第一个跟随日本之后，于 1882 年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跟日本一样，美国坚持否认中国在朝鲜的主权，在对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上是从朝鲜完全脱离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在独立的朝鲜当时更容易建立其经济的支配地位，进而建立其政治的支配地位。汉城外交部的美国“顾问”德尼在美国政府指导下，为有利于“独立的”朝鲜热心工作，八十年代后半期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但是美国对朝鲜的野心遇到了象军国主义的日本和俄国那样强大的、对渴望的目标更近的敌人。美国资本从朝鲜被排挤出来（如象它后来从满洲被排挤出来一样，它把注意力转向朝鲜之后，也转向过满洲），而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但是在朝鲜面对面只剩下俄国和日本以后，美国人也未中止对朝鲜的重大关心。一部分美国企业家组织的、以杰姆斯·摩兹为首的“朝鲜开发公司”于 1895 年夏季获得了云山郡金矿和其他矿产开采租让权。不久租让权转到由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组成的公司之手，该公司为“东方协同矿业公司”，积极开展采金业务¹，金产量不断增加，到 1898 年公司所属各矿山已有四十名外国人和一千二百名朝鲜工人。企业投资约一百万卢布。1896 年，同是那个美国人杰姆斯·摩兹获得了汉城仁川铁路建筑权。奇怪的是，早在 1894 年日本就已获得了这条铁路的建筑权，后因俄国、美国 and 英国代表的抗议，建筑铁路合同的履行受到了阻挠。而美国摩兹获得了建筑权之后，立即着手建筑铁路，尽管日本公使提出了坚决抗议。1897 年，日本同摩兹开始关于转让该铁路的谈判²。

1 参看案卷第 134 号《关于涅波罗日涅夫和马秋宁的租让权》，1902 年 7 月 31 日（8 月 13 日），斯坦英的报告及其他。

2 摩兹于 1897 年 11 月向俄国人提出租让权，但是认为赎买在当时不是时候（参看案卷第 133 号，《关于马秋宁第 18 号报告的纪要》）。

1899 年订立契约,日本以一百七十万日圆赎买了该铁路。1896⁴¹ 年,美国人建议在政府担保哪怕以收入一半(收入以所耗资本 5% 计)的条件下建筑朝鲜整个的铁路网¹。

美国人在汉城修建了电车,进行了关于电灯、上下水道修建权的谈判。1899 年初,平安南道采金业租让权占有者美国人汉特建议,以美国辛迪加名义贷款给朝鲜政府,以获得朝鲜全部矿产开采租让权。美国代办给予汉特以正式协助,得到俄国人的善意协助,请俄国代表相信美国“殷实的”辛迪加获得的租让权不会转入日本人之手,如象汉城仁川铁路转让之事不会再次发生。

1903 年,约有二百五十名美国人在朝鲜从事殖民剥削的活动。看来,“美国商业利益有美好的前途”²。

美国铁路公司对满洲的野心比对朝鲜还要大。

美国资本对满洲的打算首次表现在 1895 年春季,当时美国人巴什同俄国驻北京公使开始关于这件事的谈判。

经过一年,还在莫斯科俄华条约签订以前,巴什代表以前参议员沃什伯恩为首的、据说从属于哈里曼康采恩的一部分美国资本家提出了纵贯中国的铁路(从广州经汉口—北京—满洲到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计划,这一部分资本家希望获得这条铁路以及中国其他铁路的建筑权。巴什的满洲铁路计划中有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他希望在满洲建筑铁路,其目的是要“把中国从俄国人的入侵中解救出来”。同时又向俄国公使秘密建议签订关于购买这条铁路公司股票和债券给予俄国人优惠权的协定,并请俄国人相信,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俄国最可信赖的同盟者”³。巴什也向中国人提出了更明确的建议,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资本抱有

1 驻汉城领事馆关于朝鲜铁路建筑的资料。

2 邓尼特:同前书,第 105 页。

3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列宁格勒,1923 年,第 103 页。罗曼诺夫根据俄国驻北京代表的报告重写的,对照莫尔斯的著作,第 3 卷,第 86 页。

经济上占据满洲的意图。根据建筑铁路合同草案，这条铁路从辽东湾的某一港口经牛庄—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到西伯利亚铁路 42 某一地点和从奉天到朝鲜边境。在满洲任何地点和至蒙古铁路沿线地点，铁路公司有权经营“土地、森林和矿山”；该公司对满洲每条铁路的建筑有三十年的独占权¹。

很难说巴什向俄国公使提出的关于在满洲合作的建议真诚到何种程度。在这以后彼得堡政府很快就签订了俄华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已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因而不感到有与美国资本合作的任何必要。

但是美国人对满洲的态度是坚决的。1898年初，巴什第三次向俄国人建议“合作”。巴什通过俄国驻华盛顿代办告知：他“于1898年1月初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帝国铁路行政当局以建筑山海关到奉天、吉林和从旅顺口到奉天铁路线的合同，以聘请美国人建筑和经营铁路为条件。而且美国人“不追求政治目的”，“真诚地希望同俄国政府合作”，将按照俄国铁路类型建筑铁路，完全承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²。

但是此时已在侵占大连湾之后，彼得堡政府已决心独占南满，站稳脚跟，并竭力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相应的协定，美国资本的企图跟过去一样完全没有结果。美国人在中国和在满洲的铁路扩张计划在当时仅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取得了粤汉铁路线的建筑权并贷款给中国以建筑这条铁路。

美国铁路建筑扩张计划大部分都未能实现，尽管美国人表现了最大的努力，而在商业上侵入中国，其中也侵入满洲，美国资本却有了一定的成绩。美国成品的输出一般仅在十九世纪末才具有

1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3页。

2 同上书。

较大的规模。1870 年，成品输出仅为五千六百万美元。1890—1894 年，平均每年成品输出已达二亿零八百万美元，约增加三倍。1899—1900 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占第三位，几乎要赶上占第二位的日本了。

1899—1900 年中国同各国¹的贸易有如下表（单位百万卢布）：

43

国 别	对 中 国 (不包括香港)		对 香 港		总 额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不列颠(不包括印度)……	53	22	28	10	113
不列颠同印度……………	91	25	81	22	219
日 本……………	31	29	38	10	108
美 国……………	26	59	16	4	105
法 国……………	2	85	—	—	87
俄 国……………	7.5	43.5	—	—	51
德 国……………	20	16	—	—	36
意大利……………	0.5	25	—	—	25.5
奥 匈……………	0.5	2	—	—	2.5

至于对满洲的贸易，那么，关于棉织物进口部分恰恰在俄国人占领的最后几年中，美国人已远远把其他国家抛在自己之后，通过开放港口牛庄进口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一点²（单位英镑）：

1 基比卢斯：同前书，第 34 页。
2 《满洲经济史》汉城，1920 年，第 29—30 页。

初看起来，同牛庄对外贸易表相比较，数字中有很大的差额，主要是因为，在第 1 表中仅引用直接有关各国的贸易额的资料，同时在这里指出了按生产国的出口，因而包括自日本各港口输入中国欧美商品的转口。在第 1 表中完全没有从中国各港口输出的数字，因此输出总计不大。

细 竹 布	1898 年	1899 年
美 国	310,789	588,674
印 度	3,930	6,188
英 国	7,520	6,159
日 本	112	3,527
中 国	—	16,223
床 褥 布		
美 国	183,291	304,601
英 国	738	1,836
印 度	677	284
荷 兰	—	210
日 本	—	172
中 国	—	208
棉 绒 布		
美 国	1,430	13,380
英 国	5,145	3,660
荷 兰	—	632

应当指出：美国全部进口等于七一八百万海关两，英国等于五⁴⁴百万海关两，日本等于二百万海关两¹。在中国港口中，牛庄在美国对中国进口值中占第三位。

诚然，在以十亿数字计算的美国贸易总额中，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所占地位是比较小的²，但是亚洲国家贸易的前景却

1 邓尼特：同前书，第 127 页。

2 例如 1902—1903 年美国的对外贸易：

全部输入十亿零七百万美元
 全部输出十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
 其中对亚洲输出五千八百万美元
 对中国输出一千八百七十万美元
 对日本输出二千零八十万美元
 对香港输出一百三十万美元
 （基比卢斯：同前书，第 37 页。）

由于义和团起义和俄国人占领满洲，美国对华贸易额与 1897—1900 年相比大约下降了 30%。

使美国资本向往。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刚刚走上帝国主义向外侵占的道路，而美帝国主义将其魔掌所伸向的大部分领土恰恰是到东亚广阔地区的要冲。调动兵力来侵占这些要冲就削弱了保卫美国资本在中国、朝鲜和满洲利益时的进攻。当时全部精力集中在占领(借助军事力量)中间基地。1897年，美国终于吞并了夏威夷群岛，这无异是对日本的警告，数以千计的日本臣民已移居在群岛上面了。1898年，对西班牙战争之后，华尔街确立了自己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统治。后来美国人被迫在菲律宾与当地人民进行长期的斗争。美国资本还未强大到处处能操胜算的地步。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和“立足点”的美国资本，除了向敌人呼吁在中国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这一呼吁不是单纯的柏拉图式的（即空谈的——译者）宣言。北美资本宣称：你们形式上划定“势力范围”也罢，租借领土也罢，但是在实际上，你们在这些势力范围和租借领土中不要妨碍美国资本的“业务”。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已占有坚固阵地的其他列强赶走，美国垄断资本力求在这一段时期得到“权利平等”，对于把它从中国的活动范围，哪怕是从个别地区排除出去的一切企图加以坚决抗拒。华盛顿宣布了自己的野心并保留在将来采取措施的权利。

十九世纪最后时期掀起的积极瓜分中国的高潮企图，基本上
45 与这一时期资本涌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同一程度上进行着。因为1899—190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投资的不利条件在当时又促进了资本在殖民地活动中的好战精神，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各种矛盾更为尖锐化和引起在中国开业狂（即滥设投机企业以发横财——译者）大发展的原因之一。

美国于1899年向处在侵占和巩固势力范围极盛时期的所有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致送的照会，要求在中国包括各国“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在内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中建议，列强应声明在其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该国不得破坏条约上“开放”口岸的权利和其他国家一般现存利益；中国现行关税率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商品，由中国政府征收；中国所有口岸征收平等关税，各铁路线对所有国家商品规定平等运费率。

有关列强——法国、德国、俄国都形式上答复同意，但措词都很含糊不清（例如俄国声明只在“商业上同意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给自己保留了退步余地。

美国致英国外交部的照会更为坦率，并指出，美国对任何国家对中华帝国任何部分的独占权或对它的控制¹不打算予以承认。华盛顿同伦敦用更明确的语言交谈，希望比在欧洲其他首都得到更大的同情和支持。英国资本在当时已不惧怕“机会均等”，意识到自己的工业强大而深信，第一把交椅非我莫属²。只有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借助“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以便在这些领土内用保护关税制度的措施来保卫薄弱的本国工商资本，以对付强大的竞争者，并保证该工商业资本能够加强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必然成为垄断市场，并逐渐与本国殖民地合并。

这种情况在眼下也关系到沙皇专制政府所“保护”下的满洲。当时在英美资本心目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个因素，是南满与北 46
京和与华北直接毗连。在具备相当武力的条件下，这种毗连能在任何时候和以任何借口对大清政府施加压力，由此产生了俄国在全中国迅速建立政治优势的威胁和将来对英美资本产生无法估计

1 参看案卷第 64 号，1900 年 4 月 12 日（俄历 4 月 25 日），斯达尔的报告和附录《英国蓝皮书》。

2 《目前工业的霸权招致贸易的霸权》（马克思：《资本论》，第 605 页，1931 年版）。

的损失；这一点说明英美两国坚决抵制俄国在南满站稳脚跟的任何企图。

美国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而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口号，但同时也不反对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自己直接捞到一点什么。美国国务卿海伊几乎在向各国致送“权利平等”著名照会的同时，提出了在福州建立美国加煤站的问题。

1900年，海伊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考虑到日本人侵占的台湾岛位于中国福建省的对面，日本人可能很不赞同在台湾的正对面建立美国基地。果然不出所料，东京有礼貌地、但坚决地表示不赞同。美国人认为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当时对中国最危险的侵略者——沙俄更为适宜，便放弃了它使日本不愉快的计划。

俄华银行（事实上是俄法银行）的创立，是对英美利益（也对日本和德国利益）的严重威胁。该银行的野心是要在扬子江流域搞铁路建筑和在华中搞工业企业以及商业投资活动，这一切说明，若不加以积极而坚决的对抗，则沙俄武力同法郎的联盟，对在华英国资本和其他国家资本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关于满洲问题的矛盾尖锐化 和列强的集团化

47

英国、美国和日本对九十年代初在满洲和中国所形成的局势极端不满，自然会引引起资本主义各国明显的集团化。英日同盟是自然的结果，因为英俄利益不仅在远东发生冲突，而且在所有俄国东方国境的地方都发生冲突。这一同盟也是法俄同盟事实本身的结果¹。英日同盟旨在反对俄国，所以获得了被排除出满洲、在中国又受法俄外交代表排挤的美国资本的同情。日本资本虽然已经显示出，它的侵略本能的发展并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资本，但在目前情况下危险是较少的。日本的刺刀和大炮是对付沙皇专制政府向远东进攻唯一能作为迅速行动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相当的时间，以便在那以前处于“傲慢孤立”的盎格鲁-撒克逊各国资本和东亚君主岛国日本受侮辱的资本之间产生“真诚的协约”(entente Cordiale)。英国为了积极准备日本反对俄国的战争，于1902年²以军事同盟条约使新的“友谊”固定下来了，而华盛顿政府则一再使东京相信美国支持它反对俄国。德国最初试图以英国同盟中的第三者的面貌起特殊的作用。虽然德国终于未与对方达成协议，但它必须承认在英日勾结中³所起的积极助手的作用。德

1 例如参看邓尼特的说法：英日同盟在极大程度上是俄国在满洲的政策(1900—1901年)所引起的，它既对这个国家，也对另一个国家都是必要的(邓尼特：《罗斯福与俄日战争》，纽约，1925年，第57页。)

2 日本驻伦敦大使还在1901年4月就奉命与英国政府开始就同盟问题进行谈判(《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卷；《林大使记要》，第322页)。俄国人占领旅顺口后，日本报刊在1898年开始鼓吹英日同盟。

3 《沙俄外交部公报》，第5卷；参看《艾卡德斯坦在伦敦关于三国同盟的建议及其他》，第322页。

国外交部甚至在 1901 年担心日本将同俄国签订协定。

48 沙皇专制政府当时在满洲已扎根很深，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经济的、政治的和战略的。

俄华银行积极开展业务活动，在土耳其斯坦、俄属远东、新疆、日本和中国开设分行。在满洲境内开设哈尔滨、吉林、奉天、铁岭、海拉尔、齐齐哈尔、宽城子、牛庄、旅顺等分行。股资的股息一再增加：1897 年每股股息为七卢布半，1898 年为十三卢布，1899 年和 1900 年均均为十五卢布¹。

1897 年 8 月 16 日，中东铁路干线建筑工程正式开始了；南线至旅顺的勘探于 1898 年春季开始，当时北线建筑工程事实上已着手进行。建筑工程延期开始是由于敷设干线的两种方案：中东铁路副理事长克尔别兹代表统治集团的极端侵略派，为实现俄罗斯的“历史任务”主张偏南；另一种是主张偏北，更实际和更靠近帝俄国境，因此在铁路线和俄国国境之间占用较少领土的方案，由于维特赞同偏北的方案，因而就采用了此种方案。铁路工程中枢基地——主要修配工场也设在哈尔滨，而不是克尔别兹所希望的设在大连。

勘探和施工都是以加快的速度进行的，几乎是按军事行动进行。在零下 30° 的严寒和夏季的暴雨及江河泛滥下都不停工。工程开始前从国外（比利时和英国）订购了十八艘内河轮船、四艘汽艇、六十艘平底驳船，专门用以从哈巴罗夫斯克运送建筑材料和装备。

工程中枢地点——未来的哈尔滨的施工分东、南、西三个方向进行。铁路工程总局于 1898 年 6 月 28 日迁到这个工程中枢地点。这个日子可看作是哈尔滨创建的日期。同年在辽东开始了建筑大连港和旅顺口要塞的施工；向北方敷设铁路线也开始了。此

1 《中东铁路历史概述》，哈尔滨，1923 年，第 120 页。

外，从尼科尔斯克至沿海地区和从卡里姆斯克至后贝加尔敷设铁路进行施工。

义和团起义之前，满洲中东铁路干线铺轨约达一千四百公里；南北两线共有机车二百零六台，车厢和平台车五千四百辆¹。

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开始比华北各省要晚，边疆行政当局奉到⁴⁹清帝6月8日关于多方协助义和团²的诏书后，才发展为真正的战争。奉天副都统于6月下半月派兵占领供应中东铁路用煤的烟台煤矿和全部南线。俄国工程人员和护路队遭到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的攻击后略有损失，均退却到哈尔滨和旅顺口。

外来俄国人和南满本地居民发生冲突的事件自1898年初早就出现了。不过在当时还只是规模比较小的冲突或对“不速之客”的插曲式的攻击。当地行政当局也参与组织反抗行动。例如，向辽东北部“有组织地派遣一百五十到四百人的部队对铁路进行破坏活动”³。1899年，在铁岭一次反对俄国人的行动中有带着旗帜和大炮的中国士兵参加。

俄国行政官员还在1899年在辽东半岛以凶残的行动反对当地居民来表明自己的统治。一群农民反抗俄国行政当局的压迫，受到枪击。当场打死数十人，伤百人以上。后来俄国当局同意对

1 《中东铁路历史概述》，哈尔滨，1923年，第120页。

2 义和团是“互相忠忱自愿结合”的团体。义和团反映了中国人民各阶层对外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传教士）强权势力的不满。运动声势很大，大部分官僚都为运动所吸引，北京政府多数人决心领导这一运动，否则多多少少害怕运动会把自己消除；另一部分人希望借义和团起义来打击欧洲人的霸权。

清帝在5月18日在对于义和团的诏书中还勒令从速逮捕匪首和驱散附和者。但在6月8日的诏书中则谕示：义和团大公无私为帝国而战，连幼儿也受其鼓舞而手执棍杖……战后朕将封以官职及其他赏赐。这一诏书无异是对西方人的宣战（诏书引自杰姆琴斯基的《俄国在满洲》，载《政治公报汇编》，1908年，第113—118页）。欧洲陆战队（6月7—14日）的进攻和占领大沽口炮台无疑影响了中国统治上层中的动摇分子，他们坚决而公开地转向义和团方面。

3 杰姆琴斯基：《俄国在满洲》，第90—91页。

死者和伤者付给赔偿费(死者每人七百两)¹。

居民的不满是因为俄国当局不仅在租借地内要他们纳税，而且在所谓辽东“中立”领土内²也要居民纳税，以及因铁路需要而强征铁路附近的农民耕地和其他良田而引起的。很大部分大车和帆船主连同他们的工人，担心铁路将来同他们的竞争。此外，俄国人在满洲的大量投资并未使居民中最贫苦阶层的状况有所改善。相反，封建官僚机构施展诡计，采用最残暴的手段，榨尽劳动人民的血汗。

加之沙俄军队的横行早就激起广大居民阶层的憎恨。例如，奉天当局向北京的报告中说：“俄国人在各村庄任意侵占房屋，奸污妇女，用欺骗手段诈取金钱，掠夺财产，用暴力劫走谷物和食粮，用各种方法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后者因受俄国人的欺压而无法生活³。”

无疑，这个报告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当义和团运动开始时，南满居民敌视俄国人的情绪最高，因而驻扎在这里的俄国部队比其他地区的俄国部队吃的苦头要大。

北满严重的武装冲突在7月初开始，但是吉林将军因与俄国人“金钱事务”的联系，只是勉强地和形式上地参加了军事行动。不仅这样，在“围攻”哈尔滨的最紧要时期，即7月15日，他攻击了来到吉林的五十名义和团宣传员，并命令立即杀害其领导人员⁴。附近各地区的铁路工程人员都集中在哈尔滨，几乎被中国人包围了一个月(6月27日电讯联系中断，7月21日萨哈罗夫将军率领的部队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达哈尔滨)，经受了多次攻击和炮击。

几支俄国部队从各方面向北满进攻，打败了义和团和中国军

1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3卷，第168页。

2 租借地区和仍在中国主权下的领土中间地带。

3 波克罗夫斯基：《俄日战争》，《1905年汇编集》，第554页。

4 杰姆琴斯基：同前书，第138页。

队的某些抵抗后便迅速控制了局势,到8月末,干线已为俄国人全部占领。

苏波基奇将军的部队在南满作战,到9月末已占领铁路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其中有奉天、牛庄(营口)。俄国部队也抵达了山海关,但在俄国部队到达一小时前,英国人已成功地登陆并悬起英国国旗。俄国人占领了天津—山海关—营口铁路线。占领营口后,立即在中国海关悬起俄国海关旗。沙皇政府中的主战分子要求采取进一步的坚决步骤,认为是对整个华北建立完全统治的好时机,难怪派遣了十五万大军来镇压“暴乱”。

时机是十分有利,以致谨慎持重的分子如维特也希望尽快对 51 满洲建立直接的政治和经济的“保护关系”。根据俄国政府的要求:最高行政当局,包括将军在内加以更换;铁路沿线和沿松花江的海关移交给中东铁路公司,即事实上移交给俄国人;俄国政府对铁路建筑有否决权;租让整个满洲、蒙古和其他靠近国境地区的矿业和工业(即把这些租让权保留给俄国资本);取得从中东铁路至北京铁路建筑权或改为山海关至新民屯铁路建筑权;在中东铁路公司内建立有权开发满洲地下资源和森林的租让权康采恩;将铁路附近的土地全部移交给中东铁路以扩大铁路租借地的面积——所有这些要求就是连维特也认为是可能的,而且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¹。

俄国资本庆祝胜利,新的轻易得来的胜利,“俄罗斯‘文明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弗·伊·列宁在1900年12月写道:“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

1 参看案卷第3118号(《同中国的谈判》),附在维特1901年1月9日(1月22日)致外交大臣信中的要求草案。

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张,工人的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灾难。”¹

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曾坚决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殖民主义冒险行为,他们了解引起冒险行为的原因和冒险行为对俄国无产阶级和对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中国劳动人民所产生的后果。列宁曾严厉痛斥沙俄专制政府的政策并指出“东正教军队”的“辉煌胜利”的极丑恶的反面:“……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列宁写道:“在战争上……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给饥饿的农民的救济金却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52 “但是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那种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

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216页。

迫，遭受到侵入中国的资本的压迫”……“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¹

弗·伊·列宁早就预见因为义和团起义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联合进攻的国际后果。“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²

列强在联合进攻中国前已经发生争吵，在进攻时争吵就加强了，到开始分赃时争吵更尖锐化了。

沙皇专制政府代理人的举止特别傲慢，毫不客气地要强占最好最大部分赃物，只在遭到列强(盟邦法国除外)统一战线的对抗之后，才开始让步并逐渐撤销自己的要求。

进攻北京时，俄英两国司令部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有时因为个别问题几乎发生武装冲突³。牛庄(营口)海关悬挂俄国海关旗帜、俄国人占领天津—北京和天津—山海关铁路、满洲地方当局和俄国占领当局之间签订条约，当时将满洲交由俄国统治、俄国人同李鸿章和中国政府对满洲一系列的要求进行单独谈判——所有这些事实促使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的统一战线的形成。

还在1900年10月，德国就采取了倒向英国方面的步骤。英 53 德两国协定将其政策注重于维持中华帝国现在的领土边界，“如果任何强国利用中国的混乱局面以获得任何形式的领土利益，……就共同磋商”保护两国在华利益⁴应采取的措施。曾邀请列强参加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6—217页。

2 同上书，第216页。

3 例如参看莫尔斯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3卷，第324页。

4 马克·穆拉：《论文集》，第1卷，第263页；同书，第265页，参看俄国对邀请参加这一协定的答复。沙皇政府只在不破坏现状的情况下，即不破坏在满洲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才参加。后来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上宣称，协定的签订是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为条件。英国也承认这一点(参看《不列颠关于大战起源的文件，1898—1914年》，第26—28页)。

由于义和团起义普遍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情。中国士兵杀害德国公使克特尔引起了德帝国主义特别起劲镇压义和团起义。杀害事件发生在6月7日—(20)，但6月3日—(16日)伦敦报纸就刊登电讯，说德国驻北京公使被杀害了(莫尔斯：同前书，第3卷，第224页)，英国报刊这样过早的报道，是极令人怀疑的。报刊往往泄露机密，把计划当事实。如果某方面组织对克特尔的杀害是为了使德华关系恶化和把德国更牵入到远东的事务中，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游戏里这种手法是不排除的。

这一协定,但都以这种或那种不同措词的形式上的同意予以答复。德国虽然把满洲排除在该协定所适用的领土以外,但协定本身已标志着英德之间的接近,而且作为接近本身而论,应该产生一定的影响。

加之敌人以资产阶级外交的惯用手段:撒谎和欺骗而活动。俄国代表吉尔斯担心地自北京电告:英国公使已通知李鸿章,英德之间似已签订协定来阻碍俄国在满洲的策划¹。

当俄国驻北京的代表提出关于割让满洲条约的最后方案时,中国政府不仅得到所有列强(法国除外),其中包括德国和意大利,方面的支持,而且采取强烈的警告和要求,不得割让满洲。

沙皇专制政府驻满洲的代表在镇压义和团起义后,也未取得其他列强所担心的特别的成就。阿列克谢耶夫只在10月末才能同奉天将军²签订条约(后来又同其他的将军签订条约),但是这种条约只是临时性的,而且是规定地方当局和占领当局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条约无疑会破坏中国政府的主权,但是在战时谁重视主权? 54 重要的事实是,俄国在满洲驻有大军,象在“家里一样”随便。战争中断的铁路建筑、旅顺要塞和大连港的修筑又以加快的速度在进行,每月都有切合实用的基地建成,用以巩固俄国人在满洲的统治地位。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抢劫城市,对于小商店、皇宫、庙宇概不怜惜。清宫逃奔西安府了,从这里同胜利者开始谈判。德国人作为“报复”对德公使的杀害而进行坚决讨伐的进军。烧毁城市和乡村,居民遭受侮辱和镇压。“联军”在整个华北逞威作福。甚至赞扬英国殖民者及其所采取一切措施的英国历史学家莫尔斯指出,中国居民受到欧洲军队的痛苦非常可怕,因为欧洲军队由于他

1 参看案卷第3118号,1901年1月31日吉尔斯的电报。

2 条文刊在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第267—269页。

们的某些同胞被杀害而狂怒了¹。

以下是俄国驻北京财政代表(后来是驻北京公使)目击者波克基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全城进行可怕的抢劫,外国军队抢劫中国人。显然这一点是得到军事当局准许的。不仅军人,而且文官都想发横财。很多人背上步枪进城去,回来时则用大车装满丝绸、毛皮和银块。士兵把自己的赃物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自己的长官或其他收购者。”

说明“意志最善良的人”因为“主人四散逃走了”也不得不进行抢劫之后,波克基洛夫恬不知耻地写道,他也“用抢劫的方法”弄到了“某些必需的家具”。

根据波克基洛夫的说法,“社会地位高的人”远不限于“必需品”。指挥官、外交团和某些军官要求在“紫禁城”举行检阅,检阅后“大家忙着劫取各种尽可能贵重的小饰物作为纪念。一位公使夫人把镶有宝石的壁炉上的一具小金钟放在精致的伞里拿走了。总之,凡是能掩藏在衣服内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了;那些在这次未搜罗到‘纪念品’的人,在另一次会犒劳自己,他们能顺利地办到这一点……有完全的根据可以肯定,最近的将来在‘紫禁城’皇宫里和各陈列室里会只剩下一些空匣子,而里面的东西都将有安置之所”。

关于征服者在北京城外干了一些什么,以下的记述足以说明: 55
“来到通州约下午6时,全城已烧光,据说因为每户和每条街上都堆满了死尸,为避免空气传染而不得不烧掉。富庶城镇的毁灭比这更悲惨的情景是很难想象的。”

波克基洛夫关于俄国部队的一次小规模作战报道,清晰地描述了沙俄军队的“作战”方法。“义和团员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敢和顽强,尽管遭到我方致命的排射,还是向我方射击手冲

1 莫尔斯:同前书,第3卷,第288页。

来,每次死几十人。在这次战斗中义和团员死三百人,我方损失不超过五至十人。这次战争中最可怕的是根本不收俘虏,因为无法处理他们……发现排射后未死的中国人……又对他们进行枪刺¹。”

“传播文化者”的军队及其指挥部的行动是半世纪前W. 霍维特对基督教殖民地制的公正叙述的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曾对此叙述并加以引用:“所谓基督教民族对于受其奴役的异教徒、异民族所施加的野蛮行为和无耻的残暴行为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民族所为的最野蛮的、最无知的、最残忍的和最无耻的全部惨祸²。”

占领满洲同样也对居民带来掠夺和屠杀。俄国军阀以其在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所实行的同一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八国联军在华北也采取了这种方法³。

在这种背景下,彼得堡政府决定继续对中国采取“永久友好”的政策,并对满洲赔偿进行单独谈判。

送往北京提交李鸿章的条约草案的内容,基本上是上面我们已谈过的沙皇专制政府的所谓“温和部分”的那些强求:中国军队只在中东铁路完全建成之后才能开进满洲,而且其人数必须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根据俄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撤换地方最高当局;华北武装力量不许有外国教官;废除金州(辽东租借区内)自治市;俄国对于中国政府在满洲和在中国与俄国交界地区内给予外国人以工业和运输业租让权有否决权;支付军事赔款;中东铁路公司获得由北京走向长城的铁路建筑权,为补偿这次战争的损失,中东铁路公司将根据协定获得追加的优惠和租让权;满洲“建

1 波克基洛夫:《日记》,沙俄财政部出版,1900年,第3,21,33,39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03页,1931年版。

3 参看波克罗夫斯基引用吉尔斯曼的纪要:关于对居民的挑衅攻击,目的是为了抢劫(《日本的战争》,《1905年汇编集》,第514,516页)。

立公共安宁”和履行条约以后，俄国军队开始最后撤兵。撤兵不涉及中东铁路“护路队”，“护路队”在铁路租借权有效期间以不定人数留驻该路¹。

条约草案交给李鸿章后，约许付给第二个百万赔款²；彼得堡政府最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和暗中活动上，但是彼得堡政府很快就完全失望了。第一次关于三百万赔款的诺言未履行，李鸿章感到是对自己的欺骗和侮辱，显然决心在其他地方对自己获得报偿。李鸿章在死以前的一切活动和与谈判有关的情况都证明，他在此时已卖身他人，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甚至糊涂的彼得堡官僚们很快也明白了李鸿章这一行动的原因。2月中旬，俄国外交大臣向沙皇报告：英国人和日本人已大体上将北京中国全权代表关于满洲所拟定的协定条文通知我方。李鸿章和庆亲王大概考虑到，过早公布草案会激起其他列强方面的抗议³。

的确，根据事变进程来判断，李鸿章已将俄国人的全部建议和自己同俄国人的谈判都通知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了。1901年3月间（当时俄国人已将很多要求撤销），英国驻北京公使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的电报中说：“李鸿章秘密地告诉我，中国希望展期十至十二天，把这一条款和另外两条款作为例外。”⁴

除李鸿章以外，彼得堡驻北京公使（维特曾把俄国人的要求通知他）急忙把俄国人的要求通知日本公使。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传统政策，把认为必要的情报告诉了日本

1 参看案卷第3122号协定草案，条文载在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第296—299页。

2 参看案卷第3118号，波克基洛夫1901年2月11日发自北京的电报副本。

3 参看案卷第3118号，拉姆兹多尔夫1901年11月17日奏折副本。

4 《蓝皮书》（中国，1904年第2号），参看基比乌斯的俄文译本，《关于对日战争的原因》，彼得堡，1905年，第25页（沙陀致兰斯多恩的电报，第30号）。

人，并千方百计煽动和唆使日本人去反对俄国人。协定草案在北京公布后不久，英国公使弄到了协定草案条文的准确译本。日本⁵⁷驻彼得堡公使急忙至俄国外交部声明“关于现在同中国签订特别协定的危险性”，特别因为“日本认为协定中某些条款破坏中国的主权及不可侵犯性，以及破坏其他列强的条约规定的权利”。英国公使急忙把日本同行¹的这一外交上的表示报告伦敦。同时在北京的日本人约许在任何情况下²，甚至在与俄国人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都支持中国³。

英国和日本赶紧动员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来反对俄国人的要求。英国下院在获得俄国建议条文后，立即开始了关于俄国人对满洲要求的质询，伦敦和纽约的报纸都敲响了警钟，等等⁴。

还在俄国人提出要求以前“日本报纸和政治团体在讨论俄国人占领满洲时，就以挑战的语气要求并吞朝鲜，不惜同俄国一战”⁵。

李鸿章同俄国进行谈判时，作出竭尽全力向逃奔西安府的清皇室获得同意以便对稍加缓和的协定草案进行签字的姿态，同时又劝说俄方在同其他列强关于义和团起义“赔款”一般谈判商妥之前暂缓签字。

但是即使李鸿章愿意“真诚”为沙皇专制政府服务，彼得堡政府未必能获得很大的成功。中国皇室上层不愿把满洲交山俄国人

1 《蓝皮书》，第28页，中国驻伦敦公使请英国政府协助，兰斯多恩对该公使说：关于协定草案的各种情报便想到协定将导致对整个满洲以及对土耳其斯坦、蒙古的保护关系（《蓝皮书》，第14页，3月1日兰斯多恩致沙陀的信）。

2 参看案卷第3118号第1卷，伊兹沃尔斯基1901年2月18日发自东京的电报。

3 参看案卷第86号，吉尔斯1901年3月11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4 参看案卷第3118号第1卷，俄国电讯社，1901年2月7日和2月9日发自伦敦的电报。

5 同上，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斯克雷德洛夫1901年1月13日的电报。

完全支配,特别是南满,与北京十分邻近,此外满洲王公们的封建领地全在这里。中国统治上层得到大多数列强的支持,甚至其中某些国家还约许“在任何情况促进撤离”满洲,自然不管李鸿章的立场而坚持强硬的路线¹,尽管刚刚遭受了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屈辱。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也只有把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现实的客观情况相结合了。

58

列强中关于“满洲协定”问题一开始向俄国政府最明确地和最和解地加以说明的是美国。

美国国务卿海伊向俄国大使具体阐明:美国所担心的是什么是为什么将同日本人和英国人并肩反对俄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海伊声称,整个问题在于使美国商业在满洲不受损失和保持门户开放²。美国资本坚决希望参与从满洲榨取殖民地的超额利润。美国资本显然坚持以前私人谈判中那个立场。它准备同沙皇专制政府结成同盟,不反对后者在满洲的政治统治,只要有经济上侵入满洲的各种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专制政府要失掉最肥美的一块肉,一旦同美国资本在这块地方协作,沙皇专制政府必须放弃同法国资本的合作,后者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沙皇专制政府不愿走这条路。但是列强的压制是十分友好的,以致俄国对外政策的领导者不敢正式承认自己希望同中国签订将会破坏其他列强的条约权利,或破坏“中国在满洲的主权的单独协定”³。大清政府借口其他列强反对而断然拒绝这一协定。

彼得堡只好暂时停止对中国政府的进攻。它也就这样做了,

1 参看案卷第 3118 号,中国驻彼得堡公使将清帝的函件转交俄皇尼古拉,函中说俄国的要求破坏中国主权,函件的论据完全不能反驳,连尼古拉不得不批注“写得真好”。

2 参看案卷第 3118 号,卡西英 1901 年 2 月 24 日发自华盛顿的电报,以及案卷第 806 号,3 月 17 日和 3 月 21 日卡西英的电报。

3 参看案卷第 3118 号,1901 年 2 月 23 日奏折副本中拉姆兹哥尔夫同英国公使谈话简述:基比乌斯的《蓝皮书》俄译本;斯各脱致兰斯多恩的电报。

3月23日(公历4月4日)在政府公报上刊登了关于中国政策的冗长的正式通告。通告的要点如下:俄国政府极愿尽快从满洲撤兵,并愿关于此问题同中国签订协定,本政府最为痛心的是,“根据所获情报,中国政府对于同俄国签订这样的协定造成严重的障碍,因此刻不容缓地采取逐步撤兵的措施已不可能”。沙皇政府向北京示意,俄国在自己的要求上不考虑让步,并可能不定期地延长
59 占领时间,在结论中宣称:“保持满洲的临时组织,帝国政府静待事变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沙皇专制政府企图强迫中国同意它在满洲的统治地位,义和团事变的“胜利者”之间的关系在1901年初极为尖锐,也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情况。各国外交在加紧活动。英国人尽全力把日本推上第一线,这是完全不难的,因为日本对满洲和邻近地区特别关心。英国人和日本人急于弄清楚,一旦断然行动时德国的立场,并对德国在英日进攻以武力制止俄国时¹严守中立的保证感到高兴。德国也要求中国对俄国的勒索予以抵制²。

沙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意识到形势的尖锐性。5月间关心俄国战备的外交大臣在给另一些大臣的信中说道:“日本政府阶层在关于俄国在满洲的计划的传闻影响之下,自本年初是十分好战的,如果3月间不即时发布帝国政府关于放弃同中国签订单独协定的通告,那么日本会立即对俄国开始军事行动。”³

当然,沙皇专制政府对战争是没有准备的,一般来说,俄帝国主义是不能对强大的敌人作任何战争准备的,因为它本身含有各种矛盾和各种缺陷,这些矛盾和缺陷把它削弱到这种程度,以致在对付稍微强大敌人的任何战争中都会遭到失败。在目前还有不景

1 《欧洲皇室伟大的政策》,柏林,1924年,第16页;《中国的动乱和力量》,第337—338页。第4826号(卡茨菲尔德发自伦敦的电报)。

2 《蓝皮书》,第13号;兰斯多恩致沙陀的电报。

3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307,308页。

气的原因——1900—1901 年强烈的经济危机使俄帝国主义削弱了,弗·列宁在《危机的教训》一文中写道:“大铁路的修筑、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昌盛——这一切引起了工业的突然活跃,新企业的增加,对销售市场的疯狂竞争,对利润的追逐,以及新公司的创建和大批新资本(其中一部分是小资本家为数不多的储金)的投入生产。这种世界性的对未经开发的新市场的疯狂追逐,引起了巨大的破产,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破产终于到来,来势凶猛,在俄国还从未见过。”¹

彼得堡政府虽然正式放弃了强迫中国签订关于满洲的单独协 60 定的意图,但是并未打消以某种方式实现其计划的念头。对政府间正式协定草案大加修改以使中国人能接受之后,彼得堡又提出签订另一种协定,即由俄华银行出面签订协定。这个协定的大部分内容是“重复以前的”。俄华银行理事会作为缔约之一方以代替俄国政府。必须把根据第一次草案给予俄国政府的那些权利和特权的大部分给予俄华银行。这是维特的十分巧妙的手法,他希望既保持俄国政府的纯洁(即不出面——译者),又能引起法国资本更大的关心,从而得到法国对沙皇专制政府计划的更积极的支持,这对共同抵抗敌人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这个草案跟第一次的草案一样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李鸿章长期愚弄俄国缔约当事人,一会儿对草案或个别条款表示自己的不同意,一会儿借口“宫廷”反对。草案又被日本驻北京公使知道了,日本人在彼得堡敲响了警钟。李鸿章一开始就要求明确肯定中国是否有权以租让权给予外国人,认为这对他自己是最首要的问题”²。毫无疑义,对于已被其他列强“收买”的李鸿

1 《列宁全集》,第4卷,第161—165页,第3版。

2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325页,波兹涅耶夫发自北京的电报。

章来说¹，这是最首要的问题，因为他对这些其他列强许下了一定的诺言，必须履行诺言。尽管李鸿章的“背信弃义”行动和谈判中的许多细节都证明李鸿章与彼得堡政府的敌人有联系，但彼得堡政府在李鸿章死去之前仍希望借助于李鸿章以“取得”满洲。随着“完美的和忠贞的”²李鸿章之死，这一虚假的希望破灭了。

1 除李鸿章以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小中国官僚作外国使团的“送情报者”（其中未来的皇帝袁世凯同日本人就有联系）。

2 李鸿章死后清帝下诏谥为“文忠”——“完美的和忠诚的”。

日本政府因受英国的教唆和依赖美国的积极支持以及德国外交家的赞同的声明，又受本国资本和军事官僚们的企图扩大活动范围的督促而专心致力于对沙皇专制政府在整个远东、特别在满洲的计划组织积极的对抗。日本驻伦敦大使已在1901年夏天（7月18日）向英国外交大臣声明：“日本无意让俄国进入满洲，并希望日俄间一旦发生战争时，其他列强对后者不予支持。”¹

同年秋天，伊藤以试探为目的访问了彼得堡，终于使东京政府弄明白了：沙皇专制政府现在和将来都要紧紧地抓住满洲，也不打算让朝鲜完全受日本的支配。伊藤的关于在满洲给予日本以优惠运费率和“机会均等”的建议，也未得到彼得堡的赞同。而俄国的和睦协商瓜分朝鲜和满洲的方案对日本是十分不利的，以致伊藤拒绝将此方案作为在东京未来谈判的基础²。

而沙皇政府中比较有远见的官吏们意识到朝鲜-满洲问题的密切关系和由此所产生的后果。驻东京公使伊兹沃尔斯基还在1900年8月就说过：“如果我们勉强在满洲建立我们的政权，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在朝鲜给予日本以相应的利益，或者决心同它武装冲突。”³

俄国“真正的资本主义”工商界及其在沙皇政府中的喉舌同“真正的俄国”农奴主和冒险的军事工业资本相反，在此时刻倾向

1 《沙俄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号；《林大使备忘录》，第325页。

2 同上，第321页。

3 参看案卷第200号，1901年10月6日伊兹沃尔斯基的信。

62 于同日本资本的和睦协商交易,更清醒地辨别形势,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维特站在放弃朝鲜和在目前情况下在满洲作出较多让步的立场。但是以尼古拉本人为首的占优势的奸党老是想着自己参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掠夺。

这个集团选择朝鲜(首先正是朝鲜)、满洲、俄属远东作为开展自己活动的范围,其次在不久的将来注意到中国,至少是华北和华中……俄皇陛下和公爵大人们打算在为“纯俄罗斯的”和“爱国主义”的目的而斗争的旗帜下靠国库来完成自己参与殖民地的掠夺。东亚工商公司还在取得这个名称之前就有了自己的历史。库罗巴特金根据别卓布拉佐夫在“特别会议”(1903年5月7日)上叙述鸭绿江企业的产生历史所作的日记中说道:尼古拉在1896年就对这件事感兴趣,并认为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别卓布拉佐夫在上述特别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根据在北朝鲜探险队的工作结果,“皇帝陛下满意地认为必需定居在那里”。海参崴商人布林涅尔在1896年(8月28日)获得沿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森林租让权就是结果¹。农奴主上层在未来的东亚公司萌芽期直接参加到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但是库罗巴特金在尼古拉的全部活动中认为主要的那个军事政治“思想”方面起着次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利益占优势。而且利益也不仅是“森林的”。开发地下资源和各种工业租让权在这些计划中占主要地位。只要回忆一下,曾普遍流传在朝鲜有取之不尽的矿藏资源(主要是黄金)的意见²。

除日本人以外,美国、法国、英国的投机企业家都奔向朝鲜。

1 《俄日战争》,中央档案局出版,1925年;摘自《库罗巴特金日记》,第20—21页。

2 《亚洲资料汇编》,1896年,十九世纪出版;《中校阿尔弗坦1895—1896年在朝鲜的旅行》,第36页。

还可参看案卷第134号,1902年7月31日斯坦英的关于朝鲜采金业租让权的报告。自里赫特戈芬写了“十九世纪阿拉伯一篇文章中有关朝鲜盛产黄金的首次消息”之时起,朝鲜被认为是“金窖”。

连对朝鲜取之不尽的矿藏资源表示怀疑的俄国“调查队”，也坚决赞成朝鲜与俄国合并。

初期未暴露出来的罗曼诺夫家族和农奴主上层直接参加朝鲜的租让权，到1898年初已真相大白了，当时宫廷内务部官吏涅波罗日涅夫(5月11日)正式向布林涅尔收买租让权。⁶³

这仅仅是“宫廷”租让权活动的开始。就在1898年春，涅波罗日涅夫率领“显贵的”¹考察队去朝鲜进行调查和取得租让权。考察队成员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取得镇南浦—元山—义州—俄国边境铁路建筑权和铁路地区内煤矿租让权；兹维根采夫和科尔夫被任命为沙皇政府在镇南浦的常驻代表，以便在这一地区获得土地租让权，而涅波罗日涅夫本人则要求取得了开发属于朝鲜皇帝的所有矿产和良田的权利。即正如大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对朝鲜全部自然资源的租让权²。胃口是太大了，但不会有任何结果，也是自然的。诚然，涅波罗日涅夫得到了朝鲜皇帝的书面诺言：当形势允许的时候，着手关于对“组织管理”他的矿产和资产的谈判，同时皇帝请俄国政府予以庇护和保卫。

但是维特的俄国政府在中东铁路紧张施工和占领满洲的时候不愿在朝鲜陷得太深，而在罗曼诺夫家族的代表手中只剩下对“朝鲜自然资源租让权”提出要求的“优先权”。后来这种“优先权”从涅波罗日涅夫之手到马秋宁之手，或从马秋宁之手经庚茨堡男爵之手进行倒卖和再倒卖；对于这种优先权也同美国人（汉特）进行了讨价还价，等等³。

1 探险队成员中我们遇到这样一些熟识的姓，如尤登尼契、兹维根采夫、伯爵格拉别。

2 参看案卷第133号，1898年5月22日、1899年1月21日大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3 参看关于涅波罗日涅夫考察队和租让权专门案卷，第133和134号。

宫廷上层恰恰在这个时候谋求参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利益，是不足为奇的。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正在安度自己的蜜月。美国金融大王完成了首次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侵占。欧洲各国资本家之间为殖民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地主专政的殖民-资本主义的意向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而朝鲜受到日本取得胜利的轻微的攻击之后，就自己投入了俄国的怀抱（朝鲜皇帝逃到俄国公使馆，请求保护）。

稍迟，列宁指出：“连黑帮分子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¹，
64 “领地的邻人”在我们的资本主义时代经常成了工厂主、酿酒者、制糖者等等，日益参加各种工商、金融、铁路企业。最大的贵族同最大的资产阶级密切地结合起来了²。

上层贵族的冒险分子们因尝到了投机发横财的美味果实，迅速加强了统治贵族上层中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倾向。发横财新方法的热心拥护者、前近卫军上校、地主兼投机商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曾从事很多工商企业和投机勾当，在1898年初给沙皇的报告中，直率地建议为了不落后于时代，应把资本投到殖民地，具体地说，投到朝鲜³。对其他身居高位的农奴主-地主专政的大人物也提出同样的建议。

除了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以外，别卓布拉佐夫、阿巴扎、马秋

1 《列宁全集》，第16卷，第544页，第3版。

2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55页，第3版。

3 后来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因在楚科奇半岛（苏联东北部与美国阿拉斯加隔海——译者）进行骗子式的租让权而臭名远扬。特别因为伪造奥金斯基的遗嘱事件更为众所周知。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在1900年获得为期五年的租让权，以开发楚科奇的资源。就其条件来说，这个租让权不外是二十世纪的“东印度公司”。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造成租让权所在地的“假繁荣”，推销了自己所发行的股票，在1905年又获得延期五年的租让权。租让权承租者的代理人在楚科奇只是胡作非为和搜刮楚科奇人，不准许任何局外人进入楚科奇半岛，连政府官吏也不许进入。因奥金斯基事件租让权完蛋时，资产阶级报刊报道罗曼诺夫家族也参加了这次楚科奇的大骗案（参看1911年6月10日《远方报》）。

宁、沃隆佐夫、大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和尼古拉本人(后来还有沃加克和巴拉绍夫)都是参与资本-殖民主义广泛活动的“积极分子”。封建农奴制阶层继承者们的最后的大规模的对外冒险正需要由这“一辈杰出人物”来领导。根据杰姆琴斯基的定评,别卓布拉佐夫是“病态型的,以非常无知而著称”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给别卓布拉佐夫所下的更恰当的评语为两个词:“野蛮地主”²。很快晋升为海军少将的阿巴扎是彼得堡首席贵族的儿子、65别卓布拉佐夫的亲戚、A. A. 阿巴扎的侄儿,曾威胁地要求同维特决斗,因为后者揭露了他叔叔的投机伎俩。阿巴扎的叔叔作为国家经济局的主席事先知道财政部要降低卢布行市,运用降低行市而赚了几百万卢布(通过真正的俄国黑帮分子所鄙视的犹太人银行家)³。

马秋宁是沙皇政府原驻朝鲜的代办。他被编入宫廷内务部受“特殊委任”(管理宫廷在远东租让权事务),大声叫嚷要把布林涅尔的租让权一部分,即对马岛上的森林租让权卖给日本人,并说这个岛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他还进行关于把涅波罗日涅夫对朝鲜租让权的精神上的优先权转卖给美国人汉特的谈判⁴。用他的和阿利别尔特的名义还登记了鸭绿江的租让权,宫廷内务部并责成该

1 杰姆琴斯基:《俄国在满洲》,第5页。

2 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病态现象”和“冒险的幻想”掩护了别卓布拉佐夫的专职。他的爱好军事秘密(库罗巴特金在远东旅行时,别卓布拉佐夫获得极机密的资料)、旨在削弱俄国西方国境的行动(根据纳列夫的战略防御、撤销某些部队、减少华沙军区的演习)、他愚昧无知地倒向德国、劝说宫廷有势力的也倒向德国、以“休养”为名去瑞士旅行而与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会面——这一切说明了这个“国务秘书”同德国特定机关的特别联系,这种联系类似某些沙皇的上校和将军已有的联系。难怪当沙皇专制政府远东政策的紧急时机来临时,1903年底,德皇威廉一再询问:“别卓布拉佐夫还安全无恙吗”(《红档》,第2卷,《库罗巴特金的日记》,1903年2月10日备忘录,第54页)。

3 维特:《回忆录》,第3卷,第187—192页。

4 参看案卷第134页,斯坦英同外交部来往信件及其他。

二人有义务根据弗列杰里克斯的要求将租让权转给后者所指定的人¹。

积极参与其事的还有大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和伯爵沃隆佐夫,玛丽亚·菲多罗芙娜也投资了²。后来亚历山大二世的非婚生的儿子海军大将阿列克谢耶夫也被吸收进来,并被任命为远东总督,专为实现宫廷贵族的利益。

罗曼诺夫这一“家族”集团的野心(这一集团因其他高级贵族后裔的参加而扩大了)当然不限于朝鲜。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还谈到东亚辽阔的地区,未来的公司必须对这些地区加以开发,包括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拟定了公司活动的原则,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谈及将成立的公司跟十九世纪上半期存在过的俄美公司一样,亚历山大一世和沙皇家族其他成员曾是俄美公司的股东。这个俄美公司大致在东印度公司后期在东印度工作的同样基础上从事东亚北部地区的开发。实质上有关人的意图是要在东亚、主要在中国的领土上,成立符合“工业世纪”的特殊的“东印度公司”。例如,在1903年,当俄国林业公司成立的时候,早就有了“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这些“特许公司”自十二世纪就开始活动,并对“英国世界殖民地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异常宝贵的劳务”³。

斯大林同志在1927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时,对中国军阀所下的定义,对于这一集团(它的许多成员或多或少地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好处)的社会本质是完全适用的。“某些军阀一方面占有大量土地,同时又是工业的所有者,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许多俄国地主在当时也有工厂和其他的工业企业,

1 参看案卷第135页,1906年2月10日希波夫的信。

2 《俄日战争》,第7页。

3 格林斯基:同前书,第292页。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妨碍他们仍然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者。”¹

封建残余的代表者遵循资本主义的当前趋势，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开发自然资源上，而把贸易放在第二位。这种由公爵贵族组成的公司很注意这个集团的特权，这项特权使该集团能利用关税和运费政策以及俄国军队的刺刀，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反对外国资本的野心和本国的竞争，也能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特别是能靠国库完成“原始积累”，而且后来需要时就取自国库。

由于这样的广阔前景，在所计划的大规模殖民地企业参加者的行列中除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外，还包括有农奴制上层中的范围很广的人们。1900年春，当殖民地冒险的鼓舞者发挥特别积极性的时候，在贵族上层中开始流传成立工商业公司的各种方案。参加公司的有这样的一些人，如伯爵沃隆佐夫、公爵尤苏波夫、上校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伯爵根德里科夫、三等文官巴拉绍夫、伯爵奥尔洛夫-达维多夫、公爵谢尔巴托夫、伯爵诺斯基茨、上校谢列勃利亚科夫、克里斯基、海军校官阿巴扎、公爵科兹洛夫斯基、M. B. 罗江科及其他人²。

稍晚，当有关公司的章程拟完的时候，创始人成员减少了，但这并不使事情的本质发生变化。1900年5月，伯爵沃隆佐夫把东亚工商业公司的章程交给了外交大臣，不妨把构成章程的三条条款的主要内容引证在这里，这是很有趣的。

章程第1条称：“东亚工商业公司设于彼得堡市，资本二百万 67 卢布”。创始人：伯爵沃隆佐夫-达什科夫、公爵尤苏波夫、伯爵根德里科夫、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阿巴扎、谢列勃利亚科夫。

章程第2条规定：“在帝国境内选择苏昌森林区（面积二万俄亩）（1俄亩=1.09公顷——译者）为公司活动的最近目标，以组成

1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反对派的错误》，国家出版局，1927年，第6—7页。

2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389页；根据1900年3月28日草案副本。

在国际市场上能与美国林业企业相竞争的林业。在帝国境外公司打算把最初的(异体字是著者标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鲜北部、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森林。本公司必须是朝鲜北部三个道的占优势的企业。”

章程第3条规定：“鉴于本公司创始人皆为可信赖的人士，政府机关必须给予本公司以最优惠待遇。在朝鲜及其毗连地区¹的‘各种租让权业务上’也应给予本公司以最优惠待遇。”

封建农奴制统治上层中多数成员加快地、甚至“飞跃地”参与资本主义剥削在历史上已不是新事物。在古典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许多封建主当时曾积极地从事资本主义活动。日本和德国是这类情况最鲜明和最生动的例子。一部分日本封建主不久前还代表纯粹的封建剥削，在短期内靠国家资金的帮助就变成了资本家。德皇威廉及其心腹者的酷爱商业在俄国也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农奴主向往资本主义剥削的意图，决不意味着各种封建农奴制剥削方式的消失。封建农奴制剥削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将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存在到现在(例如在日本)，只是逐渐地消失。但这种方式逐渐起变化，不能成为统治上层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因为封建制度残余以某种形式同资本主义剥削的统治方式搅在一起，所以封建制度往往作为保护统治阶级个别阶层统治的附属方式而相当顽强地存在着。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能妨碍处在历史歧途中的俄国统治的农奴主专政试图走上资本主义剥削的道路。农奴主感到对其剥削方法日益增长的威胁，就谋求尽快参加新的剥削方式以确保自己在金字塔顶上的地位，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正如上面已说过的，不管农奴主的殖民-资本主义剥削的意图如何，他们仍然是农奴主。而且只有一部分农奴主才有这样的意

68

1 参看案卷第133号，1900年5月8日沃隆佐夫伯爵交给外交大臣的东亚工商公司的章程。

图，不仅大部分军阀和农奴主都有军事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半封建剥削的目的，而且这一部分从事以最新方法发横财的农奴主也还有殖民-资本主义剥削的计划。为了全面揭露沙皇专制政府在对外扩张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利益总体，我们引证列宁对俄国在世界大战中为什么作战问题的答复，列宁说：“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¹“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一术语，这里是指侵占、军事掠夺、把半封建剥削扩大到农奴主专政下人员的新限额的政策意义上而说的，而农奴主专政则依赖地主大地产和中世纪残余，依赖经济上强大的垄断资产阶级，后者也利用半封建剥削。

其次列宁又加以说明：“压迫和掠夺其他民族的可能性加强了经济停滞，因为收入的来源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而往往是依靠对‘异族人’进行半封建剥削。”²

列宁在1915年8月间所说的关于在沙皇专制政府的对外扩张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后者一般占优势的那个情况，也关系到沙皇专制政府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的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俄国，即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里“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被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裹住了”³。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在沙皇专制政府在远东扩张的时候，即在列宁写这一段文章（1916年）前十至十二年更密而紧地把俄国裹住了。在这一扩张中除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外，“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起着不一定是首创的，但归根到底是首要的作用，这是毫不足怪的。

1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5页。

2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页。

3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6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第3版。

侵占新的领土、向广度发展资本主义、推迟了资本主义向纵深的发展,使极为合乎农奴主心意的中世纪残余能保存下来。

“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加倍厉害”¹,它利用这种方法在俄国保持最野蛮的和最无人性的压迫方式。

新殖民地的企业家们在朝鲜林业租让地“胚胎期”就遭受了挫折。租让地占地五千公里以上,因此这个“胚胎”本身是十分可观的。当筹备工作完成之后,林业公司也正式成立了(1903年)。在合同中规定:本公司成立的宗旨“为开发满洲、朝鲜境内和沿海地区各种林业租让地、矿产资源、渔业和猎兽业、贸易以及其他各种工商企业”。这样一来,林业公司也就是东亚公司或二十世纪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以“林业的”形式而已。但是事情发生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公司正是在俄国政府的政策由于形势所迫必须退出朝鲜的时候取得了租让权。

优柔寡断的尼古拉和追随他的官吏企业家的一辈杰出人物服从初期需要而放弃了他们的朝鲜企业,尤其是因为林业公司本身还处在筹备阶段。但是1900年初,当林业公司采取东亚工商公司方案的形式时,“积极分子们”就从待机转为行动了。总攻是很坚决的,以致反对新公司的维特(他一开始就看到该公司是站不住脚的)很可能那时就得离开政府。但是中国的义和团战争,自1900年夏把全部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事变上面,迫使对朝鲜和整个新公司问题从缓考虑。然而众所周知,正是自这个时候起半农奴制的上层终于认定维特及其政策是他们的敌人,在成立公司以前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的确,维特曾阻挠这个集团的方案,并且往往对它的远东政策的观点表示反对。

例如在1901年5月,当东亚工商公司已经成立,以便在鸭绿

1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页,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4页。

江活动的时候，维特不顾别卓布拉佐夫一伙人和尼古拉本人的意见，表示异议：如果日本占领朝鲜，那也不能认为这是“宣战的理由”(casus belli)¹。

宫廷集团推迟在朝鲜实行计划，决不意味着对计划的放弃。当驻东京公使伊兹沃尔斯基在义和团起义和俄军占领满洲的时候报告说，日本建议俄国“占领满洲，只要我们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 70 利”，彼得堡答复他说，他“几乎跟卖国贼一样在说话，因为朝鲜必须置于布哈拉(现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一个州——译者)所处的那个地位”²。

地主专政的非正式的政府扩大自己对满洲的保护，作为在朝鲜延期实行自己计划的补偿。贵族官僚上层认为，由于中国的战争对自己的封建尊号立即添加“黄金的”、“煤炭的”、“森林的”等等资本主义大王的称号，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满洲和远东成了他们的“私人事业”了。现在他们打算在这个地区从事殖民剥削，是不会遭到任何方面的拘束和竞争的。这些在事业上无远见的、少思维的、主要地过着腐朽生活的、以尼古拉为首的陈旧制度的代表们通过他对官方政府施加压力，这个官方政府在极大程度上已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断然保有满洲和朝鲜，并在那里造成有利条件，以满足这伙匪帮的野心。

另一方面，他们进行斗争来反对满洲现有的俄国国营资本主义企业，维特和由他引进来的法国和俄国的资本家是这些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进行斗争，主张把各个剥削目标的权利移交给农奴主的新“工业公司”，归根到底是争夺对满洲所有俄国企业的领导权和夺取这些企业占为己有。

这个农奴主集团在那个时期给俄国全部国家生活打上了特殊

1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 313 页，根据 1901 年 5 月维特给外交大臣的信。

2 参看案卷第 206 号，1909 年 11 月 28 日关于远东事务特别会议记录。

的烙印，完全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到满足自己的狭隘利益方面，有时也转到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方面。当时任何一个官僚在书信或回忆录中都不是默不作声来回避这种情况。诚然，其中许多人、地主阶级成员本身为这些凶恶的强盗寻找善良动机的表白理由。例如沙皇政府驻日本大使罗申是与东亚公司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相接触最近的人员之一，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参加这个公司，不是激于暴利的动机，虽然暴利如公认的是巨大的，而是激于爱国主义和冒充绅士的动机¹”。

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热心太过分了。对谁也不能加以掩饰，
71 实质正是在“巨额的暴利”和谋求通过对外冒险来防止自己的统治在国内崩溃。

哪怕回忆一下也好，甚至在 1900 年当罗曼诺夫还受自己的财政大臣约束的时候（1902 年，当这种受约束的情况已不存在的时候，罗曼诺夫下令付给沙皇公爵合营资本主义企业二百万国家资金）就明确规定：“鸭绿江企业的利润必须上交给内阁一部分，以便与内阁为此企业所付的支出相符。”² 以后的利润可充作“军费”和“修建教堂”。

1901 年末，日本决心投入英国的怀抱，并为朝鲜和满洲、为在大陆坚强地站住脚的权利而进行血腥搏斗作最后的准备。英日同盟条约公布于 1902 年 1 月底。这项条约明显地旨在反对俄国。英日双方认定：如果日本在朝鲜和在中国的利益、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任何强国的侵略行为的威胁时，容许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同盟国之一同任何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又有第三国来援助此任何国家时，则另一同盟国必须加以援助并“共同作战”³。除了公布的

1 罗申：《外交四十年》，第 1 卷，第 211 页。

2 《红档》，第 2 卷，《库罗巴特金日记》，第 81 页，1903 年 10 月 31 日备忘录，宫廷内阁。

3 《1895—1905 年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 527—530 页。

英日同盟条约外，想必两同盟国还签订各种名称的更具体的秘密条约。

但是已公布的条约也不使人有任何怀疑，它旨在反对谁。由于同盟条约的签订，日本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它所固有的不能自制。在几个星期内不断举行庆祝宴会、示威游行、狂喜和欢呼，等等。

还在英日同盟条约公布以前，美国资本就说出自己要说的话。1902年1月21日（公历2月2日），美国致彼得堡政府的照会坚决抗议俄华银行在满洲取得的独占权。国务卿海伊在向俄国大使的口头抗议中，对于不准许美国企业家进入满洲表示坚决反对。

例如卡西英报告：海伊向我明确示意，联邦政府不妨碍俄国在满洲的行动，如果向该政府保证美国工商业在这个省内的自由¹。

我们在前面已引证关于美国对满洲的进口数字及其在整个中国贸易中的重要性。邓尼特关于这一点指出：“俄国在满洲的攻势直接打击了发展着的美国的商业利益。当时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的商业利益未处在那样直接的威胁之下。”²为了着重指出满洲的重要性、特别是牛庄口岸的重要性，美国于1901年5月在牛庄设立了领事馆，以代替早已存在的副领事馆。

在多数敌人积极的和齐心协力的进攻以及国内不顺遂的情况下，沙皇若还有一点理智，似应在此时开始让步。尤其是因为独占满洲的意图，与其说是为了俄国资本和与它结成同盟的法国资本的切身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一小撮高级贵族和一批为数不多的资本家的冒险渴望。关于满洲对于俄国“重要性”的考虑和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保住满洲对于经济、政治、战略目的和需要的打算都处于次要地位了。但是沙皇专制政府是不轻易放弃大好前景的。只是在遭到柏林政府拒绝成立统一战线来反对英日同盟和法国政府无

1 参看案卷第188号，1902年8月12日卡西英的信。

2 邓尼特：同前书，第126页。

意在任何情况下以一切手段在远东支持沙皇专制政府之后，彼得堡才放弃了立即正式占领满洲的要求。为了对抗英日同盟条约，俄法发表了共同宣言，它比英日同盟条约含糊得多，但“注意到”在该条约中“确认各项原则”，这些也构成沙俄和法国政策的基础，特别是中国和朝鲜仍对所有国家的工商业“门户开放”¹。就这样俄国再一次正式放弃了它悄悄地向中国坚决提出的那些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政府坚决不同意下，沙皇专制政府在这个时候必须对自己的正式要求让步。彼得堡也这样作了，放弃了关于满洲独占权移交俄华银行的协定，并被迫签订了关于俄军从满洲撤退期限的协定，但仍打算今后在实践中实现条约所未能得到的东西²。

73 中东铁路工程局顺利地同吉林将军和齐齐哈尔将军分别签订了关于在中东铁路整个地区内设立特别外事科和在哈尔滨设立特别外事处的协定，由中东铁路供给经费，审查和处理涉及中东铁路和中国公民利益的事务。此外，中东铁路公司利用占领初期的时机，于1901年夏季和1902年初获得吉林将军和齐齐哈尔将军允许在两省境内勘探和采掘煤的优惠权³。

对已遭破坏的铁路积极进行修理，中断的铁路继续建筑，破坏是很厉害的。愤怒的居民对异国人的入侵极为憎恨，选择铁路、车辆和属于“外国魔鬼的”一切东西为破坏的目标。车站、煤矿和桥梁被烧掉或遭破坏，部分铁轨被拆走，甚至有些地方的路基被填平了。义和团费了很大力气把车厢对轮和机车的金属部分推到铁路

1 《1895—1905年条约和关于远东事务外交文件汇编》，外交部，1906年，第533—534页。

2 签订撤兵协定后，中国全权代表庆亲王亲自拜访英国公使，请向英国政府转达他“对与俄国谈判时所给与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杰姆钦斯基：同前书，第570页）。

3 马克·穆拉：《论文和有关中国的文件》，纽约，1921年，第661页。

一旁，以便把它们抛到远离铁路的地方。中东铁路由于义和团起义和战争所受的损失，官方的数字为七千万卢布，可能夸大了些。但即使认为损失没有这么大，仍需上千万的卢布新投资来修复所遭受的破坏。

满洲的经济情况极其恶化了。特别是在铁路沿线发生过军事行动、庄稼被毁和村庄被破坏的很多地方，开始发生了饥荒。

所有这一切对匆忙来自彼得堡的工程人员干扰不大。紧张的施工进度得以在 1901 年底修复轨道和全线通车。

旅顺口靠中国本身，即靠得自义和团的“战利品”在很大程度上很有成效地武装起来了。“1900 年底和 1901 年初，自满洲和北直隶（现河北省北部——译者）运来了战利品。运来了大炮、炮弹、几千普特的各种火药、铁、钢、机器、子弹、煤”（仅现代化的大炮达一百尊之多）。机器、车床、“材料如铁、钢、铜、木材一部分移交给港口，一部分移交工程机关或其他机关，因此在修建要塞和港口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捕获的中国鱼雷舰补充了俄国海军，该舰“有很好的航速，并且装备了分舰队”¹。

俄国在满洲的影响加强了。特别是到 1903 年底卢布成了满洲占支配地位的通货。除了沙皇贵族的公司以外，小投机企业者 74 和冒险企业家都奔向被占领的地方。最多的是“采金者”，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与沙皇官僚政治有联系的贵族。租让权承租者的名字中有这样的一些人，如：沙尼亚夫斯基将军、公爵夫人奥鲍林斯卡雅、贵族托洛茨基、伯爵阿卜拉克辛、八等文官阿斯达舍夫，等等。

必须指出，沙皇专制政府在初期不满足于仅仅两条铁路干线的建筑，而对刻不容缓的进一步的铁路扩张采取了积极的步骤。1902 年夏季 6 月 28 日（公历 7 月 11 日），中东铁路的代表同吉林

1 参看文件《旅顺口的过去》，政治公报汇编，1908 年，第 92—96 页。

将军签订了关于吉林-长春铁路的初步协定。对于中国人来说,建筑条件比中东铁路合同有利多了,但是连这条铁路也仍然完全是俄国的,只有三十六年以后中国才能赎买该铁路。根据初步协定的条件,铁路的建筑和营运必须在以将军本人为首的中国官吏共同监督之下¹。但是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协定。

彼得堡政府在通过订条约来完全占领满洲的努力中遭到失败之后,就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便事实上占领满洲。因为殷实的私人资本甚至在占领满洲期间也遭到了困难,正如俄华银行代表之一所评论的那样,贵族们、“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各种坏人把那里的租让权抢光了,所以维特政府方面决定在外国人来到满洲以前,采取措施以认证各种租让权。这项事务已委托俄华银行办理。银行必须从当地满洲当局获得各种矿业、林业和“其他大企业”的租让权²。

俄华银行在这个活动范围内成就不大。一部分租让权被“坏人”抢光了;关于租让权目标所在地的可靠情报也几乎没有,此外北京对地方当局已同意的租让权也拖延不予批准。诚然,可以认为,“坏人”的大部分租让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转归俄华银行或哪怕是归它监督,因为若无银行的协助,没有钱的租让权承租者什么也办不成。这样的过程事实上也开始了。这个时期俄华银行的固定资本已增加到一千一百二十五万卢布³,并发行转让给俄国政府的新股票额,该政府成为股票 50% 以上所有者,从而为银行事实上的主人。因为俄华银行创立时固定资本的 3/8 是在俄国推销的⁴,所以在俄国人手中有七百二十五万卢布,约占固定资本的

1 马克·穆拉:《论文和文件》,第 1 卷,第 629 页。

2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 369 页。

3 参看案卷第 1048 号,俄华银行。

4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 91 页。

65%¹。

但是,因为根据俄华银行的章程,该行无权直接以租让权从事开发,以及为了完全排挤在外资影响下的工业在满洲的活动,1902年夏季成立了专业的满洲矿业公司,用以对抗宫廷的东亚公司,银行关于工业租让权的全部业务应移交给满洲矿业公司。跟中东铁路公司一样,满洲矿业公司实质上也是国营企业,因为资金(固定资本一百万卢布)是在股金的担保之下出自国库的。除了俄华银行的代表以外,沙皇财政部的官吏们都是该矿业公司的冒充的股东。

该公司成立后的一年内几乎把固定资本的一半用在勘探和获得租让权企业的股分。但是在维特离职以前对租让权目标真正的开发未曾开始,并由于政治上的考虑,矿业公司在满洲未显露自己的真面目,主要通过俄华银行进行活动。

1903年夏季(8月),维特的离职,意味着满洲矿业公司活动的中止。宫廷的别卓布拉佐夫开发满洲-朝鲜公司曾获得二百万卢布的国库资金(1902年1月),不仅未遭到外国的竞争,也未遭到本国的竞争,国家银行停止了以满洲矿业公司股金为担保的贷款。

这两个殖民地企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靠国家资金创建和进行活动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满洲矿业公司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打算并能够在有利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进行殖民地资本

1 这跟中东铁路资金来源一样,目前众所周知的是,法国货币资本在今日的南京官吏中找到了走卒,这些走卒不害羞地在其正式出版的所谓“研究著作中”说什么中东铁路是俄亚银行建筑的,既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建筑的,该银行是商业企业,同俄国政府-沙皇政府或苏维埃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这样,“研究者”当然事先就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有权收回(?)中东铁路并对债权人,主要对巴黎银行家承担债务者的义务。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侨民在1930年得到了巴黎银行家的一点小恩小惠,便千方百计地为主人“建立”中东铁路对俄华银行不存在的从属关系和后者对俄国政府的独立性。

主义剥削“正常的”业务；而宫廷“托拉斯”在经济实践中没有任何
76 根基，妄图靠对满洲和远东的“爱国主义”发横财，搞任何正常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都是不行的。在前者服务的是资本的真正能手，他们懂得“业务”。“满洲矿业公司”立足在各租让权目标上，打算成立“分公司”，并根据各分公司的开发业务吸收私人资本参加。而后者即东亚公司，暂时以俄国林业公司的形式出现，以“野蛮地主”之一、宫廷狩猎者巴拉绍夫为首，从事鸭绿江林业¹、东抚顺煤矿（从满洲矿业公司“挖来”的）、辽河航运业和奉天电业租让权，到维特离职时把拨付东亚公司的几百万余额全花光了，除了亏本以外没有任何结果。鸭绿江林业租让地的侵占公款情形是家喻户晓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开始，“真正的俄国”爱国主义者的胃口会越来越大的。巴拉绍夫在 1903 年夏季已经要求对“林业增拨六百万”，若不是这一年下半年的政治气氛紧张起来，国库给宫廷托拉斯大概不止拨一个百万。但是当然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几个百万，沙皇贵族企业家集团就把维特免职了。

对未来的前景、靠国库广泛地开发满洲、朝鲜、俄国远东、侵入中国——这些就是使资本主义的贵族新手向往不已的东西。

沙皇地主殖民地联盟既无能力也无充分的刺激来认真地考虑现实的可能和国际形势，所以它几乎不用自己的资金来冒险。

不仅这样，我们引证过列宁的话：“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对冒险行为是有兴趣的。

除了一小撮商业“部门”的资本家和一小撮工业“部门”的资本家已把自己的利益与满洲和中国结合在一起外，一般地说来，俄国

1 对朝鲜林业租让权是这样开发的：公司代理人、中校马德里托夫坐在鸭绿江中国岸上和沙河子，向中国人购买森林，在满洲把这些森林加以斫伐，然后运到朝鲜方面，从这里再运到大连和旅顺口。在朝鲜方面的全部工作是：1903 年 12 月派去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斫倒几株树之后，便写成文书说工作开始了”（参看案卷第 135 号，驻汉城总领事普兰松 1907 年 1 月 12 日的报告）。

资产阶级对沙皇专制政府的远东冒险行为不感兴趣。为争夺满洲的战争耗费几亿乃至几十亿,同时使国内的“稳定”遭到极大的破坏,这是不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俄国东方学会主席菲多罗夫在 1903 年出版的《东方商业利益的竞争》一书结论部分中,总结俄国当时工商资产阶级的任务时说⁷⁷道:“我国的工业除了国内市场以外,还应有国外市场,这些国外市场……能使我国工业有正确和稳定的发展。”指出在西方寻找市场“根据一系列原因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必需转向东方”。但是在现阶段绝不允许采用军事方法,并号召采用和平的经济征服,深信“为了在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竞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谋求远东的持久和平”,因为“战争不再是有利的了”,“使战胜者本身破费太多”¹。

俄国资本的这一立场在俄日战争时期特别显露出来了。在战争初期遭受几次严重失败之后,资产阶级中间就出现了明显不满的征兆,如《俄国新闻报》那样的指导性的资产阶级报纸,倡议和平运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加强了这一倾向。明显的例子是矿业和石油工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私人会议”(1905 年 3 月 12 日),通过了关于请求缔结和约的“奏章”决议案,纵然丧失库页岛和海参崴也行²。

当然,沙皇专制政府的“进步的”仆从维特意识到必须迎合资产阶级并谋求满足它的利益。1903 年,被大公爵黑帮集团免职的维特根据资产阶级的要求又重新为沙皇服务,以便与日本缔结和约。

如果原则上把以维特为首的一部分官僚从俄国政府远东政策中区分出来,那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实质上这一部分官僚给自

1 菲多罗夫:《东方商业利益的竞争》,政治公报汇编,1903 年,第 341—343 页。

2 巴夫洛维奇:《俄日战争一周年》,载《新东方》第 7 期,第 9 页。

已提出了同样的目的，只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上同宫廷奸党有所不同。在维特的政策下，地主资产阶级的俄国过去和现在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敌人发生冲突。

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但是维特把比较有远见的一部分贵族地主的利益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统一起来，尽量使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利益少受损失而把俄国纳入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维特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满洲的政策都服从这一需要。

78 维特的政策，跟一切其他的资本主义对外侵占的执行者一样，最终导向战争；毫无疑问，他的政策比尼古拉和别卓布拉佐夫要灵活和有远见。比较灵活、考虑国际形势并善于利用这一形势的维特的政策，使俄帝国主义有更多获胜的机会，并在对专制制度更适当的时机和更有利的条件下导向战争（战争终于是不可避免的）¹。但是注定要失败的专制制度是如此盲目，以致对自己的最好的仆从不能善加利用。

因此，如果象 Б. 罗曼诺夫在他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所说的，认为维特是“整个满洲问题的作者”（虽然事变的进程，不以维特的意志为转移，把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的扩张转向远东，特别是转向满洲），而要维特担负“帝国政策”失败的责任，认为正是维特和资产阶级是俄日战争的罪人，并偏袒尼古拉及其农奴主奸党，这是绝对不正确的。Б. 罗曼诺夫确认：对这一失败的“责任”（关于 1902 年满洲撤兵条约——著者）“最公平地应落在维特身上，他是自 1900 年起俄国外交远东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和自 1895 年开始提出的整个‘满洲问题’的作者”。“尼古拉着手为自己专制制度寻找救星，立意在这方面用亲自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来弥补政府的无

1 必须给我们保证远东至少有十年的和平（参看维特 1902 年 12 月 28 日致拉姆兹多尔夫的信，案卷第 200 号）。

能”。据Б·罗曼诺夫说，后来尼古拉和别卓布拉佐夫之流在1903年5月提出“战备问题”（似乎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只是从维特造成的僵局中找出路。“与此同时，尼古拉的‘帝国’外交在1903年4月还遵循旧的方针，在全速推进中，而在同一个地方（在满洲，而不是在朝鲜）却第三次失望地搁浅了，他紧接着在5月就坚决转到新的方针”。¹

顺便提一下，Б·罗曼诺夫在这里的错误起源于他的总的不正确的立场：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和不理解某些集团或某些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意义。错误也起源于机械地把满洲问题同朝鲜问题分开了，邓尼特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肯定“战争的原因不在朝鲜，而在满洲”²。

与满洲有关的全部历史事件，特别是同北京政府签订1902年条约以后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两个统治阶级为争夺俄国社会金字塔顶上的优势地位的斗争（虽然正是与远东问题有联系的这一斗争的鲜明的例子以前也有过）。

“退却的”俄华条约签订以后，事变的发展沿着确定不移地增长着的曲线进行。自1902年初起，关于俄日战争的谣传就在远东广泛地流传开来。这种谣传的根据一方面是俄国在东西伯利亚大量增兵和加强太平洋分舰队，另一方面是日本政府通过关于第三次强化海军的计划。

实际上彼得堡官方政府在初期未打算开战。例如维特只考虑经济上尽可能切实地在满洲稳固起来（俄华银行、中东铁路、满洲矿业公司、私营工业企业、私人商业资本），并采取一切措施使外国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感到难于渗入满洲。但是所有这一切在“条约权利”范围内的形式上都作到了。他现在甚至也不反对

1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67—368, 412, 以及75, 77页。

2 邓尼特：同前书，第102页。

把朝鲜让给日本来换取满洲，当然是在国际和国内形势首次向更有利方面转变以前。

因为日本在 1902 年夏季建议就朝鲜-满洲问题进行协商，维特访问满洲回来后在奏章中说道：“根据我的意见，在最近时期内同日本进行武装斗争对我国将是一个大灾难。我不怀疑俄国在这次斗争中能成为战胜者，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胜利是以重大牺牲为代价而获得的，而且在俄国的经济状况上将严重地反映出来。”维特指出俄国在远东备战不足之后继续说道：“我认为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暂时或完全放弃朝鲜，只要日本对此给予我国相应的补偿。我个人不怀疑，两害之中——同日本的武装冲突和完全让出朝鲜，在最近的将来后者对俄国（应读成沙皇专制政府——著者）为害要轻。”¹

关于自满洲撤兵问题，维特在同一奏章中说道：“我确信俄国在满洲问题上的政策的最近任务就在于坚定地走与中国和解的道路和绝对履行根据（关于撤兵期限的）协定所承担的义务。”²

他的内容广泛的奏章的大部分是专门阐明有利于“准确履行对中国所承担义务的”论据。

80 这个意思维特说过多次。1902 年 12 月致俄国外交大臣一封内容广泛的信中维特概括地说道：“我们必须诚实地（bona fide）、不应有任何规避来履行这些协定（同中国人签订的——著者）的规定，在规定的时期内把俄国军队撤出满洲，把中国人的财产发还他们。”³他的租让权在目前则归“俄华银行和中东铁路”所有。

自沙皇政府产生取得“补偿”（义和团起义后在满洲为撤兵作出让步和力图避免满洲问题尖锐化）念头的初期，维特基本上坚持

1 格林斯基：同前书，第 216 页。

2 格林斯基：同前书，第 207 页。

3 参看案卷第 200 号，维特 1900 年 12 月 28 日致拉姆兹多尔夫的信件副本。

这样的路线。外交大臣收到俄国驻北京公使 吉 尔 斯 (1900 年 11 月)关于俄国在满洲和在俄国势力范围所有地区内¹获得加工矿产资源和建筑铁路的独占权的权利的建议之后,便就这个问题询问维特和陆军大臣的意见。维特在自己的“意见书”中提出应从北京政府方面取得满足的要求方案,同时写了冗长的信阐明不宜在满洲保持军事占领的威胁下提出这些要求的证据。维特认为,关于中东铁路建成后完全从满洲撤兵的声明,“无论对于俄国本身的利益,还是对于暗示对中国的完全信任和对于同其他国家²保持良好的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

然而宫廷和军事上层的压力使这个惯于耍手腕的沙皇大臣改变了这个立场。经过各种协商和采取种种手腕之后,彼得堡政府终于在 1903 年 1 月“一致”决定只是部分地履行条约,即实质上不履行条约,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对于日本也都同意暂时放弃谈判。维特不能把自己的路线坚持到底、倾向于同农奴主妥协,而不去公开对抗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行动,正说明维特处于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接合点”的地位。维特基本上当然是倾向资产阶级方面的,但是有时在农奴主的逼攻下而退却了。

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宫廷地主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1902 年秋季,“政权”已开始转到这个集团。几个月 81 后,维特的辞职只是这一胜利的公开形式,并最后把他作为道路上的障碍排除了;虽然维特还在辞职之前就已屈服,但有时仍然企图对“坚决”行动的拥护者加以“恶意捣乱”,并使他们感到不愉快。

新的要求在 1903 年 4 月才送达北京政府。新协定草案提出:

1 参看案卷第 3118 号,吉尔斯 1900 年 11 月 28 日的电报。

2 参看案卷第 3118 号,1901 年 1 月 9 日维特的信。维特的论据是值得注意的,该论据证明,军队在满洲事实上是不需要的,因为军队消灭起义者所产生的印象,人民记忆中未必很快就消失了。维特在这一点上是没有错的。满洲居民对沙皇军队的兽行至今记忆犹新。

不得将已撤兵的地区转让给其他国家；在满洲不对外国商业开辟新商埠；未与俄国事先联系不准许设立外国领事馆；遇聘请外国人为中国行政顾问时，应委托俄国人管理华北事务；俄国臣民和俄国机关保有俄军占领时所获得的权利；俄国保有旅顺口—奉天—营口的电报线；在营口任命俄国医生和海关委员，并设立卫生委员会；俄华银行在营口保有海关银行的职责；保持满洲现状¹。

虽然后来其中某几项被撤销了，但一般说来，草案的命运同前两次企图强加于有关满洲协定的命运没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对新协定草案加以拒绝，而美国、英国和日本对俄国要求中破坏它们的“条约权利”立即提出抗议。俄国的要求跟以前一样对这些国家具有挑衅的性质。日本资本事实上已控制了与满洲毗邻的朝鲜，尽管有俄国占领军，在南满也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彼得堡对朝鲜谈判的回避，说明沙皇专制政府不考虑有利于日本而放弃朝鲜。同时日本的侵略性则增长了。

南满同朝鲜一样，也吸引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日本资产阶级报刊的腔调（俄国公使还在谈判初期就报道说，报刊“要求日本政府坚决行动，为了在必需使用武力时事实上把俄国从满洲赶走”）²，现在成为极端好战了。“独立的”报刊坚决地反复说，满洲对日本资本的关闭，“等于日本在为生存斗争中的失败”（《朝日》）；“日本不能容许俄国在满洲从中国获得特殊的优惠”（《时事》）³。

日本资产阶级的这些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华战争以后，日本资本的力量大大地增加了。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以极迅速的步伐进行着，在1898年，金融和工业危机以后更加强了；到1904年，投入到全国所有经济部门各企业中拨付的股资总额几乎增加

1 照会全文刊登在格林斯基的著作中，第274—275页；也刊登在罗曼诺夫的著作中，第420页。

2 参看案卷第806号，1901年4月2日伊兹沃尔斯基的信。

3 《蓝皮书》（基比卢斯），第118号，麦克唐纳尔关于日本报刊的报告。

到四倍。

例如拨付的资本(单位千日圆)¹:

	1895 年	1903 年
农业·····	2,014	3,197
商业和银行·····	110,534	451,680
工业·····	51,674	170,346
运输·····	67,603	262,383
总计·····	231,876	887,606

82

迅速发展着的日本银行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平均年利润率为 15%²。

拨付股资大为增长,而股分公司的数量则增加不多,在 1898 年的危机以后甚至减少了。1898 年股分公司总共为二千一百七十三家,其中工业公司为一千二百家;1901 年股分公司总共为二千一百六十九家,其中工业公司为一千一百八十家³。

这个时期日本对外贸易的增加有如下表(单位百万日圆):

年	输 入	输 出	总 额
1896	171	117	288
1897	219	163	382
1898	277	165	442
1899	220	214	434
1900	287	204	491 ⁴
1901	271	258	530 ⁵

1 《远东评论》,1926 年 6 月;L. 巴兰廷:《日本商业的发展和性质》,第 272 页。

2 菲多罗夫:同前书,第 132 页。

3 杜莫拉尔:《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巴黎,1903 年,第 150 页。

4 菲多罗夫:同前书,第 133 页。

5 波格列别茨基:同前书,第 64 页。

进出口中成品部分的变化颇饶兴趣。在输出中成品百分数自1890年的六十七增至1901年的七十八,而在输入中由1891年的八十六降到1901年的六十二。全国加工棉花数量由1893年的二百五十万普特增至1901年八百万普特。商船队的吨位由日华战争前的十五万吨增至二十世纪头十年初的五十万吨¹。

83 日本和其他外国人解释俄国人顽固地力图不许任何人进入满洲的原因,是这个地区矿物丰富,其中特别是黄金。当时流传着关于满洲黄金的神话。

1883—1885年,在“阿穆尔加利福尼亚”(现漠河区)曾有过著名的热尔图京斯卡雅采金业“共和国”,引起了俄国远东当时强烈的黄金热,也大大地促进了对于满洲有大量黄金蕴藏传说的深信。

在俄国调查者中间也留有有关满洲“金窖”的概念。例如波兹涅耶夫1897年在他的论满洲一书中说:“根据不完全的和片断的资料可以得出结论,满洲是高度产金的国家。”²“采金业是满洲各种财富的真正来源和特点……”³沙皇政府的官吏们进行较认真的调查之后,对自己关于满洲资源的意见深信不疑。赫沃斯托夫中校在总结1901—1902年对奉天省进行军事调查的报告中说:“奉天省山地部分富有矿物资源”⁴。其次列举出丰富的金矿、银矿、铁矿、煤矿并加上注解,所有这些矿物都“很多”。

日本工业资本企图侵入南满,尽管俄国军队占领了南满。1902年初,日本人竭力获得奉天附近的煤矿租让权⁵。

同年夏季,俄国人对以下两件事发出了警报:俄华银行股东英国人克雷格把属于他的采金业租让权卖给美国人华尔,日本辛迪

1 杜莫拉尔:同前书,第148—249页。成品中显然包括半成品。

2 波兹涅耶夫:《满洲记述》,财政部出版,1897年,第474页。

3 同上,第614页。

4 赫沃斯托夫:《奉天省记述》,政治公报汇编,第152页。

5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369页。

加为开采奉天省矿物通过华尔而活动;日本人坚决地企图“向‘日波(Zee Pau)’公司参加者获得同一奉天省的矿场租让权”¹。

恰恰在俄军占领期间,日本人向满洲涌入的人数急剧增加了。根据日本官方资料,1903年3月在满洲(主要是南满)的日本人为一千五百五十六人²。日本在牛庄—营口的贸易额1900年(因为义和团起义和俄军占领)比前一年降低了一倍,在以后几年又不断增加了,尽管受到占领军的阻挠。根据英国领事馆的报告,牛庄直接对各运销国的贸易如下表(单位千英镑)³:

年	英 国		香 港		日 本		俄国和俄国的满洲		美 国		欧洲大陆(不包括俄国)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1899	29	—	299	88	259	1,214	38	—	140	—	11	—
1900	—	—	151	66	192	526	—	—	55	—	—	—
1901	—	—	385	88	248	971	17	—	7	—	—	—
1902	6	—	358	78	285	1,041	5	—	4	—	2	—
1903	6	1	373	92	325	1,235	27	—	15	—	17	17

俄国在满洲的商业资本代表以及“租让权代理人”都哭诉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把他们完全“打败了”,而旅顺口报纸《新边疆》在冗长的文章中抱怨“俄国人”无能和不愿好好地工作。

美国和英国资本依然不甘心离开满洲。英美资本的代表于1902年初在通化区和鸭绿江流域进行调查,对于这件事沙皇专制政府代理人向彼得堡寄去控诉书⁴。根据俄国政府代理人的同一

1 参看案卷第999号,1902年7月和8月邓西诺的报告。
2 赫沃斯托夫:同前书,第139页。
3 基比乌斯:同前书,第33页;前几年的参看第9页前。
4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274页(根据波科基洛夫的电报),奉天将军把著名的日本副本转给英国公司坦迪涅尔,中东铁路同该公司进行了长期的争讼,仅在营口英国领事出面干涉之后,副本才转到了中东铁路。

情报，美国人在吉林甚至已经获得了银矿租让权。即使这些控诉是希望从彼得堡多搞到一些资金来经营满洲而有些夸大，但无论如何，英美资本是不愿让满洲成为沙皇专制政府的世袭领地。从上面引证的表中可以看到，尽管俄国占领了满洲并加以阻挠，从香港的进口却大幅度增加了，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进口。“美国面粉不仅侵入日本，也侵入满洲和西伯利亚”，上面提到的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远东专家”菲多罗夫¹就这样抱怨过。根据他的资料，亚洲俄国，即远东 1901—1902 年进口八十二万普特面粉²。

85 在俄国向中国提出所谓七点照会以前出现的、并在 1903 年秋季（9 月 25 日——公历 10 月 8 日）签订的商约草案中，美国资本要求在满洲增辟四个商埠：奉天、安东、哈尔滨和大虎山（后来根据签订的商约只开辟奉天和安东为商埠）。

为了答复外国的抗议，沙皇的外交跟以前一样，坚决否认向中国提出“破坏条约权利”要求的事实，虽然俄国向中国提出要求的副本，和以往一样，已在提出抗议各国代表手中。

不履行撤兵条约³、向中国提出对所有外国人关闭满洲的要求，终于使在满洲有利害关系的三大国结成了反俄战线。对英国的支持和美国的善意⁴感到满意的东京政府开始坚决行动起来了。1903 年春季和夏季，日本军各部队中都进行教练性和检查性的动员，海陆军处于完全戒备中。东京向俄国政府再次（7 月 18 日）提

1 菲多罗夫：同前书，第 329 页。

2 同上，第 337 页。

3 占领部队仅从奉天省西南部撤走，但仍留在吉林省，在签订撤兵协定一年以后，从吉林省撤净，俄占领军从吉林省撤净后六个月，从黑龙江省撤净。

4 美国除了希望借助日本的武力来恢复满洲的“自由贸易”以外，在日本向亚洲大陆的意图中看到了日本对自己不久前取得的殖民地——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的进攻威胁消除了。

“美国未正式加入英日同盟，因为罗斯福怕参议院加以反对”（波克罗夫斯基：《1905 年汇编集》，《日本的战争》，同前书，第 595 页）。

出自己的建议,对两国利益相冲突的“远东事务”进行磋商¹。现在完全受大公爵“公司”领导的俄国政府多方拖延谈判,因为自己备战不足,没决心明确地拒绝履行日本的要求,并认为每拖延一个月就是对俄国在远东阵地的巩固。

1903年夏季(7月1日)举行中东铁路交付营运仪式,虽然铁路线未完成,也不能正式通车。已交工的资产价值确定为三亿七千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五百九十八卢布,而且在这个数额中包括因义和团起义所受的损失(追加工程和支出),约为七千一百七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八卢布。此时轨道连同支线约长二千五百公里²。但是建筑远未完成;很多桥梁是临时性的,在兴安的三公里隧道中还在砌筑拱顶³。在交工时确定,为了完成工程还需要五千七百五十万卢布。铁路平均建筑价值每公里等于十万零七千卢布,即大大超过正常的建筑价格⁴。在交付营运时机车有三百六十七台、客车厢九百零三辆、货车厢和平台车六千七百辆以上⁵。 86

中东铁路公司特别注意组织海洋运输,积极购买轮船,大部分是向国外专门订购的。1903年,中东铁路公司已拥有二十艘大型轮船。在俄国远东、中国、日本的很多港口设有该公司的仓库、办事处,甚至有码头。公司的太平洋商船队的总值为一千一百五十万卢布⁶。

总之,在满洲花费了大量金钱。例如,还在维特于1902年旅行满洲时“大连港的支出达一千八百八十五万卢布”。但正如维特

1 参看案卷第188号,1903年7月18日日本公使的口头照会。

2 《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23页。

3 《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13页。

4 其中车辆每公里为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卢布,同时每公里平均标准额为八千卢布,中东铁路每公里比外贝加尔铁路每公里贵一万卢布。

5 《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63—364页。

6 《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72页。

在其报告中所说,“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数额”¹。

中东铁路公司开采烟台煤矿的煤,并对札赉诺尔煤矿着手开采,开始木材加工,在南北满各地区进行矿物调查。对铁路租借地区的俄国人移民也采取了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军事当局采取的半军事化移民的企图值得特别注意。俄军占领满洲后不久,格罗杰科夫将军就提出了在铁路地区内设立哥萨克人居民点和士兵村庄的方案。1903年7月,“关于中东铁路所属地区内后阿穆尔军区士兵村庄和后备军官居住区条例”体现了这一方案。为了安置退为后备役的人,甚至规定年补助金额为二十万卢布²。某些沙皇官吏对移民和很快占领满洲抱有如此大的希望,以致打算在不远的将来把满洲改名为“黄俄罗斯”,与现有的“小俄罗斯”、“白俄罗斯”齐名。

除了大规模的国营康采恩——中东铁路公司以外,还有强有力的金融机关——俄华银行在活动,该行积极参加创立合办的和
87 纯俄国人的矿业租让权公司,也还有各种小企业家和商人。后者主要集中在哈尔滨、旅顺口和大连,这三个市镇很快变成了大城市³。

沙皇公爵合营企业——林业公司,是拟议中的大康采恩的第一个组合体,根据组织者的想法,这个大康采恩必须把满洲、朝鲜和中国所有资源的开发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个公司的成员——俄国将军们、海军大将们、大公爵们利用俄国在满洲的军事专

1 日本确定俄国在修建大连港的投资为三千万卢布(《经济史》,同前书,第51页)。

2 《满洲公报》,1930年,第四期,斯克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士兵村》。

3 哈尔滨在1903年已约有三万俄国居民,大连有二万混合居民,旅顺口在1903年1月,根据官方统计有四万二千零六十居民,其中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三名为军人,四千零二十四名为俄国公民,九百六十九名外侨,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四名中国人(哈尔滨和大连港都是在荒芜之地建立起来的。旅顺口炮台在俄国人占领时中国居民约有十人)。

政并大量使用国库资金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为康采恩侵占所能侵占的一切,甚至对所有其他的“祖国”企业加以一定的敌视,力图尽快使它们从属于自己。

成为沙皇地主康采恩头目的别卓布拉佐夫,第二次(1903年)到满洲招摇得象沙皇的第一代理人似的。他乘坐专车带领大批随员旅行。在豪华高贵的车厢里“饰有”尼古拉亲笔签名的肖像:赠给亚力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别卓布拉佐夫,表示感谢的尼古拉签名¹。别卓布拉佐夫对肖像称“你”,就是明确地告诉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出自“主人”的主张。(指沙皇的主张——译者)

别卓布拉佐夫在交谈者面前发表对于在远东实现“俄国使命”毫无意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计划的荒谬议论。他实现了这些计划中的某些部分。例如鸭绿江租让企业(根据该企业组织者的术语:鸭绿江租让企业是鸭绿江上的掩护部队),虽然在经济上无能为力,但对日本是军事上和政治上潜在的威胁。第一,因为该企业属于俄国统治上层,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能使用国家的力量和资金;第二,因为为了掩饰发横财的目的而大肆宣扬军事掩护队的想法,不仅宣扬,而且采取了某些措施,使该企业具有那样的外形。如果俄军占领满洲和排除外国人在满洲的活动,会给日本在满洲资本的利益带来损失,而且是对日本资本在朝鲜统治的间接威胁,那么,除了俄国公使要求给予该租让企业汉城—新义州铁路建筑⁸⁸权、对马山浦港口的野心以外,还要求对俄国代表坚决支持的林业租让企业“优先权”的不可侵犯,直到同日本决裂,这样鸭绿江租让企业便成了对日本在朝鲜资本“切身利益”的直接威胁,由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原因²,日本资本认为朝鲜天生是自己的世袭

1 《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52页。

2 继承者、伙伴马秋宁,男爵庚茨堡在俄国公使协助下于1903年9月间同意获得咸镜北道和平安南道各省内矿业租让权(参看案卷第135号,1906年2月10日西波夫的信)。

领地。

别卓布拉佐夫于1902年第一次旅行满洲时就对自己的交谈者说过：“无论如何满洲必须是我们的”。实现这个“无论如何”的方法、组织“掩护队”的方法是别卓布拉佐夫的独特的方法。例如他曾请求阿列克谢耶夫组织和派遣三千红胡子队伍到朝鲜境内，并派遣数百化装的俄国士兵去那里。他的老部下巴拉绍夫因与日本人发生某种事件竟致电上尉、一个部队的指挥官鲍季斯科逮捕日本人，并“当众”加以惩罚¹。1903年，在鸭绿江加紧组织红胡子部队，在俄国军官的领导下活动²。成立红胡子部队原来似乎为了保护租让企业，但专对中国常规武装部队发动进攻并胡作非为。根据租让企业承租者，即别卓布拉佐夫的要求，向邻近朝鲜国境、鸭绿江中国一边的凤凰城和沙河子(安东)派遣俄国部队。在租让企业地区进行土木工程，显然具有筑垒性质。

当时的外国报刊每天都报道这方面的活动。日本人则视为如果不是在俄国正规部队帮助下，那就是在中国和朝鲜武装部队帮助下最近在朝鲜进行积极反日行动的准备。

据库罗巴特金认为，别卓布拉佐夫的满洲军事计划是“战略领域中的想入非非，为此遭到军队战败和战役全盘输掉的严重惩罚”³。

值得注意的是，“专制君主”虽然在官方政府的压力下签署关于“排除鸭绿江公司中的军人”和“在纯商业的原则上准许外国人、
89 特别是美国人和比利时人参加该公司”的命令⁴，但实际上执行的则是农奴制集团迫使他照办的路线，而尼古拉签署的政府命令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纸空文。

1 参看案卷第188号，1903年12月24日库罗巴特金的奏章副本。

2 格林斯基：同前书，第288页。

3 参看库罗巴特金的上述奏章中对于这些计划的叙述及其批判。

4 参看库罗巴特金奏章中关于1903年3月26日“特别会议”记录的决议案。

当日本以断然形式要求把朝鲜给予它时，沙俄代表为了让人看看沙皇专制政府根本不考虑让步，便对鸭绿江行动加以补充而提出汉城—新义州（新义州在中朝边境上）铁路建筑权的要求。

因为这一步骤在沙皇专制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间的关系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必须谈得稍为详细些。

最初，法国辛迪加“法伊夫里尔”的代表格里尔在俄国公使协助下，于1896年取得了这条铁路的建筑权。辛迪加未开始施工，在1899年根据条约该辛迪加丧失权利时，俄国和日本政府都提出对这条铁路的建筑权。朝鲜政府把这条铁路的建筑权给予本国铁路公司，从困境中找到了出路。因为该公司资金不足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朝鲜政府又把建筑权收回，朝鲜铁路部门于1902年开始了某些建筑工程。

俄国公使于1903年2月要求把这一建筑权给予俄国臣民男爵庚茨堡¹。

为回答俄国公使的这一要求，日本以断然形式要求朝鲜政府把建筑权给予它，在自己的照会中声称：“日本政府不容许任何人妨碍它的计划，甚至连俄国也一样。”照会阐明，“在朝鲜中部有大量日本侨民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交通机关不论在谁的手中，都会立刻影响日本的利益并招致严重的后果”²。日本同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后，感到自己十分强大，在1903年初已把朝鲜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加以对待，在对日本利益有所威胁时使用极坚决的语气表示反对。

但是俄国军事封建殖民主义者也不认为已丧失了朝鲜。在他

1 庚茨堡是远东俄国舰队给养供应者、驻汉城鸭绿江林业公司的代表、从马秋宁承继涅波罗日涅夫对“朝鲜皇帝的矿山和良田”租让权权利承继者。宫廷奸党在自己圈子内任命代表时遭到失败，就通过“生意人”开始活动，这个生意人就是入了耶稣教的犹太人男爵庚茨堡。

2 摘自汉城使团的档案。

们的殖民地剥削者的计划中，把朝鲜继续当作未来的“自己的”殖民地之一。

90 农奴主集团完全胜利以后，外交部又把汉城—新义州铁路旧事重提。拉姆兹多尔夫在5月间询问罗申：“鉴于远东事务新的转变……您是否认为最好把我方完全明确的要求向日方提出，例如要求日本有义务对我方取得汉城—新义州铁路建筑权和电报线路敷设权不得造成障碍”¹。

法国支持把朝鲜作为历史注定的俄国殖民地的观点。法国教授杜莫拉尔在日本研究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种现象三年而于1903年，即俄日战争前夜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也认为朝鲜对日本帝国主义是“生死”问题，必须阻止俄国侵占朝鲜，但却得出不容反驳的结论：“对于这些问题稍加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朝鲜将是俄国人的，日本人应迁就这一点。”²

在外国人的这种认识下，日本资产阶级的不安和由于朝鲜问题而焦急（俄国占领满洲后，朝鲜问题同满洲问题不可分），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在俄日战争时期，俄国遭到初期战败之后，“阿列克谢耶夫还认为必须坚决把日本人从全朝鲜清除出去，不清除干净誓不罢休”³。

为了保住满洲，侵占朝鲜和进一步向中国扩张，就必须准备对日作战，日本无疑将得到英国的支持，可能有武力的支持，美国也可能给以武力支持。沙皇专制政府对战争也有所准备，但准备有点与众不同。

俄帝国主义的正式领导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应积极加以准备，但是希望战争延期到来，以便更好地加以准备。同时别卓

1 参看案卷第188号，1903年5月17日拉姆兹多尔夫给罗申的电报。

2 杜莫拉尔：同前书，第299页。

3 《红档》，第5卷，《库罗巴特金日记》，1904年3月14日记事，第96页。

布拉佐夫之流——一部分军阀和上层贵族显要尽量加速时机的到来,那时可“以人众压日本”,能无阻碍地对远东拟定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剥削。

俄日战争爆发前的最后时期中,政府“范围”内对于战争问题明显地出现三方面的斗争:一部分军阀、上层贵族和显要打算靠贵族殖民地康采恩大发横财,故希望战争愈快愈好。军事工业资本家、以普列维为头子的警察和宪兵参加这一集团,认为“小胜利的战争对于国内治安是完全必要的”。的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⁹¹极为敏感地震动了沙皇的宝座和全部“基础”。1902年秋季,罗斯托夫的罢工轰动了全俄罗斯,而1903年夏季,整个南方为总罢工所笼罩,参加罢工人数达二十万人。二十世纪头十年上半期,农民革命武装起义次数有如下表:

1900年	48次	1902年	340次
1901年	50次	1903年	114次 ¹

弗·伊·列宁于1903年初(3月1日)在《火星报》上写道:“专制制度在动摇中……‘打倒专制制度’的战斗号召愈来愈响亮、愈来愈有力……”²。

警察统治制度由于不能对付增长着的革命风暴,就抓住一种想法作为救命的最后一着,即转移群众的不满,并尽可能快地使其反对“民族敌人”。

一部分职业军阀与这种倾向不同,希望等一等,以便造成对有利后果的现实条件的某种时机(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将军也是一个希望拖延战争开始的人)。

以维特为首的第三派根本反对目前在远东进行战争。

无疑,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增长及其转化为垄断资本和它的发

1 杜勃罗夫斯基和格拉维:《革命前夜的农民运动》,《1905年汇编集》,第250页。

2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2页。

展,引起了这一派对远东市场压力的增加和侵占中国企图为加强;在第一次更有利的国际力量对比下,俄国资本同它的远东敌人的武装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目前对日战争对多数资产阶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甚至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在 1903 年已成为对过分冒险的农奴主集团命令的喃喃抱怨的执行者)对问题忧郁地表示半信半疑:“那些工商业利益重要到了何种程度?为了确保这些利益,我们要加速事变的历史进程而面对极危险的麻烦。”¹

“接近沙皇”的阶级集团代表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敌对态度,例如维特、别卓布拉佐夫、阿巴扎这样的一些代表是众所周知的。但值得注意的⁹²的是,地主俄国的代表们意见很不一致,“各派别”互不信任,彼此加以监视。正如罗申很委婉的说过²,1903 年罗申和库罗巴特金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别卓布拉佐夫曾派遣“暗中监视者”加以监视,这难道不是很微妙的吗?

掌握政权的“专制君主”经常是优柔寡断和动摇不定,一般说来,盲从“别卓布拉佐夫之流”的政策。

关于尼古拉的无意义的好战,陆军大臣恰好于 1903 年初在其日记中写道:“俄皇陛下对于为俄国占领满洲、并吞朝鲜、想望占领西藏并置于俄国版图之下……希望占领波斯、不仅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且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早已胸有成竹。”³

在当地领导鸭绿江企业的巴拉绍夫还在一年前自鸭绿江写信给“专制君主”:“请亲临此地,您会深信必需立即将满洲合并为俄国领土,而且相信您将亲自在当地宣布这一合并。”⁴在同一信中他

1 参看案卷第 188 号,1903 年 7 月 16 日拉姆兹多尔夫给罗申的电报。

2 罗申:同前书,第 218 页。

3 《红档》,《库罗巴特金的日记》,第 31 页,1903 年 2 月 16 日记事。

4 《俄日战争》,中央档案局,1925 年;巴拉绍夫 1902 年 3 月 12 日致尼古拉的信,第 134 页。

又说,占领满洲只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黑海和海峡主要任务”的必要阶段;沙皇愈快搞完满洲,他就愈能迅速地开始从波斯“赶走”和从埃及“挤走”英国人,等等。军事地主寡头政治的殖民地胃口确是难以满足。

任命阿列克谢耶夫为远东总督(1903年7月30日),并把国家政权乃至对日、华关系所有职能都移交给他,然后在彼得堡成立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处理外交部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这是实现别卓布拉佐夫加速危机的计划和步骤的因素之一。委托俄国一边区行政长官办理外交事务,对日本来说,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侮辱。俄国驻东京公使罗申说,维特的免职和在远东成立总督府,日本看作是俄国侵略性加剧和战争加速的征兆¹。

同时俄国占领军在满洲作为新征服国家的极权主人继续胡作非为。逮捕、死刑、强制迁出家屋、制止当地居民搬迁、侵占好住房作为兵营、对妇女的暴行——所有这一切都是直到俄日战争开始前最后一日的占领情况的写照。如维特所抱怨的²,军事专政对占领区俄国工商业发展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1903年末,沙皇政府的行动日益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深信,俄国正在并吞满洲,哪怕以战争为代价也好。在北京屡次提出用条约把俄国在满洲的统治固定下来、保持占领状态和于1903年10月第二次占领奉天、构筑工事、准备转运大军的交通线——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措施的总和,不能不造成关于沙皇专制政府侵略意图的明确的印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制止沙皇专制政府的扩张问题上没有动摇。日本、英国和美国经常一致行动,对大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彼得堡提出抗议。敌人在满洲境内以及在朝鲜进行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阴谋活动,激起居民反对占领者的愤怒,不需费

1 罗申:同前书,第219页。

2 格林斯基:《前言》,《维特旅行满洲后的报告》,第208—211页。

力,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俄国军阀本身在这方面已作到所能作的一切。日本人也从事组织红胡子部队,攻击俄国人。后来在俄日战争时期,红胡子部队和南满中国居民给日本人帮了不少的忙¹。

在朝鲜(1903年已住有约三万日本人)除了已开辟的商埠和鸭绿江租让企业以外,对去内地和特别去日本人集中地区的俄国人进行攻击,痛打他们,并强迫他们回家。成群的日本人在警察指挥下也对停泊在朝鲜港口的俄国军舰上的水兵加以攻击。例如在仁川对“鲍勃尔号”海军军舰水兵进行攻击,在釜山—汉城铁路地区对中尉吉尔斯进行攻击,在松林对牲畜收购者加以攻击,等等。

日本当局对于沙皇政府因为这些事件用外交公文提出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94 总督府——露骨的军事专政建立以后,日本政府对争端必须用武力解决,就完全不怀疑了,因为总督仿佛是拥有一切相应权利、直到同“敌人”谈判权利的前线总指挥。此外,连日本在朝鲜所取得的比较重大的成就,也处在俄国武装出动的经常威胁之下。不能设想:俄国人在满洲的军事准备和加强海军只是为了巩固现状。在鸭绿江的行动说明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方面:要求建筑汉城—仁川铁路、建筑到北京的铁路、修建朝鲜港口马山浦,等等。也很难设想:既同日本也同英国调情的德国政府未把俄国“专制君主”向德皇威廉关于自己对日作战计划的声明书转交给日本人,这个声明书是尼古拉在1901年写的。1903年10月间,尼古拉向威廉证实明年战争还不能开始,因为“对战争准备的进度离他所希望的尚远”²。

1 其中满洲未来的“统治者”张作霖是日本人吸收来为自己服务的红胡子部队之一的头子(参看案卷第244号,奉天总领事1916年的报告)。

2 波克罗夫斯基:《俄日战争》,《1905年汇编集》,第596页。

日本资本对战争的准备比沙皇专制政府要积极得多，但是不愿袖手等待俄国人准备好战争的時刻的到来。因为深信一旦第三国参加到俄国方面，英国就会参加到日本方面，并得到美国的积极援助¹，日本统治阶级认为决战的時刻已来临。所以在1903年下半年俄日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双方都深知这一点。

同时彼得堡政府在1903年8月底又一次——第四次企图从中国得到关于满洲的“保证”。要求虽然缓和些，但这一企图仍以失败告终。很明显，关于满洲的会谈应当不是同中国，而是同日本进行，但是彼得堡政府在与后者的谈判中，把满洲问题从要谈判的那些问题中完全删去了。

而日本不仅不同意满洲连同朝鲜在谈判中占一个主要地位，而且在其建议中（8月30日）（无疑基本上得到了英国和美国同意），给予俄国在满洲极有限的优先权，只承认俄国的“特殊铁路利益”，同时坚持俄国方面承认日本在朝鲜各方面的“重大利益”²。

成立总督府之后，谈判的进行转到阿列克谢耶夫和罗申之手；他们提出一个公式：“认为满洲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³。当日本人不同意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不谈论满洲了，但这不能使日本人满意。

为答复不涉及满洲问题的建议，日本致罗申的口头照会中说：⁹⁵“如果两帝国利益相关的广阔和重要部分地区完全置诸磋商之外”，则不能消除误会的原因，因此“请从新考虑贵方对这个问题的观点”⁴。

拉姆兹多尔夫在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他给罗申“指示”的电报中

1 参看邓尼特：《罗斯福和俄日战争》，纽约，1925年，第27页。

2 参看案卷第201号，1903年7月30日的日本提案。

3 参看案卷第201号，俄国提案草案副本；1903年11月5日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

4 参看案卷第189号，1903年12月9日罗申的电报。

批示的意见，是对阿列克谢耶夫外交的最好的说明。拉姆兹多尔夫批示：“极大的愚蠢”。

对谈判细节不加论述的同时，应指出，从沙皇政府方面来说，基本上对问题仍旧是拖延，如尼古拉本人所希望的最好拖延到俄国本身能开战的时候。日本则寻找最有利于立即进行打击的时机和借口。日本人的一切行动和俄国代理人从各地的所有报告，都说明日本人对战争已下了决心。尼古拉顽固地一再说明他不希望战争，而且也不会有战争，同时事实上却使对日关系尖锐化。库罗巴特金9月间在自己日记中写道：从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中，根据萨哈罗夫（总参谋长）的意见，“显然，日本人已开始积极行动”¹。2月11日，他在同一日记中记载：“今天收到我方在上海军事情报人杰西诺少将的紧急情报，日本内阁决定对俄宣战，日本舰队已起碇。”²

又过一个月，当巴甫洛夫和罗申报告日本军事机关租用轮船运送军队、完成了多方面的军事准备，向朝鲜运送军用品和武器³的时候，库罗巴特金在讨论对日本提案反提案的会议上，还坚决主张必须把战争哪怕拖延四个月也好，如果不能再多的话⁴。但是尼古拉在1月25日（俄历）要求“打就打吧”⁵。好象是执行尼古拉的这一愿望似的，日本舰队第二天进攻旅顺口的俄国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这次屠杀以俄日战争的名称载入了史册。

幕后发生的、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以及其他大臣都不知道的事变，说明尼古拉的立场和日本人的坚决行动。这就是“专制君

1 《红档》，《库罗巴特金日记》，第277页。

2 同上，第93页。

3 参看案卷第189号，1月7—20日，12月19日—1月1日罗申的电报，1月11—24日，1月16—29日巴甫洛夫的电报及其他。

4 《库罗巴特金日记》，第103页。还可参看案卷第191号，1904年1月15日《特别会议记录》。

5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4年1月25日记事。

主”的代表阿巴扎向日本人提出了非正式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

当大臣们讨论日本的最后提案和反提案时（1月15日），阿巴扎对于北朝鲜问题“保留自己的意见”，不仅“保留”，如后来所证明的，还很积极地行动了。1月17日，他亲自访问日本公使（无疑受尼古拉的全权委托），并对准许日本人在朝鲜登陆的海岸线范围加以解释（如在他致尼古拉信件的摘录中所叙述的）。他还解释了一些什么，在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摘录中没有说明，但是从中可看到，第二天“日本公使两次派秘书带有很长的请求书”¹去会见阿巴扎，他答应“口头报告”尼古拉。从以上这一切可以看出，尼古拉在对待官方政府同日本人办理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中，是多么无礼。很显然，阿巴扎、尼古拉的条件不能使日本人满意，并认为来自沙皇本人的这些条件中是俄国人的最后意见，因此日本人决心战斗，而尼古拉通过阿巴扎也收到了日本政府的否定答复，并说了立即进行战争。这一点说明日本人为什么不等由电讯发出的俄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就宣布对俄断交。

日本公使1月25日交给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的两份照会都未包含直接宣战，也未提出任何最后通牒的要求。第一份照会声称：既然关于远东谈判的结局，很少有希望使俄国政府同意所提出的建议，“除了中止目前无益的谈判外，日本政府别无其他选择”。但“保留采取独立行动的权利，如果这些独立行动对于巩固和保卫自己受威胁的地位是适宜的”。

1 参看案卷第200号，关于1903—1904年对日谈判的文件；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办公厅刊物；1904年1月18日阿巴扎致尼古拉信件的摘要。这本根据阿巴扎和马秋宁原手稿（1905年5月6日）出版的所谓“深红皮书”是得到尼古拉同意的，其目的在证明农奴主集团对战争发生没有罪责，但很快就停止发行了，因为实质上这本书恰恰帮助确定宫廷集团的罪责，并可能被利用反对专制君主的宣传，以及证明俄国政府的无用。

第二份照会通知:日本政府决定中断同俄国的外交关系,因为它已没有任何价值¹。因为双方舰队势均力敌,而未来的登陆战役、进而在大陆作战和日本在战争中成功的可能性本身,都取决于日本舰队的优势,所以日本政府打算突然袭击俄国舰队,并用自己的两份照会使沙皇政府失去警惕性。但是这两份照会必须这样写,以便给日本政府一旦受指责不宣而战和开始军事行动时造成某种摆脱困境的可能,这在欧美社会舆论的眼目中对日本政府是不利的。所以才有两份照会,其中措词都是资产阶级外交惯用伎俩的空话。

这种谨慎甚至是多余的。对英国资本的同情和援助无需怀疑。而美国资本及其华盛顿政府已经在1903年5月宣称:美国在“满洲问题”上的立场是“纯道义的”,美国不能为满洲而战,但“同时借助在我们支配下的手段,我们必须作所能作到的一切”²。

英美资本已有了象武装到牙齿的和准备决战的日本那样美好的“工具”(诚然,日本比所想象的要苛求得更多,战争胜利后,占据了俄国的地位,开始对英国和美国资本所持的态度并不比沙皇专制政府对它们所持的态度为好)。

美国的支持有效到何种程度,从罗斯福总统向法、德(据罗斯福说,以最有礼貌的和最有分寸的形式)所作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如果法、德联合反对日本,“我立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如果日本利益的需要,要我走多远,我就走多远”³。

诚然,这只是一种威胁,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当时还不十分关心中国和满洲,非要罗斯福把自己卷入(假使他个人愿意)这次武装冲突不可。后来罗斯福本人也用这点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但是有

1 参看案卷第80号,库里诺的法语照会副本。

2 泰伊尔:《约翰·海伊的生活和书信》,波士顿,1915年(1903年5月22日约翰·海伊致亨利·华爱特的信),第369页。

3 邓尼特引证罗斯福1905年7月27日致斯普林·瑞斯的信。

关方面不能忽视和不应考虑这种威胁。

法国资本在俄日冲突中的立场是特殊的。鉴于法国在俄国有大量投资,为了法国资本的利益应对自己的盟国给以援助,但是在美国公开敌对、德国态度还远不明朗、以英国为敌人的情况下,这种利益的重要性还不到在当时参战的程度。

所有这一切迫使法国保持戒备的立场。渴望削弱东方危险近邻的德国政府丝毫未考虑积极地站在俄国方面。这样,在政治舞台上只剩下两个斗士,而其余的资本主义列强都起着积极的、物质上帮助交战某一方的旁观者的作用。清朝政府对这次俄日的搏斗甚至感到高兴,希望跟过去俄国把日本从满洲赶走一样,这次日本⁹⁸能把俄国撵走并恢复均势。也不怀疑,一旦日本遭到严重失败,英美会出来保护日本,不让沙皇专制政府随意胡为。

我们对于在满洲战场上发生的俄日战争的事变不加以叙述。我们只限于论述袭击旅顺口后主要事变的日程。

日军司令部保证军队在仁川安全登陆和宣而战突然袭击旅顺口¹俄国舰队并使其遭受失败后,到1904年3月初,在鸭绿江集中十万大军。4月间,九连城附近战斗之后,日本人强渡鸭绿江。5月17日(公历30日),占领大连,准备围攻旅顺口。8月1—2日(公历14—15日),在瓦房沟附近打败增援旅顺口的俄国部队。8月11—12日,辽阳战役和俄国舰队从旅顺口突围企图的失败。9月30日—10月2日,在沙河附近的会战。12月18日,旅顺口俄军投降。

在1905年1月1日《前进》报上刊登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列宁立即说明最后事变对于俄国和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

1 虽然舰队已进入碇泊场并处于半戒备状态,但司令官海军大将斯塔尔克本人却在岸上过妻子的命名日(《红档》,1930年,第41—42卷,《普兰松日记》,第163页)。

弗·伊·列宁引证欧洲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的看法(该报指出,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整个政治制度被宣判……难以补救的失败使旧世界遭到屈辱……)时写道:

“不错,欧洲资产阶级是有值得害怕的东西。无产阶级是有值得高兴的东西。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快要到来,它还预告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当时最强大的要塞投降纯军事的意义加以分析之后,便强调战争的无望,“已经是很明显了,而一切的拖延将只会加重俄国人民由于容忍专制制度宰割自己而遭受的无数灾难”。

列宁在对未来的后果的下列预言中,对于被认为沙皇专制政府的远东不可攻克的要塞陷落的政治意义给了再好不过的评价。

列宁写道:“但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一旦人民不得不在实际上以自己的鲜血为专制制度付出代价的时候,专制制度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僚和权贵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作为代价。”

“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战争每进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¹

1905年1月底,俄军曾企图在三源浦附近进攻,2月10日—25日,奉天附近总会战失败,3月3日,铁岭战败,5月14日,对马

1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36页。

岛战败。

列宁事先准确预告了从波罗的海出发的沙皇“大舰队”的命运。1904年12月22日《前进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列宁确信地说：“前往援救的舰队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连到达目的地的希望也没有；……”¹。

俄国舰队在马岛附近海战中完全战败（在这次海战中整个沙皇的波罗的海舰队毁灭了：十四艘军舰被击沉，四艘被俘，一艘突围逃到海参崴），受到列宁的进一步评价。

列宁在对马岛海战之后写道：“现在俄国统治阶级还在对马岛海战之前所抱的‘一线希望’也完蛋了。现在明白了，战争完全输了。”

列宁指出专制制度无能力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又着重指出专制制度行动的极端冒险、特别是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往远东的全部冒险（该舰队正象一群野人一样猛扑装备精良的日本舰队），对全部俄日战争和对马岛海战加以总结之后，关于专制制度说道：

“战争揭开了它的一切痼疽，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表明它与人民是完全分离的，并且摧毁了凯撒统治仅有的支柱。战争成为一个森严的法庭。人民已经对这个强盗的政府作出了自己的判决。革命将把这一判决付诸执行。”²

5月底，美国政府认为俄国已一蹶不振，开始忧虑日本过分强大了，在德国参加下以缔结和约的中间人出面。罗斯福在5月11日还向德国代表说，俄日两国³相互毁灭，对于其他列强的利益是有利的，现在却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

交战双方已处于财政耗尽的边缘，而主要的是日益迫近的可

1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2 同上，第453页。

3 《欧洲皇室的伟大政策》，第2卷，第19页，柏林，1925年，第6310号。

怕的革命风暴开始震动沙皇专制政府。

俄国国内受沙皇专制政府压迫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与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接触。例如,1905年约瑟夫·毕尔苏茨基到了东京,其目的是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和取得“反对俄国”的援助。沙皇专制政府感到自己被迫与日本“讲和”,这不仅因为它的军队在前线吃了败仗。由于西伯利亚大干线1905年秋季才能最后完成,届时始有可能充分增援满洲军队和弹药,从而大大加强满洲俄军的防御力量。但是国内的腐败和动荡不安、革命群众的强有力的打击造成了主要的威胁,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决心集中所有的力量。

列宁早在1905年2月初就写道:……“大公爵党懂得战争对于专制制度的危险性而且希望尽快达致和平”¹。交战双方愿意举行谈判,当日本撤销十五亿军事赔款(最初要求七十亿日圆)要求以后,沙皇的代表同意让出库页岛南部一半作为在满洲让步的补充,谈判以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而告终(1905年8月23日)。双方必须从满洲撤兵,但俄国把辽东的租借权和一切权利、以及从大连到宽城子中东铁路南支线让与日本。实质上这是把满洲瓜分为日本的和俄国的两个“势力范围”。

同时在朴茨茅斯条约中关于正式的租让权承租者——俄华银行及其所组织的中东铁路公司一字未提。只说双方必须就南支线让与日本一事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第六条)。因此完全抛弃了私营中东铁路公司的虚构性和正式确立俄国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权利。

俄国在朴茨茅斯条约中再次确认它在俄日战争前多次使资本主义列强政府相信的和至今它顽强不承认的那些特权。朴茨茅斯
101 条约第二条中“俄国政府宣布它在满洲不拥有土地优惠权、特惠权

1 《列宁全集》,第7卷、第104页,第3版。

或专利租让权，这种租让权能损害中国最高权利或与平等原则不能并存。”¹

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以前约两星期缔结了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以代替 1902 年的英日同盟条约。1905 年的英日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并适用于印度，以完全明确的语句来说明两缔约国之间的军事同盟。

由于胜利的战争的结果，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把握向亚洲大陆扩张，首先向朝鲜和满洲扩张。俄日战争后，日本进而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积极征服这些地区。

当时对满洲的中国行政当局还遵守某种礼节，而朝鲜在俄日战争时期则完全从属于日本军事当局了，后者在朝鲜就象在家里一样发号施令。这种状态战后还维持着。后来日本政府又采取一系列行动，直到 1910 年迫使朝鲜皇帝退位归顺天皇，朝鲜就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²。

俄日战争对满洲的经济有两种影响。在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居民忍受极大的困苦和物质损失。村庄被毁了，禾苗被践踏了。交战每一方对居民稍涉间谍嫌疑者一批一批地被枪杀了。

另一方面，百万大军给养的需要，特别远离自己基地几千公里的俄军的给养，需要在当地大量购买各种食品和产品，这就是当地生产发展和繁荣的原因，甚至也是建立新工业部门的原因。

原有的不大的工业企业——半手工业面粉厂、肥皂作坊、机械作坊和成衣作坊等等在俄日战争时期获利极大。俄国企业从军事机关领到大量补助金和预付金。产生了很多具备欧洲式设备和生

1 《1895—1905 年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 741—753 页。

2 俄国沙皇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 1906 年已向驻日公使下达指令：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声明、关系都明确地表明，俄国……对朝鲜未抱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它诚恳地公开承认日本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俄国驻汉城代表同当地政府的关系必须经由日本驻扎官进行。

102 产的新企业,其中有玻璃厂、制革厂、蒸汽机面粉厂、啤酒酿造厂、通心粉厂等等。一般说来,应认为俄日战争时期是满洲的欧洲型工业萌芽的开始,主要在北部,即在哈尔滨。

到俄日战争结束时,哈尔滨在其存在的第八个年头,连同中国城道外,有将近二十五万人口,军人不计在内。

因此,俄日武装斗争尽管给满洲带来了破坏,它在后方地区却引起了经济繁荣,虽然是不健全的投机性质的经济繁荣。

俄日帝国主义的联盟

满洲各战场上浴血交战,使几十万人丧失了生命,耗尽了物质资源,交战双方都大大地削弱了。

战争使日本花费了约二十亿日圆,后来支付的军事借款利息还不计算在内。日本的国债由六亿日圆增至二十四亿日圆,其中国外军事借款为八亿日圆。然而在战后仅利息一项每年需支付一亿一千万日圆¹。一千万成年壮丁人口中约二百万人脱离了生产活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战争服务;其中一百万人在前线。日本的人力损失是:战死者六万三千人,死于疾病者二万二千人,因病遣送回家者(即残废军人)二万九千人²。

战争使俄国耗费了二十三亿四千七百万卢布(直接货币支出),花费在转归日本的铁路、南满港口和沉没的商船上约二亿卢布,沉没的军舰价值约三亿卢布。此外,若不是十月革命阻碍,全部军事借款利息就要支付四十二亿零六百万卢布。这样一来,战费和军事借款利息超过了七十亿卢布³。俄国军队的伤亡、疾病和失踪者等等共约四十万人⁴。

美国报刊⁵在俄日战争时写道:“日本人是为我们而战”。的确

1 G.小川:《俄日战争的战费》,纽约,1923年,第36,252页。

2 同上,第29,30页。

3 杰缅捷夫:《对日战争使国库花了多少钱》,彼得堡,1917年,第28,33,34页。

4 巴甫洛维契:《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新东方》,第10页。

5 例如,参看 P. 莱因什:《日本与亚洲的领导》,《北美周刊》,1905年1月。莱因什后来为美国驻北京公使。

是这样，当日本人在奉天城郊获胜决战中的最后炮声还未停止的时候，美国资本家就首次公然企图坐享日本军队的胜利果实。1905¹⁰⁴年3月18日（公历3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尔提出一项计划，通过国际赎买将满洲铁路交还中国，参加赎买的各列强享有监督权¹。康格尔在鼓吹这项计划时说，这项计划的实现，在满洲就建立了对日本和俄国不可逾越的障碍物。中东铁路国际化的计划（实质上是美国化，因为美国是主要的金融强国），是美国在满洲意图的公开证明。

其实，还在康格尔发表谈话以前就很清楚，美国对满洲是有具体计划的。当时罗斯福（老罗斯福，1858—1919年。——译者）就说过，“在列强指导之下”，满洲必须归还中国。在康格尔的建议以前，人们对于“在指导之下”的意思是什么，还弄不清楚。从那个时候起，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过，而美国人在适当和不适当的场合中，用各种方案和种种计谋顽强地反复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资本的金融大王认为1905年是最有利的时机。战争走向结束，交战双方都精疲力竭。俄国在前线失败了，面临着革命的明显威胁，同时还迫切地需要钱。日本耗尽了全部国内资源和几乎全部国外借款。因此，随着康格尔的谈话之后又产生了另一个企图。6月间，中国政府和英国人希里尔之间“关于借款赎买中东铁路”交换了意见²。

康格尔和希里尔的后台首先是强有力的纽约银行团和铁路大王哈里曼。在朴茨茅斯和平谈判中，刚刚谈妥中东铁路南满支线转归日本人时，美国资本家就和日本人谈判关于自己参加未来的南满铁路和开发南满工业问题。由于这项谈判是库恩洛伯公司所属银行的人员进行的，而该银行曾协助推销过日本公债，更重要的

1 邓尼特：同前书，第157页。

2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555页。

是由于希望美国对俄国和平谈判代表团施加压力，所以日本人在南满铁路和满洲问题上表示了种种“好感”。

因与库恩洛伯公司有密切关系，哈里曼重新提出了在美国资本保护下的统一的环球铁路和海路计划¹。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是俄国人自己建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无缘无故就把西伯利亚铁路置于美国资本支配之下。而环球铁路和海路计划只不过是借此侵入满洲，作为在东亚的作战基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105

哈里曼事先得到日本人的允许，于俄历8月31日到达日本横滨，并得到首相桂太郎根据对开原则给予美国辛迪加参加南满铁路和满洲矿业的书面同意²（哈里曼的最初意图甚至于是要购买南满铁路）。但当他回国途中抵达美国海岸时，一封电报正在等待他，通知他日本政府希望对协定加以“修改”。对俄国和约业已签字，情况表明，竭力向美国资本家讨好，或牺牲日本资本家的利益对美国资本家作实际让步，已经没有必要了。

库恩洛伯公司所属银行经理雅科夫·申夫于1906年春去日本旅行，目的在于重提哈里曼的环球路计划，但仍无结果³。在这以前，即在1905年10月美国资本家向南京当局建议，“贷与中国所需款项，以赎买满洲铁路”，同样也无结果⁴。

日本资本家和军事官僚机构对于为自己独占南满早有定见。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不久（1905年12月22日，公历1906年1月

1 假定的环球路：美国—亚洲（太平洋轮船公司）—满洲铁路—西伯利亚铁路—经过欧俄到波罗的海—经过大西洋—北美。

2 邓尼特：同前书，第311—313页。

3 邓尼特：同前书，第313页。

4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555页（根据达维多夫和波科基洛夫的报告）。对照邓尼特：第313页，罗曼诺夫：第556页。罗曼诺夫根据威林肯和申夫1906年的通信，说道：哈里曼在朴茨茅斯和约后，1906年同日本人开始谈判。美国资本家于1909年同俄国谈判过关于赎买中东铁路，不便于承认他们在根据条约向日本人作实际让步以前，曾打算支配一段中东铁路。在同威林肯谈判中，美国人谈到了这一点，却把哈里曼活动的日期推迟了很久。

4日),日华关于满洲协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一协定,日本人在满洲获得的权利,比在这以前俄国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朴茨茅斯和约所给与的权利要多得多。例如,日本从中国获得使用安东—奉天军用铁路(改建后的)十五年的权利。另一专门协定规定日本有权建筑长春—吉林铁路,日本资本家按对开原则参加。关于南满铁路,中国政府根据日方后来的通知似乎答应承担“不在南满铁路附近修筑可能损害日方利益的干线和支线”的义务。不仅如此,在和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资本家就使自己渗入北满有了保障,因为他们得到中国“对日本轮船得在松花江行驶表示同意”所承担的义务,若日方能与俄方关于此点达成协议¹。

申夫到日本的旅行是美国最后利用时机的企图,也是比前几次更无结果的企图。

“南满是日本人的”,日本资本家和政府在这一口号之下在南满开始了政治和经济的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不仅反对外国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并且力图使土著资本家服从于自己。这并不是说,日本当局立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采取敌对态度。日本人尽力使中国封建官僚统治者上层和大的中间商人阶层对自己有好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于整个商业资本家、地方工业和农民的态度则是另一样。日货立即同大部当地手工业部门开始猛烈竞争。日本资本家在南满所有大城市和各工业部门中均占有强固的阵地,极少借助于买办。大批日本侨民、各种投机者、艺妓和理发师涌进南满,在城市生活各个领域造成了竞争。早从1906年起,驻屯在地方上的大量日本军队和军官对待农民和居民的态度,一般说来,不仅不如以前的俄国占领者的态度,而且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比俄国占领者更加蛮横和残忍。

1 参看案卷第202号,日本公使在1907年签订密约时向外交部提出的未经公布的日华条约的清单,以及马克·穆拉的前书,第一卷,第554页。

因此，俄国领事馆的报告中有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人态度的相当准确的情报。大体上归纳如下：“上层和官吏们对日本人的态度是好的”，“下层和商人都痛恨日本人”¹。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限制中国资本家的活动，同时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切断中国资本家、以及整个南满与外国资本家和外国人的联系。和平条约签订后，“曾发生多次日本人杀死中国人的事件，因为他们在战时曾为俄国人服务”²。

当然，谈不到俄国资本家在南满有任何活动的可能。吉林和奉天俄华银行分行甚至被迫停业了。俄国资本家完全被排挤出南满。¹⁰⁷

但是，当日本资本家竭力把南满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时，对待自己的同盟者——英美资本家并不太友好。日本当局借口有军队和“戒严条例”，在战后完全不准许外国人进入南满。可是，“戒严条例”已取消时，外国资本家所处的地位，比俄国占领时期还要坏。外国人在满洲的商业，特别是“自由港口”牛庄（营口）所受损害最大。不仅对“不友好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甚至连“友好的”美英资本家也开始悲观失望地向本国政府诉苦。

南满铁路运送日货的保护性运费率、通过大连的免税进口、拒绝外国人进入南满的签证、对非日本企业³的种种挑剔——这一切给外国资本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

繁荣的牛庄贸易现在开始衰落了。为了彻底消灭牛庄贸易和把大量货运转为铁路运输，以及窒息南满重要水路交通命脉的中国辽河内河运输，日本人特修建一座桥拱最低的铁桥，使中国帆船

1 参看案卷第210号，哈尔滨总领事柳巴的报告，1907年3月15日。

2 同上。

3 参看弗郎克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东亚大国，1894—1914年》，不伦瑞克—汉堡，1923年，第289页。

过桥时必须停下来并卸除其全部桅帆索具等。日本人对此还不满足,为了航运,于 1906 年购买了八百艘帆船,自己运送货物¹。

牛庄贸易在 1901—1903 年俄国人占领时期,甚至在日俄战争时期都不断增长,但日本人在南满站住脚跟以后,却开始下降了。下表说明二十世纪头十年牛庄的贸易额(单位百万海关两):

年	出 口	进 口	总 计
1900	11.5	10.5	22.1
1901	18.7	23.5	42.2
1902	17.5	25.1	42.6
1903	19.9	27.6	47.6
1904	12.1	29.3	41.5
1905	12.0	49.7	61.7
1906	14.7	29.6	44.4
1907	15.7	26.5	42.2
1908	19.6	21.5	41.1
1909	26.0	29.0	55.1

108 牛庄贸易的下降,特别令人吃惊,如果把同一时期的大连贸易额与其相比的话,大连的贸易额是迅速增长的:

年	出 口	进 口	总 计
1908	12.4	20.2	32.6
1909	26.7	17.5	44.2
1910	28.3	23.7	52.0

《纽约时报》苦恼地抱怨,美国对满洲的出口额自 1905—1909 年由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同时日本贸易则以同样比

1 杰姆琴斯基:同前书,第 168 页。

例上升¹。

英美资本家对日本在南满的独占地位当然不能容忍，正如当时不能容忍俄国人的这种独占地位一样。美国资本家特别精力充沛，迅速发展着的垄断资本全力推动他们去进行无限的帝国主义的扩张。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机会和门路侵入满洲。机会之一就是从小俄罗斯林业公司所有者那里有条件地获得该公司在朝鲜和南满的租让权。1906年7月，美国人斯密特在彼得堡签订了四份获得这种租让权的合同²。其中抚顺煤矿部分就在林业公司管辖范围内。规定美国人的付款期限是1908年7月以前，这很清楚，这种付款是有待真正掌握租让权时才能兑现。同时这笔交易也给了农奴主上层以希望，即在“殖民地”活动受到清算之后能为自己捞到一点什么。

鉴于各商会和资本家各公司的请愿，盎格鲁撒克逊各国政府立即向东京提出抗议，反对压制外国在满洲的工商业活动。因为中国当时宣布抵制美货，部分是报复美国颁布反对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法律，部分是因为日本人的宣传。因此，美国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颇为激昂。除了书面抗议之外，华尔街决定采取比较断然的行动，用新型巡洋舰吓唬一下“日出之国”和“天下帝国”的“顽固统治者”。1907年春，美国舰队沿日本海岸和中国海岸进行了威胁性的游弋。华盛顿特别希望这次示威对刚刚因战争而消耗殆尽的日本产生影响。

但是日本资本家并不是胆小的。他们在开始成为同盟者的过

1 参看案卷第207号，《纽约时报》登载罗申的1910年6月5日（公历18日）信的附件，1905年，美国商品输入满洲为二千三百五十万美元，1909年为七百五十万美元，记得在1909年达到满洲进口额的百分之六十。而在日俄战争以前日货的输入为数甚少。

2 参看案卷第183号，大部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来往通信，对照罗曼诺夫的前书，第351页。

去的敌人那里找到了支柱,以反对变成当前敌人的“老朋友”。

签订耻辱的朴茨茅斯和约以后,还不到一年,不知是一种什么因素推动了沙皇专制政府去同日本谈判而用秘密条约方式成立“联盟”?这一答案必须在国际总形势和俄国国内状况中去寻找。在欧洲非常明显地形成了两个联合。俄国资本家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依赖法国资本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法英联盟的行列。尼古拉在堡尔克与德皇威廉会晤时对德国“王朝”的倾倒神往遭到了他的大臣们的反对,他们被迫必须重视经济。

在堡尔克会晤之后不到一年,德国企图保持自己对俄国外交的影响和借助沙皇傻瓜来进行这种外交的方针,显然是失败了。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1906年3月)(在西班牙南部——译者),已出现非正式的三国协约的局面。从这个时候起日益明确地看到俄国西部边境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集中一切人力和财力加以准备。俄国统治阶级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巩固的。强大的革命风暴风起云涌,正以新的力量向前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远东的状况不明确,同日本(它是三国协约成员国之一的盟国)的关系紧张,这都是不能容忍的。由于俄国在远东的兵力弱于日本,有一切理由不仅担心在北满的“占领地”和“权利”,也担心俄国在远东完整地存在。

众所周知,日本军阀极不满意朴茨茅斯和约的条件,在满洲和朝鲜继续进行坚决的军国主义活动,巩固占领区,建立基地,派遣大批特务去北满、蒙古甚至中国西部(新疆)。

沙皇政府考虑到这一切,认为必须使朴茨茅斯条约有准确的
110 解释,更加明确地规定完全放弃南满和朝鲜,以消除日本人的怀疑,同时从他们那里取得关于北满和蒙古的保证。

在明确规定满洲势力范围和“诚意”遵守双方利益基础上的联

盟,这是合乎日本愿望的(美国资本家曾压制日本),也更是合乎俄国愿望的。

1907年春(5月31日,公历6月13日),关于“满洲俄日铁路连接公约”的签订是俄日接近的第一个明显征兆,虽然铁路的接轨和中东、南满两条铁路的通车,实际上是在秋天(9月)才开始。

远在双方必须从满洲撤兵完毕以前¹,就开始了关于签订“一般政治协定”的谈判。这次是伊兹沃尔斯基倡议的,他在1907年1月下半月向日本大使本野发表了关于“一般协定愿望的想法”,本野“对此极表同情”,不久接到东京政府的通知,说“极为欢迎”²。俄国外交部在内部“解答”中说,由于日本人对北满和蒙古压力的加强,特别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俄国和日本一般“利益”的压力³,必须签订协定。

几乎与协定签订的同时还签订了商约和渔业协定(7月28日),关于这两项文件的谈判,因困难很多拖延了很久。

公布的所谓“一般政治协定”的两项条款,虽不是特别重要的,但却向世界证明在不久前的敌人之间刚刚接近了一步⁴。正如后来伊兹沃尔斯基所说,这是欧洲的“正面”⁵。全部实质在于明确划分北满和南满界限的秘密条款,换句话说,在于划分俄国和日本界限的秘密条款。划分的界限,“从俄朝边境西北地点起”,“经过珲春和镜泊湖的极北地点秀水,从这里沿松花江到嫩江河口又沿这条河上游到洮儿河口”,然后“沿这条河到格林威治以东122经线该河流横断处”(参看瓜分附图)。

1 根据1905年10月17日(公历30日)双方统帅部代表签订的议定书,撤兵必须在1907年4月2日(公历15日)完毕(马克·穆拉:同前书,第1卷,第527页)。

2 参看案卷第302号,伊兹沃尔斯基的奏折,尼古拉御批:“很高兴。”

3 参看案卷第202号,俄国外交部1907年2月5日(公历18日)内部解答。

4 参看《关于1907年7月17日(公历30日)俄日间签订一般政治协定的文件》,1907年俄国外交部出版,第7—9页。

5 参看案卷第206号,1907年11月28日(公历12月11日)“特别会议”记录。

111 缔约一方有义务不在另一方势力范围内自费为本国或为他国臣民使用而谋求铁路或电报租让权，相互间也不得采取旨在妨碍缔约一方在自己势力范围谋求这种租让权的行动。此外，条约承认朝鲜完全处在日本的支配之下，而俄国在外蒙享有“特殊利益”，日本对于这种“特殊利益”有义务放弃能使其招致损失的一切干涉¹。

2月7日，俄国交给本野的第一次协定草案，内容只有两条一般性质的条款，而且是十分含糊不清的²。俄国的提案对日本人来说正是时候，在对案中(2月24日，公历3月9日)把俄国提案中不明确的措词加以发展并使其具体化，并增加了一些地理上的名称，使双方权利和义务更加明确。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甚至建议大事宣扬通过协定的签订而完成了满洲势力范围的划分³。日本对中国已不再客气了。对日本气势汹汹的美帝国主义，看到公然瓜分满洲，感到极不愉快，就无须解释了。但据传要从改善俄华相互关系的观点来说，大事宣扬对俄国外交是不利的。

协定的俄国对案中，除了规定建筑铁路范围和关于朝鲜两条款外(基本上是重复日本的提议)，也增加了关于蒙古和新疆的条款，并十分详尽地列举了日本方面不应作的事情⁴。

日本外交当局最初企图回避列入蒙古和中国西部(新疆)条款。借口说，在这两个地区内日俄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麻烦，因为在那里日本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完全不相接触⁵。后来日本政府

1 参看案卷第202号，协定法语副本，格里曼译，《条约密件汇编》，莫斯科，1928年，第170页。

2 参看案卷第212号，《对日协定草案》。

3 参看案卷第202号，法语本草案，2月27日俄国外交部致驻北京公使波科季洛夫电报副本。

4 同上案卷，3月21日交给本野的俄国草案法语本，日本人甚至不应该派传教士。

5 同上案卷，4月12日(公历27日)日本公使馆备忘录。

提议把这一条放在定稿中，事实上这一定稿没有给俄帝国主义带来什么好处¹。最后双方同意“特殊利益”的上述措词。所谈的只是关于外蒙，并不涉及新疆。

应当指出，根据协定划归日本势力范围的有吉林市和吉林省 112 内俄国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约一百三十公里穿越的地区（当然不包括铁路本身及其“租借区”）。这是俄帝国主义为了远东普遍的哪怕是暂时的“稳定”所作出的牺牲，而协定总的来说是应该带来这种稳定的。

在交换日俄两国同中国签订“保持有效”的条约时，发生了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在签订秘密协定时所约定好的，双方应就仍有效的条约通知对方。李鸿章和洛巴诺夫签订的俄华密约，未曾通知日本人，因为俄国外交部认为该项密约已失效（虽然该密约应在1919年期满），也因为“俄华双方”都破坏了该密约，“中国对密约已不加以重视”。

如果对于日本把协定的“特别秘密”条款通知伦敦政府而俄国则通知巴黎政府²一事加以注意，则沙皇政府对欧洲的一般政策和签订俄日协定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更加明显了。而且沙皇的外交大臣本人也证明了这一关系，他在6月14日（公历27日）“特别会议”上说：“所拟定的对日政治协定是英法协定系统的一环”³。事实上同年春季俄国已经同英国进行有关中国领土协定的谈判。

然而，沙皇政府对于新的日本“朋友”的担心和不信任仍然是很大的，协定倡议人伊兹沃尔斯基本人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他向海军大臣说：“可以假定，日本打算的只是使我们失去警惕性，以准

1 参看案卷第202号，1907年4月29日备忘录所附定稿。

2 同上案卷，伊兹沃尔斯基的奏折，附7月10日尼古拉御批。

同上案卷，伊兹沃尔斯基于8月1日（公历14日）交给法国公使秘密条文的亲笔记录。

3 参看案卷第202号，1907年5月14日“特别会议”记录。

备新的进攻。”伊兹沃尔斯基继续说道，因此应准备万一和武装起来。一个参加国际帝国主义谈判的俄帝国主义代表，在海军部质询 1907 年协定期限时所表示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伊兹沃尔斯基教导人们说：“本政府不管用什么协定约束自己，但若一旦国家的切身利益需要时，它将毫不动摇地扔掉这些协定。”¹也就是说，无论帝国主义的哪一方在必要的时候对“一纸空文”是不重视的²。

日本统治集团对于获得重要支柱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极为满意，并且用隆重的宴会、讲演和报上发表文章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高兴。

113 除了对抗美国的进攻以外，新的联合加强了日本统治阶级的信心，在最近时期内同最亲近而又最危险的竞争者——俄国保持和平关系。这使得日本最紧张的国家预算因略加缩减军备的拨款，主要是缩减陆军的拨款而减轻了。拟定的最近六年军备计划，在 1907 年底缩减了一亿二千万卢布³。

在协定顺利谈判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能相当镇静地对待美国海军的示威，不理睬美国人要求购买俄国前林业公司的租让权，而且俄国政府在签订协定以后也未显露出任何愿望，来积极支持美国人暗中购买沙皇在朝鲜和南满的“权利”。

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和主要同盟者仍然是英国。英国为了同日本保持政治上的同盟甚至牺牲了本国资产阶级个别集团某些领域内的根本利益，不过这一同盟也给了英国资本家在日本直接的经济利益，其他间接的除外。然而英帝国主义一般不放弃在满洲的“活动”，但在这一时期对于日本资本家所特别重视

1 参看案卷第 203 号，1907 年 9 月 23 日伊兹沃尔斯基书信草稿。

2 同上案卷，9 月 20 日和 11 月 23 日巴赫麦季耶夫的电报和 9 月 21 日—10 月 5 日亚洲政策会议通报。

3 参看案卷第 204 号，巴赫麦季耶夫 1907 年 12 月 22 日（公历 1908 年 1 月 4 日）发自东京的电报及其他。

的问题不加过问，而对日本资本家不准外国资本家干涉的领域也不加以过问。不列颠鲍威林公司铁路租让权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07年11月，北京政府给予鲍威林公司建筑新民屯——法库门铁路租让权，并有权把铁路线延伸到齐齐哈尔。这样作的目的，很明显是要使不列颠资本家与日本资本家相对立，使后者不能妄想在满洲独占统治地位。

早在签订铁路租让权合同以前，日本政府基于所谓1905年北京条约补充议定书禁止中国在南满铁路邻近或平行建筑铁路而提出了数次抗议。给予鲍威林公司以铁路租让权后，日本又提出坚决抗议。北京政府打算将此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但日本对此不同意。鉴于东京的这种断然行动，伦敦政府拒绝支持鲍威林公司的租让权¹。

从大体上来说，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利益一再提示，必须在满洲向日本让步，而日本帝国主义对此让步一开始就表现得极为敏感。

虽然不能说，随着1907年俄日协定的签订，过去的敌人相互投入怀抱了，因为彼此的极不信任仍继续存在着，但这一协定终究是结成俄日“联盟”的第一步。保护俄日两国在满洲势力范围内不受他国暗算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列强在国际舞台上势力的分布，必然使“联盟”巩固起来。 114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同沙皇政府的联盟在现阶段是最为有利的。当然，这一联盟并不妨碍在满洲和北京的日本代表在某些场合中挑唆中国当局去对抗俄国人，也不妨碍日本资产阶级的某些报纸，特别是军国主义的报纸有时掀起反俄运动²。但是这一

1 《关于发展满洲的报告》，大连，1909年，第36页。

2 参看关于这一点的特别案卷第206号，1910年科罗斯托维茨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其他的事实和日本对抗俄国建筑张家口—恰克图的铁路计划。

点对于日本政府政策的基本方向没有重大的影响。

沙皇政府同样毫不动摇地执行对日联盟路线，或不如说是被迫地执行。唯一的一次动摇情况发生在 1908 年非正式的、主要是俄国财政部所支持的同美国金融资本交往中，又“旧事重提”关于由美国或国际资本赎买满洲铁路“交还中国”。这次动摇是力求在俄日之间设立缓冲地，哪怕以丧失北满的地位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但是财政部代表维连金在华盛顿同银行家申夫的谈判（这次谈判是谁倡议的，尚未查明，应认定是美国倡议的），根据科科夫采夫“听其自流”的指示进行得很不顺利¹。

根据美国的倡议，中国政府于 1909 年 1 月照会俄国公使，建议赎买中东铁路²。同样也把这一照会抄致日本人。

这样的行动方式，事先未得到有关政府的同意，想获得某种积极的结果是谈不到的。彼得堡政府回答说，“原则上”不拒绝中国的建议，但把这一建议的可能实现推迟到阿穆尔铁路³建成后。沙皇政府不打算拒绝中国的建议，否则只会增加北京的不友好的关系，在朴茨茅斯和约以后，这种不友好是十分明显的。

115 经过一年以后，美国政府建议满洲铁路“国际化”的表示，是最为严重的，虽然这一表示一开始就很明显注定要失败。如遇俄国和日本拒绝“国际化”计划时，就拿建筑锦州—齐齐哈尔—瑷珲竞争干线相威胁，使美国的这一表示立即加强起来。为铁路建设服务的美国冶金工业当时所经历的危机，在国务卿诺克斯的表示中也起了自己的作用，此外，这一表示是美帝国主义不断向满洲进攻中的首要一步。塔夫特新政府也想借这一表示来证明自己是能够保护美国资本家利益的。

1 罗曼诺夫：同前书，第 564, 565 页，关于科科夫采夫的函件。

2 同上书，第 563 页，关于科科夫采夫的函件。

3 同上书，第 566 页，阿穆尔铁路 1908 年开始建筑，1916 年建成，共花费三亿六千万卢布。

美国外交界建议满洲铁路国际化时，在各国首都又提起锦州—瑗珲铁路是有一定根据的。关于建筑这条干线的初步合同已于1909年10月¹由美国摩根、库恩·洛伯公司、第一国家银行、花旗银行和英国鲍威林公司与东三省总督签订了。

鲍威林公司的参加美国集团，使1907年签订的新民屯—法库门铁路合同也给并吞掉了。鲍威林公司现在已是美国资本家手中的诱饵，后者吸引英国公司参加，想因此取得英国的预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有击破俄日抵抗的某种可能。

根据美国银行团和鲍威林公司之间的合同规定，建筑铁路器材不少于一半应在美国购买（请注意，美国冶金业正经历危机），美国工程师必须参加铁路的建筑等等²。第二年1月8日（公历21日），北京皇帝以御旨批准了这一合同。

美国在关于满洲“中立化”问题上的举动伴随着很多饶有兴趣的事件，在外交上不体面的勾当中所进行的这一举动，反映了那一时期明显的种种外交关系，对此值得稍微详加叙述。

诺克斯于1909年12月14日发出有名的备忘录在德国受到最大的同情，骤然看来是出乎意外的（还在11月9日〔公历22日〕就向不列颠政府发出呼吁书）³。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凡格在给德皇威廉报告中说，为什么德国政府必须支持美国的建议：“因为 116 我们最希望的，是使俄国愈加把自己约束在远东，并在那里造成同日本发生磨擦的较为广泛的地带。在这一点上满洲到现在仍是不利的地方。相反，俄日对满洲的问题很快就要团结起来了。”在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并担心这种情况会导致俄日完全和好，贝特曼·霍尔凡格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美国，特别是英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5卷，第800—802页。

2 马克·穆拉：同上，第802页。

3 扬：《满洲的国际关系》，1929年，第107页。

国(??——作者)打算尽力阻挠俄日在满洲的意图，俄日共同行动的愿望就会冷却起来。”德国宰相断言，“美国对满洲是倍感兴趣的”。总之一句话，必须使其他列强紧紧地挤入满洲，不使俄日有可能在这块土地上结成彻底的同盟。威廉在贝特曼·霍尔凡格的报告上批示：“很高兴，完全同意。”威廉只是对于旨在反对日俄的计划受到英国支持感到惊奇，因为英国是俄日的同盟者，美国代办一定相信这一点。既然实际情况这样，威廉只能表示高兴，“哪怕仅仅是为了在国外将向全世界表明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团结一致”。威廉仍然让美国来倡议，“让美国去承担因磨擦而产生仇恨的责任吧”。¹

因此德国立即训令驻华盛顿公使通知美国政府，德国完全同意所提的原则，并乐意参加可能的步骤以实现这些原则²。

但是，威廉的关于英国立场的情报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美国外交官小题大做了。德国驻伦敦大使报告说，英国虽然同情美国的建议，但它的行动却有待于明确的“日俄表态”³。换句话说，英国方面给予俄日两国以任何压力是谈不到的，纵令俄日都同意美国的建议，如果没有英国参加，英国资本也不会把满洲给予美国一国或与其他国家的联合集团，当然英国会加入“赎买满洲”的资本家银行团。

美国外交家也相信“日本对南满铁路国际化能表同意”。使德国人和英国人信服这一点的同时并补充说，如果日本不同意，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日本从满洲逼走”⁴。至于谈到俄国，那很明显是美国人根据一年前同俄国人所进行的非正式的谈判而

1 《伟大的政策》第32卷，CC章，第11668号，《贝特曼·霍尔凡格1909年12月23日的报告》。

2 同上，第11669号，12月24日申致柏里斯多夫的电报。

3 同上，第11670号，12月31日收到柏里斯多夫自华盛顿发来的电报。

4 同上，第11607号。

断言，“俄国已有友善态度的迹象”。但是所有这些希望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刚刚在不久以前(同年8月)用哀的美敦书从中国获得以下的权利：中国同意履行1905年签订的关于改建安东—奉天轻便铁道(狭轨)为正常铁轨¹，延伸长春—吉林铁路到朝鲜边境，这一点对日本非常重要(这是当时计划中的朝鲜—满洲干线的一段)；日本达到了巩固日本资本家在抚顺和烟台煤矿权利的目的²，于1908年5月1日(公历14日)签订了关于成立中日合营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公司)的协定，以开发鸭绿江在中国方面广阔地带的森林³，开展了向南满输出工业品的积极活动；开始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断然拒绝美国的建议是自然的。回答说：“日本政府的任何一个省都不敢接受美国的建议。人民(应读成资产阶级——作者)会烧掉大臣的房子。”⁴

彼得堡政府的答复也不好，尽管最初的答复是“支吾搪塞”的——“俄国政府首先必须对计划进一步加以研究”⁵，但是美国大使罗克希尔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之间的谈话，其细致情节在外交惯例上是少有的。当罗克希尔谈到如不接受国际化计划将建筑与中东铁路相竞争的铁路时，伊兹沃尔斯基领会这是一种威胁，“而且态度十分严厉，以致使罗克希尔先生回答说，如果大臣先生今后用这样的态度同他谈话，将来他只能同他书信交往。”⁶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5卷，第785页。

2 同上，第790—797页。

3 同上，第731页。这一公司的成立是1905年12月24日日华补充协定规定的。

4 《伟大的政策》，第11673号，1910年1月11日(公历24日)收到的史瓦尔程斯登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5 同上，第11674号，1910年1月11日(公历24日)米切尔里赫致贝特曼-霍尔凡格的电报。

6 同上，第11672号，普尔塔列斯1910年1月4日—17日自彼得堡致贝特曼-霍尔凡格的信。

彼得堡政府的最后正式答复跟东京一样,是否定的,而且正式答复的方案,东京和彼得堡事先都已相互通知,在同一天送致美国大使(1月8日,公历21日)¹。

118

俄国资产阶级同北满日益加强的经济关系,在沙皇政府对退出满洲的否定态度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地的战后危机已经过去,北满的经济生活已走上轨道,对北满的贸易关系、特别是俄国远东对北满的贸易关系,日益稳固和加强起来。对满洲工业(特别是林业和建筑业)规模不大的新投资也开始了。资产阶级看不出放弃满洲的理由。同日本瓜分满洲以后,由俄日共同协力保护它不受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以尼古拉为首的农奴主的死硬派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远远不是那么明确的。

德国驻彼得堡大使普尔塔列斯在致德政府的信中叙述伊兹沃尔斯基对美国建议的消极态度,并对这件事有何结果表示怀疑。德皇威廉在该信中五次指出“沙皇倾向于”美国的建议,但想的却完全“相反”²。威廉这样肯定未必没有根据。德国外交官对尼古拉的影响,他希望美国人一旦在满洲能站稳脚跟则根据同斯密特签订的合同能为“皇室”获得前林业公司租让权的全部付款³,这两件事使代表农奴主的反复无常的尼古拉“狼狈不堪”。由此产生了彼得堡政府最初所表现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俄日的协力抵抗和直到正式抗议北京政府打算建筑锦州—璦琿铁路,把从满洲“逼走”这两个国家的方法也弄得完全失败了。至于巴黎和伦敦政府拒绝支持这一建议,就更不必提了。

1 参看案卷第286号,1909年12月31日(公历1910年1月13日)马列维奇-马列夫斯基发自东京的信。

2 《伟大的政策》,第11675号,普尔塔列斯1910年1月12日(公历25日)致贝特曼-霍尔凡格的信。

3 关于出售租让权的一切步骤均经沙皇批准(参看案卷第135号,巴拉绍夫1907年3月30日致伊兹沃尔斯基的信)。

美国外交界关于满洲毫无成效的一些步骤，引起了美国大资本家集团的极大激动，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文章，批评前届政府支持日本和现届政府的无能和软弱。

塔夫特政府把责任推到罗斯福身上，归咎于他的亲日政策和对日缺乏具体的协商。应该说，1907年春季用战争威胁以后，罗斯福政府安静下来了，意识到在当时用威胁不可能从日本那里获得什么东西，就走另一条路线，于1908年签订了所谓罗特—高平协定。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11月30日）在换文中，用一般的说法承担义务来维持太平洋现状并保护在中国¹（即在满洲）“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日本在南满于严厉压制外国资本家活动期间巩固了自己的经济统治地位，经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一系列抗议之后，确实减弱了反对外国工商业者的措施，形式上也准许“机会均等”。而美国政府因为看不出用好战声明能得到什么东西，就开始建立“和平的”相互关系。但是极大部分的美国金融界仍对罗特—高平协定不满，称它为罗斯福“外交上的愚蠢”。

诺克斯的备忘录失败以后，塔夫特政府要求罗斯福书面公开说明他的远东政策，因此罗斯福本人在致诺克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想对抗日本在满洲的政策，那么，就需用战争来解决”，（罗斯福使人们相信）因为日本在满洲有“切身”利害关系，决不会乖乖地把它让出来。而要使“争夺满洲的战争获胜”（根据罗斯福的意见），“必须有英国那样好的舰队，此外还必须有德国那样好的陆军”²。但是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美国没有这些。

诺克斯在回信中向罗斯福提出不同意见并表示怀疑。“为什么日本人需要满洲胜过中国，况且满洲目前是属于中国的，或者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5卷，第369—771页。

2 邓尼特：同前书，第320页。

说，为什么满洲对日本人有‘切身利益’，而对中国没有‘切身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诺克斯对罗斯福没有作战决心表示不满。诺克斯说，不能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为我们在中国的利益而战¹”。

申夫本人(库恩·洛伯银行经理)在日俄战争时给日本筹措战费尽了很大的力，后来企图同哈里曼一块儿钻进满洲，失败了，现在瑗珲铁路“国际化计划”又遭失败了，因此也认为进行战争威胁是自己的职责。1910年初，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他对“俄日的联合”表示痛心，他“作为日本的朋友来说”，“预言大战即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俄日英之间的协定对整个世界构成最大的威胁”²。与申夫和哈里曼有关系的《纽约时报》向日本发出了更有威胁性的警告³。

120 从美国金融大王、过去和现在的政府成员日常都大声谈论“对日战争”的情况中，看到满洲对于美国垄断资本家具有多么大的魔力。虽然没有足够的手段，用武力把敌人从满洲“逼走”，在“和平”、“逼走的”政策中又遭受了失败，但华尔街却不愿丢失侵入东亚这个地区并在这里稳定下来的希望，正象它在全中国顽强地继续追求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一样。

为了达到这一点，美国资本家及其政府在中国的“朋友”幌子下竭力伪装起来。其中之一是1908年春美国国会决定把一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华尔街就是这样以失小换大的。

美国金融资本家损害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和侵入满洲的下一个重要企图，是美国自己(不要俄国和日本参加)成立给中国政府国际借款的组织。这次所谓“财政改革和发展工业的借款”为

1 邓尼特：同前书，第322页。

2 参看案卷第206号，罗申1910年2月24日(公历3月9日)自华盛顿发的紧急电报。

3 参看1910年3月9日社论。

五千万美元。关于借款的初步合同于1910年10月14日(公历27日)签字。最初只有以摩根为首的美国几家银行参加,后来“库恩·洛伯公司”¹也参加了,即哈里曼的铁路康采恩。

但是为了确实保证借款的偿还和使俄国、日本感到压力,必须吸收代表其他“列强”的参加者。因为借款的真正目的比铁路国际化的目的要隐蔽得多,所以吸收英、法资本家参加不是太困难的。英国和法国参加了借款,对于同盟者的俄国和日本来说是“无辜者”。1911年春(4月间),得到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同意,原则上参加借款。

根据借款条件,中国方面既然对偿还借款首先以满洲各省的国家收入作保证,所以满洲就应由国际资本防止俄国和日本加以最后吞并,并设置某种障碍来对付这两个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加强影响。只有中国自己占有满洲和从那里获得一定收入的情况下才能偿还借款。这些收入是:工业税七十万库平两,消费税八十万库平两,烟酒专卖税一百万库平两。此外,得以确保借款的有二百五十万海关两²。除了在中国进行货币改革外,预定借款应促进 121 满洲工业的发展,即是说,应对俄国和日本的活动造成明显的对抗。根据声明,中国政府拟将四千万两用在满洲,其中货币改革为二千万两,移民开拓一千四百万两,余数则用在矿业、林业等等的开发上³。在美国集团的心目中,满洲起着何等作用,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到,美国集团的代表是美国驻奉天领事 B. 斯特雷特,在这以前是为哈里曼奔走满洲铁路“国际化”和建筑瑗珲铁路的代表。

A. 坎托罗维奇把美国资本家的小走狗斯特雷特评价为

1 马克·穆拉的合同条文,同前书,第5卷,第851页。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5卷,第851页。

3 同上,第841—849页。

“国际化和美国侵入满洲问题的鼓舞者”，这当然是不对的¹。坎托罗维奇对斯特雷特这样评价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不把这一评价同贬低美国资本家在整个满洲的作用和侵略联系起来。坎托罗维奇轻视地指出，“某些美国集团要在中国执行积极和侵略政策的意图”，是与斯特雷特的名字有联系的。根据斯特雷特的倡议，“英美资本家集团关于建筑纵贯满洲由锦州到瑗琿的铁路同中国进行谈判”²（异体字是我标的——作者）。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美国垄断资本家正是由老早的铁路问题开始对满洲进攻，同时随着沙皇的侵略开始，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在俄日战争结束时更加强了这一进攻。现在这当然已不是“根据斯特雷特的倡议而活动的某些美国集团”，而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华尔街庞然大物，对他们早已预定的和给予他们巨大超额利润的殖民地，继续顽强进行侵占，这种顽强性为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所固有。

由于借款的偿还是从得自满洲各省的收入来保证的，四强的资本家最感兴趣的是满洲仍在中国手里，俄国和日本在满洲的势力不会加强起来。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和日本吞并满洲的危险已完全成为现实。在这不久以前（1910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鲜。此外，俄国和日本之间于1910年6月（6月24日公历7月7日）签订了第二次友好条约。美国的“国际化”和在满洲建筑铁路的计划恰好加速了这一条约的签订。

美帝国主义特别希望的扩张对象，在中国当然不止是一个满洲。美国资本家在扬子江开展了积极活动。自十九世纪末特别注意利用福建省（企图为美国舰队建立加煤港）。

1911年，威福列姆钢铁公司甚至同中国签订了关于在福州修

1 坎托罗维奇：《满洲的铁路冲突》，《新东方》，第22期，第10页。

2 同上书，第10—11页。

建造船坞的秘密条约。如果这项秘密条约实行了，实际上福州就会自然变成美国舰队的基地。日本人知道了这项秘密条约以后，拼命反对实现，正象当时不准许在这里建立美国“加煤港”一样。然而这一事实连同其他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正与日本帝国的利益发生特别尖锐的冲突。

俄日联盟虽然有显著的分歧因素，但却很迅速地巩固了，如果不是前朝鲜总督元老伊藤公爵被刺，第二次友好条约可能更早些就签订了。1909年10月，伊藤来到哈尔滨，是为了同路过哈尔滨的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会面和关于某些问题“搜集资料”，以答复美国抗议强迫同中国在夏季签订若干有利于日本资本家协定的最后通牒，同俄国进一步接近当然是日本对美国抗议的最好的答复。伊藤（“俄国的老朋友”）的使命正是实现这一点。但是朝鲜人的子弹打死了伊藤，使得这一答复推迟了若干时候。因为刺杀是发生在“俄国的”哈尔滨，日本“社会舆论”顷刻间又重新激起了对俄国人的旧恨。

其实，现在有一切根据认为，刺杀是由日本军事当局本身挑拨起来的。因为伊藤的“过于和平的政策”，日本军事当局很不喜欢这位有影响的元老。此外，伊藤到北满面临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改组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地带的管理机构。根据方案，这一改组必须撤销辽东（日本人现称为关东）都督（军事将官）的职务，而把一切民事交由省长和领事馆处理。在日本军阀的心目中，退出在满洲已占有地位的这一步骤是不能容忍的，是软弱的表现，而主要是剥夺了军阀的权力和大发横财的机会。然而伊藤被刺事件不能阻止事态的一般发展。负有日本帝国主义使命充当“俄国朋友”的接班人后藤在11月间告诉俄国人：伊藤本来应与科科夫采夫讨论的问题中尚有“在租借地内规定对中国人的共同行动”和“互相支持”的问题，即是说使关于满洲“势力范围”的协定更加明确和共

同向中国逼攻¹。同时日本报纸大肆夸张地传播关于同俄国签订第二次一般政治协定谈判的谣言。必须指出，这在时间上是与摩根、库恩·洛伯公司同东三省总督签订关于锦州—瑗珲铁路合同(10月)相一致的；“日本外交老手”大隈伯爵直接向俄国代表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现正急冲冲地奔向满洲，这是日俄有共同利益的地方。”²

俄方对于在满洲“共同利益”基础上加深俄日联盟的问题，随后不久就在11月最后决定的。美国大使和日本大使一个接着一个去拜会俄国外交大臣，他们各自都建议加强从中国的“无定形体”(日本大使本野的说法)中吸尽汁液的工作。俄帝国主义的总路线实际上已经确定，尼古拉于11月18日在伊兹沃尔斯基关于日美建议的“奏折中”批示，“现在应选定同日本开始最密切的协议”³。这一批示是根据俄帝国主义在远东过去整个政策而产生的自然步骤。

后来，伊兹沃尔斯基在11月末“关于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说，“如果我们拒绝美国建议，则可能使美国的态度一时冷淡起来”，但是“美国不会因此向我们宣战，也不会把舰队派到哈尔滨来，而日本在这一点上是最为危险的”。科科夫采夫补充说，他在远东视察时，证实俄国在太平洋方面没有任何防御，几艘军舰中“大部分不仅不能对付敌人，连大风都对付不了”，就“防御来说，总的情况是很可怜的”，因此应“在同日本共同行动中谋求支援”，于是决议最后通过了，虽然在会议记录上未作下记录⁴。应当指出，就

1 参看案卷第206号，马列维奇-马列夫斯基1909年11月8—21日自东京发的电报和1909年11月9日(公历22日)的信件。

2 同上案卷，马列维奇-马列夫斯基1909年11月5日(公历18日)的信件。

3 同上案卷，1900年11月12日(公历25日)有尼古拉批示副本的奏折草稿。

4 同上案卷，1909年11月28日(公历12月11日)特别会议记录。

在这个时候(1909年下半年)传播着日俄之间在远东“立即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谣言。俄国在远东的军阀则极力促使这种谣言¹²⁴的传播,他们希望借此迫使加速对强化军队和巩固远东的拨款¹。彼得堡被迫急电“警告”阿穆尔总督翁捷尔别尔格尔,说他参与造成那里过分紧张的“惊慌”²。认为德国参与了这些谣言的夸张传播,不是没有根据的。德国政府仍然企图把沙皇专制政府的军国主义机器引向远东。《德意志远东通信》总编辑布史特德博士在这个时候专程来到彼得堡,由于“友情”的洋溢,要亲向俄国外交大臣报告自己所获得的情报:关于日本在何地和准备何种武器以及在疯狂准备对俄战争过程中发行公债等³。最后,毫无疑义,根据当面说好话,暗中下毒手的原则,日本人本身也促进了上述谣言的传播。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在当面的同盟条约中为自己多得点权利,而对“同盟者”则少作让步。然而日本人开始表示极大的不耐烦,要求尽可能快地答复“关于1907年政治协定的进一步发展”。彼得堡政府动作十分缓慢,探索日本政府将提出何种具体建议⁴。日本政府甚至对“自己向俄国人献殷勤所遇到的那种冷淡和矜持表示惊奇”⁵。

俄国外交部在2月底才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同盟”的共同条件。这些条件是:相互保护满洲的现状,反对第三方面建筑新铁路和破坏“商业权利”,以及建议“双方有责任共同保卫俄国和日本

1 1909年加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堡垒计划预算,达到九千八百万卢布。

2 士官们送走自己的家眷,各商号缩减业务。参看案卷第206号,伊兹沃尔斯基致翁捷尔别尔格尔的电报(1909年12月2日,公历15日)。

3 参看案卷第206号,米列尔1909年11月19日(公历10月1日)书面报告副本。

4 同上案卷,马列维奇-马列夫斯基一系列电报,特别是1910年2月10日(公历23日)的电报。

5 同上案卷,马列维奇-马列夫斯基1910年2月24日(公历3月9日)的电报。

在远东的领土，并根据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所获得的权利之不可侵犯”¹。

后来，日方采纳这些条件作为交换意见的基础，俄国驻东京大使以备忘录形式向日本外务省说明该项条件。进一步的谈判后来移到彼得堡进行了。

日本驻彼得堡大使本野根据东京训令对问题持另一种态度，
125, 提出了扩大和明确满洲势力范围现状的概念，而回避“共同保卫领土的义务”。同时，他坚持为了避免竞争和建立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作业的相互协调，进行协商²。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5月间以俄国方案形式达成公开的和秘密的协定，然而在协定中没有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协作”这一条。但本野仍坚持把这一条和其他的若干补充条款列入协定。日本大使反对俄国人排除在对方势力范围内任何经济活动的条款。这一条款对于在满洲比较发达的和比较有力量
的日本资本家显然是不利的。东京政府建议在本协定最后签字前，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协定内容通知英法政府³。

第二次俄日协定公布的部分，或者所谓的“公开的”协定，叙述俄日双方“相互”改善满洲铁路，放弃中东、南满两条铁路作业上的竞争，保持“满洲现状”，还叙述“如果发生威胁现状的情况，两国应立即进行采取有关措施的谈判”⁴。

这就证明日俄之间在对待满洲问题上是全面的同盟。这两个

1 参看案卷第209号，1910年2月20日（公历3月5日）俄国外交部致马列夫斯基的电报。

2 参看1910年5月1日（公历14日）日本大使法语本备忘录。

3 参看案卷第208号，本野1910年5月18日（公历31日）法语本备忘录和马列夫斯基1910年5月20日（公历6月2日）信件。英法政府实际上已知道双方草案（参看关于这个问题的案卷第208号，柏克多尔夫5月16日〔公历29日〕自伦敦发出的信件和聂克柳多夫5月17日〔公历30日〕自巴黎发的电报）。

4 同上案卷，协定副本。

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说明还存在着一个比公布的协定走得更远的秘密协定。对于关心问题但又不能从有关方面得到消息的人只能猜测(美国报纸就是这样作的),秘密协定究竟走得多远。

第二次协定确实大大地扩大了第一次秘密协定的范围。它承认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每一方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利益”,“不反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种利益”,在对方“势力范围内”“不搞政治活动”和不搞由于谋求特权和租借地而有损于有关的特殊利益;在“出现威胁情况”时,双方应就“相互支援”的措施进行协商¹。

伦敦和巴黎对于俄日进一步的接近表示满意,柏林和维也纳¹²⁶对协定的态度则极为冷淡,并指出,对于德国和奥匈的危险性增加了。在维也纳协定甚至“引起了风波”²。至于伦敦,在仔细研究了俄日协定以后,在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大资本集团(他们早就知道了秘密协定的主要内容),很快就了解到新协定对他们利益将带来直接的损失。《泰晤士报》为时稍晚的对协定的评论确实证明了这一点³,该报对协定是不赞成的,并着重指出英国资本家所遭受的损失。俄国资产阶级对该协定大体上表示满意,指望能在中国的自己“势力范围”内进行更为安全的开发。

瓜分满洲的协定的深化和明确,对于日俄帝国主义说来,这是很自然的步骤。这个协定不仅能够对其他帝国主义的要求给以坚

1 参看案卷第 208 号,法语本秘密协定准确副本(第 28 张)。格里姆的翻译本。条约汇编第 177 页。但是译文第四条有明显的错误或错字。格里姆的译文:“规定:俄国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不谋取任何特权……”应为:“规定:俄国不在日本势力范围内而日本也不在俄国势力范围内谋取任何特权……”还有几处很不明确。格里姆的协定译文同 1910 年 6 月 30 日(公历 7 月 13 日)政府公报补充材料中所公布的正式译文在某些重要细节上还有出入。公布的协定显然是格里姆从马克·穆拉的英文本翻译的(第 803—804 页)。

2 参看案卷第 207 号 6 月 7 日(公历 20 日)乌鲁索夫的紧急电报。

3 参看 1910 年 8 月 6 日《泰晤士报》编辑部文章。

强的回击，而且对主权主体的中国为了确保自己在满洲的实际主权的企图也能给以坚强的回击。尽管在原先的两个敌人间把满洲瓜分了，但北京政府仍然不愿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这个地方。当时南满的封建官僚上层在战后初期完全是在日本的支配下，而北京却处在其他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的压力下（中国资产阶级竭力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北京所能作的，只是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和利用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使俄国为了巩固自己、日本为了进行顽强进攻制造困难。

然而，中国腐败的封建官僚上层毕竟无力作出稍许有效的、实际的回击。帝国主义的大量要求通过哀的美敦书和威胁最终逼得北京同意了，例如上述 1909 年夏日本在南满建筑铁路支线，等等。

中国行政当局凡是不在日本金钱和刺刀直接影响下的地方，它有时由于不满而甚至反抗满洲本土的“救星”。例如，1908 年初哈尔滨道外中国当局竟敢于采取这样的步骤，命令把日本人从道外强制迁出（道外对外国人不开放）¹。

127 中国人反抗俄国人比反抗日本人要厉害得多，在俄国外交人员的报告中有很多对中国人的“蛮横无理”和“苛求”的抱怨。现列举其中几项。

中国行政当局受日本人的影响，禁止蒙古人和内蒙王公同俄国人有任何往来关系（其中乌达优王公于 1901 年曾从俄帝国主义的代​​表那里领取二十万卢布的“津贴”）；甚至命令不让过往的俄国人住宿²。

中国当局拟订了北满移民计划，特别是西部边境地区的军屯户³，禁止从满洲输出粮食（俄国远东当时进口了很多满洲谷物），

1 参看案卷第 211 号，1908 年 2 月 4 日（公历 17 日）柳巴的报告。

2 参看案卷第 212 号，1909 年 8 月 28 日（公历 9 月 10 日）波波夫的书面报告。

3 同上。

在松花江设关并征收关税(过去过境是免税的)¹,各地向俄国商人征收厘金。总之,颁布了与1881年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相抵触的命令。后来的几次命令使边境的俄国商业资本家受到特殊的打击²。中国行政代表在中东铁路租借地区内个别问题上不服从铁路督办的规章和命令(督办是铁路租借地区俄国的非正式总督)。

1907年,在整个满洲和俄国远东盛传中国即将“进攻”俄国的传说,以致俄国公使甚至认为有与北京政府说明这一点的必要³。

俄国帝国主义的处境由于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以及在某些场合中还有日本人的竭力支持和策动中国人的反抗而更加复杂化了。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铁路租借地区行政组织问题,美国人坚决拒绝服从俄国制度。因为1907年1月1日在哈尔滨设立的俄国领事馆,它拥有大量俄国侨民,但不掌握一般领事馆对侨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力,造成了铁路租借地区地位的特殊性。在给领事的秘密训令中说:“对铁路地区俄国侨民的行政权、对公民生活的指导和监督均属于中东铁路公司。”⁴(即事实上属于铁路督办)应指出这一情况,即约在一年时间内(1908年8月19日—1909年7月7日),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将军身兼督办和哈尔滨总 128 领事两种职务。很显然,打算把两种职务合并在一起。

宣布哈尔滨为开放的“港口”(1907年1月1日),接着就产生了疑问,这个“港口”所辖的究竟是哪些地区(属于中东铁路的地区或是其他地区),“租界”安排在哪里。甚至俄国领事本人对这个问题⁵也不明确。

沙皇当局的所有这些紊乱现象和含糊不清(在最初时期,他们

1 参看案卷第213号,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往来公文。

2 同上案卷,1909年8月28日(公历9月10日)波别的信。

3 参看案卷第203号,1907年9月7日(公历20日)波科基洛夫的报告。

4 参看案卷第210号,1907年1月间柳巴的报告。

5 同上案卷,柳巴的第一次报告。

并没有准确理解,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目前在北满要追求什么目的,要执行何种路线),这帮助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不仅削弱俄国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地位,而且也削弱在中国本部的地位。

沙皇政府代表首先感到了政治路线不明确后果,坚决要求对政治路线加以明确,提出必须二者择一:“跟日本人走或者跟美国人和英国人走”……“对这个问题应该下定决心”¹。在中国的俄国财政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不了解秘密协定,所以他就不知道沙皇政府自 1907 年已经跟日本人“走”了,诚然在最初时期是不坚决的和谨慎小心的。

1910 年协定最终地结束了这种含糊不清状态,并加强了俄国帝国主义在北满既反对外国人又反对中国人的地位。

对中国行政当局施加压力、沙皇当局的苛求、对中国主权的藐视,这一切逐渐地又使占领时期重新复活起来。

然而这一次俄国帝国主义却遇到了一个新因素,在俄国人强占满洲的初期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现在则大大地加强了。这个因素就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它虽具有优柔寡断的殖民地性质,但却比封建主和官僚们表现出较大的毅力,比较能巧妙地和坚决地对日本和俄国的人侵进行斗争。满洲的当代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资本培养起来的,主要是俄国人。在满洲建筑铁路、购买建筑材料和粮食等等所支出的资金,除了必需维持劳动力的最低定额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钱回到俄国资本家手中外,一部分集中在封建官僚上层手中,一部分集中在各种承包商、
129 工长、商人等等手中。由于建筑铁路和港口,商品流通大大地增加了,使钱多多少少积聚在那时还极为软弱的满洲土著商业资本家的代表手中。满洲的新生资产阶级在俄日战争时捞到了很多的

1 参看案卷第 917 号,1906 年财政代表郭伊尔的报告。

钱，满洲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诞生期，应认为是 1904—1905 年。

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官僚们的另一个巨大的资本积累来源是土地的投机倒把——开拓基金，而这种投机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于建筑铁路造成的。

满洲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这种特征下诞生和成长的，就其本性来说很不善于革命和反帝斗争，这一点是很自然的。满洲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有密切联系，在某些方面同封建官僚机构结合在一起并靠它成长，把自己的根又伸展到亚细亚式的高利贷资本中，因此它本身同时常常体现着封建农奴制的剥削、高利贷和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当时它比中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落后、更反动、更不善于反帝斗争。

但是，满洲的优柔寡断的资产阶级甚至多少也能清楚地理解在满洲所造成的地位。

1901 年，哈尔滨道台于驷兴给东三省总督的报告在这一点上很有代表性，因为很大程度上他是在黑龙江搞土地投机倒把致富的。我们把他报告中最本质的一段话引证在这里。他的文章风格是清朝中国文体的典范。于驷兴写道：“对外国人的政策加以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政策是经常变化的，就象魔鬼那样千变万化。他们的政策愈显露，就变得愈奇怪。他们的手法是可怕的，象魔术师的手法一样，一件东西可以变成许许多多的东西。”在这段概论之后，于驷兴对满洲的形势叙述了自己的观点。

“日本人和俄国人……把我国的领土视为拨给他们殖民之用的土地。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空有其名，而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却有绝对的权力和真正的权利。他们任意把满洲划分为北满和南满，各自居住在自己的范围内，然而他们唯恐最终不能占有满洲，就签订友好协定，把这一协定作为应最终占领满洲的可靠途径。”

根据于驷兴的意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协定旨在反对其他国家干涉远东问题。”于驷兴对于其他国家对这个协定的态度断定得不错。他特别强调美国工商业资本家利益遭受的损失：“美国首先不会漠不关心地对待。”因为新协定“也涉及英国资本家，它必将采取预防措施”。根据于驷兴的想法，西欧列强中德国和奥匈帝国是最不满意的，因为俄国能把“自己的兵力派往西方”。新协定破坏了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安宁，这些国家“正竭力缔结相互间的友好协定”。

应该注意到，于驷兴并不知道秘密协定，只是根据公布的协定来发表议论的。

其次，于驷兴提出了一系列保卫中国和满洲不受外国资本家侵略的具体措施。其中重要的措施是：修订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的权利、建立常备军以及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提出的其他要求。

关于对满洲的具体建议中，有关于修订 1881 年商约、解决边境问题等对俄国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此外，于驷兴还建议：宣布禁止外国人开采满洲和蒙古的自然资源，发展黑龙江和松花江的内河航行，筹集资金和由中国当地资本家成立公司以建筑锦州—瑗珲铁路¹。

于驷兴建议中提出的计划要点对满洲的资产阶级来说，直到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

帝国主义在满洲这时也遭到农民的反抗。

满洲农民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本国地主、高利贷盘剥的自发性的不满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红胡子队伍的活动中。诚然，能干的冒险者，通常是由无家可归、陷于绝境的破产农民为首

1 参看案卷第 213 号，在 1910 年 8 月 21 日（公历 9 月 3 日）的信中附寄的道台于驷兴给东三省总督的报告。

而形成的,他们为了自己致富而利用红胡子队伍对外国租借地、中国商人、地主和富农课以定期的“红胡子税”,而对辛勤农民的赋税则更为频繁,这只是扩大了寄生者的人数,而且完全歪曲了破产农民活动的阶级性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

但是,特别在危机、歉收时期发展起来的红胡子活动,在个别 131 场合中极明显地是反对俄国和日本的强权势力,也反映了受压制的满洲农民反对本国和外国剥削者的自发的、无组织的阶级运动。

*

*

*

如果把俄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俄日战争后的初期各自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地位加以对比,则很容易看出,日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迅速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地位(建筑新铁路、日本工业品在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等等),俄国帝国主义在最初时期最为关心的,只是坚守住自己的阵地。

中东铁路公司和黑龙江当局之间签订关于开发煤矿权的合同并不是很大的成就。该合同只是重复了 1902 年类似合同的主要内容,并经过很多阻难之后才于 1907 年 8 月签字。

随着抚顺和烟台采煤权的丧失,中东铁路必需开采另外煤矿。但是在黑龙江省铁路地区内著名煤产地(主要在合同中列举的)价值不太高,因为褐煤质量很低。

8 月 17 日(公历 30 日)同吉林省当局也签订了这种开采煤矿的合同。此外,还同两省签订租让森林开发权(黑龙江省合同是 1908 年 3 月 23 日签订的)和中东铁路公司收购土地合同。早在 1906 年就已经恢复了在铁路地区内地段的收购,根据合同共收购十万零五千俄亩以上(黑龙江省十二万六千垧,吉林省五万五千垧,共计约一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森林租让权在吉林有两个:一个是过去的弗兰克的租让权,面积约为九百三十平方公里;另一个租让权面积为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在黑龙江省有三个租让

权,总面积达九百平方华里,约为二百五十平方公里¹。

132 关于中东铁路租借地内“管理制度”协定的签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俄帝国主义力图建立象租界一样的制度。以铁路督办为代表的中东铁路公司是铁路租借地内的全权主人,而中国人被认为是外国客人,应完全服从主人的要求。可是中国坚决坚持自己的一切权利,因为中国是主权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得到德国、奥匈帝国甚至现在对俄国“亲善的”英国的支持。

中俄关于管理制度初步协定经过长期交涉和俄方的极大让步,终于1909年春,即4月27日(5月10日)签字²。该协定一方面承认中国在铁路租借地内的“主权”,另一方面规定了特殊制度,并对铁路督办和俄国人地方自治机关赋予特权。但是上述列强不承认这一协定,并对此正式提出抗议。这些国家力求在铁路租借地内保留外国人的全部治外法权。在服从中东铁路公司制度的义务中,它们看到破坏了条约的权利,特别是在中国土地上³破坏了治外法权的“权利”。

因此该协定空挂了好几年,而签订协定的中国人更是竭力拒绝履行。

但是中国和俄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相互关系问题,最终决定于地主资产阶级俄国某一时期的内外形势的稳定程度。

沙皇专制政府在战争和革命后恢复了元气,巩固了作为三协约国成员的国际地位,最后通过同日本缔结联盟而稳固了远东的

1 所有这些合同的原文均刊在1915年外交部公报附件中:“中俄关于铁路各项问题协定,邮电和海关”,第33—52页。根据1912年补充协定,黑龙江省森林租让权改为兴安区更方便、面积更大的一些地方,因此中东铁路在黑龙江省的森林租让权面积约达七百平方公里。

2 参看前引《协定》,第17—21页。

3 参看《美国对外关系》一书中美国政府的声明和给俄国大使的口头照会。1910年,第213—219页。

势力范围,因此对中国又采取更严厉的方针。

1911年2月,哀的美敦书式的要求,说明沙皇专制政府又着手对付远东“病夫”了。

当北京政府企图拒绝完全接受俄国提出在满洲和新疆给以贸易特权和建立新领事馆等要求的时候,却对北京政府提出了真正的哀的美敦书,限期三日答复,为了加强哀的美敦书的力量,在边境还集结了军队¹。

北京政府接受这一哀的美敦书,是中国1911年革命的推动力¹³³之一。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满清王朝和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不满以不可抑制的力量爆发出来了。甚至北京报纸由于接受俄国人的要求而写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国上层官僚的迟钝和无能”,“只要一威胁,立即张惶失措,稍加宽容,就忘乎所以了”²。在南方,俄日协定(非秘密的)公布以后,“因政府无能为力,不断受到严厉的责难”。人们的印象认为“中国很容易失掉满洲”³。

俄国官方出版物提出转向实力政策。半官方刊物《新时代》刊登长篇文章,要求结束在中国面前受“屈辱”状态,应采取“强硬”路线,“停止在黄海无舵无帆地航行”⁴。

甚至远离满洲的如赫尔松、基辅的地方报纸(这里的大工业家同中国有某种经济关系)要求“强硬外交”和“强大的军队”以“保卫远东的和平”⁵。

西伯利亚、远东和中部各省的报纸以及资产阶级的报纸在

1 参看《俄国外交部公报》,1912年,第1卷:《关于中国破坏条约权利的谈判》,1911年2月15日,第113—152页。

2 《俄国外交部公报》,1912年,第1卷:《关于中国破坏条约权利的谈判》,1911年3月23日科罗斯托维茨的信。

3 参看案卷第207号,石金1910年7月12日的急电。

4 参看如1911年7月29日《新时代》。

5 参看7月23日《祖国边疆》杂志,波格丹诺夫教授文章,《基辅思想》杂志,1911年7月2日。

1911年夏简直达到歇斯底里的狂叫，把去北满和蒙古的每个中国移民都看成是改装的士兵，报道中国似乎“对俄国的利益”开始了有害的经济战，造谣说中国正加紧备战等等¹。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为了掩盖其向“强硬政策”的转变，而这一强硬政策正是与中国和蒙古有经济联系的资本主义集团所希望的。同时报纸掀起了反对美国人在满洲的“无赖行为”运动²。

德国资产阶级注意到，加强俄帝国主义对远东的兴趣并使它再度更深地陷入远东问题的有利时机似乎到来了，于是它积极从事教唆活动³。

的确，对俄国资本家来说，此时除“满洲”又加上了一个“蒙古问题”。中国当局根据中国商业资本家的要求，对俄国在日俄战争时期和战后对外蒙加强经济掠夺，现在开始加以阻挠。这使俄国帝国主义报纸有理由大声叫嚷“俄国失掉了蒙古”，“在这个地区俄国人的事业完蛋了”等等⁴。

这一叫嚷是根据库伦呼图克图的“请求”而增加俄国在蒙古驻军的信号（1911年9月初，在这以前有三百人保卫俄国领事馆）。关于同蒙古王公接受俄方“保护”的谈判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应该注意，这还是在武昌起义前（9月末）发生的，即在中国1911年革命开始前发生的。

俄国帝国主义采取坚决行动的根据是，它同日本签订的关于“势力范围”的协定和已酝酿成熟的对协定中的蒙古问题的明确，

1 参看1911年7月16日托木斯克报纸《西伯利亚生活》，乌苏里江上的尼科尔斯克报纸《乌苏里边区》（5月14日和7月12日）等；《交易所公报》（8月2日），《莫斯科公报》（6月22日，7月17日，8月15日），《新时代》（1911年7月2日，7月14日，8月7日）等等。

2 参看《阿穆尔沿岸》杂志的K.波雷诺夫的文章，《莫斯科公报》（1911年6月22日）。

3 参看2月5日德文《柏林日报》和上海德文杂志《东亚轮船公司》，1911年。

4 参看莫斯科亿万富翁的报纸《莫斯科之晨》（1911年7月17日）。

后一问题已在 1912 年 6 月明文载入第三次秘密协定。

因此，美国资本家担心满洲和蒙古可能被侵入到那里的两个强国所吞并，是完全有现实根据的。

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大财政资本豺狼的四国银行团，其使命就是借助前面讲过的用于“协助满洲工业发展”的借款，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来削弱日俄的吞并活动，同时给四国资本家在满洲造成站住脚的机会，并且希望美国大财政资本家能起当然的领导作用。中国统治阶级上层只要能够使满洲摆脱日俄的控制，并获得大批金钱，自然感到高兴。

美国资本家也搞一些较小的私人资本侵入满洲的计划。例如，一批美国企业家建议中国政府租赁给他们一批地段（其中某些地段的面积达五万英亩），以组织示范的农业大地产。美国收割机公司（American Harvester Company）辛迪加建议以农业工具和机器供给大地产，而且是这批企业家的积极参加者，美国驻华公使柯鸿就是他们的实际代表。英文报纸《京津时报》报道美国人的这些计划时说：“如果他们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对俄国人和日本人的事业”一将军就将死了”。当然，这样说法是过分夸大了，但若这些计划实现了，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必然将受到重大损失。其实，据俄国驻哈尔滨领事报告¹，在松花江下游佳木斯附近有一个美国农业租让农场。 135

瓦特·扬也说，这个农业企业的创建人是美国少校巴里麦尔。据扬说，该企业共占地一万五千英亩，在世界大战前企业发展十分顺利。他又说，参加投资的有我们熟悉的斯特雷特和美国前驻华公使克雷英。租让权所在地内约有五百个中国工人²。

1911 年秋爆发的中国革命，使银行团安排好的活动受到破

1 参看案卷第 217 号，特拉乌特沙尔德 1914 年 9 月 8 日的信。

2 W. 扬：《中国人、殖民地和满洲的开发》，檀香山，1929 年，第 22 页。

坏。在时局不定的情况下贷给中国大批借款是冒险行为，另一方面，继续“内讧”则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利。此外，俄国外交界和一部分日本外交界都致力于阻止这次借款的实现或使银行团垮台，以对抗该银行团的意图。

俄国外交界担心这次借款和以后的借款用来建筑通向俄国边境的锦州—瑷珲铁路和其他铁路，竭力进行阻挠。日本对待借款比较安心，它所指望的是自己在南满的现实的经济力量，让俄国去承担“因磨擦而产生的憎恨”责任。稍过一些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日本在对南满附有某种保留条件情况下甚至也参加了银行团¹。

日本外交界虽公开同意参加银行团，但同时在北京却积极反对该银行团，并使报纸公开发表意见。还在锦州—瑷珲铁路计划出现以前，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就已日益提高对美国的好战声调。

随着中国革命的爆发，俄国资本家对远东有利害关系的集团的热望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们正在这时提出了美国资本家最为担心的那个要求，即吞并北满和蒙古的要求。大声疾呼的“强硬政策”在 1911 年 9—10 月间已变成了相当一致的呼声——一定统治阶层的“哪怕以占领的形式²合并北满”，“用金钱的补偿获得蒙古的大部分领土或割让满洲”³。“伙同日本吞并满洲”⁴，“立即占领北满”和“修改俄国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全部国境线”⁵。

1 参看《法俄关系史资料》，第 140—141 页。伊兹沃尔斯基 11 月 10 日（公历 23 日）的信以及《中国借款》附件第 541—580 页；特别第 547 页。萨佐诺夫 1912 年 4 月 5 日电报第 554 页，《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第 566—568 页，1912 年 4 月 13 日（公历 26 日）的信。

2 《莫斯科公报》，1911 年 9 月 2 日。

3 《俄国之声》，1911 年 9 月 11 日。

4 《俄罗斯之晨》，1911 年 10 月 28 日。

5 《俄罗斯边疆》杂志，1911 年 10 月 15 日。

俄国统治阶层的侵略野心这时竟狂妄到这种程度，列宁认为有必要表明俄罗斯工人阶级反对这种侵略野心的态度。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1912年1月在巴黎临时大会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专门决议案。在该决议案中写道：

“鉴于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并祝贺中国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¹

在中国中央政权的削弱和日俄帝国主义间“友谊”加深的同时，满洲作为中国领土（哪怕是名义上的）能否存在下去的危险增长了。日俄帝国主义间的“友谊”充分表现在1911年成立的“俄日协会”的积极活动方面，在哈尔滨设有总分会，参加者是双方知名官僚和资本家。协会的目的是“增进在满洲从事工商业和经营铁路的双方代表的相互了解”。

中国封建官僚上层已经明显地看到满洲形式上被瓜分和被吞并的威胁，同时也看到对自己物质地位极为严重的威胁。它认为唯一的挽救方法是把北美资本引进满洲。1911年11月，北京训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允许美国人在满洲从运用其资本中获取厚利，这会使美国政府对我们有好感，也会支持我们（清朝）。”可以允 137
许美国人“经营渔业、航业，开发矿业和林业”，“届时我们用他们的力量来遏制俄国和日本”²。

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的恐惧部分得到了证实，但部分则

1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94页，中文版，第457页。

2 参看案卷第215号，满洲总督的报告（1911年11月7日）。

稍为夸大。事情只限于最近宣布外蒙自治,就是说,事实上确定沙皇专制政府对外蒙的保护。1913年(当时日俄之间一切都商议妥了),彼得堡政府形式上承认中国对自治的蒙古享有主权¹。此外,在内蒙也更明确地划分了“特殊利益范围”,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贪婪长爪现已深深地伸入到内蒙了。

第三次秘密协定是由萨佐诺夫和本野于1912年6月25日(公历7月8日)在彼得堡签订的。规定分界线“由洮儿河和格林威治以东122度经线交叉点,沿乌伦楚尔河和穆斯斯河到穆斯斯河和哈尔达旦河的分水岭,由此沿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边界到外蒙古和内蒙古边界线的极端。根据秘密协定内蒙古本身沿北京经线(格林威治东经116°27′)划分为东蒙古和西蒙古。前者属于日本特殊利益范围,后者属于俄国特殊利益范围²(参看瓜分地图)。

这次秘密协定签订的倡议又是由日本政府提出的,大概是由于外蒙宣布独立和俄国在蒙古的一切活动而使日本感到不安。本野在1912年1月间提出的第三次秘密协定初步方案是沿张家口至库伦的通道划分内蒙分界线³,这样日本人就侵入了外蒙心脏,也在很长的距离中侵入了日本人议定的“内蒙古”。

彼得堡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一点,以大量口头照会拒绝日本的方案,“说该方案不能使双方观点达成一致,并对自古以来就有的库伦—张家口俄国商队通道构成一种威胁”,建议把分界线大大地向东推移,即向直隶省边境推移,因此根本制止了日本的野

1 参看《俄国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3卷;《关于蒙古问题的政府通报》,第85—86页,《关于蒙古问题外交文件汇编》,《俄国外交部公报》附录,1914年,第2卷;1912年10月21日(公历11月3日)《俄蒙协定》,第23—31页;《俄华关于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宣言》,1913年10月23日(公历11月5日),第87—90页。

2 参看案卷第211号,法语本协定准确副本,格里姆的俄译本第180页。

3 同上案卷,1911年1月11日(公历24日)本野提出的法语本秘密协定方案。

心¹。日本政府遭到坚决反对之后，同意移动分界线。4月间，萨佐诺夫建议具体的界线——北京经线，除此之外，并提出要求日本承认中国西部为俄国特殊利益势力范围²。随后于5月14日（公历27日），日本对北京经线表示同意，但日本政府拒绝把协定扩充到中国西部，因为当时“日本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例如在福建省”，然而，“日本又无意讨论整个中国问题”³。很清楚，日本政府为什么没有这个打算，因为秘密协定方案曾通知英国和法国，而英国对承认中国本部沿海的福建省为日本势力范围，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因为福建离香港很近。

但是俄帝国主义对北京经线完全满意，因为它把界线比协定中最初规定的最边远的那条界线更向东推移了两度⁴。

根据既定惯例，在正式签字前把秘密协定的条文通知了（5月19日，公历6月2日）英法政府⁵。

后来从日本代表的说明中查明，日本人认为的自己势力范围南边界线是长城。这样，作为日本未来殖民地的那块新领土，是非常辽阔的。

关于新协定的消息很快就在报上传播开了。特别是日本报纸对此消息纷纷加以评论，因为日本政府对这次协定不打算保密。相反，为了吓唬中国和美国，日本报纸甚至故意夸大地传播谣言，说缔结了同日英同盟条约一样的“攻守”同盟条约。与日本原敬内阁接近的报纸甚至报道了在内蒙古新形成的势力范围的相当准确的界线⁶。

1 参看案卷第211号，1912年2月7日（公历20日）口头照会副本。

2 同上案卷，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萨佐诺夫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和俄国的方案。

3 同上案卷，1912年1月14日（公历27日）本野的口头照会及协定方案。

4 同上案卷，1912年5月27日（公历6月9日）萨佐诺夫的奏折。

5 同上案卷，有注解的备忘录草稿。

6 参看案卷第207号，1912年5月10日（公历23日）马列维契·马列夫斯基的急电。

虽然报纸上叫嚷不休,在对待满洲问题上,北京的俄国外交使节和满洲的俄国代表暂时都以执行“强硬政策”来代替吞并。俄帝国主义面临欧洲日益明显的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斗争,尽量使自己
139 不深深陷入满洲,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各样利益在这里交织在一起。

沙皇政府对远东事务中出现的事变保持相当慎重的态度。毫无疑问,当时采取群众政治罢工性质的俄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次远东冒险的后果记忆犹新,对再搞另一次新的冒险应有所考虑了。甚至从“宿敌”英国要俄国更加积极行动的劝说中,可以看到这种慎重态度对专制沙皇政府说来是不寻常的。例如英国驻华公使佐丹 1912 年 5 月间向沙皇外交代表保证说:“您可以毫无顾虑地在中国西部和蒙古行动,但只是在满洲您必须重视日本的利益和愿望。”¹

可是日本人的愿望在这一时期却相当大。据某些消息灵通人士证实,自 1912 年初日本政府已经不是积极劝说彼得堡政府缔结关于势力范围的协定,而是缔结正式吞并满洲的协定:日本吞并南满,俄国吞并北满。桂太郎公爵似乎专为此项使命去过彼得堡。

签订秘密协定以后,日本外交界在 1913 年仍继续沿这个方向对彼得堡施加影响²。

从俄国方面来说,俄国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反动的侵略分子也继续要求吞并北满。马尔蒂诺夫将军在由梁布申斯基 1914 年出版的小册子中的结论中断然宣称:“总之,俄国的利益要求尽可能快地吞并满洲。”³

俄帝国主义暂时仍只限于在北满和内蒙自己“特殊利益”势力

1 齐柏特:《战争年代决策的历史外交档案》,柏林,1921 年,第 287—288 页。1912 年 5 月 1 日(公历 14 日)驻北京俄国公使的电报。

2 参看 E. 马尔蒂诺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我国铁路人员在满洲的工作》,莫斯科,1914 年,第 90—91 页。梁布申斯基印刷所。

3 同上书,第 12 页。

范围内执行“强硬政策”和巩固其对外蒙实际上的政治和经济的保护关系。

俄国单方面宣布 1881 年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再延期十年,俄国商业资本家在陆路通商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通过商业资本家也使工业资本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¹。

沙皇政府只拒绝了在双方国境各五十俄里地区内免税贸易 140 权,因为最近从满洲大量输入酒精和工业品到俄国远东,使俄国国库受到了重大损失。

在北满实行进一步的“强硬政策”,特别是在世界大战头一年半中,中国的主权已成为徒有虚名了。当地中国当局在俄日勾结的大力夹持箝制下,只得到美国资本家“纯道义上”的支持和英国资本家极少的支持,完全屈服于各该势力范围的主人支配下。

俄日双方为了维护当前利益,也不让中国资产阶级有抗议的机会,在他们中间增长着对俄日强权的不满。

某些个别的积极反帝斗争的企图被中国官僚们制止和压服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哈尔滨道台获悉从北京有一批“炸弹投掷者协会”的会员来到哈尔滨对俄帝国主义者进行破坏活动时,立即劝告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为“避免事件复杂化”,强迫他们离开“俄国势力范围”²。

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当局在北满几乎象在自己领土内那样发号施令。

加强“护路”部队在铁路沿线两侧进行纵深袭击,追捕红胡子,在中国村庄市镇进行搜查,更正确地说是借口发现德国奸细和武器进行抢劫。沿松花江两岸设立俄国军事哨所,很多居住在中东铁路地区内的奥国人和德国人都被逮捕,并作为战俘送往俄国,

1 《俄国外交部公报》,1912 年,第 6 卷,《俄国公使的照会》,1912 年 8 月 24 日(公历 9 月 7 日),第 74—76 页。

2 参看案卷第 215 号,1912 年 12 月 23 日波别的报告。

对其他人则根据俄国行政当局的要求由中国当局从哈尔滨遣送到内地¹。

必须指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德断绝外交关系以前(1917年3月1日〔公历14日〕断交,8月1日〔公历14日〕宣战)。中国官僚们有时(主要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压力下)也提出抗议,企图予以某种抵抗,但都没有结果。

141 俄国资本家在北满的经济地位有某些独特性,在其他殖民地中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帝国主义占领北满的历史特点及其地理位置。俄国商业资本家在北满的地位是比较薄弱的,世界大战后期的地位虽予加强,但也不显著,而在某些部门甚至下降了。

当时俄国在规模宏大的国营运输企业——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工业企业中投入了大量资本。俄国工业资本经过当地1906—1908年战后严重危机以后,在这里也有了增长的趋向。这一趋向在世界大战时期特别加强了。

以下是说明俄国资本于俄日联盟时期在北满的地位和发展进程的数字和资料。

1913年,俄国商品在铁路运输进口中所占位置:木材98%,烟草53%,钢制品47%,糖63%,布匹26%,文具纸张27%,食品杂货24%,煤油12%,服饰用品4%²。

俄国代理机关经常抱怨说:“俄国商品竞争不过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商品”³,俄国商人和各公司代理人不善于适应市场,也不积极争夺市场,俄国商品太贵,不适合需要等等。俄国商品渗入到南满的也为数极少。例如,根据奉天中国商会的资料:1912年在奉

1 参看案卷第217号,特拉特沙尔德的各种信件。

2 《北满手册和中东铁路》,哈尔滨,1927年,第209页。

3 参看吉林领事米谢尔斯基的报告,《俄国外交部公报》,1912年,第1卷,第188—194页。

天销售的洋货总额为七百七十六万五千卢布，其中俄国货为十七万四千卢布；1913 年则为八百十九万六千卢布，其中俄国货为十九万一千卢布。运到这里的几乎全部是布匹和俄国烟卷。1914 年，即世界大战第一年，俄国商品销售量超过百万卢布，但这个数字内包括了哈尔滨面粉厂五十万卢布的面粉¹。

在战前年代(1913 年)北满出口的80 % 虽然是经过俄国国境，但主要是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过境运输。对俄国本部的出口只占北满全部出口的 10—15 % (粮食、牲畜、油类、蛋品等等)。

同时不应忘记，根据建筑中东铁路合同规定，以铁路输入到铁路地区内的商品进出口关税比中国普通关税低三分之一。对供运销内地用的商品除此之外再征收 50 % 的全部关税以代替厘金。因此，俄国商品在本国境内虽要经铁路长途运输(其实铁路运价也很低)，但在中国本土只缴纳很低的关税。俄国对北满的出口在许多有利的情况下而成绩不够好，主要原因是俄国工业比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工业落后和薄弱。 142

撤兵以后，俄国的北满主要企业中东铁路的发展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但还不能说是财务上的业务成绩。不论在当地的交通上或在进出口过境运输上都是以低速度运送商货和乘客：

年	运 送 乘 客 (单位千人, 不包括军人)	运 送 货 物 (单位千吨)
1907	442	1,181
1908	546	833
1909	732	905
1910	947	1,004
1911	1,226	887
1912	1,117	1,269
1913	1,165	1,208
1914	1,086 ²	1,115 ³

1 参看案卷第 214 号, 1914 年 5 月 19 日(公历 6 月 2 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2 《中东铁路和地区的工作概述》，哈尔滨, 1929 年, 第 12—13 页。

3 同上书, 第 35 页。

虽然货运量增加了一倍多,但是中东铁路仍然是亏本的企业。这在极大程度上是担任中东铁路领导人的沙皇将军们和官吏们的无能和贪婪的管理的结果¹。但是甚至在铁路本身经营已开始赚钱的时候,而铁路机构所属各种附属企业仍旧亏本,这些附属企业的业务远不是依据商业上合理性的方针,而是依据各种不相干的动机,其中也包含个人利害关系的动机。

下表说明中东铁路经营中财务成绩的情况(单位百万卢布)²。

年	收 入	支 出	利 润 或 亏 损	新工程的 支 出	特种企业 的 亏 损	利 润 或 亏损总计
1904	23.7	32.2	— 9.5	—	—15.7	—25.2
1905	33.9	49.5	—15.6	—	—20.4	—36.0
1906	29.2	41.8	—12.6	—	—12.5	—25.1
1907	17.0	27.2	—10.2	—	—11.0	—21.2
1908	14.9	19.0	— 4.1	—	—11.5	—15.1
1909	15.5	16.9	— 1.4	1.0	—11.3	—13.7
1910	17.5	16.5	+ 1.0	0.5	—11.3	—10.8
1911	19.6	17.8	+ 1.8	0.4	—11.2	— 9.8
1912	19.0	14.7	+ 4.3	0.9	—12.3	— 8.9
1913	21.2	14.8	+ 6.4	—	—12.3	— 5.9
1914	22.7	15.4	+ 7.3	—	—11.8	— 4.5

143 世界大战使中东铁路运输量大为增加(约增加一倍),主要来自日本和美国的过境军用物资。因此铁路的收入也增加了。然而下面所列举的 1915—1917 年的数字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概念来说明铁路的收入,因为这个时期的卢布实际价已大大贬值了。

1 关于霍尔瓦特将军为了消除痕迹而安排的中东铁路的盗窃和火灾,参看马尔蒂诺夫将军小册子的引文:《满洲的铁路投机者》,第 34—35 页以及其他未与人谈过的。

2 《中东铁路工作概述》,哈尔滨,1929 年,第 101,102 页。

年	货物运送量 (单位千吨)	乘客运送量 (单位千人, 不包括军人)
1915	1,813	1,251
1916	2,086	1,786
1917	2,021 ¹	2,260 ²

战时商货和乘客运送量:

	1915 年 (单位百万卢布)	1916 年 (单位百万卢布)	1917 年 (单位百万卢布)
收入·····	39.2	50.3	79.6
支出·····	7.6	22.9	35.4
利润·····	21.7	27.4	44.2
新工程支出·····	—	0.4	0.3
特别企业亏损·····	9.0	9.0	13.1
利润总计·····	12.7	18.0	30.81 ³

中东铁路的全部投资到 1913 年 7 月交付经营时共为三亿七千五百万卢布, 但是建筑工程尚未完结。截至建筑工程全部完成为止又投入七千二百万卢布, 因此中东铁路的建筑使俄国国库总共花费了四亿四千七百万卢布⁴。南支线的总值和转归日本的铁路资产约为八千一百万卢布, 仍属俄国所有的铁路总值为三亿六千六百万卢布。自 1904 到 1914 年, 每年抵补赤字的总额达一亿七千六百万卢布。因此截至开始无赤字时, 仍属俄国所有的部分 144 中东铁路的投资达五亿四千二百万卢布。

关于完全说明俄国私人资本在北满究竟投资多少的数字, 我们并没有掌握。但根据俄国资本在某些个别工业部门中的“周

1 《中东铁路工作概述》, 哈尔滨, 1929 年, 第 102 页。

2 同上书, 第 15 页。

3 同上书, 第 35 页。

4 同上书, 第 100 页。

转”，仍能举出某些数字。

面粉工业是完全用俄国资本建立起来的，约花费七百万卢布。俄日战争时期兴起来的面粉工业到 1908 年在北满只剩下十四台蒸汽磨粉机，后来联合为面粉辛迪加。由于满洲面粉出口的发展，迄 1913 年蒸汽磨粉机已增加到十九台。世界大战对北满面粉工业的投资是极为有利的。根据下列经由中东铁路运输的面粉数字可以判断出它的发展。1913 年面粉运输为二万七千吨，1914 年为三万八千吨，1917 年为八万二千吨，比战争第一年增加了一倍多。同时出口百分比 1913 年为 20%，1917 年则为 70%¹。

在松花江上除中东铁路的船队外，在哈尔滨成立的私营轮船公司也从事运输。该公司轮船和驳船载重总量达一万吨，阿穆尔轮船公司也为松花江运输服务。

俄日战争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满洲的）俄国白酒工业处境很艰难。当地居民喝惯了中国烧酒，此外从欧俄以低廉运价进口的俄国白酒进行竞争。例如，在 1909 年几家酿酒厂共生产了十四万桶白酒²。

1907 年，在阿什河建立了制糖厂，在哈尔滨开设了肥皂厂，在哈尔滨还开设了卷烟厂，世界大战前用俄国烟叶，后来改用满洲烟叶。在北满有不大的制革厂、毡呢-毡靴厂、蜡烛厂、奶油-奶酪厂、规模较大的制砖厂、印刷厂、茶叶分称包装厂和某些其他不大的企业。

145 俄国私人资本家也向若干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和森林租让权投资。其中在黑龙江省称为“乌尔奇齐汉”的大规模租让权，面积达八千五百平方公里，是由沃隆佐夫经营的。另一个“雅多尔”租让权是拉邦斯基根据同蒙古自治行政机关于 1914 年签订的合同

1 苏林：《北满的工业》，哈尔滨，1928 年，第 56—57 页。

2 同上书，第 80 页。

取得的,面积约为四千平方公里。

俄国政府和私人在北满的投资总额不可能很精确地确定。某些日本资料记载,俄国在整个满洲的投资数字为十六亿卢布,即是说,把俄日战争前和战争时期在南满的投资也计算在内¹。巴甫洛维奇同志说,中东铁路所经过的境内俄国投资数字为十五亿卢布(显然也把南满包括在内)²。如果注意到交给日本的一段铁路、港口、旅顺口要塞和在南满境内的其他建筑物(全部价值约为三亿五千万卢布)以及俄日战争前和战时用在专用铁路建筑上的资金,主要为军事机关在战前和战时所进行的其他直接投资(粗略估计约为三亿五千万卢布)。这些投资或者留在后来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境内,或者战时用在特殊目的上,到战后,不论对俄国政府或对私人都已没有实际价值了(国内道路、兵营、临时小型工厂、各种调查、津贴等等),因此十五亿卢布这个投资数字应认为是近乎正确的。如果只谈论俄国在北满运输、工业、各种不动产和商业以及其他企业上的投资,在十月革命以前这个数字(包括国家和私人资本)约为八亿卢布。这个投资的数字是近乎准确的,投资的用途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是正确的。

俄国财政部的一个机构——俄华银行经历了特殊的波折,根据俄华银行创办人的宗旨,它应成为俄国在全中国、特别是在满洲扩大财政影响的强有力的工具。在1904—1905年战争时期,这家银行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它的宗旨,并成为俄国国家银行的分行。它在满洲对军队提供大量拨款;面粉工业以及一系列其他企业开设的资金90%是它提供的,就是说俄国政府的资金。可是在俄日战争后该行所处的困境,跟俄国政府整个财政困难情况相似,甚至

1 《满洲经济史》,第50—51页。

2 巴甫洛维奇:《苏维埃俄罗斯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国家出版社,1922年,第16—17页。

还要坏些，因为它的业务活动恰恰是在沙皇专制政府的所有帝国主义政策遭受失败的地方，而它的大部分资本也是投放在转归日本的地区内。为了借口私人企业来尽可能避免损失，该行又开始积极把它伪装成俄法私人企业。为使法国人进一步关心，甚至把俄国政府的一部分股票于 1906 年按低价卖给法国银行家。后者就开始积极参加银行业务，结算亏损并关闭盈利少的分行。仅哈尔滨、上海和奉天三个分行就亏损七百万卢布。关闭了吉林、奉天、张家口三处分行，还计划关闭其他分行，其中有库伦分行。凡在中国仍继续开业的银行，例如哈尔滨，均压缩了自己的活动范围，把业务限制在极小范围内，而这些业务是有确实把握的。当俄帝国主义的地位开始巩固时，银行的这种活动又极不合俄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代理人的口味了。他们向彼得堡纷纷提出抱怨，说什么银行变成了“小银行办事处”，对俄帝国主义几乎是无益的¹。已开始使远东政策积极化的彼得堡政府对改组银行采取了措施，特别是又把银行完全转到俄国人手中。1910 年，俄华银行与北方银行合并。新银行定名为俄亚银行，资本总额为四千五百万卢布（但没有前俄华银行的中国五百万库平两股份），其中基本金三千零五十万卢布，备用金一千四百万卢布²。新银行开始积极地执行俄国主义的远东政策。

1 参看案卷第 917 号，1909 年 3 月 19 日科罗斯托维茨的信。

2 参看案卷第 919 号，大臣会议特别记录（1910 年 5 月 25 日）。

俄帝国主义在世界大战开始时所执行的“强硬政策”，与日本在这次战争开始后迅即采取的政策相比，只不过是小孩嘟嘟囔囔说不清楚的话语而已。

在战争一开始，列宁就详尽地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原因和意义。

“军备的扩张，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先进国家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家的王朝利益，都必然促成而且已经促成这场战争。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¹

列入大帝国主义国家之林的日本，对于帝国主义总搏斗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日本人超过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当时还保持着半封建君主政体的沙皇俄国，成为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成为“特别的大国”（列宁）。

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资本集中已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例如，1913年投入工商业公司的资本已达到二十亿日圆²。资本五百万日圆以上的五十九家大公司的股额占全部投资的38%。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发展迅速，也就迅速过熟了。对“能盈利的”投资的企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8页。

2 《统计摘要》，1930年，第46页。

求,对侵占领土(在侵占领土中能主宰一切)的企求,便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日益明显地反映出来的特征。

日本虽然发展得很快,并过渡到了腐朽的阶段,但是在那些其他大帝国主义贪婪的侵略者中间,它的经济仍是最弱的。日本通常只是在某一领土上建立了它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能排斥他人的竞争)的时候,才能展开剥削活动。

日本的特点是经济薄弱,在战胜中国并根据《马关条约》获得一切商业活动权利之后经过了5—6年,即在1900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共只有百万日圆。甚至在1914年(当时日本投资已达四亿五千万日圆)大约70%的投资是在南满,在这里绝大部分“投资”是从沙皇俄国那里抢夺来的铁路和其他资产(总共不下一亿五千万日圆),另一部分“投资”是英国资本家对南满铁路的贷款(一亿二千万日圆)¹。

但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根据台湾、朝鲜和南满的实例,深信甚至向殖民地投以少量资本或从那里直截了当用抢劫办法得来的资本,都会获得高额利润。日本地主在对台湾和朝鲜农民进行半封建掠夺的经验中,尝到了对异族人进行半封建压迫和剥削的甜头。

此外,日本资本家在对中国的贸易掠夺中,在世界大战前就已有了很大的成就。

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数额由1899年的11.5%增加到1913年的19%,而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则由13.5%增加到21%。

世界大战刚一爆发,日本资产阶级伙同地主和所有军事官僚机构就猛扑向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以便在情况有利的时候为自己多掠夺一些东西,发不义之财。

1 我们未把庚子赔款约四千五百万日圆和“改组借款”约五千万日圆包括在四亿五千万日圆之内,日本事实上未承担欧洲各首都发行的“改组借款”的义务,横滨正金银行只是借款的形式上的参加者。

对中国后来压力的开端是日本同北京政府谈判关于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归还给中国,以换取满洲的“特权”¹。日本政府显然认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暂且先把这个有疑问的猎物交换南满某种重要的东西为好。但这只是开始。

对中国的保护关系,这就迅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当前的和直接的计划。著名的二十一条就是这一计划明确的阐述,计划中关于对南满和内蒙东部的要求只是该计划的一章,当然其他的还很多。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部力量都投到了欧洲战场上,战争显然是持久性的,而且看来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了。美国还未武装到足以直接威胁日本帝国主义的程度。日本决心利用它的“良机”,并把它利用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使那些习惯于不知羞耻的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得无厌的野心都感到惊奇。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任务不是吞并南满,这并不使其他帝国主义者感到怎么惊讶,不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前不是追求形式上巩固自己在南满的权力,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任务是在中国建立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霸权。 149

日本于 1915 年 1 月 18 日提出的二十一条第四和第五项对全中国的图谋比沙皇专制政府在当时对满洲的图谋要广泛得多。

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要求中国:聘请“有影响的”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全国“各重要地方”的警察交给日本人掌管(“共管”),军事工业交给日本人(第四部分第一款),中国政府放弃把中国海岸某处交给或租让给其他国家的权利(好象这已是日本的领土了)。我们姑且不论“那些重要性较小的”要求,诸如:给予日本庙宇、学校、修道院的土地占有权,给予在华中建筑铁路权,关

1 参看案卷第 217 号,黑龙江将军朱庆澜给北京政府的电报(附在 1914 年 12 月 10 日的报告中),朱建议北京对日本二十一条通知的答复不要屈服于“狡猾的计划”。袁世凯显然以这个通知试探地方对日本要求南满进行让步的意见。

于福建省工业的特殊制度。我们在这里也不论述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无直接关系的对山东和汉冶萍公司的要求，但必须对有关南满的要求详加叙述。

关东租借期限、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占有期限根据上述要求均应延长为九十九年¹；在九十九年期限内日本人对吉林—长春铁路也取得了监督和管理权。日本人在南满和内蒙东部有居住权和从事“各种”工业和实业的权利，有租借和取得土地和地下资源占有权。如果中国打算给外国人租借地以建筑铁路或以地方税收为担保条件向外国借款建筑铁路，那末，这一切均须得到日本人的同意²。

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对中国建立事实上保护关系的二十一条要求，不单单是指望国际形势。在中国境内就有一群执掌政权的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日本人弄到这种地位的。总统袁世凯很久以前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和他周围的一群官僚加快步伐在搞帝制复辟。

列宁深知这类国家领导人的本质，还在 1912 年 7 月当袁世凯夸耀自己再次“革命”时，列宁关于中国革命写道：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³

1 关于共同提出有关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这种要求，日本政府在 1909 年就已打算同彼得堡协商（参看案卷第 206 号，1909 年 1 月 4 日（公历 17 日）马列维契·马列夫斯基发自东京的电报）。

2 参看中日文二十一条英译本，马克·穆拉，在所引用的著作中，二十一条各种文本没有差异。

3 《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53 页。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太上皇”，而袁世凯本人也登上了新“立宪”皇帝的宝座。

善于维持政权的封建主和封建官僚们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即使实际上处在日本保护之下而建立起具有封建农奴制残余色彩的合法化统治，并对他们所熟悉的君主政体，这也比处于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不熟悉的经常受意外事件的威胁和独立共和国要有利得多。

但是袁世凯政府的困难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太多，几乎多到建立正式的保护关系，另一方面新兴各阶级的能力和力量以出乎意外的势力表现出来了，威胁着袁世凯政府本身的存在和帝制的复辟。封建官僚政府开始尽力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并想脚踏两只船。从国内政策的立场来说，不能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但从自己安全的立场来说，拒绝日本的强求连想也不敢想。北京 151 政府进行了谈判，讨价还价并想赢得时间。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代表原希望很容易满足自己的要求，谁知万万没有料到的抵抗使他们感到极为懊丧。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在此时引起特别麻烦并不适宜，就将自己的勒索条件加以缩减，并以哀的美敦书威胁立即满足其要求（可能是同袁世凯约好的）。

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接受了哀的美敦书。中国把这一天作为著名的“国耻日”。

日本人自己同意把公开对中国建立保护关系的要求推迟到“下次谈判”。关于海岸问题由总统下诏书，禁止将海岸地点租借或割让给任何外国¹。

涉及对南满和内蒙东部的要求稍为缓和了。例如，准许日本人租借土地，但不能取得土地所有权。在内蒙东部准许成立中日

¹ 马克·穆拉的条约全文，同前书，第二卷，第1215页。

合营农业企业和准许日本人在规定的地点居住。拒绝给与日本人在内蒙东部开采矿业权利的要求。关于吉林—长春铁路,中国政府承诺在日本人贷款建筑其他铁路的条件下将缔结关于该铁路的协定。其他有关南满和内蒙东部的要求中国政府完全接受了。此外,关于聘请日本顾问来中国事一般均予推迟,但日本人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如果要聘请外国人为顾问时,首先应聘请日本人到南满充当顾问¹。

接受日本所谓“缓和了”的要求,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各工业中心的工人、商人、工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低级官吏甚至落后的满洲居民中激起了普遍的义愤。开始流传出一些传说,说袁世凯政府在未公布的秘密条款中完全同意了日本最初的全部要求²。哈尔滨中国商会中止募集“救国基金”,提出的理由是:“既然总统把国家出卖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救国。”³在北京广泛散布着旨在反对袁世凯的告民众书,并指责他乞求日本帮助自己当选,其结果导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⁴。

中国总商会通过了关于抵制日货秘密决议案,在几个月中确实坚决实行抵制日货的活动⁵。中国各地方当局终于开始逮捕反日鼓动者,甚至俄国领事也协助镇压这种鼓动,认为能“损害俄日关系”⁶。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1915 年 5 月签订的日华条约和协定,虽经中华民国总统签字,但根据宪法要求,中国国会未予批准,因此甚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 2 卷,第 1220 页。马克·穆拉的北京政府公布的正式译文,与日本政府公布的五月协定正式译文稍有不同,但无重大差异,扬的条约全文,第 138—139 页。

2 参看 1915 年 5 月 22 日特拉乌特沙尔德的报告。

3 参看案卷第 218 号,1915 年 5 月 11 日报告。

4 同上案卷,附在 1915 年 5 月 13 日报告中的告民众书。

5 同上案卷,1915 年 5 月 11 日报告及其他。

6 同上案卷,1915 年 7 月 2 日报告。

至从资产阶级的法权立场来说,该条约不能认为是合法的。

不久,袁世凯便宣布称帝(1915年12月13日),因而也间接地巩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袁世凯不是勤恳的仆人,只给予相当的支持。中国“工业比较发达和比较先进”的¹南方对称帝的回答是坚决起义来反对复辟、反对投降日本的政策。

新王朝的军队吃了败仗以后,它的创始者被迫退位(1916年3月22日),而且不久就死了(1916年6月6日)。封建官僚各派系虽然表面上继续相互轮流执政,愈来愈卖国求荣,对当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愈来愈卑躬屈节,但是中国国内形势对于建立正式的或半正式的保护关系仍然不很有利。日本国内大部分资产阶级不赞同政府过分冒险的、不考虑实际可能的对华政策。曾长期执政的政友会总裁原敬向国会提出决议案,断然谴责这一政策是“挑衅的”、“未来争执之源”的政策。这一决议案于1915年6月获得一百三十票而通过²。

不能不重视最主要的国家美国。美国急忙向中、日两国致送照会(1915年5月13日),声称“美国政府不承认中日间任何‘破坏美国及其公民的条约权利’和‘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协定和义务”³。这一声明意味着,美国资本不承认给它带来损失的同中国签订的协定,遇有必要时它准备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受蹂躏的”权利。不应忘记,1914年巴拿马运河已通航了,而且在美国已开始积极宣传一种观点,即太平洋的霸权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应属于美国资本。

1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0页。

2 《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莫斯科,1924年,第106页。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236页;《华盛顿会议》,俄译本,第106—107页。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本身并不大。自 1875 年的八百万美元增至 1900 年的二千一百万美元和 1914 年的六千万美元。但是随着美帝国主义经济实力的增长，对中国投资和对占领大有发展前途的中国市场的企求却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特别在世界大战时期在一系列扩大自己影响的企图中（其中某些企图是有成绩的）表现出来了。在六千万美元总额中约有一千万美元是美国各传教士社团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一条公布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先锋队传教士立即出来积极反对。日本人在未到相当时间以前，不仅对二十一条的内容而且对提出要求这件事本身都是尽量保密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记者都被收买或为了讨好，正如美国外交界失去警惕一样。但是美国传教士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不分哪一个教派（新教派、美以美教派、洗礼教派、长老会教派等）都联合共同签名向美国政府发电报要求加以干预，会见日本外交代表提出抗议，提醒中国大官们和袁世凯本人不要同意日本的强求。美以美会主教柏斯福特甚至急急忙忙去美国（途经日本时把一份二十一条条款副本送给美国驻日大使），以便以个人名义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他还从美国打电报给袁世凯，要求“坚定立场反对日本的要求”。

154 主要由于美国的压力，尽管日本事实上支配了中国和基本上是亲日封建军阀派系当政，但二十一条第五部分要求（建立半正式的保护关系）直到华盛顿会议以前（1921—1922 年）成了悬案。在会议上日本人除了做出种种“让步”外，已完全放弃了关于第五部分要求“进一步谈判的权利”。

在中国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袁的美敦书以后，日本力图使中国政治上立即正式从属于日本的因素减弱了。世界大战无论对于日本资本主义，还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来说都是“及时雨”。

在战争期间，日本资本主义以异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日本资本主义在俄日战争后由于恢复十分迅速，在世界大战前在其发展的道路上已大踏步前进。但只是世界大战才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因此它的发展又加速了。以下是说明本世纪最初二十年中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主要数字。全国各经济部门投入股份资本共计¹：

投入资本(单位千日圆)

年	农业和渔业	商业和银行	工 业	运 输	总 计
1903	3,197	451,680	170,346	262,383	887,606
1907	12,035	569,486	381,815	150,892	1,114,228
1913	27,651	931,215	814,814	210,061	1,983,331
1919	76,865	2,460,545	2,721,651	716,735	5,975,796 ²

资本五百万日圆以上的大工商业公司在全部投入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由 1913 年的 38% 增加到 1918 年的 53.6%。

对此就无须再作注解了。

作为重工业基础的日本煤采量在二十年内，自 1899—1919 年增加了四倍；自 1904—1905 年俄日战争以来增加了两倍，在 1909—1919 年期间增加了一倍。

对外贸易虽然发展得很迅速，但在世界大战前仍是入超的。可是在战争四年中（1915—1918 年）日本出口超过进口达十四亿零八百万元。俄日战争后日本对外贸易额的动态如下（单位百万日圆）：

1 L. 巴兰廷：《日本商业的发展和性质》，《远东评论》，1926 年 6 月，第 271 页。

2 1899 年采煤六百万吨，1904 年采煤一千万吨，1909 年采煤一千五百万吨（参看《日本统计摘要》，1907—1912 年），1919 年采煤三千一百万吨（《日本年鉴》，1920 年）。

年	出 口	进 口	总 额	出口超过进口
1907	432.4	494.4	926.6	—
1911	447.4	513.8	961.2	—
1912	526.9	618.9	1,145.9	—
1913	632.4	729.4	1,361.8	—
1914	591.1	595.7	1,186.8	—
1915	708.3	532.4	1,240.7	175.8
1916	1,127.4	756.4	1,883.8	371.0
1917	1,603.6	1,035.8	2,638.8	567.1
1918	1,932.1	1,668.1	3,630.5 ¹	293.9
四年共出超				1,408.0

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占日本全部对外贸易额的 20—25%，一直是出超的，而且日本靠这部分出超补偿自己一部分对外贸易的入超。日本对中国和关东的出口和进口（香港不在内）共计（单位百万日圆）：

年	出 口	进 口	总 额
1911	111	82	193
1912	142	80	222
1913	184	92	276
1914	184	89	273
1915	163	113	276
1916	229	142	371
1917	384	186	570
1918	475	382 ²	857

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额于 1918 年达到最高水平，这个

1 《日本财政经济年报》，大藏省，东京，1925 年，第 98—99 页。

2 同上，第 98—101 页。

水平不论过去和以后都是从未有过的，它高达 39%，连香港在内则为 42%，而中国自日本的进口（香港不在内）增加到中国全部进口的 43%。

日本对满洲和关东（即是说租借地，它实际上是满洲的转运站）的贸易额在各个年份占它对中国全部贸易的 30—50%。

日本在满洲（整个满洲，不只是南满）对外贸易中所占额在世界大战时期内所达到的数字，绝对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例如，156 1917 年全满洲从国外的进口为一亿零七千五百万海关两¹，而从日本的进口占七千七百三十万海关两，即是说约占 70%。

但是日本的进口在世界大战前在满洲就已经占有优越的地位，部分是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主要是日本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给本国资本家以最优惠的条件。

满洲在这一时期的出口中值得注意以下的事实：对日本出口虽然比对其他国家出口占优势，但相对地减少了。这就是说，由于战争造成的局面，满洲已开始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了。世界大战前日本在满洲出口（中国本部不在内）中所占额约为 85%；而在战争最后几年在绝对数字² 大为增长下，这一数额却下降到 75%。

大连由于经过改善、扩建和受到有无限权力的南满铁路日本行政当局的特别关注，在 1908—1918 年十年间由一个不显眼的小港湾在规模上一跃而变成了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第二大港。该港的贸易额由 1908 年的三千二百万海关两（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八亿三千四百万海关两）增加到 1918 年的一亿六千五百万海关两（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十三亿一千五百万海关两³）。

同时受日本措施压制的牛庄港在十年间的贸易额不仅相对数

1 《经济史》，第 214 页。

2 同上，第 225 页。

3 同上，第 226—227 页。

字而且绝对数字几乎都减少了一半。1909 年该港贸易额为五千五百万海关两,而 1918 年的贸易额则降到了三千万海关两¹。

日本对满洲的运输和工业的投资激增了。为了发展和改建南满铁路和日本的其他铁路,一开始就吸收英国资本。日本人以完全异于美国的条件弄到了英国资本。伦敦自 1907—1911 年为上述用途四次贷款给日本,期限规定从三年到二十九年,年息 4.5—5%²。英国人对利息和对日本的一般政治影响都感到满意,也不追求在满洲享有某种特殊的势力。四次借款总额为一千四百万英镑。日本在当初只是由于依赖这笔资金才能使自己资本踏实可靠地深入南满。由于日本游资很不充足,日本私人资本为满洲铁路只能提供很少的资金,南满铁路公司虽然是按“私营公司”方式成立的,其股金为二亿日圆,但股金的一半却由政府承担,为补偿转归公司的铁路和附属建筑物——煤矿及其他之用。私人认购南满铁路股票的极少,到 1917 年底全部投入的资本(除政府承担的一亿日圆外)只有四千二百万日圆,其余不足之数仍由日本政府投资。

根据南满铁路管理章程,总裁、副总裁和理事会理事均由政府任命,不隶属于铁道省,而直属首相³。南满铁路形式上具有国营铁路的性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它借助这一工具巩固了它在满洲的统治。

用英国借款把南满铁路改建成标准的欧洲轨道(四英尺八英寸半);在战时日本人又把俄国宽轨(五英尺)改为日本窄轨(三英尺六英寸)。一部分铁路改为双轨,改善和扩建了大连港,改建了奉天—安东轻便铁路,改进了抚顺煤矿,发展了电站等等。抚顺煤矿

1 《经济史》,第 214 页(分表)。

2 同上,第 96 页。

3 马克·穆拉,第 1 卷,第 561 页,关于南满铁路的天皇诏书第 35 款。

是南满铁路的“附属企业”，在十年期间采煤量增加了九倍（由1907年二十三万三千吨增加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吨），烟台煤矿也增加了采煤量（由1910年的一万五千吨增加到1917年的十一万三千吨）¹。

南满铁路公司的收入由1907—1908年（从4月1日—4月1日）的一千二百五十万日圆增加到1912—1913年的三千三百万日圆和1917—1918年的六千九百万日圆，而利润1907年为二百万日圆，1913年为五百万日圆，1917年为一千五百万日圆²。

日本资本家不满足于南满铁路现状，在1905年以后立即着手建筑专用线和其他路线的铁路网。

1905年中日条约秘密条款中已规定建筑吉林—长春铁路（关于建筑该铁路的初步合同是由南满铁路公司与吉林将军于1902年签订的）（参看原书第74页）。1907年（6月15日）日本以投资一半³为条件达成缔结建筑该铁路的协定；1908年（11月12日）南满铁路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贷与中国二百一十五万日圆⁴ 158借款建筑铁路的合同，并于1909年（8月18日）签订关于这笔借款的详细协定，规定期限为二十五年⁵。铁路于1912年开始营运。

但在日本的计划中，吉林—长春铁路只是从朝鲜清津港出发经过会宁—吉林—长春—洮南—索伦—甘珠尔庙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有巨大重要性的一段干线（关于这条干线的详情请参看本书作者所著《帝国主义和满洲的生产力》第二卷中论铁路一章）。从吉林到朝鲜边境铁路建筑拨款权最初在1907年（4月15日）关于吉林—长春铁路和新民屯—奉天铁路的协定中已有所规定。1909年

1 《经济史》，第110—111页。

2 《关于满洲发展的报告》，大连，1929年，第72页。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1卷，第627页。

4 同上书，第767页。

5 同上书，第785页。

(9月4日)关于间岛地区朝鲜侨民地位条约中明确规定,中国政府把吉林—长春铁路延长到朝鲜边境,使吉林—长春铁路同会宁的朝鲜铁路联接起来。这条至会宁的铁路必须按吉林—长春铁路¹同样条件建筑。可以认为日本政府于1909年在朝鲜人问题上多少作了些让步,同意朝鲜人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中国司法权和承认间岛是中国的领土,正因为中国政府同意把延长吉林—长春铁路的条款包括在条约内,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这一条款极为重视。

奉天—安东铁路的改建在1911年完成,根据日本资料共花费了二千三百万日圆。日本政府于1913年(4月29日)取得经这条铁路输入商品同经中东铁路输入俄国货同样的优惠条件,即是说减少关税三分之一,输入内地则另征已交全部关税的50%以代替厘金²。

1913年(10月5日)中日换文规定,中国政府将用从日本借款中取得的资金在满洲建筑以下三条铁路:四平街—郑家屯—洮南铁路,开原—海龙镇铁路,长春—洮南铁路(朝、满、蒙干线的一段)。此外,中国政府还同意在建筑洮南—承德(热河)铁路、海龙府—吉林铁路时,同日本资本家协商借款³。

159 日本帝国主义对俄日战争时期建筑的新民屯—奉天这条不太长的轻便军用铁路的行动,值得注意。这条线实质上是延长了原来受英国人控制的北京—山海关—新民屯铁路。日本保有这条线,能引起同英国资本家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此是要竭力避免的。因此日本政府还在1905年12月就已同意把新民屯—奉天线移交给中国。1907年(4月15日)正式签订协定,但中国政府承担了对轻便铁路支付一百六十六万日圆的义务。可是日本资本家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1卷,第797页。

2 同上书,第1039页。

3 同上书,第1054页。

在当时还不让这段铁路完全脱离自己的控制,在该协定中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同日本缔结把铁路改建为标准轨所需费用一半的借款合同。改建铁路的总工程师应是日本人,铁路的收入必须交由日本银行保管¹。1908年为了改建铁路确实同日本缔结了三十二万日圆的借款合同²。

日本私人资本也积极侵入了满洲所有经济部门。如果不是以纯日本企业形式就是以中日合办企业形式,有时也在纯中国企业形式幌子下日本资本侵入了南满经济的所有毛细孔,侵入对外资“禁止的”部门中。

主要为逃避中国法律而成立的中日合办企业中,中国方面大部分参加者是北京政府或各省政府或取得若干股份的大官僚。日本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之间或私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合同形式上规定中国资本应参加半数,但在实际上从未照办。在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最重要的或盈利最多的企业中少数中国人的参加久而久之就等于零了。鸭绿江林业公司、本溪湖煤铁公司、后来的鞍山铁矿股份公司等都是最大的合办企业。

大仓公司还在日军占领南满时期就攫取了本溪湖煤矿。1910年,日本同北京政府订立了协定,使这一攫取合法化了,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中日合办本溪湖矿业公司,股金为二百万中国(北洋)元。大仓公司取得了把先前投资折成一百万元的股金;而中国政府则以开采权为代价折合三十五万元股金,其余股金由中国私人资本投资。协定期为三十年,届时中国政府有权收回矿山³。因为中国 160人未必能获得多少如此可观数额的股金,显然,这个企业一开始日本资本就占有优势。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1卷,第627页。

2 同上书,第767页。

3 同上书,第793页。

大仓攫取本溪湖未合法化之前,1909年(9月4日),日本政府同北京政府达成订立一个总协定,规定安东—奉天铁路和南满铁路地区内的煤矿由中日合办企业开采¹。因此事实上正式承认了日本对这一地区内的煤矿有支配权。

日本政府同北京政府还达成订立关于成立鸭绿江林业“合办”公司的协定,股金三百万元,期限为二十五年。股金必须按对半原则由中日两国政府投资²。

袁世凯于1915年接受日本袁的美敦书以后,日本资本对侵入工业和铁路建筑采取了进一步的步骤,而俄日1916年的协定则更加巩固了这一袁的美敦书(以下再谈)。

1915年(12月27日),横滨正金银行同北京正式签订关于五百万日圆贷款协定(年息5%),期限为四十年,以建筑四平街—郑家屯铁路(即1913年协定所规定的五条铁路之一)。根据协定规定,建筑领导权属于日本工程人员,铁路器材向日本购买,通车后运输业务管理必须由日本人掌管³。

1917年(10月12日),南满铁路同北京政府签订了关于吉林—长春铁路以铁路本身及其收入为担保的追加借款协定。新借款为六百五十万日圆(年息5%),其中包括原借款二百万日圆。根据借款协定,铁路的管理和监督权在借款期限三十年内移交给南满铁路⁴。吉林—长春铁路名义上也算是“中国国营”铁路,事实上完全是日本人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种种措施,使大规模的合办企业不受中国资本的任何影响,甚至不受最低限度的影响,也是为了使奉天当局对日本资本加强经济上的依赖。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790页。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731,733页。

3 马克·穆拉,第2卷,第1249—1258页。

4 同上书,第1390—1397页。

1915年10月16日,大仓公司同奉天省当局签订了为期一年¹⁶¹的一百五十万日圆的借款协定,这一期限于1916年予以延长。这笔借款的担保是本溪湖铁矿和安东林业公司股金以及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矿山的税收¹。

根据1916年协定,鞍山铁矿股份公司是合办企业。股本定为二十万中国元,“由中日双方各认一半”。规定两个经理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分任²。

同年(1916年)为履行二十一条中关于准许日本人开采矿山的条款,日本资本取得了以前属于中国人的煤矿和其他矿山的开采权:在奉天省境内有牛心台、田师傅沟、杉松岗、铁厂、锦州、暖池塘等矿山;在吉林省境内有红窑煤矿、杉松岗铁矿、夹皮沟金矿³。

日本资本在1916年和1917年又在奉天开办罐头厂和制糖厂,组织日本大麻加工股份公司。在南满铁路⁴沿线各大市镇和城市设立日本发电站。

在整个满洲遍设了日本各银行的分行,实质上使地方金融完全受自己的支配。仅朝鲜银行一家在1909—1919年的十年间就在满洲设立了十八个分行,到世界大战末已侵入到北满的各大城市。

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思想家们大事叫嚷把南满同朝鲜一样作为殖民地,以吸引日本本土似乎过剩的人口。实际上日本资产阶级—地主统治集团对日本劳动人民大量移民完全不关心,因为在大量移民的情况下劳动后备军会大大减少,工资会增加,统治阶级的利益会减少。因此日本政府对于日本劳动者向满洲和朝鲜的移民未采取认真的措施。自日本到满洲“自发性流动”的只限于力图不择手段发横财的冒险家和投机倒把分子。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335页。

2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6年8月25日奉天总领事报告所附协定副本。

3 《满洲每日新闻》,1916年5月19日,7月16日,8月14日。

4 同上,1916年5月18日,6月1日及其他各期。

为什么从来没有过从日本到满洲的真正移民运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162 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向满洲移民只能预示日本劳动者地位的恶化。

因为要使新殖民地归属日本资本，日本统治阶级仍然考虑有必要在满洲加强其民族成分，所以在这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从日本资本家利益的立场来说，这些措施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都不需要耗费太多。

总之，以下的数字说明日本向满洲移民的速度是缓慢的：1908年，在南满铁路地区内居住的有三万日本人。1918年，他们的人数达到十二万九千人¹，如果把居住在整个满洲和关东的日本人包括在内，人数不超过十八万人²，同在北满居住的俄国人大致相等。如果回忆一下日本每年人口增长为七十万人，此时甚至在美国的日本移民数字已达二十万人，对比之下向满洲移民数量之少就不言而喻了。

* * *

如果同日本联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一开始就是勉强的，在极大程度上是为形势所迫的，那末，随着世界大战的开始，随着这一联盟的“牢固”，彼得堡政府对联盟迫切需要的程度就不断增加了。

正式提倡订立联盟的不是象过去两次那样出自日本人，而是出自俄国人。俄国在战场上已吃了大败仗，对日本总的态度感到极为不安。此外，俄国对武器和军用品也极感不足。沙皇专制政府在国内的基础眼看就要垮台了，已明显感觉到引起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灭亡的激变即将来临。

沙皇政府已丧失判断和合理行动的能力。它从一个措施突然

1 《经济史》，第 116 页。

2 《日本年鉴》，1921—1922 年，第 34 页。

转到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措施。各个部的大臣都有自己的计划和己“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往往同其他部门是不相协调的。1916年签订俄日协定的谈判过程恰恰可以作为沙皇政府工作中的紊乱和缺少最低限度协调的一个突出例子。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在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去日本以前已经同日本大使开始关于这一协定的谈判。但是一方面日本政府在 163 这种情况下不表示正式的倡议，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正式传声筒——报纸和社会团体却担当了倡议者的角色。日本“社会舆论”以最富于挑衅性的口气要求为报酬“这次战争中友谊的效劳”让出中东铁路的南支线，给与日本资本广泛深入北满的权利，在俄国远东沿海进一步扩大渔业权等等。萨佐诺夫致日本大使的正式声明书只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挑衅性宣传的一个被迫的答复。

1915年12月—1916年1月，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去日本，应认为是俄国政府为调整两国关系的重大步骤。大公爵自然是一个傀儡，操纵他的真正当事人是外交部一名官员科扎科夫。

科扎科夫代表俄国外交部向寺内(朝鲜总督)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阐述了以下的论题：加强俄日联盟以反对德国；战后联盟应仍然有效¹；通过两联盟国友谊的“加深”应相互提供劳务。科扎科夫要求日方不要象直到现在那样“以陈旧无用的军火”“让给”俄国，而要代之以真正适用于战争的武器和军用品。对此除现金支付外，科扎科夫还建议“以另一种方式抵补”，例如，“让给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中东铁路支线”或其他领域内²的抵补。

日本外务大臣对于在中国反对德国斗争的基础上加深联盟很

1 为了着重指出德国对日本的仇视，科扎科夫甚至引证德皇威廉战前在波罗的海港口会见萨佐诺夫时说过的话，必须“在中国造成对日本的均势”。

2 参看案卷第213号，附在1916年2月13日萨佐诺夫奏折中科扎科夫2月10日的备忘录。

表冷淡,认为在纸上巩固联盟是多余的¹。

至于供给俄国武器和军用品,从 1916 年 2 月日本大使备忘录中可以明显看到,供给问题须视彼得堡政府同意让给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直接而定,而且日本人最初妄想得到中东铁路全部南支线,尽管俄国外交家的谈话只是围绕通过日本势力范围的那一部分打转——从松花江(老少沟站)到宽城子。

164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扎科夫的使命之后,日本大使代表本国政府以公然的毫不掩饰的威胁语言通知:1. 日本政府保证俄国东方边境的安全,使沙皇专制政府能把全部军队在前线集中;2. 供给俄国武器(陈旧的劣货——著者);3. 同意俄国国库在日本发行公债。日本政府虚假地期待俄国政府方面的友好对待。

根据大使的见解,日本的利益在关税和渔业问题上²受到妨碍,这似乎不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安,在日本人民中也引起了猜疑。目前日本政府首先指望在关税和渔业问题上的让步。至于军用物资的供应,日本政府认为只有俄方把至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南支线“在适当条件下”让给日本作为友谊象征时,才有可能。如果俄国政府同意这些基本条件,那末,“日本政府将完全乐意讨论和订立俄日同盟条约”³。

后来,萨佐诺夫在很快的答复中规避了关税和渔业问题的让步,指出在这方面的新设施会引起俄国政府对资金的需要激增,而关税和渔业一般说来不会使日本公民遭受损失。接着他重复了为酬报军用物资的供应,提出把中东铁路支线至松花江一段让给日

1 参看案卷第 213 号,附在 1916 年 2 月 13 日萨佐诺夫奏折中科扎科夫 2 月 10 日的备忘录。

2 日本渔业主认为俄国政府鼓励俄国资本在远东水域发展渔业是对自己利益的妨碍,因为日本人几乎垄断了远东水域。

3 参看案卷第 213 号,本野的法语备忘录,俄国外交部,1915 年 2 月 5 日(公历 18 日)。

本,而不让到哈尔滨。同时请求协助“在中国国境内打击德国”,共同协力强使中国政府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坚决站在同盟国这一方面。但萨佐诺夫又安抚日本政府说,这不应给中国以参战国和未来参加媾和谈判的权利¹。

下面事实说明,沙皇政府自己感到在远东没有信心到了何种程度:沙皇政府认为向伦敦和巴黎请求订立同俄国更紧密的同盟来“共同打击德国”²,在这个意义上对日本施加英、法的压力是必要的。更加紧紧地把自己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与其说是为了“打击”德国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受日本打击的需要。

但是持审慎态度的英国外交家认识到,现时对待日本要特别委婉,日本在这时的“任性苛求”都得予以满足。因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首先劝告在同日本的谈判中今后甚至不要涉及“打击”德国的问题,譬如让中国参予同盟国行列的问题,这样作显然不合日本的口味,且能引起相反的结果。格雷又说,日本很明显是要在中国取得霸权,公然破坏日本政策的步骤能引起对同盟国不愉快的后果³。 165

彼得堡政府由于看到英国在此时要求对日本采取谨慎态度,就改变了战术。在远东关于同盟的谈判,主要与中国谈判,与其说是沿着反对德国的同盟路线,还不如说是沿着反对任何“第三”国的同盟路线来进行的。

随后关于订立“同盟”条约问题经过日本大使和俄国外交部之间大量的书信往来,终于签订了公开和秘密的两种协定。但是协定的条件引起了俄国大资产阶级集团的极端不满,萨佐诺夫对此种不满不得不加以重视。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政府提出了订立政治协定取决于沙

1 参看案卷第213号,1916年2月12日(公历25日)致日本大使备忘录副本。

2 同上案卷,1916年2月19日致英法大使备忘录副本。

3 同上案卷,1916年3月4日(公历17日)柏克多尔夫关于同格雷谈话的电报。

皇政府在满洲的相应的让步。日本帝国主义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暂且同意了中东铁路南支线转让到老少沟，俄国承认日本轮船在松花江上游至嫩江口的航行权。转让和承认是萨佐诺夫所同意的作为两种补偿。

165 可是将近五月初，萨佐诺夫对财政部未给予任何通知，而中东铁路仍旧属财政部管辖。俄国财政大臣巴尔克在四月底通过私人途径才知道有转让中东铁路支线的谈判问题和问题已经解决。后来到了5月2日（公历15日）萨佐诺夫才详细解释说，总之为了“防止德国同日本接近”，订立这一条约是必要的；俄国铁路通过日本势力范围是一种反常现象，早就应该消除，特别是现在日本正承诺“进一步援助”的时候，“皇上赐予同意”作价“转让”宽城子和松花江¹之间的支线。

作为财政大臣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巴尔克因为受了加倍的侮辱，对于萨佐诺夫的过时的解释完全不予理睬。他首先提醒，当日本报纸报道转让部分中东铁路给日本时，就于4月11日（公历24日）函询萨佐诺夫关于这一消息的可靠性，“尊敬的萨佐诺夫阁下”只是说，日本政府已否认了这些谣言，即是说，萨佐诺夫进而证实这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巴尔克用十五页长函强调指出，避开财政部和对他隐瞒让给中东铁路支线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证明萨佐诺夫对俄帝国主义在满洲和远东的事业是外行的，他对这个问题
166 一般说来是没有远见的。大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愤怒地预言，倘若把百俄里的南支线让给日本，俄国几乎会失去整个远东，并引起国内外的重大纠纷。“社会舆论的不安情绪”和“对军队更为不利的印象”、在整个中国失去威信、“在远东失掉政治上的均势”——巴尔克以断然的口气预告了这些后果。让出中东铁路部分南支线

1 参看案卷第213号，1916年5月2日（公历15日）萨佐诺夫致巴尔克的信草稿。

之后,中东铁路不可能与南满铁路相竞争,因此使中东铁路成为南满铁路的专用线,在北满建立日本的经济霸权,即把俄国资本和全部俄国人从北满完全排挤出去,丧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货运量——这就是巴尔克总结上述广泛论据的出发点。当时财政大臣已不是从“俄国的历史使命”或是从某种“战略任务”出发,而是从“交易所”出发来引证论据,他着重指出,“地方和中央交易所委员会的代表们把保留在我们手中的一段南线经常看作是在满洲市场上能与外国货泛滥作斗争的主要条件之一”。俄国大资本家是借巴尔克的口在说话,他们虽已感到,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基础动摇了,但还不至于因此就陷入惶惶不可收拾的惊慌地步。

巴尔克得出结论说,不应把中东铁路的一段让给日本的责任归之于“最高当局”,这个问题应由“立法机关——国会加以初步审查,“有关国家收入和资产割让事项均属国会管理并须皇上赐予同意”¹。

因此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借巴尔克之口抗议代表地主政权的尼古拉和萨佐诺夫让给日本中东铁路南支线的决定,并要求国会讨论这一问题。

地主政权这时已不敢公然藐视大资本家的利益和要求了。

北满所有俄国居民都已知道中东铁路一段支线的让出,新“主人”——日本工程师也来视察自己未来的财产,在让出的车站上出现了未来的日本站长和为了接收及营运的工作人员,但是移交事宜受到了阻碍。萨佐诺夫虽然一再表示原则上同意,虽然得到了尼古拉的确认,虽然克伦斯基政府步萨佐诺夫的后尘,但是移交事宜仍然不能实现。 167

至于关于“政治”协定的谈判,显然由于中国对让出铁路提出异议而发生困难,萨佐诺夫只能再度牺牲中国来补偿日本。

1 参看案卷第213号,1916年5月18日(公历31日)巴尔克致萨佐诺夫的信。

俄国外交部最初拟定的条约草案条款中有一项，限制日本强迫中国以协定规定的形式，使日本资本在中国享有独占的权利。还在五月上半月，俄国驻东京大使克鲁平斯基报告俄国政府说，日本外务大臣石井态度顽强，他坚持有权与中国缔结条约而无须事先与俄国政府交换意见。克鲁平斯基认为，日本政府有意回到去年他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声名狼藉的第五部分，并以某种形式把保护关系强加在中国身上¹。

萨佐诺夫的易于让步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的。他立即在涉及华中协定的条款中只规定了极为含糊不清的义务：日本与中国缔结协定时，“须注意自己同盟者的利益”²。

可是日本政府连这样的义务都不愿承担，而萨佐诺夫就同意把它全部删去³。这样，萨佐诺夫实质上允准日本强求对中国的保护关系。

然而萨佐诺夫此时还未收回关于让给一段南支线的诺言。当时公开协定和秘密协定条文在签字前双方都已通知了伦敦和巴黎（6月13日，公历26日），而日本大使未忘记附以说明：除本草案中所规定的义务外，俄国政府为了酬报军用物资的供应，同意让给日本中东铁路的一段南支线和沿松花江到嫩江口的航行权作为补偿。法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不反对这一草案，相反，草案却受到了官方的赞许。

经过半年谈判之后，签订的公开协定规定，俄国和日本将不参加旨在反对本协定参加者之一的任何政治联合。这必须保证俄

1 参看案卷第213号，1916年5月11日（公历24日）克鲁平斯基发自东京电报副本。

2 同上案卷，1916年5月16日（公历29日）萨佐诺夫致克鲁平斯基的电报副本。

3 同上案卷，1916年6月8日（公历21日）萨佐诺夫致克鲁平斯基的电报副本。

国,其中也包括同盟者,防止从日本转向德国协约同盟的危险。此外,双方必须协商相互援助的措施,如果订立协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或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¹。这一条款主要为反对美国,因为在此时只有美国能威胁日本在中国已获得的和新获得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

其次,秘密协定规定了相互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根据相互协议采取措施”,为此“使中国不落入敌视俄国和日本的第三国的统治下”,“缔约国之一方就须和第三国宣战”²。这在实质上就是说,俄国政府不仅认为中国所接受的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合法和承认日本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而且承担武力援助的义务,如果有谁威胁这一优势地位的话。因为需要武力援助的一方只有在该方盟国保证协助的情况下才能提供,而英法两国对俄日来说就是这种盟国,协定在形式上是反对德国的,而俄日双方同德国都已处于战争状态中,所以在实质上军事同盟的订立是为了反对美国,美国在当时对俄日任何一方都不是盟国。

顺便提一下,美国政府恰巧在 1916 年核准了第一次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在三年中建成十艘主力舰和二百多艘其他舰只。日本认为,这个计划就是日美海军竞争。

俄日秘密协定事实上也反对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上另一个最重要的帝国主义的竞争者,即反对它的“知心的”,“老”朋友——英国。列宁并不知道协定的条文,但考虑到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形势,于 1916 年 11 月 6 日写道:“同时大家知道,俄国和日本两国之间除了原有的条约(如 1910 年签订的让日本‘并吞’朝鲜和俄国并吞蒙古的条约)之外,这次战争中又缔结了新的秘密条约,锋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国。虽然条约的原文还

1 参看案卷第 213 号,《公开协定》副本。

2 同上案卷,《秘密协定》准确法语副本,格里姆译,第 191 页。

不知道，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日本曾经在英国的帮助下在
169 1904—1905 年打败了俄国，现在它正在审慎地准备能够在俄国的
帮助下打败英国。”¹

日本资本家除了巩固自己阵地反对英美以外，还希望通过同盟条约来保证自己在战后至少有象德国对战前俄国输入的一半，这是日本政府首相在商会为庆祝订立协定举行的宴会上所说的。协定订立后，日本闲院亲王率领大批随员——军事和经济专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暗探”）访问俄国，其意图就是取代德国先前在俄国的地位并巩固这一地位。

从日本方面来说，“援助的义务”实质上只是对中国西部、外蒙和北满负责任，因为仅在这些地区存在着俄国帝国主义的“现实利益”，而任何人都能威胁这种“现实利益”。

俄国帝国主义出于担心而被迫同日本订立这一不利的同盟，日本军阀们看来虽没有利用机会进攻俄国远东，但正是在条约订立前他们的威胁却指向远东。沙皇政府作这笔不利的交易，还因为统治阶级的政权在国内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日本资本家除了以用不着的大部分不合用的陈旧的劣货获取超额利润外，也决心利用机会迫使竞争者一方不仅认为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合法，而且有义务予以援助，譬如说如果美国侵犯这一统治。

俄日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加深”同盟是迫不得已的。尤其在满洲的俄国居民（住在接近日本的地方，这里的报纸爱乱扯关于当前祖国的“成就”）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散布着接连不断的流言蜚语，说协定中有一项关于让给日本的条款，不知是止于哈尔滨的南支线，还是止于哈尔滨本身。但是协定签字后不久，俄国大使就自东京发电说，日本政府提供（当然要钱）十五——十八万支枪、一亿发子弹，这正如沙皇政府所想望的，这些武器能把它从不幸和灾难

1 《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27 页。

中拯救出来。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在西部边境上吃了败仗，俄帝国主义及其在远东的代表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

例如在战争初期，哈尔滨的俄国总领事特拉乌特沙尔德事实上是被抛在一边的。看来，在最近的将来铁路租借地，还有整个北满，由于盟国战胜德国的结果都将正式成为“俄国的领土”，因为在胜利的战争后，中国人怎么敢反抗合并满洲……北满应该作为对俄帝国主义的战后“赔偿”之一。俄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在战争一开始就竭力想把它攫为己有。在哈尔滨设置领事是为了装样子的。特拉乌特沙尔德完全不计较这一点并报告上司，他“请我们的将军们来统治和当代表”，而特拉乌特沙尔德只是哭诉他已被抛在一边，以致“从他自己方面来说，不能尽任何力量来促使实现俄国的满洲——黄俄罗斯来代替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和中国港口”¹。

与此同时，俄国将军们以十足挑衅性的态度对待中国人，而且放任挑起冲突。还是那个特拉乌特沙尔德报告说，“一个宪兵想得点好处”，向距铁路租借地三十俄里的中国村庄派去了俄国军队搜查鸦片，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结果打死五名中国人，而俄国人死三人，伤七人²。

就是那些将军们看到北京政府接受了日本的哀的美敦书（即二十一条）也积极讨论向中国当局提出赔偿的要求。

在这个时期签订了关于呼伦贝尔的协定（1915年10月24日，公历11月6日），根据这一协定，呼伦贝尔蒙古地区（在北满境内）几乎完全取得了自治权，而且实际上对它确立了俄华共同保护关系。如中国派军队到呼伦贝尔须事先通知俄国政府，外国资本中只有俄国资本能在这一地区投资建筑铁路³。

1 参看案卷第218号，1915年11月18日特拉乌特沙尔德的信。

2 同上案卷，1915年9月5日的报告。

3 参看马克·穆拉所有的条文，同前书，第1247—1249页。

1916年，沙皇代表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看来甚至俄国的“利益”在北满可能遭到严重损害的时候，将军们也不敢采取行动。许兰州将军（据推测是反俄的）反对齐齐哈尔督军朱庆澜“亲俄派”（俄国人操纵的）的变乱，结果朱庆澜被赶出了齐齐哈尔。似乎应立即采取行动，但是根据将军们的意见，现在“任何企图或要求在满洲去积极反对中国，即使能保证成功，也如同在前线要求集中一切力量的时候，却在大后方谴责企图破坏和平，那是早已注定要失败的”¹。

171 对于俄国将军们的异乎寻常的爱好和平，甚至胆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部队已失去信心。士兵的不满在1915年底从西方战线已波及到驻扎在满洲的军队了。在这一方面的征兆是一个士兵的举动，一个拉特维亚人士兵苏尔茨枪杀了三个军官（其中有一中校）后自杀了²。

直到现在，受压制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以及封建高利贷阶层开始感到自己胆子大了，这是日本人暗中挑唆的，他们公然表现出反俄倾向。

例如，1916年底商界中广泛散发传单，号召抵制约贬值50%的俄国纸币³。

在这一时期，中国中央政府也“对整个同盟国的态度傲慢起来”⁴（少不了日本的影响——著者）。“亲德国的”情绪甚至达到十分“不能容忍的”程度，例如北京政府对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死命令下半旗三日志哀⁵。

在这种情况下，在远东已没有实际力量的俄帝国主义看到唯

1 参看案卷第219号，1916年10月27日报告。

2 同上案卷，1915年10月20日的报告。

3 参看案卷第219号，1916年12月9日的报告。

4 同上案卷，1916年11月5日的报告。

5 同上案卷，1916年11月18日的报告。

一的挽救办法是保持和巩固对日同盟。哈尔滨总领事向彼得堡政府报告：

“在我们对复仇(对日本人复仇——著者)尚未准备就绪之前，我们在这里的政策必须同日本齐心协力进行，如果日本不喜欢美国和中国的行动(同协约国断交，参加到同盟国方面——著者)，那末我们就没有理由对此表示高兴”¹。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自己的优越地位，并利用机会对“盟国”的势力范围作精心细致的渗透。朝鲜银行于1916年在哈尔滨和道外开设了分行。在日本人协助下，在中国官僚集团中进行紧张的阴谋活动，进行反“亲俄派”的斗争，斗争往往是以免去“亲俄派”的职务而告终。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引渡政治犯方面对盟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当哈尔滨领事要求引渡在大连的“无政府主义者巴甫洛夫-彼得罗夫(他参加过螺钉工厂起义和军舰波将金号起义等)时，日本帝国主义考虑应“提醒”关于“两国引渡犯人协定”所附秘密条款(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译者)和关于“在对朝鲜政治宣传者作斗争中两国提供劳务”，但是看来，这都用不着了。日本当局在逃营的借口下愿意引渡巴甫洛夫-彼得罗夫²。 172

与俄帝国主义在北满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普遍削弱的同时，在世界大战后半期，俄国资本也显露出复苏的某种趋势。1916年底，百万富翁库拉耶夫与黑龙江行政当局代表马道台合伙经营开采额尔古纳河沿岸金矿和采伐木材。俄亚银行也与这个马道台达成关于开采金矿的协定，百万富翁斯基杰尔斯基达成关于采煤的协定。西伯利亚的一些百万富翁们曾准备贷予满洲督军们数百

1 参看案卷第220号，1917年2月14日的信。

2 参看案卷第219号，1916年12月24日的信，根据公布的俄日关于引渡犯人协定，政治犯不引渡(参看《俄国外交部公报》，1912年，第2卷，第8页)。

万卢布的借款¹。战时致富的豺狼们力图利用自己的资本来获取殖民地的超额利润。林业家斯基杰尔斯基指出，从满洲能榨取非常可观的超额利润。在俄国人侵入满洲的初期，他以很少的钱开始经营，1916年他死后除了“实业”（即不动产。——译者）以外，给继承人还留下了一千万卢布的现款²。

此外，俄亚银行于1916年春（3月14日，公历27日）由郭伊尔代表该行与中国政府签订发行五千万卢布公债的协定，以建筑哈尔滨—黑河铁路及其支线墨尔根—齐齐哈尔。根据借款条件，总工程师必须是俄国人，总之铁路实际应由俄国人监督³。这个方案基本上重复了美国计划的锦州—瑷珲铁路的北段。美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声明，美国财团根据1909—1910年建筑锦州—瑷珲铁路协定所取得的权利“决不放弃，可是……坚定不移地对该项权利加以维护和保留”⁴。不过这次声明更可能是对日本人的，他们在1915年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建筑四平街—郑家屯铁路协定，这条铁路也重复了美国计划的锦州—瑷珲铁路的一段。同年4月，俄亚银行两次划拨中国政府上述借款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上海两，并对未来轨道路基进行了勘察，但没有实际施工⁵。

173 二月革命后，俄帝国主义在北满的地位更加迅速地削弱了。由当地俄国资产阶级建立的管理机构不受中国当局的尊重。至于不久后建立起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更激起了中国当局的阶级仇恨。中国当局在共同阶级敌人面前忘记了旧日的纠纷，竟把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警察局长、宪兵队长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这些人当地士兵代表苏维埃要逮捕的。十月

1 参看案卷第220号，特拉乌特沙尔德一月份的信件。

2 参看案卷第219号，1916年11月15日哈尔滨领事的报告。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267—1279页。

4 《美国对外关系》，1917年，第168—169页。

5 根据中东铁路经济局的材料。

革命后，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要求把中东铁路和总领事馆的职权移交给苏维埃，但因与霍尔瓦特谈判时决心不够，霍尔瓦特商请中国当局派中国军队对抗苏维埃。经过武装冲突之后，苏维埃被消灭了（1917年12月12日），可是最终局势的主人自然不是中国人，更不是俄国的反革命分子，而主要是日本人。

就此结束了俄日帝国主义“同盟”的时期，开始了俄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变为日本的恭顺的仆从、或法国、英国、美国武装干涉者的走狗的新时期。同时在帝国主义者之间也开始了争夺中东铁路，即争夺北满的斗争，基本上斗争是沿着日美尖锐竞争的路线进行的。

* * *

到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和日本虽然成为“盟国”，但世界大战并未使整个日美相互关系向好的方面变化，特别在满洲问题上也未向好的方面变化。

日美共处在一个交战的同盟中，这也不能使它们的矛盾缓和，相反，在表面“睦邻的”外衣下，这些矛盾已不可避免，而且发展得更急遽，不止一次地暴露出来了。

“虎头蛇尾”：1910—1911年美国金融大王费了很大的力量组织四国银行团借款给中国，总数为四十万英镑，以预支款形式供开发满洲之用¹。

后来，日本和俄国也参加了这个银行团，它的活动性质也改变了，与美国金融资本家的打算不符，美国资本家认为“自动退出”为好。

几经波折之后，所谓“改组借款”协定在完全不同与美国资本所计划的基础上，于1913年4月五国——英、法、德、俄、日银行团与中国政府正式签订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俄国和日本

¹ 扬：第104—105页。

174 参加银行团这件事本身（美国反对俄日两国参加）¹对美国人来说是极不愿意的。此外，很明显的是银行团不可能渗入满洲。同时，如果美国财团参加银行团，自己提出的条件将束缚自己。

参加银行团的五国金融豺狼们的借款除了巨额利润外，还有其他目的。正象当年法国“民主”共和国的借款帮助俄国反动派仍旧维持政权一样，现在这笔借款必将协助袁世凯及其封建官僚集团彻底镇压中国革命，保证所投的资本不受任何损失，并进一步维护残酷剥削殖民地制的条件。列宁用以下的话正好说明这次借款的意义：

“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拥护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公债数目约为二亿五千万卢布，按 100 卢布折合 84 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付中国人二亿一千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要去二亿二千五百万卢布。你看，在几个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一千五百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是一笔绝妙的‘纯’利吗？”

若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在中国不是有共和制度以及国会中的大多数反对这笔借款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叫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了！那时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²

关于中国国际银行团的问题，必须顺便指出 ⊙. 格里姆教授

1 《关于法俄关系史的材料》，第 542—543 页，伊兹沃尔斯基致萨佐诺夫的信。还可参阅第 565 页。

2 《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83 页。

的不正确的观点：他把国际银行团的问题描绘为“帝国主义业已组织起来”的观念，他不去揭露日益增长和尖锐化的帝国主义的矛盾，而却妄图借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金融资本似乎可以共同和平地剥削中国来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涉及到 1910 年的银行团时格里姆说道：“然而所有这一切同时也证明中国国际史上新时代的来临。根据美国的倡议，各国金融集团联合行动来共同开发中国自然资源和剥削中国人民劳动的企图是代替他们之间经常进行相互竞争的不一致行动的时代。”¹

银行团的成立虽然也证明“新时代的来临”，但银行团的意义恰恰与格里姆教授所解释的那个意义完全相反。关于在剥削中国问题上，跟剥削一般半殖民地一样，谈不到停止任何竞争。相反，¹⁷⁵帝国主义列强集团建筑在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上，而这种尖锐化引起了世界大战。企图强使中国在一定的集团范围内接受更为奴役的条件，这绝不能说是根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美国退出银行团及以后该团的解体，对于“根除”帝国主义竞争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列宁正是在谈到列强就“银行团”问题对中国的关系中“国际联合金融资本”的例子时，写道：

“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灭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²。

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著作中，认为必须指出美日之间为争夺中国的尖锐斗争，它是帝国主义者争夺半殖民地加强斗争的一个例子：“瓜分中国还刚刚开始，日美等国瓜分中国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³

1 ㊟. 格里姆：《中国问题》，载《新东洋》，第 6 期，第 61 页。

2 《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88 页。

3 同上，第 265 页。

突然爆发的欧洲大战使五国银行团受到挫折，也迫使美国在初期对中国的庞大“计划和事业”采取谨慎态度。尽管没有“大事业”，特别是对满洲，可是个别美国银行集团在这时却拚命往中国钻。1916—1917年，美国银行已提供了几笔不大的借款，以改善中国水道等等¹。

美国政府于1917年提醒北京注意，美国资本家根据“自1904年就贷款给中国”为理由而保有贷款的权利，如果中国需要这种借款。

同时，日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使人感到愈来愈强烈。例如，南满铁路给日货的优惠待遇，而美国政府认为是对“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破坏，日美两国政府就这个问题于1914年6月开始谈判和公文往来，持续达一年半之久。在上述谈判中，日本帝国主义视时机而变的灵活立场值得重视。自1914年3月起，南满铁路按三分之一的低运费率将来自日本和运往日本的货物沿奉天—安东铁路运往奉天和奉天以北地区，可是美国输入满洲的
176 货物则主要是通过上海和牛庄。经过美国政府的抗议后，东京于1914年7月同意均按低运费率收费，不管货物运送路线。可是后来在10月间又解释说，诚然所有货物均享有低运费率的权利，但条件是必须由日本轮船运送。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资本显然感到自己胆子大了。1915年1月，正当日本准备向中国提出大量要求的时候，日本政府就运费率问题却又向美国让步了，显然认为不值得“为一些小事”而争吵。对于任何国籍轮船运来的货物，只要该轮船公司与南满铁路订有相应的合同均予以低运费率待遇。美国国务卿兰辛对此仍不满意，继续抗议并反对这一条件，但无效果²。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287—1297, 1337页。

2 保尔·艾德：《美日关系一件事》，第482—483页。《远东评论》，1930年，9月。
河上：《太平洋问题》，1923年，第150—151页。

我们所提到的美国政府不承认中日关于二十一条协定的照会是日美关系上的重要阶段。

还在这以前,即在 1915 年 3 月(公历 13 日),美国国务卿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提出书面声明,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同中国一定地区的特殊关系;但又警告说,它将反对日本派遣顾问到中国的特权,反对经济上破坏美国“条约权利”的特惠待遇。美国照会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放弃强迫中国接受的那些要求,中国一旦接受这些要求,美国人将从平等参加对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中被排除出去,中国的政治上的独立也将受到限制”¹。

1916 年俄日“公开”协定签订后,华盛顿立即提请俄日两国注意,协定中丝毫未谈到对中国的“门户开放”。俄日两国政府对此则回答说,不用说,它们都无意使“门户开放”受到损害。

最后,1917 年(11 月 2 日)著名的兰辛—石井协定签字了,日本人首先作出毫无根据的吹嘘,说这是美国人方面极大的让步并且承认日本人在中国的特权。

实际上,协定是日本的倡议和对美国攻势的结果,更主要的是因为满洲问题而产生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美国因参加世界大战而本身受到约束的时候,想保证自世界大战以来现有的和已预定好的自己的“获得物”不受美帝国主义的当前主要威胁。还在 1917 年 1 月间,当时在远东发生了不无根据的谣传,说美国金融资本正打算采取步骤,贷款给中国政府建筑满洲铁路,日本资本家和政府甚为焦急不安,日本大使急忙询问华盛顿政府。美国国务卿用当时一般的词句回答: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和“不进行有损于日本利益的干涉”等等²。日本政府不满足于这种答复,同年夏(美国军队已蹲在法国战壕里作战),派以石井为首的专门

1 《美国对外关系述评》,华盛顿,1915 年,105—111 页。

2 《美国对外关系》,1917 年,第 117 页。

代表团在海军专家的参加下赴华盛顿进行谈判。日本大使发表声明：“日本人民对于中国问题特别敏感，现在感到不安”，因为传说“美国政府事先未与日本协商就对中国的政治地位作了重要声明”¹。日本大使以极为强硬的语气要求美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以“证明美国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友好态度”，特别是国务卿伯赖安于1915年所作的声明，如日本人所解释的那种意义，即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²，应表示确认。

这一开端已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想从美国那里夺取重大的让步。美国政府在答复的照会中从一开始就坚决拒绝承认日本在中国有任何特殊的和优惠的权利，并恰好引用了伯赖安关于二十一条照会中的那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抗议强迫中国接受限制政治独立和排除美国人平等参加“经济发展”的协定。兰辛同意重申：“领土上的相邻所造成的日本同这些地区（即南满、内蒙东部、山东）³之间的特殊关系。”该项谈判延续了很久时间，一直到11月，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质上未取得任何更多的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究竟向美国要求哪些“承认”，现尚未公开，但毫无疑问，兰辛—石井协定远未反映出日本原来的要求。6月22日兰辛照会中的否定部分仍然是关于同美国人谈判时所提出的日本计划的一般说明。兰辛拒绝对日本大使解释伯赖安照会中所说的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区“优越利益”的意义，指出所谈的只是“特殊利益，拒绝承认日本对整个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殊关系，只承认对南满、内蒙东部和山东有这种特殊关系，拒绝承认在这些地区有任何破坏中国政治和行政统一的特殊优惠或权利。日本帝国主义代表们显然企图在初次粗暴的攻击中迫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

1 1917年6月初，兰辛通过美国驻北京大使照会北京政府，建议保持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美国对外关系》，1917年，第48—49页）。

2 《美国对外关系》，1917年，第259页。

3 同上，第261页。

国的“优惠利益”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影响，即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半保护关系。当然，没有武装斗争，美国垄断资本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但是后来它连对于缩减了的要求只承认对南满、内蒙、山东享有“特殊利益”也不同意了，即承认 1915 年 5 月的日华协定。它仍旧以不涉及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与其领土接壤地区”有“特殊利益”的空话来对付。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很倔强，最终也只有对此表示满意了。

实际上，11 月 2 日美日两国的换文没有提供任何根据来评定这个协定是日本的重大胜利。随着承认（由于领土相邻）“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与其领土接壤地区内”，换文不是具体指出这些特殊利益是什么，反而列举了不能包括在内的特殊利益。从列举中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不能比其他列强有任何特权和优惠，双方就是在这一点上签字换文的。因此这个换文实质上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在日本的猛烈攻击面前保卫了本国资本。美国不承认日本有任何具体的权利，同时保证了世界大战期间自己后方的安全，因为同日本的长期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美国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以后出现的更为紧张的关系而对后方担心。

事实上，根据兰辛—石井协定，“中国领土主权仍未缩减”，因为日本政府“不想使其他国家贸易受到不平等待遇，或轻视迄今中 179 国根据条约给予其他国家的权利”。美日两国政府“否认，它们两国有任何意图用任何手段来破坏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不可侵犯”……“它们仍忠实于门户开放原则或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原则”。此外，它们相互声明，两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取得任何一种特权或特惠条件，如果这种特权或特惠条件能触犯中国独立或领土不可侵犯，或者否认任何国家臣民或公民完全利用对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¹。

1 参看马克·穆拉的原文条文，同前书，第 2 卷，第 1394—1396 页。

因此日本实质上以书面形式放弃了根据二十一条从北京政府那里取得的一切特殊权利,因为这些特殊权利既触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不可侵犯”,也否认其他国家臣民或公民享有机会均等。虽然这些陈词滥调通常对外使用于其他一切国家,而对己则除外,但已在上面签字,就成为要求履行它的明确的根据(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法关系和相互义务一般都能作为“根据”)。如果详细列举出日本在中国究竟有哪些特殊利益,或者更正确地说,有哪些特权,即哪怕引证日本根据二十一条所取得的那一部分权利和优惠,那末,这些“原则上”的保留条件对日本是无害的。因为两国“领土相邻”而模糊承认“特殊利益”,特别是在有了以后的保留条件的情况下日本就毫无所获了,对此必须寻求原因,为什么日本外交家在对他们那么有利的时候却满足于这种“让步”。经由美国驻北京大使转交北京政府的兰辛的照会,显示和说明了这一让步的内容是空洞的,该照会是向北京政府解释兰辛—石井协定的。照会说,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显然“因为两国地理上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国家公民的同样企业具有某种优越性”¹。

兰辛—石井协定签字后不久,日本外相本野致俄国驻东京大使的声明中对日本政府为什么仍然同意这种不明确的措词作了某些说明。本野讽刺地指出,如果将来在解释“特殊利益”这一说法上发生分歧,为了阐述自己的解释²,日本比美国有更好的手段。日本资本在1917年为中国问题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还未下决心,但是对将来自己的力量和可能估计得太高,希望基本上在中国执行自己的路线,并迫使美国在实践中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对“特殊利益”所作的解释。

不能不承认1917年的谈判和兰辛—石井协定使日本对中国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396页。

2 扬:《满洲的国际关系》,第273页。

的政策在以后几年里也产生一定的遏止的影响。

如后来从公布的石井回忆录中所看到的，甚至连“特殊利益”这个词，石井费了很大力气才列入协定。华盛顿政府非常坚决地反对这一点，通过与日本有联系的并应石井请求协助的美国资本某些集团对兰辛施加影响，最后才迫使美国政府同意这一措词。太平洋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1917年已经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正是在1917年夏季日美“友好”谈判时，列宁明白地看到谈判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在全俄罗斯苏维埃第一届大会上讲演中说道：

“……日美之间的战争已经成熟了，这个战争已经准备了好几十年，它不是偶然的……。”¹

还在大会以前，1917年5月，列宁确信地说，美国亿万富翁“……必然要同日本展开太平洋的争霸战。这场战争已经准备几十年了”²。

我们认为有必要详细论述兰辛—石井协定，因为在苏联出版物中广泛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在这次换文中对美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有一种论点，说美国这次换文实际上放弃了对满洲问题的干涉。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世界大战以来，膨胀起来的美国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贪求殖民地，甚至是暂时的，甚至在“一片纸”上也不愿把阵地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相反，再度证实它是多么强烈地向往整个中国，特别向往满洲，它占有庞大东亚殖民地的打算是多么坚定。

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证实，当俄帝国主义一退出这场赌博，特别是当战后主要的战胜者获得了最大的俘获物时，美国垄断资本就把自己的特殊注意力从大西洋转到了太平洋。

1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2 同上，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6页。

第三时期

十月革命后国际帝国主义在满洲

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震动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并奠定了总危机时期的开始”（摘自第三国际纲领）。世界经济分裂为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化、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世界大战中战败国和战胜国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强、各战胜国本身之间矛盾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明显地表现出已经来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由于争夺满洲的斗争也表现在满洲本身，帝国主义直接使满洲卷入了大规模的金融资本的剥削。

资本主义在其腐朽的最后的毁灭性发展阶段上反对胜利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其中一部分是在满洲境内进行的。横贯满洲的中东铁路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帝国主义者反苏斗争中用来挑拨离间和进行阴谋活动。作为半殖民地的满洲和作为剥削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之间矛盾的加深，被战胜者美国利用了，美国在日益尖锐化的帝国主义间的斗争中利用它来对付另一个战胜者日本。

日美帝国主义为争夺中东铁路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夺北满的斗争，是战后最近时期帝国主义在东亚的矛盾的一个最主要部分。这是很自然的。

日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区域矛盾的总和已暴露出来了，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迅即发生流血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已很明显。日

本帝国主义稳坐在南满,由这里向四方伸展魔掌,并力图以自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囊括全中国。

美国在亚洲大陆保住了自己的某种比较牢固的阵地以后,现在不仅需要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剥削的基地,而且还需要建立未来对日斗争的战略根据地。对南满的殖民地剥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补给渠道之一;同时它在南满的统治与任何竞争的国家相比,是最薄弱和最易受攻击的地方,别的国家有的在附近有根据地,并得到中国的同情。¹⁸²

十月革命永远消灭了俄帝国主义,1918年初,北满已经没有帝国主义主人了。还住在满洲的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余孽早已准备四肢着地匍匐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面前,只要保住优厚的职位和较好的物质待遇。

日本帝国主义第一个扑向北满,跟它飞奔而来的是美帝国主义。

法国和英国资本家虽然也参加了北满的后来一切事件,但基本上是忙碌的极端自私的帮忙者,力图从形成的局势中,特别是从日美斗争中为自己捞点好处。

中东铁路在一个时期成了美帝国主义争夺远东统治的主要出发点之一。

帝国主义者在这一时期争夺中东铁路的斗争(这一斗争几乎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就开始了),与同盟国远东武装干涉和与日美争夺整个俄国远东统治的竞争有密切的联系。

毫无疑问,苏维埃政府取得政权后,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向其盟国提供“良好的”服务来扼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来日本武装干涉者自己只是用了比较隐蔽的形式承认了这一点¹。日本政府和军国主义者在那时的全部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还在1918年1

¹ 河上:《太平洋问题》,巴黎,1924年,第227页。

月间，日本“太平组合”公司同北京政府签订了关于供给二万五千支步枪和五千尊大炮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合同，总数为三千万日圆，而且合同规定这批武器不得用于内战¹。诚然，北京政府获得这批
183 武器主要是对南方作斗争，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的谈判表明，当时已打算共同进行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斗争。这次谈判是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中进行的，3月25日以“军事合作”的换文而告终。两国政府根据这一换文必须立即磋商采取措施，来对付由于敌对势力顽强侵入俄国领土而参加“盟国所进行的这次战争”²。这样的“军事合作”意味着在日本指导下反对苏维埃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一举两得：它在苏维埃远东开始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又侵入了北满，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的武装力量服从自己的指挥。

美国政府眼看日本军队占领苏维埃远东，也可能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大大加强的危险，显然有损于美国，而美国军队在欧洲忙于作战，因此美国政府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持否定态度。然而后来，日本人稍微减低了最初关于赔偿的要求，得到了伦敦和巴黎方面的同意武装干涉，英法政府在1917年12月已把推翻布尔什维克和瓜分俄罗斯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这个任务他们允许日本在远东某些地区进行统治），认为没有必要重视美国的意愿。日本帝国主义者同中国签订关于军事合作协定后，即组织对日本商人牛地的商社事务所挑衅性的武装袭击³。第二天，1918年4月5日，日本舰队司令借口保护日本臣民生命财产，第一批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登陆。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415页。

2 同上，第1408—1410页。

3 马伊斯基：《苏俄外交政策》，莫斯科，1923年，第50页。

同时必须指出,一个月前,即3月初,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译者)日本侨民受本国当局指示,组织武装队伍同俄国反革命分子一起手持武器反对苏维埃政权。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在当时一个短时期内占领了城市。

日本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四月登陆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仅仅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密谋反对苏联的最早行动之一,从那时起这种密谋在不断地进行。

列宁得到陆战队登陆的消息后,立即看清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并预告同盟国即将进行全面的武装干涉。

随后(5月16日和19日)以详细的海军协定使日华“军事合作”换文更加明确了¹。7月末(31日),恰恰在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面武装干涉开始前,“太平组合”公司又卖给北京政府八万五千支枪,几百尊大炮和机枪等,总数为二千三百六十万日圆。

因为等待弄清楚俄国内部情况,武装干涉的总出动推迟了。日本人(他们是唯一能立即提供实力侵入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因为以下情况限制了自己的出动:不仅美国开始坚决反对日本出兵,同盟国也开始讨价还价了,要求降低条件。日本要求无限的全权(*carte blanche*)。它希望单独在西伯利亚活动,不让同盟国军队参加。此外,它要求承认它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在俄国远东取得租借地的独占权作为补偿²。

十月革命后,英国军国主义者曾打算立即开始武装干涉,对于这一点现在已没有疑问了。只要引证英国远东武装干涉部队司令官瓦尔德的供述就够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的部队还在1917年11月就奉命开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推迟出发,第二年1月完全停止出发,只是

1 马克·穆拉,第2卷,第1413页。

2 巴夫洛维奇:《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新东方》,第2期,第18页。

到了7月才出发了¹。

1917年12月23日(公历)英法已签订划分两国武装干涉范围和势力范围的协定,由克雷孟梭和福煦代表法国和由密勒尔勋爵和谢西尔代表英国签字²。

事实上这是瓜分俄国的协定。英法占领欧洲俄国和亚洲俄国近东部分的同时,必须要以或大或小一块土地“让给”日本。除了不明了俄国内部情况以外,拖延武装干涉开始的另外原因是:伦敦和巴黎同日本关于让给“一块”土地大小的讨价还价以及华盛顿担心日本人占优势而加以反对。也需要制造本国的“社会舆论”。为了对美国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福熙还在2月间以其“威望”的“荣耀”公开赞成日本进行武装干涉,3月间英国巴尔佛耳在下院也作了同样的声明³。

185 还在1月间,在北京开始组织以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为首的“远东政府”,而高尔察克在4月间已成为这个政府类似“陆军部长”的人物⁴。这个政府的目的是要征服莫斯科。上面提到的那个瓦尔德抱怨同盟国给予白卫军的支援“不够”,并指出,要知道高尔察克“去进军”,只是组织和鼓舞他的政府的同盟国本身倡议的结果。

4月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出现了第一批不大的英国武装部队。

谢苗诺夫匪帮在1918年1月末由满洲流窜到外贝加尔。遭到赤卫队痛击,3月间从奥洛维扬纳亚窜回满洲。4月间又出现了,直接在日本教官指挥下并由日本武器装备进行反革命活动。

1 瓦尔德:《同盟国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国家出版社,1923年,第29页。

2 塔宁:《苏联外交政策的十年》,国家出版社,1927年,第28—29页。

3 《通史》,1931年,3月;《法英联合支解俄国》,斯特拉科夫斯基,第840页。

4 邓尼金:《俄国内乱概论》,第3卷,第106页。1918年9月17日斯杰潘诺夫将军给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

苏维埃政府 1918 年 4 月 24 日致日本政府的照会中指出了这一点，并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阐明立场（日本已开始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照会中说道：“我们最后一次请日本代表对于著名土匪谢苗诺夫上尉匪军中有日本的炮手和大炮一点予以注意。”

“公布的资料确凿查明：日本政府代理人广泛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反革命斗争。”¹

全俄罗斯执政霍尔瓦特和匪首谢苗诺夫这最初两个远东白匪首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娇儿。霍尔瓦特在致鲍尔迪列夫将军的电报中公然承认：“一开始在中东铁路租借地内成立志愿军反对德国-布尔什维主义，日本陆军省就用枪支、大炮和其他给养帮助装备部队。”

5 月间，在西伯利亚干线上发生了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英法外交使团开始积极活动组织内部叛乱。1918 年夏天是斗争最激烈的时候。6 月末，日本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公开建立了占领军政权。6 月 9 日，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率自己的军队占领了满洲边境附近的格罗杰科沃车站，并宣布自己为“全俄罗斯统治者”。8 月初，法国部队（约一千人）和人数众多的英国部队（瓦尔德部队约七千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同日本人会合。最后，8 月 16 日，美国军队也登陆了。美帝国主义眼看日本政府不重视¹⁸⁶它的意愿，就急急忙忙紧跟竞争者，完全不顾提供给它的财源最富的猎物，而且在十月革命前美帝国主义已把魔掌伸向这个猎物了。

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已经开始实现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它对西伯利亚怀抱着这个计划已有二十多年了。

克伦斯基政府在其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关于准许美国资本监

1 1918 年 4 月 26 日《消息报》。

督西伯利亚铁路的谈判。美国工程师约翰·史蒂文斯还在 1917 年春就到俄国来了。夏天,史蒂文斯被任命为交通部顾问,这显然是彼得堡政府同艾里乌·鲁特谈判的结果(他率领整个专家代表团于 6 月间抵达彼得堡)。史蒂文斯组织了“美国工程师西伯利亚铁路工作团”,1917 年秋,他率领三百名美国工程师到达远东¹。克伦斯基政府把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监督权,同时也把对中东铁路的监督权“在战争期间”让给美国,说是“为了战争的利益”。这是美国侵入西伯利亚、侵入俄国远东和北满第一次所跨的很大的一步。俄国资产阶级需要钱,不与华尔街充满黄金的地窖的主人“合作”,还能同谁合作呢?

对经济上“和平地”占领西伯利亚和过去沙皇俄国其他地区、甚至在北满完全替代俄帝国主义的希望,美帝国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显然从未放弃。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也就说明了美国最初对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计划持审慎态度。毫无疑问,应当在这里寻找说明威尔逊(当时美国总统。——译者)向第四届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 年 3 月初)发出著名的贺电的原因:向希望“自己成为命运主宰者的俄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同情”,并答应美国尽“一切可能”以确保“恢复俄国在欧洲和现代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²。

日本帝国主义大概已相当了解鲁特的使命,史蒂文斯工程师“团”的作用和纽约富翁们的计划,就以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来切断美国的道路。于是美国为了自己的掠夺对象而急忙派出兵力,以便有权参加瓜分和直接监视竞争者。另外,关于同布尔什维克
187 “合作”的幻想,即是说,从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比较广泛的权利来开发俄国地方的希望,随着美国资产阶级开始对苏维埃政权的社

1 马伊斯基,同前书,第 49 页。

2 河上:同前书,第 248 页,关于 1919 年 7 月 25 日威尔逊致参议院的信。

会本质的理解也就渐渐消失了。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全面的公开竞争，甚至尖锐的敌对关系，美国在远东的武装干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不同，它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

正在这个时期，开始了积极反苏的武装干涉，1918年5月，弗·伊·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日美矛盾和由于这些矛盾苏俄所处的国际形势。列宁说：

“决定俄国国际形势的第二个矛盾，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因此这两个大国必然会为争夺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搏斗。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美日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个现在暂时被美日的反德同盟掩蔽着的矛盾，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俄国的进攻……这些集团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闹翻，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其次，列宁作出了结论，它直到今天仍保有其重要性：“因为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使各国帝国主义者必然结成同盟，另一种趋势使一些帝国主义者同另一些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而这两种趋势本身都没有坚实的基础。”¹

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不久就相当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经查明，日本将占领：我国矿产富饶的沿海地区、乌苏里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东铁路，显然还连同附属物在内”，西伯利亚的反革命头子就这样通知南方的反革命头子²。

1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页。

2 邓尼金：《俄国内乱概论》，第3卷，第109页，1918年9月17日斯杰潘诺夫将军（已得高尔察克同意）致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

英国远征队司令官也抱怨日本人极端公然的掠夺。据他说，日本司令部曾向白匪军当局建议，以一亿五千万卢布购买俄属太平洋沿岸、矿场等¹。

188

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这种原因断然分手了。为了对抗日本，美国提出了自己惯用的公式——“领土不可侵犯”和“门户开放”。自然，这无论对中国或对北满和西伯利亚地区，完全不能说是美国资本家的“道德”高尚。实质在于这个时期的实力对比大有利于日本。日本一个师跟着一个师连续登陆，不管美国的抗议，到1919年秋已达七万人，而同时美国的“监视”部队总共只有八千五百人，所有其他国家——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总共只有四千人²。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盟国不得不同意，远东武装干涉的“总司令”由日本军司令官大井将军担任。

假定认为问题已发展到瓜分远东地区，或者发展到关于瓜分的谈判，那末，日本显然会根据“地理邻近”、“历史关系”、“经济”和其他的“特殊”利益，必须按照遭受的“损失”，即根据登陆部队的人数给以报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仅要求，甚至占领沿海地区、萨哈林岛、堪察加，把中东铁路置于自己的监督下，成立卡尔梅克和谢苗诺夫-蒙古仆从“王国”等等，而只把某一部分楚克奇（苏联亚洲极北部楚克奇半岛——译者）给美国，在所有占领区实行名义上的“门户开放”，如同它在南满所作的一样。但当时局势却十分复杂，东京政府经常庇护远东的德国人，特别是在中国的德国人，于1918年上半年试探同德国单独媾和。因为德国在1918年春季攻势中有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这以后，如果起因于企图瓜分“俄罗斯帝国”和中国的领土，日本将不仅对协约国保持中立，而且

1 瓦尔德：同前书，第162页。

2 河上：同前书，第234页。

对协约国的敌人——对德国的盟国保持中立，对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

世界大战最后期间，在击溃德帝国主义以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在俄国远东占领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全权主人自居，完全藐视同盟国及其武装干涉部队。根据英国远征部队司令官证明，在日本人看来“巴黎在德国人打击下可能陷落的那个事实，与美国监督中东铁路的事实相比，或与美国装甲舰‘布鲁林号’停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相比，都是不重要的”。

而当时日本人不仅敌视美国人，对待盟邦英国人的态度也很189不好，几乎闹成武装冲突。日本当局侮辱英国代表团长“本人”诺克斯将军，要求在日军占领区降下英国旗，把运牲畜的车厢给英国上校乘用（英国人一般必须向手持武器的日本人要求拨发车厢）¹。

在此十年前，帝俄总参谋长巴利增将军在访问中国时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之大，就断言“日本无疑将统治中国”²。那时这是夸大的说法，但在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盛势力已达到顶点及其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实际上已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当然也是中东铁路和北满的主人。它对自己的盟邦公然不客气地表示这一点。中东铁路的沙俄将军和官吏们绝对服从执行了日本政府代理人的命令。

1918年末，德帝国主义的覆灭，自然使日本军国主义从它在东亚独占的决定性的地位上缓慢地、但无可挽回地滚下来的开始。

同盟国的兵力腾出来了，首先是美帝国主义重新建立起来的强大军事机器能够转用于新方向。

1919年1月，以美国大使和日本外务大臣签订“共同监督”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协定而著名。虽然其他盟国、白匪军代表、

1 瓦尔德：同前书，第42，50—52页。

2 参看案卷第206号，1909年5月28日巴利增将军的日记。

甚至中华民国代表都参加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盟国之间委员会”，但只有日本和美国起着重要的作用。

华盛顿政府2月19日在致日本特别照会中再次着重指出，在东京签订的协定中所谓某个国家的适当“利益”的概念（在任命由一定的国家代表组成的当地工程师技术会议主席时应对这种利益加以注意），“不应理解是某种政治上的或领土的权利或势力范围”。

在关于盟国之间委员会的协定中，美国获得了一定的胜利。那个史蒂文斯本人又出现在舞台上了，还在1917年春为了“监督”
190 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了俄国。首先由于十月革命，其次因为日本强权的势力，他未能执行自己的“职责”。后来被任命为盟国之间委员会技术会议主席，即实际的业务机构主席。铁路技术营运完全由史蒂文斯负责，他“指挥俄国负责人员”，“任命技术会议的助手和检查员”。因为有“金钱”手段、车辆、器材等等¹为后援，美国资本及其技术会议主席有一切条件期望便于进一步的经济侵入。尤其在战时美国已为俄国宽轨铁路制造了车厢和车头，而且恰恰是经过远东把这些车厢和车头运进了俄国。

美国垄断资本又充满了对东北亚的希望。俄国反革命头子们多少知道列强的计划，既抱怨日本的野心，也对美国的“关怀”加以抱怨，因为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美国在西伯利亚铁路事业上的统治，并为美国资本经济渗透深入的同时，把日本排挤出去创造条件²，美国还计划修筑经过堪察加到伊尔库茨克的铁路并“开发邻近地区”³。

1 参阅“盟国之间委员会”命令印行的《关于盟国管理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法令和决议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20年，第2—3页。

2 《外交人民委员部公报》，1920年第9—10期、《高尔察克政府和美国》，第64页。1919年4月27日高尔察克总参谋部情报汇编。

3 邓尼金：第3卷，第109页，斯捷潘诺夫将军致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

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必需把远东、当然还有中东铁路“赔偿”给同盟国这一点，一般都予以容忍。高尔察克致邓尼金的信中说：“我认为它（即远东——著者）对我们说来是已经丧失了，但如果不是永久丧失的话，那末，就是在一段时间内。”¹

史蒂文斯把自己的总机关设在北满的中心哈尔滨，并从这里开始实行美国的政策。

技术会议虽然存在了近四年，但是它未起到美国资本所期待的那个作用。诚然，日本侵略的道路不仅被切断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迫开始后撤。然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不是美帝国主义（无疑它使日本侵略完全和彻底失败也起了大的作用），而是游击队，工农红军和日本劳动大众对本国资本主义政府的血腥政策日益增长的不满。

苏维埃政权对白匪军资本主义仆从和外来武装干涉的胜利本身，就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计划的失败。但是甚至在武装干涉时期，¹⁹¹美帝国主义所取得的总的成就也微不足道，仍然是日本的实力占优势。

在当时情况下，较弱的那个盟国放任被掠夺者去反对自己较强的盟国——抢劫的竞争者的事实，说明两个盟国的仇恨何等之大。

高尔察克司令部不是毫无根据地肯定：“美国人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在滨海省和外贝加尔²进行宣传。”美国人为了寻找某种支援以对付独占远东白匪的日本人，不时地向工农送秋波。

大家都知道有过这样的情况：驻哈巴罗夫斯克的美国部队把日本仆从卡尔梅克匪帮准备“消灭”的几百人置于自己的保护

1 邓尼金：第3卷，第109页，斯捷潘诺夫将军致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

2 《高尔察克反革命的末日》，中央档案馆，1926年，第103页。1919年10月1—15日高尔察克司令部军事政治简评。

之下。

但是美国人还不止于此。美国部队司令官格雷夫斯将军及其部属军官同沿海的游击部队队长签订了协定,相约互不侵犯¹。有一个时候美国人把整个苏昌地区宣布为“中立”地区,在这里建立了游击队的根据地。英帝国主义的代表、英国远征部队司令官、前工会官僚主义者、脑筋迟钝的、无远见的、但比其他帝国主义者较坦率的瓦尔德上校²抱怨说:在这里“列宁的军官们……在美国旗帜保护下的自己的大本营上面升起了布尔什维克旗帜”,“组织自己的兵力攻击日本人,颠覆同盟国的列车,当最高执政的军队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每次都躲藏到美国中立地带”。

到1920年初,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已经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是多么顽强和无可比拟的勇敢保卫自己的自由。当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被消灭以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无疑是最现实的和最可怕的力量。美帝国主义(为统治俄国远东既需要同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作斗争,也需要同自己的竞争者——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认为退却是明智的。而且在实际中看到,日本人在占领区的处境是多么难受。

192 1920年3月,美国军队从俄国远东撤退了。

日本帝国主义最初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在滨海省的地位。美国撤军一个月以后发生了日军进攻当地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当地红军部队的事件。在各地推翻高尔察克伪政权后的初期,日本人对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部队宣布中立。4月4日至5日夜间,正当红军部队在营房休息的时候,日本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省的其他城市进行突然袭击,屠杀数千

1 瓦尔德:同前书,第155—156页。

2 瓦尔德:同前书,第157页。参看高尔察克驻远东全权代表霍尔瓦特致鄂木斯克政府电报,在《高尔察克和美国》一文中,外交人民委员部公报,1920年,第8—10号,第66—67页。

人。高尔察克匪徒被日本人从监狱中放出来¹，参加了屠杀。

事后，日本司令部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攻击他们，因而他们被迫继续占领。用血腥的挑衅和卑鄙的谎言在日本劳动大众面前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舆论”面前来证明占领是应当的。在两年半时间内，日本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地作了种种努力，组织白匪军，不仅以金钱、武器帮助他们，而且派自己的军队协助他们，为了保持他们在俄国远东和北满的支配地位，但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心机。

尽管日本占领者在帝国主义的贪婪中是那么顽强，但终于在美国人撤走两年半以后，于1922年秋不得不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红军和远东红色游击队不可摧毁的力量、日本劳动者对统治阶级反苏冒险表示日益强烈的不满、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保卫苏俄利益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我国外交的巧妙活动，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日本撤退以后，列宁特别着重指出了苏维埃外交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已经作到使这种协定不可能实现，使拥有强大兵力的日本人宣布撤退，并且履行了这个诺言，那末，这里当然也有我们外交界的功劳。”²

日本占领者仍很牢固地占领北萨哈林(库页岛)，仅在1925年5月14日最后一批日本部队才撤离该地区。因此除罗马尼亚占领比萨拉比亚以外，日本的占领时间最长，达七年以上，而且以特别顽强、野蛮和卑鄙为其特点。

* * *

武装干涉的全部活动，一部分是在邻近满洲地区内进行的，另 193
一部分是在北满境内进行的。在这个时期，这些活动把帝国主义

1 详见 H. 诺顿：《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伦敦，1923 年。

2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351 页。

在满洲的矛盾从资本主义各国首都的外交部和外交部长办公室转移到实际的现场,比任何时候更甚,并使这些矛盾具有人们可以感觉到的和看得到的性质。

1918年夏天,在巴黎和伦敦刚刚基本上同意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日本穿军装的军队就出现在北满和中东铁路。但便衣士兵¹在十月革命后就立即出现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特别是在中东铁路的南支线地区。一部分便衣士兵在二月革命后就已渗透到上述地区了。

还在日本武装士兵在南满铁路终点站出现以前,在长春就集中了大批备用铁路器材,以改建中东铁路俄国宽轨(看来至少要改建中东铁路的南支线)为南满铁路的准轨。武装士兵和便衣士兵都是由日本铁路护路队所组成,以便在必要时能立即担负起中东铁路的业务。

铁路的监督和权力自1918年春天起事实上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9月间同中国政府签订的“详尽的”军事协定,除规定中国军队受日本指挥外,另有一条规定,在中东铁路成立日华联合委员会,该会负责军队运输和协调与“现行铁路组织”²有关的问题。

日华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铁路上的权力并使之合法化。

美国和其他“盟国”自春天起就已看出日本正式侵占中东铁路的危险性。为了排除这一威胁,同盟国列强的大使们建议中国政府以中国管理人员代替俄国管理人员,并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就可能完成了将来“国际化”的第一步。日本当然坚决反

1 在中国和满洲,日本一般有一支不大的专门便衣部队,即改装的宪兵队,紧急时把他们派到受威胁地点或预定侵占的地点。这种部队除身带武器外,在箱子内放着军装以备万一。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5卷,第1413页。

对这一点¹。第一,日本自己准备作铁路的主人;第二,中国政府夺取中东铁路的先例,在其他情况下能产生夺取南满铁路的危险。在这以后,日华协定中就出现了关于成立日华联合委员会和营运权保留在“现行组织”手中的条款。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完全侵占中东铁路,未必会在一个美国的抗议面前停止下来。它遭到了未料到的多方面的反对,以致在其势力极盛的这个时期而动摇起来和不敢下决心立即正式占领中东铁路。

俄亚银行意外地宣布自己是中东铁路的主人,银行本身突然受到法国的保护了。法国资本眼看中东铁路是多么美好的猎物,于是宣布自己是北满铁路的亲属,并准备采取任何机动办法和坚决行动,只是不让这猎物为日本人所有。英国资本自世界大战开始就同“东方的普鲁士”有很多磨擦的借口,因此为了英皇王冠上的“珍珠”——印度,对日本在远东过分的贪求是不赞同的,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当然也是反对日本的。日本人甚至遭到中国人方面,其中遭到多年受到保护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反对自己的意图。老红胡子很了解自己的主人。一步跟着一步:先侵占中东铁路,对满洲建立半保护关系,然后在日本半保护关系下建立满洲自治,最后完全吞并满洲,这时也就不需要张作霖了。经历过多次变革的有经验的红胡子不愿下台。张作霖在1918年已走上资本主义剥削的道路,把通过半封建剥削和其他途径弄来的金钱投入到南满各种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其中也有与日本人合办的企业。张作霖不愿靠日本人的养老金过活,象朝鲜的皇帝那样。尽管张作霖及其集团存在的资本主义很不象样,但是比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朝鲜封建主义的僵尸还是有较大的生命力。张作霖为日本人服务,但尽力保持某种分寸:他希望在日本人帮助下能盘踞在

1 扬:同前书,第153页。

北京的皇帝故宫，从这里剥削整个中国。但如果日本在满洲过分扩张，全中国人眼看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的逼攻面前表现束手无策和无能，那就谈不到盘踞北京和剥削全国了。因此，不仅广大人民阶层和神气十足的资产阶级，甚至一般说来顺从的满洲行政人员都反对日本侵占中东铁路。连中东铁路的俄国将军和官吏们（他们对所有武装干涉者一向奴颜婢膝）对日本人的意图也不表示友好。这些将军和官吏们通过同俄亚银行的策划保持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并增加个人收入，因为过去彼得堡对他们还有某种监督，¹⁹⁵而现在他们可以“凭良心”作威作福。如果日本强占了中东铁路，他们会安插自己的人，使俄国将军们失掉美缺，这是很明显的。

当日本人因遭到多方面的反对而动摇时，德帝国主义已遭到覆灭，而日本的野心也就开始有所收敛¹。为了对抗，在中东铁路出现了以美国看守人史蒂文斯为首的盟国之间委员会，来替代日华联合委员会。

然而盟国之间委员会和史蒂文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了今后占领中东铁路的企图。其他竞争者方面的危险和他们本身的接近只是把占领中东铁路的企图掩盖起来，并采用更审慎的斗争手段。美国人出现的结果之一导致日本武装干涉军达到巨大的数字——十万人，其中数千人驻扎在中东铁路地区。不仅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在已形成的情况下自己不便侵占中东铁路，愿借俄国走狗之手来作这件事。谢苗诺夫专程去奉天劝说张作霖，不要妨碍谢苗诺夫的军队占领由满洲里至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地区和巩固铁路管理权。日本驻奉天领事积极协助谢苗诺夫，帮他说服张作霖。该领事甚至这样声称，谢苗诺夫为俄国的“拿破仑”。张作霖明显地感到这里有某种危险，坚决不同意。于

1 后来某些日本重要的军国主义者说：由于德国打败了，日本所输掉的不比德国少，日本政府最大的错误是 1918 年未出兵帮助德国。

是俄国的“拿破仑”在1919年10月初企图在事实上(de facto)占领铁路,并伪称“绕道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把部队开进海拉尔、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中国司令部坚决要求谢苗诺夫立即把部队撤走¹。

因为“布尔什维克危险”的临近,日本军阀在1920年初再一次企图占领中东铁路。现在当地的俄国将军们和铁路管理人员都赞许日本人占领铁路,因为他们想到布尔什维克会威胁他们的私宅而无限恐惧。以史蒂文斯(他阻止完全把铁路器材转移到另外地方去)为首的美国人已被列入“布尔什维克化的”一类,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日本的保护是唯一的救星。得到霍尔瓦特和其他人的同意,日军开进了满洲里、海拉尔、哈尔滨和博克图,受到中国行政当局和军队的坚决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协助他们抵抗。在海拉尔的武装冲突中甚至打死了很多人²。如果日本人继续固执下196去,会引起国际上很大的麻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所不希望的,因而不得不容忍这次企图的失败。

史蒂文斯一方面警惕地注视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同时不放过使日本的意图和利益遭受损害的机会。“盟国之间委员会”技术会议为了回答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于6月14日通过决议案,抗议日本军队在中东铁路租借地内对俄国人的横暴行为。这份抗议书送致日军司令部和驻北京各盟国大使,其中叙述日本军事当局对俄国人大量的残酷折磨和枪杀(当然是实际情况)事件。目的在于唤起社会舆论来反对日本人留驻中东铁路,并迫使他们尽快离开北满。

华盛顿会议以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翅膀已被斩断,而以史蒂文斯为首的“盟国之间委员会”却继续呆在中东铁路,对日本人说来,已显露出美国人借口“国际化”巩固其在北满地位的危險,而

1 《高尔察克反革命的末日》,中央档案馆,第109页,1919年,斯皮增的报告。

2 巴夫洛维奇:《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载《新东方》第2期,第55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唱的则完全是另一个调子。他们突然说，中东铁路是“纯粹俄国人的”铁路，把它归还给合法的“俄国政府”¹是理所当然的。

顺便提一下，成立“盟国之间委员会”之初分配控制范围时，外贝加尔铁路一部分和乌苏里铁路的一段划归美国，全部阿穆尔铁路、外贝加尔铁路一部分和大部分乌苏里铁路则划归日本。中东铁路形式上归中国保护²，而不论日本人或美国都对它垂涎三尺。日本军队已在中东铁路沿线驻扎，为了对抗起见，根据美军司令部的要求，规定在哈尔滨驻扎美国卫戍部队一千人。因为“盟国之间委员会”所在地规定为哈尔滨，所以美国在中东铁路上的影响从形式上看比日本的大得多。以史蒂文斯为首的“盟国之间委员会”高踞于哈尔滨一直延续到1922年10月底，即美军撤退后的一段很长时间。

美国资本的代表来到中东铁路后，头一个职责是建议以铁路
197 为担保的二千万美元的借款³，建议仍然吸收其他战胜国列强金融集团参加借款。这是实现美国多年计划——铁路“国际化”的第一步。凡是日本资本使用武力较多的地方，强大的美国垄断资本则靠美元活动。

虽然这次借款未成功，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美国资本的代表仍把对铁路的监督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此外，史蒂文斯为了“改善”铁路仍作了某些少量的投资，使美国后来能向铁路提出若干要求。中东铁路直接欠史蒂文斯所领导的“盟国之间委员会”的债款共约四百五十万卢布⁴；此外，供应者和承包人欠款几百万。如果一方面旧俄国行政管理人员掠夺铁路，那末，“盟国之间委员

1 参看河上：同前书，第249页等。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1卷，第83—84页。

3 霍多罗夫：《中东铁路》，载《国际生活》，1924年第1期，第22页。

4 奥扎尔宁：《北满和中东铁路》，载《新东方》，第3期，第317页。

会”则力图使铁路丧失独立存在的可能，使它破产，以便从经济上更易于占领铁路。例如，把“盟国之间委员会”所供给的一切陈旧设备算作铁路的欠债，则该委员会认为铁路给盟国运送武装干涉军队则不应该付钱。盟国所欠这项运费的债务达一千二百万卢布¹，直到今天武装干涉者还欠着这笔债。

美国工业品输入满洲获得很大的成就，在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增加的输入，特别在武装干涉期间更加扩大了，当时一部分美国商品经过哈尔滨流入西伯利亚。

至于在北满巩固自己的经济影响，日本资本使所有的竞争者远远落在自己后面，这是当然的。

输入数字在这里不足为据，因为大量日货转运到俄国远东、西伯利亚和蒙古；日货在北满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是很明显的，但没有数字。1919年春，仅在哈尔滨和道外计有日本大小工商企业一百一十家以上²。因为卢布的破产和西伯利亚各种纸币以及霍尔瓦特发行的货币贬值，很多遭到破产的俄国企业转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手中，或变为在日本旗帜之下的俄日合营企业。同时其他列强也有类似这种“收获”。一部分俄国企业不愿丧失治外法权的特权（1920年9月中国大总统指令废止俄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转为悬挂美国、法国和英国旗帜的企业。但是如果这些企业依然挂着别国旗帜而实质上仍是俄国人的话，那末，日俄合营企业则由于日本资本的经济力量雄厚和协助其在北满新生幼芽的特别政策而迅速转变为纯日本的企业。日本资本的加强和俄国私人企业的转移到日本人（以及转移到中国人）的过程在世界危机期间特别加速了，世界危机在1921—1922年也非常严重地波及到了北满。很多

1 准确数字是一千一百九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三卢布，参看《1916年11月1日至1924年10月1日中东铁路关于运务总额资料》。

2 《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公报》，1919年，第81—90页。

不动产和地段变成了日本人的财产或受日本人的监督，主要是由于日本东拓(东洋拓殖公司)不动产借贷银行在这里大肆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奴才——俄国白匪军在肉体上感受到奴才的地位。

当白匪军不能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特别鄙视他们。所有白匪帮和反革命政府在远东被消灭和被逐出苏维埃国境以后，他们必须住在集中营里。“常常听到日本宪兵揍了某某中尉，揍了某某准尉”，武装干涉者的奴才们在他们的报纸上这样诉苦¹。同时根据英国远征部队司令官瓦尔德证明，在武装干涉之初“高尚的”反革命军官们顺从地挨日本士兵和宪兵的耳光，所以对瓦尔德来说这并不是初见。

中国人看到过去有无限权力的主人已软弱无能，也急忙对北满俄国居民发泄对俄帝国主义所积下的仇恨。遗憾的是，铁路租借地内毫无罪过的俄国工人居民也同白匪一样受到中国人的暴虐，他们很久以前就居住在这里，在铁路上或其他企业里工作。

1920年9月，在哈尔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列举了中国警察和军阀对俄国人，主要是对中东铁路上的低级职员和工人的暴行达五百件之多²。

一部分是受日本人的教唆，一部分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有时得到了中东铁路的奴颜婢膝的白匪行政人员的同意，中国行政当局在上述1917年12月12日(公历25日)攻击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俄国义勇队以后，废除了俄帝国主义所享有的特权和权利。在这里可以指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1920年3月，中国护路队代替了中东铁路的俄国护路队；9月末，北京政府拒绝承认前沙皇政府的大使和领事，并宣布废止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享有的治

1 基尔日茨：《在中国的大门口》，莫斯科，1924年，第17页。

2 河上：同前书，第250页。

外法权；1920年10月，同俄亚银行谈判的结果，中东铁路理事会进行改组，中国政府任命理事会半数（五名）理事，半数职员必须由中国人替换，而最高监督权属于中国政府。此外，还对中国人作了其他一系列的让步。

如果北京政府在1920年9月终于完成了它应该在1917年11月完成的对沙皇政府代表的那个行动，那末，同俄亚银行签订的合同是中国政府完全不合法的步骤，因为该银行对中东铁路绝对没有任何权利，更不能作为契约当事人之一方。因为法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压力（它们绝对不愿意中东铁路有苏维埃俄国的代表），又因为这些骗子们必须拿那些利益和让步去交换承认他们有主人的权利，所以中国政府才同意和俄亚银行达成协议。

同时，自1918年初第一个霍尔瓦特反革命政府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到1922年滨海省远东反革命政府末日止，中国，主要是北满、中东铁路地区是形形色色的白匪军的最近根据地。在这里组织武装部队进入俄国境内以后，从这里得到给养，红军把他们击溃以后，往这里逃命。

北满实际上还在更早一些，即工农政权在俄国存在之日起就是白匪的根据地，直到今天仍然是这种根据地。日本走狗谢苗诺夫在十月革命后不久，1917年12月就在满洲里地区开始自己的活动。他成功地完成了首次登台的血腥表演，袭击从哈尔滨遣送到这里的被中国人解除武装的、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民兵¹，其中很多人被谢苗诺夫的爪牙枪杀了。

白匪军能这样长久地和广泛地利用中国领土和前中东铁路租借地作为庇护所，是因为北京封建军阀政府和满洲当地半封建主 200 已成了帝国主义政府手中的傀儡。这些帝国主义政府尽管它们之间互相敌视，但在帮助反革命分子和同苏维埃政府作斗争上基本

¹ 《中东铁路沿革史》，哈尔滨，1923年，第554—555页。

是一致的。中国封建主和官僚们不会对苏维埃政权抱任何同情，虽然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俄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密约，并放弃了根据这些条约在亚洲国家，其中也有中国，获得的权利，这是自然的。虽然1919年6月发表了专门对华宣言，当时高尔察克被击溃后红军已越过了乌拉尔，中国中央政府和满洲政府认为自己不宣战而与苏维埃政府处于交战状态。如在上面已经讲过的，日华关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合作换文以后，1918年5月19日，又签订了陆海军事专门协定，使日军开进中国领土合法化。根据这项协定，中国武装力量事实上交给了日本军国主义指挥¹。9月间，另签订一项协定作为补充，规定中国军队在外贝加尔和阿穆尔省的作战“将归日本军官指挥”²。同时，如我们所看到的，仅在1918年一年内，日本供给北京政府的武器，价值达五千万日圆以上。

诚然，中国军队是太弱了，根本不能严格地参加任何武装干涉，而且日本人也不希望中国军队真正参加，他们要得到的，主要是使中国武装力量从属于自己和使自己的军队驻扎在中国北方地区合法化。中国封建军阀集团，特别是满洲集团，也和其他武装干涉者一样，仍然享有力所能及的实际参加武装干涉的光荣和被红军打败的荣幸。

当然，如果北京和奉天这种滑稽剧式的“政府”甚至想实行另一种政策，它们也无力做到，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于帝国主义指挥者的意志。中国对帝国主义者指挥棒的依赖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袁世凯死后所发生的“中央”政府的迭次更换中。

虽然推翻袁世凯以后北京历次政治变动在满洲都产生很强烈的反映，但这里无法详细研究这些事变。我们只指出一点，即日本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411—1412页。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1413页。

帝国主义在封建官僚集团的更换中起着头等的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者奉行“分而治之”的原则，不同时间、不同程度地支持中央政府，有时组织某种运动反对现存的中央政府，有时又同时向几个派系(开始时同帝制复辟派，最后同封建官僚与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联盟)表示自己的好意。 201

在这一点上应一下子断然驳倒某时候流行的一种意见，认为某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始终支持中国某一个派系，而这个派系也是该国帝国主义者的始终如一的忠实走狗。这种情况既与帝国主义的本质完全不相符合，也与象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国家中封建官僚、优柔寡断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集团的本质完全不相符合。

希望把大部分中国，或是整个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日本帝国主义，一般不考虑巩固某一个派系，建立某个稳定的中央政府。这样的政府纵然是在日本人帮助之下取得政权的，但它越感到自己稳固，就对主人越不恭顺。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利益曾支持内乱，力图使中国更分裂，更软弱。甚至在北京存在恭顺的政府时，日本帝国主义为防万一准备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而在或多或少程度上支持一个或数个反对派系。这样它给自己再保了险，如果不依它的意志，政权转到任何反对派系手中也不要紧，这样也保持了国内不稳定的局面。

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和军阀阶层以及优柔寡断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完全不愿意绝对忠实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物质的需要”不论在野或当政时，这些派系都向所有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得到借款(这些借款大部分落入个人私囊了)，并准备随时为当时的最大利益而卖身投靠。这些派系中的很多派系不同程度地同时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有联系，并受到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或多或少的支持。

最后，所有这些派系无论如何必须重视还不充分的但在不断

增长的民族意识的力量，必须重视当时在形成中的比较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刚开始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被剥削到极限的农民对某些一时篡夺者的集团予以压力。所有这些迫使这些集团在对帝国主义者的要求作让步时遵守某种界限，迫使它们那怕在对外礼节上也要维持原则，有时对过分奴役性的借款和最不能容许的租让权等等予以否决。

为了说明上面提到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当然也在满洲的政策各种情况(直到现在这些情况仍然有效)，我们从这一政策的开始时期引证与满洲紧密相关的若干例子。

南京巡阅使张勋于 1917 年 6 月着手复辟清朝的企图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极密切的关系，这已不是秘密。实际的情况是：从清朝被推翻最初时期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就支持、甚至策动复辟运动，而同时它又与当政的封建官僚集团具有密切的联系。1913 年初，奉天督军张锡銓向北京政府报告：满洲保皇党总部设在大连和青岛，受日本人保护。制定反对民国暴乱计划的首脑人员是日本人。如果暴乱开始，“所需武器和军需均由日本人供给，条件是将满洲矿产资源开采权让与日本人”¹。

看来，1916 年日本人在袁世凯对日本帝国主义那样恭顺的“帝国”政府下面立即埋了两颗地雷。日本当局和金融家对满清复辟运动的支持仍坚定不移，从大连、从日本刺刀围墙那边，通过满清肃亲王仍旧把线索牵到中国各地，牵到封建主和官僚张勋、倪嗣冲、蒙古王公和其他同情满清王朝复辟的人们那里。

但是在 1916 年初，“辽东护国军司令部”也设在大连，“护国军”司令邵昭忠(译音)向外国领事分发正式通知，说明他反对袁世凯的拟议中的行动。日本人供给该“司令部”武器和炸弹。该司令部人员在 1916 年初鼓吹东蒙在日本人帮助下宣布自治——脱离

1 参看案卷第 216 号，1913 年 2 月 20 日(公历 3 月 5 日)报告副本。

袁世凯政府，并许诺如果暴乱开始，就供给他们日本武器¹。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来说，东蒙在什么口号下宣布自治，“脱离北京”，反正都一样，只要脱离了就行。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就²⁰³可以在东蒙开始行动，就象它在朝鲜所行动的那样。

日本人在这方面一只手通过共和派革命家，而另一只手通过保皇复辟派。横滨正金银行通过复辟派哲里木盟王公许诺供给一百万日圆，其中五十万日圆购买武器，如果他们赞同自治并恢复清朝的话。给钱当然不能没有专门的保证，东蒙的矿产地就是这种保证²。贫困的封建上层不能不为这笔巨款所吸引，尤其这笔巨款还预示着无限美好的前景。封建主们赞同自治行动，肃亲王专程从大连到哲里木盟以后（恰好是袁世凯被推翻的时候），蒙古人开始闯入满洲中国各县境内。由于在北京恢复了民国，日本帝国主义在东蒙的“共和派”一只手就停止活动了，但更积极地运用复辟派另一只手。而且这对日本是比较有利的，因为除了其余的一切以外，对巩固日本在满洲和在整个中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意义，保皇派比任何人更慷慨地答应各种各样的要求和义务。毫无疑义，复辟派张勋向日本政府代表承担了最大的义务，特别是关于满洲的最大的义务。他在1917年8月扶持娃娃“皇帝”溥仪重登帝位一星期。北京政变后，张勋在给奉天督军张作霖的信中写道：“日本政府表示同意清朝复辟并答应予以支持……奉天省处在特殊的地位，日本的利益必须加以保护，不得有一点损失。”³张作霖打电报问张勋，这个“特殊地位”应该是怎样的方式？“日本人的帮助是通过在满洲的让步而得到的，直至满洲服从日本警察”⁴，是否都是真的（这里所说的显然是关于南满和东蒙）牺牲满洲来恢复清

1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6年5月9日（公历22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2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6年5月24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3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7年6月21日和7月7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4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7年6月21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朝,无疑是使张作霖的复辟热心冷淡下来的原因之一,在这以前他一般是倒向清朝的。在南满和东蒙建立日本正式的保护关系使张作霖个人幸福有受到破坏的危险,而且与其个人的自尊心相违背。

日本报纸公开讨论的日本当局的措施和计划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复辟清朝政变成功,首先在南满建立正式的保护关系,²⁰⁴这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议事日程中。

奉天日本人出版的《盛京时报》(华文)恰恰在积极准备复辟期间(6月4日)报道关于不久将来成立“朝鲜满洲联合管理局”的消息。联合管理必须集中在关东都督手中。根据计划所有日本驻满洲领事都受他指挥(通常受外务省管辖),都督府下设专门的处以管理朝鲜满洲联运铁路网;日本驻满洲的领事警察由宪兵队替换,如在朝鲜那样等等。紧跟奉天《盛京时报》之后,关东都督半官方报纸《满洲每日新闻》(6月18日,6月22日等期)刊登很多文章以同一精神讨论该计划。同时满洲日本当局提出正式要求在日本臣民(其中包括朝鲜人)居住的地方派驻日本警察或部队,以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也向北京提出了这一要求¹。日本也要求给予日本和朝鲜移民土地;在东蒙日本进行大规模的地形侦察;突然浪潮般地向满洲涌入大量日本和朝鲜移民,他们不仅占用官家荒地,连中国农民的耕地也占用,旁若无人并挑起冲突²。

此外,要求北京政府在南满聘请日本顾问和满洲中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教官。北京对此答复说,奉天已有一名日本军事顾问,而军事学校一般不打算聘请外国人³。

同时日本政府提出要求给予建筑洮南——库伦铁路的权利⁴。

以朝鲜、南满和东蒙联合管理局的形式对南满的保护关系,并

1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349—1351页。

2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7年6月7日(公历20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348—1349页。

4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7年6月14日(公历27日)报告。

不是出人意外之举。大概在 1916 年俄日协定签订后不久,《满洲每日新闻》发表了文章,叙说朝鲜总督寺内的意见,他主张必须把这三个地区联合在统一的日本地方长官权力之下,并积极开展日本“东洋拓殖公司”(东拓)组织的把日本人、朝鲜人移住满洲和东蒙的活动¹。 205

因为一系列不利的因素,其中包括日本无产阶级和大部分资产阶级阶层的强烈反对,“联合管理局”的计划有时仅仅部分地实现,而且是经过改变、打了折扣的形式实现的。1917 年 6 月 30 日天皇诏令,朝鲜铁路受南满铁路管理²。南满日本领事馆归关东都督管辖仅在 1919 年 4 月才实行,同时关东都督府也进行了某些改组。都督改为关东厅长官,非军事人员也可出任长官。长官由日皇任命并对内阁总理大臣负责,关于外交事务则对外务大臣负责。关东厅设外事处,处长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兼任。驻南满其他日本领事同时均为外事处秘书官,通过奉天总领事馆而受关东厅长官管辖³。南满铁路和满洲日本铁路事业一般均置于关东厅长官的监督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加以积极干预之后,在这一改组期间明显地看到,在最近时期对南满的保护关系计划业已告吹,而且越往后,日本帝国主义受到敌对方面的压力就越大。日本政府急于实行这富有引诱性的计划,哪怕只实行一部分,哪怕是以残缺不全但多少还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来实现它。在这一时期内除了日本领事警察和南满铁路“护路队”,即除日本正规军外,在南满还引进了日本宪兵队。

1916 年,特别是 1917 年和 1918 年以及 1919 年上半年,因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在中国本身存在着有利的情况,是日本帝国主

1 《满洲每日新闻》,1916 年,7 月 20 日(公历 8 月 2 日)。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 1 卷,第 563 页。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 1 卷,第 569—570 页,后来这部分已全部重新改写。

义在满洲、在全中国和远东取得政治上最大成就的时期。

还在 1916 年（恰恰是寺内公布其计划的时期）蒙古人开始行动，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多么露骨和无耻地认为这个时候可以行动了。索伦地区中国军队司令吴俊升向张作霖报告他同敌人作战和打败敌人的经过时指出，蒙古人是由日本武器武装的¹。

206

张作霖给北京政府的报告，极明显地描写日本人直接参加 1916 年蒙古独立运动的情况，他写道：“蒙古匪徒侵入梨树、怀德、昌图等县……日本人全力支持他们并予以保护……每当我军进攻他们并开始占优势时，日本护路队司令便加以干涉，并借口军事行动给铁路带来损失，子弹飞到铁路沿线村庄和日本侨民住房，要求停止战斗……这几天该司令命令我军全部撤离上述各县……在梨树县城升起了日本旗。”²

在郑家屯事情闹到中日武装部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7 月 31 日—8 月 13 日），而且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³。

虽然日本人多方协助，蒙古部队仍然被击败了，这时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菊地中校便亲自出马迫使接受同蒙古人“协定”条件：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蒙古人在七至十天内安全撤退到自己境内⁴。

如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就此对蒙古人的冒险行为罢手了，那是想得太天真了。1916 年末，张作相向张作霖报告，向洮南行进的四千蒙古部队中，约有五十名日本指挥官⁵。

日本帝国主义的玩弄张作霖本人是值得注意的。1916 年 4

1 参看案卷第 244 号，1917 年 7 月 14 日（公历 27 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2 参看案卷第 244 号，1916 年 8 月 12 日（公历 25 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3 关于这次冲突详细情形，参看《美国对外关系》，1908 年，第 241 页，美国公使莱因什和美国驻奉天领事的报告。他们报道关于蒙古自治运动和日本参与这一运动，基本上同俄国总领事的报告一样。

4 参看案卷第 241 号，1916 年 8 月 13 日（公历 26 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5 参看案卷第 241 号，1916 年 12 月 14 日（公历 27 日）的报告。

月,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督军兼巡按使以后,对日本帝国的代表们未立即表示足够的恭顺。除了金融上的压力——日本银行要求将该行所有当地纸币兑换为白银,以期挤垮省银行以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也开始运用谋杀的方法。张作霖就任督军后大约一个月曾两次谋杀张作霖未遂,在投掷炸弹犯中国人身上发现有日本领事馆出入证,另外又获得日本特务参加这次事件的证据¹。

在谋杀事件后,张作霖在两种影响压力下对日本帝国主义顺从地低下了头,并同意朝鲜银行提出的一百万日圆的借款(年息 $6\frac{1}{2}\%$,为期两年)以奉天发电站、中国电话、外国租让权租金收入为保证。几乎在获得借款的同时,张作霖在其军官会议上明确表示赞成恢复清朝²。日本银行停止了金融上的压力,现在张作霖在日本卵翼下平安无事地继续统治奉天省。但是张作霖最终并未成为日本人的百分之百的恭顺的仆从。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中国的社会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个人沽名钓誉的意图——所有这一切促使张作霖及其半封建集团力求执行往往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的差别极大的路线和政策。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其以后官运亨通的生涯中真象在无底深渊上保持着平衡踩软索。1928年6月,张作霖摔下来了……

*

*

*

以段祺瑞为头子的封建军阀和老官僚的安福系自1917年8月(推翻了张勋扶持的短命皇帝之后)到1920年8月当政时期处在日本的影响之下。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国最强有力的因素,任何封建军阀派系想当官发财,不能不顺从东京的意志。但

1 参看案卷第241号,1916年5月20日(公历6月2日)的报告,张作霖在日本炸弹爆炸声中开始其官运,而于1928年在日本铁路旱桥下日本地雷雷鸣般的轰隆声中结束了官运。

2 参看案卷第244号,1916年6月2日奉天领事的报告。

是当时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集团和小资产阶级、正形成的自觉的无产阶级、千百万农民大众的压力当然控制着安福系政府，正象控制袁世凯政府一样，不容许完全迁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也在阻挠日本的意图。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顾白匪军的包围和帝国主义的封锁，这时也施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影响。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安福系有时因不满而反对日本人，正如张作霖有时因不满而反对日本人一样，而主人有时对执拗的亲信也不少生气。北京代表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众所周知，凡尔赛条约规定把山东割让给日本），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愤怒。但是在安福系统治北京的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成就仍是不小的。

208 以下的主要“成就”说明日本资本在满洲的经济地位的巩固和扩大。1917年，为吉林-长春铁路及其转归南满铁路管理（见前）签订的借款。其次，北京政府同三家日本银行集团签订关于预定建筑吉林-会宁铁路的“初步合同”。集团的成员工业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获得了（1918年6月18日）拨款和参加建筑这条铁路的权利。根据初步合同约定，立即付给北京政府一千万墨西哥银元¹而且已照办了。

稍迟（1918年9月28日）与同一银行集团签订了对以下四条铁路拨款权的初步合同（部分地发展了1913年关于五条铁路的协定）：洮南—热河、长春—洮南、吉林—开原和“从洮南—热河铁路某一站至某一港口的”铁路。借款总额必须随后明确规定。设计的铁路本身及其收入应为借款的担保。借款期限为四十年，年息8%。当时北京政府得到建筑这几条铁路的预付款为二

¹ 年息7½%。参看马克·穆拉所引的条约原文，同前书，第2卷，第1430—1431页。

千万日圆¹。

因为这两笔借款的预付款没有任何担保，其用途也没有明确规定。安福系集团利用这两笔预付款作为巩固自己政权之用，而且大部分落入私囊。这三千万日圆属于“西原借款”（即借款给段祺瑞的臭名昭著的那个西原。——译者），或者更正确地说，“西原贿赂”。

日本帝国主义也力图使“合办”企业摆脱中国资本残余及其本来就不大的影响，并尽量加强在金融上奴役奉天省行政当局。朝鲜银行贷给奉天省政府的三百万日圆的借款（1918年4月22日），以本溪湖煤矿公司中国股金为担保²。

更大的一笔三千万日圆借款由参加上述银行辛迪加的汇兑银行在1918年8月贷给北京安福系政府，用以“发展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林业和金矿”。借款期限为十年，期满后有权延期，年息 $7\frac{1}{2}\%$ ，担保品是上述两省国有森林和金矿以及中国政府由该两省 209 林业和采金业的收入。提出的条件：中国政府今后不得为此目的要求借款，未经日本银行辛迪加同意不得处理这些担保品³。在补充约定中，日本银行辛迪加并不掩饰借款实际上是支持安福系政府的国家财政⁴，即支持对南方进行战争。

看来，日本资本通过这次借款而一举数得：它帮助顺从的安福系封建军阀集团反对南方的革命者，并巩固了自己对北京政府的财政领导权；独占北满森林和金砂矿床以及大大地巩固了自己在整个这一地区的经济统治地位。日本银行辛迪加代表在关于组织合办企业协定的补充说明中，对“准许所有的人”来开采森林和矿

1 参看马克·穆拉所引的条约原文，同前书，第2卷，第1448—1449页。

2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416—1417页。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431—1438页。

4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2卷，第1439页。

产的夸夸其谈，不过是预防美国和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抗议的一句空话。恰好在这个时候，美国紧跟这次借款成立之后建议组织四国新银行团。

日本这次借款也属于西原式的贿赂借款；既无须偿还借款，也不要付利息。当然，日本资本关于这次借款问题，如同对其他的西原式的借款一样，经常得到相应的“承认”和调整。除此而外，日本资本是从来不吃亏的。虽然中国当局并未承认协定规定森林和金砂矿床为借款的担保品，日本人根据借款完全侵占这些自然资源也未实现，但日本资本却千方百计地获得部分开采北满森林和采金业，参加和实际占有很多森林租让地。其中一个森林租让地，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即所谓的“扎免租让地”，它恰好位于中东铁路穿越兴安岭的地区，把著名的兴安隧道也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有几个日本森林租让地位于中东铁路东线（海林河和牡丹江流域）；此外，日本资本参加（有时是事实上的主人）以中国企业家名义的某些租让地。

210 给予安福系贿赂借款的清单远不限于这些。我们所涉及的只是有关满洲的借款。仅在1918年一年中，日本银行和大垄断组织康采恩就贷给中国这类性质的八笔借款，总数达一亿二千万日圆。以“借款”形式资助安福系在1919年和1920年仍继续着，也采取直接贿赂个人的形式。例如，1920年，日本三菱送给中国驻东京使馆武官数万日圆以弥补开支¹。

日本的“贿赂”活动仍然以1918年为最积极——日本同时供给北京政府大量武器，而这些借款的一部分也预定作支付武器价款之用。上述一系列借款协定签订的同时，中国武装部队事实上已处于受日本指挥的地位。这些贿赂借款伴随而来的是部分地满足了日本在全中国，特别是在满洲的政治和经济性质的特权的

1 《中国年鉴》，1928年，《外债》，第611页。

强求。

自提出二十一条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和全中国的极为紧张的活动，当然不能不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密切的注意。美国资本特别不安和愤怒地注视日本的行动。华盛顿政府虽然签了蓝辛-石井协定使其太平洋境界多少有了保障，同时再度得到日本的正式承担遵守“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等义务，但看到日本人千百次破坏美国资本的各种各样“权利”的事实，对此又不放心。美帝国主义开始行动起来了，在俄国远东和在北满——中东铁路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阻止日本人在南满和在整个中国计划的实现。美国压力的推动力仍然是为了银行团对中国提供借款的计划。

根据美国在 1918 年提出的第一个计划，银行团不仅必须垄断未来的一切借款，而且必须把过去的中国政府的借款（不论是行政管理上的借款或是工业企业的借款）转为银行团管理。应该指出，7 月间¹，即在美国开始准备积极参加西伯利亚武装干涉的同时，美国政府就银行团问题首次正式向其他政府发出通告。

如果说，在 1909 年美国人提出了“满洲”铁路“国际化”的计划，那末，现在美国人所提出的“国际化”的计划则已是“全中国”、²¹¹ 中国的全部铁路和最大工业企业。因为十年前日本和俄国从“公共”流通中只提出一个满洲给自己专门享用，而现在日本则企图“提出”整个中国。但是当美国金融资本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强大的现在，采纳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比任何时候更加美国化，更使中国从属于美国资本。这个计划旨在直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是自然而然的事。在 1918 年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感到自己是在远东处于唯一当家作主的地位，他们对美国的计划只是加以嘲弄，在

1 参看《中国年鉴、新财团、正式文件》，1921 年，第 327 页。1918 年 10 月 8 日备忘录。最初参加银行团的美国财力最雄厚的银行达四十家，它们实际上控制着美国全部金融资本。

他们怠工的情况下，银行团的计划当时连一步也不能前进。世界大战的告终，使这个问题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19年，在美国压力下，在英法的积极支持下（英法对日本在中国的独占地位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开始了关于成立银行团问题的实际讨论。但是英国、法国、日本资本的一部分利益是相合的，因此美国不得不立即作出很大的让步。法国和英国资本家，特别是后者在中国已设立了各种企业，决不愿丧失独立经营自己开办的企业的机会，美国银行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同意将即将竣工或已经经营的所有工业企业¹不属于银行团的管理范围。

但这种形式的银行团也是相当尖锐地对抗日本的，因为正是日本从中国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权利，这些权利当时尚未开始实现，而中国本身也千方百计在阻止其实现。日本在满洲和蒙古得到的这些“权利”特别多，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打算让出这些权利。日本银行集团代表小田切对日本关于这一方面的要求明确表示：从合伙经营协定中必须除去满洲和蒙古地区属于日本所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买卖，因为“在满蒙日本有特殊利益”²。小田切还引证蓝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一定”地区有“特殊利益”。这里立即反映了各方面对协定完全不同的理解。以蓝辛
212 本人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未考虑承认日本资本在满洲比其他国家资本有任何具体的特权。美国，然后是英国都坚决抗议日本对“特权和利益范围”的要求，这种要求能排除银行团在南满的活动。

美国金融集团代表拉蒙特甚至说：“根据我们的意见，特殊利益从来绝不是指经济问题。”按照他的说法，蒙古和满洲“是中国的重要部分，要把它们从银行团的活动范围内排除出去的任何企

1 银行集团代表们于1919年在伦敦的五月会议上通过了这一决议案（《中国年鉴》，1921年，《新财团》，第330—331页，《银行家会议的决议》）。

2 同上，第331—332页。1919年6月18日小田切致拉蒙特的信。

图是不允许的”¹。受英国政府支持的美国政府本身反对日本的要求是如此的坚决。

显然,日本帝国主义在 1917 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希望在将来迫使美国接受它自己对蓝辛-石井协定中“特殊利益”一词所作的解释。当美国政府在 1920 年 3 月根据蓝辛-石井协定否决日本资本在南满的特权时,日本政府不仅不对该协定提出其他的解释,反而“收回了”自己关于从银行团活动范围内除去南满和东蒙的要求。

1920 年 1 月,列宁在关于银行团谈判紧张时说道:“日本在西伯利亚驻有比我们强大的军队,但它不能同我们作战,它怕美国进攻,它们两国在争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上仇恨很深。”²

稍迟,列宁再次特别着重指出,日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日美战争的不可避免。1920 年 5 月(应为 3 月。——译者)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正掀起一场大争吵。美国和日本眼看就要厮杀起来,因为日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按兵不动,却几乎全部攫取了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帝国主义者老爷说:‘我们为共和而战,我们为民主而战,可是为什么日本人从我们鼻子下面窃取了许多不该它得的东西呢?’日本和美国正处于交战的前夜,要想制止这个又要使一千万人死亡和二千万人残废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³

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之间和银行集团之间关于银行团进一步的谈判、日本的退却和美国收缩自己的攻势,使美国代表拉蒙特和日本代表贝原之间进行交换函件(1920 年 5 月 11 日)。²¹³

1 《新财团》,同前书,第 332—333 页。1919 年 6 月 25 日小田切致拉蒙特的信。

2 《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72 页。

3 同上,第 360 页。

拉蒙特同意从银行团的活动范围中除去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和所属企业,也除去已建成和计划建筑的铁路:吉林-会宁铁路、四平街-郑家屯-洮南铁路、长春-洮南铁路、开原-吉林铁路、吉林-长春和新民府-奉天铁路¹。这就是美国财政大王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十分巨大的所有让步。其余不仅北满和外蒙(日本政府用大量备忘录才获得承认北满和外蒙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连南满和内蒙东部都列入银行团的活动范围之内。

至于洮南-热河铁路和在这条铁路线上某一站同某一海港连接的铁路,在就此交换函件中强调这两条铁路都在银行团管理范围之内。未提到日本在南满有任何“特殊”利益。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只好满足于而且还是极不明确的、英美政府任意所作保证性表示的解释,即银行团无意破坏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切身利益”²。

此外,日本政府仍认为,日本资本对于以南满各省收入为担保的借款保有特权,并阐明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对此曾作了一般性广义的保证性表示。

关于银行团最终合同只是在1920年10月15日才由各方签字。以前对日本在建筑一定铁路的权利所作的保留条款未列入合同,但是实质上这些保留条款当然依然有效。合同规定对其活动表明有“重大进步”的工业企业的旧借款可以不列入银行团活动范围之内。合同有效期限规定为五年³。参加银行团美国集团管理委员会的美国银行计有:库恩·洛伯公司、摩根银行、花旗银行、保证信托公司、大通银行、里·希金逊公司、大陆商业信托公司,此外还有美国十一个城市的五十家大银行⁴。这一点已说明,如果银行

1 参看拉蒙特的原信,《中国年鉴》,1921年,《新财团》,第355页。

2 同上,第351和356页,1920年4月29日和5月17日美国和英国的照会。

3 参看《中国年鉴》,1921年,第357—360页。

4 《中国年鉴》,1928年,第651—652页。

团开展自己的活动，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经济干涉的规模能有多大 214
大。参加日本集团的计有十七家大银行，参加英国集团的计有七家，参加法国集团的计有九家。

对于现阶段的特点是，英国完全彻底支持美国对日本的攻击。在关于银行团谈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是，此时英日同盟事实上已不存在了。英国资产阶级对日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中国侵占太多。日本公开提出对整个中国的要求，不仅造成了清除英国在华利益的直接威胁，也开始威胁英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殖民地。此外，在战后最近时期英国比任何其他时候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愿望。在对英日同盟关系上美国的愿望是非常明确的。所有这一切使英日同盟事实上失效了。以后华盛顿会议才正式使英日同盟终止。

新的四国银行团跟过去的银行团一样是无能力的。不仅因为中国封建军阀政府难以接受银行团经济上的完全奴役（北京政府已拒绝银行团向它提出的建议），还因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内部矛盾，特别是日本资本方面的怠工。银行团的活动开展对日本资本收益极少。中国政府的反抗银行团的苛求，显然不无日本帝国主义方面的教唆。银行团仍单独执行美国垄断资本的任务。银行团使日本帝国主义“知道本分”，并给它指出在力量对比之下所应遵守的界限，在越过这种界限的时候可能出现美国资本方面的特别反应。这也就是英法参加银行团组织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既已解决，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家也就不再对银行团抱同情了。

由于美帝国主义压力的结果，在英法或多或少的支持下，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抑制了它对满洲和整个远东的野心。但是从美国资本的观点来说，日本野心的抑制还远远不够，日本从对其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期间实际上所占领的阵地上退却得还远远不够，也

就是说它所占领的阵地 in 帝国主义现时实际力量对比之下太突出了。

215 华盛顿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强迫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缩小自己的扩张计划，并逼迫它还要从俄国远东、整个中国、特别是从满洲退出某些阵地¹。

的确，在 1921 年 9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垄断资本虽然只完成了其远东问题计划的一部分，但却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和十分重要的“战略上”的退却。

美国人达到其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利用中国代表团本身（吴佩孚的拥护者在北京已代替了安福系）。在美国“顾问”蓝辛本人、托马斯·米拉尔德和甚至过去极亲日者莱因什大力参予下拟定了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备忘录，它主要是反对日本的利益，也部分反对在中国获得“特权”的其他有条约关系的列强²。

经过长久的倾轧和幕后讨价还价之后，华盛顿会议参与者们除了有关中国的一系列局部协定之外，还签署了“关于对中国的原则和政策的总条约”。该条约与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满洲有直接关系。有趣的是，该总条约中除了关于“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的不可侵犯”，关于支持“机会均等”等等使人极为厌烦的陈词以外，还有对这些概念加以明确的指示，特别是关于“机会均等”的指示。美国因为牢记着日本政府在 1914—1915 年对美国希望在南满铁路享有同等运价要求的拖延答复，而现在在总条约中列入一条，极详尽地指明，不得“根据乘客的国籍或根据乘客来自何国或往何国去；或根据货物的出产地或所属，或根据货物运自何国或运往何国；或根据上述乘客或货物在经中国铁路运送以

1 另一个任务是强迫欠美国百亿美元以上的西方列强缩减军费开支来偿还一部分债务。

2 河上：同前书，第 61 页。他的备忘录原文，第 67—68 页。

前或以后搭载的轮船或其他运输工具的国籍，以及根据运送轮船或其他运输工具的所有者的国籍”¹而降低各国在中国铁路上的同等权利。

华盛顿政府对东京在 1915 年给予日本轮船等优惠条件所表现的种种回避，记忆犹新。因而总条约中也详细规定，防止“寻求 216 能使友好国家公民权利遭受损失的任何特权和优惠”²。

这样，在缩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取得特权方面美国资本获胜了。众所周知，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资本迫使日本声明放弃山东，并在美国资本的压力下，曾在日本侵略满洲获得成功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的英日同盟也正式废除了，尽管这个同盟的存在近几年来确实已只是一纸空文了。

最后，日本代表币原在华盛顿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声明，日本准备把专门给予日本资本的“特殊买卖权”，即第一，有关建筑铁路的借款；第二，由这些地区税收³担保的借款均移交国际金融银行团。

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给予日本资本独占特殊买卖权”，还在组织银行团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并未予以承认。为了增大自己的“让步”数目，日本现在在形式上放弃了它们，这就应该意味着，日本今后不会在北京和奉天公然阻挠银行团对满洲铁路的贷款，或以各省收入为担保的借款。但是根据拉蒙特和贝原之间的交换函件，这一放弃并不涉及日本资本保有的铁路。

此外，币原声明关于放弃在南满有关聘请日本顾问和教官的“优先权”，并放弃关于 1915 年“稍迟谈判”有关二十一条第五部分的保留条款⁴。

美帝国主义仍然不能满足于此。尤兹回答说，听到这些让步，

1 《华盛顿会议》，莫斯科，1924 年，第 79 页。

2 《华盛顿会议》，总条约第三条。

3 《华盛顿会议》，第 103 页。

4 《华盛顿会议》，第 107 页。

“令人高兴”，但是又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仍坚持 1915 年的立场，即不承认 1915 年的日华协定，因为该协定破坏美国的条约权利¹。

²¹⁷ 尤兹着重指出，美国政府尤其不会承认日华协定第二、三、四条给予日本公民的特权（关于在满洲和内蒙东部租赁土地，从事各种行业等等），而根据中美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将认为这些权利也将自动适用于美国公民²。美国政府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这一点。尤兹还解释说，他将阐明日本放弃上述在南满的“特殊买卖权”，正如币原所声明的，不仅这一放弃对国际银行团有利，而且是整个的放弃，是不阻挠友好国家任何公民的义务，如果该公民愿意从事铁路建设或以满洲各省收入为担保提供借款。日本资本对银行团能作出这种“牺牲”，无疑是注意到国际银行团因为内部种种矛盾而无力作出稍微认真的实际活动。但作为银行团组织者的美国垄断资本曾暗示，它没有把任何希望寄托在银行团身上，而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同意越过银行团的任何关系而侵入满洲。

银行团在限制日本的野心方面已起了自己应起的作用，到华盛顿会议结束时对银行团已没有很大的需要了。

美帝国主义对于日本规避确定自俄国远东撤兵日期极为不满。1918 年的日华协定有效期限（该协定给予日本军国主义指挥中国武装部队和日本军队驻扎满洲等权利），更决定了日本规避确定自俄国远东撤兵的日期。军事协定的有效期原定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即驻扎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全部日军撤退时为止³。美帝国主义所施的压力在华盛顿会议及其以后仍有其影响，因而加速了日本撤兵。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未能达到使日本放弃 1915 年日华条约

1 《华盛顿会议》，第 103 页。

2 《华盛顿会议》，第 108 页。美国驻北京公使莱因什在 1915 年日华协定签字后，立即以同样精神向北京政府作了声明（《美国对外关系》，1917 年，第 285 页）。

3 马克·穆拉：同前书，第 2 卷，第 1214 页。

规定关东地区和南满铁路租借地租赁期限延长到九十九年的目的，虽然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暗中支持下提出了这一要求。受美国支持的中国代表团企图要求日本从南满、中东铁路地区（根据1918年军事协定驻扎在这里）撤走军队、警察、宪兵和自山东撤兵，撤走南满铁路地区内邮政局，撤走南满和关东地区日本无线电台，也都未能成功。后来日本军队从北满撤走了，但日本军队、警察和联络通讯机关却总是留在南满铁路租借地内。

必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所作的让步，不是轻易能落到美国垄断资本手中的，必须经过顽强和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极其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坚决意图是要达到废除日本根据二十一条要求所得到的其他成果和迫使它接受华盛顿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和满洲问题的建议，这就明显地使该会议有决裂的危险。华盛顿会议期间在北京发生了政变，是日本决心不再继续作出超过一定限度的让步和公然准备积极反抗的征兆之一。1921年12月18日，在张作霖的协助下成立了亲日的梁士诒政府。这非常明显，尽管有张作霖的支持，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完全亲日的政府不能支持很久，它的成立只会使中国广大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更加尖锐化。然而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这个时候命令其中国仆从采取断然的步骤，那末，这就证明万一发生武装冲突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恭顺的政府。

此外，北京亲日政府能以其存在的事实本身对在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团施以一定的“制约”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困难境况。

然而必须指出，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对日本进行了正确无误的玩弄。如后来查明的，美国政府弄清楚了东京同其在华盛顿的代表团所使用的密码，因此美国政府准确知道允许日本代表团“让步”到何种界限，到了这个界限一步也不让，华盛顿虽要求日本方

面让步,而并没冒任何风险。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东铁路问题在满洲问题中是一个稍微独特的问题。它是极复杂的、而且在远东帝国主义矛盾的总和中得不到任何解决的问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新因素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中东铁路问题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苏俄政府对于只涉及苏俄和中国的中东铁路问题的任何讨论提出正式抗议,并声明不承认可能通过的决议案,才制止了在华盛顿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国代表团也声明,中国打算只同对中东铁路有“历史”关系的俄国彻底商谈该铁路问题。所有这一切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通过决议不能没有影响。尤兹被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不想掌握中东铁路也无意取得对它的控制”¹。

远东问题委员会技术小组在它关于中东铁路的报告中也被迫明确声明,“实际上铁路是俄国政府的财产”²。

但是这些夸大其辞的宣言并不妨碍帝国主义者在那个会议上企图事实上占有该铁路,或者至少延长他们对铁路的控制。经过无休止的相互争吵之后,这个技术小组提出一种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国际金融委员会”代替史蒂文斯的盟国之间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金融委员会”为了供给铁路资金必须贷款,控制铁路的财政经济活动,为了护路成立特种宪兵队并加以指挥³。中东铁路事实上成了中国第一条“国际化”的铁路,显然以后将转为四国银行团管理。这就是美国资本的计划,虽然在小组里通过了,但不论日本或是法国都不喜欢这项计划。日本不喜欢,因为这是对满洲其他铁路不好的先例,因为把美国资本放进了北满,尽管以银行团成员的形式,但是对日本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法国不喜欢,因为在

1 《裁军会议》,1922年,华盛顿,第12—70页。

2 同上,第1376—1378页。

3 《华盛顿会议》,第99—100页。

当时由于“新的”法国的俄亚银行同北京政府签订了 1920 年协定的结果，法国对中东铁路有很大的影响。它的代理人奥斯特罗乌莫夫现任该铁路总办，法国还希望在现存的情况下增加其影响。

中国代表坚决反对所提出的计划。他们特别反对在中国领土内建立非中国的武装力量。主要一点是：中国代表团不能不看到，这项计划要把中东铁路送给国际金融豺狼们。出席华盛顿会议但未被正式承认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一再声明，苏俄政府“不承认”没有它参加所签订的任何有关中东铁路的协定，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因此“金融委员会”这一组织吹台了。华盛顿会议也未能使中东铁路的现状有任何变化。

帝国主义者承认自己完全没有能力相互间达成关于中东铁路的协议，他们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矛盾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为了表示哪怕某种“慈父般的”对中东铁路的关怀，华盛顿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必需“好好保护”、“慎重用人”和“节省开支”的决 220
议方案¹。此外，帝国主义政府保留权利，“坚决要求中国向股票、公债券外国持有者和中东铁路公司债权人对不履行基于合同²的义务而负责任”。法国银行家企图用这种手腕吓唬中国，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中国采取了有损于他们利益的任何步骤的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中东铁路的“债权人”。但是中国代表团对于这一决议案表示了反对。

华盛顿会议后，中东铁路在北满的状况未起变化。法国资本通过俄亚银行悄悄地向中东铁路靠拢，日本军国主义在中东铁路地区内驻有自己的军队，“以便同俄国境内的占领军保持联系”，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以美国垄断资本代理人史蒂文斯为头子高

1 《华盛顿会议》，第 100 页。

2 《华盛顿会议》，第 101 页。

坐在哈尔滨“技术委员会”内，该委员会当时领导中东铁路。帝国主义代表中的每个人都把中东铁路往自己家里拖，而在这个时候铁路已被破坏不堪，变成了南满铁路的一条专用线了。

如所周知，华盛顿会议“全体一致地”和非一致地所通过的大量决议案，都成了一纸空文，谁也不想去执行它们，每一方都竭力回避而自行其事。关于中东铁路的唯一的残缺不全的决议案，因为帝国主义者之间不能达成协议而丝毫不能实现。

史蒂文斯及其“盟国之间技术委员会”在哈尔滨呆到 1922 年 12 月 22 日，即日本军队撤离滨海省以后。事实证明盟国之间技术委员会没有任何必要留在中东铁路。但是在这以后，美国金融资本使中东铁路“国际化”的企图还未中止。在这一方面美国驻北京公使苏尔曼在英国支持下卖了不少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没有打瞌睡，企图通过自己的借款来巩固在中东铁路的地位。

1924 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苏奉（天）协定使所有这些努力暂时告一结束，这个条约和协定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时期第一阶段相巧合，也与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相巧合。

苏中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 和帝国主义者阴谋

221

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初期就希望通过驻彼得堡中国使馆同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双方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但是封建军阀集团安福系对待一切革命政府，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政府持敌对态度。北京安福系政府因已得到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的命令（由于英法的劝告这项命令更有力了），准备反对俄国的工农政权。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北京政府在1918年初就同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同盟达成了协议。因此苏维埃政府愿与中国建立正常相互关系的希望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这一希望在1918年3月¹完全被中国方面中断了。在日华协定签订后，驻彼得堡中国使馆完全随从日本大使馆的意志，并随同其他外国外交人员离开了苏维埃俄国国境，当时武装干涉已完全公开化了。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致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著名宣言（由加拉罕署名），是再一次尝试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保持接触。该宣言向中国建议根据完全平等的原则，在苏维埃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庚子赔款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并声明关于将在中国土地上，即在中东铁路地区内属于沙俄破坏中国主权的权利和特权归还中国的意愿²。

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独立性的政府，甚至封建农奴制政府也会

1 参看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宣言，载伊文：《中国与苏联》，国家出版社，1924年，第103—105页。

2 同上。

222 抓住无产阶级政权的这个建议不放，因为它是至今对待另一国人民完全不寻常的友好态度和爱好和平的表现。但是当政的安福系不仅对宣言默不作答，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宣言，继续同其主人联盟与苏维埃政权处于战争状态。

只在安福系集团被推翻(1920年8月)和“直系”封建军阀派系在北京夺得政权后，情况稍有改变。直系军阀起初感到自己对帝国主义者尚有某些自由，而主要想通过同苏维埃俄国的谈判，争取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层的同情和支持，而他们是坚决要求对苏维埃政府采取相应的步骤。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红军对武装干涉的胜利不能不产生影响。8月底，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到达北京；9月间，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团张斯廩将军抵达莫斯科。

然而为了能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当时的封建军阀派系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国际帝国主义实际上仍继续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和封锁。随着统治北京的派系的更换，他们的帝国主义主人也更换了。直系主要听命于英美帝国主义，在当时中国的某些问题上“合作的”。这些帝国主义者跟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十分坚决地反对中国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尤其是反对关于中东铁路的谈判)。法国银行家及其俄亚银行的白匪仆从担心发生一切不愉快事件的可能而急忙忙在这个时候(1920年10月2日)以非法的条约来“巩固”白匪在中东铁路的统治。北京政府装作准备与莫斯科谈判的姿态，以迫使骗子们更加听话。随后张斯廩将军被召回国，关于中国与苏俄的相互关系问题依然如旧，虽然苏维埃政府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了第二次宣言(1920年10月27日)。在宣言中确认并详细说明第一次宣言中所陈述的各项原则，同时再次建议，在遵守作为主权国家中国的一切权利下专门协商关于中东铁路的问题¹。尽

1 宣言全文见伊文：《中国与苏联》，第105—108页。

管这对于中国有明显的巨大利益，但苏维埃政府的建议遭到所有帝国主义者的抵抗所造成的似乎不可克服的“万里长城”般的障碍，中国同苏维埃政府的正常关系对帝国主义者是如此的不利，而对中国却是十分有利。所有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特别积极和齐心协力地活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希望让苏维埃俄国的代表来到中东铁路，因为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希望迟早自己占有这条铁路，或者至少参与该铁路的经营。²²³

正是因为北京外交使馆区——帝国主义阴谋的最龌龊藏污纳垢之所的疯狂阻挠，也因为根据各垄断资本首都的命令所施加的阻挠，巴伊克斯同志代表团（1921年末—1922年上半年）和越飞同志代表团（1922年8月—1923年1月）都未能获得直接的结果。我们说没有“直接的结果”，因为苏维埃政府以惊人的毅力试图与中国人民大众建立正常关系仍然是有结果的而且是很明确的。除了范围很小的封建军阀和官僚集团外，中国各阶层人民都强烈要求其政府调整同苏维埃政府的相互关系。中国社会舆论，其中纯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也与公开反对本国利益的政府相敌对，该政府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接受各阶层人民的这一要求。

因此，帝国主义者无论怎样阻挠，北京政府本身无论怎样规避，越往后，越更具体地迫使北京政府提出关于同苏维埃政府谈判的问题。拖延战术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中国社会舆论不仅要求进行谈判，而且要求签订条约。这时在中国两个主要相斗的封建军阀派系（奉系和直系）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也有区别。这两个派系都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军阀派系连同安福系余孽以及听命于日本的其他阶层残余，一般来说比受华盛顿和伦敦指挥的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更仇视苏维埃政府，更不重视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奉系之所以仇视苏维埃政府和不重视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因为日本帝国

主义这时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特别强硬，满洲上层分子对中东铁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已享有该铁路的收益和资产而表示关心，而且满洲同苏俄领土直接毗邻使这些上层分子极端恐惧“赤祸”。所以同反奉系的曹锟政府签订了条约，并不是偶然的。曹锟政府不得不比张作霖匪帮稍重视社会舆论，并打算同苏维埃政府调整相互关系之后，不仅利用中国社会舆论的支持来反对奉系军阀，而且如果奉天不承认北京同苏俄签订的条约，可以从苏俄领土方面对奉天造成威胁，削弱奉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在奉系军阀的后方无论如何会产生磨擦。在这里我们未论及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对苏维埃国家的友好政策，因为该政府同满洲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仍须着重指出，广东政府对顺利解决中东铁路问题上无疑是有影响的，虽然是间接的影响。我们哪怕回忆一下孙中山同越飞同志在上海会见以后，于1923年1月所发表的友好宣言。

加拉罕同志的代表团于1923年9月抵达北京，当时苏联的国际地位已大大地巩固了。克服了帝国主义者们的疯狂抵抗之后，1924年3月，谈判似乎快胜利结束；3月14日，缔约国双方的代表们在协定上签字。但是国际帝国主义进行了最后的绝望挣扎，于是北京政府……拒绝批准它的代表刚刚签了字的协定。法国公使——当时最仇视苏联的帝国主义的代表紧抓着中东铁路不放，在3月2日就送交北京政府一份威胁性的照会，反对同苏联签订条约¹。日本和美国政府也致送了警告性的照会²。

谈判重新开始了，现在是完全保密的，以便迷惑北京使馆区敏感的阴谋家的警觉性，并把他们置于既成事实的面前。5月31日协定终于签字了，与原来的协定相比没有重大变动。这些协定是：

1 参看加拉罕于1924年3月19日关于这个问题致中国政府代表的照会，载伊文：《中国与苏联》，第133页。

2 杰连季耶夫：《苏联、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出版社，1929年，第21页。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关于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协定”和一系列共同声明。

协定严格保持了苏联政府最初向中国发表的宣言的精神。因为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政府放弃治外法权、租界和沙皇政府所取得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改为教育之用,宣布沙皇政府同第三国签订的涉及中国的条约无效等等。北京政府承担义务,不准 225 许敌视苏联的组织,即白匪帮组织在中国进行活动。

条约的最主要部分是关于中东铁路的条款和协议。中东铁路被宣布为纯商业企业,前铁路“租借地区”内司法权属于中国当局,并允许用中国资本赎买该铁路。理事会由中国理事五人和苏联理事五人组成;由理事长(中国公民)、副理事长(苏俄公民)管理,两人共同主持和签署理事会命令。路局局长必须是苏俄公民,在任用职员时必须遵守中国公民和苏俄公民平等分配原则,但已工作的苏联公民不因此原则而进行解雇。对中东铁路股票和债券持有者在俄国二月革命前提出的权利要求,由苏联政府承担责任。协定签字后一个月,中苏会议必须开始工作,以彻底解决中苏相互关系中有关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中东铁路的问题。规定在最终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时排除任何第三方面参加¹。

北京封建军阀政府的代表们为了拖延谈判而抓住中东铁路问题不放。他们的蛮横无礼是无限度的。曹锟政府的代表利用1919年苏维埃政府宣言被歪曲的文字而断言苏维埃政府曾承诺完全和无条件地把中东铁路交还中国,现在在正常外交关系建立以前他甚至还要求履行这一“承诺”。尽管苏维埃代表团提供了1919—1920年宣言的真正原文,但中国代表王正廷以难以置信的无赖行径仍继续抓住某家英文报上公布的“自己的”原文,其中说道:“苏维埃政府将中东铁路、矿山和林业租借权以及沙皇政府、克伦斯基

1 《国际年鉴》,1925年,第3期,第21—30页;1924年苏中协定原文。

政府、霍尔瓦特匪帮及其他人所强占的一切归还中国，不要求任何补偿。”¹

加拉罕同志在自己的照会中正义地指出，如果在宣言中使中国政府有某种理由根据宣言所作建议向苏联提出要求的情况下，²²⁶ 引用这些宣言对北京政府才可能具有某种意义²，但是这些建议本来就是单方面的，因为中国政府抛弃了这些建议，仍然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这些建议不具有国际义务的性质。中国反动集团玩弄宣言的把戏，只是为了拖延谈判和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作某种表白。

完全和无条件地“把中东铁路交还中国”，实际上意味着把中东铁路交给帝国主义者。那时中东铁路事实上成了中国第一条“国际化”的铁路，在这条铁路上以日本、美国和法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会进行残暴的内讧，北京政府对于自己能保有该铁路当然不抱幻想。关于“完全交还”中国的要求只是重复美法公使们向中国提出的任务而已。正因为这样，关于中东铁路的问题便成了谈判的“障碍物”，因此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扬在其《满洲国际关系》一书中对中国因1919—1920年宣言不正确的原文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感兴趣地作了详细分析³。

苏中条约的最终签字，无异在帝国主义者的外交魔窟中爆炸了一颗炸弹。尽管加拉罕来到北京，尽管进行了长时期的谈判，但帝国主义者不相信北京政府会不听他们的话，让他们遭受这样的打击。因为对谈判无止境的拖延，帝国主义者就习惯地认为谈判将是没完没了的滑稽剧。帝国主义者受到苏中条约签字影响的冲击镇静下来之后，立即采取积极行动，以阻止条约的实施。

1 扬：同前书，第221页。

2 参看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致王正廷的信，载伊文：《中国与苏联》，第117—118页。

3 扬：同前书，第220—223页。

日本和法国政府又向北京提出正式抗议¹。美国驻北京公使苏尔曼活动较隐蔽,但很积极,因为当时的北京政府是听命于他的。美国垄断资本在远东的宣传机关还在苏中条约签字以前就发出大量造谣和诽谤的消息,以影响中国的社会舆论和北京政府,而现在则加倍的起劲起来了。英国在中国的报刊也不甘落后。北京外交团竭尽全力在“实际上”阻挠条约的履行,不交出使馆房屋的钥匙等等。

但是关于中东铁路对抗的主要战线在满洲。张作霖拖延履行关于中东铁路转为中苏共管的协定达四个月之久。奉天派系明显地表明,如果它还依赖什么人的话,那末它只依赖东京,但无论如何不依赖北京的中国中央政府。张作霖提出同他签订独立条约的要求,不承认由北京政府签订的协定。苏维埃政府为了表示特别爱好和平,对此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尽快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因此9月20日奉天代表和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签订了《苏联政府和东三省自治政府的协定》。条约中有几条关于相互关系的一般原则,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协定中关于一般政治的内容相同,但主要重复了“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的内容。从中国的立场来说,增添了一条重要的新内容,张作霖想藉此向中国的社会舆论夸耀一番。北京条约对“自铁路建成和通车之日起”经过八十年无偿交还中国政府支配的期限未予更改。张作霖达到了缩短无偿交还铁路期限为六十年²。这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没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苏联政府的这一行动再一次向中国人民证明了自己的友谊。因此中国政府决定,根据奉天条约规定把无偿交还铁路期限定为1967年,因为中东铁路建成和正式客运是1907年开始的(因为俄日战争延迟了通车)。

1 扬:同前书,第239页。

2 条约全文刊登在《满洲公报》,1925年,第1—2期,第88—89页。

张作霖尽管有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压力而加强的敌意，但仍然被迫同苏联“和解”，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奉天封建军阀统治集团不仅无力对付中国广大各阶层人民的强大压力，而且也对付不了满洲本身的压力。此外，他在中国本部争夺统治地位的时候，担心在后方与整个满洲接壤的强大邻邦苏联存在不友好的气氛。

张作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现实的政客，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微弱，就顺应需要和满足于缩短无偿交还铁路期限的“成就”。紧接着日本承认苏维埃政府，并签订了日苏协定（1925年6月20日），证明奉天派系这一步的及时，因为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地位随着岁月越来越巩固。

228 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满洲半封建军阀统治者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善意地执行他们所签署的条约。奉天统治集团（今后苏联须同它在满洲打交道）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和遵守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命令，开始极为无耻地破坏条约，违反条约中的条款使中东铁路商业活动受到阻碍。没有任何根据时而侵占铁路的这种财产，时而侵占铁路的那种财产，即随便对铁路进行掠夺，压迫苏联公民，挑起各种冲突。

国际帝国主义暗中指挥满洲封建军阀干这些勾当，它不仅不甘心于中东铁路转为苏中共同管理，而且还竭力破坏中东铁路的现状。英、法、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对中东铁路问题的行动和意图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用鼓励各种挑衅的方法或用催促奉天进行这些挑衅的方法使事态最后发展到中国人占领中东铁路，或者发展到他们最希望的——奉天军阀武装进攻苏联。那时他们就能行动起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支持奉天，对中东铁路问题迫使接受自己的条件。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条件当然不同，但这已属于次要问题。在教唆奉天干坏事这一点上他们的政策暂时是完全一致的。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点，因为某些作者无根据地认定英帝国主义在

满洲这方面只起了消极的作用。

如果假定认为，英国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不同于“一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那末要知道不列颠对外机关外交部和内务部一般执行的是同一个政策，不管是谁高踞在伦敦的部长坐位上。而这个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调和地仇视苏联的英国垄断资本的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帝国主义稍稍不同于上述帝国主义的三重奏。那种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东铁路上不积极制造冲突、不促使关系尖锐化的论断(如有时在出版物上发表的)，是完全错误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跟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策动和支持奉天组织对苏联的进攻，因为从尖锐关系中日本帝国主义只能得到好处。不过日本帝国主义干这些事比较隐蔽，有时它的代表和出版物甚至公开反对奉天的某些过分挑衅性的步骤。日本有时对苏联保持 229 比较友好态度有其重要的原因。它当时指望在这种“友谊”上能比其他帝国主义在远东公开和不断执行的那种狂妄攻击政策得到更多的东西。日本帝国主义希望用公开不赞成奉天军阀上层分子的某些极为粗暴的强制行动的方法，来着重指出在满洲没有法律，所以必须在那里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领事裁判权、警察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其他积极行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的实质不在这里。当时其他帝国主义的政策力图使尖锐化的结果是由奉天集团随时占领中东铁路，越快越好，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尽量保持军阀们的好战热情，希望到一定的时机占领中东铁路，即在那样的时机——总的局势应当是：奉天占领铁路实际上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铁路。这有可能发生或者是在新的世界大战期间，假定这次战争造成了和 1914—1918 年大战时大体相似的局势；或者是在有利于占领或要求在北满和对中东铁路建立日本统治地位的局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自己准备坚决同某个敌

人决战的时候。

日本帝国主义不希望不按照它的命令占领中东铁路,第一,因为这将对满洲的日本铁路造成危险的先例,中国统治阶级在其他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支持下会对满洲的日本铁路进军。华盛顿会议后,中国代表团要求日本放弃 1915 年以袁的美敦书强迫签订的关于延长关东地区和占有南满铁路期限的协定。北京政府(亲美的)于 1924 年 3 月 10 日再次要求废除 1915 年的协定和归还关东¹。除表现在报刊上的口头要求外,中国统治阶层开始对日本铁路和在满洲境内进行经济上的对抗。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人最终占领中东铁路,就意味着美国首先侵入中东铁路和北满。法国
230 银行家会立即要求中国满足自己的要求,即要求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

英帝国主义在那个时期在排除美国和法国参加中东铁路的意义上未必支持日本政府。如果英国支持日本,这一行动意味着帝国主义集团的迅速结合,并加速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而英帝国主义当时对武装冲突尚无准备。

最好的情况是:奉天最终占领中东铁路(假定苏联也迁就这一点),意味着铁路的“国际化”和美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在满洲大大的加强,而这一点是日本在南满确立其统治之日起所最反对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是:百般挑唆奉天集团反对苏联,在他们之间保持紧张而又尖锐的关系,但不准许未经日本同意而采取坚决的步骤。

但是在基本上执行上述政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中间有一个“派别”,它也力图随时挑起中国军阀的坚决行动,而它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毫无区别。这是一小撮冒险主义

1 1924 年 3 月 14 日日本政府以照会否决了这一要求。

的日本军阀和政友会主战派，特别是以他们满洲殖民主义者的成员为代表。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份子的立场来说，奉天同苏联的关系在任何时候越尖锐就越好，因为在远东能够进行某种武装冒险的机会就越多。此外，他们认为，奉天同苏联的尖锐冲突一方面削弱它们双方的地位，同时给日本帝国主义在奉天所统治的地区内带来大发横财的前景。日本殖民主义者积聚了奉天张作霖应偿还而未偿还的许多账单，他们迫不及待等候适当的时机，以便提出这些账单。因为这些原因，在满洲极有影响的一部分日本帝国主义者教唆奉天随时占领中东铁路，并许诺在某种程度上给以支持。

在帝国主义者这样积极协助之下，奉天军阀上层在同苏联共同管理中东铁路时期是怎样的一种行动方针呢？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1927年春季以前；2. 1929年占领铁路以前；3. 奉天军阀武装力量被红军打败以后。

在历时约两年半的第一时期中，奉天集团从来没有过哪怕有丝毫诚意来对待根据1924年协定所承担的义务。挑衅一个接着一个，破坏条约事件接连不断发生。但是还不能说，这在当时是蓄意使事态发展到同苏联断绝关系和占领铁路的行动方针。这些行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而帝国主义的挑唆者早就理解到这一点，不过奉天集团本身还不敢想象这样的结局。这只能是遥远未来的梦想。条约刚刚签订，中国根据这一条约得到了封建主和军阀们在梦中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那里所不能希望得到的东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正处在高潮，虽然奉系军阀憎恨它，但革命却强迫他们牢记着它。

因此，奉天军阀在第一时期的挑拨行动对他们来说还不是自觉地旨在断绝关系和占领中东铁路的行动。在这里却经不起帝国主义者要他们为自己多强占物质利益的诱惑（强占松花江商船队等等，后面将详细叙述），同“赤祸”作斗争（反对中东铁路教育科和

苏维埃职工会等等),不愿放弃自己的“朋友”和仆从——“处境困难的”白匪军,对他们可能还有用处,因为阶级仇恨,给苏联代表增加麻烦。奉天当局挑衅和不法行为的清单是很长的,我们只举出其中最为重要的。

无论是奉天,还是北京“中央”政府都不顾北京协定和奉天协定所规定的义务(第五条),未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白匪团体及其积极的反苏活动,北京“中央”政府自1924年12月至1928年春(仅1925年末至1926年4月短期中断)实际上是奉天集团本身的体现或在奉系强力影响之下。此外,不顾北京协定规定和专门照会中所阐明关于从军队、警察、东北部队、山东暴君张宗昌部队中解雇白匪的义务,在上海和其他地区有大批白匪武装部队(涅恰耶夫旅、奥尔洛夫匪帮等)。苏联代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抗议毫无结果。

1924年10月,中东铁路转为苏中共同管理,而在第二年的1月,哈尔滨行政当局(当然得到奉天的同意)就不客气了,对中东铁路开始第一次强暴行动。它占领了有专用线、仓库等等的一部分哈尔滨货运站,借口是铁路不“直接”需要这一地段。为什么铁路不需要正好在这里进行重要的倒载业务的部分货运站(在松花江232 边的铁路转运站)呢?他们不能以任何合理的解释来证明这样作是对的,只能借武力为论据,这是任何军阀所惯用的。根据哈尔滨中国行政当局的命令,各商号拒绝交纳被强占的一部分货运站所租赁地区的租金。中东铁路局长令铁路人员停止向这些商号提供车辆装货,中国当局竟企图用武力强迫铁路人员提供车辆。铁路理事会苏方理事希望因这次强暴行动而发生的冲突得以和平解决,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哪些地段是铁路所不需要的,就交给中国当局管理¹。奉天军阀代表装着同意成立

1 奉天协定的条文详细说明了北京协定关于中东铁路的同一条文,并规定除铁路本身所需要的地段外,其余前铁路“租借地”土地转归中国当局管理。

委员会,但事实上对这个委员会的任何工作的开始则百般怠工,并继续强占所看中的地段。

此后不久,当地的将军们因为关于解雇铁路上的白匪问题竟威胁要逮捕路局局长¹。

上面我们已指出过,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上供职的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平均分配,铁路上中苏职员应各一半。其实自霍尔瓦特宣布自己是“全俄执政”以来,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反革命被歼灭以后,形形色色的白匪无赖都钻进中东铁路了,从哥萨克大尉和克伦斯基的准尉起,到极反动的黑帮沙皇的将军们和高尔察克的部长们。几乎所有高尔察克的内阁阁僚都变成了“专业铁路人员”,在路局占据优厚的位置。他们的“路局”是这样糟,以致华盛顿会议被迫通过决议案:“为了预防盗窃财产,必须慎重用人以保证正常服务和节约开支。”²

必须以最坚决的方式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强盗、土匪从藏污纳垢之所清除干净。他们之中大部分急忙转为中国国籍,使自己有 233 了“合法”保护的保证,仍继续服务。但是数百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仍以“纯”白匪身份充当中东铁路职员,并继续公开反苏活动。路局局长于 1925 年 5 月下令予以解雇,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都可就任他们的职务。奉天军阀代表根本不感谢苏方的这一措施,而且令人愤怒地反对所签订的协定,完全出乎意外地努力保护白匪帮。尖锐的冲突拖延了一个多月,并威胁要逮捕路局局长等等。苏方代表仍断然拒绝无国籍的白匪在铁路上工作。

奉系将军们在 1926 年 1 月另一次他们所挑起的冲突中对路局局长进行逮捕的威胁。奉天军阀们惯于完全没有监督地管理自

1 哈尔滨当局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得到奉天的同意和鼓励。在这里必须指出,以便更好理解今后的冲突:在满洲境内政权是很集中的,遇到涉及外国人的重大问题没有奉天的赞同或命令,通常地方当局不能采取任何步骤。

2 《华盛顿会议》,莫斯科,1924 年,第 100 页。

己的铁路，也力图把这种制度强加于中东铁路。他们就规定免费运送军队，并由路局供给一部分军饷。又因为奉天几乎不断同另一个军阀派系作战，经常运送军队，给中东铁路带来巨大的损失（每年约三百万卢布）。奉天对苏联代表的声明完全置之不理，甚至在原则上不愿承认应该付运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且在中东铁路有进一步实行象中国内地铁路管理制度的危险，在那里全部运输和收入事实上概由将军们处理，作为商业企业的铁路不可能存在下去，除了赔本就是赔本。

苏方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容忍终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26年1月路局局长伊万诺夫同志下令停止这种运输，奉天军阀们对此种运输不仅不付运费，而且不承认应该付运费。他们开始抓住这项命令作为肆意胡为的借口。军阀们开始强占列车，对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工制造各种野蛮暴行，逮捕伊万诺夫同志（1926年1月22日）。封闭“东省特别区”（前铁路租借地）苏联公民职工会。不仅苏联在满洲的代表对此提出坚决抗议，而且苏联政府也提出抗议，并要求三天内释放伊万诺夫同志和恢复中东铁路的秩序，以及苏联人民对奉天军阀野蛮暴行的愤懑怒潮——这一切迫使暴行者不得不住手。伊万诺夫同志被释放了，中东铁路上的中国“军队”负责恢复秩序，职工会也恢复了工作。1月24日，将军们同意军队运送进行登记，并承认必须支付运费。

1926年秋，哈尔滨的将军们对中东铁路的内河商船队和港口设施进行公开的掠夺。“中东铁路内河轮船公司”还是在建筑铁路时为运送器材而成立的。后来商船队靠俄国政府资金加以充实，并主要用来运送货物到哈尔滨铁路枢纽站。但是因为中国行政当局于1924年1月29日下令不许中东铁路船只在松花江上航行，自1924年春，即在苏维埃代表参加铁路管理局之前，中东铁路商船队即停航了。不管军阀的这项命令是否合法，中东铁路轮船公

司仍然是俄国政府财产，奉天和哈尔滨的将军们对此项财产没有任何权利。惯于军事封建掠夺的军阀们的贪婪野心在1926年8月迸发了，当时张作霖命令强占中东铁路的船只。哈尔滨行政当局抢走了两艘客轮、十一艘拖轮、一艘挖泥船、十九艘铁驳船和十一艘木驳船¹。掠夺的理由是所签订的北京协定和奉天协定未规定内河商船队为中东铁路所有。诚然协定未列举哪些财产铁路能占有，哪些不能占有，因为苏方未料到中国行政当局会公开进行掠夺。难道根据这一理由凡是未经列举的财产都应为奉天军阀们所有吗？根据这一点，其余一切都可以抢走，铁路只剩有路基和铁轨了……

相反，奉天协定第一条规定，铁路直接经营的一切业务事项（属于商业活动）照旧。而北京协定除加拉罕和顾维钧共同声明外，并规定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相互将留在本国境内而属于对方的动产和不动产移交给对方（土地租借权当然除外，因为破坏了中国主权，苏维埃政府应予以放弃）。

中东铁路的松花江内河商船队无疑是苏联的财产，如同铁路的其他一切财产一样。如果奉天当局今后不准许商船队船只在松花江航行，该当局应将船只归还苏联或以相应的报酬赎买，如协定中关于全部铁路及其一切财产所规定的赎买一样。 235

不顾苏联代表和苏联政府的抗议，奉天军阀们用抢来的船舶成立将军们的“东北国营轮船公司”，大大提高松花江运费，并利用苏联财产发财致富²。

1 塔拉索维奇：《松花江航行与中东铁路的商船队》，第30页，《满洲公报》，第8期，1925年。

2 甚至在1930年的危机中，这个企业还赚了约五十万日元纯利润。企业名称中的“国营”字样，完全是空话，因为航运公司的利润全进入半封建军阀们的私囊了。

滿洲封建军阀集团对 夺取中东铁路的准备

从 1927 年春起,奉天军阀的暴行和挑衅不断发生,旨在挑拨同苏维埃政府断交和夺取整个中东铁路。

这一政策的转变由以下因素所决定:奉天封建军阀派系在中国本部地位的变化和好转、伦敦代理人的影响、参加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南方的地主军阀公开转到反动派方面。

1925 年夏,张作霖及其奉天封建军阀派系已经认为,他们能在华北和华中的最重要省份、直到上海巩固地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很快发现这没有那么简单。奉天反动集团公开屈从在中国最使人憎恨的日本帝国主义,激起了中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的反抗。希望在富饶省份占有主人地位的其他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人民对奉天军阀的痛恨,组织了积极的武装对抗张作霖集团。经过几次武装交锋之后,说明张作霖的力量是建立在腐朽基础上的。他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和金钱帮助消灭已取得胜利的倒戈将军郭松龄(他在 1925 年 12 月已进到通往奉天的要冲地带),张作霖未必能保持在满洲的政权。众所周知,日本人在一个时期曾大力协助满洲暴君窜入中国本部,同时宣称不准许中国内战转移到满洲境内。而这一次日本人则以自己的武装干涉证明,在他们的利益未受到危害时,的确是不容许自己的仆从及其集团垮台的。

在日本刺刀的围墙里、在禁止其他派系武装力量进入南满铁

路租借地的情况下,张作霖集中了新的兵力,改组了旧军队,并已于1926年春向山海关出击。他联合华北的其他军阀把冯玉祥军队从北京排挤出去了。到1926—27年冬,张作霖在华北又有了十五万军队,1926年11月,在有孙传芳、张宗昌参加的北方军阀会议上,张作霖“被选为”反对南方军队及其同盟者冯玉祥军队的北方联军总司令,他的军队称为“安国军”,并授予张作霖“大元帅”称号。²³⁷

1926—27年冬,是在“安国军”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渡过的。张作霖靠日本的支持在长城外尚能保持得住,但在中国本部仅有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受美英支持的军阀已经两次把奉天军阀从北京赶出去。张作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这些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他早已得到了这种支持,他虽已获得了这种支持,但只是在个别场合中而且规模也不大。由于南方革命战线内部的进展,事先得到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友谊”是特别重要的。

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在公开叛变民族民主革命以前,事先同帝国主义的代表,而首先是同美国人关于叛变后他们的支持已达成协议,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必须以其他的支持来代替工农的支持。其他的支持只能是帝国主义者的“友谊”。1927年末,蒋介石在美国报纸《先驱论坛报》上公开宣称:“同莫斯科的决裂”应该使美国外交界深信,国民党值得美国的信任和援助¹。

在中国封建军阀集团中以及资产阶级集团中充满叛变和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者勾结各军阀派系相互损害的情况下,奉天派系的头子对于前线的变化和蒋介石同帝国主义者的交易能完全不知道吗?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新的反革命军阀派系使北方军阀集团失去了对反革命的垄断权,在前者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能使奉天军阀在领导反革命方面已

1 P. 瓦列林:《从断绝到恢复的英苏关系》,国家出版社,1930年,第71页。

成为不需要，并把他们赶回老家去。获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
238 成了张作霖当前的任务。所有帝国主义者在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即都希望挑拨同苏联断绝关系和从中东铁路赶走苏联代表。英国保守党政府对这一点特别关心，它本身正积极准备同苏联政府断绝关系¹，还有法国银行家过去借给沙皇政府数十亿以支持反动派，现在则希望在中东铁路搞到一点什么东西。领导日本政府的政友会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并准备执行“积极的”政策，即执行田中在亚洲大陆的积极进攻的政策。

张作霖迎合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愿望，借以买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同时缓和自己作为黑暗势力反革命分子对苏联的极端仇视。他不需费很多时间来说服自己的同伙反对苏联，因为封建军阀安国军对工农政权国家的仇恨是共同的。

自1927年初在北满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试探性挑衅。1月间，没有宣布罪名逮捕了苏联公民职工会主席叶西科夫同志(1月11日)，搜查铁路职工会(1月12日)，同时在中国警察局服务的白匪悄悄把一枚炸弹放在铁路职工会会所下水道里。但作得这样笨拙，以致中国警察局认为不能根据这一点宣布任何罪状。3月31日，中国警察——俄国白匪拦住哈尔滨苏联总领事的汽车，要求取下车上的苏联国旗等等。

1927年2月28日，张宗昌扣留苏联轮船“列宁纪念号”，逮捕所有船员和乘坐该轮船的苏联外交信使，这是对苏联首次大规模的挑衅，由于坚决要同苏联决裂才这样作的。

在这以后，反对驻哈尔滨苏联代表和苏联公民的粗暴挑衅行为更为强烈了。在3月间的挑衅行为中，即在袭击北京苏联大使馆前夜，可以指出以下的挑衅：3月11日对哈尔滨商务代表处进

1 2月23日伦敦关于“反不列颠宣传”照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5月12日袭击苏联驻伦敦商务代表处和苏英贸易公司，1927年5月26日断绝外交关系。

行了无结果的搜查,3月12日在苏联公民庆祝二月革命周年纪念大会上警察要求摘下列宁的像片和苏联国徽并破坏庆祝大会,3月16日地方当局未说明理由命令封闭苏联运输股份公司哈尔滨办事处,3月31日对铁路职工会主席斯杰潘年科、指导员科索拉波夫和中东铁路哈尔滨电报室主任维利德格鲁别的住宅进行了无结果的搜查。

为了执行帝国主义者意志,4月6日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 239 袭击是旨在同苏联断绝关系的坚决行动。假如同时夺取中东铁路将是极粗暴的土匪行动,会明显地揭穿对北京苏联大使馆的袭击和奉天军阀在这方面一切行动的真意。为了随着事变的进程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因此他们把在中东铁路的强盗行为推迟了。但是在4月间,即在袭击北京苏联大使馆前后,满洲的将军们已对夺取中东铁路作了必需的一切准备。登记可以在铁路上利用的白匪,在适当地点布置军队,警察处于戒备状态并企图借搜查造成惊慌不安的气氛,作为进一步挑衅的借口等等。

张作霖希望从国民党右派那里夺得英美的支持作为自己反苏强盗行为的报偿,希望自己独享这种支持,但是这一希望是建筑在沙漠上的。不用说,帝国主义者“非常高兴”,“衷心感谢”,但是仍然不打算承认奉天派系垄断反革命和独占“统一”中国,何况该派系基本上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之下。

但并不是这一情况阻止了张作霖去实现对苏联既定的计划。如果一方面蒋介石的反革命使张作霖易于对苏联进行仇视的活动,但另一方面在军阀内讧战线上日益密集的乌云和不屈从于任何挑衅的苏维埃政府坚定而彻底的和平政策妨碍了夺取中东铁路的实现。

奉天军阀在中东铁路的代表于1927年夏和秋,为了挑衅的目的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要求:要求把以中东铁路理事会户头存在外

国银行和苏联远东银行的收入和现金移交给他们，把中东铁路硬货币单位的运费和收支款项换成当时正跌落得很厉害的地方大洋纸币。哈尔滨的将军们袭击职工会，对苏联公民、特别是对中东铁路的苏联工人施加暴行等等。

众所周知，苏中协定和苏奉(天)协定都规定苏中共同管理铁路，但绝不是占有铁路。如北京协定第一条关于“暂行管理”所说，“中东铁路是由俄国政府提供的资本建成的”，过去是俄国的国家财产，现在则是苏联的国家财产。同意商业上共同管理中东铁路是史无前例的苏联政府的让步。

奉天军阀在 1927 年夏还不敢直接夺取中东铁路，但企图提出前所未闻的厚颜无耻而又毫无根据的要求，明明知道这些要求是苏联政府不能接受的，不过借此造成公开夺取中东铁路的理由。

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就是奉天代表在 1927 年夏勒索中东铁路的资金三千万日圆“存放”到满洲各中国人开设的银行。这些银行都是奉天封建军阀上层的金融机关，其主要业务是吸收资金充作奉天集团的军费。把这三千万日圆转存到张作霖的银行里，就意味着把三千万日圆送到满洲军国主义的难以填满的欲坑里了。奉天对中东铁路的资金提出了这种勒索的要求，虽然如上面已指出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奉天协定第十三条关于“纯利润”问题甚至规定：利润“由理事会加以保管，未得两方组成的关于分配纯利润委员会中缔约双方的许可不得动用”。

这一要求是准备夺取中东铁路很明显的步骤。如果夺取中东铁路成功了，奉天军阀担心失去存在外国银行的现金，因为夺取中东铁路是非法的，外国银行未必肯把钱付给掠夺者。因此他们首先力图把钱弄到手。另一方面，如果勒索失败了，他们就打算夺取铁路，并借口苏方不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

苏联政府为了表示特别的让步，同意把中东铁路的一半资金

“存入”满洲各银行。1927年8月13日签订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临时协定。这在短期内使奉天失去了夺取中东铁路的借口。

但是奉天集团又提出了新的勒索，即把中东铁路的收支款项和运费改为当地大洋纸币，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勒索。

在满洲每一省，甚至每家银行和很多钱庄都“发行”自己的纸币，限在一定的地区内流通。“东省特别区”，即前中东铁路“租借地”内主要货币是五家银行：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和黑龙江省银行（广信公司）所发行的大洋。

因为发行事实上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又因为大量利用发行 241 大洋和其他纸币作军费，满洲纸币包括大洋在内的价值极不稳定，经常跌落。因此不仅外国企业，就是中国较大的企业都以某种硬外汇作预算，大数额也以硬外汇存放银行，通常是用日圆和美元。中东铁路的收支款项和运费是以硬货币单位金卢布来计算的。虽然中东铁路出纳处现金支出和收入都是用大洋，但是根据当地纸币对金卢布变动的行市来计算的。在当地纸币价值不断猛跌的情况下，中东铁路为摆脱不可避免的破产，所以清账时考虑当地货币市价的跌落。例如向国外订货必须支付硬外汇，同南满铁路和其他外国铁路清账也是用硬外汇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当地纸币只是价值不大的、五光十色的花纸而已。

因此提出把中东铁路的收支款项和运费改为大洋计算的要求，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铁路亏本并很快使它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铁路继续营业，则每年必须弥补大量亏空。满洲军阀同时还靠增加发行纸币而把硬外汇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如果这种勒索实现，就意味着破坏作为商业企业的中东铁路，苏联政府就必须不断补给付款来弥补亏空，中东铁路就变成了奉天封建军阀上层剥削苏联间接发财的泉源。

尽管奉天军阀集团不断要求，苏方对这种勒索坚决加以

拒绝。

恰恰在这个时候，在 1927—28 年冬，前线战事对满洲军阀越来越不利了。阎锡山还在 9 月末就对张作霖开始军事行动了。前线战事的严重恶化使奉天军阀对中东铁路的欲火冷却下来了。美英军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开始赏识自己当时的反革命宠儿蒋介石。建立“满洲”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的庞大计划已渐渐暗淡了。所有这一切对断然反对苏联的行动不利。无疑，苏联政府在关于中东铁路的收支款项和运费改为当地货币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有其影响。

242 在奉系将军们对中东铁路的欲火有所降低以前，中东铁路地区内的苏联公民，主要是苏联工人和职员在 1927 年中经受了艰苦的考验。从满洲严刑拷打者的无数兽行中举出其中几件较为突出的暴行。

穆棱车站警卫队长余才江（译音）于 5 月 25 日野蛮地殴打车站值班员萨夫钦科同志，因他劝告中国士兵不要坐在列车入口处。当时这同一个暴行者“为了玩笑”殴打车厢联结员（即挂钩员）萨夫拉索夫同志。

7 月 19 日，满洲里车站营长哈扬周（译音）殴打远东银行职员科诺瓦洛夫、他的妻子和儿子，因为孩子追赶鸽子。8 月 24 日，在横道河子车站警察三次殴打苏联公民伊万诺夫，因为他的孩子在玩耍时同警察的孩子吵了嘴。

9 月 2 日，在绥芬河车站警察无故殴打基谢列夫、赫麦列夫、萨莫伊连科，殴打后加以逮捕，并吊起来拷打。在同一个车站 9 月 8 日殴打洛班诺夫，9 月 25 日殴打波德戈尔斯基。波德戈尔斯基挨打后，被带上脚镣手铐扔在地窖里。

9 月 3 日，齐齐哈尔车站苏联公民乌沙科夫被殴打。

在哈尔滨市内白匪不受处罚地一再袭击苏联公民。6 月 10 日，

甚至当着中国警察面殴打苏联领事馆汽车司机卡尔宁，因为他保护汽车上悬挂的苏联小国旗不让白匪流氓侵犯。

镇压也临到苏联公民的工会组织。例如，8月8日，宽城子运输工人地方委员会委员六人被逮捕，会址被搜查并被捣毁，虽然任何“指控证据”未找到。同时白匪高举沙俄国旗和反苏标语牌在哈尔滨街上结队游行（10月18日），苏联公民住宅窗户上的玻璃被打碎，甚至领事馆窗户上的玻璃也被打碎（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撕下苏联公民住宅悬挂的苏联国旗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军阀及其白匪走狗的胡作非为，在1927年夏和初秋达到了顶点。这正与奉天军阀要在中国建立霸权希望的“高潮”完全相符。夏季（6月18日）张作霖自封为“大元帅”——华北的独裁者。北京内阁在他当政时只是形式上的谘询机关。到了深秋，不仅奉天军阀进一步扩大自己政权的希望消失了，而且大家都开始怀疑他们还能否在华北站得住脚。

1928年头几个月，以奉天军阀及其长城内盟军地位进一步恶化 243 化为标志，继而是前线不断吃败仗。这一点也阻止了奉系将军们对中东铁路的积极夺取。最后奉系的头子们不得不奔回日本帝国主义保护下的满洲老巢。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列车在南满铁路的旱桥上被炸毁，张作霖是在他的保护人保护下逃跑的，也是在他的保护人组织下被炸的。爆炸结束了他的官运，并给奉天半封建主们带来了一时的极度的惊慌失措。

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

老红胡子的确陷入了困境。近来他的戏法玩不转了。戏法失败了，长时期在无底深渊上面保持平衡的张作霖就这样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日本人要他们的老仆人的命呢？哪一点他使他們不满意？当人们知道了炸毁张作霖列车是日本军国主义驻满洲的代表们搞的，很多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乍看起来，解答这个问题是不十分复杂的。仆人已变得固执任性和很不恭顺。在其他帝国主义者压力下，张作霖企图在中国和满洲“社会舆论”面前保持一点点自己的“爱国主义”，拒绝了对满洲的那些极为重大的要求，日本“积极”政策的执行者们从1927年后半期起坚决强求满足这些重大的要求。这些强求是：建筑五条铁路，其中包括建筑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重要的吉林-会宁铁路，事实上实现日本人在满洲和内蒙东部土地占有权，事实上和正式承认日本在满洲对朝鲜人的司法权等等。

张作霖离开北京之前，日本公使数次去会见他，并两人单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据报纸报道，日本公使向张作霖提出了非正式的但“坚决的”哀的美敦书。日本报纸写道，张作霖多次表示“初步”同意，但在事实上对哀的美敦书拖延执行，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未变。此外，如我们已指出的，张作霖对英国人加紧献媚，特别是对美国人加紧献媚。他聘请美国军事顾问（斯瓦因哈尔特，他在张作霖列车炸毁三周后在日本镰仓发现已被打死）¹。张作霖在1927年为南满铁路向摩根财团借款造成困难，在后期建议美帝国

1 《中国周报》，1928年7月，第213页。

主义建筑热河-洮南和齐齐哈尔-黑河铁路,修建葫芦岛港口,同意在夺取中东铁路后吸收美国银行向该铁路投资。总之他使美国资本在满洲进行广泛的干预。他仍然希望从有时也使用革命词藻的南方反革命分子那里夺取美国的支持。 245

日本帝国主义下了决心,“我生了你,我也可以杀你”。从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来说,这一措施应该作为对“忘恩负义的”张作霖的继承人的警告。日本“积极政策推行者”指望在独裁者死后必然会出现的惊慌失措和瓦解的时期中,对满洲的要求很快就能达到,如果需要的话,对于害怕华中军队侵入满洲的封建主们重新加以保护,如果事态发展顺利,就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直到宣布保护关系。“保护关系”一词在那时的日本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甚至在英语版的报纸上也谈论这个问题。这家报纸断言:日本事实上在满洲占统治地位,“如果日本政府宣布对满洲的保护关系,并任命驻奉天领事为总督,情况变化不大,这种变化甚至也觉察不出来”¹。

放出试探汽球的同时,这家报纸声称:“无疑,如果日本坚决宣布对满洲的保护关系,华盛顿将承认这一事实,只不过发个宣言说,美国不承认对美国权利的损害。英国和法国也会声明承认这一既成事实。”²

南满铁路副总裁松冈对美国记者说,如果需要的话,日本将使用武力,不准许南京军队进入满洲,而且根本不容许“破坏满洲的安宁”,继而讽刺地补充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就称这个为保护关系吧。”³

到1928年5月,事态终于明朗了,奉天遭到失败,日本政府向

1 《日本周刊》,1928年5月31日,第667页(《日本将在满洲作什么?》)。

2 同上。

3 《中国周报》,1928年8月4日,第329页。

所有交战派系致警告备忘录(5月18日),其中说道:“如果内乱继续向北京和天津方面发展,并造成威胁满洲的和平和安宁的局势,日本政府方面将被迫采取适当的坚决措施,以保持满洲的和平和安宁¹。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谋杀张作霖是失算了。

246 这一血腥行动仍未招来所希望的满洲封建军阀上层的俯首听命(当然它不能有任何坚决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相反,更加深了奉天上层的敌意,而这种敌意是其他帝国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利益矛盾和阴谋所支持的。

满洲统治上层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抵抗,因为这样作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危险。如果注意到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参加这一赌博,那末这种抵抗使日本有遭到极为有害的后果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同张作霖一起被炸死,并伤了奉天封建军阀上层和张作霖北京政府的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吏,其中有莫德惠、张景惠、刘哲、武进(译音)、于国翰²。

日本国内政友会田中政府经国会揭露(虽然以稍微隐蔽的形式)该党代表在满洲的“功绩”以后丧失了政权。日本资产阶级对田中及其喽啰们不完全满意。这种炸毁列车的举动极象纯封建日本大名(日本封建时代的大封建主。——译者)和武士的斗争方法,并未引起日本资产阶级的赞赏。

张作霖被炸死的初期在满洲封建军阀上层中间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混乱。“首领”死于日本人之手的情况引起了特别的惊慌不安和恐惧,炸毁列车的组织工作后来发现不仅没有保守秘密,甚至很显然是故意让中国人毫不怀疑这次炸毁列车正是日本人搞的。

正如远东英美报纸所报道的,发生爆炸的南满铁路旱桥下面

1 《关于满洲发展的报告》,大连,1929年,第52页。

2 《中国周报》,1928年7月21日。

经常有日本哨兵守卫，在张作霖的列车通过旱桥以前中国当局要派自己的卫兵，日本人不允许。张作霖列车被炸毁以后，列车卫兵按照中国的习惯向四面八方射击，爆破者因此显然（也可能是故意）来不及把通向日本兵营的地雷导线拿走。

根据路透社报道，该社派专人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以路透社名义由英国军事专家检定），爆炸是正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旱桥时发生的。在爆炸地点炸毁了一个花岗石的桥墩，而桥的钢梁则被抛到列车驶过的京奉铁路上。地雷是由有经验的工兵埋置在支撑南满铁路铁桥结构的桥墩下，装有不少于二百磅的强力炸药。埋置这样的地雷需要四、五个工兵，安装电引信管等等至少需六个工作小时。还经查明，夜间在张作霖的列车通过旱桥以前，日本哨兵不许任何人接近旱桥，到拂晓时他们就都躲到日本兵营里去了¹。

中日官方共同调查委员会未公布关于调查结果的任何结论。中方委员鉴于日本明显参与炸毁列车事件而对于日方委员所提出令人齿冷的、完全假造的结论拒绝签字，该结论说什么炸弹是从桥上扔的或是列车上藏有定时炸弹。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只是形式上否认参与这件事。日本国内的报纸抱怨，关于日本工兵组织炸毁列车事件的传说，“深为遗憾，尤其是因为这种传说是来源于南满铁路公司和关东都督府的重要人士”²。这些报纸还津津有味地重复中国、英美报纸的报道（记者伦诺克斯·辛普森的报道）：据他的中国仆人说，奉天一名日本高级人士（请读成总领事。——著者）很早就起床了，从自己的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所谈论的那座旱桥³。

日本报纸这次未打算哪怕为“对欧洲”保存面子而把罪名推到

1 《中国周报》，1928年7月21日，第254页；《日本周刊》，1928年7月5日，第15页。

2 《日本周刊》，1928年7月5日，第115页。

3 《日本周刊》，1928年10月4日，第441页。

莫斯科或推到张作霖正与之作战的南京身上（一般的作法是把罪名往别人身上推）。只是后来有过这样作的打算。

炸毁列车是指望消灭同张作霖一起在列车上所有“旧奉系”的首脑人物。“旧奉系”中的某些人确实被炸死或受伤了。老奉系、新奉系活着的有吉林督军张作相和“王位承继人”张学良，他们恐惧到这种程度，以致在炸毁列车以后几个月内人们把他们的恐日病作为笑话来谈。他们尽力不让一个日本人接近自己。张学良只是在炸毁列车以后两星期改穿普通士兵军衣乘军用列车回到奉天的¹。

248 奉天上层中的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是如此强烈，使张作霖的死讯严格保密达三周之久。在这期间进行多次会议，商议谁来占已死独裁者的位子，又谁来占黑龙江督军的位子等等。第一个位子由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稳固地占有，张作霖本人早已指定让他当承继人。张学良早就指挥庞大的实力——几个奉军军团，父亲死后，他无疑是满洲最富有的人。张作霖“积蓄”了几千万元，一部分投资于满洲的各种企业，一部分用在招兵买马上面，一部分存放在银行和自己家里。由军长中的万福麟出任黑龙江督军。

没有内部的剧烈争吵和所有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密谋参与，奉天政权的“改组”是行不通的。这类争吵经常透过报刊反映出来。后来张学良杀害张作霖的老战友、他的参谋长、在报上被尊称为奉天派系的“头脑”杨宇霆，就是这种争吵的明证。根据某些迹象可以认为，正是日本人有意让杨宇霆代替张作霖，事先从杨宇霆方面已获得对日本支持给予适当补偿的保证。

当惊慌平息下来，一切已渐渐纳入常轨，就可以看到，由于谋杀张作霖的结果，日本在奉天的政治影响受到了一定的损失。甚

1 《日本周刊》，1928年10月4日，第440页。

至在半封建军阀上层中，在基于某种共同物质利益而与日本人保有友谊的居民阶层中，对日本帝国主义激起了强烈的不信任，他们害怕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仆人同样的命运。与张作霖同车偶然免于一死的一部分军阀以及死者的亲属，其中有张学良，都完全有理由憎恨日本军国主义者。虽然个人的同情和厌恶本身不构成政治，但仍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充满国际帝国主义阴谋的象满洲那样的环境中。

在满洲“无政府”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尽管积极图谋¹，但未得到任何重要的东西，因为对日本勒索的回答是奉天“无政府”，或无权进行国际交易。日本报刊仍然指出南满铁路总裁山本竟能向受惊的奉天军阀强逼作出某种承诺，甚至可能还签署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某些要求的不完全的正式书面文件。《日本周刊》在1930年已报道奉天军阀的“果敢的”铁路计划时指出，“中国”拒绝执行关于在满洲和蒙古建筑五条新铁路的协定，该协定似乎由张学良同山本签订的²。 249

新政权后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比张作霖后期持更为强硬的态度。这里除了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以外，由于6月4日炸毁列车所引起的、新统治者的私人厌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需要比较详尽地论述奉天封建军阀生活中的这次事件，因为事件是田中在满洲“积极”政策的唯一重大的“实际”措施，并对苏奉关系也有某种影响。奉天军阀中引起的惊慌失措和他们在某一段时间不在关外，使得满洲将军对中东铁路的进攻减弱了，“暂时平静”的时期也延长了，这是不合乎帝国主义者的胃口的。

1 曾搞过一系列挑衅，例如6月10日夜间在日本人住宅里爆炸了炸弹，当然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后来日本人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以“确保治安”。《日本周刊》，1928年6月21日，第779页。

2 《日本周刊》，1930年12月4日，第637页。

夺取中东铁路是反苏战争的前奏

帝国主义者运用一切手段来影响“改组后的”奉天政权，以激起奉天政权去反对苏联。

奉天统治者上层经过从华北退却、炸毁列车和张作霖惨死而引起的惊慌，刚刚恢复元气就走上了对中东铁路进行掠夺和胡作非为的老路。日本暗害张作霖后，美国资本取得了对奉天日益增长的影响。美国资本的代表完全同法国和英国资本的代表一样，在这一时期不断挑唆奉天去反对苏联，并完全夺取中东铁路。他们还不断劝导奉天军阀，说苏联对奉天军阀无力采取什么行动，并答应在某些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中给予支持和援助等等。

“更新的”奉天政权反对苏联的首次重大行动是 1928 年 12 月 22 日强占中东铁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站。在这以后奉天开始坚决准备同苏联断绝关系和夺取中东铁路。这里只列举较为重大的挑衅事件。

1 月初，封闭了苏联公民的《群众之声》报纸，该报日出一万份。其次是在中国警察局服务的白匪莫诺康诺夫对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进行射击。5 月 27 日，袭击哈尔滨领事馆并逮捕四十八名苏联公民，这是夺取中东铁路前的最后一次行动。根据奉天军阀的计划，袭击的结果必须“发现”“文件”，这些文件将揭露北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并给夺取中东铁路和赶走布尔什维克以“道义上的权利”。袭击领事馆以后，远东帝国主义的报刊就立即把这一点透露出来了。但是白匪所炮制的伪造文件是这样的拙劣和愚笨，几乎无法加以引用。

因此7月10日夺取中东铁路是在没有引用“文件”作口实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南京政府在7月21日对袭击哈尔滨领事馆发表了“宣言”，那是赤裸裸的武断，说什么在哈尔滨领事馆查获了“反对统一中国秘密阴谋”、组织“谋刺南京和奉天要人暗杀团”、“成立秘密军队以破坏中东铁路”等文件¹，此外就没有什么了。这些武断是那样荒谬无稽，以致为大多数帝国主义报刊所讥讽。同时，肆无忌惮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反动派却公然正式宣称，这次行动的真正原因首先是赤裸裸的掠夺。

在夺取中东铁路几天之后，中国反动派“头子”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很自负地说，不管其他一切，“我们要把中东铁路夺到手，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²。

在奉天事实上对南京保持独立的情况下，蒋介石口中的“我们”听起来十分可笑，因为在夺取中东铁路的问题上南京当然不是决定的因素，它也不是倡议者。只有在认为蒋介石是代表帝国主义者讲话的情况下，才能理解这个“我们”，帝国主义者才是夺取中东铁路的真正的倡议者。

奉天反苏的无耻行动对其本身利益来说的确是愚蠢而又有害的步骤，不由地引起人们深思，奉天怎能下决心采取这个行动。有人认为南京政府是夺取中东铁路的原作者，例如，象斯卡洛夫同志所说的，据该南京政府推测，“夺取中东铁路成为奉天派系遭致灭亡的捷径”³。沃伊京斯基同志也在南京寻找夺取中东铁路的倡议者，他说张学良是“南京手中可怜的工具”⁴。

张学良确是“可怜的工具”，不过不是南京手中的工具，而是所有指挥南京的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工具。但是就对南京的关系来

1 《中国年鉴》，1929—30年，第1223—1224页。

2 《消息报》，1929年7月18日。

3 斯卡洛夫：《中东铁路》，国家出版社，1930年，第46页。

4 沃伊京斯基：《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策》，1930年。

说,张学良是独立的工具,完全不经过南京的杠杆而进行活动。

如我们所看到的,奉天半封建主们在帝国主义者的领导和积极倡议下,自 1927 年初是完全独立地对夺取中东铁路进行有计划的准备。自 1929 年 1 月改挂国民党的旗帜之时起,奉天承认了南京的特权,但只是形式上的,只是因为对它有利。夺取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的挑拨,是反苏战争的前奏,奉天半封建上层则是帝国主义者手中进行反苏战争的工具。当然,反苏行动得到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南京领导集团的同意和热切赞同。该领导集团鼓励奉天派系的动摇分子振作起来,在冲突过程中和冲突后对苏联进行大肆叫嚣、站在最不妥协的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当然也要对武装进攻苏联负责,因为它同情、鼓励和正式承担发生冲突和以后一切罪行的责任。无疑,南京在这里打算削弱和转移奉天派系的力量。当然所有这一切丝毫也不能减轻以张学良为首的奉天统治上层的责任,该上层不管南京持何种立场而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动下夺取了中东铁路。

由于奉天半封建上层坚决反对苏联的结果,1929 年下半年中东铁路和北满已成为国际注意的中心。与中东铁路有关联的种种问题具有远远超过远东范围的广泛意义。诚然,问题不仅仅在于中东铁路本身和满洲,而在于受帝国主义者支持和策动的奉天将军们的行动是整个反苏军事行动的前奏。还在 1929 年,还在夺取中东铁路以前,这是完全明确的,当时帝国主义各国不体面的外交界及其豢养的远东报刊日复一日地挑唆中国当局去行动,散布“赤色”帝国主义计划的无稽谎言,并公然答应给予支持和各种协助。

远东反苏战争的前奏本身标志着相对稳定告终时期的到来,即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一开始,充满矛盾的国际帝国主义就对社会主义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个明显的警告,标志着:在暂时稳定的进一

步动摇下,在危机进一步加速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首先要向哪方面寻找出路,它首先企图牺牲谁来解决自己的矛盾。

如果在“苏中冲突”时还有人会怀疑奉天对中东铁路的冒险行为是武装干涉的“尝试”,而认为冒险行为只具有较为狭隘的地方意义,那末来自“工业党”和“孟什维克联邦局”——社会法西斯的第二国际代表部危害分子的供词应该使还有一点怀疑的人们确信: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国军阀在苏联远东边境上的破坏行动具有何种重大的意义,而且谁是这次破坏行动的真正的组织者。 253

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甚至在当时也未必有人对奉天破坏行动的重要性和幕后的祸首有所怀疑。美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积极参加在公开冲突的初期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当苏联政府使尽了和平调解冲突的一切手段后于1928年7月19日宣布同奉天暴君断交时,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它已采取措施使中苏两国政府注意作为凯洛格公约¹参加国所承担的义务。以白里安为代表的巴黎政府在宣布断交的第二天便毫不害羞地提出“调停”。

所谓“调停”就是以恐吓苏联为目的的直接干涉,就是公开表示支持奉天强夺者。谁都不怀疑法国的“调停”是什么性质的“调停”。几年前法国政府也十分顽强地向北京政府提出过调停,直至提出正式抗议和威胁,阻止把中东铁路权利移交给苏联。

美国政府“提到”凯洛格公约也同样是粗暴的干涉。奉天将军们以武力夺取中东铁路、逮捕了几百名苏联公民——中东铁路的职工、放逐了路局局长等等,这一切是直接的战争行为,而且是突然和暗中干出来的,在这以后一星期中华盛顿一动也不动地旁观。而当苏联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宣布断绝关系时,美帝国主义就立刻想起了凯洛格公约。华盛顿把另一步骤保守秘密,即以公约相恐吓后所采取的步骤,后来这一步骤也尽人皆知了。7月

1 扬:同前书,第26页。

25日,国务卿史汀生向各列强致机密照会,建议召开公正的“国际委员会”来调查冲突和任命中东铁路“外国人局长”(即非俄国人任局长。——译者)¹(是否又一个史蒂文斯?)。美帝国主义通过胡佛政府企图借“国际委员会”侵入中东铁路并巩固其地位,正如第一次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时候一样。

还值得注意的是,夺取中东铁路后,中国铁路美国顾问曼特尔的瞎忙和重复白匪关于苏中双方间中东铁路资金分配“不合理”的谎言的无耻诽谤。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撒谎太过分了,以致国务卿史汀生被迫表示不同意,而曼特尔本人因为给自己的“主子”帮了倒忙而失去了职位,尽管后来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法帝国主义也立刻采取了措施,以便直接牢固树立自己在中东铁路的影响。

根据中国政府的指令,在中国的俄亚银行已经在1926年9月关闭。关闭后经过了三年,即在冲突期间,经过法帝国主义的电疗后俄亚银行忽然复活了,并对中东铁路提出要求……不仅如此,法国高利贷者还企图用另一途径,即组织“中东铁路附设”专业银行的途径而钻进中东铁路。

日本报刊不安地报道说,8月1日(夺取中东铁路三星期后),“华南银行界重要代表为创办中东铁路附设新银行自南京去哈尔滨”。“一部分银行家计划在与前俄亚银行理事会成员达成协议后由中法两国投资来成立大银行。”²

巴黎银行家久久不甘心于中东铁路上的完全失败。哈尔滨报刊报道,法国一系列行动中的最后一次企图,即在冲突结束后法国驻华公使马特尔于1930年4月专程来哈尔滨,“与法国对中东铁路的要求有关”³。

1 《消息报》,1930年11月25日。

2 《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第25期,哈尔滨,1929年,第26页。

3 《哈尔滨通报》,1930年4月16日。

美帝国主义者(与法帝国主义者同样)在夺取中东铁路的企图方面遇到了自己的宿敌——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满意地赞同对苏联领事馆的袭击,并在袭击前就通过自己的报刊散布关于“苏联特务”活动的最卑劣无稽的诽谤,但对夺取中东铁路总的说来持相当冷淡和观望的态度。

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代表早已知道准备夺取中东铁路,大概甚至还加以鼓励。不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如何,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同意或者至少“善意中立”的保证,奉天不敢下决心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如武装进攻苏联。

一方面个别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驻满洲当地的代表为暂时的局部利益和把问题发展到奉天苏联之间公开敌对的愿望所迷惑,以便在必要时向奉天提出自己的要求,鼓励断绝关系并且非正式地约许“友好的中立”,即暗中帮助;另一方面民政党的东京政府在1929年7月,即在夺取中东铁路一星期前开始履行自己的义务,是稍有远见的。奉天将军们的掠夺意图强烈到这种程度,以致必需给他们出路。当其他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前奏所选定的时机已到现在的现在,这些帝国主义者用指头向奉天将军们指着中东铁路,虽然夺取中东铁路在这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合心意的和有造成麻烦的危险,但是东京却不能说:等一等!日本政府不准备在冲突的基础上同奉天和美帝国主义走在一起。无疑,主要是军人和政友会纵容奉天军阀对东京政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希望从夺取中东铁路中捞取直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在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中,在组织帝国主义者反苏共同行动中,东京政府确实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中立”。当然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行动的唯一原因是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基本上是日美之间的矛盾。

不论在任何形式下都不许美帝国主义侵入满洲,这就是日本

帝国主义给自己坚决提出的基本任务。“国际委员会”和“外国人局长”是史汀生在8月25日的照会中所建议的，所有这一切明显地感到有使北满新的“国际化”和美国垄断资本侵入那里的危险。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银行同中国进行关于贷给一亿二千万英镑建筑铁路借款的谈判¹。考虑到美国资本特别热中于满洲，可以认定这笔巨款的足足一半预定用在满洲，也包括“改造”中东铁路在内。但这是来自最坏的帝国主义敌人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致命威胁。

然而，如果侵入满洲的即使不是美国资本，而只是法国资本或英国资本，日本帝国主义也不好对付。因此史汀生的照会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坚决抵制。

日本在对它极为敏感的满洲问题上抵抗美国，实际上也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指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英帝国主义鼓励夺取中东铁路和武装冲突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反苏力量的试探，而且是完全秘密的、隐蔽的演习。工党政府的存在全都建筑在对工人大众的接连不断的欺骗上。因此，工党政府参与挑唆冲突必须完全保密。但是伦敦政府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质还不在于此。它在于暂时不公开的、尚未最终形成的英日合作，由于近年来英美矛盾的日益成熟而事实上发生了这种合作。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是“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主要矛盾的后面有非主要的、可是相当重要的矛盾：日美之间、德法之间、法意之间、英法之间等等的矛盾”²。

中东铁路冲突显示出红军的高度战斗力和苏维埃政权的钢铁堡垒。同时冲突也显露出未来帝国主义大屠杀中（如果无产阶级

1 《观察家》，1929年7月21日，第19页。

2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94—495页。

革命未预先防止这种大屠杀) 各帝国主义列强集团的轮廓。英国和日本反对美国, 这就是这些集团的轴心, 这一轴心自红军远东特种部队的光荣保卫战以来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日美矛盾在冲突消解期间表现得最突出, 当时美法外交勾当的炮制者眼看到苏联轻易而顺利地摆脱了所布置的圈套, 茫然若失。

众所周知, 红军在松花江口附近和绥芬河地区给了满洲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组织的白匪强盗几次不大的教训, 看来还不够, 因此变得蛮横无理的奉天将军匪帮在 1929 年整个秋季不断进攻苏联国境。

中国军阀对北满苏联公民、主要在铁路工人和职员中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在监狱和集中营内被拘禁的达两千人以上。

几十名苏联公民被将军和白匪的刽子手折磨致死。在中国进攻的第一天, 苏联公民的职工会就被查封, 苏联商业组织的各代表处也全遭封闭。

由于苏联各铁路同中东铁路联运中断、苏联商业组织的关闭、中东铁路本身营运锐减、大量中国军队开进北满和向当地居民征收各种各样的捐税来供养这些军队的结果, 这个地区人民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化了, 商业停顿, 各行各业的大多数公司破产。农民特别感到将军们冒险行为的后果, 预定外销的产品卖不出去。为了稍稍缓和冒险行为所引起的人民的不满以及履行帝国主义者组织的“前奏”的指示, 奉天军阀开始越来越加强组织对苏联国土的不断进犯和攻击保卫苏联边境的红军特别远东军。同时, 将军的报刊和传单无耻诽谤红军进攻中国、中国人在苏联受压迫、红军强占中国西部等等。

苏联的长期忍耐是有限度的, 11 月下半月, 在满洲里地区, 红军部队在对白匪和中国军队又一次进攻的反击中, 继续在满洲境

内防御作战,占领了满洲里车站和若干其他地点,在几天中俘获中国士兵近万人、军官数百人及大量武器,使袭击者不再长期为害。

奉天将军们吓坏了,他们原以为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下能肆无忌惮地抢劫、进攻苏联边境等等。丧失大量的士兵和武器对于封建军阀上层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各半封建主对中国武装力量投入了“自己的”资本。

满洲统治上层还有更大的灾难,中国军队在满洲里,在兴凯湖地区、密山附近吃了败仗,就潮水般地从边境各地涌向哈尔滨,沿途抢劫和毁坏一切东西,并有可能完全不服从命令。帝国主义政府焦急起来了,它们之间讨价还价和再拍卖活动加强了,它们的报刊开始对苏联进行威胁,但是它们不能对奉天封建军阀上层给以直接的实际援助。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内部的和日益暴露出来的相互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者从冲突中捞取了可能捞取的一切。南满铁路和大连靠货运赚得了可观的利润,过去这些货物是沿中东铁路东258 线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往国外。根据日本人自己的计算,南满铁路在中东铁路东线停止货运期间所赚得的利润约为6百万日圆¹。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官方代表与奉天进行谈判,提出了许多早已提过的要求。但是因有美国的支持,奉天不肯让步。此外,某些受美国人资助的中国报刊宣称,南满铁路的命运应与中东铁路相同,即转到中国人手中(而通过中国人受美国资本的控制)。

日本军阀利用满洲的慌乱和军事情况,从便在冲突开始后立即准备实行久已拟定的步骤——把日军总司令部从关东地区转移到长春,转移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沿阵地”。据中日报刊报道,日

1 《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第34期,第21页。

本人在长春修建了四万人居住的临时营房¹。一句话，满洲军阀反对苏联的缺乏理智的行动，被日本最大限度地用来反对中国和满洲本身。但是随着冲突的深化，整个形势对给予奉天某种直接支持的希望日益减少了，奉天在 11 月间满洲里车站吃败仗以后，为致命的恐惧所苦恼。整个国际形势说明，对苏联施加压力，明显地要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不愿这样做。伦敦政府虽然参加了法国和美国的共同声明，该声明“希望中国和俄国放弃极端措施，相互间能达成协议”，这一声明是对苏联的新威胁，但是伦敦政府参加这一共同声明十分勉强，行动很迟缓并附有保留，这明确地表现出了英帝国主义支持日本立场的趋势。

当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奉天封建军阀上层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奉天面临的前景是军队叛乱，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已经仿佛看到了红旗招展，使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惊恐万状的一切。11 月间造成的形势的延续的确对奉天孕育着最可怕的后果。满洲封建军阀各派系的领导人本来也不是完全一致地进行冒险行为的，其中比较有远见的和接近资产阶级的看到了这一冒险行为的破产和危害性。一部分哈尔滨资产阶级和黑龙江、吉林两边境省份的一部分统治阶层也反对这一冒险行为。诚然，只在用自己的皮肉体验了替国际帝国主义火中取栗要烧伤自己而且烧伤得很厉害以后，他们才开始对冒险行为持消极的态度。 259

在中国军队和白匪帮被击溃以后，奉天将军们急忙发出停止战斗信号了。在此以前，奉天扮演着南京的属下角色，由南京进行关于夺取中东铁路的外交谈判。现在奉天已成为相当自主的政府，就由它自己来进行谈判。但是为了把“统一”的滑稽戏继续演到底，形式上以紧急方式取得南京的同意进行谈判。因此哈尔滨

1 《中国周报》，1931 年 1 月，第 278 页。

交涉员蔡运升作为奉天和形式上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于12月3日签订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议定书，12月22日签订哈巴罗夫斯克议定书，内容是承担义务：今后遵守北京和奉天协定以及恢复夺取中东铁路以前的原状。

第二时期——有步骤的准备夺取中东铁路、同苏联断交和武装进攻苏联的时期，到此结束。

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 经济和政治地位

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问题”而受到包围,²⁶⁰在华盛顿会议上被逼得走头无路,把中国本部的许多阵地交出来了。它不仅暂时完全放弃建立保护关系,即放弃把中国变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而且把山东也“让出来了”等等。

在中国国内,帝国主义之间为了每个剥削对象,为了这个半殖民地的每块土地而以新的力量在进行激烈的内讧。但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帝国主义甚至在华盛顿会议上对于满洲仍保持十分强硬的立场,只稍作了些让步。事实上连这些让步也未实现。在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坚持“日本人的满洲”这一口号。事实上它早把南满列入兼并计划和盘算之中。每个日本资产者都认为南满和内蒙东部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未正式化而已,但完完全全是日本的,不仅任何其他帝国主义者,就连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也在内,都没考虑想干预满洲事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毫不松懈地坚决要求实现根据二十一条所取得的在满洲的权利和特权。十分明显,日本帝国主义在目前不经过流血斗争不仅不让自己被排挤出满洲,甚至不允许使自己在那些阵地在本质上受到削弱。然而恰恰在最近,¹明确地看到这些阵地受到了削弱。这就是说随时都可能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的

1 对第二版的注:所谓最近时期应理解是1929—1930年和1931年初。这儿行写在1931年早春,我们保留第一版中的本章及以后各章,以不损害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写成的本书的性质。这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事变的进程证实了本书著者所作预测的正确性。编者。

261 断然行动。如果有人在这里对它抵抗,那将意味着,基于帝国主义矛盾的综合(在远东诸矛盾中满洲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会爆发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

日本帝国主义地位的削弱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地位沿着衰减的曲线加强极少,政治地位遭到损失,最多不过是保持稳定。与美国资本在满洲、特别是在中国本部政治地位和最近¹经济地位加强的同时,与在某种程度上受美国资本刺激的地方资本和地方资产阶级的有所加强以及帝国主义相互斗争加强的同时,上述这一情况就意味着日本地位的大为削弱和走下坡路的开始,而走下坡路不是用一般的和“临时的”措施可以阻止住的。

1921—1930年这十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成就”不多。

根据1913年拟定的五条铁路建筑计划之一——四平街至洮南铁路及其至白音太来(通辽)的支线于1923年11月建成了,是由横滨正金银行于1915年起供给资金的。日本资本是根据横滨正金银行为建筑四平街-郑家屯铁路贷款五百万日圆合同而参加建筑这条铁路的。该合同是1915年12月签订的。

四平街-郑家屯铁路段通车后不久,南满铁路公司把往后的铁路建筑就接过来。南满铁路公司在1918年和以后各年中贷给铁路新借款,年息9%,包括横滨正金银行最初的日本借款。借款的最初期限规定为四十年。关于建筑郑家屯-洮南-白音太来线的合同也包括四平-郑家屯段在内。根据合同规定,铁路管理权由日本人掌握,直到借款还清为止。

但是在华盛顿会议时这条铁路快建成了,所以该合同的签订实质上不能算作为最后时期的成绩。

在建筑铁路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期间只取得了两项重大的成果,而且也只是局部性质的。

1 参看对第二版的注。

1924年9月，南满铁路同“满洲自治政府”，即同张作霖签订了关于四平街-洮南线延长到昂昂溪（距离中东铁路齐齐哈尔车站以南六公里）借款合同。根据南满铁路路局供给美国教授扬的资料，合同规定该路由日本工程师建筑，在借款有效期间，即在最终偿清借款以前，洮南-昂昂溪铁路由日本人任财政顾问及其助手（事实上的局长）。这条铁路形式上是属中国国营的，实际上受日本人的控制。²⁶²

这条铁路于1925年5月开始建筑，于1926年12月基本上建成。中国当局在某一时期不好意思横越中东铁路辅轨到齐齐哈尔车站，但是在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挑拨起的不断挑衅期间，他们甚至在未得中东铁路局的同意下，修建了一座旱桥越过中东铁路。1928年12月通车到齐齐哈尔。中国报刊确信日本资本未参加昂昂溪-齐齐哈尔路段的建筑。

必须指出，洮南-昂昂溪铁路中国管理处为了本身的独立同日本的控制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一般政治地位的削弱，日本在该铁路的利益有时受到了损害，尽管日本“副局长”顽强地加以抵抗。

日本人的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是签订关于借款和建筑清津（朝鲜-满洲-蒙古）大干线的吉林-敦化路段的合同。这项合同是北京交通部长同南满铁路于1925年10月签订的。我们注意到，这恰恰是在张作霖头上乌云密布的时候（与冯玉祥作战，一个月后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在北京政府中的走卒用这项合同来买取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1926年1月，北京新政府拒绝承认这项合同，但当张作霖的走卒在北京再度“即位”时又重新承认了这一合同。

根据合同吉林-会宁线由日本三家银行于1918年已取得的拨款权转归南满铁路公司。暂先建筑吉林-通化段，按照合同由南满

铁路提供资金并承包建筑工程。借款总额在 1925 年规定为一千八百万日圆，但后来增加到二千四百万日圆。如果开始通车和把铁路交付中国人以后一年内不能偿还全部借款，借款期限则延长到三十年，年息 9%，由铁路本身及其收入为担保。在借款有效期间路局稽核员及其助手由日本人充任。这条铁路线的建筑开始于 1926 年 6 月，完工于 1928 年 10 月。建成后中国人不同意对铁路的估价和不承认日方关于投资总额的数字。

263 在这期间日本人延长了从朝鲜同长春-吉林铁路接轨的铁路线。还在 1918 年 3 月，签订了关于建筑从吉林省长白山到朝鲜边境、到图们江的铁路，条件是中日资本参加各半¹。但是这项合同遭到吉林省统治阶层内的激烈反对，因为该合同把吉林省大部分边区，即极大部分朝鲜人居住的所谓的间岛地区经过朝鲜铁路系统紧密地圈入日本势力范围内。同时，一部分当地士绅由于私人同日本资本有利害关系则极力拥护这项合同。该项合同在很长时期内，经过若干年斗争和阴谋活动以后仍不能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仅在 1922 年才达成签订略有变更的另一种合同。但是日本人还在 1921 年就采取了秘密接洽的方式开始筑路，日本大使已把此事用照会通知北京政府了。这条铁路未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但吉林行政当局在 1929 年同日本人签订了关于成立天图铁路公司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吉林省政府本着股分对开原则参加铁路管理，当然中国的对开股分是虚构的。远在这以前，即在 1924 年，建筑得很坚固的窄轨铁路（2 呎 6 吋）已经把会宁同长白山联结起来了。

除了这几条铁路以外，南满铁路还以中日合办公司名义建筑了关东地区南满铁路金州车站至郑家屯地方性的一百公里的支线。该公司的固定资本为四百万日圆。监督和实际管理权属于南

1 1917 年日本人刚刚完成了朝鲜铁路清津-会宁段的建筑。

满铁路。铁路的建筑开始于 1926 年 6 月,完工于 1927 年 10 月。

日本资本在满洲工业中的比重虽绝对地增加了,但速度极慢。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因为靠在满洲已起作用的资本所获得的部分利润而增加投资,才有了增长,而且这部分利润也不大。

宗主国没有进行较大的新投资。

半国营的康采恩“南满铁路公司”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势力最盛时期,即 1917—1919 年及以后最近各年中,成功地吸收了大量私人资本。公司的股分资本增至四亿四千万日圆。日本政府除已有的一亿日圆股票外,又获得了一亿二千万日圆的股票,其中一亿一千七百万日圆用在伦敦市场发行总额一千二百万英镑债券方式来支付。因为二百万英镑的债务在 1911 年 7 月已清偿了,因此南满铁路已排除外国资本甚至任何间接的影响。留给日本私人资本市场的二亿二千万日圆中到 1930 年夏已售出股票一亿七千万日圆¹。因此到 1931 年总额约为三亿九千万日圆占全部投入资本的 56% 强留在日本政府手中。同时南满铁路多次发行国内公债,在当时日本货币比较充裕,债券顺利地销售完了。

但是在 1923 年,南满铁路公司又须借助在国外市场发行公债券。同年 7 月,在伦敦又发行四百万英镑的公债。到 1930 年,南满铁路共欠国内外公债款二亿七千七百万日圆²。

日本对南满铁路康采恩投资动态达到某种程度(但是仅仅到某种程度)可以作为日本在整个满洲投资动态的例子,有以下突出的情况:

各年 4 月 1 日全部投资价值估计为:

1908 年……101 百万日圆	1923 年……506 百万日圆
1913 年……214 百万日圆	1928 年……644 百万日圆

1 《满洲公报》,1930 年,第 9 期,第 12 页。

2 同上。

1919 年……264 百万日圆 1929 年……671¹ 百万日圆
1931 年……742 百万日圆

近年来,许多辅助企业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单位,它们的资产也从南满铁路的资本中冲销了。例如在 1928 年分出几家大饭店,1926 年分出几座电站,1925 年分出一些煤气工厂,在这以前分出了大连玻璃厂和陶磁工厂,以及部分轮船公司。如果加上分出来的企业的资产,则资本总额在 1923 年应增加约五百万日圆,而在 1928 年还应增加五千万日圆。这样五年间资本的增加为:

1913 年……113 百万日圆 1923 年……247 百万日圆
1918 年……50 百万日圆 1928 年……188 百万日圆

265 每年平均增加额为三千万日圆。但是在第一个五年中的增长几乎完全靠英国借款,在第二个五年中的增长靠利润的扣除额和自宗主国吸收不多的私人资本,每年平均增加额为一千万日圆;但在第三个五年中不仅有了大量的利润扣除额,而且吸收了新的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每年平均增加额达五千万日圆(1919 年增加额为八千二百万日圆,1920 年增加额为六千一百万日圆);在第四个五年中(包括重新估价时提高资产价值)每年增加额少于四千万日圆,而且一般是逐年递减:1924 年增加额为四千一百万日圆,1925 年增加额为三千八百万日圆,1926 年增加额为二千五百万日圆,1927 年增加额为五千七百万日圆(其中三千一百万日圆靠重新估价时提高资产价值),1928 年增加额为二千七百万日圆。

近年来,一部分投资用在南满铁路“租借地”本身的扩大上。租借地或“南满铁路地区”由 1925 年的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增至 1929 年的二百零二平方公里。

康采恩铁路部分的货运和收入的发展在危机以前的整个时期

1 其中三千一百万卢布由于重新估价时所提高的资产总价值,即在这期间实际投资数字应该扣掉这个数字(《满洲公报》,1930 年,第 9 期,第 12 页)。

中是沿着累进线上升的,但在最后几年,特别是与该地区同期经济发展的一般增长相比,速度也缓慢下来。最近时期铁路营运的情况如下¹:

年 度 (自 4 月 1 日 到 3 月 31 日)	运 输 量		总 收 入 (百万日圆)	纯 利 润 (百万日圆)
	货运(百万吨)	客运(百万人次)		
1917—18	7	6	34	23
1922—23	12	7.5	87	53
1927—28	18	8	113	63
1928—29	19	9.7	118	74
1929—30	20	10.4	122	74

在危机以前的最后时期,主要的“附属企业”抚顺煤矿的发展速度也开始降低了。1913 年的产量几乎为 1907 年的十倍,但是以后就停留在大致 1918 年前的同一水平上。在这以后各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生长,在 1923 年的产量比 1917 年增加了一倍(二百三十万吨对五百万吨)。往后的增长就比较小了。开采量分别为:

1926—27 年	6.3 百万吨
1927—28 年	6.9 百万吨
1928—29 年	6.8 ² 百万吨
1929—30 年	6.9 ³ 百万吨
1930—31 年	6.7 百万吨

这种缓慢对整个康采恩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抚顺煤矿除了自己的开采收入外,在最后时期每年给予南满铁路 35—40% 的最高 266 货运收入。因为对开采成本很低的抚顺煤规定了高运费,使南满铁路获得了大量利润。1928—29 年一千九百万吨货运中煤占九

1 1917—1928 年的数字摘自《关于满洲发展报告》,大连,1929 年,第 81 页,载《日本财政经济年报》,1930 年,第 267 页。

2 《关于满洲发展报告》,大连,1929 年,第 87 页。

3 《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第 38 期,第 16 页。

百万吨（包括铁路自用煤在内），煤在这一年中占全部货运进款的 38%¹。

抚顺煤矿及其附属企业（其中十二个各种专业工厂）的交易额如下：

1919 年总收入 64 百万日圆，纯利润 13 百万日圆

1921 年总收入 40 百万日圆，纯利润 3 百万日圆

1923 年总收入 64 百万日圆，纯利润 4 百万日圆

1926 年总收入 76 百万日圆，纯利润 5 百万日圆

1927 年总收入 82 百万日圆，纯利润 9² 百万日圆

1928 年总收入 87 百万日圆，纯利润 11³ 百万日圆

1929 年总收入 84 百万日圆，纯利润 12⁴ 百万日圆

1930 年总收入 62 百万日圆，纯利润 2 百万日圆

1917 年设计建立另一个大企业——鞍山制铁所，年产生铁一百万吨，自 1920 年已进行生产，但未达到原设计规模。

1919—20 年，第一年的熔铁量为三万一千吨生铁，1922—23 年生产六万六千吨生铁，1928—29 年生产二十二万四千吨生铁，1929—30 年生产二十一万吨生铁。根据帐目每年平均亏损三百万日圆，靠铁路收入来弥补。仅在 1928 和 1929 年工厂每年有五十万到一百万日圆的利润。

另一个初期无利润的企业是从抚顺沥青岩提炼矿油的工厂。1928 年开始建厂，1930 年建成，费资九百万日圆。

大连港在危机前的发展蒸蒸日上：

1 《满洲公报》，1930 年，第 9 期，第 16 页。

2 《关于满洲发展报告》87 页中指出，在 1921 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大大地降低了。

3 《满洲公报》，1930 年，第 9 期，第 13 页。

4 《经济公报》，1930 年，第 13 期，第 24 页。

年 度	轮 船 到 达 (单位艘)	货 运 额 (单位百万吨 ¹)
1917—18	2,072	3.3
1922—23	3,171	5.9
1927	4,224	7.1
1928	?	8.2
1929	4,721	8.6
1930	3,882	6.4

1928 年八百多万吨货运中，六百三十多万吨属于出口。在前 267 几年进口占的比重大，例如在 1917—18 年进口占 35%。

南满铁路康采恩的财政情况大体如下：

年 度	总 收 入	纯 利 润
1922—23	170 百万日圆	35 百万日圆
1927—28	230 百万日圆	36 百万日圆
1928—29	240 百万日圆	42 百万日圆
1929—30	241 百万日圆	45 百万日圆

自 1917—18 年到 1922—23 年的五年内增加了一倍半的周转额，在下一个五年内只增加了 1/3，后来在危机前实际上处在同一水平。同时自 1922 年起利润在若干年内几乎稳定在同一水平上，在 1929 年因中东铁路冲突利润才有了大大的增长。根据日本的资料，因为这个原因利润增加到六百万日圆²。从上面引证的数字中看到，在危机以前对康采恩投资的增长整个是沿着下降的曲线进行的。

但是这个庞大康采恩的发展图景和活动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1 《满洲公报》，1931 年，第 5 期，第 10 页。

2 《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第 34 期，第 21 页。

出日本资本在满洲的经济作用的增长一般是缓慢的。

因为这个康采恩基本上是运输企业，所以处于享有特权的和确保自己顺利发展的地位，不决定于日本在其他领域中的积极活动，只要整个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就行。此外，康采恩享有日本政府方面的特别协助和支援。

显然，如果康采恩的发展动态在这一时期内只有这样的指标，日本资本在其余部门中的活动图景则更欠佳了。的确，除了上面列举的新铁路以外（而且这些铁路还是在 1926 年以前开始建筑的），日本人未开办新的大企业，也未拨款，也没有进行新的大量投资（南满铁路和大连港除外）。现有的企业发展速度不如以前，最后几年在个别情况下还显露出停滞的趋势。在后来所谓日华“合办”²⁶⁸企业的组成和发展上也出现了停滞。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几乎看不到新组织的“合办”企业。因日本领事馆当局采取各种压力措施，直到领事馆警察施用暴力才组成了某些“合办”企业，例如“哈尔滨跑马场”。在最近几年来组成的这类企业中日本人实际上只是参加者，而不象过去那样是事实上的占有者（会宁-长白山窄轨铁路除外）。对“合办”企业的投资总额约为八千万日圆（其中六千万日圆以上是日本人的，不包括对所谓中国国有铁路的日本借款），在最后五、六年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没有进一步的生长。

日本向满洲移民也极少。如果不把朝鲜侨民计算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对朝鲜侨民加以注意是极为重要的）那末，满洲真正的日本居民在最近十至十二年中的增加趋势极为微弱。1919年，在关东地区和南北满洲的日本人为十八万一千人¹。到 1930 年，在十一年内这个数字只增加了六万九千人，共达到二十五万人。

从日本列岛向满洲移民的打算事实上落空了。1927 年不到一千家日本家庭在满洲（包括关东地区）从事农业，其中大部分从

1 《日本年鉴》，1921—22 年，第 34 页。

事园艺。

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计划是建立在殖民地剥削上，完全不决定于日本移民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在 1907—1927 年期间把朝鲜人从朝鲜排挤到满洲，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到 1928 年迁入满洲的朝鲜移民达八十万人，在二十年内增加四至五倍。但是近年来因为中国当局采取各种行政措施限制朝鲜侨民，移民速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日本在满洲对外贸易中比重的减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根据中国海关资料，1908 年日本在满洲进口额中占 27%，实际上约为 36%（包括日本商品自中国本部向满洲的进口）；根据中国海关资料，日本在出口额中占 36%，实际上约为 50%（包括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港口对日本的出口）。1909 年进口已达 60%，出口也达约 60%。1918 年实际上日本进口为 70%，出口则为 75%。

1927 年，日本的贸易额比 1909—1922 年大为下降了，回到了 269 1908 年的水平。根据中国海关资料，日本在进口额中占 40%，实际上约为 47%，日本在出口额中占 38%，实际上约为 45%。根据中国海关资料，在绝对数字的激增下，全满洲贸易额中日本占 38%，中国为 30%，苏联为 13%，美国为 4.4%，英国为 2.6%。如果按实际进口的商品来源和运销国别把这些数字加以校正，则日本将约为 45%，中国为 21%，美国为 9%，英国为 7%，苏联为 5%。

日本在中国的全部对外贸易额同样也大为降低了。自 1918 年的 39% 降到 1925 年的 28%；日本在中国进口额在这时也由 43% 降到 32%。但是自 1925 年起日本的贸易额尤其不断地下降。下降的情况如下（百分比）：

年 度	占 中 国 的 全 部 对 外 贸 易 额	占中国的全部进口额 (香港除外)
1925	28	32
1926	27.5	30
1927	26	29
1928	25	26.5
1929	25.5	25.5
1930	24.5	25

日本在进口额中的下降,部分是因为日本资本输出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在中国和满洲本身的商品生产,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日本“本国”资本所形成的有利局势随着欧洲各国回到远东市场而中止了。但是仅拿这一点来说明在日本统治南满的第三个十年中日本在整个中国、特别在满洲对外贸易额中比重不断下降,将会是不正确的。必须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地位总的相对削弱中寻找根本原因,下降不仅是其他帝国主义者袭击和中国革命运动压迫的结果,而且也起因于腐朽的日本帝国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

270 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地位的削弱在这一时期首先主要是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结果,是其他帝国主义者袭击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被其他帝国主义者“和平地”排挤出去,因此暂时形成了对中国地方资本和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相对有利的局势。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因其帝国主义的本质不能允许这一情况进一步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这一情况的发展,为了把它扭转到相反的方面去,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一时机一定会到来。满洲的中国地方资本主义只是一条胡狼,仅在大的猛兽大声吼叫准备搏斗时,才能得以享受猎物。

南满铁路的正式出版物确定,到1928年初满洲全部日本资本

为二十亿零六百万日圆。这一总数由下列各种投资组成：

南满铁路公司投资	{	南满铁路及其所有企业 (其中	
		保健投资 14.5 百万,	
		国民教育投资 13.5 百万,	
		公用企业投资 135 百万).....	644.8 百万日圆
		派生(分出来的)企业的担保金和	
		股票.....	55.2 百万日圆
	{	借给中国的铁路和奖励工业的	
		借款.....	59.4 百万日圆
		根据合同对中国铁路投资总额、	
		提存金、未归还贷款等.....	150.5 百万日圆
日本政府投资 {		对中国政府的借款.....	99.7 百万日圆
日本各公司投资	{	对中国政府和私人的借款.....	20.2 百万日圆
		固定资本.....	439.0 百万日圆
私人投资 {		固定资本.....	94.9 百万日圆
总 计			1,563.7 百万日圆 ¹

日本的估计者对此数还要增加 443.6 百万日圆，简单地提到，它是由关东地区国家财产、在二十一年中每年给关东地区的补助金和日本臣民的私产(大概是房产)所组成的²。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二十亿日圆这个数字中哪些是真实的。

在二十亿日圆中约有十二亿日圆是贷给中国政府的借款（显然连同累积的利息在内）。为什么把这种借款算作对满洲的投资²⁷¹呢？如果即使那些为了在满洲使用的借款，例如规定为发展北满林业和采金业的三千万日圆借款，那么我们本来就已知道，这些借款不过是些贿赂赃款，北京政府完全为了别的目的而使用了。一般说来，即使把这种借款算作日本投资，那也只应把它算作对中国

1 《关于满洲发展报告》，大连，1929 年，第 47 页。

2 同上。

的总投资，而不应算作对满洲的投资。在这一栏内可能有几笔不大的借款，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另一部分是贷给张作霖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但是这几笔借款不可能超过这个总数的 25% 以上。

似乎根据合同对中国铁路、提存金、“未归还贷款”（都是以借款形式贷给中国铁路的）等等投资总额二亿一千万日圆是不真实的，至少夸大三分之一。所谓满洲的“中国”铁路（事实上为南满铁路所有或受其控制）不值这个总数的 $\frac{1}{3}$ ，甚至根据日本统计，到 1928 年中国铁路欠南满铁路借款不超过九千万日圆。“提存金”、“未归还贷款”这些都是完全不真实的项目，记在这一项目下的是各种的旧津贴、贿赂、破产倒闭企业的欠债等等。这一栏中的真实数字最多只能认为一亿五千万日圆，而不是二亿一千万日圆。

关东地区国家财产价值总额估定为四亿四千三百万日圆，其中包括政府对关东厅每年的补助金和加上日本侨民的“私”产价值，但是实际资本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首先对关东厅的政府补助金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日本在满洲的“投资”。这些补助金是用来维持日本警察、监狱、法院、行政机关等等的。这些补助金甚至不够支付全部行政开支，还要靠地方收入弥补大量数额。例如，1925—26 年这些项目的开支为五百五十万日圆，而补助金只有三百万日圆¹；1927—28 年、1928—29 年、1930—31 年补助金每年各四百万日圆²，如果二十年来补助金每年平均为三百万日圆，总数则为六千万日圆，这个总数应该减去。

其次，这一项目中列入的所谓“私产”，根据所有资料判断，不外是居住在满洲的日本人和朝鲜移民的“家产”（朝鲜移民中很多人甚至不承认日本籍）。一家统计日本在满洲投资的杂志计算出总数为二十二亿六千五百万日圆，并确定项目如下：“日本和朝鲜

1 《日本财政经济年报》，东京，1925 年，第 212—213 页。

2 《报告》，第 57 页，《金融年鉴》，1928 年和 1930 年。

的不动产为一亿五千万日圆,家产为一亿日圆,日本和朝鲜移民的资本(显然是现金)为四千万日圆¹。当然,无论如何不能把居住在满洲的八十万朝鲜人的财产算作“日本投资”,同样也不能把居住在满洲的日本臣民的家产算作对“殖民地投资”。如果减去这一数额,则四亿四千三百万日圆数字中所剩下的不到一亿日圆了。在关东地区和南满的数额中有国家财产、军用器材和日本农民移民的投资。

无疑,南满铁路对公用企业、保健、国民教育的投资总额(标明是一亿六千二百万日圆)高估了10%以上。还有其他的夸张项目,例如日本各股份公司所定的资本不是真实的,而是假定的。根据一系列资料判断,上表中实际投资(不是虚构的投资)至少平均高估了10%。

作了上面指出的重大更正之后,我们得出的总数为十五亿一千三百万日圆($2,006 - (90 + 60 + 343) = 1,513$)。如果我们把这个总数平均减少10%,则我们所剩下的整数为十三亿六千万日圆。从而1928年日本在满洲实际投资最可能的数字为十三亿到十四亿日圆。其中在奉天省和关东地区的投资达十一亿八千万日圆,在吉林省达一亿二千万日圆。根据交相查核现有关于日本投资资料,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这个数字的不正确只能是在过高估计上,而不是在过低估计上。因为自1928年以来,日本人未进行任何重大的投资,所以到1931年初,日本在满洲的投资为十四亿日圆。

日本人本身在计算日本在满洲投资上存在的不一致,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现在引证一些数字。根据朝鲜银行的调查,在中国二十五亿日圆投资总额中,“私人”资本部分占十八亿三千二百万日圆(日本政府以借款形式贷给中国的似乎为七亿日圆)。私人

1 《银行周报》,第518期,1927年。

资本投资满洲的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万日圆¹。根据通产省的资料，
273 投入在满洲的纯日本资本(不包括各“合办”企业资本)为六亿九千七百万日圆(包括南满铁路)²。东京杂志《中国时报》1930年4月号《日本在华投资总额》一文中确定在全中国的投资总额为十八亿零九百万日圆(显然是根据列举的种类而计算的,对中国政府的某些借款不包括在内)。

非日本人作者B·谢平引证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总数为十七亿七千七百万日圆³。苏联作者别利所引证的数字超过了日本人本身所统计的最高数字。他在自己写的《争夺太平洋》一书中不知根据什么,指出日本在满洲的投资为三十亿日圆,而在全中国的投资则为五十亿日圆⁴。

根据日本人自己的资料,迄1930年日本在中国的实际投资总额为二十亿日圆,其中投入满洲的约为十四亿日圆,投入江苏(上海)的约为三亿日圆,投入山东的约为一亿五千万日圆,其余的则投入其他各省。

1 《满洲日日新闻》,1927年3月20日。

2 《大阪每日》,1928年3月22日。

3 《满洲公报》,第6期,1930年,第31页。

4 别利:《争夺太平洋》,国家出版社,1929年,第39页。

如我们早已看到的，国际关系最尖锐的时期使地方工业有可能得到一定的发展。

世界大战时期，工业国家中很多工业品缺少到这样程度，以致不仅从殖民地运回以前进口的工业品，而且用高价购买为数不多的殖民地工业产品。尤其把满洲储存的西欧商品从市场上收回而转运回欧洲去。甚至用高价很快买回已售给中国商人的商品¹。这自然就给当地中国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简陋工厂等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但必须强调指出，中国地方工业在大战期间得到的好处并不象乍看起来的那么多，因为在中国市场上美国产品、特别是日本产品开始代替欧洲产品了。从 1915 年底起，满洲外国货物中仅日本货和美国货相竞争。此外，在这时期在满洲建立了不少工业企业，其中大部分纯是日本人的，或者名义上也有中国人参加，但实际上中国资本参加的极少。满洲的封建军阀、地主、商人和富农-高利贷者因食品的有利行情而获利更大。于是他们开始积累了一定的货币积余。中国商业资本获利也很可观。值得注意的是，满洲最发达的民族工业部门之一的榨油工业产生在下述领域内：在这里商业资本以农民、地主为一方和以外国资本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大规模中介业务。

例如，1914 年以前在北满榨油工业总共只有三个厂子。自 1914 年至 1918 年期间，已建立了二十五个榨油厂，除少数外，都²⁷⁵

1 参观案卷第 241 号，奉天总领事 1916 年 5 月 4 日的报告。

是纯中国资本¹。诚然,大多数是小工厂,设备也不好,也不需要大量的资本。这些工厂是由商业-高利贷资本出资在封建军阀参加下开设的。封建主同时也开始特别积极地关心其他工业部门。我们提到过的那个齐齐哈尔马道台曾参加俄国资本所计划的林业、采金业和煤炭工业的租让企业。

对于满洲,特别对于北满的有利情况继续着,甚至在 1918 年以后更好转了。因为战争现在完全在满洲近旁,在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进行。白匪区是各种工业品有利的销售市场,因为这里地方工业并不多,此外武装干涉军需要大量生活必需品。而且这种对满洲工业有利情况同整个世界经济战后短期繁荣时期部分相融合。此外,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极为敏感地波及到中国、波及到满洲的时期。革命铲除了俄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基础,中国人对白匪也不特别客气了,革命也刺激了中国民族革命反帝运动,迫使国际帝国主义稍微缩小自己的胃口,并给予当地资产阶级以某些机会,以吸引它到自己方面来反对危险的工农运动。

在 1919—1921 年间期,满洲的榨油工业在继续增长,而在北满增长的规模更大。三年内在北满开设了二十八家新厂,其中十三家是在 1920 年一年内开设的²。就一年内开设的工厂数字来说,这是满洲榨油工业所达到的最高点,1921 年以后每年只开设一、二家新厂,但有时也关闭了已有的工厂。

在这时期内,出现有利情况的不仅是榨油工业。面粉工业中很多现有蒸汽面粉厂部分或全部转到中国人手中,中国人也开设新面粉厂。到 1923 年,北满蒸汽面粉厂达三十八家(1913 年只有十九家),其中十家以上是在 1914—1921 年期间由中国资本开设的。在这些年内经中东铁路运送的面粉每年都保持在十万吨以上

1 苏林:《北满的工业》,哈尔滨,1928 年,第 31 页,第 48—51 页。

2 苏林:《北满的工业》,哈尔滨,1928 年,第 31 页。

的水平（1920年达十二万七千吨），是前所未有的，只是经过五年以后北满又重新达到了这一水平。

北满在此时期内，主要在哈尔滨开设了制革工厂（一家大规模的）、肥皂厂、蜡烛厂、小型铸铁厂和机械厂、手工业玻璃厂、锯木厂、烧酒厂、棉纺织工厂及其他工厂等等。

南满也出现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图景，但程度上相对地比较低。这里强有力的障碍是，自宗主国输入的投在地方工业上的日本资本和由于在满洲已起作用的日本资本的“工作”结果而在新企业中取得的大量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后来，主要从战后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开始，再加上资本主义各国商品泛滥，不仅中国工业企业受到压制，而且日本的某些企业部门也受到了压制。不过在南满除了日本工业以外，中国纺织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南满榨油工业也大部分在中国人手中。

中国工业发展中的暂时静寂时期（在此时期不仅未看到新的大规模的投资，而且关闭了很多现有的企业），由二十年代中期的高涨新浪潮所代替了。这次浪潮不很高，但是持久，保持到世界经济危机前，甚至保持到危机开始时期。

1924年的苏中条约是激发满洲地方资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该条约在法律上彻底清除了俄帝国主义的权利和特权。它在对外关系上把过去受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俄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工业不仅置于平等的地位，而且置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它使中国代表参加管理中东铁路合法化，在这以前他们只是偶然的和临时的外来人，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任何一瞬间，都可能被任何帝国主义国家赶走，如果这个国家想插手中东铁路的话。苏中条约对地方资本的活动也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苏联代表在运费政策和其他措施方面，不仅不象沙皇将军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做的那样采取阻碍地方工业的方针，相反，多方面协助这

一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通过苏联国境，特别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²⁷⁷的过境运输的商品交换的发展、以及苏中条约签订后开始的苏联经济机构、特别是苏联远东银行在北满的活动，对这一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都是有利的。鉴于苏联的这种方针，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稍加改变阻挠和关系恶化的政策，以便不与觉醒的民族运动过于对立，与苏联代表的活动相比较不使自己的活动对这一地区的危害性表现得太突出。

阻止日本扩张行为的扩大，而且又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明显地过渡到腐朽阶段，即内在矛盾给其发展带来巨大危害性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在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很明显了。

日本资本获得新的特权之后，也有机会获得大规模扩张的其他优惠，但是对这些特权和优惠远没有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后来在几年中表现得萎靡不振。日本资本只是在最近时期面临其他帝国主义者愈来愈顽强的压迫和被他们激起的中国资本的积极性，后来又受危机的打击，才开始表现出较大的积极性，但是以经济斗争的方法取胜的前景已显然没有了。

问题在于：庞大的垄断康采恩从纵面和横面把日本资本联合起来，其规模不小于规模宏大的美国垄断组织，在内讧的竞争中往往轻视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只力图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特别表现在关于建筑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重要的清津干线（清津-会宁-吉林-长春-洮南-索伦等）问题上。还在1907年就已取得了建筑这条干线主要铁路地段的拨款权。1909年，关于间岛协定中规定建筑吉林-会宁段，而在1913年，这一规定又以换文方式扩大为关于五条铁路的建筑。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迟迟不建筑这条干线，未采取任何措施或只采取了部分活动，同时中国人也未加以阻止。当中国人因有了与日本相敌对的帝国主义者的强力支持而积

极反对建筑这条铁路时，日本帝国主义才着手进行关于建筑这条铁路的具体步骤。通常解释日本帝国主义在建筑这条干线和其他几条铁路以及实现某些经济计划上的迟钝是缺乏游资，害怕把游资输出到满洲——半殖民地，在这里日本的政治统治是经常建立 278 在不十分坚固的基础上的。虽然上述原因也有关系，但是问题的本质不在这里。问题的本质在于各部门、整个区域和地区受自己影响的日本资本垄断组织的相互竞争。

战后日本资本的集中比战时的速度要慢些，但集中的进展仍很迅速。1927年，大公司(五百万日元资本以上的)在投入资本总额中的比重高达64%(1918年为53%)。

满洲实际上在大康采恩南满铁路的支配下，南满铁路直接控制1931年前投在满洲的十四亿日元资本中的十亿日元，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满洲的日本官僚代表和其余大多数日本小企业。参加南满铁路这个企业中的日本国家资本的意义主要在于：南满铁路的参加者、靠它豢养的周围的私人资本家、大官僚和委派他们的政治派系都靠国家资本获得大量利润。政府机关基本上执行他们关于满洲的意志。南满铁路不准许重要的竞争者进入满洲，哪怕是来自“祖国”日本的也一样。三银行团之一的横滨正金银行所取得的铁路租让权(对铁路的拨款权)到事情刚要成功的时候被南满铁路夺走了。南满铁路阻止那些没有转到自己手中的大企业开业，而且，在把它们弄到手后，有时也不急于使它们开业。

建筑一条独立的、不从属于南满铁路康采恩的清津(或罗津)-吉林-洮南干线对南满铁路的经济意义、对大连港和整个现有康采恩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有把南满铁路一部分变成大干线的专用线的危险。建筑这条干线给大连港带来的损失，不仅只一个大连港，而且也给神户带来了损失，从清津(或罗津)运出的货物毫无疑问要运往敦贺，而不运往神户。因此南满铁路和神户的有关的

资本家垄断组织就阻止这条日本新干线的建筑，正如他们阻止建筑其他几条新铁路并对那些不在他们控制之下而又威胁他们垄断地位的日本企业的建立设置障碍一样。

我们引证这一情况仅仅是日本资本主义内部腐败的例子之一。这种腐败已深深渗透内部，而且是在一定阶段促进满洲地方资本发展的因素之一。

279 1923年的大地震在这一时期也起了某种作用。大地震使整个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个时期内也削弱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

但是除上述情况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首先是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地方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中根本的和决定的因素。过去帝国主义者之间斗争最尖锐的时机，给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兴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现在相互的斗争（更确切地说，是美帝国主义的压力，它不允许日本使用武力来阻碍地方资本的活动，特别是在铁路建筑领域内），也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在这些条件下最初胆怯，逐渐胆大起来了，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威胁置若罔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直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在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不仅没有减弱对日本的压制，反而增加了压力。为了强调不承认日本在满洲有任何特殊利益的决心，华盛顿政府于1923年4月正式废除了蓝辛-石井协定，并屡次在声明中着重指出，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所有外国资本在满洲各方面都应享有“机会均等”权利。特别是在1928年5月为对抗田中在南京军队北进时发表的好战宣言，凯洛格又作了类似上述的声明。

在这个时期，中国资本大量投到铁路建筑方面，日本正是主要集中在有关铁路建筑方面提出了抗议，中国则一概“置之不理”，这个事实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加紧铁路建筑的原因应该从多方面去找：除了铁路对整个经济、特别是对满洲经济的重要性以外，还有美国顾问的直接教唆（造成对日本铁路的竞争），他们正是在铁路建筑方面答应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一部门需要投入较多的固定资本，而且远不是马上就有实际效果的，能吸引贪图立即致富的半封建主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顾问”的教唆。

因为没有大规模侵入满洲的机会，美国资本就认定发展地方资本是自己在满洲进行扩张的掩护和途径。中国地方资本应该为美国资本的来临创造前提条件。

如果认为满洲每个大企业自其创建一开始起就有美国资本或 280 其他外国资本作后台，那当然是幼稚的。当地统治阶级有自己的资金，他们在这一时期开始把资金投在工业和铁路建筑上。当地统治阶级手中积累的资本能用在任何目标上，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是相符合的，这种局势给地方资本扩大自己的活动提供了一切机会。

尽管资本家们从满洲榨取了大量的殖民地超额利润，尽管半封建上层本身在几乎不断的封建军阀战争中耗费大量非生产的金钱，但在半封建主、商人、高利贷者和为数不多的工业资产阶级手中仍存有货币余款。

帝国主义所鼓励的满洲农业大豆作物专业化在此时期使当地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好处。满洲的对外贸易额经常出超。自 1920 年出口每年大大地超过进口，1920—1927 年时期，全部出超差额为五亿四千六百万海关两，而且在危机以前的顺差经常是增加的，在 1927 年达到一亿三千二百万海关两。1928 年出口超过进口一亿四千二百三十万海关两，1929 年出口超过进口九千四百四十万海关两。若以美元计算，1920—1929 年时期出超为五亿零一百一十万美元¹。这些数额中的某些部分落入了当地统治阶级的私囊。1918—

1 《满洲公报》，第 5 期，1931 年，第 23 页。

1929 年以来的满洲贸易每年为战前 1913 年对外贸易的 250—400 %。

从下述情况中看到满洲的特殊的有利地位：尽管中国的这一部分有上述的顺差，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同一时期平均每年有两亿海关两的赤字。满洲的对外贸易按人口计算超过中国本部对外贸易二至三倍，并在危机前最后期间达到全部中国出口的 $\frac{1}{3}$ 和全部中国进口的 $\frac{1}{4}$ 。

满洲的半封建主-军阀和地主利用税收、实物地租和生产工具、贷款的高利贷利息夺去了农民几乎全部劳动果实，首先积累了大量游资。

满洲半封建主-军阀的苛捐杂税相对地不少于中国本部，而绝对数字则超过了很多倍。

281

因为满洲的半封建主拥有比中国本部半封建主-军阀通常支配的更多的货币资源，所以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工业和运输业，同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结成联盟、有时甚至领导工商业资本。这些资本的大部分投在铁路上，时而以“国营”企业、时而以半国营半私营企业名义建筑铁路。

还必须着重指出，半封建主对铁路建筑的特别关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利益”与半封建主统治集团的本身的利益配合得很好。铁路有时经过人烟稠密的地区，有时又经过荒无人烟的地方，把地价和地租提高了很多倍。将军们、官吏们、部分投机商们往往成立“合股”公司，以便在铁路设计要经过的无居民地区内事先购买相宜的土地。

但是半封建主——军阀和地主们——不仅变成了铁路建筑领域内的企业家，因为他们也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现代工业的其他部门：榨油工业、面粉工业、纺织业、矿业、林业等等。而且对工业的投资在很久以前，还在日华“合办”企业的时期就已开始了，华方的

参加者主要是封建官僚。结果在满洲形成了独特的、相当规模的低能的地方资本主义，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前的年代中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封建地主同工业家、商人、高利贷者人事上结合在一起采取了从未有过的、相当大的规模。

危机前的最后几年中，半殖民地的地方资本日益加强地侵入主要是为日本人所垄断的工业领域，甚至侵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神圣不可侵犯的”铁路建筑，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用通常的手段来阻止这种侵入已丝毫无能为力。

满洲的日本报刊抱怨当地中国工业的竞争、特别是棉纺织业对外国进口棉织品的竞争要大得多。棉纺织品是日本输入满洲商品的主要部分，这一进口部门遭到破坏，对日本资本来说是最为敏感的。例如，《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对1928年北满形势是这样描绘的。根据该杂志的说法，“战前日本在北满的进口中占第四位，大战时期上升到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目前日本在进口中虽然仍占第一位（占北满全部进口的30%），但却要忍受来自中国当地工业方面的激烈竞争，特别是棉纺织生产上的激烈竞争，它还受害于其他外国进口商的竞争、特别是德国进口商的竞争。中国当地生产的棉织物和棉线（已由家庭手工业的设备转为比较现代的机械设备）开始排挤日本产品”¹。

282

地方煤炭工业、中国的电站、汽车运输业等也造成了对日本人的严重竞争。

但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威胁出现在另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即铁路建设部门。

中国人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即自1925至1930年总共建筑了约一千五百公里铁路，其中一半是日本铁路的竞争者，而另一半最

1 《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第13和14期，1928年，秋野：《日本商品在北满市场》。

终也具有竞争性质。

关于中国铁路网以及其他铁路将在本书第二卷中详加分析,但我们认为在这里必须指出,中国铁路就其固定资本状态来说是低功率的。这些铁路的大部分具有临时建筑的性质,土方工程不大,许多桥梁是木制的、低质量的,车站建筑简陋,车辆不足。每条铁路都没有财政储备。投入中国铁路上的资本值,除京奉铁路外,约为七千五百万日圆。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满洲统治阶级之间关于铁路问题所发生的一切抗议和冲突中,必须特别指出,1928年3—4月,即张作霖被炸死前不久的尖锐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日本人动用了武力。

南满铁路曾深信,中国人所建筑的奉天-海龙铁路与该路签订了联运协定,事实上即成为南满铁路的专用支线。建筑奉天-海龙铁路之初就许下这一诺言,而在1928年2月24日又签订了协定,但协定未获得张作霖的批准。代替这一约定的是,新奉天-海龙铁路根据张作霖的命令进行关于与京奉铁路联运的谈判,就这样“瞒过了”准许横断南满铁路地区的日本人。根据未经张作霖批准的关于联运协定,南满铁路答应拨给一百节车厢和十台机车,这是新奉天-海龙铁路所必需的。张作霖一方面不批准协定,另一方面命令洮南-昂昂溪铁路调拨所需的车辆。但是洮南-昂昂溪铁路的车辆是日本提供建筑该路借款的担保品。如果联运协定被批准,南满铁路对于自洮昂铁路调用车辆自然不会加以反对;但是现在新建的中国铁路想要成为完全独立的铁路,南满铁路就坚决提出抗议并宣布:将中断横断南满线地点的交通。日本公使吉泽在1928年3月末和4月初向北京政府,即张作霖致送断然的抗议书并提出补充要求:关于批准联运协定和发还洮昂铁路的车辆,以及要求停止建筑吉林-海龙铁路和给予在郑家屯派驻日本警备队的权利。

张作霖最初回避实施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任何要求。日本人

极为愤怒。满洲的日本报刊歇斯蒂里地喊叫中国人侮辱南满铁路和日本，说什么“现在不是空洞抗议的时候，而是英勇行动的时候”，“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的时候”¹。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者采取了足够“有效的”措施，南满铁路拒绝运送去前线的军队，中断经过南满铁路租借地通往奉天兵工厂的交通，换句话说，切断了对关内张作霖军队增援和军火的供应。

日本人开始只是叫嚣，这对张作霖是有利的，因为提高了他的反帝国主义“战士”的威望。但是“有效的”措施很快地迫使张作霖投降，并满足日本关于直接引起冲突的联运协定问题的要求。日本人自己撤销了补充要求，因为提出这种要求主要是为了恐吓张作霖，而且是非用武力不能得到他的同意的。但是后来奉天并未实现同南满铁路联运的协定。

张作霖在玩弄铁路问题的严重性也表现在他对南满铁路在1927年向美国借款的态度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满洲实行自己的铁路计划时遇到了阻力，而且很知道满洲半封建主敢于这样行动，只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在他们后面撑腰，于是决心挖掉奉天军阀 284 们的这一支柱。只要能使美帝国主义者对日本企业有兴趣，就有可能希望美国不予干预，如果需要对奉天采取某种果断的措施。

摩根的代表和伙伴拉蒙特对日本为南满铁路借款六千万美元的要求原则上予以同意。日本人显然希望这次借款的条件，大致上同他们当时在伦敦获得借款的条件相同。日本首相田中于1928年7月25日在给日皇著名的奏折中解释说，外国资本（极希望吸收这种资本）的占有者在任何情况下应是日本在这里具有经济上特殊利益的“公正的见证人”²。摩根对田中预先给他规定的作用未必感到满意。无疑，这个垂涎满洲的老豺狼把六千万美元

1 《满洲每日新闻》，1928年4月4日。

2 参看奉天杂志《新东北》，第12期，1930年。

的投资同今后的广阔前景联系起来，把这次业务看作为侵入满洲的临时措施、一个后门，一个面临果断提出谁战胜谁问题的阶段。

但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借款的成立在现阶段是极为有利和合乎愿望的事情。因此，当杨宇霆在 1927 年 11 月 29 日（当时美日借款谈判正在“顺利”进行）奉张作霖之命对这一借款阴谋表示坚决反对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报刊大发雷霆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杨宇霆宣称，借款阴谋将在中国人民中间激起对美国的愤怒、反对美国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帮凶。本来就提心吊胆地进行借款谈判的美国资本对杨宇霆的声明极为重视。给日本提供这笔贷款有使美国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中国统治阶级和中国地方资本协助的危险，而中国地方资本是美资侵入中国和满洲的重要渠道。于是美帝国主义决心不同时追逐两只兔子，而只限于一只兔子，对这只兔子的狩猎已在进行，而且根据全盘考虑，在国际帝国主义内讧的局势中对这只兔子的狩猎有更多的取胜机会。六千万美元借款告吹了。日本帝国主义希望，正是在借款的帮助下（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实现自己的“积极”政策的重要部分——建筑新铁路。因为假如这次借款成功、美国对中国统治阶级的支持减弱，那末，中国人建筑的铁路和象许多其他铁路一样都将受到日本的控制，实际上受日本的统治……

285 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政府在张在世的最后一年半中关系尖锐化的原因之一是铁路问题。然而许多其他的问题也成为日华关系恶化的原因。田中为了执行“积极”政策而与张作霖北京政府关于“满蒙问题”举行谈判，并事先大肆宣扬政友会政府为达到所要求的让步的决心。这主要是要求完全地和无阻碍地在满蒙实现从袁世凯那里强迫取得的“二十一条”的全部权利。此外还增加了某些新要求。

张作霖坚持自己反帝“英雄”的路线，坚持“保卫祖国利益”的

路线,坚持同美国作“朋友”的路线,并竭力回避同日本进行谈判。当杨宇霆奉张作霖之命于1927年1月末向报界代表宣布这项谈判已中止,北京政府不进行谈判时,日本公使为了维持田中和政友会的威信急忙对杨宇霆的声明加以驳斥。结果是:中国人不进行谈判,而日本人则仍然进行……

在日本推行“积极”政策这一时期除了上述的铁路“事件”外,中日在满洲纠纷的各种事件中,还可以指出1927年8月因为日本不顾中国当局的抗议在临江(奉天省东部接近朝鲜边境)设立日本领事馆而引起的中国报刊和城市居民的激昂情绪。日本人终于被迫关闭了该领事馆。8月末,日本军队在本溪湖煤矿枪杀中国罢工工人也引起了群情激愤。本溪湖在南满铁路租借地以外,但日本司令部公然破坏中国“主权”,该司令部以前早就这样干过,在华盛顿会议以前的时期曾派军队镇压过和平罢工。因为破坏中国“主权”和横暴行为,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站在罢工方面。9月初,事情甚至闹到上街游行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奉天发生反日的大示威游行,几家日本商店被捣毁,几个日本人在街上被打伤。在满洲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游行。

“积极”政策的一次最明显的行动——炸死张作霖之后,在持续的几个月内还不能有把握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次行动而失败了,虽然相应的征兆马上就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因为炸毁张作霖列车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己在满洲的地位,这一点最后成为十分明显了。

尽管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坚决的要求,发布命令和进行威胁¹,张学良却完成了同南京政府关于统一的谈判。满洲获得了自

1 张学良“登极”后,威胁不断而来,“日本总领事得知张学良准备从属南京政府的意图,就去会见张学良并声称,如果悬挂‘国旗’,日本将使用武力”(《中国周报》,1928年7月28日)。

治权,事实上是完全独立的,但形式上它同中国本部统一了,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为中央政府并悬挂国民党旗帜。对于奉天半封建主说来,这有双重好处:事实上对南京不承担任何重大的义务,同时他们希望回避商讨他们不喜欢的外交政策问题,把问题推给南京“中央政府”。这种计谋对南京也有利。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经常处于极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样就提高了它的“统一中国领土”的威望。关于用武力真正统一满洲,南京连想也不敢想。除了奉天军队以外,南京还得同日本军队较量。因此形式上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已经是一种成就了。

但是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是政友会总的“积极”政策的完全彻底的失败。如果在奉天来自中国人方面每一抵抗行动后面显示出美帝国主义的阴影,那末,在南京的日本帝国主义实证论者所面临的已不是阴影,而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这个可怕的敌人本身。

日本政府作出了绝望的努力不让奉天正式承认南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只能使正式承认这一事实稍加推延,因为它的抗议和威胁,关于承认的谈判和对承认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满洲神秘的气氛中进行的。自1929年1月1日在满洲悬挂起国民党旗帜,从而满洲与中国本部重新合并的行动也完成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失常了。甚至十分克制的、在“妄自尊大”中保持沉默的机关,如枢密院也开始说话了:

《东京朝日》报道:“枢密院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对日本明显的侮辱……枢密院对日本在满洲的代表们所表现的无所作为表示不满……枢密院认为悬挂新旗帜给满洲问题大大地增加了困难”¹。

287 尽管废话连篇和进行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未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在国民党旗帜的背后有美国的星条旗。

1 《日本周刊》,1929年1月10日。

张学良和奉天封建上层以这一行动开始公开不服从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在有关的一切问题上继续奉行这条路线,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未必会下决心就这些问题采取什么行动。

1929年7月3日,日本政权从执行鞭打政策的政友会转到执行鞭打和蜜糖饼干并举政策的民政党,在满洲的日华关系上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东京的计划依然如旧,只是在某个时期内未全部端出来,而是部分地从各大臣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并陪着亲切的微笑送上,竭力证明日本的要求若被接受,双方的利益该多么巨大。

因为民政党政府的政策比较灵活,初期在满洲避免了某些事件和尖锐化,但不能说,这一政策达到了某种“成就”。满洲统治上层的经济活动继续在展开,这给满洲的日本资本或多或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或在将来有造成损失的危险。在这些措施中必须特别加以指出的,是修建葫芦岛港口,1930年7月2日开工时是非常隆重的。

同时,奉天资产阶级组织的“外交后援会”公开推行反对日本强求建筑敦化-会宁铁路和反对其他要求的运动,从1930年春开始广泛散发宣言、传单。第二年春,列入该会计划的已有象关闭中国人和日本人或朝鲜人在满洲合办的企业,禁止日本人用华语出版的报纸¹等等那样一些措施。各地同日本居民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反日情绪加强了。来自许多城市的、其中甚至来自齐齐哈尔的消息说,地方当局禁止出租房屋给日本人,日本领事为此一再提出“坚决”抗议。

奉天的重要行动是1930年夏出兵反对阎锡山和冯玉祥,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极为坚决和“善意地”劝告不要这么做。在反对南京和美国的斗争中,日本把赌注下在阎锡山和阎包围北京上。这

1 《京津时报》,1931年4月10日。

288 一赌注输了。阎锡山失败后逃到了日本，很可能他还会出现在政治舞台，由日本供给他军火。

奉天突然进入山海关后，使直隶（现称河北）省、以及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省一部分（奉天政权对后面几个省只是名义上的）置于奉天半封建主上层的控制之下，继而以张学良同蒋介石在1930年11月的会见，结束了1930年末继续发展的示威游行来巩固奉天和南京之间的“友谊”，在会见前后，中国报刊大肆叫喊两位领袖坚决奉行把日本人从满洲“驱逐”出去的政策决心。

这次会见的实质正在于：美帝国主义把中国两个主要统治集团在实际独立的基础上，吸引奉天集团转到更为积极反日的政策上。根据所有资料判断，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达成的很可能是口头协定的本身，正带有这种亲美和反日的性质。张学良到南京会见蒋介石来回都乘坐美国福特公司的“试”飞的飞机，从满美关系的立场来说，这也是象征性的，正如蒋介石在1930年庄严“要求”和接受美以美教派“美国”宗教洗礼是象征性的一样。

正值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和世界经济危机深化的局势下，只是由于肤浅或偏见才能得出象美国作家奥查德所作出的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发展那样的结论。他在自己的论日本经济地位一书的结尾，为使人们确信说道：

“今后日本同中国相互关系的特点是：较少使用武力，更多地发展友好关系，日本资本的投资用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渗透”¹。

1 J. 奥查德：《论日本经济地位》，纽约，1930年，第489页。

1930年下半年和1931年头几个月的所有资料都表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在整个中国、特别在滿洲的矛盾的危机时期正在来临。

较弱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十年中步步退却,有时进行遭遇战,有时进行局部性猛烈的反击战,但最终是后退了,而现在正接近于其退却的极限了。

现在已经不是政友会,而是民政党政府在进行那个“滿蒙谈判”,它是政友会倒台的原因之一。

地主、对军事工业有利害关系的大资本家和军阀“三位一体”的联合体所领导的政友会,在其当政时期对中国执行不仅粗暴恐吓和威胁,而且直接使用武力(1928年对山东出兵和谋杀张作霖等等)施加影响的政策。

对中国的这一政策的完全失败、由于许多外部和内在的原因不能使这一政策达到合乎逻辑的结果、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主战派每次进攻后的退却和失败,这些都是政友会政府垮台的一些重要原因,而民政党就取而代之了。后者既代表老的、托拉斯化的“纯业务”资本,也代表最新的工业部门。它也同一部分军事工业和某些军界有关系。民政党在当时的局势下反对进攻政策,特别反对政友会首领田中把“滿蒙谈判”强加于中国,该项谈判要求对滿洲和东蒙实现根据1915年二十一条所取得的权利和特权,以及最终使日本占有滿洲和东蒙的许多其他的让步。

但是帝国主义政党的阶级本质都是一样的,为形势所迫而表现 290
现出自己真实面目的民政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现在开始采取和政

友会同样的方法。特别是它强迫奉天进行实质上同样的谈判，诚然，为了对外的需要改名为“满蒙铁路谈判”。事实仍然是，不是冒险的死硬派政友会党人，而是“实事求是的”民政党人对中国用露骨的威胁来代替自己的“友好”宣言，事实是，民政党现在借助于最后的手段——关于苏联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吞并满洲的威胁性的最粗野、最荒谬的谎言，这个事实是很值得注视的。

如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也极其沉重地伤及了“繁荣的”美国和在最近时期处于几乎经常不景气状态中的日本。

但是危机特别沉重地冲击了农业的满洲。

经济危机大大加速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各种对抗的暴发。斯大林同志在1930年6月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明确地分析了经过危机的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景。斯大林同志多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暴露的同时，也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列举了根本矛盾和日美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一分析对我们的研究极为重要，故全文引证斯大林同志所描述的鲜明情景：

“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原料的斗争、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正在暴露并尖锐化。现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旧的划分感到不满。他们看到力量对比起了变化，必须与此相适应地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势力范围等等。这些矛盾中主要的是美英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成品输出方面或是资本输出方面，斗争主要是在美英之间进行的。只要拿起任何一份经济方面的报纸，任何一份关于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文件看一下，就会相信这一点。斗争的主要场所是南美、中国以及老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自治领。这个斗争中的优势——而且是肯定的优势——是在美国方面。

除了这个主要的矛盾，还有许多非主要的但相当重要的矛盾，如美日之间、德法之间、法意之间、英法之间的矛盾等等。

毫无疑问,由于危机的日益发展,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一定会逐月逐日地激烈起来。

斗争的手段是:关税政策,廉价商品,低息贷款,重新部署力量和建立新的军事政治联盟,扩充军备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发动战争。”¹

在这里未对农业危机的发展及其对满洲经济的影响加以考察,但必须指出,危机的破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只引证一些资料。

1930年9月末,哈尔滨中国商会会长、百万富翁张廷国说:“目前大豆的价格跌落到一美元四十二分,价格再往下跌不可能了,因为现在农民纳税要担负很大的费用,不能再降低价格了。”²工商资本重要代表口中的这一承认,意味着农民在当时的价格之下不能抵补生产费用。此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价格继续迅速下跌:“1931年1月—2月,哈尔滨大豆价格每普特(16.38公斤。——译者)为八十美分。而当地农民每普特只得到四十美分”。此外,当地货币行市也继续下跌,因此大豆价格跌落得更低了。大豆价格的跌落不小于极限价的一半,根据张廷国的说法,低于这个极限价格,就不可能再下跌了。

尽管价格这样低,但对满洲农业原料的需求不多,这说明一点,即使行情能向稍稍上升波动,但价格的继续跌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形势的出路(甚至在比较遥远的将来)预料不会有。

应该明确地说,满洲经济的基础——农业遭到来势迅猛的危机的破坏,而且这一点反映在满洲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千家商号倒闭了³。

1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7—218页。

2 《经济公报》,第18期,哈尔滨,1930年,第23页。

3 仅1931年1月奉天倒闭了一百四十五家大小商号,商号老板逃债的约三分之一(《经济公报》,第4期,1931年,第27页)。

各条铁路的收入极度缩减。1930—31 年南满铁路的收入为二千七百万日圆，利润为二千一百万日圆，比1929 年少了 25%。大多数中国铁路和日华合办铁路经营上都亏了本，1930 年中东铁路的全部收入为四千九百万卢布，而 1929 年则为七千二百万卢布，即收入减少达 30% 以上。大连港 1930 年的货运量仅为 1929 年货运量的 56%。

292 在危机以前，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额、特别是同满洲的贸易额的发展比其他国家的贸易要快得多，甚至比日本同中国的贸易发展还要快。1929 年向中国进口和从中国出口与 1913 年相比，计增加：

国 别	进 口		出 口	
	向 中 国	向 满 洲	从 中 国	从 满 洲
美国.....	7 倍	10 倍	8 倍	80 倍
日本.....	3 倍	5 倍	4 倍	5 倍
英国.....	1 ¹ / ₄ 倍	4 倍	2 倍	16 倍

因为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比重不大，因此在全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总增长是相当缓慢的。1930 年美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只占 16.5%，而 1913 年已达到 7.5%。

美国在华的投资也增加了。

自 1914 年至 1930 年以来，美国在华的投资增加了三倍，达到二亿四千万美元巨大数额。这一数额中的四千三百万美元为传教士的投资，四千二百万美元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一亿五千五百万美元是所谓的商业投资。在一亿五千五百万美元投资中的 80% 属于十七家大公司，每家投资百万美元以上。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是在最后十年内成立的。

美国在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自 1900—1914 年的

2.5—3%增加到1930年的10%以上。

自危机开始，美国人无论在中国或是在满洲的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

南满铁路对中国许多铁路的竞争在“繁荣”时期还可以勉强忍受，而在危机和当地货币对用以计算运费的日圆的比价下跌的情况下，南满铁路就显得十分敏感。来自许多当地工业企业的竞争也加强了，特别是1931年实行中国新海关税率以后，对日本进口的大部分商品的税率大为提高了。由于美国资本积极经营、危机迫使它加强飞跃式的对外扩张的结果，情况无疑更加恶化了。美国资本正在深入或积极企图深入到以下各部门：满洲铁路建筑（不断进行谈判，有时是直接谈判，有时通过德国关于对中国现有铁路和建筑新路贷款的谈判）、汽车运输和道路建筑（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租借权要求）、航空交通（福特公司和其他美国股份企业的要求）、煤炭工业、无线电工业、电业（安东电站、北湖〔镜泊湖〕大水电站计划、参加开发鹤岗煤矿的计划等等）；美国各大银行分行大大扩充自己的营业，着手在奉天设立美国专业银行，“贷款给中国工商业”。满洲小麦（大部分是日本人加工的）、朝鲜和日本大米大丰收时，美国面粉在满洲则按倾销价格出售等等。²⁹³

修建葫芦岛港口使中国铁路具有独立自主和竞争能力，并对日本在满洲经济统治的基础具有异常明确的威胁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危机使满洲优柔寡断的地方资本主义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它的本来就脆弱的独立性会遭受完全消灭的威胁。正是因为满洲资本主义与封建高利贷剥削结合在一起，农业危机对它的危害特别大。满洲“资本家”迄今已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并靠封建和商业高利贷剥削而扩大了投资，但是不能逃避因满洲出口商品价格跌落一半以上而使他遭受重大的打击，尽管他竭力把危机的重担整个地转嫁到生产者肩上。因为大量主要商品的价格跌落和对这些

商品没有需求,不仅收入减少,而且由于在 1929 年和 1930 年夏按高价收购或订购了一部分产品(后来这部分产品的出售价格要低得多),满洲资本家开始蒙受直接损失。如所周知,省银行(半封建、商业-高利贷上层的金融机关)和这个上层中的某些个人在最近时期变成了主要的粮食收购商和投机商,价格的跌落直接影响他们的腰包,正如影响地主的腰包一样,地主们从佃农那里夺取半封建的实物地租,其货币表现的价值与前几年相比减少了 60—75—90%。

294 除了极少数例外(如榨油业),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地方资本的所有工业和运输企业。这些工业部门的大部分在 1930 年都入不敷出;资力薄弱的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破产的尖锐问题,都面临完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和资金来对付危机的尖锐问题。曾经大吹大擂用自己的资金建筑满洲铁路和工业建设的不断宣传现在销声匿迹了。诚然,满洲资本直到现在不打算只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而且也打算,最近甚至企图不使自己处于奴役的条件下,而是在把大部分剩余价值留给自己的条件下吸收外国资本。它曾力图大致与法国资本在沙俄经营的相同条件下吸收美、英等国的外国资本。但是它未能成功,不过在危机前,在“繁荣”时期它仍多少有所收获。帝国主义列强的垄断资本获得了和正在获得在中国和在满洲“经营”的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绝大部分利润归他们自己,借给一定数量的资本必须有无条件的政治上领导权做保证。

日本帝国主义自其侵入满洲的最初一开始主要依靠了封建农奴制上层和高利贷资本,它实际上不仅敌视满洲工业的萌芽,在很大程度上也敌视商业资本、甚至买办资本这一情况也必须加以注意。在最近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日益丧失自己的主要支柱。促成这一点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妄图占有整个满洲,想使当地封建上层象朝鲜皇帝一样“退休”;第二,使

满洲封建上层本身也沦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

美帝国主义对这一点考虑得很周到。美国资本主要在口头上、在某些场合也在事实上给中国当地资本某些发展机会的条件下进入满洲。美国资本选择了地方资本作为自己侵入满洲的工具，在初期不仅不向着直接消灭地方资本的方向活动（而日本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就是这样作的），而且给予它能生存的某些希望。诚然，归根到底美国资本的侵入预示着跟日本统治同样的那种奴役，而美帝国主义留给当地剥削者的剩余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

同时，满洲统治阶层利用美国人的献媚和当时所形成的整个政治形势，大胆地由于不满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最近几年中由于不满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洲地方资本和统治阶层现在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迫切地、坚定不移地选择自己的主人：重新顺从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绳索套在自己身上，或者让华尔街的大王们骑在自己身上并紧紧地套上勒口，那些华尔街的大王们已安适地躺在中国本部地主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背上了。²⁹⁵

不仅满洲封建主和优柔寡断的资本家看到了和意识到了决定的时刻来临了，而且对统治的两个候补者、目前在满洲仅有的帝国主义竞争者——日美垄断资本也都看到了和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活动具有尖锐的战斗性质，那是自然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采取了完全无用的措施。下述事实促成了这一点：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而与美国资本调情的满洲统治上层表示今后向美国一面倒的意图。这不能不使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恐慌，焦急不安，因为若不经流血的搏斗它是不会让自己被排挤出满洲的。

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满洲本身作为它生命脂膏的泉源、作为它在中国和在东亚战略统治基地，它具有巨大的意义，除此而外，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被排挤出满洲，将置它的另一个主要殖民地

——邻近的朝鲜于直接威胁之下，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来说，朝鲜与满洲在方式上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 1916—1917 年日本帝国主义最强盛时期，甚至在行政管理方面曾计划以朝鲜和日本在满“利益”总管理局名义加以完全合并。

甚至在日本被“和平地”排挤出满洲的情况下，日本不仅面临丧失朝鲜这块殖民地的外在威胁，也面临朝鲜国内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地位的削弱无疑极为强烈地促进了朝鲜国内民族革命运动，朝鲜二千万人民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经济和民族压迫。如果考虑到这一切，满洲的丧失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意味着作为帝国主义强国的日本开始完蛋，这是很明显的。

296 日本力图根除在满洲的“美国的危险”所使用的精力，以迅速累进的级数增加着。它的行动实质已不在防御，而在反攻。在满洲开展攻势的不是主战派政友会政府，而是“合乎理智的”民政党人，说明形势的严重性。由于美国资本的积极性及其支持满洲中国资本的结果，日-美的相互关系在 1928 年已达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中国周报》报道：“流传着关于日美战争的谈论”¹。目前这一尖锐化程度比过去要高许多倍，而且孕育着极其难以意料和危险的各种可能性。

在中国着手修建葫芦岛港口之后，日本立即开始反攻，这一反攻首先表现在专门动员报刊系统地准备有关的社会“舆论”，其次表现在组织对中国的“侵略”，即对美国的“侵略”加以“坚决抵抗”所必需的宣传。而且日本大部分报刊都毫不客气直率地说，美国资本是日本人在满洲“受苦”的祸首。

近来各种倾向的资产阶级报刊发出的威胁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致无需怀疑这次宣传运动是经过极其严格准备的。

在这以后的最近几个月内，日本政府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实

1 《中国周报》，1928 年 8 月 4 日，《四方战争》。

际措施。去年底和本年初,内阁召开几次专门会议来讨论满洲“形势”,政府同南满铁路领导人举行了专门会议等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南满铁路外事课长木村开始就一些最重要的铁路问题同奉天中国当局进行谈判,而且毫不掩饰对这次谈判的结果极为重视。

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谈判中表现出很大的机智。例如远东报刊有以下的报道:“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1月21日(1931年)将日皇赏赐满洲元首的一级旭日勋章授予张学良。此后林久治郎同张学良就有关满洲铁路问题进行了谈话”¹。《中国周报》补充报道东京路透社电:林久治郎所开始的铁路谈判按以下要点进行:建成吉林-会宁铁路;偿还投入满洲的“中国”铁路的日本借款;遵守1905年的日华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似乎有义务不得建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或在其邻近地区建筑铁路²。

最后一项要点意味着把中国人建筑的铁路交由日本资本控制,若所有三项要点都予实行,则日本统治地位的加强达到它从未有过的程度,即满洲完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如果履行这些要求,就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加强,特别是在具有巨大重要意义的清津干线敦化-会宁段建成以后。如果履行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对美国资本深入满洲的希望的一个严重打击,同时也意味着美国资本的敌人在整个远东舞台上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大大的加强。 297

奉天意识到日本这次攻势的严重性,力图用各种方法拖延谈判,时而说张学良“不在”,时而说在准备谈判资料等等。同时,中国统治集团竭力要弄清楚美国支持的程度。

日本代表木村和中国代表高纪毅(北宁铁路局长)之间的第一

1 《日本周刊》,1931年1月29日。

2 《中国周报》,1931年1月31日。

次正式会议于 1931 年 3 月末举行,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关于未来谈判的“组织方面的”问题¹。

从所有这些来看,日本报刊断言:“目前对于日本最重要的问题是满洲铁路的建筑问题”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已陷入僵局,借助于一般措施无法找到出路。日本帝国主义者本身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文章标题就这样写着:《满洲的僵局》,《在满洲大灾难的面前》等等。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必须清醒地记住,日本和中国在满洲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不能调和的”³。(异体字是著者加的)。假如日本和中国,确切地说,日本和满洲相互对立而无太平洋彼岸的证人参与,这两种立场是可以“调和”的。

唉!太平洋彼岸的证人就在这里。上面引证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不得不断言:“日本对美国政策的失败导致中国态度的强硬”⁴。

这就是说,关于日本在满洲的措施应该不是同奉天谈判,也不是同南京,而是同华盛顿谈判。日美帝国主义者关于中国和满洲能够达成协议吗?显然不可能。日本记者说:“日本和中国在满洲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应该这样读“日本和美国在满洲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才对。只有这样的措词,这句话才有意义,因为中国是封建军阀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中国和满洲本身的分量,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微乎其微的。现在这个“中国”重要起来了,是因为其他的帝国主义者支持它(在目前情况下是美国)。但是现在有一切根据可以断言,美帝国主义不是那样轻易地从整个东亚、特别从满洲被排挤出去,如象在一世纪的四分之

1 《京津时报》,1931 年 3 月 9 日。

2 《中外商业》,1930 年 9 月 21 日。

3 参看《外交时报》,1930 年 12 月 15 日,赤塚正助:《满洲的僵局》。

4 同上。

一时间中所发生的那样。当时哈里曼、库恩·洛伯公司(申夫)、摩根及其他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主要因日本的顽强抵抗而失败了,其时日本利用了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有力支持。日本政府在俄日战争结束时受过哈里曼的“骗子式的”欺骗(美国报刊经常这样称呼哈里曼)后耿耿于怀,就不断破坏美国深入满洲的一切企图。此外,日本在1915—1918年妄图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美国驻华公使、不是无名的莱因什在当时给蓝辛的信中写道:“虽然列强被迫给予日本在华的行动自由,无疑报复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美帝国主义用1919—1920年的“新借款团”、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不断支持中国反日派系等等方法对日本进行报复,但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说,所有这些只是对真正“报复日子”的准备。这个日子——在中国、满洲问题上日美关系的紧急阶段到来了。在这里不谈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和在整个远东的矛盾,只注视一下为何美国对满洲特别喜爱。

有过许多原因,因为这些原因美帝国主义近四十年来同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满洲站在帝国主义斗士的前列。其中某些原因现在已成为过去,但是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原因。

腐朽透顶的资本主义把争夺东亚广大半殖民地的斗争作为最重要的活动。投资、为本国工业找市场、殖民地剥削——这是他们奔向中国的共同理由。此外,正是某些极为重要的、满洲独有的特点吸引美帝国主义到满洲去。

满洲的殖民地利润直到现在仍是十分高的,资本远不能经常榨取到象在满洲那样的巨大的超额利润。南满铁路、抚顺煤矿等等企业的利润之大,是众所周知的。

南满铁路在1929年(从1929年4月1日—1930年4月1日)仅铁路本身的总收入达一亿二千二百万日圆,纯利润为八千二

299 百万日圆。美国资本对满洲的自然资源已垂涎四十年了。美国著名汉学家、驻华公使馆多年的商务参赞阿诺德在 1926 年美国商务部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实际上整个南满洲是辽阔连绵的煤田……在满洲有世界上最好的农业耕地……有铁、森林、黄金、畜牧业的牧场等等”¹。阿诺德什么也没有遗忘。

资本主义交易额的指标——满洲的对外贸易二十年（1907—1928 年）以来增加了六倍以上，而中国本部的对外贸易在同期只增加了 1 1/2 倍。

问题的实质是：整个这个地区，所有这些财富都掌握在美国的最现实的帝国主义敌人手中。不仅如此：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上经济、战略和政治基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从这里吮吸生命脂膏，它从这里还能威胁整个中国 and 任何想在中国本部立足的敌人。当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还强大、特别当它还统治着满洲的时候，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经济上的深入是处在很大的危险中，因为这种深入是建筑在沙漠上的。

德国在世界大战时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在危机夹攻中喘不上气来的美国垄断资本² 无法遏止力图扩张的愿望，而东亚则是这一扩张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也因为危机而处于困境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把道路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自己也大力进行扩张。它两次尝到了掠夺世界上其他掠夺者的甜头（1904—1905 年和 1914—1915 年），并威胁说，一有适当时机就要与当前的敌人搏斗。在横过太平洋倾注大量黄金以前，美国资本要求自己的华盛顿奴仆保证它将来在东亚的安全。保证安全这就是说把来自满洲的、笼罩在整个东亚大陆上空的日本威胁加以消

1 朱利恩·阿诺德：《中国》，商务部，华盛顿，1926 年，第 13 页。

2 美国的出口总值在 1930 年已缩减了 25%，而在 1931 年则出现了进一步的缩减。

除或使其减到最低限度。如已指出的，满洲本身是东亚最肥美的一块肉，因此日美不可调和，因此日美的任何协定都是短命的，即使这种协定还能达成的话。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其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特别着重地指出下述事实：太平洋两岸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在各个领域和各方面都非常尖锐地相冲突。共产国际纲领在关于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矛盾一章中说道：“在太平洋交织着矛盾的焦点，而美日冲突则是各种矛盾的主要基础。”³⁰⁰

当中国的（南京和满洲的）统治阶层的心境都反日，当他们日益陷入美国影响下的现在，公开的冲突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利的。但是中美的逼攻已使日本帝国主义退到了极限，拖延战术已经再也不能用了。美帝国主义深知，在十分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它目前在中国的地位是多么有利，而这种有利的局势随着日英接近的加深可能很快变坏（虽然现在事实上英国已与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华尔街，这使美国对远东的炽热情绪稍微冷了下来）。

为了制止美国（“中国”）的攻击并准备自己出击，日本帝国主义抓住了最后一个机会。日本帝国主义的出版物已经半年多无休止地宣传“赤祸的危险”，宣传苏联“马上和完全不可避免地侵占”中国和满洲，如果中国对日本不执行较友好的政策以获得日本援助的话。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劝人相信：（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只是为了尽快地占领满洲和中国。

殖民主义代理人中最著名的骗子之一、《远东评论》杂志编辑布朗森·利装着一付严肃样子月复一月地反复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让日本建筑清津干线敦化-会宁段、开设昭和制钢厂和不满足日本的其他要求，则中国和满洲的末日就将来临。日本本身也有毁灭的危险，如果把上述铁路的建筑哪怕推迟一年而不赶紧同中国达成协议的话。苏联似乎已准备吞并满洲、中国和日本。

布朗森·利写道：“北方的苏联威胁具有十分可怕的规模，倘若日本不同奉天达成协议（目前还有时间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对两个民族来说，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¹。”

301 然而，不顾东京的奴仆们的努力，中美反日路线照旧执行，而且加强起来。也没有愿从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中寻找“救星”，来摆脱苏联和五年计划的威胁的明显征兆。不仅这样，最近在中国出版的中美报刊开始对日本帝国主义妖妇的热情呼吁加以嘲讽。

当然，“来自北方的赤色威胁是巨大的”，“应当怕它”，但是要说“苏维埃明天早晨就会把中国吃掉”，那是日本宣传家的过分夸大。如果中国接受日本关于防卫赤色威胁的建议，根据《中国周报》的说法，这将是“狮子把小绵羊放在自己肚子里加以防卫”的那种防卫²。

《中国周报》揭露日本的真实意图和计划是完全排他地奴役满洲，并答复布朗森·利的文章说：“中国必须在满洲继续建筑自己铁路的政策、奉天和南京（即奉天和美国。——著者）合作的政策，在满洲必须继续加强国民党（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著者）的影响。”

这个得意的反苏题目已经扯得精疲力竭了，帝国主义者门多少次企图利用这个题目相互进行欺骗，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手段已不中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最后机会”大概不会带来所希望的成果。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很顽强，它不愿放过有利的局势，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者之间在远东你死我活的决战的威胁是很严重的，形势是很紧张的。

既然华盛顿会议对于中国问题、满洲问题以及整个远东问题

1 《远东评论》，1931年1月号，布朗森·利：《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第7—8页，《地图上划一条线》，第13页。

2 《中国周报》，1931年1月。

召开大量会议来加以讨论，未来的“世界裁军会议”也应对日美在东亚的对立花较多时间来加以讨论，当然，如果在裁军会议以前不发生任何特别事件的话。

但即使美帝国主义者和南京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对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企图以苏联“吞并”满洲来吓唬他们，使日本帝国主义便于在满洲放手去作，公然加以嘲笑，那也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胡佛（当时美国总统。——译者）的喽啰们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自己不采取完全同样的最肮脏的挑衅性的宣传方法。

美国金融资本的机关报《纽约时报》还在本年初就很乐意刊登该报中国通讯记者的文章，极糊涂而又很冗长地议论关于“俄国熊的爪子”，“日益深入地扎入中国的躯体”，关于“不可避免的苏联对新疆的威胁”，关于“莫斯科和中国之间由于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广大地区的决战来临”。有个姓阿宾德的人专门擅长给《纽约时报》捏造反苏谰言。对于英日在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出版的不列颠报刊¹极详细地转载《纽约时报》的阿宾德的胡诌，并在自己的社论中经常加以利用。³⁰²

不用说，在研究分析满洲问题上日美矛盾尖锐化问题时，不能丢开整个中国国内外的形势，不能不涉及全中国、特别是满洲的反帝土地革命问题。

在中国南部开展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前进运动，对于中国的遥远北方地区——满洲的居民不能没有影响。南方的苏区，对于遭受异常压迫的满洲工人和农民来说，这是召唤、希望和目的。

中国南部红军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以及中国大工业中心群众的革命化，对于发动满洲的革命运动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

1 参看《京津时报》，4月15和16日，《中俄争论中赌注的主权》，《俄国在新疆的损失》等。

在满洲农村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建立在封建制度的残余上，而满洲的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的残余紧密相联，在这两者上面耸立着帝国主义的剥削，所以满洲面临着中国其他地区所面临的同样的革命问题。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满洲的主要部分(南满)变成为几乎是自己独占的殖民地，所以满洲的反帝革命面临很多额外的困难。有可能，满洲的必胜的革命同日本的必胜的革命结合起来。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因为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这里完全有效。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能由外部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那里或从必胜的中国革命那里受到致命的打击。

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威胁连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爆发革命的威胁，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最尖锐的矛盾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战争问题上，这是最重要的抑制因素，无论如何无可怀疑。

但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空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制动器”、“保险器”都很少有效了。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威胁增加了，帝国主义者企图牺牲苏联来解决本身矛盾的威胁也增加了。

冲突后的苏中关系

1929 年的冲突证实了苏联的威力，但是这次冲突也向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赤色帝国主义”的人们表明，这样的“帝国主义”根本不存在，这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的虚伪宣传。苏联击溃中国军阀的武装进攻之后，并未表现出利用胜利成果的任何意图，也未要求任何“赔偿”，如象每个帝国主义敌国所作的那样。中国统治阶层担心“中国现在要丧失掉”呼伦贝尔，因为那里将成立“苏联保护下的特区”，使他们惊奇的是这种担心原来是没有根据的。苏联只限于要求根据北京和奉天两协定恢复现状，并在今后履行这些协定的条款。

完全依赖帝国主义者并在其影响下的奉天统治阶层的半封建本性还在继续表现出来。奉天的骑墙政策在冲突以后极不稳定，就象钟摆一样摇摆不定。

无论在莫斯科同莫德惠的谈判中，或在当地、在满洲中国当局同苏联代表的相互关系中都表现出了奉天的骑墙性和动摇不定。

1930 年 2 月 25 日签订的伯力议定书规定了彻底解决两国关系的苏中会议的召集日期。

会议的拖延和缓慢、莫德惠的自相矛盾的声明、他否认自己的宣言和保证、最后于 1930 年 12 月 12 日开始的会议工作中断达四个月之久、工作速度的进一步缓慢——所有这一切都是奉天动摇不定的政策的结果，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它施加的影响。特别是日本的挑拨者现在积极地活动起来了，它打算为自己在满洲的进攻准备基地。

挑拨者照旧鼓吹关于苏联的“侵略”意图的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1930年2月9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说蔡运升签署伯力议定书是“越权行为”，因为议定书包含有不能接受的条款。请看，解除白匪武装竟成为“不能接受的条款”。满洲统治者仍然合乎理智地不愿使自己的地位再度恶化，虽然延误了时机，但仍派莫德惠去莫斯科，并授予代表南京的全权。南京很不愿意，但也不能不委以全权，因为即使不委以全权，会议反正是要开的。

莫德惠到了莫斯科而且会议也开始了，帝国主义者和南京仍竭力破坏会议。他们达到了目的：纵然会议不完全破裂，也大大的拖延了，最后会议工作中断，这当然也是一定的“成就”。

危机连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恶化和因此而引起的哪怕部分地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获得较多的政治上独立的企图——不可避免地同时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在半殖民地经济作用的加强，引起对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半封建主进一步加强的奴役，从而归根到底也引起帝国主义者政治势力的加强。

苏联坚定、自制的路线使帝国主义阴谋家及其在满洲的白匪和中国走狗的挑衅活动未能得逞。在这方面的企图是极其严重的。苏联代表到达哈尔滨不久，1930年1月27日哈尔滨白匪帮袭击中东铁路局是这种企图之一。匪首公开赞扬帝国主义列强对他们行动的支持。白匪在哈尔滨街上对苏联公民进行强盗般的突然袭击，白胡匪“头子”季杰里赫斯大摇大摆地来到哈尔滨，在中国侦缉队服务的俄国白匪以共产党员名义出版的挑衅传单、白匪武装部队在侦缉队队部内准备的对中东铁路沿线村镇和车站居住的苏联公民——中东铁路职工进行袭击，所有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孜孜不倦工作的标志。为了答复苏联情绪平静的、强硬而坚决的要求，奉天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被迫采取某种措施以反对血腥和丑恶的代理人。这些措施都是不彻底的，往往不及时，不执行

到底。但是这些措施即使是不彻底的和局部的，对于维持苏联同奉天“半正常的”关系仍有一定的有利影响。

奉天很理智，不需多费唇舌就把它进攻苏联中东铁路时所雇用的几千白匪解雇了。1930年夏，白匪特别加强反苏的积极活动，苏联政府坚决要求对这些杀人犯和匪帮采取措施。奉天政府（以及南京政府，因为奉天的“交涉员”同时也是南京外交部的“特派员”）在答复的照会中承认苏联政府的要求是正当的，通知已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些要求，承诺不允许白匪在满洲有仇视苏联的活动，向苏联国境进攻并袭击满洲的苏联公民等等。

在这里全文引证 1930 年 10 月 9 日“中华民国驻奉天外交特派员”照会，该照会是最近期间满洲同苏联相互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文件。照会内称：

“为答复苏联总领事面交张学良元帅第 018 号苏联政府照会，东北政务委员会兹通知：本会早已采取并实际执行制止白俄活动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关于伯力议定书指名列举的白卫军人一节，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东北特区行政机关，已及时通知将上列人员驱逐出境。其后又发布指令着仔细寻找上开各人以维前令。

至于白俄首领季杰里赫斯将军来哈尔滨，刚刚获悉此事，立即指令调查此次来哈全部情况及欢迎和集会等，并令停止此项活动，如季杰里赫斯尚停留在哈尔滨，即令其出境，查明彼等在上述活动中有犯罪事实后，对其拥护者加以惩处。

为制止中东铁路地区内白俄组织的武装袭击，我方曾派军队前往追击、搜捕和驱逐。近半年来，几支部队从事这种搜捕和剿灭，目前该部队正继续加强该项工作。前不久曾向该地区派增援部队以期完全歼灭白俄武装部队。我方对此问题的注意力并未减弱。

关于在中国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服务的白¹俄，必须指出，

1 保持原文件方式。

306 所有这些目前在哈尔滨工作的人都是老居民，很多年以前就居住在这里了。当时中国是从人道方面对待他们而让他们工作。

这些人的全部愿望只是在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他们不应该仇视苏联和中国。无确实根据驱逐他们，与宽大原则不符，但同时当然必需严密侦查他们的活动。若他们安分地实现自己的职责，把他们全部解雇是不合适的。当一旦发现这些人有越轨行为，决不予以丝毫宽容。

关于假借共产党员名义印刷挑衅性传单，实际上是在哈尔滨侦缉队服务的白¹俄所为。特区警察局查明，这是几个人为骗取钱财之个人行为。为杜绝他人类似行为，对费多罗夫等人已依法予以惩处。

关于白卫军报刊进行反苏宣传一事，已令特区长官进行彻底和仔细侦查。若白卫军报纸出现关于苏联不适当的议论，当然必须对此加以制止，并不听信其挑唆。总之，中国完全无意保护俄国白卫军或对其加以庇护。以赫杰列夫(中文拼音的俄国姓)为头子的十四名白俄企图潜入苏联海兰泡偷袭苏军一案可为例证。滨江警察局获悉上述情报后，立即对该项人犯加以逮捕，目前正在审讯中。所有这些情况足以证明，我方事实上正采取措施以制止白俄的活动，完全无意允许彼等活动或对彼等加以庇护，请苏联政府对此深信无疑。”²

制止白俄活动的诺言四分之三上都停留在纸面上。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报上公布奉天政府采取“步骤”和“措施”照会的同一天，报道白匪在中东铁路线上杀害铁路职员哈哈索夫和鲍戈留鲍夫，并有几名职员受伤，同时又报道白匪袭击事件频繁起来了³。

1 保持原文件方式。

2 《真理报》，1930年10月19日。

3 同上。

在某些场合，中国当局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尤其是白卫军匪帮在其匪盗般的袭击中对中国居民也不饶过，被他们碰到的所有人都遭到抢劫。例如 11 月间逮捕了兹科夫一伙共七人的白卫军匪帮，12 月间在海拉尔附近中国当局捕获了佩什科夫一伙共四十人的一群匪帮¹。 307

苏联和奉天的代表在中东铁路的工作做得比较满意，无论如何比在不断反苏挑衅和武装反苏总进攻以前要好多了。关于铁路商务活动方面双方已取得一致意见并实施了某些重要措施，例如对当地的运输规定了随大洋行市变动而不固定的运费率，这减少了(正确地说，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当地运费照大洋固定行市计算所受的损失；进行了运费的某些改革，规定公文处理上用两种语言(俄语和汉语)等等。

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全力不让同苏联改善关系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除了自己的外交家、报刊、铁甲舰等等为此目的效劳以外，还有大量直接和间接受日圆、美元、法郎和英镑豢养的中国封建主-将军、商人买办、御用学者和记者们为他们效劳。

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了得到报酬，对于任何下流勾当、任何虚伪捏造、任何愚蠢的推论都不择手段加以利用。这些代理人今天喊叫“苏维埃帝国主义”必然要占领满洲和中国，明天又说从西伯利亚到乌拉尔山“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殖民地”；今天添枝加叶地说“国际”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明天又对全体俄国人民本身加以大肆污辱，说中国人比“淫荡的、懒惰的斯拉夫人”高尚得多。

左右逢源、卖身投靠的记者兼“学者”曹良恩(译音)，他是《华北明星报》前编辑之一，在中美报刊上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污辱诽谤，不惜用露骨的沙文主义的推论和攻击，况且南京官方出版

1 《消息报》，1930 年 2 月 24 日。

物——《中国经济杂志》也为他效劳。这位“学者”首先“科学地”确定，俄国人“通常是懒惰的”（“因为现在国家给人民面包，而人民却很少关心劳动”）¹，与俄国人（“懒惰、放荡、肉欲、贪食、无止境地溺于性的满足和淫欲的人”）相反，在满洲的中国人是“热爱劳动、勤俭的、有高度文化的人”²。

其次，曹良恩得出结论：由于满洲的中国移民是来自孔子的故乡山东，而山东的居民都具有中国的道德，又由于“土地所有者和农民有同样的文化修养”，“在满洲经济剥削的一切危险都消除了”³。

一句话，满洲是中国农民的真正天堂！……曹良恩在满洲移民中发现存在六个阶级（II），而且任何一个移民由于同样的文化修养能很快地跳到最高的“阶级”。根据曹良恩的说法，全体满洲农民同时是“农奴也是封建统治者”⁴。（曹的文章中确是这样写的）。当然，在中国人有这样理想的社会制度下，曹良恩对于“中国城市不久就扩展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冻土带以及蒙古心脏地带”⁵是毫不怀疑的，对于不久将来俄国的东方国界将不是太平洋海岸，而是乌拉尔山⁶也是毫不怀疑的。根据“学者”的统计，这一点之所以特别容易实现，因为西伯利亚只有四百七十万居民，而其中有三百五十万中国人和一百万通古斯人⁷，“几乎也是中国人”。

一会儿说，“苏联吞并中国”，一会儿又说，“西伯利亚到乌拉尔

1 《中国经济杂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实业部工商情报司，1930年6月，曹良恩：《中国移民及其原因和性质》，第722—723页。

2 《中国经济杂志》，1930年8月，第833页，曹良恩：《满洲的中国移民方法》。

3 《中国经济杂志》，1930年8月，第834页。

4 同上，第833页。

5 同上，1930年8月，第737页；1930年7月，第741页。

6 同上，1930年8月，第738页。

7 《中国经济杂志》，1930年8月，第735页。曹良恩认为，西伯利亚现在的居民甚至少于四百七十万，因为“这是在第一次大战前统计的，自那时起居民更减少了”。我们奉告该“学者”，在他所理解的西伯利亚地区1930年居住着一亿三千五百万人。

是中国的殖民地”——这就是远东“有学问的”新闻记者们听从帝国主义支配而匆忙凑成的无法消解的废话。因为他们胡说八道，因为主人本身也嘲笑这些粗制滥造者的奇怪行为和胡闹，甚至中国居民对这种愚蠢作法表示憎恨，但是这些新闻记者及其主人们由此而犯下的罪行是不会因此而减少。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在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关系尖锐化时期、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半殖民地国家及殖民地之间关系尖锐化时期，露骨的沙文主义的强烈反苏的抨击，说明帝国主义者和从属国家剥削统治阶级力图“牺牲苏联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苏维埃国家是革命的堡垒，以自己的存在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阻碍发动新的战争、阻碍重新瓜分世界、阻碍在本国广阔的国内市场 309 上作威作福，特别在现在因为经济危机这种市场对资本家是必需的”。

“由此就产生一种冒险袭击苏联和进行武装干涉的趋势，这种趋势一定会随经济危机的扩大而加强起来。”¹

这种倾向在欧洲有了加强，在那里反苏狂热病的发作也传染到军火大王和银行家，在远东、日本、中国、满洲这种倾向也都加强了，布朗森·利、曹良恩、阿宾德在这些地方喷发出大量的反苏墨汁，而佐藤信胜则借助于布朗宁手枪²。

帝国主义者中间失去理智的、极为好战的反苏分子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组织反苏冒险行径，是多么可怕地在玩火。

历史和反苏的武装进攻已判定资本主义世界的死刑，资本主义是用亲手加速这一死刑的执行。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不管是谁发动反苏战争，迟早要变成国内战争，它不可避免地使企图采取这种缺乏理智的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剥削者的统治完蛋。

1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3页。

2 日本人佐藤信胜用手枪打伤苏联驻东京商务代表。

反苏运动的指挥者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直到现在还未下决心进一步准备和演出。

但同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增长速度在加快，它在各方面，特别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的，在美日（在紧要关头英国大概同日本站在一起）之间关于满洲问题和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也在增长。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说道：由于危机的结果，“战争危险将加速增长起来”。这一危险实际上已增大到极为可怕的规模，不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力图牺牲苏联来解决自己的矛盾，或是在帝国主义之间大屠杀威胁的意义上，这种危险都是非常巨大的。战争的危险在满洲问题上特别大，关于满洲问题的矛盾在加速帝国主义者的武装进攻上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四时期¹

310

日本占领满洲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发动了武装进攻。日军占领满洲以后，侵占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河北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准备夺取中国北部的其他省份。日本外务省在1934年4月就已提出要求，要其他国家不给中国提供贷款，不给中国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要它们在中国采取某种步骤以前和日本政府“商量”。换句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重新企图宣布整个中国是它独占的势力范围。

满洲和与满洲有关联的事态发展的速度从1931年春天起大大加快了。

满洲的中国当局继续顽强地抵制日本在“铁路问题”上的要求。前面已经指出，实现这些要求就意味着满洲完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地方的统治阶层还决定采取其他一些步骤来消极抵抗日本的渗透。在日本人根据二十一条迫使北京政府同意日本人长期租借土地的权利后不久，规定了一项非正式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任何中国人租地给外国人要受到严惩。从1931年5月1日起，在奉天省正式实行了这项法律。犯有长期出租给外国人一至五十亩土地或出售给外国人一至五十亩土地罪行的人要判处五年直至终身苦

1 这是再版时补写的章节。

役。犯有出租土地五十亩以上罪行的人要判处死刑¹。

在日本管辖下的关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地区（日本人把这些地方一直看作是自己的法定殖民地）的中国居民在 1931 年春天推选了出席南京政府组织的中国国民大会的代表。南京确实没敢让这些地方的代表参加它排演的“国民大会”，但是形式上臣服日本的这些地方的中国资产阶级搞的选举本身，而且请求准许他们出席大会，这是不承认日本管辖的示威，是敌视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的示威。

满洲的地方资本和地主只是因为几乎是绝对相信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支持，他们才表现出“勇气”和顽强。

他们这种相信当然不是根据外交代表的虚幻保证，而是考虑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开发满洲的实际利害关系。

在这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时期参与对满洲的贸易扩张的动态是相当说明问题的。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各国在满洲进口中所占比重如下（不包括从中国本土的进口。以海关两计算的进口值按每年平均行市换算成美元，并以此为根据计算百分比）。

日本在满洲的国外进口总值中 1918 年占 70%，1919 年占 66%，1920 年占 69%，1921 年占 64%；1928 年下降到 53%，1929 年为 56%，而 1930 年则为 54%。缩减是相当显著的。在同一时期从朝鲜进口所占的比重也下降了 1—2%。

从美国进口的 1918 年占 11%，1919 年占 14%，1920 年占 10%。一直到最近时期它保持原有水平：1929 年为 11.5%，1930 年为 10.5%。

日本在满洲进口中所占比额的下降是由于从香港进口的比额增加（从 2.5—4.5% 增加到 6%），从英国进口的增加（增加 1—

1 《京津时报》，1931 年 6 月 11 日。

3%),从德国进口(从零到4—6%)和从某些其他国家的进口。

如果把从中国本土的进口包括在内来计算满洲的进口,并按生产这些进口商品的资本的“民族”来分析从中国本土的进口以及从香港的进口,那末日本在满洲进口中所占比额的下降显得更大。具体说来,日本的进口在1918年约占60%(连同朝鲜一起),而在1930年下降到36%左右。

因为美国商品和英国商品大量地从中国和香港再出口到满洲,所以美国和英国在1918—1920年间、特别在1928—1930年间所占比重实际上要比上面列举的更大些。在这最后几年,外国制造的商品从中国港口再出口到满洲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在评价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时,如果象有时所做的那样,³¹²仅限于确定所谓现存的“实际”利益——进口商品的数字,已经投入的资本数字等等,那会是不准确的。

帝国主义者在这个或那个半殖民地的利害关系远不限于此。资本扩张的趋势、控制一定地区来剥削居民和开发自然资源的趋势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实际观察问题时,甚至在我国的文献中,有时也完全忘掉了这些趋势的作用。

特别是关于满洲问题可以看到这样些意见:在满洲不存在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巨大的“实际”利益,因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会为满洲而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争夺。

但是在观察帝国主义的利益和矛盾时不能把满洲脱离整个中国而孤立起来看;此外,问题不仅在于现存的“实际”利益,而且在于帝国主义扩张的趋势。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总的扩张趋势愈来愈大,同时总是对满洲怀有特别的“爱好”。

这种“爱好”在1930—1931年间由于经济危机加强了美国资本的侵略意图而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满洲的半封建主确实有充

分理由指望华盛顿去反击日本独占的要求。

日本占领前的 1931 年的特点正好是美国的空前的积极性。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发展自然不限于中国一国，更不限于满洲。危机的夹攻愈来愈紧，促使它到处加强殖民扩张。在 1931 年上半年，美国主要工业产品比危机的 1930 年上半年下降了 30—40%。美国的出口比 1930 年下降了 36%，比 1929 年下降了 50%。在 1931 年上半年期间，商品的批发价格下降了 12%，许多最主要的股票价格仅在上半年来就下跌了 40—50%。失业人数达到了一千二百万这个庞大的数字。

美国资本的代理人无论是在全中国，还是在满洲，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蒋介石甚至弄到一个美国顾问罗·路易斯。早在 1930 年就和美国柯蒂斯公司签订了著名的关于在中国开辟航线的合同，为此建立了中美合资股份公司。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13 收买了上海的电话网，并承担了大大扩展电话网的义务，组织了中美航运公司，进行了提供白银贷款的谈判等等。

这里不详细谈美国在中国本土的活动，因为这超出了本书的主题范围，但是我们要列举许多说明美国在满洲的狂热的积极性的材料，美国人当时力图渗入经济的各个部门，而且中国人常常自己主动和美国资本进行谈判。

例如 1931 年春，呼海铁路管理局和美国人谈判借贷一千万银圆，用以建筑通往鹤岗煤矿的铁路支线。贷款应以煤矿作保证。在 5 月，同美国资本的代表开始谈判借款修筑吉林-同江铁路的问题¹。

当时设计了建筑从大虎山-白音太来(通辽)铁路上的芳山车站通往孙家湾煤矿的铁路支线，美国资本要参加修筑铁路，也要参

1 《大北新报》，1931 年 5 月 15 日。

加开采煤矿¹。

日本报刊十分惊慌地报导说，同美国人正在谈判提供巨额贷款来赎回用日本贷款建筑的满洲所有日中合营铁路。真是草木皆兵。还不止一次地刊登“可靠”消息说，美国正同苏联谈判购买中东铁路。日本杂志《支那》还在1930年10月就根据以上这些消息写道：

“我们不能对这种说法无动于衷，特别是对满洲抱有明显的功利意图的美国要登台的话……因为美国总是在等待有利时机来实现它对满蒙的自私自利意图，所以日本应该有充分准备，以便采取相应的坚决措施。”1931年5月，这家杂志在举了许多例子以后明确指出：

“美国的政策在张学良上台后逐步顺利地实现。美国投资的过程采取愈来愈公开的形式。”

杂志在指出美国不仅在满洲、而且在整个中国进行扩张以后，写道：“事态发展的结果将是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归于消灭，这就迫使日本采取相应的措施。”

日本帝国主义者十分惊慌是可以理解的。除关于美国购买中东铁路的“谣言”以外，确实还存在大量严酷的事实。

1931年6月，美国福克尔航空公司同张学良签订关于在奉天³¹⁴建造一个飞机工厂的协定（这个工厂显然是用来装配和修理飞机的）。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就建造汽车装配厂以及将一系列公共汽车路线交付他们经营的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人还给奉天人建造了无线电台，建立了通过大洋和旧金山的联系。

据报导，1931年5月，成立了在四平街—洮南—昂昂溪铁路地区开采煤矿的美国公司。该公司的股本为一千万银圆，奉天当局将煤矿交付公司使用的期限为十年。其它的一些报导甚至还说，

1 《京津时报》，1931年5月1日。

编制了一项和美国资本共同开采满洲矿藏的包罗万象的方案¹；美国人组织了考察东三省矿藏的许多勘测队，并打算成立满洲的专用银行。

东洋拓殖公司(东拓)要求日本政府津贴八千万日圆，“以便削弱美国在满洲业已加强的积极性”。

1930年期间，美国资本的一些个别代表到中国和满洲参观的目的是为了开展他们的活动，这种参观的结果是美国大银行的代表大批地来到中国，特别是1931年4月很多大银行的代表长期逗留在奉天和哈尔滨。这些人中为首的是罗·爱德华尔德，他在同哈尔滨报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在美国大量资本用不上，我们要为它向其它国家找出路。”

爱德华尔德已和国民党政府在原则上谈妥加强美国资本的扩张。爱德华尔德说：“关于美国资本向中国工业投资的问题，我的观点和南京政府商业部长的观点完全相符。”

爱德华尔德在解释自己来满洲的原因和目的时说：“我对北满这个矿藏丰富、潜力无限的地区非常重视。现在我们正在选择目标，美国资本的工作将仅涉及工业部门。”²

继美国银行资本代表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专员也于5月底到达满洲，他拜会了当局的代表、国防参谋部、交通委员会和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商务专员的莅临是和满洲总的开展活动有关。他在中国铁路提供设备以及对吉林-龙井(延吉)铁路提供经费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美国银行在这一时期据说对满洲的某一中国商行提供了二千万中国银圆的贷款(可能签订了合同)，并筹划在全国开设二十七个分行，总办事处设在哈尔滨。还听说，这个银行好象签订了提供

1 《盛京时报》，1931年5月16日。

2 《公报》，1931年4月28日。

七千万元的协定，“以发展满洲的采矿业、工业和交通”。¹

在占领前不久，满洲和中国的报刊又都重新报导了类似的消息，只是形式稍加改变而已。

突出的一点是，1931年春，美国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升级为总领事馆，并且扩大编制人员，这和美国在北满的开展积极活动是步调一致的。

但是，在满洲选择“目标”的不仅有美国资本。英国资本和德国资本最殷实可靠的代表团——经济侦察队——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也都来到满洲“选择目标”。

瑞士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布朗热于1931年5月抵达满洲，他说：“在欧洲，对满洲的兴趣大大超过对中国其它地区的兴趣。”²

这不是一句空话。它反映了实际情况。虽然满洲的农业危机极其严重，但是，由于满洲所特有的很多条件，它看来能给各国处在危机夹攻中窒息的资本带来殖民地的超额利润。资本被吸引到这里来，窥视并开始抓住“目标”不放。

特别是关于英国资本的报导说，就在日本占领前它直接渗入了早就想染指的采金工业。据说，汇丰银行为开采北满的金矿大概投资好几十万英镑，和其它投资加在一起，1931年期间这家银行在满洲的投资达到一千五百万日圆³。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曾经和张学良签订修建葫芦岛港合同的荷兰辛迪加的招牌下，实际上隐藏着不列颠的资本。英国人曾同张学良谈判扩大自己银行资本的活动——在满洲开设资本为三千万美元的英中银行。

而且，美国资本也特别看中金矿。1929年和1930年均派遣特

1 《大坂每日新闻》，1931年7月14日。

2 《公报》，1931年5月8日。

3 《经济消息》，1931年，第19期，第21页。

316 使来北满。1931年，他们和中国当局就美国资本参加开采金矿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和机关枪制止了外国资本在满洲“选择目标”和一切重大活动。

*

*

*

日本帝国主义在9月武装出动以前的几个月内，便着手进行占领满洲的系统的和直接的准备工作。他们首先在前沿阵地配备野心最大的活跃分子。

在各种变动中应该指出的是，6月间任命内田伯爵为南满铁路总裁。正如部分日本报刊吹嘘他的那样，这位“非党”总裁的任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的“非党性质”和沙俄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所具有的“非党性质”是差不多的。

内田是元老西园寺公爵内阁仍然健在的成员中受到信任的人，是封建地主死硬派的傀儡。内田多次担任过外相。他在西园寺内阁、原内阁、高桥内阁和加藤友三郎内阁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他同政友会有联系，还同由一部分日本地主、一部分军阀以及某些最大垄断资本(三井)联合组成的党有联系。

三菱和民政党的代表——江口(原三菱公司经理)仍担任南满铁路的副总裁。这表现出在危险的地段和危险的时刻的“民族团结”。

内田的任命事实上证明：日本的黑帮分子和最主战的资本集团已浮到表面上来，他们准备把政权直接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虽然民政党的若槻-币原政府由于危机的促使，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并不亚于田中的“积极政策”时期，但是日本资本野心最大的分子和军事封建的掠夺者认为，在日本本土和在殖民地的土壤都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脚下摇动得越来越厉害，因此，他们决定进行“比锅”赌(赌博用语，照庄家所有的钱下注。——译者)。

民政党有它自己传统的关于对中国“友好”的漂亮话，它拥有参加该“党”的日本资本中对于在一定范围内同美国及苏联保持和平经济关系感兴趣的某些阶层。这个党关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主义有一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废话，因此它对于准备大干一场的日本军事警察君主制度的军事封建分子以及最好战分子来说 317 是个障碍。

日本直到现在还是财政资本统治和资本主义经营方法同封建农奴制的严重残余以及资本主义前的经营方法交织在一起的典型。

地主封建分子的影响十分严重。它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如这些人对于停止民政党内阁的执政起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民政党在国会中占多数，而且不久前获得了大选的胜利。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走上“战争的道路”后不久，12月，天皇“号召”地主死硬派以及与之联系最密切的资产阶级阶层执政。这里可以看出(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1903年维特停职相类似的情况。若槻和币原“下台了”，虽然他们也和维特当时一样，早在停职以前就已完全实行侵略性的政策。但是，即使在犬养内阁中也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有势力的代表(虽然现在主要已是政友会的成员)，这一点也正好是同日俄战争前夕的沙皇政府相比的一个重大差别。

我们认为，列宁在布拉格会议的决议中对沙皇制度所作的鉴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说明现代日本的“天皇制度”，当然，应该考虑到崭新的历史情况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

列宁当时写道：“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并在欧洲愈来愈被挤到后面的沙皇制度，现在与黑帮贵族和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勾结起来，企图对边疆地区、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芬兰、波兰、西北边区)实

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各国（波斯、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来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¹

1915 年列宁又指出了俄国“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和占优势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列宁的这一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于日本的现状。列宁写道：“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²

而列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也把日本和俄国等同起来。1916 年列宁指出：“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³

日本的地主土豪以及银行资本（通过地主土豪或直接地），不仅在殖民地—朝鲜、福摩萨，而且很大范围内在日本本土也保持着对农民的半封建剥削制度。日本的整个政权机构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均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前各种关系的极其深刻的痕迹。皇帝的御前会议、“元老院”（“最老的国务活动家”会议）、氏族残余及氏族“族长”的影响和权力、君主制度相对的独立性——所有这些也是现代日本所能自夸的。

“军事行政厅长官楠本讲话”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思想意识的典范模式，这个讲话是他在占领萨哈林时期（1922 年 10 月 30 日）口头发表的，后来印了出来流传于民间。这篇讲话特别突出而明显地描述了日本统治阶级打算强加于萨哈林自己暂时的“臣民”的思想意识，我们在这里摘引几段：

“要了解日本，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日本皇帝。这个概念使我们

1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440 页。

2 《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85 页。

3 《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14 页。

能够对日本有个完整的认识。

……皇族从一开始到现在连绵不断共一百二十二代，经历了二千五百八十二年，对它的特点我请你们特别注意。在第一代皇帝以前，他的祖先天照大神派自己的孙子琼琼杵尊来管理日本。

……因为日本皇帝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神，并且按照神的精神管理国家，因此他的各族臣民均一律享有皇帝的同等无限恩典和仁慈。其实，从族系来说在日本臣民中有中国人、朝鲜人和其它民族。虽然如此，所有这些民族都团结成为一个整体。

……你们都看见，我有一把马刀，但这只是用来按照皇帝的神圣旨意建立和平的。

最后，我庄严宣布，我将根据日本皇帝的上述旨意并遵照民政当局最高长官的正确派遣，诚恳地履行自己的职责。”¹

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其它很多特点。有人说，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叫作“印花布的”或“纺织的”帝国主义，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日本的重工业不太发达，而轻工业却很发达。

日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纺织品。危机前纺织品和丝绸在日本出口中约占 70%。

特别是对中国，尤其是对满洲，日本大量输出棉织品。由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构中纺织工业具有很大意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占领和扩大殖民地市场以销售自己的纺织品。

生丝在日本的出口中占第一位，但它主要是手工业产品，而且几乎只向美国出口。如果把生丝除外，则在日本纺织品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棉织品。危机前日本棉织品的年出口额平均为五亿日元，其中对中国的出口约为二亿日圆。

从满洲来说，则危机前的最后几年中最普通的棉织品（原棉、

1 《北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1928 年，第 164—166 页。

棉花、成衣除外)在日本对满洲的出口总值中平均占 30—40% (年平均为二千万—三千万日圆),而在满洲这些商品的总进口额中,日本占 85%—90%。

但是,满洲这些纺织品的进口 1930 年比 1929 年下降了 50% (1929 年为二千六百万日圆,而 1930 年为一千三百万日圆),1931 年又比 1930 年下降了 40%—50%。日本对满洲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但是除此以外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个原因——满洲地方的中国工厂、从中国本部运来的纺织品以及德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纺织品的竞争。在占领前,地方纺织品的销售额比日本纺织品的销售额有所增加。银币价值的下跌和其它行情性质原因有利地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

日本资本在满洲强制地建立总的垄断地位,也保证了对日本工业很重要的纺织市场的垄断。日本的纺织商由于英国资本对印度垄断作用的加强,因而在这一时期缩减了对印度的出口,所以也力图靠满洲来进行弥补。

此外,棉花对日本来说还是进口原料,因此日本殖民者多年来已经把南满用作这种原料的产地。

日本帝国主义结构中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宗主国缺乏重工业所需的各种重要原料。

日本帝国主义在自己的岛国上能保证供应的只有煤。但是日本没有好的炼焦煤,它主要由满洲(本溪湖)进口。

至于说到铁矿,则日本虽有某些贫矿资源,但是日本铁矿的开采量微不足道,在日本的冶金重工业中起着完全无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铁和钢或者是进口的,或者是用进口矿砂冶炼的。

日本对铝需求量的 95%、铅—90%、锌—70%都是进口的,其它各种金属也是大量进口的,对石油及其产品的需求量日本进口 70%,日本还进口肥料、化工原料、木材和食品。

所有这些原料都能或多或少从天然资源富饶的满洲取得，更不用说对满洲三千万居民劳动的剥削了。这种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被特别吸引到恰好位于它邻近的满洲的重要刺激因素之一。

* * *

为了准备武力扩张，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们在满洲各重要岗位都配备了极反动的黑帮分子。其中有一个是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他到任后便发表了对中国人极端侮辱的和公开吞并的谈话，以致当地中国当局给了他一份正式通知（1931年6月10日），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¹，即不受欢迎的外交代表。这表示不承认大桥是总领事，但东京并不想召回大桥，就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相反，日本的代表无论在奉天、还是在南京大施压力，要求接纳这位“野地主”²。

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布置了“战斗队员”以后，便把不断挑衅的政策扩大到骇人听闻的规模。袭击中国警察局、殴打和杀害中 321
国人、制造朝鲜人冲突、对中国居民施加各种各样的暴行——诸如此类小型事件在不多的几个月内就发生了数十起。

其实，早在这些挑衅活动以前就发生过一系列采用老办法的预谋事件——肉体上消灭被日本人认为是祸首的张学良。从1931年一开始报刊不止一次报导了企图对张学良下毒和其它未遂事件。例如，4月28日，张学良的一个跟班死了，致死的原因是吃了给张学良准备的早餐³，张学良的马弁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等等。奉系军阀头子每次自己吃东西以前，都要命令厨师或其它仆人先

1 《京津时报》，1931年6月17日。

2 据回忆，日本长期没有驻南京政府公使。南京政府迫于公愤拒绝接纳被任命为日本公使的小幡。小幡是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部分地接受著名的二十一条的直接工具。由于准备提出类似的条件，东京把对这项事务有经验的小幡又重新派往中国。在1931年没有得到满洲当局承认的大桥，在1933年以“满洲国代表”的身分就出售中东铁路问题在东京和苏维埃代表团进行了谈判。

3 《京津时报》，1931年5月11日。

尝,极为仔细、谨慎。由于消灭张的企图未能得逞,“皇道派”的首领们便着手进行下一步的行动纲领。

日本的警察和军队占领了中国的警察地段,例如,6月4日在打石场,¹7月14日在皇姑屯,日本部队一百二十人毒打中国警察局长和其它人员²。甚至发生将中国人拷打致死的情况,例如,在辽阳杀害了米权庆。他因肺部被灌入煤油致死³。还在辽阳这个地方,日本警察就象在“自己的国家”那样发号施令,使用武力封闭中国《新民晚报》,因为该报敢于刊登拷打米权庆的简讯;甚至在中国本土——天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竟然毒打中国警察⁴。在北满的苇沙河车站还制造了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事件。

除此以外,还采取了外交上的行动,这些行动被描绘为保护日本国民及其利益不受“中国暴力”的损害。例如,6月15日,驻奉天总领事林拜会了张作相(他代替在北京的张学良),就所谓天宝山地区发生压迫朝鲜人以及火烧属于通辽水利公司的日本商行等等问题向张作相提出了抗议。

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构还在另一方面进行挑拨——制造关于“红色威胁”和“莫斯科特务活动”的假文件。例如,1930年末,哈尔滨高等法院审判了一个叫卡尔·斯普列奈的人,该人曾任拉脱维亚驻哈尔滨领事馆秘书,因犯有明显的特务活动在满洲里车站被中国警察局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份“共产国际在东省特别区的工作纲要”和其它通常类似白匪军伪造的“文件”。在法庭上斯普列奈供认,根据日本驻满洲里车站领事馆秘书井口的指示,他进行“北满、蒙古和外贝加尔的调查”。他早先曾努力设法在乌兰巴托(原名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设立拉脱维亚领事馆,作为日

1 《京津时报》,1931年6月10日。

2 《京津时报》,1931年7月16日。

3 根据英国医生的鉴定,《京津时报》,1931年7月30日。

4 《京津时报》,1931年6月10日。

本间谍工作和破坏活动的秘密联络点¹。

但是准备入侵的挑衅活动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万宝山武装冲突、在朝鲜杀害中国人的大量空前未闻的兽行和在兴安地区枪决日本特务破坏者参谋本部中村大尉的事件。

1931年7月，朝鲜人为了灌溉稻田，在万宝山通过中国农民的土地挖掘沟渠，中国农民出面阻止。这时大批日本宪兵部队来到出事地点，向中国农民开枪开炮，随即占领整个地区。

日本报纸在满洲以及日本和朝鲜同时掀起广泛的排华诽谤风潮，指责中国人压迫和杀害朝鲜人，实质上是煽动朝鲜大规模排华。大屠杀很快扩大开来，而且除了报纸以外，排华的直接组织者就是日本在朝鲜的警察局。几天之内打死三百多名中国人，打伤千余人，数万人被洗劫一空。在此以后，住在朝鲜的大部分中国人离开了当地。

万宝山事件和在朝鲜屠杀中国人，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最近的意图。为了揭露这些意图，日本共产党早在7月16日——占领奉天的两个月前——为反对准备军事进攻和占领满洲，发表了坚决抗议。日本共产党号召日本、朝鲜和中国劳动人民积极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计划的实现。

应该指出，进攻中国的准备工作还在下列方面进行：加强镇压日本的革命工人组织，以“巩固”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1931年，大规模逮捕已成为经常现象。4月，逮捕了大约二千名革命的工人和农民，5月——一千二百名，6月——一千一百名，7月——八百名，8月——一千五百名。从事革命活动的一切群众组织均被迫转入地下。

尽管如此，恰好在准备进攻满洲的时候——8月1日——反 323
战日——共产党又组织了群众大会，提出口号：立即从满洲、朝鲜、

1 《哈尔滨先驱报》，1930年11月15日。

福摩萨把日本军队撤回去”。

在占领前，中日之间最后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是枪决破坏活动主要组织者日本特务中村大尉的事件。

中村是日本参谋本部的军官，他隐瞒自己的身分，冒充科学研究人员，从哈尔滨中国当局获得了前往南兴安地区进行“考察”的许可。

和中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日本军士、一个俄国白匪军和一个蒙古人——日本人的爪牙，到达该地后中村打算一举三得：进行军事地形调查和其它军事侦察活动，组织蒙古人-红胡子队伍进行反华的武装活动，并且贩卖麻醉剂。

当地的中国军事机关发现了这个“考察者”匪帮，在相互射击后捕获了这批匪徒。中村及其一伙有一部分在互击中被歼灭，另一部分后来根据查获的证件确定他们的全部活动后枪决。同时，在中村的行囊中还查获了大批麻醉品——海洛因，中村不仅贩毒，而且用麻醉剂作为这一地带日本特务机构（即他所组织的红胡子匪徒）的报酬。

当地军事机关深知，哪怕是枪决一个日本人的事实被泄露，就会引起事端，因此，起初对中村事件秘而不宣。但是日本参谋部通过自己的特务机构获得派出的侦察破坏小组已被消灭的情报后，便开动全部外交机器，施加压力，要求惩治凶手和相应的“赔偿”。同时，日本报刊也大喊大叫，中国人对满洲的日本侨民使用暴力和威胁这些“受难者”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负责枪决匪徒中村的中国团长袁成，最后作为牺牲品被迫“供认”了一切，被关进奉天的监狱。

9月，占领奉天后，日本指挥部首批功绩之一就是杀害这位中国团长，事前对他施加了种种酷刑。

当然，奉天的半封建统治者在9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或者

逮捕自己的团长们，都不能阻挡已经发动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机器。

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在日本本国以及国际上制造占领满洲的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已经一年了。随着军事准备工作的完成，他们想干什么就越来越清楚了。

《外交时报》杂志9月号毫不约束地声称，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对华战争。《东京朝日》报9月初十分明确地写道，很快在满洲平原上将爆发新的战争。9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会议上批准了详细的占领计划，9月9日，飞机已在日本各城市上空散发传单，其上附有满洲地图，并号召居民做好战争准备¹。9月15日，日本总参谋长金矢为了供报界发表宣称，必须用一次袭击以结束满洲“三百个悬案”的时刻已经到来。

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摧毁奉天的中国武装力量，几天内便占领了南满各重要据点。

就连对日本占领满洲总的来说持赞许态度的英国驻天津的保守机构，对日本帝国主义捏造的借口：“日本军队之所以入侵是由于一些中国士兵袭击了南满铁路的一座什么桥”，也只得加以嘲讽²。

后来，在李顿委员会调查满洲问题的时候，日本的一篇小故事《南满铁路桥的爆炸》中增加了很幽默的一段细节。李顿委员会查明，就在爆炸的半小时后有一列火车驶过“被破坏的”桥梁，并且平安抵达目的站。日本占领军中尉河本当列车通过时他曾在被炸毁的桥旁，他对这个问题向日本人是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情况呢？他说，被炸毁的是左轨，而火车在高速行驶时，只支在右轨的一边

1 《远东的危险信号》，奥·格林著，《半月刊》，11月号。

2 “对日本人行动所依据的借口只能带着讥笑加以批驳，日本人对此事愈少谈愈好”（《京津时报》，1931年10月12日）。

跳过去了……。

对满洲扩大占领的主要阶段如下：

在入侵满洲前已准备好五万名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9月18日—20日，日本军队遇到中国部队的稍稍抵抗后，占领了奉天、营口、长春、安东、抚顺、盖平和奉天省的其它一些城镇。中国军队由于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而军心涣散，有的四处逃窜，有的被解除武装。满洲的半封建统治者想用不抵抗来乞求日本帝国主义者的
325 恩典，即使是保留私人财产也好——这些财产是他们多年来在满洲掠夺和剥削人民积累起来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根据日本官方资料，在占领初期主要“为了示众”而杀死数百名中国士兵。日本人在一系列的武装接触中死六十三人，伤一百二十四人。

从9月20日到25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吉林、敦化、郑家屯、通辽和洮南；10月8日，日本轰炸机队空袭位于北宁铁路附近的锦州和平居民。被日本人推翻的张学良宣布锦州为其满州政府临时行署。

10月中旬，在有美国代表吉尔白参加的国联关于满洲问题第二次特别会议召开的时候，日本的奴才中国将领张海鹏进犯齐齐哈尔，但被击退。

10月24日——在日内瓦的又一次发言：提出的马来树胶式决议“仍然留在桌上”（白里安），因为日本代表吉泽拒绝接受这个决议。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装甲突击兵团很快进犯齐齐哈尔。齐齐哈尔省长万福麟的儿子早将省里各银行和机关的数百万满洲纸币现金兑换为日圆，而且藏到家里去了。接替他的马将军打算抵抗日军。在天然界线嫩江的几次战役后，日本的坦克、轰炸机和远射炮迫使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后撤。

多门师团(多门在任上校时就曾于 1920 年 4 月指挥部队占领北萨哈林,多门死于 1933 年)于 11 月 18 日越过中东铁路,占领了齐齐哈尔。

当国际帝国主义正在物色“调查委员会”成员的人选以提供日本参谋本部在满洲“实现警察措施”的权利时,而日本参谋本部已实现了自己的“权利”。由于张学良军队的不加任何抵抗,日本黠武主义者的铁蹄踏上了奉天省尚未被占领的其它部分——沿辽东湾一带地区,日本军队开始向热河推进。

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还由于他想完整地保存自己的残余部队。他想用这些军队继续维持他在华北的影响。作为一个军阀,没有军队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张学良部队得到的总是撤退的命令。日本人有时没流一滴血,甚至一枪未发就取得了“辉煌”³²⁶胜利。例如,占领锦州(奉天被日本占领后,锦州成为奉天的省会)的情况就是如此。锦州防御坚固,军队装备优良,中国士兵的数量比前来进犯的日军多几倍。

“日本派了一个军使来到锦州,他宣布:‘明天下午二时我们的将军将进入此城’,这就够了。第二天中午时分,最后一名中国士兵撤离了锦州。两点整,就象宣布的那样,日本将军进了城。当地的显贵用酒菜款待他,而日本兵则鼓乐齐鸣锦旗招展地沿街列队而行”¹。

因此,毫不奇怪,对日本军队来说在占领满洲的第一阶段。和中国将领作战,这种战争常常是象在满洲城镇“愉快地散步”的样式。

在热河边界上只有中国武装部队(大部分是志愿者)的游击活动能够暂时制止日本的进攻。

吉林将军汉奸熙洽在北满企图攻占哈尔滨未遂后,日本人立

1 《巴黎回声报》,1933 年 3 月 5 日。

即亲自完成了这项工作。日本军队——还是那个“萨哈林的”多门部队——在同中国将领丁超部队几次交锋以后，于2月5日进入哈尔滨。

在进攻哈尔滨的同时，开始了上海的战争。1月29日，日本军队轰炸上海的华界并大量残杀居民。但是，使日本人惊奇的是，上海市民会同部队（广东十九路军）立即对日本人予以有力的反击。

日本人武装占领满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地主和军国主义者打算先借助直接的军事掠夺以增加自己的“收入”，然后再直接对满洲农民大大加强半封建的剥削，而不经过程一直在榨取农民大部分剩余劳动的任何当地的中间人。

占领以后，他们便开始实现自己的打算。

张学良和当地其它将领的财产，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犯有过错的很多大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在一开始就被日本人抢劫一空。

远东报刊刊登了美国报界协会记者关于日本军阀抢劫中国人住宅以及奉天被抢劫后的住宅情况的报导。

该记者写道：“在抢劫时，通常由当地的日本预备队跟随日本正规部队一起去，这些预备队由附近的商人和投机者组成，他们非常熟悉要抢劫那些人家的财产情况。”

抢劫时，有时主人本人在场，他们遭到了毒打和侮辱。关于采访被抢劫后住宅的印象，记者简短地写道：“很大的橱和箱子都空空如也。”在有些住宅里，他碰到了主人——中国的将领们，他们就象挨了打的狗似的。但是他们不敢埋怨日本人，担心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记者列举了在奉天被抢劫的下列人员的官邸：热河督办汤玉麟、吉林督办张作相、杨诚、朱光沐、齐齐哈尔督办万福麟、诸良等。

张学良本人的私产估计为八千万银元，其中在他官邸的地下

室里大约藏有价值三千二百万银元的金锭，这是日本人知道的。日本军事封建强盗们对这些黄金当然不会不注意。

美国记者写道：“在汤玉麟督办的官邸里，日本人捞到了一千万银元。这些银元多半是汤玉麟搞鸦片投机发的财。”¹

只有张学良本人蒙受了小小的恩典。日本占领军司令本庄送给他一车皮家具和贵重小饰物，并且命令他永远不要在满洲出头露面。

日本军阀的代表们不仅分别抢劫私人住宅，机关的钱柜、铁路的仓库、中国铁路的货车也都没有逃脱渴求暴富的“佩剑武士”的视野。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掠夺现金实物以后，便占领了中国现有的所有大企业，这些企业近来对日本资本曾造成很不愉快的竞争。

入侵满洲后，日本帝国主义就着手实现自己庞大的占领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世界大战开始时，即日本完全进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时就已策划好了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中，满洲只是一个据点和基地，是进一步对亚洲大陆、进而对全世界扩张的跳板。

关于这一点，日本首相田中大将在 1927 年给日本皇帝的奏折中作了明确的声述。³²⁸

田中写道：“我们应该利用满洲和蒙古，以便渗入中国的其它部分。如果我们能支配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在我们对俄和对美的战争中，我们应该迫使满洲和蒙古承担战争的全部灾祸。”²

1 《中国评论》，1931 年 11 月 7 日。

2 参看《共产国际》，1931 年，第 33—34 期译文。田中是政友会的首领和日本首相。他给日本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直言不讳地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大陆政策的目的是和方法。后来，该奏折落入美国人和中国人之手，于 1929 年在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第三次会议上首次公布于世。

1931年3月1日,满洲变成满洲国,傀儡“执政”溥仪变为溥仪“皇帝”。日本帝国主义想以此作为另一论据,把日本军队进一步推进到内蒙和中国本土的北方各省,并把这些地区合并到新成立的“帝国”中去。日本在满洲帝国旗帜下的扩大占领,总的来看,是必然的。全部问题在于准备工作的完成和对日本军国主义合适时机的来临。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远远不止于中国本土的几个省。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五年计划”,就在最近的几年内“皇道”¹应该包括比现在东亚更大得多的地区。因此,如果事件的进程符合于日本帝国主义主战派的计划,那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助于刺刀打算把差不多整个中国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都划入“溥仪帝国”的版图。

当然,在中国其它地区也可能还有其它溥仪式的人物上台,如果这样做对东京当局更为合适的话。新溥仪的问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不顾一切困难来加强和巩固日本对满洲的独占统治,是不受遏制地扩大对东亚大陆,特别是对中国的军事扩张。

这一方面明显的证据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和内蒙边界上的活动以及他们表明自己行动计划的露骨言论。日本驻满洲国海军司令部代表海军少将小林在华北(河北和山东)旅行返回后,于今年2月20日在大连发表的谈话,难道还不够明确吗?这位“雄赳赳的海员”宣称:

329 “研究满洲问题越深,就越强烈相信,满洲和华北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从国防和物质资源上,或者从民族的观点和交通方面来看,日本、满洲和华北之间的有机联系极其紧密,因此,把这三部分领土相互分割开来是荒谬的。”

谈话的结尾部分流露出对南京政府的公开威胁:“如果将来蒋

1 皇道——日本帝国主义近来以“皇道”的口号来进行侵略。

介石哪怕是迈出虚假的一步，那么整个中国将重新陷入战争的混乱之中。”

总之，当日本开始吞并与日本及满洲“有机联系着的”华北时，不许反抗！否则就要发生战争！但是，与华北“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又有华中和内蒙，而与华中“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又有华南，与内蒙则又有甘肃和新疆等等。

在亚洲大陆全速前进！——这就是小林和日本帝国主义主战派其它代表的口号。

日本的军号实际上早在 1931 年就已向全世界宣布：日本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因而不得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现”。¹

但是，十分清楚，在帝国主义体系及该体系的许多“问题”中，满洲和满洲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满洲也不是站在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斗争之外。

满洲问题是“太平洋问题”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末期，是东亚沿岸所发生的事件，使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有根据宣称：“太平洋各种矛盾的全部总和是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策源地”²。

这次全体会议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还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把满洲变为侵犯苏联的军事据点。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的日本迫不及待地用运输和通讯工具装备这个据点，在那里建立军事工业和粮食基地，并且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远东边境不断集结武装力量。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进攻的准备工作，那么两个体系的斗争在这里将进入最尖锐的阶段，因为“战争不仅会在前

1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260—261 页。

2 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速记记录，第 3 卷，第 164 页，党书籍出版社，1933 年。

线进行,而且也会在敌人的后方进行”,毫无疑问,“苏联工人阶级的数千百万朋友……一定会努力从后方来打击本国的压迫者”(斯大林)。

华中和华南苏维埃工农革命坚定而胜利的步伐、日本对破坏帝国主义者之间相互关系暂时稳定的积极作用以及被占领的满洲广大群众的武装民族解放战争,都从自己的方面论证了列宁关于进入“东方各国人民参加决定全世界命运”时期的论点。

现在,当世界临近革命和战争的第二个回合时,与满洲有关的以及在满洲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均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

日本的扩张和两个体系的斗争

日本武装入侵后的头几个月里,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意见:日本帝国主义之占领满洲是因为它利用了有利时机——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因危机而削弱,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外地位的加强。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有过促使日本的进攻恰恰开始于 1931 年 9 月的某种暂时性的因素,但是整个来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显然不是因为它比其它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对加强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米弗同志说得完全正确,他认为,“占领满洲并不能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有力量,而是证明了它经济上的虚弱,这种虚弱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这条对它非常危险的道路”¹。

日本属于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特别病态的国家之一。强烈显著的萧条早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就已损害了日本帝国主义体系。工业产值可作为某种指标。根据官方数字,以纸币日圆²计算的每年工业产值如下:

1 米弗:《日本帝国主义和占领满洲》,《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 年,第 22 期,第 36 页。

2 这一时期日圆对美元的牌价(100 日圆等于 49.85 美元)。

年	代	年	代
1919	50.81	1926	47.00
1920	49.75	1927	47.55
1921	48.15	1928	46.57
1922	48.48	1929	46.19
1923	48.94	1930	49.49
1924	42.10	1931	49.50
1925	40.93	1932	28.12

年 代	十 亿 日 圆	年 代	十 亿 日 圆
1919	6.4	1926	6.7
1920	5.8	1927	6.4
1921	5.1	1928	6.9
1922	5.3	1929	7.4
1923	5.6	1930	5.7
1924	6.2	1931	5.0
1925	6.7		

资本主义总危机显现出日本资本主义的腐朽，日本由于下列各种特点而复杂化了：垄断资本同资本主义前严重残余的相互交织、在世界大战期间大大扩大了工业生产部门大量开工不足、日本工业结构本身的缺点(消费资料的生产占绝对优势)、日本出口结构的缺点(主要依靠两大项——丝和棉织品)以及其它等等。

因此，当历史上最大的周期危机冲击日本时，日本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虽比其它某些国家要小些，但是这种工业生产下降对日本经济病态发展的影响不是更小，而是更大。

根据国联的资料，日本工业生产的指数，如以 1928 年作为 100，则 1929 年为 111.4，1930 年下降到 105.6，而 1931 年则下降到 100.7，即回到 1928 年的水平。

工业产值的数字下降得更大。从上表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工业产值 1929 年为七十四亿日圆，1930 年为五十七亿日圆，1931 年为五十亿日圆。可见，工业产值 1931 年比 1929 年下降了 33%。

从 1925 年到 1931 年期间，大工业的工人人数从一百五十万人减少到九十万人，即减少了 40%。

从 1930 年 1 月到 1931 年 7 月，生铁价格下降了 70%，钢下

降 25%，商品总指数下降 38%。

日本工业生产降到整个危机时期的最低水平恰恰是在 1931 年的春天和夏天，即进攻满洲之前。6 月份棉纺生产缩减 31%，缫丝生产缩减 35%，水泥缩减 55%，纸张缩减 40%，采煤缩减 27% 等。根据日本银行的资料，这一时期很多工业部门的开工率仅为 50%。1931 年上半年资本共为一亿九千万日圆的二百六十四 333 家企业倒闭了。1930 年日本的出口比 1929 年下降 32%，而 1931 年又比 1930 年下降 21%。

失业者（人数达到三百万）和罢工者开始显示出积极战斗的性质。例如，1931 年 6 月在大阪的住友铸钢厂发生的工人罢工在整个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人占领了工厂，并对警察进行了两天的武装抵抗，十多名警察和二十多名工人受了伤。

“调整工人问题”的措施之一是，日本当局决定把二十万名朝鲜工人从日本本土送到朝鲜，但是，即使不送这些人，朝鲜的失业人数已有五十多万了。

就在危机的头几年里，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日本广大农民的状况尤其剧烈恶化。据统计，1930 年日本的农业就因生丝和大米的价格下跌比 1929 年少得六亿六千三百万日圆。1931 年，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惊慌失措地指出：“农村的状况极其悲惨”。

朝鲜的状况更加悲惨，在朝鲜几乎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下跌了 50—60%，而女孩子的价格下跌得更厉害，这些女孩子们被饥饿的父母卖到魔窟，这同很多日本农民家庭一样，是朝鲜人通常作为生存的最后来源。

由于占领了满洲，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而不仅在这一地区排挤美国资本的扩张作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且占领满洲和大战（由于占领满洲迟早必然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体系摆脱所处困难状况的唯一出路。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一个冒冒失失地急忙在战争的

道路上找寻摆脱危机的出路的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恰恰是这一环节十分薄弱。

日本帝国主义的首脑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知道，武装占领满洲在任何时候都会导致大战，而且他们下决心占领满洲，同时也考虑到可能发生最大的国际纠纷。

再说，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并正在准备这种战争，只是竭力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尽可能争取更多的机会打赢这场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究竟准备同什么样的敌人作战呢？

列宁对这个问题不止一次作了十分精确的回答：“由于太平洋³³⁴和占领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问题，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十年来都在进行着极其顽强的斗争，而有关太平洋及其沿岸的全部外交史、经济史、贸易史都十分肯定地指出，这种冲突日益加剧，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¹

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是位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两者都对中国怀有野心，都想统治太平洋。

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同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搏斗，准备进行一场它完全不打算起防御者作用的战争。日本军阀的军事理论就是进攻。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袭击美国军事力量和领土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求废除旧的海军协定，要求军舰相等和加强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地位，而实际上现在它已经破坏了一切条约。

根据过去的经验，根据近年来美国的行为，日本的地主和资本家非常了解，这个强大的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对日本统治满洲归根到底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且不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其它地区——首先是内蒙、山东、直隶、甘肃、福建——的野心，就光是独占满洲这一项就足以加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而使美国资本在东亚的利益在任何一天都有可能被日本武装

1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2页。

力量所取缔，而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在同日本的第一次公开破裂时就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攫取，就象它对俄国帝国主义在南满的投资以及德国在山东的投资所做的那样。

但是，在存在上述一切情况的条件下，在日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如果劳动群众阻止不住的话）的条件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狂热的反苏积极性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它们实际上并不认真地想搞反苏战争吗？

显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反苏战争考虑得十分认真，并以最积极的方式进行准备。相当大的一部分有权威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认为，在准备同美国作战时，事先必须对苏联进行战争。它们打算首先进攻苏联，首先准备进行反苏战争。

当然，苏联的滨海地方、苏联的萨哈林、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以及苏联其它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眼里都是贵重的奖品。但 335 是，日本反苏侵略的决定性原因，是控制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观点来看，侵占苏联远东领土的本身，比起它对这事承担的风险和费用来说能有多大的物质利益？侵占殖民地的主要刺激因素，首先是对占领地居民的剥削。但是，在苏联远东的居民人数不多。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者毕竟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他们会不懂得苏联领土上的居民无论老幼都将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战到最后一滴血，想对他们进行剥削简直连谈也不用谈。而且日本人也非常非常不易适应这些地区的气候，因此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对资本主义强盗们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除一小部分外都无法利用。何况，占领满洲和内蒙以后，对这些资源现在已经没有实际需要了。

至于说到“威胁日本的后方”，那么，大家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整个苏联远东在日本军阀开始进行其十分明确的反

苏战争的挑衅和宣传以前,根本没有设防。而现在,虽然我们的远东边境披上了混凝土和铁,集中了强大的红军部队,但所有这些只具有防御的性质。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其中也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清楚地知道,苏联的政策是真正的和平政策,苏联不准备向任何人发动进攻。“威胁日本的后方”的说法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诽谤,这点他们自己很清楚。甚至赞成立即侵犯苏联边境的日本最无知的军事首脑们也认识到,苏联远东本身在现今条件下不值得日本军队和整个日本帝国主义为它去进攻红军和苏联而冒巨大的风险。

日本帝国主义的很多代表清楚地认识到红军的力量和苏联的威力。

1933 年底,日本陆军省代表在正式的谈话中就已承认:“苏联军队比沙皇时代的俄国军队要强得多”¹。

例如,在一月份(1934 年)的《日出》杂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声明。佐藤将军说:

336 “我国应该充分认识到,战胜红军——这对日本军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种认为只要日本军队手持武器去进攻俄国就每次都能保证胜利的看法,是极其危险的。”

有一个叫平田的人讽刺说:

“在日本常常听到这样的谈论:‘只要日本的剑一举起来,那么贝加尔湖以东的全部境域都将是我们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能在哪一天真正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扩张目标首先是整个中国,其次是印度支那、菲律宾、荷属印度等等。

这里有上亿的人民(剥削他们便能立即带来利润),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很快安排好加以利用)。只有把中国并入“大

1 《华中邮报》,1933 年 10 月 1 日。

大日本”(大日本帝国)的版图以后,依靠中国的人力资源,才能设想进一步同其它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并进一步用火和剑为建立“大和族”领导的全世界统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开辟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这条路线进行侵略活动的。它已经占领了满洲,现在正在占领内蒙和华北,日本外务省在1934年的四月宣言中提出控制全中国对外关系的要求,即象1915年那样,重新要求承认自己对中国的保护关系。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路线在这里正好同美国的扩张路线迎面碰上了。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正以最有力的方式,简直就是以狂热的速度准备反苏战争。

这种轻率的追逐双兔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估计到两个体系矛盾的作用以及在资本主义稳定末期的具体情况下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矛盾的话。

这里起着巨大作用的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本身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怀有阶级仇恨,它们力图消除全体劳动人民的祖国对日本及其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群众的革命化的影响。

其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指望,他们的反苏侵略、即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侵略,或者能使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站到自己方面,或者哪怕暂时麻痹其它国家反对日本的积极性,使日本同时对中国进行的侵略不致遭到能够妨碍它占领中国的那种足够的反抗。

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准备反苏战争的同时,以保证后方和侧翼为借口,以反对中华苏维埃为借口——甚至没有借口——在战争一开始就完全占领中国。他们说,占领了中国再说。日本的军人也这样说:“如果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那这场战争将在整个中国的领土上展开,而不是在满洲或在满洲附近展开。苏联军队将沿黄河顺流而下,新疆的势力范围就会达到洛阳,这将为红军的向南方推进提供另一条道路。这样,俄国的影响将象冰

川一样移向中国本土。这说明,如果日苏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那么,中国领土的各个角落都将是冲突的地点。”¹

美国不经过战争是不会把中国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点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田中大将在其秘密奏折中除了断言必须进攻苏联以外,同时也坚决提出:“如果将来我们想把控制中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就应该击溃美国,就应该象我们在日俄战争中那样去行动。”²

要对美国作战,必须先占领中国,依靠中国和利用中国的资源,这样,比在没有中国这一切的情况下同美国作战要容易得多。

反苏侵略首先要加强日本同英帝国主义的“友谊”,虽然英美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但是如果日本的政策不是这样针对着苏联的话,英帝国主义也毕竟难于非常露骨地支持日本的政策(这种政策也给英帝国主义本身带来不小的损失)。

不列颠帝国主义者比大多数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明智些和有远见些,因此他们也知道,对苏战争甚至在远离苏联的基地和中心进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也不是一次愉快的机动演习(象他们在报刊上噉使日本人进攻苏联的远东时虚假地要人们相信的那样)。他们知道,这将以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的本身来押宝,而日本关于同时控制中国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过是空想,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其它帝国主义者将不用花费很大的力气就能把日本人从中国排挤出去。无论如何,争夺中国和争夺统治太平洋的主要斗争那时就将在美国同英国及其辅助力量日本之间进行,在英帝国主义同盟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它将尽量分给日本一些残羹剩饭。其实,可以更加准确地设想,如果英国还有其它某些帝国主义同盟国

1 《日出》杂志,1934年1月,总参谋部少校下中显治的讲话。

2 参看《共产国际》,1931年第33—34期译文。

的话,它就会同美国进行战斗,因为日本如果同苏联作战,那它未必能作为帝国主义强国而长久存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苏冒险 338 毫无疑问迟早必将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毁灭和殖民地及宗主国的革命而告终。

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希望,岛国的位置和强大的海军能拯救日本帝国免遭彻底毁灭,而革命——如果爆发的话——则按德国方式进行,即保留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甚至日本帝国主义的损失很大,对英国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这不仅能使英国在不同市场上(其中也包括中国)去占据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位子,而且能消除日本对自治领的威胁,并且能为联合即使不是所有的(加拿大除外)、也是大部分的自治领同美国作斗争创造极重要的前提条件。

英帝国主义从自己的打算出发,竭力支持日本征服者的幻想,而且为了使日本充分相信,甚至现在对日本在中国地位的极端加强也不加以认真反对,何况这种加强多半是针对美国的。从英帝国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保持随机应变,而后起个仲裁人的作用,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决定性时刻积极干预,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最为有利的。

从英帝国主义现在采取的立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干预有利于日本,至少大部分保守分子和重工业巨头的政策是这样的。“日英军队友谊”甚至具有把日军元帅的军衔赠给英国国王(以前的日本皇帝也曾是“英军元帅”)这种象征性的表示。虽然,大部分主要对轻工业感兴趣的资本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殖民地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都有十分强烈的反日情绪,但是需要完全特殊的事件步骤,需要许多特殊的情况,以克服这些情绪,并对英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给予决定性影响。列宁早就指出的英国+日本 versus(反对——译注)美国(列宁全集,中文版[1958年版],第32卷,第313页)这种帝国主义的配合,现在不仅仍然有效,而且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和真实。由于日本的倾销，由于在中国的利益等等而引起的英日之间的争吵和交易——这些现在只不过是相当尖锐的搏斗，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对英日政治合作的总路线不起决定性的影响。

339 日本的反苏积极性，也和反苏战争一样，不仅指望得到英帝国主义的同情，而且指望能不受到美国资产阶级的干涉，虽然日本在进行反苏侵略的同时也将吞并中国，——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的另一重要的打算。不能认为这种打算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占领满洲的准备工作以及占领本身，都是在日本报界和东京反间谍机关豢养的外国新闻工作者关于日本必须对“在北方扩大起来的红色威胁”采取对策的狂呼乱叫声中进行的。

从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开始起，不止一次出现可笑的场面。日本人在满洲实行南进的军事侵略——美国报刊的各栏就载满了愤怒的文章。史汀生便挥动起凯洛格公约。日本人暂时停止向南进攻，甚至将军队稍微后撤（例如在锦州附近），而向北——即向苏联边境——猛进，——美国报刊便开始推测日苏军队发生冲突的日期。史汀生则聚精会神地沉默下来。后来，日本人又向南进逼，美国报刊又发狂了，而史汀生则就必须制止日本军阀的狂妄行为发表谈话等等。之后，日本人又采取了协同行动——同时向南也向北，就象在上海时声东击西那样。除在北方进行军事行动以外，还增加了对中东铁路的挑衅和暴力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者由于自己发明的战略而欣喜若狂。但是，在罗斯福执政下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显示了睦邻关系和争取维护远东和平的愿望，这对日本人是愉快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日本指望反苏侵略能对美国的积极性起抑制影响的打算落空了。这种侵略和以前一样对美国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起着催眠作用。这里不仅有对苏联的阶级仇恨，而且还存

在这样的希望：日苏战争首先将大大削弱日本自己，以致可以赤手空拳占领日本。这部分美帝国主义者显然没有认识到，在日本削弱的情况下，英国将立即成为美国在争夺中国和太平洋斗争中的主要对手，英帝国主义正在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沿岸以及其它战略要地大大加强防御。

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指望在自己同时进行反苏和反华侵略时，美国人不会向自己进攻，还因为不仅英国而且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舆论都将站在资产阶级国家方面。

但是这些打算有重大的漏洞。在现今帝国主义矛盾极其错综复杂以及这些矛盾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在世界逼近战争和革命的第二个回合时，资本主义强国的资产阶级舆论远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统一的。和有些国家的对外政治路线一样，这种舆论往往发生变动，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它站在日本方面，还不如说它站在苏联方面。 340

在这方面可以举法国为例。在占领满洲的初期，法帝国主义者支持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立场。这种明显的支持、法国军事领导机关刊物上的许多文章以及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刊物的立场都表明，法国同日本实际上的相互勾结，还表明，对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进攻，法国总参谋部事先是知道的，并且得到他们的赞同。法国反动派鼓励日本进行侵略有自己的目的，它除了想进一步推动日本在反苏战争中的行动以外，还想在自己的欧洲政策中利用远东的新形势。尤其是，日本应该在对德国解除武装和施加压力的问题上支持法国的立场。

但是，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德帝国主义不顾达成的一切条约，在英帝国主义者（它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结束法国统治大陆的时候了）的实际同意下开始武装起来。法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动摇了。同伦敦“在观点上的分歧”刺激了同华盛

顿“意见”的越来越“接近”，华盛顿对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表现了很大的外交积极性。法国支持美国反对日本，从而获得了美国对自己立场的支持。

法国统治营垒本身也发生了变动。

当国联尽管是为了“装装门面”而被迫宣布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为非法时，日本显然不是没有同英国商议就宣布退出国联，以便保持在华行动的完全自由。日本的退出对英帝国主义者十分有利，因为它早就想改组由法国起主要作用的国联。

继日本之后，德国法西斯也在日内瓦砰的一声关门而走，大概事先也不是没有同伦敦商量过。

在武士的后裔和容克贵族的继承人之间很快就越来越多地发现“精神上的亲属关系”和“理想”上的共同性。在资本主义稳定末期的条件下，日本和德国的统治阶级脚下的土壤特别晃动起来，他们认识到战争和军事占领对自己来说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在最近的将来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关于日本海军上将松下在 1934 年春访问土耳其期间建议土耳其参加反苏的日德同盟的报导，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阶段日德的相互关系。根据这位松下的声明，似乎波兰也参加了日德协定。松下允许把高加索和其它“补偿”给土耳其。

在访问土耳其后，“日本亲善使者”松下拜访了希特勒，在盛大场合下发表了关于德日共同利益、关于必须加强两国亲密友谊和互相支持的大量言论。

这些“亲善使团”还和日本正式的大使一起，在 1934 年开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巨大的活动，日本海军舰队突然感到有必要到远离日本一万二千公里的黑海和波罗的海去访问“致敬”……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那些有根据担心它有贪婪意图的国家领导人和代表们请到日本去作客，央告他们，安慰他们，设法使他们相

信,日本的全部愤恨只是针对“红色危险”,针对苏联。被这样“强邀”到日本的有澳大利亚以外交部长拉塔姆为首的“亲善代表团”;1934年4月香港总督威廉·皮尔访问了东京,受到了外务相广田的接待。

为了收买各国的报界,东京又挥金如土……

为了准备坚决进犯苏联边境并同时占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竭力使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和英国)积极参加反苏冒险,或者哪怕是善意的中立,或者在中国尚未实际到手的时候,起码能保持暂时的消极态度(美国)。

日美最近阶段的关系怎么样呢?

美帝国主义在整个中国遭到重大损失。不用说在满洲丧失了一切阵地,更不用说在满洲地位的加强,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统治的华北,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处于日本武力不断逼迫下的南京资产阶级地主政府,也表现了使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威胁的“亲日”倾向。日本人坚持要进行南京和东京间“调整关系”的直接谈判,现在南京也开始屈服了,这对美国的利益 342 将是更大的打击。为什么华盛顿在近三年来这般无可奈何?为什么它只在外交战线上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锋?为什么它不更积极行动呢?为什么甚至当日本要求控制中国的对外关系时,它的声明只是“外交式的”又那样软弱无力?日本侵略的反苏矛头对美帝国主义起了巨大的抑制作用。华盛顿的胡佛的好汉们和大部分美国资产阶级都期待着日本进攻苏联,如前所述,他们打算在以后用不着花什么力气就能对付日本。

英、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也是抑制的因素。日本象它利用两个体系的矛盾那样,利用着这种矛盾。担心爆发革命,即担心帝国主义大战转变为国内战争也起着不小的影响。但是除此以外,美国态度审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军事上的虚弱,由于自己经济上

的实力而变得迷迷糊糊的美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后比起日本来是有点忽视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海军从现状看不能指望在东亚水域能战胜日本海军。

在日美战争中将起一定作用的还有地理因素，它对进攻者会造成额外困难。珍珠港——美国在夏威夷的巨大海军基地——远离日本海岸六千公里。而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的海军基地根据华盛顿条约不设防也不构筑工事，只是在近几年才在这方面搞了一些。这些基地离开美国既很远，而离开日本也不太近——三千公里。

但是美国的海防专家们也不是光说空话的，在日美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召开的华盛顿海洋会议上，他们要求并规定了美日海军力量的比例为 5:3，同时同意对关岛和菲律宾不设防。5:3 的比例已经考虑到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能够建立起基地，建立浮动基地和空军优势等，因此这种比例能使美国在日本沿岸的海战中战胜日本海军。

这一点甚至在苏联的书籍中有时也写得不够清楚，它们往往把现在实际的力量对比同华盛顿协定规定的比例搞混了，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华盛顿条约美国的海军力量削弱了。这里我们引用美国海军部门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343 1930 年伦敦协定以后，参议员华尔士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质问在座的海军将官们说：“在 5:3 的海军比例下，美国能在日本水域有效地同日本作战吗？”海军上将布里斯托里回答说“能”并且补充说：“如果美国同日本作战不能在日本水域战胜，美国将失去战争。”失去战争应该理解为：失去中国和东亚其它殖民地，正是为了这些地方才要进行战争。

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上规定的 5:3 的比例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它总是在有利于日本海军情况下而被破坏，在 1930—1932 年期

间,这种破坏达到了最大限度。有些数字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美国军舰的总吨数几乎比日本的多 50%,但是日本军舰的发动机为九百万马力,而美国的只有一千一百万马力。在总吨数和发动能力的这种比例下,日本军舰的应变能力和发动速度当然会大大超过美国。而且美国军舰在其它很多指标上也比日本的落后而陈旧,因为日本的军舰根据海军最新海军军事技术不断进行改进。例如,美国巡洋舰的船舷排炮重量为十二吨,而日本为三十吨,鱼雷重量为四十八和七十吨,潜水艇鱼雷的重量为一百一十和一百二十吨。英国海防专家确信,三个主要舰队大炮的实际威力的比例为:日本—10,美国—9,英国—8。

面临英美矛盾日益明显情况下的日本对华侵略,认识到日美帝国主义搏斗的不断逼近以及英美战争的明显威胁,美帝国主义尽管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大炮转向苏联,也开始积极加强自己的军备,并首先着手搞军舰。不仅批准了建设新海军(包括成百艘新战斗舰)的庞大纲领,而且还从根本上重新装备和改进旧舰,首先考虑建立实际的 5:3 的比例关系。

当时在美国劳动营有好几万人,他们在这里实际上是受军事训练,为美国陆军培养人才。

在太平洋不断推向日本的美军阵地逐渐巩固,进行巨大的海军演习,改进军事技术。

日美的军备竞赛已经广泛展开。

谁在这场竞赛中有更大的获胜把握?谁能超过谁?对于这个不可能有两种回答。

美国的国民财富为三千六百亿美元,危机前美国的工业产值为七百亿美元(1932 年为二百亿美元),1929 年对外贸易额为三百四十亿美元(1932 年为四十亿美元),国家预算为五十亿美元(1932 年),1929 年农业产值为一百二十亿美元。日本的国民财富为一

千一百亿日圆，年工业产值为六十一七十亿日圆，农业产值为三十三亿日圆，1933—1934 年国家预算为二十二亿日圆，对外贸易额为三十一四十亿日圆。

日本的国民收入几乎只有美国国民收入的十五分之一，黄金储备还不到美国的 10%，钢铁等于美国的 4%，机器制造业产值不超过美国的 3%。

危机前日本的军事预算仅为美国军事预算的三分之一。现在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日本的军事预算仍然只相当于接近美国军事预算的一半。美国的人口为一亿二千五百万，而日本只有六千八百万人（不包括殖民地的人口，殖民地居民不属于征兵范围）。

虽然美国的军事工业也需要进口某些种类的原料，但是美国对进口的依赖性比起日本对进口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美国对外贸易依赖性较小表现为：它通常只出口自己全部产品的约 10%，而日本则出口 26%。

美国的技术经济基础大大超过日本。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军备竞赛中的结果。

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这样急于侵占中国的原因之一。日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在美国舰队出现在东亚水域用它巨大“炮弹”雷鸣般的爆炸“欢迎”日本武装力量之前，充分牢固地在东亚大陆上扎根。

正是从这点出发，日本帝国主义者本身十分精确而清楚地强调必须立即行动。由安达谦藏领导的法西斯政党所组织的国民同盟的首脑人之一——中野正刚——他以露骨的言论而闻名——于 1933 年春在日本军队进逼华北时，在《外交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写道：

“现在整个中国的财富，就象苏联滨海地区和堪察加的财富一样，我们可以垂手而得。日本的阵地目前异常强固。太平洋东半

部完全在我国海军的控制下,而在大陆我国军队也可为所欲为。因此,上天交给我国国民的使命现在必能实现。”

最好战的日本帝国主义集团的这位发言人指出,“英国老滑头”的背信弃义对它不可信任,他断言:“美国现在什么也干不了。美国海军对日本的优势只是纸上空谈。美国当时忽视海军建设, 345 而日本没有忘记用新军舰替换旧军舰。但是——中野写道,——美国可以建造大船,而且也有材料说明这种可能很快就将实现。到那时情况就会改变。所以恰恰是现在而不是在其它任何时候,日本应该在大陆实行其征服政策。它应该在大陆上牢牢扎根,如果即使日本列岛化为废墟灰烬,日本也可移居到大陆并继续战斗。”

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急于用刺刀把更多的中国领土筑起围墙,还因为现在只有在这种围墙后面的中国领土上日本的贸易才能得到“繁荣”。在争夺市场的极其尖锐的斗争中,日本资本的阵地只是在依靠它的军事力量足以镇压对日货抵制的中国地区,只是在它依靠军事力量能够实际上排挤其它竞争对手的中国地区才能稳固。在日本刺刀围墙的范围以外,近年来日本的对华贸易遭到巨大损失。还在危机以前,日本对中国的进口中所占比重就不断下降,1930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仍只占中国总进口的25%(1918年为43%,1925年为32%),而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重则为24%。1932年日本在中国进口中所占比重下降到14%,出口下降到22%,而1933年分别为10%和16%。

当然,在1933年已经不把以前算在中国对外贸易一栏中的满洲进出口列入统计,而日本在满洲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大大增加了。

但是,即使如此,所引数字也是很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如果把它们和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进行对比的话。1932年美国在中国总进口中占25%,出口占12%,1933年分别为22%和

18.5%。

大家知道,虽然由于日本的进攻,美国资本的地位不稳定,但是美国资本不仅在中国的贸易领域中顽强地谋求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且也包括投资领域,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帝国主义当然根本不打算把中国让给日本或其它任何人。它准备战斗。

*

*

*

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从日本武装入侵满洲时算起的多事的三年中(这三年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稳定末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阶段。

346 虽然本书不打算研究这些相互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强调指出,列宁早在1918年5月,在两种体系存在的一开始就提出的国际关系中两种相互矛盾的 trends 的斗争,现在仍然有效,并且对整个国际局势和一切事件的进程都有影响。

列宁写道:“因为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使各国帝国主义者必然结成同盟,另一种趋势使一些帝国主义者同另一些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而这两种趋势本身都没有坚实的基础。”¹

各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进攻苏联的趋势以及帝国主义者相互间进行斗争的趋势,也说明了当前世界逼近战争和革命第二个回合时国际形势的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花了特别大的力气来影响自己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它在自己还没有在中国站稳时力求麻痹美帝国主义者。

关于“红色威胁”的破烂口号早在日本准备占领满洲时、在向奉天出兵前约一年就以各种形式广泛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走狗——外国记者——在外国报刊上或在用外文出版的日本报刊上尽其所能地进行(现在也正在进行)反苏宣传。有些卖身投靠的外国无耻文人,如美国人布朗逊·里、法国人利然德、美国人盖列

1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页。

特·阿宾德、中国人洪以及其他干这种事的“名人”。

这些奴才们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发明创造，而是常常挖掘十分陈腐的“论据”，这些“论据”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关在因中国问题同美国初期交锋中早已过去的日子里曾经用过的。

例如，“库伦方面的威胁”这个口号是布朗逊·里1931—1932年在上海杂志中采用，而且一直沿用到最近，这是新田子爵1920年在“新的银行团”的谈判过程中就提出的，当时美帝国主义用自己战后空闲出来的军国主义机器来压制野心勃勃想要吞并整个东亚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用“库伦方面的红色威胁”作为掩饰，那时就已企图保卫自己独霸满洲的权利，特别是修建洮南—承德（热河）铁路的垄断权，这条铁路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美国银行于1910年获得北京政府同意的美国的锦州—瑗珲铁路的旧方案。

1921年（4月）这个口号在《远东评论》上也出现了。

当时和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帝国主义都力求以“布尔什维克威胁”来为自己在满洲的独霸进行辩护。它把反对这种独霸³⁴⁷的都说成是“协助布尔什维克”。现在它只是大规模地抄袭和复制自己的老办法。而我们看到的人物也还是那些。这里有众所周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布朗逊·里，有学会战慄教徒（教友会会员）宣传方法的河上等等。

在1931年10月份的《太平洋杂志》（太平洋关系学院的杂志）上，这个日本的战慄教徒在埋怨日本的贫困、埋怨“针对满洲和朝鲜永远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威胁”以后，他转而指责和非难美国是……帝国主义、“美国使日本受到委屈，因而妨碍日本履行远东和平和秩序维护者的作用”。“美国是否明白？美国舰队（当然是军舰）是否明白，日本应该也愿意成为太平洋安宁的维护者？”——河上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这个问题。

另一个日本人——滨村（日本半官方刊物《满洲日报》的编辑，

该报在满洲用英文出版)写了一篇题为“美国,滚出去!”的文章。他写道,如果美国能在世界大战中愚弄欧洲并靠欧洲发了财,那么“现在摆在美国面前的不是民穷财尽的欧洲,而是有所准备的日本。美国的军事运输船这一次就过不了海,而日本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撤回自己的部队”。

但是表现了这种无畏的勇敢以后,作者便赶忙向“整个文明世界”请求援助“有所准备的日本”。因为——作者写道,——日本占领满洲就是直截了当地出面反对可怕的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而美国却妨碍日本,准备同日本斗争,所以美国无疑是布尔什维克的帮凶。因此,大家的责任是对“保卫文明”给予协助并要求:“美国,滚出去!”¹

利然德这个爪牙为了使法国资产阶级能接受日本人占领满洲的事实,在法国杂志上写道:“难道美国想把日本从中国完全排除出去,而让布尔什维克来占领日本的位置吗?”“美国对远东霸权的野心极大,难免会引起最为出人意外的后果。”中国人也利用美国的支持——利然德哀号说,——“准备对日本进行各种挑衅”²。

但是在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反苏战争以前力图用反苏的牵制来转移和刹住美国威胁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秘密,即: 不管是否进行反苏战争,由于现有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是任何反苏战争也不能在较长一些时间内能遮盖得住的,而只能使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再次出现)同美帝国主义作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看法一方面推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加强反苏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是抑制反苏战争发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满洲日报》,1931年10月3日。

2 《法兰西信使》(杂志),1931年10月15日。

同时亲自全神贯注于事件进程的大部分日本帝国主义者，变得日益贪婪而无耻。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目前它们在中国的抢劫除了纸上空谈的抗议和告诫以外，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对手的其它阻碍，因此，它们对自己的必胜和自己的威力越来越充满信心。

斯大林同志所说的“现在又象 1914 年那样，黠武的帝国主义党、战争党和复仇党，又是最出风头的了”。这些话特别是与日本有关的。

日本比其它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沉浸于战前的叫嚣，以狂热的速度进行军事法西斯力量的动员。

而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利用欧洲的战前恐慌和远东事件正在加强准备争夺世界霸权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帝国主义战役……”。“日本军阀在同德国法西斯及英帝国主义相互呼应以便既从东方又从西方发动反苏的反革命战争”¹。

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目的是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以后，认为它的任务是立即占领中国，并且同时进行“促进”这种占领的反苏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顽固地准备进攻苏联。

“……日本有一部分军人在另一部分军人显然赞同下，在刊物上公开鼓吹要和苏联开战，要夺取沿海州，而日本政府却假装与此无关，丝毫也没有约束过这些挑战分子。”²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对日帝国主义者贪婪的意图和准备进行了揭露，这种揭露对国际资产阶级舆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认为最好的备战方法就是否认正在进行的这种准备，并且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日本帝国更加热爱和平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党书籍出版社，1934 年，第 591 页。

2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575 页。

了。但是判断帝国主义者不是根据它们的言论，而是根据它们的行动。而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和在华北的“行动”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意图。

在满洲的军事准备

349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大战的加强准备现在连“肉眼也看得很清楚”(引自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日本的军事准备带有准备首先进攻苏联的性质,这一点也不是秘密。

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进行的所有这些军事准备活动的目的,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清楚,因为满洲与苏联有三千五百公里长的边界接壤,并与苏联同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日本的军事准备活动是按照“在满洲准备进攻基地的路线”(引自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进行的,它直接针对苏联,并打算在最近的将来进攻苏联边境。日本军阀在满洲的全部活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1918—1922年武装干涉后进行反苏战争的主意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圈子里曾多次讨论。特别是田中大将——国内战争时期在远东进行反苏的武装干涉的日本首脑之一——在其1927年呈递天皇的著名的秘密奏折中,对占领满洲的全部铁路以及“为了进攻西伯利亚”建立基地所必需铺设的新铁路作了详细的规划。

“当铁路铺设完毕——田中说,——我们将设法使北满充满我们的兵力……这将是我们将进行公开冲突的借口。”

这位日本前首相、政友会首脑在其冗长的奏折中不止一次地重复:“迟早我们势将和苏俄作战”¹。

1 《共产国际》,1931年,第33—34期。

头号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关于进攻苏联必须先占领满洲的这一论点，是日本报刊展开直接准备占领满洲运动的基础。

当然，现在在满洲国所进行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工业的发展的
350 另一目的，是要把这个国家变为面临日美战争的后方基地。但是大部分军事准备——铁路建设、军事航空建设、土路、邮电、设防据点等——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目前阶段所有这一切准备是为了依靠满洲这个进攻基地向苏联边境运送大量军队，并且利用满洲这个基地的资源及设备，供应这些军队的弹药和炮弹，从枪炮、汽车、毒气到军大衣、短皮袄、各种罐头、军用饼干等无所不包。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运输问题，因为在满洲国狂热的准备军事交通线带有特别明显的反苏性质。

军事铁路的修筑

修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朝-满铁路干线及其最重要的支线拉法——哈尔滨线，把哈尔滨到海边(经由清津和雄基)的路程缩减了二百到二百三十公里(比经过大连出海)，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程缩减了五十到八十公里。

按照新干线由哈尔滨到大阪的路程比经由大连缩短了八百七十里，比经由釜山缩短了八百六十公里，而到名古屋和东京则比经由大连和釜山缩短了一千到一千一百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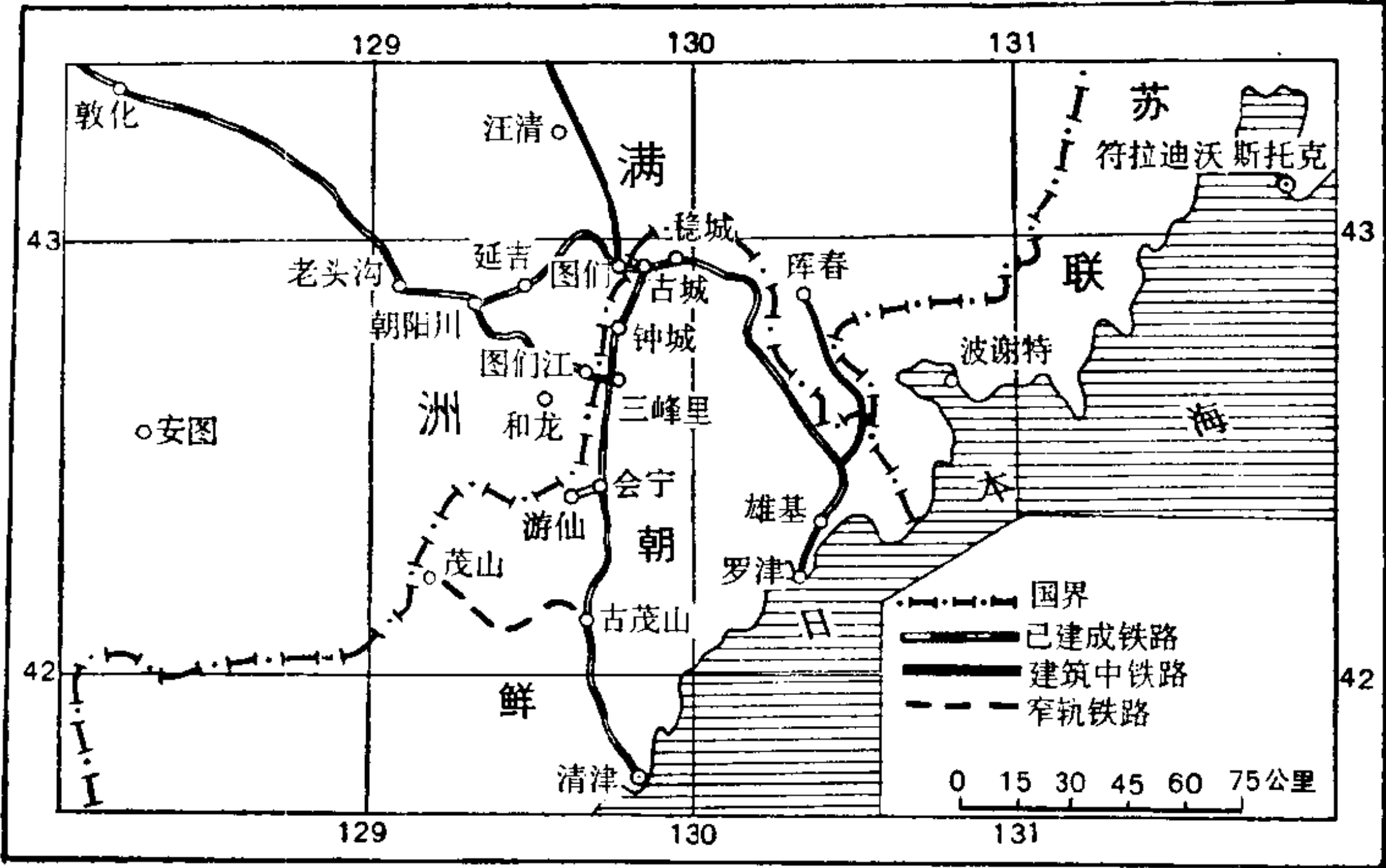
日本占领以前，以朝鲜三个港口——清津、罗津和雄基——为基点的朝-满干线，缺少从敦化到老头沟距离为一百公里的这一段。此外，这条铁路的老头沟——图们江——会宁一线是窄轨铁路。占领以后，南满铁路康采恩在占领总部的监督下立即着手勘察，并于1932年5月开始修建穿越老爷岭的以前没修的这一段。在哈尔巴岭山口由于开凿巨大隧道拖延了工程，因此这段铁路在一年后才修通。

在朝鲜境内构成所谓北朝“环行铁路”的窄轨会宁—上三峰—多岗子(五十八公里)一线于 1932—1933 年急忙改成标准轨。

这条铁路的东北另一线稳城—南阳—多岗子 (三十三公里), 从雄基港沿图们江和苏满边境运行, 于 1932 年修到南阳, 1933 年修到多岗子。这样, 加上以前修建的铁路就构成了从清津经由会宁—南阳到雄基的全长为三百十五公里标准轨的完整的铁路网。

这条“环行铁路”从南阳站经由图们-延吉由满洲境内已有的 351 铁路线同朝-满干线上的朝阳川站(在铺设敦化-老头沟-朝阳川线段时同时修成)联结起来。

因此, 这条干线不但有经由会宁—清津的出海口, 还有经由雄基的另一个北方出海口。这个北方出海口还应该在 1935 年夏季前通到罗津港, 而从雄基沿海岸到罗津再将“环行铁路”延修十五公里。由于必须开凿三·八公里长的隧道, 所以修建这一小段的线路给予这样长的时间。现在隧道挖进工程正从两头加紧进行。



图一

1933—1934年冬，仍然是窄轨的朝阳川-图们江-上三峰一线加快了改轨，这里也开凿了长为七十八米的新隧道。这段路于1934年春交付使用。

此外，还在朝鲜境内修筑了由古茂山站-会宁-清津线到接近满洲边境的茂山市的窄轨铁路。1934年春，曾打算开始修建牙门子-土们子窄轨线，关于这条线路日满半官方刊物《大同报》自己报导说(1933年12月28日)：“这条铁路将具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意义”。

因此，到1934年夏，在这个地区不仅修通了以两个港口——清津和雄基——为基点的朝-满战略干线，而且已经建成并不断扩大整个铁路网，这些铁路现在虽然货运不足，但能使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最近的这一地区成为集中和迅速重新部署大量军队的装备良好的军事进攻基地。

日本把清津、罗津和雄基这些出海港装备成设防的海军据点。

雄基离苏联边境只有二十公里，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九十六海里。这里由于可供船只停泊的水面空间小，因此港口条件不好。港内停泊场同时只能容纳几艘大军舰。1932年前，货运能力每年不超过三十万吨。1932—1933年，在雄基进行了工程建设，预计将货运能力提高到每年八十万吨。为此拨款约一千万日圆。修建了可以停泊几艘小轮船的码头。1932年前，这里的货物装卸工作只能靠驳船进行。

新干线的主要出海口是罗津，目前正在加速进行港口装置的巨大工程，打算在1937年前完成吞吐量为三百万吨货物的首批建筑物。以后，该港还将扩大两倍。对这项工程以及修筑雄基-罗津铁路共拨款三千五百万日圆。罗津港湾海上由两个小岛掩护，它的水面空间几乎达到二十二平方公里。这里可以容纳六十艘军舰。在日本武装干涉苏联远东时期，罗津同时停泊过四十七艘军

舰。从哈尔滨到罗津的铁路距离只有七百四十二公里。

清津离苏联边境九十五公里，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百二十八海里，目前还是三个港口中设备最好的，它现在的吞吐量为一百三十万吨。清津港湾由防波堤加以防护，总共达三十一万平方米。1931年清津的实际货运量为三十万吨。曾经长时间规划过，使清津成为朝-满干线的主要出海港，因此近十年来一直在清津进行大量的港口工程，全部完工后港口转运量将达到二百万吨。

朝-满干线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其特殊的军事战略意义更不待多言。从日本列岛到中满和北满从而到苏联边境路程大大缩短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日本参谋本部得到的不只是补充的铁路线。新干线也是向接近苏联边境的北满调派军队和军用品最短和最快的路线。

而沿着这条铁路运回日本的则是大批工业原料和食品——首 353
先是生产军用机器和军用品的原料。

应该指出，在同海军强国如同美国作战的情况下，朝-满干线所起的极大作用，就是把原料和食品从大陆弄到日本。

海上封锁不仅能使同东亚以外供应来源的交通断绝或受到阻碍，而且能使经由大连和黄海的交通遭到危险。但是，使日本列岛同北朝鲜各港口相联结的日本海，在同美国或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作战时则为比较安全得多的海，几乎是“内”海，因为要到日本海必须经过南方设防的对马岛或者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冻冰的狭窄的北方海湾。而要把货物从满洲沿较长的朝鲜铁路线经过釜山港和其它南方港口运出比较困难，因为这些货物数量大，体积笨重。

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不隐瞒新修干线的纯军事意义。例如，1933年10月4日《日本时报》指出：“新干线的军事意义甚至居民也看得很清楚。”

而朝-满干线只是在满洲国狂热进行的全部军事铁路建设的

一个部分。

长为二百六十二公里的拉法-哈尔滨线于 1932 年 11 月开始动工，于 1934 年 1 月竣工。《哈尔滨新闻》（1932 年 12 月 21 日）关于这条路写道：“拉滨线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战争时期的战略作用。”

通过哈尔滨附近的松花江的新大桥（长为一·四公里），把这条支线和以前中国人修的呼海铁路连结起来。呼海铁路于 1933 年秋由海伦经北安镇和克山通到泰安镇（海伦—泰安共一百九十九公里），它在这里和泰安—齐齐哈尔线衔接，泰安—齐齐哈尔线也是以前中国人自己出资修建的。

因此，现在已有一条联成一体的铁路线：北朝鲜各港口—拉法—哈尔滨—北安—齐齐哈尔。而且，1933 年开始，也以突击方式修建由北安经由龙镇到瑗珲和阿穆尔河岸的黑河的铁路（长约二百八十公里）。黑河位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和阿穆尔铁路亚历山德罗夫卡站的对面。

354 北安-瑗珲铁路所经地区荒无人烟，因此它没有经济意义。它的目的是从朝鲜港口和南满（经由洮南-齐齐哈尔）铺设军事战略交通线，打击布拉戈维申斯克-亚历山德罗夫卡，截断苏联的阿穆尔铁路。北安-瑗珲路已经通到龙镇以远。修筑这条铁路是保密的，甚至好几百名白俄被辞退，因为日本军阀认为这些人不可靠。由于松花江和阿穆尔河的开航，曾经打算将大量钢轨运往黑河，以便从这里开始铺路会接从北安方面修筑过来的铁路。

此外，齐齐哈尔-黑河直通线，是中国人设计的，并由他们修到拉哈（约一百一十公里），1933 年日本人将这条路修到纳河（三十九公里），而土方工程甚至修到墨尔根，这是第二条纯军用线，它主要是沿着荒无人烟的地区驰向布拉戈维申斯克。

而且，还十分紧急地修筑了另一条支线：由图们经汪清-宁古

塔到中东铁路东段的牡丹江站。这条线是从两头——一头从图们，另一头从牡丹江——修建的。在老松岭开凿了一条长为一·八公里的隧道。这条路是专门用来集中军队开往绥芬河和兴凯湖，横截乌苏里铁路的南线。还打算将该线沿牡丹江延长到三姓，并修支线到密山(三百公里)——到兴凯湖边的苏联边界。

除这些反苏的纯军用铁路线以外，到 1934 年 5 月还在热河省修通了一条由口北营子经朝阳到凌源的二百公里长的路段，而且筹划将其延长到热河的首府——承德，并修建支线通到赤峰，向前深入内蒙。日本帝国主义者谈到这条线路时指出：

“日本人希望铺设一条横越蒙古的铁路通到苏联的土耳其斯坦。”¹

目前这条铁路首先用来反对中国，并致力于巩固在热河省的日本政权的目的。

辽阳-公主岭窄轨线(三十七公里)也于 1933 年开始修筑，于 1934 年秋竣工。

日本人还进行了大量工程以修复原先的中国铁路和日中合营铁路以及南满铁路本身。他们把原先中国铁路上被游击队烧毁的木桥换上了铁桥，恢复和改良被破坏的线路和建筑物，这些也花了不下百万日圆。

上面所提的铁路建设现在都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此外，还有很多方案，其中有些正在进行勘测，有些将在 1934 年完成。在首批方案中有下列线路：长春-大赉-洮南，王爷庙-索伦以远，白音太来-开鲁等。这些线路，和以前所列的线路一样（参看书末所附地图《满洲和热河的铁路》），毫无疑问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和反苏的强烈意图。

根据大略的计算，从占领时起到 1934 年初日本人在满洲和北

1 《满洲日报》，1933 年 12 月 21 日。

朝鲜对铁路建设以及与之有关的港口建设的投资不少于一亿二千万日圆(不包括机车车辆的价值)。已经修通或正在完成的铁路总长约一千公里。

资产阶级的《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关于这些铁路建设写道：

“预见同俄国的冲突毫无疑问是促使日本人狂热实现计划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话，这些计划可能会推延到较好的时机去进行。”¹

但是必须注意到，修筑铁路的预定速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延滞了，这不仅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压力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本身营垒的内讧所造成，而主要是由于席卷整个满洲的民族解放游击战所造成。

1932年夏，有些已经修筑或准备修筑新铁路的地区，如海伦-克山地区和拉法-哈尔滨地区，已完全掌握在抗日军队的手里。因此，有些工程不能在预定期限开工，或者有些工程如海伦-克山地区不得不中断了很长时间。

干线本身的修筑，也和修筑其它线路一样，使游击队的袭击活动受到了困难(原文如此——译者)，而从占领和修路的一开始这种袭击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而且匆匆忙忙修筑的线路现在也远没有完工。修建各个分段的日本承包私商也不特别关心修路的质量。所以还须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使新铁路进入正常状态和完全适用。甚至干线本身新修的地段也有很多急湾和上坡道。而在有些沼泽地区，主要是间岛，路基在修筑后不久就下沉了半米。长春-雄基线特快客车的平均速度每小时不超过三十公里，也就是说1934年夏由海上到长春或到哈尔滨的旅程须要一昼夜以上。

356 由于修筑工程不完善，铁路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破坏。

1 《曼彻斯特卫报》，1933年9月15日。

1934年夏水灾时，各条新线均因线路严重冲毁，桥梁损坏等而停止运行。拉滨路受害最大，被冲毁三十多处，损失七十五万日圆。线路修复工作共延续了约二个月。

在修筑铁路线的同时，还拨出大量资财加强机车车辆。除了在日本订购机车车辆外，南满铁路自己在沙河口的铁路修配厂生产并修理机车和车厢，这个厂的工人人数比占领前增加了一倍，到1933年秋达到四千五百人。后来沙河口修配厂也开始生产柴油发动机的机车车辆。北满呼海铁路原有的修配厂和其它铁路修理厂都扩大了。

满洲国所谓的国营铁路总管理处向日本和南满铁路订购了一百一十辆客车车厢和六十台机车，并且打算在1934年再订购二十台机车、六十辆客车车厢和六百辆货车车厢。

南满铁路康采恩1934年拨款一千九百万日圆以购买铁路机车车辆。

南满铁路预定在1934—1935预算年度对新的“超额”建设投资二亿零五百万日圆，其中七千六百万日圆用来“给满洲国政府”修筑新铁路，三千万日圆用来改进现有铁路。康采恩打算通过发放债券并依靠尚未支付的股票搜集所需的二亿日圆，而且财政部打算拨款三千万日圆¹。

到1934年春，南满铁路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达到它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三万八千三百人，其中日本人占二万七千二百人。危机前职工总数没有超过三万五千人，其中日本人也只有二万人。这个铁路的日本化一年比一年加强。1933年在日本本土给南满铁路雇用了受过大学和技术教育的人员一千三百人，预定1934年还要招收一千四百人。

在修筑新铁路的同时，在满洲国正在进行现有铁路网的军

¹ 《满洲日报》，1934年4月4日。

事化。

所有原日中合营的铁路和原中国铁路，以及原英中合营的奉天-山海关线均归南满铁路管理处管辖，而南满铁路管理处大家知道现在主要是由占领军总部领导的。在原中国铁路工作的日本人³⁵⁷人数早在1933年末就已超过一千人¹。司令部还通过南满铁路控制全部新铁路的修筑工程，新铁路在建成以后也都归南满铁路管辖。

早在1933年三月初，“独立的”满洲国政府就发表了正式通告，宣布将所有铁路转交给南满铁路康采恩：

“满洲国政府委托南满铁路对满洲的铁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因南满铁路是铁路事业富有经验的领导者。”

当时这些铁路都已被宣布为“国有化”，同时被抵押给南满铁路作为这些铁路欠债大约一亿三千万日圆的保证金。正式通告中写道：“总额为一亿三千万日圆贷款的抵押金是上述铁路的全部财产和收入，而这些铁路的经营权委托给南满铁路。”

还在正式侵占这些铁路之前，所有的领导职务都已被日本人——南满铁路和军阀委派的人——所占有。

不受南满铁路和占领军总部直接管辖的只有中东铁路，因此它是占领者的眼中钉。他们逮捕、恐吓并排挤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工，用另行建立中国职工的机构，完全执行占领者的命令而不服从苏联管理人和其它苏联领导人员的命令，想尽办法力图控制中东铁路。

如果把已转交给南满铁路的北朝鲜环行铁路(三百三十公里)也计算在内，那么在满洲和北朝鲜现有七千七百公里长的铁路线中，南满铁路康采恩现在实际管辖的不少于五千七百公里。除了中东铁路(一千七百二十六公里)和一些小支线以外，所有其它路

1 《吉林日报》，1933年12月2日。

线都合并了。北朝鲜各港口的修建和经营也转交给了南满铁路，因此，在占领满洲以后，除大连和旅顺口以外，南满铁路康采恩实际上也完全控制了安东、营口和葫芦岛。打算在 1935 年春把张学良于 1930 年开始后来从占领时起中断的葫芦岛建筑工程继续进行。

土路的修筑

在交通运输其它领域中军事化和军事建设的匆忙程度也不亚于铁路运输。

日本人既不考虑经费，也不考虑经济上是否适宜，修建和改进大量土路，有些土路甚至在冬天也进行部分施工。其中很多路线直达苏联边境，有些土路改善了满洲境内军队调动、兽力运输和汽车运输的条件。这些土路也针对游击队的活动。日本报刊在报导土路修建时经常补充说，根据军人的声明，现在在本地区的“匪徒活动将迅速被消灭”。例如，《满洲日报》（1933 年 9 月 24 日）写道：“随着本溪湖-桓仁道路（长约一百五十公里）的修筑，匪徒活动的大量基地将迅速被消灭。” 358

根据长春政府的正式报导，1932—1933 年期间筑成了四千公里的土路，而在 1934 年预定修筑三千三百公里。已经筑成和正在修建的道路有：敦化-海林（二百三十公里）-穆棱（七十五公里）-绥芬河（八十公里），珲春-土门子（一百一十公里），哈尔滨-同江（在松花江口——六百九十公里），讷河-黑河（三百八十公里），洮南-索伦（二百二十公里）-将军庙（三百二十公里），朝阳-平泉（二百二十公里）-古北口（一百七十三公里），朝阳-赤峰（一百九十里）等。

土路修筑工程也由南满铁路统一管辖。到 1934 年花费在修筑土路上已约一千万日圆。有些路段或邻近的大据点之间的道路

都修成了公路。

修路工程的领导人之一、日本官员本间于1933年冬12月在谈到敦化-宁古塔-东宁-土门子-珲春(六百四十公里)路线时的声明,说明了这种工程的性质:

“修筑工程将立即在全线开展,以便尽快完工……由于迫切需要维持本境内的秩序和安宁,决定加快修建。”¹

除了维持“秩序和安宁”外,这些土路还在很大程度上预定在进攻苏联边境时用作大军通行的道路,重要的战略土路都有能够承受重炮和大型坦克的桥梁。例如,1934年春在齐齐哈尔附近开始修架跨越嫩江的大桥,该桥长八百九十米,价值一百五十万满币,将在1935年夏完工。现在在很多地方沿着战略道路已修建了大量兵营、各种军事仓库、燃料储存库,装置了供水设备等。特别是南满铁路康采恩于1934年在下列各地均修建了大医院:奉天、四平街、哈尔滨、小平岛、黑河、佳木斯、海拉尔、扎兰屯、图们、林西、赤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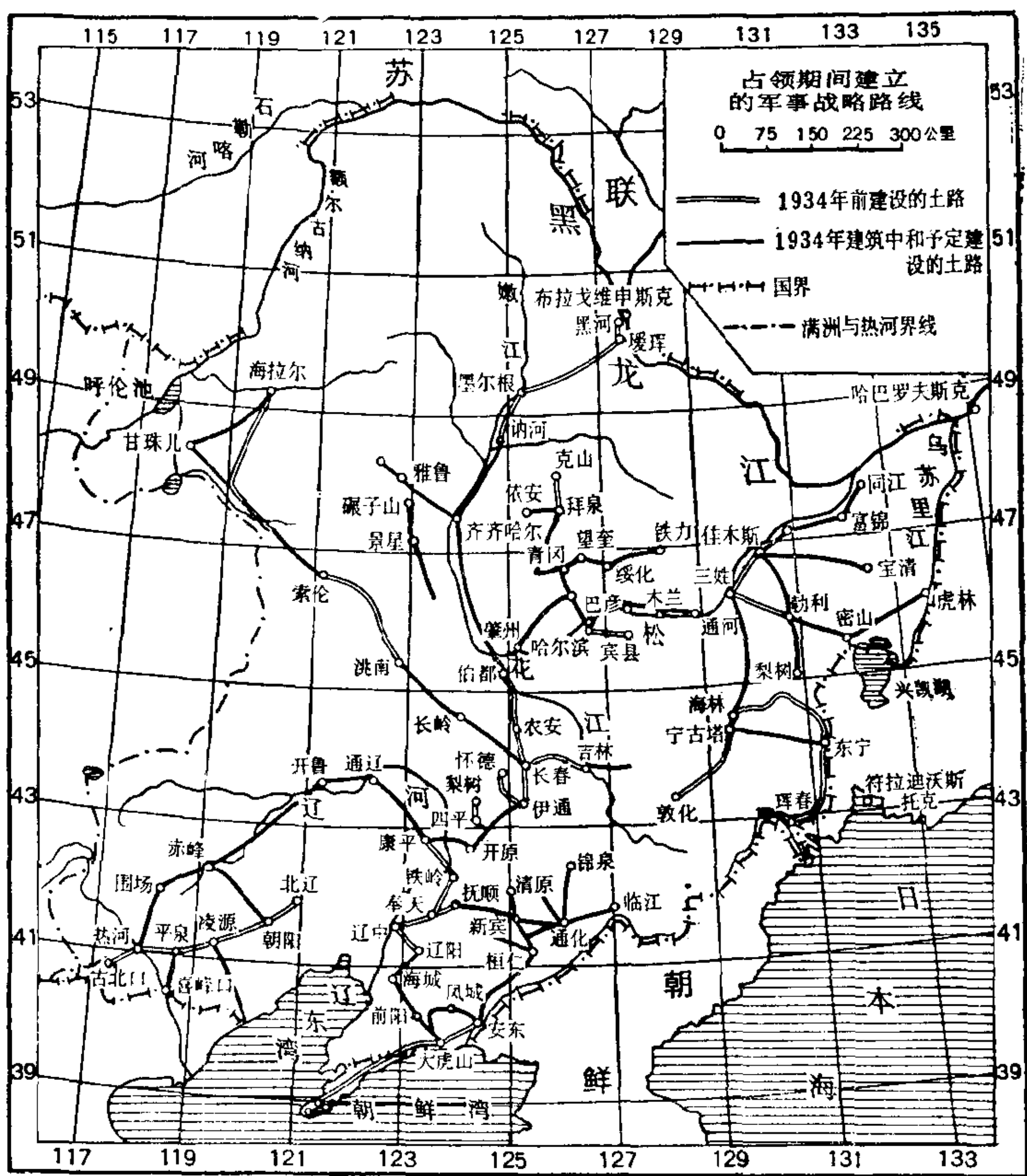
具有特点的是,1933年春占领军总部通过自己的民事管理机构——长春政府——清查全国的牛拉大车和水井,这从展开大量军队的观点来看是很重要的(满洲的河水通常不适于饮用)。

同时还通过决定,在满洲修建大型修配厂(资本为六百二十万日圆),把日本运来的零件装配成汽车并且修理汽车。

“同和”汽车工业公司股票的分配情况如下:二百九十万日圆属于南满铁路康采恩,三百一十万日圆属于日本本土和汽车工业有关的七家工业公司,二十万日圆属于满洲国政府。

《满洲日报》(1934年3月16日)在谈到该公司——谷田将军被任命为经理——时指出:“这个公司有重大的军事意义”。除了在奉天的主要修配厂以外,该公司还在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开

1 《满洲日报》,1933年12月22日。



图二

设了修理厂。

1933 年年终，着手组织集中化的汽车运输协会，它将代替现有的很多日本和中国协会“组织和管理整个满洲的汽车运输”。自己已经拥有巨大运输业务的南满铁路康采恩以二百八十万日圆的资本进入新协会，其它股东——主要为现在的汽车公司——投资三百万日圆。桥川将军被任命为主席。从 1934 年春起开始工作¹。

1 《满洲日报》，1933 年 12 月 30 日。

航 空

占领者非常注意建设满洲军事航空进攻基地的工作。在占领以前,只是在奉天有一个张学良机场、几十架军用飞机,而从1929年起,日本的客-邮航线——大连—朝鲜—日本开始航行。

占领以后共修建了一百多个飞机场和空军机场,其中很多都是修在接近于苏联边境或直接靠在苏联边境的地方¹。在整个满洲国、特别在北满部署了军用飞机航空大队。总共有七百多架飞机,也就是说,日本全部飞机的20%以上已集中在满洲。飞机场和飞机的数目不断增加。例如,1934年1月在农安着手修建新机场²,同月又为吉林的日本警察队搞到几架飞机³等。

361

1932—1933年期间组织了连结满洲国各重要基点的客-邮航线。到1933年末有下列航线:义州—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义州—大连,大连—奉天,奉天—锦州—朝阳—承德—赤峰—朝阳,长春—吉林—敦化—龙井,吉林—五常—拉法,哈尔滨—佳木斯—富锦,齐齐哈尔—拉哈—墨尔根—黑河。全线总长约为四千二百公里。飞机主要是运送日本军邮、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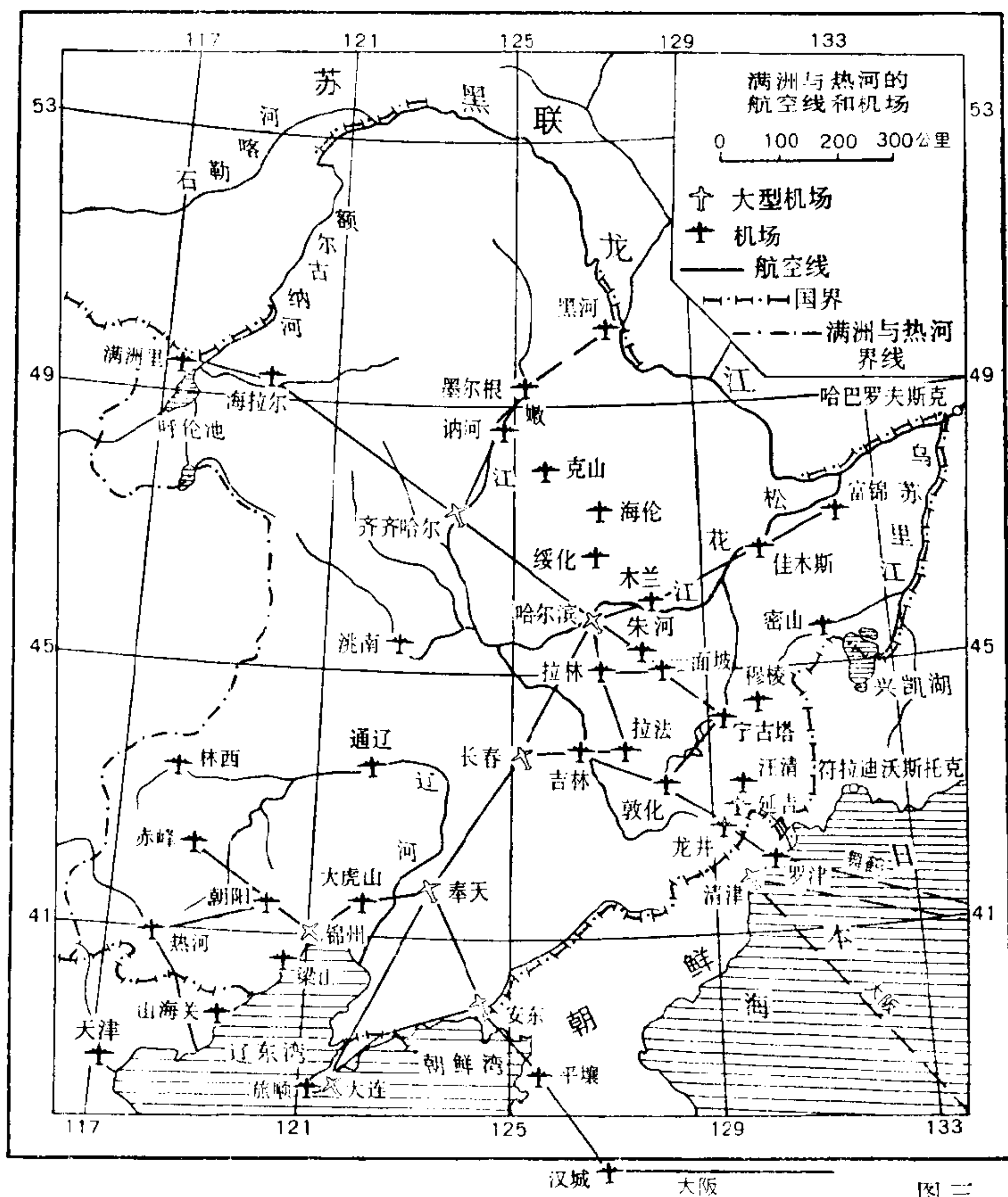
1 在修建的飞机场中,下列各地的飞机场是最重要的:兴安省——满洲里、海拉尔、林西;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克山、龙镇、讷河、墨尔根、黑河、木兰、绥化;吉林省——长春(2)、吉林、哈尔滨(2)、珠河、五常、拉法、汪清、三姓、佳木斯、富锦、宁古塔、穆稜、密山、龙井村、延吉、敦化;奉天省——奉天(2)、大连、金州、大石桥、瓦房店、辽阳、连山、洮南、白音他拉、山城子、山海关;热河省——朝阳、赤峰、凌源、承德。

此外在下列各地还有日本飞机场:河北省——天津、兴隆;察哈尔省——大海河、多伦诺尔、哈嘎林、沽源。

最大的飞机场在长春和哈尔滨。在长春的两个飞机场有二十多个钢筋混凝土的飞机库,而且每个飞机库可停十架飞机。在长春现在已有飞机约一百八十架。在哈尔滨飞机场修建了十三个飞机库,并集中了约一百二十架飞机。这里还设有地下库房。

2 《盛京时报》,1934年1月22日。

3 《满洲日报》,1934年1月23日。



本军官和官员,就在这种运输情况下,飞机也是满载。1933 年客- 362
邮航线共飞行了一万八千小时,飞行路程二百三十万公里,运输
三百吨货物和邮件。

为了经营航空运输,从 1933 年 9 月起成立了航运专营协会,
规定股本为五千万日圆。参加协会的有南满铁路(决定性股票
额)、“住友”康采恩,满洲国政府也在形式上参加了,因此该协会称
为日满协会。

大连—义州—日本以及长春—奉天—义州航线均有夜航设备。准备开航的日本—罗津—龙井线以及沿现有航线以远到长春的路线都将有夜航设备。这条路线开航以后，从日本到长春的航程只要十小时。长春—奉天—义州一线将在1934年5月开始夜航，到那时从东京到长春的航程将仅为一天半。今后，其它重要航线也将适应于夜航。

占领者对修建飞机装配厂也很注意。航运协会在奉天修建了一个装配厂，1933年9月，据说该厂生产了头两架飞机¹。

在占领军参谋长小矶将军的“高度”庇护下，1934年1月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防空协会²，这是一个类似满洲“特种化学防空”的组织。

但是，训练居民防空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荒唐的，因此暴露了占领者在防空问题上的恐惧和束手无策。

例如，占领军总部的半官方刊物写道：“在满洲有很多人一想到在大连、奉天和哈尔滨的上空出现强大的苏联巨型军用飞机就吓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报刊对我国空军拯救“切柳斯金号”上人脱险的功绩噤若寒蝉！）“但是没有什么可着急的，——该报继续写道，——只是一种有效的毒瓦斯——糜烂性毒气，但是防止这种瓦斯会找到十分有把握的方法。在毒瓦斯空袭时任何人只要钻进热水澡盆便能十分安全。”³（口口一作者）

通讯的装备和军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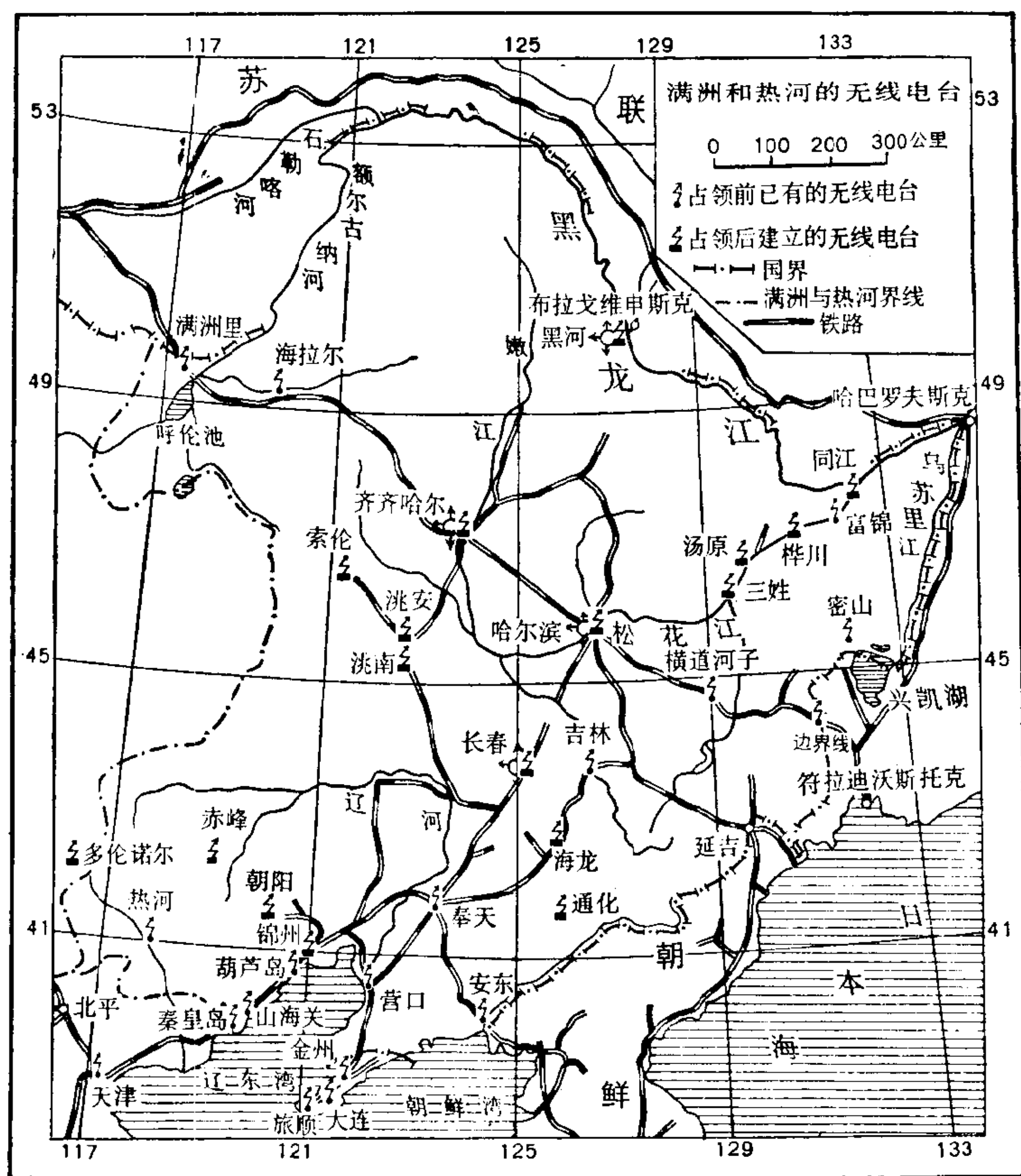
占领者对满洲国电报通讯、特别是无线电讯的装备十分积极。

363 除了从中国人那里抢来的无线电台以外，占领军还建立了许

1 《大阪每日》，1933年10月4日。

2 《新通日报》，1934年1月24日。

3 《满洲日报》，1934年2月19日。



图四

多新的无线电台，特别是在北满，其中还包括在接近苏联边境的地区。

现在满洲共有六十多个无线电台，其中大型电台的功率达到十瓩。全部电讯业务都被合并并转到满洲电报-电话公司的手中，该公司的股本为一千万日圆，于 1933 年 9 月开始进行实际业务。

这个公司的股份分配情况如下：三十三万股属于日本政府、十万股属于南满铁路康采恩、三十万股属于日本本土的十家大康采

恩、十七万股属于满洲国政府、十万股由广泛认购。

364 该公司订购了于 1934 年在长春建造功率为一百瓩的无线电广播电台的设备，这个电台的任务是在远东干扰一切不合意的广播，电台于 1934 年秋完工。

公司预定在第一年的工程中投资六百六十万日圆，第二年——三百七十万，第三年——五百二十万。在首批工程中将沿铁路线：哈尔滨—克山—齐齐哈尔—四平街（一千一百公里），哈尔滨—拉法—吉林（七百八十公里）和长春—吉林—图们（四百七十七公里）架设有线通讯线路。

电报-电话公司的工作完全受占领军总部的控制，但是力图使所有经济部门军事化的军阀甚至对此还不满足。除军事部门建造的电台外，军阀还把其它很多电台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下列报导足可证明这一点：

“由哈尔滨电信局管理的吉林、新京（长春）、延吉和黑河的无线电台都转由陆军省直接管理。”¹

军事部门还在齐齐哈尔建立了电台。接近苏联边境的有下列地区的无线电台：满洲里、海拉尔、呼玛、同江、富锦、佳木斯。

邮政业务的管理也集中了，这是在日本官员领导下进行工作并由极其严格的军事监察官控制的。

军阀在经济上的专政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占领军总部于 1933 年制定的所谓《南满铁路改组计划》最明显地表现出军阀对满洲国全部经济生活立即进行全面军事化的野心。

南满铁路半政府性康采恩的管理处通常是由当时的执政党安置的人员所组成，从 1931 年起这个管理处受军阀的影响越来越

¹ 《公报》，1933 年 10 月 7 日。

越大。

这个康采恩对以前自己经营满洲的垄断权死死抓住不放，在占领以后它实际是处在日本将军们的控制下，因此对任何竞争的企图、哪怕是来自“本国”资本方面的竞争也更不允许。

到 1934 年初，受康采恩控制和实际管理的已有包括工业、运输、贸易等各式各样部门的六十三个子公司。

军阀们打算从占领一开始就把事情安排好，使任何一个大企业都不能超脱他们的领导。这里有两个主要目的：把利润最大限度 365 地搞到军阀的口袋里，使经济生活军事化，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在预计的“大战”中搞好并利用这个未来的军事进攻基地和前沿基地的经济。

日本军人关于对满洲国的运输、工业、银行等进行所谓“国家监督”以及“不容许大型康采恩和资本家任意贪图私利”的声明，使日本社会法西斯分子有妄谈“满洲国的社会主义”的借口，甚至很多外国记者也在自己的电报中多次谈论“重要公用部门 and 企业的国有化”。

而所有这些声明和正式宣言的实质在于，占领军总部利用它对长春政府所下的关于国家监督和国有化的指令，不仅取缔和排挤地方资本的活动，而且还限制了日本大资本的自由活动。对日本资本提出了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基本上可归结为：要求它们加入南满铁路康采恩和由军阀所筹办的各种股份公司，要求它们满足于若干股息而处于从属地位，接受南满铁路或军事部门代表——安排在南满铁路以及多少有些独立性的企业中——的监督和管理。

日本军阀在自己的队伍中保留着军事封建分子，并且总是企图起到一定的独立作用，因此，它在这种情况下决定采取这样的独立立场，直接占有这个重要的物质财政基地。

它不仅在南满铁路康采恩中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且还获得了支配占领时掠夺来的各种中国企业权利，虽然这些企业名义上是属于由日本军阀建立的“满洲国政府”。此外，日本军阀手中还掌握了东京来的大批资金——包括公开的资金和根据国家预算拨给“满洲国军事需要”的隐蔽资金。

但是即使如此，关东军总部没有日本本土财政资本的帮助还是不行，由于发现本国财政巨头对于关东军总部的“特种服务部”（它经管满洲国一切经济问题）进行的“国家监督”持非常冷淡的态度，很多著名的军阀开始一再要求本国资本投到“地上天堂”——满洲国来。

366 占领军总部的“主脑”，日本军阀在满洲的实际领导人、原参谋长小矶将军在 1933 年同记者的几十次谈话中，对于资本家不在条件极好的满洲国进行投资感到惊讶。他为此在本国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全国旅行，并于 1933 年夏在大连举行了工商业专门会议，在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号召投资。

总部的半官方刊物之一——《满洲日报》甚至把 1933 年总部的经济政策称为“满洲的新经济政策”，它将这个政策解释为“公有财产和私人资本配合起来共同工作”¹。

稍后，在指出满洲国对于资本主义特别有利之后，这家报纸声称：“满洲国达到了墨索里尼所说的‘合作主义’。满洲只把它称为‘国家社会主义’”²。

日本军阀变换手法、盗用各种名词，实际上愈来愈巩固自己的直接监督和影响，同时并制定了各种方案把满洲国一切重要经济部门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这种变换手法的一个例子就是下面的《军队公报》：“为了消除

1 《满洲日报》，1933 年 10 月 24 日。

2 《满洲日报》，1933 年 11 月 20 日。

现在在某些系统中存在的关于满洲国全部企业均在关东军严格控制下的错误看法，日本军队作出了说明事实真相的通告。根据这一通告，对二十一个不同部门的那些大有前途的企业均提供了自由经营的权利”。

根据日本军队的声明，在它控制下的有“运输邮电、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企业、采矿业、电力、对社会安宁有关的企业的拨款事业以及从工业合理化的观点来看必须进行控制的其它企业”。

“为了奉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列大有前途的企业对外国资本的经营和投资仍然开放：乳品、捕鱼、农产品加工、原材料、制材工业、木材和海产品及牲畜的贸易、纸张和纸浆的加工、制糖、磨粉、啤酒酿造、食品加工、水泥加工、棉纺生产、染色、鞣革、陶器业、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¹。”

这从实质上说是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嘲弄。《军队声明》²对在华的外国资本界没有引起任何特殊的反应，因为这种嘲弄早已 367 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声明》在日本资本家中也没有引起任何强烈反应。它只是再一次从实质上证实了军阀在事实上的绝对专权。投在相同的彼此竞争的部门的日本大资本和满洲国资本之间的经济上重大矛盾丝毫也没有减少。这种矛盾只有在日本大康采恩成为满洲国的绝对主人的情况下——而这一点正是军阀和南满铁路所不允许的——才能有所削弱。

1932年开始的工业的一定高涨，主要是在军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这种矛盾略为缓和，但矛盾的全部实质

1 《满洲日报》，1933年9月28日。

2 现在，甚至以前租让给外国人的木材企业和制糖工厂在两年占领期间都已被迫贱价“卖给”日本人的时候，又有谁会向满洲的“乳品企业”或机器制造业、制糖业或木材工业投资呢？而且，运输和工业所有十分重要的部门都不准自由经营了，这又叫什么“门户开放”呢？

仍然存在，满洲“大陆的”日本人的任何蛊惑宣传和责难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还是那个小矶在大连工商业会议上说过：“具有岛民所特有的有限智力的人们想排除一切满洲产品（不允许进入日本本土——作者），因为这些产品可能给本土的祖国企业造成不便。”¹

可以在满洲进行巨大投资的各种渠道仍然和以前一样控制在军阀的手里，甚至答应过的“二十一个部门”事实上也处在总的严格的监视之下。这在实际活动中以及在水泥、棉纺、制糖等生产上均表现出来，更不用说象木材工业这种部门了，从1932年起军人就在这个部门成立了专营辛迪加，退伍将军铃木被任命为该辛迪加的组织和领导人。

军阀并不隐瞒自己的野心和实际作用。在声明《满洲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有报导说：“虽然日本军队没有把剑改锻成犁，但是它所进行的经济工作规模之大是至今任何一个军事组织所不曾进行过的。在长春的总部成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部，它发挥着巨大的积极性……满洲国的工业发展应为军事需要服务。”²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对这种状况也仍不满足。它们力图无条件地绝对控制整个经济并使之正式合法化，它们把自己的这些打算冠以“南满铁路改组计划”（上面已提到过）的美名。

根据占领军总部制订的这一计划，占领军司令应有权决定有
368 关满洲国经济生活的一切问题，同时摆脱拓殖省的任何监督。为了在实际上实现总司令的领导，由现已存在的特种服务部改组成为经济总部作为占领军总部的一部分。

南满铁路康采恩同时改组成为满洲国发展企业控股公司，在它总的控制下有十六家相当独立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铁路、制

1 《京津时报》，1933年8月8日。

2 《满洲日报》，1933年10月24日。

铁、煤炭工业、电力、化学、采金工业、有色金属的开采和生产、电报-电话、农业、汽车、航空、木材工业、军事工厂公司（兵工厂）、贸易、煤油、采矿工业。¹

由上面所列可以看出，“发展企业公司”包括工业中一切现有或筹划的最重要部门以及其它经济部门包括贸易和农业。根据计划，直接领导整个这个巨大康采恩，以及在这个康采恩以外的各部门和企业的是关东军经济总部。

这个计划原则上在占领军总部和南满铁路管理处之间已达成一致，并于1933年12月送往东京呈请最后同意和批准。

虽然准备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军阀在东京政府中影响很大，但是这个计划仍然遭到各方面的剧烈抵制。

首先反对这个计划的是满洲南满铁路康采恩本身的日本职员。他们不无根据地担心，在南满铁路正式和全部军国主义化的情况下，不仅工作条件将大大恶化，而且一切最好的差事都将被占领军总部直接委派的人——将军们和军官们——所占据。由高级“职员”——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领导的南满铁路职员协会，开始大肆吵嚷反对改组计划，推说这种改组计划“不符合日本帝国的利益”。

职员协会——它的二万会员还拥有南满铁路的二十多万份股票（一千万日圆）——甚至派遣了代表带着有关的委托书去参加管理处于193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股东非常会议。

但是，职员协会的反対只是开始。

由于军阀想把南满铁路这种有利可图的事情从拓殖省大臣永井那里夺过来，因此永井坚决反对改组计划，他认为南满铁路的策略在国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已确定。

改组计划还受到贵族院大部分议员的反对，受到外务省的反 369

1 《满洲日报》，1933年11月8日。

对,特别重要的是受到金融资产阶级界的反对。

在公政会——贵族院议员的政治集团——会议上,以男爵酒谷为首的公政会很多会员坚决反对南满铁路组织上的任何根本性变动。到过满洲国的公政会有些会员甚至要求撤销关东军总部附设的特种服务部,理由为它是完全多余的。

外务省反对改组计划首先是因为,实行这个计划为时尚早,而且可能引起国际上的误解。从日本的外交目的上看,夸耀满洲国名义上的“独立”是更为适当的,但是当日本占领军司令都已正式成为军事甚至经济独裁者的时候,这叫什么“独立”呢?

外务省还认为,目前实行能在某种程度上废除南满铁路现有的特别权利和利益的任何计划都为时过早。

拥有南满铁路全部股票一半以上(政府股)的大藏省也反对改组计划。大藏省特别反对把南满铁路的控制权转交给关东驻防军,“因为这将给政府的金融和信贷政策带来严重损失”¹。

当然,这些省的立场主要只是反映了日本金融资本的立场,金融资本不仅在书面和口头上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而且还用更重要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南满铁路的股票下跌²,发行到市场上的又一批价值三千万日圆的证券无人问津³。

资本家们甚至不惜作出决议。日本工商业会联合会早在1933年11月中旬就通过决议反对南满铁路的改组,指出这种改组“会引起慌乱并减弱股东的安全感”。

工商业会威胁说:“在改组的情况下将很难得到发展满洲国所必需的资本。”⁴

《大阪朝日》表达了金融界的意见,它在1933年12月中旬

1 《大阪每日》,1933年12月20日。

2 《满洲日报》,1933年10月30日。

3 《满洲日报》,1933年12月11日。

4 《日本时报》,1933年11月16日。

写道：

“关东军可能认为，南满铁路企业的军事意义产生了军事监督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经济上的开发是在军队任务范围之外。³⁷⁰关东军领导人可能会说，满洲国应根据日本的国家政策加以开发，但是关东军的国家政策并不一定是整个帝国的国家政策。关东军有权以军事方式参加执行国家政策，但难道它应该掌握经济上开发的控制权。”《大阪朝日》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驳斥。

金融资本界的大多数人在“经济问题应由经济学家（即资本家——作者）去干”的口号下开展广泛的运动反对军阀的改组计划。

还在10月底陆军大臣荒木本人就曾以命令的口吻公开声明：“南满铁路改组计划完全公开以后，拓殖省将予以赞同。虽然我不知道计划的细节，但是至于我——荒木解释说，——我支持关东军的政策路线。改革无论如何非进行不可。”¹

但是在12月底，当金融资本对《关东驻防军的计划》坚决表示不满之后，荒木就大大改变了自己的口气和自己的立场。“陆军大臣荒木就拓殖省保持对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一事持良好态度，这已经清楚了。”²

众所周知，后来新陆军大臣林声称，改组计划还必须慎重研究，对这一重要问题不应匆忙行事。因此，实行占领军总部正式领导满洲全部“经济”开发的方案暂时搁浅了。

可是，在这里还必须找寻荒木辞职的一个内部动机。除了其它的一切，所谓《南满铁路改组计划》还显示了最有权势的军阀集团的原则性路线。改组计划从两个方面反映了这条路线：它不仅反映了军国主义者力图掠夺更多的经济利益，并将满洲这个进攻基地完全军国主义化，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对待目的的态度，为了实

1 《日本时报》，1933年11月1日。

2 《大阪每日》，1933年12月12日。

现这个目的必须立即实行全面的军国主义化。这个目的就是战争开始,不顾一切、在最短时间内进攻苏联。

实行满洲经济生活完全正式军国主义化计划的失败还意味着极其急不可耐的日本军阀集团以及统治阶级中其他主战分子共同的“总路线”的实现也受到一些阻碍。

371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研究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反对军事政策中公开冒险行动的原因,但必须指出,这些集团在目前情况下有足够的力量来拒绝正式批准日本驻满洲国军队司令为“满洲经济独裁者”。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目前把统治阶级推上冒险道路并在战争道路上寻找出路的日本各种内部矛盾仍然在起作用。还在发现陆军省将被迫暂时拒绝实现满洲军阀的计划时,就发表过下列报导:“由于关东驻防军认为实现自己的建议是光荣的事情,所以南满铁路改组问题的发展有引起严重麻烦的危险。”¹

在这方面必须对满洲“关东军主脑”——占领军参谋长、加速对苏战争的狂热拥护者小矶将军——的反应作出估价。但是屈服于当前的时机,野心最大的军阀在等待“自己日子”的到来。根据小矶的反应,关东军半官方刊物写道:

“日本有小矶将军这样的伟大人物。当小矶不为他权力以外的情况所束缚,而能运用其真正的直率来解决发生的各种问题时,他的光荣日子还一定会到来。注视东方局势的人,如果他在准备未来的报告中在自己的人名录中保留有小矶的名字,那么他的行动将是明智的。”²

大部分军阀界人士、特别是占领军总部,当然丝毫也不能容忍这一事件的结局。很清楚,他们将要争取实现自己的“国家政策”。

1 《大阪每日》,1933年12月26日。

2 《满洲日报》,1934年3月7日。

军事工业基地的装备,工业的军事化

近两年来,占领者对很多工业部门表现了明显的积极性。

早已筹建的“昭和”制钢厂正在鞍山加紧建造,到1935年工厂的第一期工程应该投产。

但是,1934年春发现建设中存在极大的缺陷,纠正这些缺陷大大推迟了工厂的投产。

这个制钢企业和已有的鞍山制铁所合并,由海军中将后藤领导,后藤也是南满铁路的理事。鞍山厂三个高炉的生产能力能达到每年四十万吨生铁。1930—1931年生铁产量为二十五万吨,占领后产量增加,1933—1934年达到三十一万二千吨。 372

当时还打算把本溪湖制铁所以及属于大仓康采恩和名义上也属于满洲国政府的焦煤矿山都并入“昭和”制铁企业。早在1933年秋就已和大仓谈判出售这个企业或用其它方式使之合并和从属于“昭和”(即南满铁路康采恩)。

还进行了关于购买久张岭铁矿场的谈判,以便把满洲国的铁矿工业和制铁工业全部垄断。本溪湖厂的生产能力现在已达到每年约十万吨生铁。这种生铁从质量上说特别适用于军事工业,而它也主要用于军事工业。

1934—1935预算年度,对继续建造“昭和”制钢厂的工程预定拨款二千二百万日圆。

1934年初日本报刊报导,在牛心台窄轨铁路区发现含铁量为50—70%的特富铁矿矿床。新矿床的矿层极厚,甚至可以满足日本对铁矿石的全部需求,即年产五百万吨矿石。看来这个报导是过于夸大的。

占领者对煤炭工业的合并和垄断也花了很大力气。大家知道,全部中国矿山都被占领者攫为己有。1933年秋,拓殖省就已

批准成立“日满”煤矿公司,资本为一千六百万日圆(或满洲国国币)。这个公司的股东形式上有两个:南满铁路康采恩和满洲国政府。第二个股东(满洲国政府)的资本是以满洲国八个最大的煤矿——北票、西安、鹤岗、孙家湾、新立屯、抚州、八道沟和未名山——(总储煤量为二十亿吨)作价七百二十万日圆。南满铁路的资本是以一个不大的新康煤矿作价五百万日圆和三百万日圆现款。

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方法就把对满洲国所有煤矿资源的掠夺从法律上固定下来了,因为南满铁路康采恩——除了新公司(实际上也是南满铁路)以外,还有抚顺矿山和其它由它开发的矿山——就是满洲国的垄断企业。

不仅如此,南满铁路康采恩还掠夺了中国比较重要的煤矿。例如,它“购买”了吉林-敦化铁路(即朝鲜-满洲干线)附近的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奶子山煤矿,它的工业储备量为一亿吨。购买价仅为三十四万日圆¹。

根据关东军总部的方案,南满铁路煤炭企业将来应和日满煤矿公司合并成统一的煤业公司,从属于发展满洲国控股公司 and 经济总部。满洲国煤炭工业军国主义化的工作由吉田将军领导,吉田还被任命为筹建中的煤业公司经理。

由于市场的垄断、军事工厂以及与备战有关的很多满洲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加紧生产,1933年南满铁路康采恩的煤矿和日本在满洲的其它煤矿的采煤量增加了。1932年采煤量(抚顺、烟台、本溪湖等矿山)共为七百四十万吨,1931年为七百一十万吨。而1933—1934财政年度上半年的采煤量比1932—1933年同一时期增加了六十二万五千吨。1933年运往日本本土的共为三百一十万吨。《大阪每日》在报导1934年输往日本的煤将为二百七十一—三百五十万吨的时候,补充说:“预定输出这个数额是由于日本

1 《满洲日报》,1933年11月18日。

军事工业生产积极性日益增长对煤的需要越来越多。”¹

抚顺煤矿在 1933 — 1934 年的产量为七百万吨煤，预定在 1934—1935 年要达到七百五十万吨，为此在 1934 年秋仓库储存量已达到八十万吨，而春天的储存量只有三十万吨煤。

1933 年煤矿工人为二万五千人，比危机前少一半。

1934 年将开始开采瓦房店附近的渣滓窑煤矿。打算在“昭和”制钢厂使用这个煤矿的粘土质煤，数量为每年七万吨左右。

1933 年 5 月成立的满洲化学工业公司，在大连附近的康城子修建了一个生产硫酸铵和其它化学制品的工厂。化学工业公司的资本为一千二百五十万日圆（规定资本为二千五百万日圆），它还打算生产烧碱和其它在军事上非常广泛应用的“无害”的化学原料。

南满铁路把子公司股票的 50% 留归自己，而提供给日本本土各大康采恩三井、三菱、住友的股份只占全部股票的 10% 以下。根据计划，硫酸铵工厂应于 1934 年 12 月开始生产，成本为每吨二十七日圆，而当时日本的成本则为每吨三十三日圆。加上包装费、折 374
旧费、运输费用等，每吨的价值为四十八日圆，出售价格为七十一日圆。生产能力为每年十八万吨。副产品是：硝酸氨二千五百吨，浓缩硫酸三百吨、树脂四千五百吨、汽油一千吨、杂酚油一千吨、焦油二千吨。

非常重视的另一种生产就是铝的开采，铝对于航空以及对于整个军事工业极为需要，而在日本本土则是根本没有的。

1933 年 9 月，日棉铝公司开始在东京推销自己的股票，该公司的股本为五百万日圆，经理是原运输省大臣井上忠广。铝公司将设在富山县，由满洲铝公司（即南满铁路子企业）在抚顺加工生产的半成品将从满洲运往富山。根据计划，富山厂的生产能力为

1 《大阪每日》，1933 年 10 月 24 日。

每年五千吨,以后再增加到一万二千吨,这个数目差不多能满足日本对铝的全部需求量。以后这两个铝公司应合并。生产半成品的实验性装置,价值为三十五万日圆,于1934年3月在抚顺投产。

还在日棉铝公司成立以前就曾强调指出:“军人支持计划,因为他们认为,铝对他们极端必需。”¹近来运往日本的轻金属为每年一万五千吨,这些轻金属主要用于军事工业。

占领军总部对水泥生产也很重视。满洲水泥的消费量1933年达到三十三万吨²(包括从日本进口的十二万五千吨),1932年只消费二十一万吨,而1931年则极少。很多水泥不仅用在军事运输建设和军事工业建设,而且还直接用于修建设防据点,特别是在北满。

现有的工厂——大连的小野田公司(生产能力为二十万吨),南满铁路所属各工厂等(生产能力约为四十万吨)足能满足满洲水泥需求而有余,但是还准备修建下列水泥厂:在辽阳修建日满水泥公司、在吉林修建浅野水泥厂、在抚顺修建南满铁路水泥厂、在鞍山修建小野田水泥厂³。此外,还打算在四平街修建小野田水泥厂,一部分资本家还着手在哈尔滨修建水泥厂。

辽阳波特兰水泥工厂和吉林工厂(股本各为三百万日圆)计划产量各为十一万吨,鞍山工厂为十二万吨。在吉林建造的工厂应于1934年春完工。日本最大的水泥公司——浅野和小野田——之所以能参加进来,是这些垄断组织经过激烈斗争来反对在满洲国开展独立的水泥工业的结果。但是根据最近的材料,占领当局和南满铁路虽然在原则上被迫同意日本垄断组织参加,但实际上却阻挠这些工厂的兴建⁴。

1 《日本广告报》,1933年8月20日。

2 《大公报》,1934年1月21日。

3 《日本时报》,1933年10月14日。

4 《满洲日报》,1933年10月13日。

预计在抚顺修建的工厂将从沥青页岩的废渣中生产出水泥。如果产量为十万一二十五万吨水泥，则需对企业的设备投资二百万一五百万日圆。

1934 年仅南满铁路就在日本订购三百五十万袋水泥，这年满洲水泥的总消费量达到五十万吨以上。

对水泥的巨大需求是因为在很多据点修建了大批炮台，还修建了很多兵营以及占领者所需要的其它各种建筑物。例如，在长春修建了可以容纳两个师的兵营，1933 年这个城市的建筑工程共花了一千万日圆。

1933 年 11 月，打算在东京成立一个有南满铁路、住友和古河参加的菱苦土开采公司，规定股本为七百万日圆。在满洲只开采原料——菱镁矿，并且建造用以试验新法提炼菱苦土的试验性工厂装置。工厂将造在日本的山口县(宇部市)。此外，在新潟县已有一个直江津工厂。根据较新的资料，菱苦土公司的股本将增加到三千万日圆。

南满菱镁矿的蕴藏极为丰富(达五十亿吨)，已大规模进行开采。1933 年菱苦土的开采量为六万吨。菱苦土和菱苦土砖用于日本的制钢厂和兵工厂。

木材业的军国主义化和垄断化大大刺激了满洲的木材业界。

退休将军铃木及其助手们早从 1932 年底起就竭力设法成立垄断的日满木材公司，它的股东除南满铁路以外，名义上还有长春政府。股本确定为五百万日圆。

从准备大战的军事部门的立场来说，木材工业的全部集中化以及它的从属于军需机关是非常重要的。《满洲日报》公开声称：376 成立木材公司这是关东军特种服务部的建议。但是它在这里也不得不补充说：

“虽然木材商们自己也完全承认，木材业的不受监督是有缺点

的,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当局所建议的根本性变革。他们指出,甚至在日本和朝鲜,木材业都是自由经营的,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满洲应该成为例外的原因¹。”

在 1933 年 10 月初于长春召开的满洲木材商代表会议上,曾经一致决定开展强大的抗议运动,反对新的木材业托拉斯和它对木材工业及木材贸易的控制。

由于这些障碍,木材公司的正式成立一直耽搁了下来。

同时军阀和南满铁路开始用其它办法限制同它竞争的木材商。例如,在 1933 年 12 月底曾报道:当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在五常、舒兰、额穆和桦甸各县砍伐“属于溥仪”的木材的禁令,在吉林木材商中引起了骚动²。这正是上面提到过的、新的木材公司所觊觎的那些木材。因此,就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内哄也在继续。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在满洲修建纸浆工厂的方案也迟迟未能实现。这个工厂的预定固定资本为二千万日圆,应为生产人造丝和纸张提供原料。

在满洲组织真正的军事工业的工作正在比较协调地进行。由黑崎将军管理的奉天兵工厂已于 1933 年春天前恢复并扩建。三井和大仓组织成立了公司,投资二百万日圆,打算进一步扩大兵工厂并在满洲国其它地方修建辅助性兵工厂,而且还要改组兵工厂的管理机构(以公司的形式出现),吸收南满铁路代表参加。

电力行业的合并计划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计划在占领后立即就提了出来,当时三井和三菱就打算染指。但是功率最大的发电站现在都属于南满铁路,这个康采恩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有利可图的行业。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南满铁路子公司的实际垄断权加以合

1 《满洲日报》,1933 年 10 月 5 日。

2 《大连新闻》,1933 年 12 月 29 日。

法化，即把已于 1931 年 9 月—10 月武装侵占的对中国发电站和对这个公司提供独霸电力业的权利加以合法化。对现在已有各企业估价为一亿日圆作为这个垄断公司的预定资本。这个公司由于它的垄断地位而利润大大增加，这一点可从下列报道中看出来：

“以前公司的纯利润每半年平均为一百万日圆。在 1933 年 4 月—9 月的半年中纯利润达到一百五十万日圆，而且扣除四百万日圆作为特种准备金。由于不久前公司影响的扩大，它的利润迅速增加。”¹

在新的电力建设的方案中，目前能实现的计划是在康城子修建五万四千瓩的发电站，它主要用于化学工厂（硫酸铵等）的供电。发电站的第一期工程应于 1934 年 12 月前完工。

尽管有关的大国，其中包括美国表示抗议，但是 1934 年秋在满洲还是实行了对石油产品的加工和贸易的“国家”垄断。同时还打算在葫芦岛或大连成立炼油厂。关东军参谋长小矶本人赞成建在葫芦岛。但是他甚至遭到南满铁路方面的反对，因为南满铁路自己想在大连修建炼油厂。建立石油业的垄断组织也和建立其它很多企业一样，由于关于占领军总部“经济建设”的“基本”计划所引起的长时期的喧嚣也搁浅了。石油公司非正式的理事会和办事处早由南满铁路康采恩于 1933 年 10 月成立。后来，它开始在康城子修建可提炼十二万吨石油的工厂，南满铁路康采恩将五百万日圆的股本分配如下：二百万——南满铁路、一百万——满洲国、二百万——日本的各石油公司。炼油厂应于 1934 年 12 月以前完工。

日本人于 1933—1934 年在热河和南呼伦贝尔进行了石油的初步勘探，并且把从抚顺油页岩提炼矿物油的工厂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每年十五万吨。

1 《满洲日报》，1934 年 1 月 4 日。

组织“酒精烧酒公司”暂时仍然是一种设想，这个公司将控制满洲国的全部烟酒业。这个行业对日本军事部门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依靠外国石油产品的进口。早在 1931 年，哈尔滨烟酒工厂就从价廉的满洲粮食中蒸馏燃料，这种燃料在当地市场上能和挥发油及气体汽油有效地进行竞争。

占领军总部竭力要在满洲实现酒精垄断。在占领后，满洲属于中国人的火柴工厂几乎一半都停业了。但是，属于日本人或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其余十九个厂却增加了产量，1933 年生产了二十七万五千箱火柴。

占领军总部大力协助日本资本家攫取 1932 年转入美国人手中的阿什河的制糖工厂，并且成立了中国呼兰制糖厂。

特种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之一井上上校负责采金工业方面的问题。根据他的看法，金矿储藏估计为五十亿日圆。国家金矿开采公司的股东确定为：南满铁路、东拓和满洲国政府。股本为一千二百万日圆。主要由南满铁路资助的大批考察队，在大规模的武装警戒下于 1932 和 1933 年在北满到处搜寻“金矿群”。1934 年春，由一千多人组成的四个考察队被派往金矿考察。

由于日本军事化学工业所必需的碱的生产大大扩大（在关东和黄海海岸采集的），大量储备的盐全部售罄。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的生产已不能满足对盐的需求。1933 年日本本土盐的消费量为二十二亿斤，而一般的消费量仅为十六亿斤¹。根据大概的计算，1934 年盐缺少十亿斤。除了从关东出口盐以外，满洲国代表还签订了 1934 年向日本出口四亿斤盐（1933 年为一亿斤）的合同。

1934 年夏，占领军总部开始组织制盐工业股份公司，资本为五百万日圆。除南满铁路外，参加公司的还有其它六个日本股东。

1 一斤（日制）等于 0.6 公斤。

正象最近成立的其它企业一样，满洲国甚至在名义上也没有被吸收参加。而盐场将开辟在满洲国境内，而不是在关东地区。

在南满铁路的领导下还成立了制碱股份公司，股本为一千万日圆。预计产量为十万吨碱。

生产染料的所有企业合并成一个公司，资本为六百万日圆。

军事工业狂热的积极性（1934 年看来是它的顶点）以及军阀³⁷⁹和金融界之间达成的暂时妥协（是在军人对满洲经济超军国主义化的组织形式被迫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达成的），是满洲企业的股票大大上涨的原因。1934 年头两个月南满铁路的股票上涨了六十八日圆，即大约上涨 20%，这使股票价值的总上涨额达到五千万日圆以上。其它各种新成立的企业的股票也都大大上涨。各种股票上涨的总额到 1934 年 3 月中旬达到一亿日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其它经济部门的军国主义化

占领军总部的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工业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金融、贸易以及劳动部门。从一个具体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各国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军事生产，同时使所有的主要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都适应于战争的需要”¹。

日本帝国主义者特别关心增加满洲棉花的播种面积。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现在棉花的消费量每年为十四亿斤以上，而它仅能生产三十万——四十万斤，从朝鲜只能进口一千四百万——一千五百万斤。因此，棉花消费量的 99% 都只能从国外进口。

在棉花计划或者更精确地说在棉花方案中，预定满洲国的棉

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提纲和决议》，党书籍出版社，1934 年，第 9 页。

花产量为五亿日圆，即十八亿斤。将在奉天省和热河省种植一千二百二十万英亩的棉花，其中三百万英亩种植美国棉花。作为“第一步”，预计 1933 年种植棉花七十三万五千英亩，产量为一亿五千万斤皮棉。

1933 年秋的收成仍然只有二千六百万斤籽棉，即六百万斤皮棉，价值三千一百万日圆。根据较新的统计资料，从三万一千公顷的播种面积上收获了九千吨皮棉。为了加工原棉，在奉天修建了一所工厂，它在 1934 年应将梳棉机增加到二百台。

日本发展植棉业的现实计划是：种植面积达到三十万公顷，收获量达到一亿五千万——二亿斤，即经过二十年收获量达到九万 380 吨皮棉。但是日本棉纺工厂主联盟（答应在十年内给满洲植棉业协会津贴一百万日圆），要求在十年期限内完成预定计划，它提出的论据是必须尽快使日本达到“棉花的自给自足”。毋须强调指出，由于爆炸物资和棉花之间的“血缘关系”，所以军事部门要求更快地发展植棉业。

满洲植棉业协会于 1934 年 4 月成立，资本为二百万日圆。股票的一半由满洲国政府承担，以后每年发放津贴十万日圆。协会的任务是推广优良棉种和植棉方法，收购棉花和清花。为了进行清花，在辽阳、大石桥、大虎山和锦县修建了轧棉工厂。

占领者特别注意的另一部门就是养羊业。日本的羊毛包括毛线的消费量达五万五千吨，价值约一亿日圆。全部羊毛均由国外进口。满洲的羊毛质量低劣，每年产量四千吨左右，供当地消费或用来出口，但只有少量输往日本。现在计划成立日满养羊业协会，资本为二百万日圆，该协会每年将从国家获得八万日圆的津贴，每年将用十万日圆来发展和改进满洲国的养羊业。养羊业“方案”要求在二十五年内使满洲国的绵羊头数达到二千五百万头。

军阀对于发展养马业和扩大小麦耕种面积也发表了很多议

论。这些议论的效果目前还只是消极的。

占领者还对供给日本和日本驻满洲大批军队粮食、服装以及靠满洲原料制造的其它储备品的一般问题进行研究和准备。

1933 年春，南满铁路开始在大连修建一所大型榨油厂，它将用改良的化学方法利用酒精分离出油。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油既完全适合于食用，也完全适用于技术目的；油饼可用来喂牲口，还可用作部队的饲料。工厂应于 1934 年 6 月投产。

三井康采恩筹划于 1934 年在哈尔滨修建衬衫厂，固定资本为六百万日圆。

停业的奉天糖厂（由南满铁路资助建成）由日本昭和制糖公司以八十五万日圆购得，昭和制糖厂打算在 1934 年成立满洲国制糖子公司，股本为一千万。日本人还侵占了阿什河和北满呼兰的制糖厂，并打算让这些厂全力投产。³⁸¹

满洲制革工业股份协会（有日本股东参加）的大型皮革厂设于奉天。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军队需要的皮鞋和背包”。

满洲的小麦、大豆、黍、肉类和毛皮等等各种原料均在考虑之列，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利用。

军需官上校川北在奉天成立了一个大量缝制军用皮衣的工厂。

军事当局宣布收购七十万张家兔皮。其它的上校们负责制鞋皮革的生产问题、罐头工业、制粉等。

1933 年底，在奉天省实行一种新办法，根据这种办法，农民只有在警察局登记领取出口特别许可证以后，才有权出售和出口自己的粮食。

日本人花了很大力气去占有北满最大的松花江面粉厂。1934 年初他们的努力似乎成功了。《哈尔滨日日》（1934 年 1 月 25 日）在报导关于这个企业的谈判取得了成效时肯定说：“北满的制粉企

业将控制在日本资本家的手里。”

在3月已有报导说：“受关东军总部特种服务部保护的日满制粉公司(资本为四百万日圆)将于今年开业。它将购买哈尔滨的两个大面粉厂、绥化的一个厂和海拉尔(接近苏联边境——作者)的一个厂。今后还要购买三个目前停业的面粉厂。”¹

值得指出的是,占领军总部也没有放过满洲国的日本工商会。日本特使(他也是关东占领军的司令)1933年11月坚决要求东京政府颁发关于将满洲国现有的七个工商会正式隶属于政府的法令。

1933年底还实行了另一种办法,根据这种办法,发货人在发运各种进出口货物时,应领取运货证书,否则货物不予运输。日本商人坚决反对这种“制造极大麻烦”²的办法。

在金融问题上,关东军总部和日本军事代表团除领导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外,还制订了再成立一个工业银行的方案。他们还和东京的大藏省磋商关于在满洲国成立工商信贷社的问题。还制订了方案要在满洲特别是在以前的中东铁路租借地区³成立信贷机构。

特种服务部加强进行劳动军事化的工作。由特种服务部的代表和南满铁路领导的劳动监督委员会,从1934年1月起着手讨论有关成立劳动交易所以及劳动力雇用公司工作的问题。劳动监督委员会还管理在农民中强迫摊派劳动力的工作,这些农民为了微薄的工资被拉来修筑军事工程;这个委员会还负责组织强制性“劳动营”,其中主要是监禁参加游击运动的嫌疑犯以及幸存的被俘游击队员。

1 《满洲日报》,1934年3月8日。

2 《大连新闻》,1933年12月25日。

3 《大连新闻》,1933年12月29日。

总部人员还领导满洲国的工会,这是一个黑黄色的工人组织,于1933年3月成立,管理委员会设在长春。

委派日本人中田有久担任这个工会的主席,到1934年3月底在满洲似乎共有二万会员。

用后备军建立军事据点

日本军阀在满洲国组织日本武装农业后备大军的工作遭到很大的失败。

第一批¹后备军——四百五十人,不带家属,全副军装——保持严密的军事组织于1932年10月来到松花江上的佳木斯。他们的指挥员是退伍上校石川。

计划在五年内把一万名这种后备军(每人发给一千——一千五百日圆)移居到各个重要军事据点,主要是北满。

由于考虑到土著居民的敌视,军事指挥部对这种移民寄以很大希望,认为这种移民将同朝鲜的移民一起沿重要交通线建立起据点。但是,事情比将军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由于这些后备军经常被迫同游击队作战,而且差不多处在监狱制度的条件下,所以人数如融雪那样下降。开小差的人数比被打死的和病死的要多得多。

到1932年12月就已有“一半的移民由于不能忍受严寒的气候和艰难的生活条件²开小差回国了”。

还有从呼海铁路的工地上逃走的,因为他们不满意极低的工资。

但是陆军省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安,1933年又打发第二批五百人到佳木斯。可是在半路上就跑了四十三人,而且头一个月里开

1 如果不算以前用于到海伦修建铁路的那批后备军。

2 《新京日报》,1932年12月23日。

小差的又有九十三人。

日本报刊认为,由于生活条件极其困苦,而且经常受到“土匪”袭击,不可能指望这种移民会有什么成效,报刊指出,“过于严厉的制度使他们的生活就象坐牢一样”(《大阪每日》)。

1933年10月底,日本拓殖省秘书官去佳木斯以后,指出那里“现在共有三百九十九名日侨”(派去的是九百五十人——作者),他说:

“如果迁移日本侨民的目的不是要把他们派到对苏作战下的前线,那为什么把他们弄到北满这么远的地方去呢?”¹

1934年春(3月),佳木斯地区后备军居住的村落遭到游击队的侵占和破坏。大部分移民在战斗中被击毙。还活着的几十名移民在日本军队保护下又回到了老地方,所以在佳木斯地区仍然有日本后备军的“殖民地”。

军事殖民的另一试验收效也不大。军国主义者决定于1933年在吉林省北湖(镜泊湖)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总额为六百名武装的日本学生。农业学校应由满洲国政府供给开支。

学生毕业后能得到十至十二公顷土地以安排自己的家业。“学校”本身应该是“带有高墙、炮眼和塔楼”的堡垒。

一批三百名“学生”于1933年8月果真来到了满洲。但是“由于镜泊湖一带土匪活动猖獗,侨民决定暂时留在敦化”²。

1933—1934年整个冬天,都在严密的武装保护下进行调查,打算在1934年春开始建立“学校”。然而“这些学生突然从敦化开小差,现在有十五个开小差的人正在吉林找工作。应该认为,其它学生也会仿效此例,因为他们不满意自己的状况”³。

1 《大连新闻》,1933年10月31日。

2 《大北新报》,1933年8月26日。

3 《满洲日报》,1933年12月22日。

有一批“学生”于 1934 年春仍被送到了镜泊湖,其中的一部分人完全被游击队歼灭,而人数不多的另一部分人则不断忙于同游击队作战。³⁸⁴

虽然所有这些军事殖民工作的失败是很明显的,但是军事部门在 1933—1934 年冬仍然宣布了一个方案: 将于 1934 年再派二千人在长春-会宁铁路、拉法-哈尔滨铁路和呼海铁路地区以及松花江右岸接近哈尔滨的地方建立殖民地。

为了欺骗日本农民,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鹭尾甚至谈论起农民大批移居到满洲国问题:

“满洲国可耕地的大约一半已被占用。如果日本打算在满洲建立无法攻破的基础,那么剩下的一半可耕地应该主要由日本和朝鲜的侨民去占用。这是日本最后的机会。”

日本的地主和资本家当然不仅竭力想占有“剩下的一半”,而且还想占有已耕的土地。在这方面他们能做的事都做了。可是,在租赁来的一小块土地上拥挤得喘不过气来的日本本土的贫苦农民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土地。而关于日本劳动人民大批移民到满洲国一事,连想都不用想。从 1932 年年底起,日本的警察局就制订了一系列的专门措施,不允许日本的无业贫民到满洲去,——防止产生不满者的闹事,“因为日本的工人既不听话,又不守纪律”¹。

而且,1934 年初出现了报导说:“根据关东厅提出的观点,部队当局打算停几年向满洲派遣侨民。”²

用日文出版的报纸说得更为露骨:

“日本在满洲的军事移民,由于条件不好而遭到惨败。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防止侨民逃跑的话,将影响日本今后对满洲的移民。

1 《满洲日报》,1933 年 5 月 25 日。

2 《满洲日报》,1934 年 1 月 4 日。

在三年内集体的(即军事的——作者)移民将暂时停止。”¹

但是直到 1934 年军阀仍没有停止自己的实验。夏天,一批给养良好的武装日本渔民移民来到富锦(松花江下游,接近苏联边境)。“还有两个渔民劳动组合将由日本前来”²。

385

9 月份将从东京派遣一批二百十八人的武装农业移民。但是,这些移民都将带家属。

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朝鲜移民的工作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日本人指望用煽动民族仇恨和使朝鲜人同中国土著居民对立起来的办法,用朝鲜人建立军事后备军或为自己建立比较重要的据点。因此,在占领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就大肆喧嚷关于朝鲜人的大批移民问题。但是在满洲的朝鲜群众对帝国主义压迫者所表现的强烈仇恨,并不亚于中国居民,因此,占领者只好死了这条心。在 1933 年,以“有组织的方式”从朝鲜只派出了几批移民,每批中都有几十个人带着家属。

虽然殖民者的计划完全失败,但他们继续进行实验,只对最初的方针作了不同的变更。例如,放弃军事封建殖民化绝不等于总的放弃了日本的农业移民。1934 年又派了几批移民(当然是武装的)到满洲去从事农业,但是这些人已经作为“自由的”带家属的移民了。这些人由后备军和一般农民组成。他们当然都分别居住在重要的军事地点,免费获得土地、补助金等,但是没有军警式的兵营和军事组织³。

在松花江口上住了一批渔民(约三百人),他们将同时从事木材采伐和农业。

从对待朝鲜人来说,殖民者把他们从朝鲜派遣移民的计划先

1 《大连新闻》,1934 年 1 月 2 日。

2 《奉天每日》,1934 年 7 月 11 日。

3 参看 1934 年 6 月 5 日《哈尔滨日日》。

搁置到将来再办，现在先把已经住在满洲的各批朝鲜人安排好土地，希望用这种办法即使不能把朝鲜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至少也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朝鲜人整批整批地分别住到日本殖民协会从中国人那里抢来的土地上，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的开发条件好歹还能忍受，但实际上他们完全成为殖民协会的奴隶，变成他们的半农奴制的农民。

满洲国武装力量的组织

占领者对组织当地辅助武装力量即所谓“满洲国军队和警察”——不仅专门用于在满洲国“维持秩序”，而且还用于积极参加对苏的进攻——所作的努力，结果得到的是不少痛苦的失望。1932年，由占领者领导编制和武装的军队，成团成旅地起来反对压迫者。满洲国政府陆军大臣马将军本人为全国人民的愤慨所吸引，³⁸⁶也转到了抗日部队方面来。

1933年，日本人通过在中国警备队中配备日本指挥人员的办法，加强了当地部队军官的成分。但是，小部分军队和警察——连和个别中队——的投诚，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常现象。而且，起义的士兵常常杀死他们的指挥员，如果指挥员反对投到游击队方面去的话。因此，虽然日本人编制的地方军队共十一万人，地方警察和“自卫队”不少于十万人，但是在紧要关头这些武装力量甚至是占领者本身额外的危险。不仅士兵们，就连下级和一部分中级指挥人员都仇恨日本人，因此在适当时机这些武装力量就会掉转枪头去反对占领者。

占领者对“连环保”制度寄以很大希望，这种制度开始只在个别地区部分地实行，1933年12月底根据长春政府的专门命令，在整个满洲国（兴安省除外）实行。这种“保甲”制在封建的中国曾实行过一段时期（直到上世纪中叶），后来日本人在绥靖台湾时曾采

用过,现在占领者打算在满洲进行试验。

每十户人家构成一个行政单位——“牌”;每一个村子或者大居民点的一百户人家又构成一个行政单位——“甲”;每一个警察段的全部居民构成最高的联合组织——“保”。

如果基层行政单位的某一个成员犯了罪,其余的人家都要负责,要对他们罚款或给以其它处分。高级的联合组织——“甲”和“保”——可以得到特别许可靠自己本身力量组织当地的武装自卫队。

根据日满政权的说法,连环保制度«是“大同”三年(1934年)预定的根本改组的准备工作和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第一步»¹。

目前的事实是:在占领者领导下成立起来的自卫队,经常发生兵变而加入到抗日游击队的行列。

387 日本的将军们现在极少信任地方部队,只是在难得的情况下才提供大炮给他们使用。给他们提供的武装和弹药的数量也极有限。有时派去围剿的队伍每人只有几十发子弹。

日本人自己对满洲国军队的看法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如,有一个叫上野田的人写道:

“谁也不能否认满洲国军队的质量低劣。可以认为,对它进行改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一些日本军官——满洲国军队的教官——表示,要改革这支军队的打算是完全徒劳的。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要建立一支能够抵抗现代化部队的坚定而能起作用的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²

关于满洲国武装部队转到游击队方面去的事,在1934年有不少的报导。例如,日本人解释说,1934年3月在三姓—佳木斯地区的战斗中,由于地方部队指挥员宋来投到游击队方面去,打击了

1 《滨江时报》,1934年1月19日。1934年这个办法未能实行。

2 《日本广告报》,5月10日。

日本人的后方,致使游击队获得了胜利,而日本人遭到巨大损失。1934年在日满报刊上也经常发表下列类型的报导:

“在安图县有八十名地方武装人员起义。这些逃兵携带全部服装和子弹向匪徒投诚”。¹“从汪清派往小白桥沟的二十名警察已与匪徒汇合”²。“阿什河的护矿部队特别连发生哗变,并且杀死两名俄国警察”。³在对青山车站附近(齐齐哈尔省)5月17日有一百名地方武装人员哗变。吉林部队教官中队的三百名士兵,于6月1日从小城子车站出发剿匪,一去杳无音信⁴。在呼兰有一部分吉林军队发生哗变,在同警察互击以后撤离该城⁵。“6月11日在帽儿山车站有一部分铁路护路队哗变。哗变人员打死了连长和他的三个亲信,抢走了机关枪和步枪,并已与匪徒汇合。”⁶

占领者还在松花江成立了内河舰队,配备有日中水兵和指挥人员。炮艇和军用快艇是在日本本国建造的,还把有些轮船改成了军舰。占领期间,对松花江上古老而效率不高的中国军舰进行了修理、重新装备并增加了二十四艘新军舰。有些炮艇和快艇还在哈尔滨造船厂建造。在哈尔滨还成立了一所有日本教官的海军学校。

还在日本给满洲国建造了海军军舰。虽然这些军舰的全体船员甚至都是日本人,但是日本军阀仍然认为,这些军舰不应算在华盛顿和伦敦海运协定所规定的日本定额之内。 388

组 织 白 匪

日本军国主义者很关心在满洲建立自己的人力后备,所以它

-
- 1 《延边时报》,5月17日。
 - 2 《延边时报》,6月17日。
 - 3 《大北新报》,5月2日。
 - 4 《大北新报》,6月4日。
 - 5 《哈尔滨日日》,6月20日。
 - 6 《满蒙日报》,6月16日。

对白俄不能不注意。

白卫军走狗们成立了武装组织以后,在很多地方抵抗游击队。由数百名红胡子匪徒组成的队伍于 1933 年春参加了攻占热河的战役;白匪在公开的和秘密的日满警察队和宪兵队服务;红胡子匪徒按照日本总部的布置,举行示威反对中东铁路的苏联代表和苏联工人;他们进行各种挑衅直到肆无忌惮地袭击苏联公民、组织颠覆中东铁路的活动等。他们把颠覆的罪行然后挑衅性地推在“第三国际”和苏联公民的头上,这些苏联公民却被真正的肇事者关押起来,并扣上未遂的罪名。

由于处在日本将军们的卵翼下感到自己很安全,所以白匪们简直是无恶不作。一伙白卫军——其中有俄国难民委员会的成员、逃亡的将军、法西斯组织“俄国兄弟会”的成员以及在哈尔滨日本警察队服务的警官——在 1932 年和 1933 年期间抢劫了哈尔滨的富裕居民,其中甚至包括外国人。反抗的和未交赎金的都被打死。比如,被抢劫和打死的有商人考夫曼,应交赎金的有谢列里·德弗劳朗斯等。

匪徒们的暴露,是在抢劫法国公民著名钢琴家卡斯伯以后。1933 年 8 月 24 日红胡子匪徒在哈尔滨的主要街道上将卡斯伯劫走,要求赎金三十万日圆。这批赎金未缴,于是在整整的三个月之后——11 月 24 日——将卡斯伯打死。

匪徒们的姓名对哈尔滨的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只有日满当局才是例外,他们假装正在加强搜捕抢劫犯。“去搜捕的人”中有一个叫 H·马尔蒂诺夫,他是哈尔滨秘密警察局的领导官员之一,同时他又是匪徒的头子之一。只是由于法国副领事(后来根据日本人的要求,他由哈尔滨调到天津)的坚持,这伙红胡子匪徒其中包括马尔蒂诺夫才被揭露出来。但是警察局竭力隐瞒某些有名的参加者,这些人的名字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公布。占领者非常心疼

自己的“同盟军”，甚至当他们干了这种坏事也还要保护他们。

就是这个难民委员会的成员和这些白卫军——秘密警察局的官员们——每天都在日本军事代表团出版的小报《哈尔滨时代》，³⁸⁹以及由日本人资助的其它白卫军小报上对苏联进行中伤，因而获得了日本将军们的赏识。他们还伪造各种证件，组织白匪现在就在苏联境内进行破坏活动。

白卫军组织的“首脑们”在长春踏破了占领军总部人员的门坎，他们还经常到东京去朝圣。白匪伊斯兰教徒的“领袖”库尔班-加利还谒见过武藤并荣幸地受到荒木本人的接见。如果注意到日本阴谋家在甘肃和新疆对伊斯兰教徒所下的赌注，那么这是不足为怪的。

“西伯利亚侨民会领袖”戈洛瓦切夫教授（现在是满洲国半官方刊物《公报》俄文版的编辑）和维什涅夫斯基将军于1933年秋在东京长期客居，同日本军阀商谈有关在西伯利亚境内成立“白卫军缓冲国”的问题。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日本的老走狗土匪头子谢苗诺夫身上，根据美国将军格雷夫斯的说法，这个人曾自夸说，如果他白天不杀人，晚上就睡不着觉。这位将军在自己所著的《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冒险》一书中，把谢苗诺夫称作为“凶手、匪徒和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日本人就想用这号人物当全体白卫军武装匪徒的领袖。

现在的占领军司令菱刈将军经常亲自同谢苗诺夫（经常住在大连）商谈“大事”。谢苗诺夫把在西伯利亚抢来的黄金都存在日本银行里，根据需要日本人把补助金拨给这个账户。谢苗诺夫的走狗们在全中国，甚至在欧洲为贼党招兵买马。一批白匪正在日本接受专门的“正式训练班”的训练。谢苗诺夫经常到东京去访问陆军省。

直接为日本服务的还有涅恰耶夫将军以及在满洲和中国的其它白卫军“战士”。

不得不怀疑，这些“彻头彻尾的大坏蛋”会给日本帝国主义带来重大的好处。1933年秋，当哈尔滨充满了关于日本即将进攻苏联的传说时，《满洲日报》的下列报道非常说明问题：

“在哈尔滨发生了异常现象——多年居住在那里的白俄大批动身到中国、日本和欧洲去。警察局肯定说，这是传说日苏战争即将开始的结果。8月—9月间有七百一十名白卫军离开了哈市。本月份，离开的趋势在加剧，平均每天有四十个人离开。”¹

看来，白匪对“日本军队的力量”并不太信任，因此打算离开危险地区远一些。

日本人的现实打算，是使一万——一万五千名满洲的武装白匪参加武装入侵苏联，当然也不特别相信这些人的战斗力。

日本人还企图在欧洲国家拼凑白匪队伍，打算把这些匪徒送到远东去。

日本军队集结于满洲

日本的将军们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把自己的希望不仅寄托在地方部队或可鄙的白俄红胡子匪帮身上，而且还寄希望于自己的帝国军队身上，他们认为，帝国军队将相当顺从地起着炮灰的作用。

日本的军事领导人非常重视本国军队的专门训练、进行军队改组、充分供给军队技术装备等，为此近年来拨出的资金比以前的军事预算要多一到二倍。

同时不断将大批军队集结在满洲国。这些部队特别充分地得到技术装备的供应。

1 《满洲日报》，1933年10月20日。

1932年12月,陆军省的官方声明就已表明,关东军的兵力将由占领前的一万零五百人增加到六万五千人,组成三个半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这个声明还报道说,现有的八个空军团二十六个连将进行改编,增加到三十五个连,还说将成立两个坦克团,每团配备到二百七十辆坦克,还将成立军事化学学校。

但这只是1932年的官方声明。实际上,到1933年底在满洲国已集结有日本军队十三万左右,在他们中间每天都在加强反苏的战争宣传。

当然,在整个军队和整个日本居民中,都在进行有力的战争宣传,但是在满洲的日本军队中,宣传得特别厉害。在共产党的日本士兵报纸《兵士之友》上刊登的日本士兵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信件报道说,日本军官公开声称:“我们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为此须夺取西伯利亚。”专门的战争准备工作在各个方面进行。从1933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军队都集结到北满,即离苏联391
联边境更近的地方。

但是,日本军队来到这样一个民族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家,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占领军士兵们在回到日本后也表现出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感染”。例如,日本报纸《大连新闻》(1934年2月11日)刊登了下列报道:

“在到过满洲的复员军人中发现,他们感染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东京宪兵局的调查表明,不久前从满洲回来的十五名士兵已成为布尔什维克。这些士兵现在未被逮捕,因为他们在满洲对匪徒作战有功。”

而且,旅顺口又重新变成海军要塞。对所有住在满洲国的应征年龄的日本人加强了军事训练。例如,1933年12月18日,在大连举行了三千名大学生和青年团体成员的检阅,从刊登在报上的相片来看,这些人和军事部队没有什么区别。天皇的侍卫长石

田上校专程来大连进行检阅。

反苏战争的思想准备工作

1934年春,日本的军事领导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在自己公开的反苏发言中变得稍为谨慎一些。象荒木说过的这种言论:必须立即确立“皇道”,即日本天皇对整个亚洲的统治权,我们还没有听到林说过。日本驻美国的新任大使甚至说,日本“极不愿”同苏联作战,因为这种战争对日本来说会是“丧失理智、死亡”。斋藤声明:“对俄国作战还意味着对其它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作战,而我们完全不想自杀。”¹日本驻法大使佐藤、驻奥地利大使以及外务大臣广田本人等也都作了慰藉人心的发言。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者真正觉悟了,那当然不错。但是这种发言的实际价值,只能根据历史事实来判断。

“在欧洲流行一些传说,认为日本在进行战争准备、认为日本存在着普遍的战争狂热,这使日本人感到很惊奇。这些传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绝对没有进行任何的专门准备,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激昂情绪,日本象平常一样做好准备,但非常平静,因此局势不会引起任何惊慌。”³⁹²

这个迷惑人心的报道是三十年以前登在中国的英文报纸《京津时报》上的。在它发表后的整整三个月,日本舰队便在旅顺口进攻俄国舰队,从而开始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狂热地进行武装进犯苏联的准备活动时,应该怎么样看待日本这些半官方和官方的“慰藉人心”的声明呢?

只能把它们看作是企图遮人耳目,以便在这些声明的掩护下,进行日本人所惯用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

1 刊登在1934年2月10日《满洲日报》上的路透社电讯稿。

当然,甚至在日本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不少人不想同苏联打仗,他们认为这个战争特别危险,是不必要的冒险。还在1933年10月,《福冈日日》就报道过:“苏联不想在远东作战。日本也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进行反苏战争。”

这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日本资产阶级的意见,而且他们力图坚持这个意见,使它在日本对外政策中实现。荒木的辞职以及占领军参谋长小矶的被召回,都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一情况有关。但是必须指出,好战的反苏集团活动得更加起劲了,他们随机应变,有时后退一步,以便以后能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跳跃,顽固地继续推行自己的路线。

想充当日本法西斯领袖的松冈,在日内瓦坦率地宣称:“日本应该在从苏联方面来的潜在威胁成为完全的现实以前就进攻苏联”;日本军人吹嘘说:“我们很快将在乌拉尔建立前线哨所,将在黄河饮马”;日本驻北京武官的讲演(这位武官设法说服中国人在即将开始的日俄战争中站在日本人方面或至少保持中立)¹;关于必须把蒙古人和朝鲜人从“苏联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声明;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威胁”日本的说法;关于甚至必须在苏联土耳其斯坦确立“皇道”的说法;关于“我们是神的子孙,我们应该统治世界”²的口号——这些就是它们进行野心勃勃的反苏战争宣传的内容。

例如,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半官方刊物《日本时报》上发表的下列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军事专家的意见,日俄战争只有一种结局:日本人将作为十足的主人,它在西伯利亚直到把俄国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分隔开来的山脉为止的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³

1 《日本广告报》,1933年11月11日。

2 《日本时报》,1933年12月12日。

3 《日本时报》,1933年10月30日。

在另一个半官方刊物的社论中，要求确定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的边境，社论说，还在旧政府时期奉天所制作的地图上，在结雅河和阿穆尔河之间（左边是苏联阿穆尔河河岸）“明确指出了是满洲领土的一部分”¹，这种声明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个半官方刊物的另一期上，这种无耻的谎言——“在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发生的反苏运动，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政府，这个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的基地是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²——追求什么目的呢？

它们的任务是煽动军阀、在居民中挑起沙文主义感情。它们说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愿望：掠夺布列亚的煤和阿尔丹的黄金、库兹涅茨克建筑土地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西伯利亚的粮食和木材——苏联亚洲部分的一切巨大财富。它们意味着想要奴役广大苏联地区的居民，就象奴役朝鲜和满洲的人民那样。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比他们所说的更清楚地证明了他们最近的计划。在满洲进行狂热的大战准备以及在日本本土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使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意图不容置疑。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极力设法保障我国能免除意外的事件，并准备着保卫我国去打退外来的侵犯”³。

我们党在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采取了十分重要的措施。

“近两年来中央委员会，首先是斯大林同志，不断加强并且现在也正在加强远东的建设……在最重要的地区我们修建了壁垒，敌人要想通过这些壁垒跨进我们苏联的领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⁴

1 《满洲日报》，1934年3月19日。

2 《满洲日报》，1934年7月5日。

3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5页。

4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第235页。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者的某些报道是这些话的最好例证。

1933 年日本杂志《改造》在讨论可能发生的俄日战争的波折时，平田信作特别提到红军骑兵，他指出：“至于谈到红军骑兵的战斗质量，那么笠原上校证实了它的优越性，笠原说，红军骑兵比沙皇时代的俄国骑兵要强得多”。就是这个日本军事评论家于1934年初在另一杂志《中央公论》上写道：“苏联特别远东军的组织和部署，足以对敌人进行闪电般的打击。毫无疑问，红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将闪电般地行动……”³⁹⁴

半官方刊物《日本时报》(1934 年 3 月 10 日)刊登了苏联准备保卫远东的通讯报道，这篇报道最后说：“俄国人显然不想同日本或任何人开战，但他们有充分的准备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领土。”

我们的红军是真正强大的——这一点现在就连它的敌人也不怀疑。而“我们的敌人却幻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一些东西，这只能是非常愚蠢、极端无知和注定要失败”。¹

在拥有斯大林同志这样伟大舵手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其有经验的军事助手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和整个苏维埃国家将给一切胆敢侵犯我国的人以致命的回击，“使得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们苏维埃的菜园子里来”。(斯大林)

1 摘自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第 233 页。

人名索引

Абаза 阿巴扎 海军少将—64, 66, 91, 95, 96*

Абаза А. А. 阿巴扎 官僚地主—65

Абенд Гелет 盖列特·阿宾德 记者—302, 309, 346

Адачи 安达谦藏 政治活动家—344

Адрианов 安德里昂诺夫 工程师—31

Акино 秋野—282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65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65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大大公爵—63, 64, 65

Алексеев 阿列克谢耶夫 总督—53, 65, 88, 90, 92, 94, 95

Алексеев 阿列克谢耶夫 工程师—185, 187, 190

Альберт 阿利别尔特 官吏—65

Альфтан 阿尔弗坦 中校—62

Апраксин 阿卜拉克辛 伯爵—74

Араки 荒木—370, 389, 391, 392

Арнольд Джулиан 朱里安·阿诺德 商务参赞—299

Ашташев 阿斯达舍夫 贵族企业家—74

Байков 巴伊科夫 使臣—10

Балашов 巴拉绍夫 三等文官—64, 66, 76, 88, 92, 118

Баллантин 巴兰廷—15, 82

Баллод 巴洛德 教授—24

Барк 巴尔克 大臣—165, 166

Бартольд 巴尔托利德 教授—9

Бахметьев 巴赫麦季耶夫 大使—112, 113

Баш 巴什—41, 42

Безобразов 别卓布拉佐夫—62, 64, 65, 87, 88

Белли 别利—273

Бенкендорф 柏克多尔夫 大使—125, 157

Берисдорф 柏里斯多尔夫 大使—116

Бетман-Гольвег 贝特曼·霍尔凡格 德国宰相—115, 116, 117, 118

Богданов 波格丹诺夫 教授—133

Боголюбов 鲍戈留鲍夫 苏联公民—306

Бодиско 鲍季斯科 上尉—88

Болдырев 鲍尔迪列夫 将军—185

Болотин 鲍罗廷—154

Брайан 伯赖安 国务卿—177, 178

Бриан 白里安—254, 325

Бринер 布林涅尔 资本家—62, 63

Бристоль 布里斯托里 海军上将—342

Буранже А. 艾·布朗热 经济学家—315

Буштедт 布史特德 记者—124

Бэшфорд 柏斯福德 主教—153

Бюлов 比洛夫—53

Вакацуки 若槻 首相—316, 317

Валерин 瓦列林—237

Ванаг 瓦纳戈—23, 24

Ван Ли 万历 中国皇帝—9

Ван Фу-лин 万福麟 奉系军阀—

* 破折号后为原书页码,本书以边口页码标示。

248, 325, 327
 Ван Чжен-тин 王正廷 部长—225
 Вашио 鹭尾 记者—384
 Вёбер 维别尔 俄驻朝代办—18
 Верстраат 维尔斯特拉特 法驻俄参赞—22
 Виленкин 维连京 财政参赞—105, 113, 114
 Вильгельм 威廉 皇帝—65, 67, 94, 115, 116, 118
 Вильсон 威尔逊 总统—186
 Вильдгрубе 维德格鲁柏 苏联公民—238
 Витте 维特—25, 30, 34, 35, 36, 48, 50, 51, 56, 60, 62, 63, 65, 69, 70,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6, 91, 92, 93, 317
 Вишневский 维什涅夫斯基 白卫将军—389
 Вогак 沃加克 将军—61
 Вонлярлярский 旺利亚利亚尔斯基 地主商人—64, 65, 66
 Воронцов 沃隆佐夫 伯爵—64, 65, 66, 67
 Воронцов 沃隆佐夫 租让权者—145
 Ворошилов 伏罗希洛夫—349, 393, 394
 Гарриман 哈里曼 资本家—41, 104, 105, 119, 121, 298
 Гацфельд 哈茨非尔德 德国大使—26, 59
 Гаяси 林 大使—47, 61
 Гаяши 林 总领事—296, 321
 Гендриков 根德里科夫 伯爵—66
 Георг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米哈伊洛维奇·格奥尔基 大公爵—163
 Гинцбург 庚茨堡 男爵—63, 88, 89
 Гиппиус 基比乌斯—30, 42, 44, 56, 58, 81

Гирс 吉尔斯 大使—53, 57, 80
 Гирс 吉尔斯 中尉—93
 Гиршман 吉尔斯曼 工程师—55
 Гитлер 希特勒—341
 Гойер 郭伊尔 财政专员—128, 172
 Головачев 戈洛瓦切夫 教授, 白匪—389
 Головин 戈洛文 大使—10
 Го Сун-лин 郭松龄 将军—23, 262
 Гото 后藤 伯爵—123
 Гото 后藤 海军上将—371
 Граббе 格拉别 伯爵—63
 Граве 格拉维
 Гревс 格雷夫斯 将军—191, 389
 Грей 格雷 大臣—175
 Гриль 格里尔—89
 Гримм 格里姆 教授—26, 31, 32, 111, 125, 126, 137, 168, 174
 Грин 格林—324
 Гродеков 格罗杰科夫 将军—86
 Гувер 胡佛 总统—254
 Гей 海伊 国务卿—46, 58, 71, 97
 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105
 Дементьев 杰缅捷夫—103
 Демчинский 杰姆钦斯基—49, 50, 64, 72, 107
 Дени 德尼—40
 Деникин 邓尼金 将军—185, 187, 100, 191
 Деннет 邓尼特 历史学家—39, 41, 44, 47, 71, 72, 78, 94, 97, 104, 119
 Дессино 杰西诺 将军—95
 Джильтберт 吉尔白 美国代表—325
 Джордан 佐丹 公使—139
 Дитерихс 季杰里赫斯 白匪—304, 305
 Дуань Цзи-жуй 段祺瑞 将军—207
 Дубровский 杜勃罗夫斯基—91
 Дын Чао 丁超 奉天将军—326

Дюомолар 杜莫拉尔 教授—15, 16, 82, 90

Енсишан 阎锡山—241, 289

Ерманский 叶尔曼斯基—24

Есиков 叶西科夫—238

Жербильон 张诚 耶稣会教士—10

Жуйван 睿王 满洲亲王—8

Звегинцев 兹维根采夫—63

Зиберт 齐伯特 历史学家—139

Зыков 兹科夫 白匪—307

Иванов 伊凡诺夫 中东铁路督办—233, 234

Иванов 伊凡诺夫 苏联公民—242

Ивин 伊文—221, 222, 224

Игнатъев 伊格纳提耶夫 大使—13

Извольский 伊兹沃尔斯基 外交大臣—57, 61, 81, 101, 111, 112, 117, 118, 123, 124, 135, 173

Инокуни 井口 领事馆秘书—322

Иноуэ Тадаширо 井上忠庆 政治活动家—375

Иноуэ 井上 上校—378

Инуяи 犬养 首相—317

Иосизава 吉泽—283, 325

Иосида 吉田 将军—373

Иоффе 越飞—223, 224

Исида 石田 军官—391

Ито 伊藤—61, 122, 123

Ишан 奕山 将军—12

Ишии 石井 外务相—163, 167, 176, 180, 210, 212, 279

Ишикава 石川 上校—383

Кавакина 川北 上校—381

Казакеми 河上 记者—176, 182, 188, 196, 198, 215, 347

Кавамото 河本 中尉—324

Каивара 贝原 银行家—213, 216

Калмыков 卡尔梅科夫 白匪—191

Калнин 卡尔宁 苏联公民—242

Канайя 金矢 将军—324

Канин 闲院 亲王—169

Као-Ши-и 高纪毅 北宁铁路—297

Карахан 加拉罕—221, 224, 226, 234

Касахара 笠原—393

Каспэ 卡斯伯 钢琴家—388

Кассини 卡西英 大使—58, 71

Като, Томасабуро 加藤友三郎 首相—310

Катцура 桂太郎 首相—105, 139

Келлог 凯洛格 御前大臣—279, 339

Кельин, И 克尔英 历史学家—28

Кербедзь 克尔别兹 中东铁路副理事长—48

Керенский 克伦斯基—107, 186, 225, 232

Кикучи 菊地 军事顾问—206

Кимберлей 金贝尔莱 勋爵—26

Кимура 木村 南满铁路外事课—296, 297

Киржиц 基尔日茨—198

Киселев 基谢列夫 苏联公民—242

Клемансо 克雷孟梭—184

Кобеяси 小林 海军上将—328, 329

Кобеко 科别科—24

Козаков 科扎科夫 外交部官员—163, 164

Козловский 科兹洛夫斯基—66

Койсо 小矶 将军—362, 365, 367, 371, 377, 392

Коковцев 科科夫采夫 大臣—114, 122, 123

Колхун 科鸿 公使—134

Конгер 康格尔 公使—104

Коновалов 科诺瓦洛夫—242

Конрад 康拉德 教授—26

Конфуций 孔夫子—308
 Коростовец 科罗斯托维茨 公使—133, 146
 Корф 科尔夫 男爵—63
 Косолапов 科索拉波夫 苏联公民—258
 Кристи 克里斯基—66
 Крупенский 克鲁平斯基 大使—167
 Крейг 克雷格 资本家—83
 Крейн 克雷英 公使—185
 Ку Веллингтон 顾维钧—234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苏联代表—227
 Курбан Гали 加里·库尔班 白匪—389
 Курино 库里诺 公使—96
 Куропаткин 库罗巴特金 将军—62, 64, 71, 83, 90, 91, 92, 95
 Куросаки 黑崎 将军—376
 Кусумото 楠本 军官—318
 Кэтлер 克特尔—53

 Лабунский 拉邦斯基 租让权者—145
 Лаваль 赖伐尔 总理—340
 Ламздорф 拉姆兹多尔夫 外交大臣—36, 56, 58, 78, 80, 89, 90, 91, 95, 96
 Ламонт 拉蒙特 银行家—211-213, 216, 284
 Лансинг 蓝辛 国务卿—176-180, 210-212, 215, 279, 298
 Лежандр 利然德 记者—346, 347
 Ленин 列宁—14, 21, 22, 24, 26, 27, 34, 51, 52, 59, 63, 68, 79, 91, 98, 99, 100, 135, 147, 150, 152, 168, 169, 174, 175, 180, 183, 187, 190, 192, 212, 238, 317, 318, 330, 333, 334, 338, 345, 346
 Лигтон 李顿 勋爵—324
 Ли Хун-чан 李鸿章 国务活动家—30, 31, 32, 52, 53, 55, 56, 57, 60, 112

Ли Цзы-чен 李自成 农民起义领袖—7, 8
 Лобанов 洛班诺夫 大臣—30, 112
 Лобанов 洛班诺夫 苏联公民—242
 Лоу 洛乌 美国公使—39
 Лэнсдоун 兰斯多恩 大臣—56, 57, 58, 59
 Люба 柳巴 领事—106, 126, 127, 128
 Люис, Р. 罗·路易斯 美国参赞—312
 Лю Чже 刘哲—246
 Лян Ши-и 梁士诒—218
 Лященко 梁兴柯—23

 Ма, Даотай 马道台—172, 275
 Мадритов 马德里托夫 中校—76
 Майский 马伊斯基—183, 186
 Мак Муррей 马克·穆拉 美国公使, 文件汇编编者—20, 21, 53, 74, 110, 115, 117, 119, 120, 121, 126, 150, 151, 157-161, 170, 172, 175, 179, 182, 183, 184, 193, 196, 200, 204, 205, 208, 209, 217
 Малевич-Малевский 马列维奇-马列夫斯基 公使—117, 123, 124, 125, 138, 149
 Мантель 曼特尔 财政顾问—253, 254
 Мария Федоровна 玛丽亚·菲多罗芙娜—65
 Мартель 马特尔 公使—254
 Мартынов 马尔蒂诺夫 将军—139, 142
 Мартынов Н. 马尔蒂诺夫 白匪—388
 Матюнин 马秋宁—40, 63, 64, 65, 88, 89, 96
 Мацуока 松冈 政治活动家—254, 392

Мацусига 松下 海军上将—341
 Ма Чжан-шань 马占山 奉系将军—325, 386
 Меттериш 米切尔里赫—117
 Мещерский 米谢尔斯基 领事—141
 Мейдзи 明治—14, 20
 Миллард томас 米拉尔德·托马斯—215
 Миллер 米列尔—124
 Мильнер 密勒尔 勋爵—184
 Мины, династия (1368—1644) 明朝—79
 Минобэ 美浓部—29
 Ми Чуан-Чен 米权庆—321
 Мицубися 三菱 百万富翁—210, 316, 373, 376
 Мицуи 三井 百万富翁—316, 373, 376, 380
 Мо Де-гуй 莫德惠 中国代表—246, 303
 Моноканов 莫诺康诺夫 白匪—250
 Морз К. Э. 莫尔斯 历史学家—9, 18, 39, 40
 Морз Джемс 摩兹·杰姆斯—40
 Мотоно 本野 大使, 外务大臣—110, 111, 123-125, 137, 138, 164, 179
 Мундов 蒙多夫—9
 Муравьев 穆拉维约夫 总督—12, 13
 Муравьев 穆拉维约夫 外务大臣—35
 Муто 武藤 将军—389

 Нагаи 永进 大臣—368
 Накада Юкио 中田有久 工会主席—382
 Накамура 中村 大尉—322, 323
 Накано Сейго 中野正刚 法西斯分子—341, 345
 Невельской 涅维尔斯科伊

Неклюдов 涅克留道夫—125
 Непорожнев 涅波罗日涅夫 官吏—40, 63
 Нечаев 涅恰耶夫 白匪—231, 389
 Никифор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10
 Николай II 尼古拉二世—23, 27, 29, 33, 57, 62, 64, 69, 70, 71, 78, 87, 89, 92, 95, 96, 110, 112, 118, 123, 167
 Нисси 西(德二郎)—29
 Ни Сы-чун 倪嗣冲—202
 Нокс 诺克斯 将军—189
 Нокс 诺克斯 国务卿—115, 119
 Нортон 诺顿—192
 Ностиц 诺斯基茨—66
 Нурхаци 努尔哈赤 满洲王公—6

 Обата 小幡 公使—320
 Оболенская 奥鲍林斯卡雅 公爵夫人—74
 Огава 小川—103
 Огинский 奥金斯基 百万富翁—64
 Одагири 小田切 银行家—211, 212
 Озарнин 奥查尔宁—197
 Окума 大隈 伯爵—123
 Окура 大仓 百万富翁—159, 160, 372, 376
 Орлов-Давыдов 奥尔洛夫-达维多夫 伯爵—66
 Орлов 奥尔洛夫 白匪—231
 Орчард 奥察德 经济学家—288
 Остроумов 奥斯特罗乌莫夫 白匪—219
 Охаси 大桥 领事—320

 Павлович 巴夫洛维奇—8, 77, 103, 145, 184, 196
 Павлов 巴夫洛夫 驻华代办—36, 95
 Павлов-Петров 巴夫洛夫-彼得罗夫 无政府主义者—171, 172

Палицын 巴里岑 将军—189
 Пальмер 巴里麦尔 少校,企业家—135
 Паулинг 鲍威林 公司—113, 115
 Пайкес 巴伊克斯 苏联代表—223
 Перейра 徐日升 耶稣会教士—10
 Перри 伯里 海军上将—38, 39
 Петлин 彼特林 使臣—9
 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9
 Пешков 彼什科夫 白匪—307
 Пиль, Вильям 威廉·皮尔 总督—341
 Пилсудский, Иосиф 约瑟夫·毕尔苏茨基—100
 Плансон 普兰松 总领事—76, 80
 Плеве 普列维—90
 Погребенский 波格列别茨基—15, 82
 Покровский 波克罗夫斯基—23, 24, 25, 26, 50, 54, 64, 85, 94
 Поярков,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波雅尔科夫—9
 Половцева-Штиглиц 波洛夫采娃·斯基格里茨—24
 Подгорский 波德哥尔斯基 苏联公民—242
 Позднеев 波兹涅耶夫—60, 83
 Покотиллов 波科基洛夫 财政委员, 大使—54, 55, 56, 84, 105, 111, 127
 Полюнов 波雷诺夫—133
 Попов 波波夫—127
 Поппе 波别—127, 141
 Пу-И 溥仪 清帝后代—203, 328, 376
 Пурталес 普尔塔列斯 大使—117, 118
 Рейнш 莱因什 公使—103, 206, 215, 217, 298
 Реунов 列乌诺夫 海军少将—36
 Ри Бронсон 里·布朗逊 记者—

300, 301, 309, 346, 347
 Рихтгофен 里赫特戈芬—62
 Родзянко 罗江科—66
 Рожков 罗日科夫 历史学家—23
 Розен 罗申 大使—29, 33, 70, 90, 91, 92, 94, 95, 108
 Рокхилл 罗克希尔 大使—117
 Романовы 罗曼诺夫 皇族—63, 64, 65, 66
 Романов Б. А. 罗曼诺夫—25, 32, 41, 42, 53, 56, 59, 60, 66, 69, 74, 78, 81, 83, 84, 104, 105, 108, 114
 Рудаков 鲁达科夫—79
 Рузвельт 罗斯福 总统—97, 100, 101, 118, 119, 339
 Рут Элиу 鲁特·艾里乌—186
 Рут 罗特 国务卿—118, 119
 Рыбников 雷勃尼科夫—12
 Рябушинский 梁布申斯基
 Саврасов 萨弗拉索夫 苏联公民—242
 Савченко 萨夫钦科 苏联公民—242
 Сазонов 萨佐诺夫 大臣—135, 137, 138, 162, 166, 167, 173
 Сайондзи 西园寺 元老—316
 Саито 斋藤 大使—391
 Самойленко 萨莫伊连科 苏联公民—242
 Сато Избукатсу 佐藤信胜 法西斯分子—309
 Сато 佐藤 将军—335
 Сато 佐藤 大使—391
 Сатоу 沙陀—56
 Сахаров 萨哈罗夫 将军—50, 95
 Свайнхарт 斯瓦因哈尔特 美国顾问—244
 Свиягин 斯维亚金 工程师—31
 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 白匪—185, 195, 199, 389

Серебряков 谢列勃利亚科夫—66
 Сесиль 谢西尔 勋爵—184
 Симонага К. 下中显治 少佐—337
 Симпсон Ленокс 辛普森·伦诺克斯 记者 247
 Синда 新田 子爵—346
 Си-ся 熙洽 奉天将军—326
 Скалов 斯卡洛夫—251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斯卡里科夫斯基—11
 Сквирский 斯克维尔斯基—86
 Скидельский 斯基杰尔斯基 资本家—172
 Скотт 斯各脱—58
 Скрыдлов 斯克雷特洛夫 海军上将—57
 Смит 斯密特—108, 118
 Спафари 斯帕法里 使臣—10
 Спицын 斯毕程—195
 Спринг Райс 斯普林·瑞斯—97
 Спренэ К. 斯普列纳 奸细—321, 322
 Стааль 斯达尔 大使—45
 Сталин 斯大林—66, 69, 256, 290, 291, 308, 309, 329, 330, 348, 393, 394
 Старк 斯塔尔克 海军上将—93
 Степаненко 斯捷潘年科 苏联公民—238
 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10
 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 将军—185, 190
 Стивенс Джон 约翰·史蒂文斯 工程师—186, 189, 190, 195, 197, 219, 220, 254
 Стимсон 史汀生 国务卿—253, 255, 339
 Страховский 斯特拉霍夫斯基—184
 Стрэйт 斯特雷特 领事—121, 135
 Субботич 苏波基奇 将军—50
 Сузуки 铃木 将军—367, 375
 Сун Лай 宋来 中国军官—387

Сун Чуан-фан 孙传芳—237
 Сун Ят-сен 孙中山—224
 Сурин 苏林—144, 275
 Су Цин-ван 肃亲王—202, 203
 Сыромятников 瑟罗米亚特尼科夫—63
 Такахаси 高桥 大臣—316
 Такахира 高平—118, 119
 Тамон 多门 将军—325
 Танака 田中 将军, 首相—238, 246, 249, 279, 284, 285, 289, 316, 327, 328, 337, 349
 Танин 塔宁—184
 Танига 谷田 将军—359
 Тан Юй-лин 汤玉麟 奉天军阀—327
 Тарасович 塔拉索维奇—234
 Тардые 塔尔季耶 首相—340
 Тафт 塔夫特 总统—115, 118, 119
 Терауци 寺内 总督—163, 204, 205
 Терентьев 捷连季耶夫—224
 Траутшольд 特拉乌特沙尔德 领事—135, 141, 169, 170, 172
 Троицкий 托洛茨基 贵族—74
 Тэйер 泰伊尔—97
 Тюменец 丘麦涅茨—9
 Уайт 华爱特—97
 Унтербергер 翁捷尔别尔格尔 总督—124
 Уолл 华尔 投机企业者—83
 Уолш 华尔士 参议员—342
 Уошберн 沃什伯恩 资本家—41
 Уорд 瓦尔德 上校—184, 185, 187, 189, 191, 198
 У Пей-фу 吴佩孚—215, 223
 Урусов 乌鲁索夫 大使—126
 У Сань-гуй 吴三桂 军事长官—8
 Усиди 牛地 商人—183

Утай 乌达伊 蒙古王公—127
 У Цзынь 武进—245
 У Цзюнь-шэн 吴俊升—205, 246
 У Цида 内田 大臣—316
 Ушаков 乌沙科夫 苏联公民—242
 Уэнода Сецуо 上野田—387
 Фе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 俄国东方学
 会主席—28, 76, 77, 82, 84
 Фе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 白匪—306
 Флоранс Шерель 弗劳朗斯·谢列里
 Фош 福煦—184
 Франк 弗兰克 租让权承租者—131
 Франке 弗朗克
 Франц-Иосиф 弗兰茨-约瑟夫 皇帝
 —171
 Фредерикс 弗列杰里克斯 宫廷内务
 大臣—65
 Фын Юй-сян 冯玉祥—262, 287
 Хабаров Ерофей 叶罗菲·哈巴罗
 夫—9, 10
 Хамамура 滨村 编辑—347
 Хара 原 首相—138, 152, 316
 Хасигава 梧川 将军—360
 Хахасов 哈哈索夫 苏联公民—306
 Хаяси 林 陆军大臣—370, 391
 Хвостов 赫沃斯托夫—9, 83
 Хидэйоси 秀吉 日本军事长官—14
 Хиллиер 希里尔—104
 Хирата 平田 记者—336, 393
 Хирота 广田 大臣—341, 391
 Хишикари 菱刈 将军—389
 Хмелев 赫麦列夫 苏联公民—242
 Ходоров 霍多罗夫—196
 Хомма 本间 日本官员—358
 Хондзио 本庄 将军—327
 Хорват 霍尔瓦特 将军、中东铁路督
 办—128, 173, 185, 191, 195, 199, 225,
 232

Хоут 霍维特—55
 Хун 洪—346
 Хэнт 汉特 企业家—41, 63, 65
 Цао Лян-ен 曹良恩 记者—75, 307,
 309
 Цао Юнь-шен 蔡运升 外交交涉员
 —259, 304
 Цин 庆亲王—56, 72
 Цины (Дайцины) (1644—1911年)
 清朝—6, 8, 13, 20, 202, 203, 207
 Цитович 齐托维奇—9
 Чан Кай-ши 蒋介石—237, 239, 241,
 251, 288, 312, 329
 Чан Хай-пын 张海鹏 奉天将军—
 325
 Чжан Си-лань 张锡鸾—202
 Чжан Сюнь 张勋—202, 203
 Чжан Сы-лин 张斯廩 将军—222
 Чжан Тин-го 张廷国 资本家—291
 Чжан Сюэ-лян 张学良—247, 249,
 251, 252, 286, 288, 296, 297, 305, 313,
 314, 315, 321, 324, 327, 357
 Чжан Цзо-лин 张作霖—93, 194,
 195, 203, 205, 207, 218, 226, 227, 230,
 234, 236, 239, 241, 250, 261, 262, 271,
 282, 285, 289
 Чжан Цзо-сян 张作相 督军—206,
 247, 321, 327
 Чжан Цзун-чан 张宗昌—231, 238
 Чжао Эр-сюнь 赵尔巽 总督—136
 Чжу Цин-лань 朱庆澜 督军—148,
 170
 Чингис-хан 成吉思汗—354
 Чу Гуан-му 朱光沐—327
 Чу Лян 诸良—327
 Шанявский 沙尼亚夫斯基 将军—
 74

Шао Чжао-чжун 邵昭忠—202
Шварценштейн 史瓦尔程斯登—117
Шен 申—116
Шидехара 币原 大臣—216, 217, 316, 317
Шипов 希波夫—65, 88
Шифф Яков 雅科夫·申夫 银行家—105, 106, 114, 119, 298
Шпеер 什佩叶尔 驻朝代办—18
Штейн 斯坦恩—40, 62, 65
Шульц 苏尔茨 士兵—171
Шурман 苏尔曼 公使—220, 226

Щепкин 石金—133
Щепин 谢平—273
Щербатов 谢尔巴托夫—65

Эгучи 江口 南满铁路副总裁—316
Эдвард Р. 爱德华尔德 银行活动家—314
Эккардштейн 艾卡尔德斯坦 德国大使—47
Эйд Поль 保尔·艾德—176

Юань Чен 袁成 团长—323
Юань Ши-кай 袁世凯—60, 148, 150, 151, 152, 153, 160, 174, 200, 202, 285
Юденич 尤登尼奇—63, 191
Юз 尤兹—216, 217, 218
Юй Сы-син 于驷兴 道台—129, 130
Юй Цзай-цзян 余才江 要塞司令—242
Юнг, Вальтер 瓦特·扬 历史学家—115, 135, 151, 173, 193, 225, 226, 254, 261
Ю Куо-хан 于国翰—245
Юсупов 尤苏波夫 公爵—66

Ялышев 亚雷舍夫—9
Ямагата 山县—29
Ямамото 山本—248, 249
Ян Чен 杨诚—327
Ян Юй-тин 杨宇霆 张作霖的参谋长—248, 284, 285

地名、名词索引

Абагатуевский караул 阿巴加图耶夫斯基哨所—12
Авиация 航空—360, 362
Австралия 澳大利亚—389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391
Австро-Венгрия 奥匈帝国—43, 126, 130, 132
Азия 亚洲—24, 25, 28, 31, 104, 136, 179, 327, 391
Айгун 瑷珲—353
Айгу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俄中瑷珲条约—12, 13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城堡—9, 10, 11
Алдан 阿尔丹河—9
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 亚历山大罗夫车站—353, 354
Алеутские острова 阿留申群岛—342
Алжезира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109
Алюминий 铝—373
Альбион 阿尔比昂(英国)—344
Аляска 阿拉斯加—342
Аматерасу Ми-ками 天照大神—318
Америкэн Харвестер К° 美国收割机公司—134
Амур 阿穆尔河—9, 10, 11, 12, 51, 130, 353, 354, 393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阿穆尔地区—12
Амур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阿穆尔省—200
Амурский бассейн 阿穆尔河流域—334
Англия 英国—33, 48, 66, 67, 147

——殖民侵略—18, 19, 22, 28, 34, 37, 38, 40, 134, 241
——国际关系—26, 29, 47, 52, 53, 57, 59, 61, 94, 97, 112, 116, 120, 130, 138, 139, 140, 164, 165, 167, 168, 169, 194, 211, 213, 214, 221, 230, 236, 237, 239, 245, 256, 302, 337, 340
——对外贸易—30, 43, 84, 292, 311
——英美矛盾—39, 214, 256, 290, 300, 337, 338, 339, 342, 343
——英日同盟—1, 85, 113, 156, 157, 189, 214, 216, 338
——同俄国关系—81, 90, 93, 98, 132
——在满洲资本—84, 113, 115, 126, 148, 156, 315
——反苏干涉—183, 185
——同苏联关系—228, 250, 258, 337
Антант 协约国—109, 132
Аньгоцзюнь 安国军—237, 238
Аньдун 安市—85, 158, 324, 357
Аньдунская (Ялуцзянская)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 安东(鸭绿江)林业公司—161
Аньту 安图县—387
Аньфуисты 安福系—207, 208, 209, 210, 221—223
Аньшан 鞍山市—371, 374, 375
Аньшанские железодельные заводы 鞍山制铁所—266, 371, 372
Аньшанские железные рудники 鞍山铁矿—159, 160, 161
Аргунь 额尔古纳河—9, 11, 172
Архи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фонд МИД 革命和对外政策档案, 外交部最重要部分档案

№ 80—96
 № 86—57
 № 96—22, 25
 № 111—36
 № 113—36, 37
 № 133—40, 108
 № 134—40, 65
 № 135—65, 76, 88, 101, 118
 № 188—71, 85, 88
 № 189—95
 № 191—95
 № 200—29, 78, 80, 86
 № 201—94
 № 202—106, 110, 111, 112
 № 203—112, 127
 № 204—113
 № 206—70, 110, 114, 119, 123, 124,
 149, 189
 № 207—133, 138
 № 208—125
 № 209—124
 № 210—106, 127
 № 211—137, 138
 № 212—78, 80, 96, 111, 127
 № 213—127, 130, 157,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 215—137, 140
 № 216—202
 № 217—135, 140
 № 218—151, 152, 170, 171
 № 219—170, 171, 172
 № 220—171, 172
 № 244—93, 161, 202—207, 274
 № 302—110
 № 810—36
 № 909—83
 № 917—146
 № 919—146
 № 1048—74
 № 3118—51, 56, 57, 80

Асано, Цементная К° 浅野水泥公
 司—374, 375
 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й океан 大西洋—105
 Ашихэ 阿什河城
 Аэродромы 飞机场—360

 Бадаогоуские копи 八道沟煤矿—
 372
 Байкал 贝加尔湖—336
 Балканы 巴尔干—26
 Балтийский Флот 波罗的海舰队—
 99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99,
 104, 341
 Банк 银行—82, 161, 206, 210, 213,
 214, 240, 244, 245, 255, 293, 314, 315,
 346
 Чосен банк 朝鲜银行—29, 161,
 171, 206, 208, 27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банк 俄华银行
 —31, 32, 46, 48, 60, 71, 72, 74, 75,
 83, 86, 100, 106, 145, 146
 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 俄亚银行
 —146, 172, 194, 199, 219, 220, 222,
 254
 Русско-корейский 俄朝银行—35,
 8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国立
 俄国银行—75
 Кун · Леб и К° 库恩 · 洛伯公司
 —104, 105, 115, 119, 120, 123, 213,
 298
 Морганн 摩根—115, 120, 123,
 213, 244, 284, 298
 Перв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第一国
 民银行—115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ити Банк 花旗
 银行—115, 213
 Северный 北方银行(俄国)—146
 Июкогама Сперши 横滨正金银

行—30, 148, 161, 203, 261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工业银行
 (日本)—208
 Тайван банк 台湾银行—208
 Эксчейдж банк 汇兑银行—208
 Гаранти Трест 保证信托公司—
 213
 Чейз Нейшенел 大通银行—213
 Ли Хиттинсон и К° 里·希金逊
 公司—213
 Континент энд Коммершел
 Трест 大陆商业信托公司—213
 Даль банк 远东银行—239, 277
 Банк Трех восточных провинции
 东三省官银号—240
 Кита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中
 国银行—240
 Банк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交通银
 行—240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банк 边业银行—
 240
 Гуан Синь Гунсы 广信公司—240
 Банк Японии 日本银行—332
 Гонконг-шанхайский 汇丰银行
 —315
 Бао-цзя 保甲, 连环保—386
 Белогвардейцы 白卫军—304, 305—
 307, 388—390
 Биньцзянское полицейское управ-
 ление 滨江公安局—306
 Бельгия 比利时—48
 Биньхихуская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К°
 и железорудная К° 本溪湖煤矿
 公司和铁矿公司—159, 160, 161, 208,
 285, 320, 372
 Бессарабия 比萨拉比亚—192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 (海
 兰泡)—11, 183, 306, 353, 354, 393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近东—12, 13, 25,
 26

“Бобр” “鲍勃尔”军舰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义和团起义
 —44, 48, 49, 50, 52, 53, 54, 55, 57, 58,
 73, 83, 85
 Боксерская контрибуция 庚子赔款
 —120, 148, 221, 224
 Боннины, острова 小笠原群岛—39
 Босфор 博斯普鲁斯海峡—92
 Бохай 渤海国 (从七世纪到十世纪)—
 5, 6
 “Бруклин” “勃鲁克林”装甲舰—188
 Бур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布连斯奇条约
 —11
 Бухара 布哈拉—6, 7
 Бухэду 博克图车站—195
 Бэйаньчжень 北安镇车站—353, 354
 Бэйпяоские копи 北票煤矿—372
 Бэйху (Цзиньбуху) 北湖 (镜泊湖)—
 293, 383
 Бюлов 贝洛夫—53

 Ванбаошань 万宝山屯—322
 Ванцин 汪清市—354, 387
 Варха 瓦尔哈 (通古斯族)—7
 Вашингтон 华盛顿—42, 44, 58, 77,
 218
 Вашингто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华
 盛顿会议—153, 154, 196, 220, 229,
 232, 260, 279, 285, 298, 301, 342, 346
 Вафангоу 瓦房沟—98
 Вафандян 瓦房店车站—373
 Вейхайвей 威海卫—21, 37
 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ена 长城—
 37, 56, 138
 Версальский договор 凡尔赛和约
 —207
 Вифлеемская стальная К° 威福列
 姆钢铁公司—122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
 崴)—24, 99, 124, 140, 166, 183—187,

192, 195, 277, 335, 350, 352, 392, 393
 Война 战争
 манчжур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满洲-中国
 战争—5, 8
 монголь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蒙古-中国
 战争—6
 московско-манчжурская 俄-满战
 争—10, 11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日中战争—12,
 13
 втор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 Англией и
 Францией 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
 —13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日-中战争—20,
 21, 2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俄-日战争—29,
 79, 85,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103, 119, 129, 145, 154,
 153, 298, 337, 391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ая 南北战争—39
 боксерская 义和团战争—50, 52,
 53—58, 69, 73, 80
 мировая 世界大战—68, 140, 141,
 143, 144, 147, 148, 149, 151, 156,
 163, 170, 173, 175, 177, 178, 180,
 181, 188, 274, 299
 угроза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
 ны 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291,
 301, 302, 308, 309, 334, 337, 353,
 391
 угроза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войны 反
 苏战争的威胁—300, 301, 302, 308,
 309, 334—342, 345—350, 370, 353
 —354, 358, 361, 362, 370, 371, 383,
 390, 393
 Военна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军事殖民—
 382-385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база 军事
 工业基地—371—379
 Волгарь “伏尔加里”，资产阶级报纸

—22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东亚—17, 38, 39,
 44, 65, 105, 181, 182, 189, 295, 298,
 299, 328, 329, 334, 342, 353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ое торгово-про-
 мышленн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东亚
 工商公司—62, 66, 67, 69, 70, 75, 76
 Воцзи 窝集, 通古斯族—7
 Вэйшахэ 苇沙河车站—321
 Гаагский Трибунал 海牙国际法庭
 —113
 Гавайи 夏威夷—39, 44, 85, 342
 Газеты—
 «Искра» «火星报»—26, 91
 «Гражданин» «公民报»—36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彼
 得堡公报»—36
 «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俄国新闻
 报»—77
 «Асахи» «朝日»—81
 «Дзи-Дзи» «时事»—81
 «Новый край» «新边疆»—84
 «Вперед» «前进»—98, 99
 «Нью-Йорк Таймс» «纽约时报»
 —108, 119, 301, 302
 «Таймс» «泰晤士报»—126
 «Новое время» «新时代»—133
 «Родной край» «祖国边疆»—133
 «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ь» «基辅思想»—
 133
 «Сибирская жизнь» «西伯利亚生
 活»—133
 «Уссурийская окраина» «乌苏里
 边区»—133
 «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 «交易所
 公报»—133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莫斯
 科公报»—133, 136
 «Приамурье» «阿穆尔沿岸»—133

«Берлинер Тагеблатт» «柏林日报»—133
 «Утро России» «俄罗斯之晨»—134, 136
 «Пекин энд Тяньцзин Таймс» «京津时报»—134, 287, 297, 310, 313, 320, 321, 324, 367, 391
 «Речь» «言论报»—135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俄国之声»—136
 «Известия ЦИК» «苏共中央执委会通报»—185, 251, 254, 307
 «Шенцзиншибао» «盛京时报»—204, 315, 362
 «Манчжурия Дейли Ньюс» «满洲日报»—161, 204, 205, 347, 356, 358, 362, 366, 367, 368, 369, 371, 373, 375—377, 381, 384, 389, 391, 393
 «Геральд Трибюн» «先驱论坛报»—237
 «Молва» «群众之声»—250
 «Герольд Харбина» «哈尔滨先驱报»—254, 322
 «Обсервер» «观察家»—255
 «Мансю Ници-Ници Симбун» «满洲日日新闻»—272
 «Осака Майници» «大阪毎日»—273, 315, 362, 367—371, 373, 383
 «Токио Асахи» «东京朝日»—289, 324
 «Цюгай Сиогио» «中外商业»—297
 «Правда» «真理报»—306
 «Норс Чайна Стар» «华北明星报»—307
 «Дабэйсиньбао» «大北新报»—313, 383, 387
 «Гунбао» «公报»—314, 315, 364, 389

«Синминванбао» «新民晚报»—321
 «Эко де Пари» «巴黎回声报»—326
 «Сентрал Чайна Пост» «华中邮报»—335
 «Датунбао» «大同报»—351
 «Джапан Таймс» «日本时报»—353, 369, 370, 374, 392, 393
 «Харбин Симбун» «哈尔滨新闻»—353
 «Мансю Ниппо» «满洲日报»—354, 358, 259, 360, 362, 369, 384
 «Манчестер Гардиэн» «曼彻斯特卫报»—355
 «Гиринжибао» «吉林日报»—357
 «Синцзу Ниппо» «新通日报»—362
 «Осака Асахи» «大阪朝日»—369, 370
 «Джапан Адвертайзер» «日本广告报»—374, 387, 392
 «Дагунбао» «大公报»—374
 «Дайрен Симбун» «大连新闻»—376, 381, 382, 383, 384, 391
 «Синьцзинжибао» «新京日报»—383
 «Хотен Майници» «奉天毎日»—384
 «Харбин Ници-Ници» «哈尔滨日日»—381, 385, 387
 «Бинцзяншибао» «滨江时报»—384
 «Енбинченбао» «延边时报»—387
 «Манмо Ирбо» «满蒙日报»—387
 «Харбинское время» «哈尔滨时代»—388
 «Хейсино Томо» «兵士之友»—390
 «Фукуока Ници-Ници» «福岡日

Гамильтон порт 汉密尔顿港—18
 Ганчжур 甘珠尔庙—158
 Ганьсу 甘肃省—301, 329, 334, 389
 Ганьяоские копи 红窑煤矿—162
 Гензан порт 元山—17
 Генро 元老院—122, 316, 318
 Германия 德国—
 —国际关系—21, 22, 26, 38, 45, 47,
 52, 53, 59, 97, 100, 115, 116, 120, 124,
 125, 130, 132, 140, 163, 164, 168, 170,
 187, 188, 256, 290, 292, 299, 340, 341
 —资本主义的发展—24, 67, 147
 —对中国的扩张政策—34, 37, 43,
 134, 311, 315, 334
 Гирин 吉林市—41, 42, 48, 50, 84,
 106, 111, 146, 158, 325, 374, 375, 383
 Гири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吉林省—
 85, 131, 208, 263, 272, 305, 383
 Гогулы 戈古尔人—10
 Гогулы 戈古尔人, 满族—8
 Голландия 荷兰—43
 Голландская Индия 荷属印度—336
 Гоминдан 国民党—237, 239, 245
 Гонконг 香港—30, 37, 84, 138, 155,
 311, 339, 341
 Горбица 格尔必齐河—1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国家杜马—
 166
 Гродеково 格罗捷科沃车站—185
 Грунтовые пути 土路—357—360
 Гуам 关岛—342
 Гуанчжоувань 广州湾—37

Дагушань 大虎山车站—85, 380
 Дай Дай Ниппон 大大日本—336
 Дайрен 大连—33, 35, 36, 37, 38, 42,
 48, 54, 76, 85, 87, 100, 107, 108, 156,
 157, 171, 202, 266, 267, 278, 291, 328,
 350, 353, 357, 362, 373, 374, 377, 380,

389, 391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远
 东共和国—219, 222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усский 俄属远
 东—48, 76, 83, 84, 92, 109, 118, 122,
 124, 127, 140, 157, 166, 183, 186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советский 苏联
 远东—183, 184, 185, 186, 187, 190,
 192, 197, 210, 215, 217, 275, 335, 337,
 393
 Дарданеллы 达达尼尔海峡—92
 Датун 大同, 满洲国年号—385
 Дауры 达斡尔, 满族—9
 Дашичан 打石场—321
 Дашицяо 大石桥—380
 Даяны 大洋, 纸币—239, 240, 241,
 307
 Двадцать одно требование 二十
 一条—148, 151, 161, 170, 176, 177,
 179, 210, 216, 218, 285, 289, 310, 320
 Дженерал Моторс 通用汽车公司—
 293, 314
 Дова 多瓦, 汽车工业公司—359
 Договора, соглашения 条约, 协定
 —
 Нерчинский Москва-Китай(1689)
 尼布楚条约—10, 11
 Буринский Москва-Китай (1727)
 布连斯奇条约—11
 Кяхтинский Москва-Китай(1729)
 恰克图条约—11
 Айгуньский Россия-Китай (1858)
 璦琿条约—12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первый (1876)
 日中(第一个)条约—17
 Корея—США (1882) 朝美条约—
 18, 40
 Корея—Англия и Германия(1883)
 朝鲜与英德条约—18
 Корея—Россия (1884) 朝俄条约

—18

Японо-корейский союзный (1894)
日朝同盟条约—20
Симоносекский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1896) 马关日中条约—20, 24, 30,
148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896) 日中协定—21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й союзный
(1892) 俄法联盟—2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Корее (1898) 俄日关于朝鲜问题的
协议—22, 3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екретный
(1896) 俄中密约—30, 31, 32, 36,
112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ройку КВЖД
(1896) 建设中东铁路协定—31,
32, 74, 14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об
аренде Ляодуна (1898) 俄中关
于租借辽东协议—33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й обмен нота-
ми (1899) 俄英换照协定—37
Япо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торговый
(1859) 日美贸易协定—39
Англо-япо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902)
英日条约—47, 71, 101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1902) 俄法宣言—72
О-во КВЖД-Гиринский цзян-
цзюнь, угольная концессия
(1902) 中东铁路公司-吉林将军关于
煤矿租让合同—73
О-во КВЖД-Цицикарский цзян-
цзюнь (1902) 中东铁路公司-齐
齐哈尔将军协议—73, 131
О-во КВЖД-Гиринский цзян-
цзюнь о Гирин-Чанчуньской
ж.д. (1902) 中东铁路公司-吉林

将军关于吉长铁路协定—74, 15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об эвакуации
(1902) 俄中关于撤兵协定—78,
79, 80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торго-
вый (1903) 中美贸易协定—85
Англо-япо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второй
(1905) 英日第二次条约—101, 117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1905) 日中协定—105, 113, 157,
29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 ж.
д. (1907) 俄日铁路协定—11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об
эвакуации М. (1905) 俄日关于
撤兵纪要—11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торговый до-
говор (1907) 俄日贸易条约—11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общеполитичес-
кая (1907) 俄日一般政治协定(公
开的和秘密的)—110, 111, 112, 114
США-Манчжур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
бернаторство о ж.д. (1909) 美
国-满洲督军关于铁路协定—115
Паулинг-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банки о
ж.д. (1909) 巴乌林格-美国银行
关于铁路协定—115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ялуцзянской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
ной К° (1908) 日中关于鸭绿江
林业公司的协议—117
Япо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08) 日美协定—118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банки-Китай о
займе (1910) 美国银行团-中国
借款协定—120, 12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контракт (1910)
俄日协定(公开和秘密的)—122 —
126, 128
Вифлеемская Стальная К°-Ки-

тай о Фуджоу (1911) 威福列姆
钢铁公司-中国关于福州煤矿协议
—12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торговый дог.
(1881) 俄中贸易条约—127, 130,
139

О-во КВЖД-Хэйлунцзян об
угольных копях (1907) 中东铁
路公司-黑龙江关于煤矿协议—131

О-во КВЖД-Гирин об угольных
копях (1907) 中东铁路公司-吉林
关于煤矿协议—131

О-во КВЖД-Гирин и Хэйлун-
цзян о лесных концессиях
(1908) 中东铁路公司-吉林、黑龙江
关于林业租让合同—131

О-во КВЖД — дополнит. сог.
с Хэйлунцзяном (1912) 中东铁
路公司-黑龙江补充协定—13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в полосе КВЖД
(1909) 俄中关于管理中东铁路地带
协议—13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секретная кон-
венция (1912) 俄日密约—134,
137—139

Россия с Монгольей (1912) 俄
蒙条约—13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Монголии (1912) 俄中关于蒙古
宣言—137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1907—1908—1909) 中日协定—
157, 158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Гирин-Чанчуньской ж. д. (1908)
日中关于吉长铁路协议—158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обмен нотами
о пяти ж. д. (1913) 日中关于
五条铁路换文约定—158, 277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Цзяньдао (1909) 日中关于间岛
协定—158, 277

Окура-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о (1911)
大仓公司-中国权利协议—160

Иокогама Спеси банк-китайс-
кое пр-во (1915) 横滨正金银行-
中国政府协定—160, 261

Окура-Мукден о ж. д. (1915) 大
仓公司-奉天关于铁路协定—16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т-
крытый и секретный (1916) 俄
日条约及俄日密约—160, 162—
164, 176, 204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915) 中日条约—161, 178, 216,
217, 229

ЮМЖД-китайское пр-во (1917)
南满铁路-中国政府协议—16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Барге (1915) 俄中关于呼伦贝尔
的协定—170, 279

Япо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дог. Лан-
синг-Ишии (1917) 日美蓝辛-石
井条约—176—180, 210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обмен нот о
воен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1918) 日
中关于军事合作的换文协定—183,
200, 217, 221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обмен нот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1918) 日中关
于合作的换文协定—134, 200, 217,
221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военно-морс-
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18) 中日海
军协定—184, 193, 200, 217

Япо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ж. д. (1919) 日美铁路协定—
139

Договор о новом консорциуме

(1920) 新银行团条约—213
 Вашингтонский общий трактат
 (1921) 华盛顿共同条约—215
 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Пекинское пр-во (1920) 俄亚银行-北京政府的约定—219, 222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Пекинский) (1924) 苏中条约—220, 224—226, 231, 234, 239, 259, 276, 303
 Советско-мукденский (1924) 苏奉(天)条约—220, 227, 228, 231, 234, 240, 259, 303
 Японо-советская (1925) 日苏协定—227
 Келлога пакт (1928) 凯洛格公约—254, 339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Никольск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1929) 苏中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议定书—259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1929) 苏中哈巴罗夫斯克议定书—259, 303, 305
 ЮМЖД-Мукден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ж.д. (1924) 南满铁路-奉天关于建设铁路的协定—261
 ЮМЖД-Мукден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Гирин-хойренский ж.д. (1925) 南满铁路-奉天关于建设吉林-会宁铁路的协定—262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контракт о постройке Тяньтуской ж.д. (1918) 日中关于建设天图铁路的协定—263
 Японо-гиринский о Тяньтуской ж.д. (1929) 日本-吉林关于天图铁路的协定—263
 ЮМЖД-Мукден-хайлунская ж.д. о прямом сообщении(1928) 南满铁路-奉天海龙铁路关于直接

通车的协定—282
 Вашингтонский о мор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ях (1921) 华盛顿关于海军装备的协定—342, 387
 Лонд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мор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ях (1930) 伦敦关于海军装备的协定—342, 387
 Дуйциншань 对青山车站—387
 Дуньхуа 敦化市—325, 383
 Дуньхуаский округ 敦化地区—84
 Дуцзюнь 督军,省长—170, 172, 203
 Дычеры 杜切尔人—10

 Европа 欧洲 16, 24, 25, 27, 30, 84, 110, 138, 149, 174, 186, 247, 274, 315, 317, 328, 347, 348, 389, 391
 Египет 埃及—92
 Ежегодники 年鉴
 Описание Кореи 朝鲜记述—17, 18
 Икономик хистори оф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经济史—29, 30, 43, 145, 156, 157, 163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1896 亚洲资料汇编—62
 Описание Мукден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1904 г., Хвостов 赫沃斯托夫: 奉天省记述—83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чжурии, 1897 г., Позднеев 波兹涅耶夫: 满洲记述—8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ВЖД, 1931 г. 中东铁路沿革史—85, 86, 87, 199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о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чжурии и КВЖД, 1927 г. 北满和中东铁路手册—141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работы КВЖД и края 中东铁路和边区工作简论—142—144

Резюме статистик, 1930 г. 经济概要—146, 157

Джапан Ирбук 日本年鉴—162, 268

Чайна Ирбук 中国年鉴—251, 268

Финанш. Анюэл оф Джапан 日本财政经济年报—155, 265, 271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铁路—35, 37, 40, 41, 42, 45, 51, 59, 74, 89, 94, 103, 104, 105, 111, 113, 114, 115, 120, 124, 125, 126, 128, 129, 131, 150, 151, 158, 170, 177, 190, 204, 211, 215, 216, 229, 233, 244, 249, 271, 279—284, 292, 296, 297, 310, 313, 350—357, 364

КВЖД и ЮМЖД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Сибирская 西伯利亚—24, 25, 31, 35, 41, 100, 104

Сеул-Чемульпо 汉城-仁川—40, 41

Транскитайская 横越中国铁路—41

Тяньцзин-Шанхайгуань-Инкоу 天津-山海关-营口—50

Шанхайгуань-Синминтин 山海关-新民屯—51

Пекин-Шанхайгуань-Синминтин 北京-山海关-新民屯—158

Тяньцзин-пекинская 天津-北京—52

Тяньцзин-шанхайгуанская 天津-山海关—52

Цинампо-Гензан-Ийчжоу 镇南浦-元山-义州—87, 89, 90, 94

Фузан-сеульская 釜山-汉城—93

Аньдун-Мукден 安东-奉天—105, 117, 149, 157, 160, 175

Чанчунь-гиринская 长春-吉林—

74, 105, 117, 149, 151, 157, 158, 160, 208, 213, 262

Синминтин-Факумын 新民屯-法库门—113, 115

Амурская 阿穆尔铁路—114, 196, 353, 354

Калган-кяхтинская 张家口-恰克图—114

Цзиньчжоу-Цицикар-Айгунь 锦州-齐齐哈尔-瑷珲—115, 118, 119, 121, 122, 123, 130, 133, 135, 159, 160, 161, 172, 346

Корейско-Манчжурская 朝-满干线—117, 158, 262, 277, 278, 297, 300, 350—355, 372, 384

Синминтин-Мукденская 新民屯—奉天—158, 159

Сыпингай-Чженцзятун-Таонань 四平街-郑家屯-洮南—158, 160, 172, 213, 261, 314

Кайюань-Хайлунчен 开元-海龙城—158

Чанчунь-Таонань 长春-洮南—158, 208, 213, 355

Таонань-Чэндэфу 洮南-承德府—158, 208, 213, 244, 346

Хайлунфу-Гирин 海龙府-吉林—158

Харбин-Сахальян 哈尔滨-黑河—244, 354

Пекин-Мукденская 京奉铁路—246, 282, 297, 325

Таонань-Ананьци 洮南-昂昂溪—261, 262, 297, 325

Чжэнцзятун-Баинтала 郑家屯-白音太来—261

Ананьци-Цицикар 昂昂溪-齐齐哈尔—262

Гирин-Дуньхуа 吉林-敦化—262, 287, 372

Хойрен-Чанбошань (Тяньтуская)
会宁-长白山 (天图铁路) —263,
268, 350, 351

Цзиньчжоу-Чжэнцзятунь 金州-郑
家屯—263

Сейсин-хойренская 清津-会宁—
263, 351

Мукден-хайлунская 奉天-海龙—
282

Дуньхуа-хойренская 敦化-会宁—
300

Хухайская 呼海—313, 353, 356,
383, 384

Гирин-тунцзянская 吉林-同江—
313

Дагушань-Баинтала 大虎山-白音
太来—313

Гирин-лунцзинская 吉林-龙井(延
吉)—315

Лафа-харбинская 拉法-哈尔滨—
350, 335, 355, 356, 384

Дуньхуа-Лаотоугоу 敦化-老头沟
—350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ая “круговая” 北
朝鲜“环行线”—350, 351, 357

Нанио-Чаоянчуань 南阳-朝阳川
—350

Расин-Юуки 罗津-雄基—351, 352

Чаоянчуань-Шансаныфун 朝阳
川-上三峰—351

Комусан-Мусан 古茂山—茂山—
351

Хайлунь-Тайаньчжень 海龙-泰安
镇—353

Цицикар-Тайаньчжень 齐齐哈尔
泰安镇—353

Бейаньчжень-Сахалян 北安镇-黑
河—353, 354

Цицикар-Лаха-Нэхэ 齐齐哈尔-
拉哈-纳河—354

Тумынь-Муданьцзян 图们-牡丹
江—354

Коубэйинцзы-Жэхэ 口北营子-热
河—354

Ляоян-Гунчжулин узк. 辽阳-公
主岭窄轨—354

Баинтала-Кайлу 白音太来-开鲁
—355

Трансмонгольская 横越蒙古铁路
—354

Чанчунь-Юуки 长春-雄基—355

Мукден-Шанхайгуань 奉天-山海
关—355

Ньюсиньтайская, узк. 牛心台窄
轨—372

Желтая река 黄河—37, 337, 392

Желтое море 黄海—37, 353, 378

“Желтороссия” “黄俄罗斯”—86,
170

Желтуги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热尔
图京斯卡雅“共和国”—83

Женева 日内瓦—325, 340, 392

Жунары 期刊

«Современник» «同时代人»—8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海事文集»
—10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俄国档案»—12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阶级斗争»—
32

«Известия МИД» «外交部公报»
32, 47, 61, 132, 133, 137, 139, 141,
172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и» «俄罗斯边疆»
—136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新东方»—26,
103, 174, 196

«Фаристерн Ревю» «远东评论»—
15, 82, 176, 300, 346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红档»—71,
90, 92, 95

«Норс Америкен Ревю» «北美周报»—103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国际生活»—196
 «Вестник НКВД» «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190, 191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японского торгового музея» «日本商品陈列馆经济汇报»—197, 254, 258, 265, 267, 282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летопись» «国际年鉴»—225
 «Чайна Уикли Ревью» «中国周报»—244, 245, 246, 247, 258, 286, 296, 301, 327
 «Джапан Уикли Кроникл» «日本周刊»—245, 247, 248, 249, 286, 296
 «Вестник Манчжурии. КВЖД» «中东铁路. 满洲公报»—86, 264, 266, 267, 273, 280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бюллетень КВЖД» «中东铁路经济消息»—266, 291, 315
 «Бэйнкерс Уикли» «银行周报»—272
 «Новы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新东北»—284
 «Гайко Дзихо» «外交时报»—297, 324, 344
 «Чайниз Экономик Джорнэл» «中国经济杂志»—307, 308
 «Сина» «支那»—313
 «Фортнайтли Ревью» «半月刊»—324
 «Хиноде» «日出»—335, 337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共产国际»—337, 349
 «Пэсифик Эффейрс» «太平洋杂志»—346

«Меркюр дэ Франс» «法兰西信使»—346
 «Кайзо» «改造»—393
 «Чуо Корон» «中央公论»—393
 Жэхэ 热河省—159, 310, 325, 326, 354, 355, 377, 379, 388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地区—48, 185, 191, 200, 322, 393
 Займы 借款—210, 216, 219, 254, 264, 270, 271, 296
 франко-русский Китаю 法俄对中国贷款—30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Корее 美国对朝鲜贷款—41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ые 日本军事借款—103
 Четверного консорциума Китаю 四国银行团对中国贷款—120, 121, 134, 135, 148, 173
 английские Японии для ЮМЖД 英国对日本南满铁路贷款—156, 157
 ЮМЖД китай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南满铁路对中国政府贷款—157, 158
 японские Китаю для ж.д. 日本对中国铁路贷款—158, 159, 160, 161
 Иокогама Спешу пекин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 для Сып.-Чжэнц. ж.д. 横滨正金银行对中国政府为建筑四平-郑家屯铁路贷款—160, 261
 Окура Мукдену 大仓公司对奉天贷款—160, 161
 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ого банка Китаю 俄亚银行对中国贷款—172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й» пятичленного консорциума “改组后

的”五国银行团贷款—173, 174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банков Китаю в
 1916—1917 гг. 美国银行1916—
 1917年对中国贷款—175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од залог КВЖД
 美国对中东铁路抵押借款—196,
 197
 Чосен банка Чжан Цзо-лину 朝
 鲜银行对张作霖贷款—207
 японский для Гирин-чанчуньс-
 кой ж. д. 日本对吉长铁路贷款
 —208
 японский пек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
 ства для Гирин-хойрен. ж. д.
 日本对中国政府为建筑吉林-会宁
 铁路贷款—208
 японский для 4 ж. д. 日本对四
 条铁路贷款—208
 Чосен банка Мукдену 朝鲜银行
 对奉天贷款—208
 Японский пекинскому прави-
 тельству 日本对北京政府贷款—
 208, 209
 Моргана ЮМЖД 摩根财团对南
 满铁路贷款—244
 ЮМЖД для постройки Сып.-
 Таон. ж.д. 南满铁路建筑四平-
 洮南铁路借款—261
 ЮМЖД для постройки Гирин-
 Дуньх. ж.д. 南满铁路建筑吉林-
 敦化铁路借款—262
 ЮМЖД для постройки Таон.-
 Ан. ж.д. 南满铁路建筑洮南-昂
 昂溪铁路借款—261, 262, 283
 Лондона для ЮМЖД 伦敦对南
 满铁路贷款—264
 США для Хухайской ж.д. 美国
 对呼海铁路贷款—313
 США для Манчжурской ж.д. 美
 国对满洲铁路贷款—313

США-манчжур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фи-
 рме 美国对中满商行贷款—315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Синьцзян, ки-
 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中国西部(新
 疆, 中国的土耳其斯坦)—18, 57,
 109, 111, 132, 138, 139, 169, 257,
 301, 329, 337, 389
 Зея 结雅河—9, 393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采金工业
 —378
 И-лоу 挹娄族—5
 Индо-Китай 印度支那—336
 Индия 印度—24, 28, 43, 65, 101, 194,
 319, 328
 Инкоу (Ньючжуан) 营口(牛庄)—
 16, 29, 30, 41, 43, 44, 48, 50, 52, 72,
 81, 83, 84, 107, 156, 176, 324, 357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торой 第二国际
 —252
 Иокогама 横滨—105
 Иокогама Спешу банк 横滨正金
 银行—30, 148, 161, 203, 261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茨克—190
 Испания 西班牙—44
 Италия 意大利—34, 43, 53, 130, 256,
 290
 Ихэтуаны 义和团—49
 Кавказ 高加索—55, 341
 Кайпин 盖平市—324
 Калган 张家口—137, 146
 Камакура 镰仓—244
 Камчатка 勘察加—188, 190, 344
 Канада 加拿大—338
 Кантон 广州—17, 38, 41
 Канчинцзы 甘井子—373, 377
 Канхоа 江华, 朝鲜要塞—39
 Квантун (Ляодун) полуостров 关
 东(辽东)半岛—26, 33, 38, 49

Квантун (Ляодун) арендованн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关东租借地—36, 48, 55, 100, 149, 155, 162, 217, 229, 258, 268, 270—272, 310, 378

КВЖД, Общество 中东铁路公司—31, 32, 48, 51, 56, 73, 74, 75, 79, 84, 89, 100, 117, 125, 127, 128, 131, 132, 142, 143, 144, 149, 165, 173, 182, 185, 188, 190, 194, 195, 198, 217, 220, 258, 259, 267, 276, 291, 304, 305, 313

Китайско-восточ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中东铁路—30, 31, 32, 34, 48, 55, 56, 63, 72, 73, 80, 85, 86, 100, 104, 110, 112, 125, 140, 141, 142, 143, 145, 163, 164, 166, 169, 181, 187, 189, 193, 209, 210, 257, 262, 275, 306, 307, 325, 339, 354, 357, 382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авления 管理局改组—199

КВЖД и СССР 中东铁路与苏联—199, 218, 219-221—235, 236—243, 304—307

КВЖД и Мукден 中东铁路与奉天—226—243, 249, 250—254

Китане 契丹族—6

Киев 基辅—133

Китай 中国

захват манчжурами 满洲人入侵—5, 7

связь с Бохаем 与渤海国的联系—6

захват монголами 蒙古人入侵—6

торговая 贸易—12, 25, 28, 31, 34, 42, 43, 142, 148, 156, 269, 280, 292, 299, 311, 319, 345

объект агресси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其它国家的侵略目标—16, 19, 20, 25, 26, 27, 30, 31, 38, 45, 72, 167, 174, 175, 210—220, 290, 294, 334,

337, 347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社会经济的发展—32, 33, 129, 274, 28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国际关系—12, 13, 56, 57, 58, 60, 85, 127, 140, 153, 156, 164, 165, 171

объект агрессии царизма 沙俄的侵略目标—33, 35, 36, 51, 52, 58, 59, 60, 65, 76, 79, 85, 86, 87, 101, 111, 118, 128, 183

объект агрессии Японии 日本的侵略目标—37, 53, 57, 105, 111, 123, 138, 148, 149, 150, 151, 154, 167, 176—180, 181, 184, 188, 189, 200, 201, 205, 207, 214, 260, 272, 273, 288, 289, 294—302, 320, 328, 329, 336—399, 341, 348

объект агрессии Англии 英国的侵略目标—37, 53, 71

объект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美国的侵略目标—37, 40, 42, 44, 109, 120, 123, 153, 294—302, 336—339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革命运动—108,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50—152, 174, 201, 231, 236, 237, 269, 275, 285, 302, 317, 330, 336, 356

буржуазия 资产阶级—128, 129, 130, 140, 150, 151, 171, 194, 201, 207, 222, 223, 236, 258, 261, 280, 287, 304, 311, 326

борьба милитаристов 军阀的斗争—194, 201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ССР 同苏联的关系—199, 200, 218, 221—227, 303

отношения Нанкина и Мукдена 南京与奉天的关系—251, 252, 259, 286, 288, 301, 304, 311

китай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Манчжу-

рии —中国在满洲的资本—274—
283, 293—295, 302, 319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见 Запад-
ный Китай
китайская феодальная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верхушка 中国封建官僚上层集团—7, 126, 128, 133, 136, 150, 152, 153, 174, 200, 202, 203, 207, 223
Кобе 神户—278
Ксело 皇道—328, 391, 392
Кокумин Домей 国民同盟, 法西斯集团—344
Коминтерн 共产国际—300, 321, 329, 348, 379, 388
Консорциум I четырехчленный 四国银行集团—121, 134, 135, 173
Консорциум II пятичленный 五国银行集团—173—175
Консорциум “новый” 新银行集团—209—214, 216—217, 219, 298, 346
Косекай 贵族院, 政治集团—369
Коубэйиньцзы 口北营子车站—354
Корея 朝鲜—25, 62, 63, 111, 293, 311, 323, 347, 376, 393
подчинение династии Цинов 臣服金朝—6
торговля с Японией 与日本贸易—17, 18
объект агрессии царизма 沙俄的侵略目标—30, 33, 37, 62, 63, 64, 65, 67, 69, 76, 79, 87, 88, 89, 92, 96
король китайский 中国的国王—33
объект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美国侵略的目标—39, 40, 41, 44, 108, 113
объект япо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日本侵略的目标—13, 14, 20, 21, 25, 29, 37, 57, 61, 62, 71, 81, 88, 93, 94,

101, 111
аннексия 并吞—121
хозяйничанье Японии 日本的专横擅权—122, 148, 161, 194, 203, 204, 262—263, 268, 295, 318, 322, 333, 379, 385
Корейский пролив 朝鲜湾—18
Корейцы 朝鲜人—6, 126, 158, 234, 244, 268, 279, 321, 322, 385
Кориэн Дивелопмент К° 朝鲜开发公司—40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红军—191, 192, 199, 200, 222, 256, 257, 335, 387, 393, 394
Кризи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经济危机—290, 292, 293, 299, 302, 304, 312, 315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经济危机—291, 293, 315, 319
в Японии 日本的经济危机—316, 331—333, 355
Куаньчэнцзы 宽城子—43, 100, 164, 165
Куба 古巴—44
Кургис 柯蒂斯, 美国公司—312
Кяхта 恰克图—12

Лазарев 拉扎列夫港—18
Ласел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老爷岭—350
Лаосунл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老松林—354
Лаошагоу 老少沟车站—164, 165
Линь-юань 凌源—354
Лена 勒拿河—9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Японско-манчжурская К° 日满林业公司—375—376
Лига наций 国联—325, 332, 340
Ликин 厘金, 税收—127, 142
Линьцзян 临江—285

Лишу 梨树县—206
 Лондон 伦敦—38, 57, 59, 61, 156
 Лоян 洛阳市—337
 Лунчжень 龙镇车站—354
 Люй-тунь-коу 旅顺口—35
 Ляодунский залив 辽东湾—41, 325
 Ляодун, полуостров 辽东半岛—
 26, 33, 38, 49
 Ляодун, арендованн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见 Квантун
 Ляохэ 辽河—16, 20, 76, 107
 Ляоян 辽阳市—321, 374, 380
 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辽阳战役—98

 Магnezия 氧化镁—375
 Магнитогорск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393
 Малая Азия 小亚细亚—328
 Манчжоу-го 满洲国—328, 349, 356,
 357, 362, 363, 365-374, 377, 387, 390,
 391
 Манчжоу-го-диго 满洲帝国—328
 армия Манчжоу-го 满洲国军队
 —385—387
 манчжурские роли в XVII веке
 满洲在十七世纪的作用—5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манчжур 满洲人的
 联合—5—7
 манчжу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满洲
 国—9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里车站—195, 199,
 242, 257, 258, 321, 322
 Манчжурское гор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满洲采矿工业—75, 76, 79
 Маозэршань 帽儿山车站—387
 Мариинск 马林斯克—11
 Междусоюзный комитет и его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 联盟委员会及
 其技术会议—189, 190, 195, 196, 197,
 219, 220

Мергенъ 墨尔根—172, 354
 Микадо 天皇—317, 318, 327
 Минсейто 民政党(日)—255, 287,
 289, 290, 295, , 316, 317
 Миссеонеры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美国传
 教士—153
 Мишань 密山市—257, 354
 Мицубиси 三菱, 康采恩—210, 316,
 373, 378
 Мицуи 三井, 康采恩—316, 373, 376,
 380
 Монголия 蒙古—57, 81, 108, 110,
 130, 133, 137, 139, 197, 211
 агрессия царизма 沙俄的侵略—
 26, 51, 68, 134, 135, 136, 319
 агрессия Японии 日本的侵略—
 211, 285, 301, 322, 327
 внешняя 外蒙—134, 137, 139, 169,
 213
 внутренняя 内蒙—127, 137, 138,
 139, 178, 328, 329, 334, 335, 336,
 354
 восточная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нголия
 内蒙东部—137, 149, 151, 177, 202,
 203, 204, 212, 213, 216, 244, 260,
 289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
 ка 蒙古人民共和国—328, 349
 Монголы 蒙古人—6, 203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восстания 蒙古起义
 —205—206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фавит 蒙文字母—
 6
 Москва 莫斯科—10, 24, 38, 77, 185,
 301, 303, 304
 Мохэ 漠河市—81
 Муданьцзян 牡丹江—10, 209, 354
 Мукден 奉天—5, 41, 42, 48, 49, 76,
 81, 83, 85, 93, 103, 106, 141, 146, 158,
 161, 175, 195, 247, 248, 286, 291, 314,

322, 324, 326, 360, 362, 379—381
 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奉天会战—39
 Мукде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奉天省—83, 85, 203, 206, 207, 272, 310, 324, 325, 379
 Мукде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奉天政府—220, 224
 Мукденский арсенал 奉天兵工厂—376
 Мукденские милитаристы 奉天军阀—230, 231, 235, 236—243, 245—249, 250—252, 256—259, 280, 287, 292, 294, 295, 312, 325, 327
 Мулин 穆棱车站—242
 Мушиш 穆斯斯河—137
 Нагойя 名古屋—350
 Найцзышаньские копи 奶子山煤矿—372
 Нанкин 南京—26, 254, 286—288
 Нанк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南京政府—247
 Наоецу 直江津—375
 Напа 那坝, 港口—39
 Нарев 那列夫河—64
 Нерч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尼布楚条约—10
 Нефтяная монополия 石油垄断—377
 Ниигата 新潟县—375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на Амур 尼古拉耶夫斯克—11, 12
 Никольск Уссурийский 乌苏里江上的尼科尔斯克—48
 Нинигино Микото 琼琼杵尊, 天皇的祖先—318
 Нингута 宁古塔, 城市—7
 Нишимэн алюминиевая К° 日棉铝公司—374

Нишихаровские займы 西原借款—208, 209, 210
 Нонни, р. 嫩江—10, 110, 165, 167
 Нью-Йорк 纽约—119
 Ньюсиньтайские копи 牛心台煤矿—161
 Ньючжуан (Инкоу) 牛庄(营口)—29, 30, 41, 43, 44, 48, 50, 52, 72, 81, 83, 84, 107, 156, 176, 324, 357
 Ньюаньчитанские копи 暖池塘煤矿—162
 Обществ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外交后援会—287
 Овцеводство 养羊业—380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十月革命—103, 145, 173, 181, 182, 184, 186, 189, 193, 199, 242, 275
 Окура 大仓, 康采恩—159, 160, 372, 376
 Оловянная 奥洛维扬娜亚车站—185
 Онода, цементная К° 小野田水泥公司—374, 375
 Осака 大阪—333, 350
 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восточных провинций 东省特别区—233, 240, 305, 306, 321
 Ориэнталь Консолидэйтед Майнинг К° 东方协同矿业公司—40
 Остиндская К° 东印度公司—64, 65
 “Открытые двери” политика “门户开放”政策—45, 46, 58, 153, 176, 179, 188
 “Память Ленина”, пароход “纪念列宁号”轮船—238
 Панамский канал 巴拿马运河—153
 Пароходство речное КВЖД 中东铁路的内河航运业—234, 235
 Пасифик Стимшип К° 太平洋轮

船公司—104
 Пекин 北京—9, 10, 21, 26, 39, 41, 45,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60, 80, 94, 138, 140, 151, 152, 160, 164, 184, 194, 224, 237, 239, 244, 392
 Пек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北京政府—58, 74, 81, 93, 113, 115, 126, 148, 182, 184, 199
 Пенъя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平安南道—41
 Персия 波斯—25, 68, 92, 317
 Пескадорский архипелаг 澎湖列岛—20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彼得堡政府—11, 25, 29, 37, 42, 57, 58, 60, 61, 72, 73, 74, 79, 80, 81, 85, 94, 114, 117, 124, 137, 139, 157, 186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92, 108, 124, 186
 Нечили 北直隶—73
 Пирл Харбор 珍珠港—342
 Пиртанг 镜泊湖—110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станция 绥芬河车站—110
 Польша 波兰—317, 341
 Порт-Артур 旅顺口—27, 33, 42, 47, 48, 49, 54, 73, 76, 77, 87, 95, 145, 357, 391
 захват царизмом 沙俄占领—36, 37
 война и осада 战争和被围—98, 99
 Порто-Рико 波多黎各—44
 Портсмут 朴茨茅斯—104
 Потемкин, броненосец 波将金装甲舰—171
 Праж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СДРП (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布拉格会议—136, 317
 Приморье 滨海地区—13, 21, 48, 69, 188, 191, 192, 199, 290, 334, 344

Пхион-ан-до 平安南道—88
 Рабочий союз Манчжу-го 满洲国工会—382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无线电站—362—364
 Расин, порт 罗津港—350—352
 Расинская бухта 罗津港湾—352
 Резервисты-переселенцы 军事移民—382—385
 Рейтер 路透社—246, 296, 391
 Риу-Киу 琉球—17, 19, 39
 Россия царская 沙俄
 агрессия царизма 沙皇的侵略—11, 12, 13, 18, 21, 23, 24, 25, 26, 27, 29, 30, 32, 51, 52, 78, 92, 146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 остатки феодализма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主义残余—22, 23, 24, 63, 64, 66, 67, 68, 70, 163, 317, 318
 торговля с Китаем 同中国的贸易—12, 25, 28, 31, 43
 торговля с Манчжурией 同满洲的贸易—30, 33, 101, 142
 агрессия в Корее 对朝侵略—33, 40, 62, 65, 70, 89, 90, 101
 отношения с Англией 同英国的关系—81, 90, 93, 98, 132
 агрессия в Китае 对华侵略—34, 38, 57, 72, 76, 81, 132
 агрессия в Манчжурии 对满侵略—36, 37, 52, 53, 55, 56, 70, 81, 83, 93, 100, 103, 104, 111, 132, 139, 140, 170
 рус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и капиталовложения 俄国资本和投资—34, 35, 67, 68, 70, 72, 77, 84, 91, 101, 106, 109, 133, 135, 140, 141, 144, 145, 166, 172, 197
 дворянско-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ая верхушка 贵族农奴主上层集团—

11, 13, 35, 51, 62, 63, 64, 66, 67, 69, 70, 74, 76, 77, 80, 87, 88, 89, 90, 92, 96, 108, 118, 166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国际关系—45, 46, 47, 58, 59, 61, 80, 81, 109, 113, 115, 120, 127

рус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俄美关系—71, 115, 118, 120, 173, 186

буржуазия 资产阶级—76, 77, 78, 80, 91, 118, 126, 165, 166, 182, 186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 Японией 同日本的矛盾—57, 58, 61, 77, 79, 81, 88, 89, 93, 94, 97, 100, 112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Манчжурии 殖民满洲—86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革命运动—90, 91, 98, 99, 100, 103, 104, 109, 132, 139, 147, 163, 169, 182

раздел Манчжурии 划分满洲边界—110, 114, 116, 124, 125, 126, 139

раздел Монголии 划分蒙古边界—137, 138

Румыния 罗马尼亚—19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俄日公司—136

Сандепу 三源浦—99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旧金山—38, 314

Саньсин 三姓 354, 387

Сахалин 萨哈林(库页岛)—12, 77, 100

Сахалин северный 北萨哈林—188, 192, 318, 325, 334

Сахалин 黑河—353, 354

Сахарные заводы 糖厂—378, 380

Сборники документов 文件汇编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удаков, пер. Цзи-линь Тунчжи 鲁达科夫: 中国文史资料, 译自吉林通志—7, 9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俄国传教士团团员著作集—8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俄中条约集—11, 12, 13

Труды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таможенных сборов 关税署统计课汇报—12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俄国档案—12

Договоры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ак-Мурей, 1918 г. 条约和约定, 马克·穆拉, 1918年—20, 21, 53, 73, 74, 78, 106, 110, 115, 117, 119, 121, 126, 150, 151, 153, 157—161, 170, 172, 175, 178, 182—184, 193, 196, 200, 204, 205, 208, 209

Пролог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26 г., Глинский 格林斯基: 俄日战争序幕, 1926年—25, 31, 66, 79, 81, 88, 93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1927 г., Гримм 格里姆: 条约集, 1927年—31, 125, 137, 168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1915 г. 俄中约定, 1915年—32, 131, 132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альнему Востоку 1895—1905 гг. 远东条约和外交文件集 1895—1905年—37, 71, 72, 101

Синяя книга 蓝皮书—56, 57, 58, 5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Централ-архив, 1925 俄日战争, 中央档案馆, 1925年—62, 65, 92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V 红档, 第五卷

—90, 92, 95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сающиеся соглашения 1907 г. 关于1907年的文件—110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франко-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法俄关系史资料—135, 173
 Сбор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蒙古问题外交文件集—137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Зиберт, 1921 г. 齐柏尔特: 外交文件汇编, 1921年—139
 Вашингто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24 г. 华盛顿会议, 1924年—152, 153, 215—217, 219, 220, 232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колчаковщины, Центрархив, 1926 г 高尔察克匪帮的末日, 中央档案馆, 1926年—191, 195
 Юнайтед Стэйтс Форейн Рилэйшэнс 美国对外关系—132, 172, 176, 177, 206, 217
 Сборник узаконений Между-союзн. 1920 г. 同盟国法令汇编, 1920年—190
 Новый консорциум в Чайна, Ирбук, 1921 г. 伊尔布克: 新银行团在中国, 1921年—210—213
 Китай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24 г. 中国与苏联, 1924年—221, 222, 224, 226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华北—49, 54, 55, 62, 81, 236, 237, 242, 250, 328, 329, 336, 348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北朝鲜—62, 96
 Сейсин 清津港—157, 350—352
 Сейюкай 政友会—230, 238, 246, 255, 285, 287, 288, 290, 295, 316, 349

Сеул 汉城—17, 18, 39, 40, 41, 63, 101
 Сианьские копи 西安煤矿—372
 Сианьфу 西安府—54, 57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9, 24, 51, 65, 84, 183, 184, 186, 190, 197, 212, 275, 307, 308, 349, 389, 392, 393
 Сибирская ж. д. 西伯利亚铁路—24, 25, 35, 41, 100, 101, 186, 190
 Сингапур 新加坡—339
 Синканские копи 新康煤矿—372
 Синьлитунские копи 新立屯煤矿—372
 Сиова, сталелитейный завод 昭和制钢厂—300, 371—378
 Собственно Китай 中国本土—138, 156, 260, 295, 311, 319, 321, 328, 337
 Собственно Япония 日本本土—162, 333, 363, 367, 373—375, 378, 384
 Совет Р и СД Харбинский 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173, 198
 Сода 苏打—378
 Солунь 索伦—158, 205
 Соль 盐—378
 Сондзин 松林—93
 Спиртоводочная К° 烟酒业公司—377
 Спичечная монополия 火柴业垄断—378
 Средний Восток 中东—26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13, 24
 Су-мо 斯摩族—5
 Сунгари 松花江—10, 50, 106, 110, 127, 130, 135, 140, 144, 157, 163—165, 232, 234, 235, 256, 353, 354, 382, 384, 385, 387
 Суйланский уезд 舒兰县—376
 Сферы влияния 势力范围—45, 80, 100, 110, 111, 114, 123, 125, 126, 138, 139, 140, 189, 230
 СССР 苏联

борьба двух систем 两种制度的斗争—181, 187, 192, 200, 207, 221, 222, 228, 238, 252, 304, 307, 309, 329, 330, 335, 336—342, 345—348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同中国的关系—199, 200, 218, 221—227, 303
отношения с Нанкином 同南京的关系—251, 252, 304, 307, 308
отношения с Мукденом 同奉天的关系—226—235, 236—243, 250—252, 256—259, 276, 303, 304—307
отношения с Францией 同法国的关系—228, 250, 253, 254, 340
отношения с Англией 同英国的关系—228, 250, 258, 337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ША 同美国的关系—228, 253, 254, 258, 339, 342
отношения с Японией — 同日本的关系—228, 230, 254, 300
япон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日本的武装干涉—182, 193
англо-француз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英法武装干涉—183—185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美国的武装干涉—185—189, 190—192, 210, 352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反革命—183, 185, 187, 190—192, 195, 198, 199, 225, 231—233
белогвардейцы 白卫军—231—233, 238, 239, 242, 256, 304, 305—307, 388—390
СССР и КВЖД 苏联和中东铁路—199, 218, 219, 221—235, 236—243, 304—307
японская 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 日本反苏宣传—300, 301, 321, 346, 347, 391—393
угроза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войны 反苏战争的威胁—300, 301, 308, 309,

328, 329, 330, 334—342, 345—350, 370

Суйхуа 绥化—381

Суйюань 绥远省—288

Самитомо 住友, 康采恩—333, 373, 375

Суньцзяванские копи 孙家湾煤矿—313

Сучанский лес 苏昌森林—67

Сучанский район 苏昌地区—191

Сушени 肃慎族—5

Сыпингай 四平街车站—374

США 美国

агрессия 侵略—17, 18, 39, 44, 63

торговля с Манчжурией 同满洲的贸易—30, 43, 44, 84, 292, 311, 312

агрессия в Китае 对中国侵略—37, 38, 45, 46, 85, 120, 122, 153, 172, 211, 237, 241, 288, 292, 298, 299, 300, 312, 313, 319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对外贸易—28, 39, 42, 43, 44, 292, 299, 345

агрессия в Корее 对朝鲜侵略—39, 40, 4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国际关系—47, 58, 61, 99, 116, 130, 138, 152, 162

отношения с Японией 同日本关系—94, 97, 109, 113, 118—122, 149, 152, 153, 168, 169, 173, 175, 176—180, 181, 182, 183, 184,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3, 196, 210—220, 255, 256, 279, 283, 287, 288, 289, 290, 295—302, 312—316, 328, 333, 334, 336—347, 349—350, 353, 391

агрессия в Манчжурии 对满洲侵略—22, 41, 58, 72, 84, 85, 104, 108, 114—116, 118, 120, 121, 134,

136, 137, 190, 197, 230, 244—245,
250, 258, 261, 279, 292, 294, 298,
299, 312—316
финансовый капитал 金融资本
—134, 153, 175, 177, 209, 210, 299,
34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国际
关系—175, 205, 210, 214, 226,
239, 283, 290
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反
苏武装干涉—185, 192, 210, 352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ССР 同苏联的关
系—228, 253, 254, 258, 339, 342
флот 海军—342—345, 347
Сюшуйчан 秀水甸子—110
Сяоченцзы 小城子车站—387

Тазы 鞑子族—8
Тайный совет 枢密院—286
Тайпины 太平天国—12
Тайхей Кумнай 太平组合—182,
183
Таку 大沽口—39, 49
Таонань 洮南车站—158, 206, 325
Тереграфно-терелефонная К° 电报
电话公司(美国)—312
Тереграфно-терелефонная К° 电报
电话公司(日满)
Телин 铁岭市—48, 49, 99
Теншо Дайдзин 天照大神—318
Течанские копи 铁厂煤矿—162
Тибет 西藏—92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12, 118, 123,
153, 181, 187, 214, 300, 308, 334, 339,
343, 344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9
Токио 东京—26, 57, 61, 100, 101,
155, 169, 350, 374, 375, 389
Токугав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德川
幕府—14

Толахо 洮儿河—110, 137
Торговля 贸易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俄国与中国贸
易—12, 25, 28, 31, 43
Японии с Кореей 日本与朝鲜贸
易—17, 18
внешняя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外贸
—29, 30, 33, 101, 107, 108, 112
внешняя Китая 中国外贸—12,
25, 28, 31, 34, 42, 43, 142, 148, 156,
259, 280, 292, 299, 311, 319, 345
внешняя США 美国外贸—28, 39,
42, 43, 44, 292, 299, 345
США с Манчжурией 美国与满
洲贸易—30, 43, 44, 84, 292, 311,
312
внешняя Японии 日本外贸—82,
154, 155, 156, 168, 319, 320
Японии с Китаем и Манчжури-
ей 日本与中国及满洲贸易—25,
29, 30, 43, 83, 84, 148, 155, 269,
345
Японии с Манчжурией 日本与
满洲贸易—268, 269, 311, 319
Тотаку, Восточное колоницион-
ное о-во 东洋拓殖公司—198, 204,
314, 378
Тояма 富山县—374
Тумынь 图们江—62, 66, 363, 350
Тумынь 图们车站—354
Тунгусы 通古斯族—6
Тунляо 通辽车站—325
Тунчжоу 通州—59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48, 354, 392
Туркестан Китайский 见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Турция 土耳其—130, 341
Тюренчен 九连城—98
Тяньбаошань 天宝山地区—321
Тяньцзин 天津—18, 321, 324, 388

Тяньшифугоуские копи 田师傅沟
煤矿—161

Убэ 宇部市—375

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煤炭
工业—372—373

Удехэ 乌德海族—8

Удская бухта 乌第湾—11

Улан Батор 乌兰巴托—见 Урга

Улунчурх 乌伦楚尔河—137

Унсань 云山郡—40

Уоллстрит 华尔街—38, 44, 108, 120,
121, 186, 295, 300

Урал 乌拉尔—200, 307, 308, 392

Урга (Улан Батор) 库伦(乌兰巴
托)—137, 146, 322, 346

Уркичхан 乌尔齐奇汉—145

Уссури 乌苏里—10, 12, 389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边区—5,
187

Учанский уезд 五常县—376

Фаншансянь 芳山车站—313

Файф-Лилль 法伊夫-里尔(辛迪加)
—89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二月革命
—172, 238

Феодално-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вер-
хушка в Китае 中国封建官僚上
层—7, 126, 128, 133, 136, 150, 152,
153, 174, 200, 202, 203, 207, 223

Филиппины 菲律宾—39, 44, 85, 336,
342

Финляндия 芬兰—317

Флотилия речная КВЖД 中东铁
路内河舰队—234, 235

Фоккер,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К° 福克
尔汽车公司—314

Форд,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й король 福
特汽车大王—293, 314

Формоза 台湾—17, 19, 20, 21, 39,
46, 148, 318, 323

Франция 法国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国
际关系—21, 22, 26, 38, 45, 52, 53,
72, 90, 97, 112, 120, 138, 167, 168,
210, 214, 221, 245, 256, 290, 391

агрессия в Китае 对中国侵略—
34, 37, 60

торговля 贸易—43

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反
苏武装干涉—183, 185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капитал 法国资本
—34, 60, 72, 97, 109, 134, 194, 210,
254

притязания на КВЖД 对中东铁
路的贪求—219, 220, 222, 224, 226,
230, 238, 254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ССР 同苏联的关
系—250, 253, 254, 340

Фуджоу 福州—46, 122

Фуджоуские копи 福州煤矿—372

Фузан 釜山港—14, 17, 350, 353

Фурукава, концерн 古河, 康采恩—
375

Фуцзинь 富锦

Фуцзянь 道外—102, 126, 171, 197

Фуцзян 福建—37, 46, 122, 138, 149,
334

Фушунь 抚顺—324, 374, 375, 381

Фушунские копи 抚顺煤矿—108,
117, 157, 164, 265—266, 278, 372, 374

Фынтянь 见 Мукденская прозин-
ция

Фынтяньск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 奉系集
团—223

Фынхуанчен 凤凰城—88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11, 48, 50, 192, 393

Хайлар 海拉尔—48, 195, 196, 307, 381
 Хайлунь 海倫—362
 Хайнан 海南—37
 Халдатай 哈尔达旦河—137
 Ханка 兴凯湖—257, 354
 Ханьган 汉江—39
 Ханьдаохэцзы 横道河子车站—242
 Ханьепинск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синдикат 汉冶萍公司—149
 Ханькоу 汉口—41
 Хам-гиондо 咸镜北道—88
 Харбин 哈尔滨—33, 48, 49, 50, 73, 85, 87, 102, 122, 123, 127, 128, 136, 140, 144, 146, 169, 170, 171, 190, 193, 195, 196, 197, 198, 199, 220, 238, 242, 254, 257, 276, 291, 304, 305, 314, 315, 320, 321, 326, 350, 352, 353, 355, 360, 362, 374, 380, 381, 384, 387, 388
 Хаэрбали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哈尔巴岭—350
 Харбинский ипподром 哈尔滨跑马场—268
 Херсон 赫尔松—133
 Хим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化学工业—373, 374
 Хинган 兴安岭—131, 209
 Хинганский туннель 兴安隧道—86, 209
 Хинганский район 兴安地区—322, 323
 Хлопок 棉花—279
 Хобей 河北—137, 288, 310, 328
 Хойрен 会宁—158, 350, 351
 Хуайдэ 怀德县—206
 Хуанкутун 皇姑屯车站—321
 Хуаньхэ 黄河—37, 337, 392
 Хуацзянский 桦甸县—376
 Хуланьский сахарный завод 呼兰制糖厂—378, 380

Хулань, порт 呼兰港—387
 Хулудао 葫芦岛—244, 287, 293, 296, 315, 357, 377
 Хунчунь 琿春—110
 Хурха 呼尔哈, 通古斯族—7
 Хутухта ургинский 库伦呼图克图—134
 Хэганские копи 鹤岗煤矿—293, 313, 372
 Хэйлунцзя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黑龙江省—9, 12, 85, 129, 131, 137, 145, 208, 305
 Цемент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水泥工业—374—375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亚细亚—6, 328
 Цзиньбуху (Бэйху) 镜泊湖(北湖)—293, 383
 Цзиньчжоу 锦州—325, 326, 339
 Цзиньчжоу 金州—55
 Цзиньчжоуские копи 锦州煤矿—162
 Цзинь 金国, 十二—十三世纪—6
 Цзун-ли-ямынь 总理衙门, 外交部—31
 Цзянсу 江苏—273
 Цзянцзюнь 将军—32, 73, 74, 84, 148
 Цзяньдао, район 间岛地区—158, 263, 355
 Цзямусы 佳木斯—134, 382, 383, 387
 Цзяочжоу 胶州—34, 35, 36, 148, 202
 Цзяпигоуские золотые прииски 夹皮沟金矿—162
 Цинампо 镇南浦—63
 Цицикар 齐齐哈尔—41, 48, 113, 170, 172, 195, 242, 262, 325, 353, 354, 360
 Цицикар 齐齐哈尔车站—261
 Цицикар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齐齐哈尔省—见 Хэйлунцзянская провин-

ция

Цуруга 敦贺—278

Цусима 对马岛—65

Цусимский бой 对马战役—99

Цусимский пролив 对马湾—353

Чанбошань 长白山—6

Чанту 昌图县

Чанчунь 长春—158, 193, 258, 324,
355, 360, 363, 367, 375, 376, 389

Чаоян 朝阳市—354

Чахар 察哈尔省—288, 310

Чжалайнор 扎赉诺尔湖—11

Чжалайнор 扎赉诺尔煤矿—86

Чжамянь 扎免, 租让地—209

Чжацзыяо, копи 渣滓窑煤矿—373

Чженцзятун 郑家屯车站—206, 283,
325

Чжеримский сейм 哲里木盟—203

Чжили 直隶—137, 288, 334

Чжилийцы 直系—222, 223

Чжурчжени 女真族—6

Чемульпо 仁川港—17, 40, 93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92, 341

Чифын 赤峰市—354

Чосен банк 朝鲜银行—29, 161, 171,
206, 208, 272

Чукотка 楚科奇—64, 188

Чендэ 承德市—354

Шабин-дабаг 沙宾-达巴哈—12

Шанхай 上海—38, 45, 146, 176, 224,
236, 273, 312, 326

Шанхайгуань 山海关—42, 50, 237,
288

Шаньдун 山东—6, 34, 149, 177, 178,
207, 216, 217, 260, 273, 288, 308, 328,
334

Шаньси 山西—288

Шаньсунганьские копи 杉松岗煤

矿—162

Шаньсунганьское железорудное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е 杉松岗铁矿—162

Шахэ 沙河—98

Шахэкоу 沙河口, 工厂—356

Шахэцзы 沙河子—76, 88

Швейцария 瑞士—64

Шеньси 陕西省—300

Шилка 石勒喀河—11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电力业—376—377

Эмуский уезд 额穆县—376

ЮМЖД 南满铁路, 康采恩—104,
105, 122, 125, 148, 149, 157, 161, 162,
176, 205, 208, 217, 236, 244, 245, 247,
248, 257, 258, 273, 278, 282, 283, 296,
298, 310, 316, 357, 358, 360, 372, 373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овых ж. д. 新
铁路的建筑—261—263, 278, 350,
356

план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改组计划—
364—371

нов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新企业—372
—382

акционерный капитал 股份资本
—263, 264

Южноманчжурская ж. д. 南满铁
路—104, 105, 106, 110, 113, 125, 144,
156, 157, 160, 163, 175, 193, 213, 220,
246, 247, 283, 292, 298, 324, 356

Юунки 雄基港—350—352

Ядор 雅多尔, 林业租让地—145

Якутск 雅库茨克—9

Ялуцзянская япон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 鸭绿江
日中林业公司—117, 159, 160

Ялу 鸭绿江—14, 20, 62, 67, 69, 71,

76, 84, 87, 38, 92, 98, 117, 118

Ялуцзянская русская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 鸭绿江俄国林业公司 (康采恩)—69, 71, 76, 87, 88, 92, 93, 94, 108, 113

Янтайские копи 烟台煤矿—49, 84, 86, 117, 131, 157

Янцзы 扬子江—35, 37, 45, 122

Ямакучи 山口县—375

Ямаго 大和族—336

Япония 日本—6

агрессия в Корее 对朝侵略—14, 17, 18, 20, 40, 61, 63, 97, 101

торговля с Кореей 对朝贸易—17, 18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资本主义的发展—14, 15, 16, 20, 21, 29, 65, 147, 148, 154, 310, 316, 331—333, 339

агрессия в Китае 对华侵略—19, 25, 28, 34, 37, 38, 148, 150, 152, 154, 157, 158, 189, 200, 202, 203, 209, 260, 273, 298, 310, 320, 328, 329

агрессия в Манчжурии 对满洲侵略—20—22, 29, 59, 103—108, 117, 119, 139, 157—163, 193—195, 197, 198, 203—207, 209, 213, 244—249, 258, 260—272, 276—279, 281—287, 288, 289, 296, 297

торговля с Китаем и Манчжурией 对华、满洲贸易—25, 29, 30, 43, 83, 84, 148, 155, 269, 345

торговля с Манчжурией 对满洲贸易—268, 269, 311, 319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对外贸易—82, 154—156, 168, 319, 320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国际关系—26, 47, 94, 105, 112, 120, 135, 171, 188, 226, 256, 341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 русски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同俄帝国主义的矛盾—57, 58, 61, 77, 79, 81, 88—89, 93—97, 100, 112

японо-английский союз 日英联盟—71, 113, 156, 158, 159, 189, 214, 216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 США 同美国的矛盾—46, 105, 106, 108, 109, 115, 116, 118, 119, 120, 137, 152, 153, 168, 173, 175, 176, 180, 183, 186, 187—191, 196, 210—220, 244, 245, 255, 279, 283, 284, 286—288, 289, 290, 294—302, 312—316, 328, 333, 334, 336—347, 349—350, 391

буржуазия 资产阶级—81, 90, 148, 152, 246, 289, 317, 329, 368, 369, 392

капитал 资本—81, 82, 83, 87, 105, 106, 107, 125, 148, 154, 156, 158, 159, 160, 161, 162, 269, 274, 365, 369, 370

сближение с царизмом 与沙俄接近—113, 114, 115, 123, 125, 162—166, 167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革命运动—190, 192, 302, 322, 323, 390—391

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反苏武装干涉—182—193

группировки 集团—230, 289, 369—371

убийство Цжан Цзо-лина 谋杀张作霖—244—249, 285,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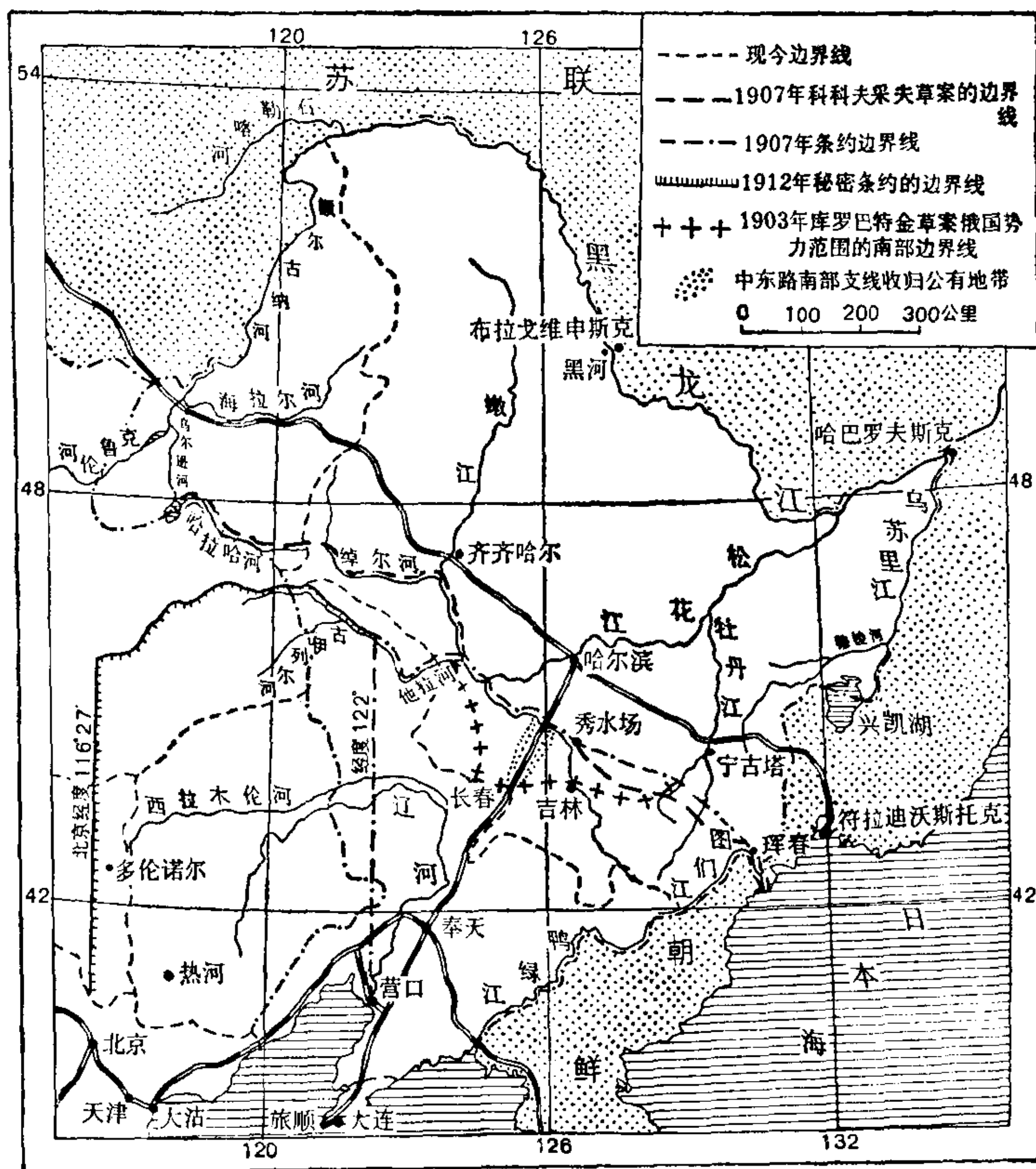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ССР 同苏联关系—226, 228—230, 254, 300

оккупация Манчжурии 占领满洲—310, 316, 320—331, 333, 339

военн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Манчжурii 对满洲军事准备—349—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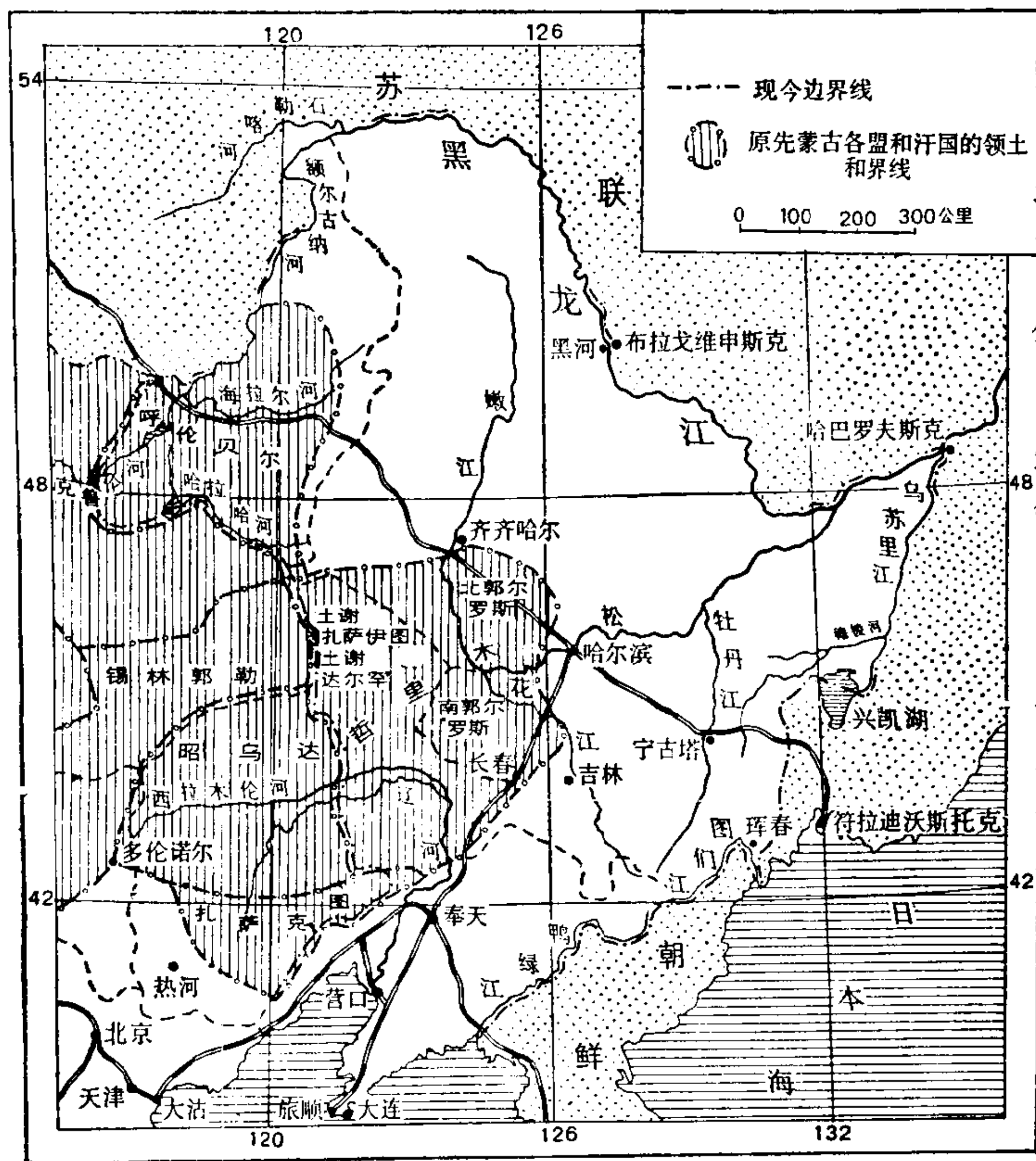
армия в Манчжурии 在满洲的军队—390—391
кризис 危机—316, 331—333, 355
военщина 军阀—348, 349, 356, 357, 359, 360, 364—371
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 反苏鼓动—300, 301, 321, 346, 347, 391—396

подготовка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войны
反苏战争准备—300, 301, 308, 309, 328—330, 334—342, 345—350, 370,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12, 353
Японцы 日本人
в Манчжурии 在满洲—83, 126, 161, 162, 204, 268, 271, 272
в Корее 在朝鲜—93



俄日条约规定的满洲和内蒙分界图

图五



图六

译 后 记

本书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 B. 阿瓦林在三十年代写的作品。作者在著述本书时，很少引用我国的历史文献，而往往是不加批判地引用沙俄的史料，因而不可能正确叙述我国东北的历史。

参加本书翻译校订工作的有俄语教研室的五位同志，黄毅译《绪论》，李绍鹏译《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第三时期》，汪廷乐、杨乃均译《第四时期》，朱得珍校对了《绪论》和《第二时期》，杨乃均校对了其余部分并最后总校一遍。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帝国主义在满州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